第三帝国的兴亡(中)

第十二章　通向慕尼黑的道路

[357]

绿色方案是对捷克斯洛伐克发动突然进攻的计划的代号。我们已经知道，它当初是冯·勃洛姆堡元帅在 1937 年 6 月 24 日制定的。后来，希特勒在 11 月 5 日向高级将领讲话时，又详细地作了说明。他告诫他们“对捷克人的突袭”应当“以闪电式的速度来进行”，而且可能“早在 1938 年”即予执行。”

显然，由于轻易就征服奥地利，绿色方案已成为一项当务之急；这一计划必须立即根据当前形势加以修订，各项准备工作必须也随之开始。希特勒在 1938 年 4 月 21 日召见凯特尔正是为了这桩大事。第二天，新任命的元首军事副官鲁道夫·施蒙特少校，就整理好了一份讨论总结，内容分为三部分：“政治问题”、“军事决策”和“宣传”。[①]

希特勒拒绝了“不必有借口或理由就凭空进行战略进攻的建议”，因为他认为“世界舆论的反对可能引起严重的局势”。第二个办法是，“在经过一段时期能逐步导致危机从而导致战争的外交谈判之后再采取行动”，希特勒认为这也“是不足取的，因为那样以后捷克（绿色）方面就会有所防范”。元首认为，至少就当时而言，还是采取第三个办法为好，即“以一个偶然事件（例如，在一项反德示威中杀害德国公使这样的事件）*为借口，发动闪电进攻”。我们记得，过去也曾计划过以这样的“事件”来为德国进攻奥地利制造口实，当时曾打算把巴本作为牺牲品。在希特勒匪帮的世界中，德国驻外使节肯定是随时可以牺牲的。

希特勒现在已成了德国的最高统帅，因为他已取得了亲自指挥三军的权力，他向凯特尔将军强调必须速战速决。

[358] 采取军事行动的头 4 天，从政治上说，是决定性的。如果不能取得突出的军事胜利，肯定会发生欧洲的危机。既成事实一定能使外国认为军事干涉是没有希望的。

至于战争的宣传方面，现在还不是要用到戈培尔博士的时候，希特勒不过谈了一下“指导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日耳曼人的行动”的传单和那些“包含有恐吓捷克人的威胁”的传单。

希特勒现在决意要消灭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使德国人深恶痛绝的和约的产物。它也是捷克的两个杰出的知识分子托马斯·迎里格·马萨里克和爱德华·贝奈斯亲手缔造出来的。马萨里克是一个马车夫的儿子，靠自学而成为一个大学者，并且成了这个国家的第一任总统。贝奈斯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他靠半工半读，读完了布拉格大学和法国的 3 个高等学府，后来几乎是一再连续担任外交部长，在马萨里克于 1935 年退休以后出任第二任总统。16 世纪时哈布斯堡帝国兼并了古老的波希米亚王国，捷克斯洛伐克现在又从这个帝国中分割出来,在 1918 年建国以后己发展成为中欧最民主、最进步、最文明、最繁荣的国家。

但是，就由于它是由几个不同的民族组成的，它从一开头就苦于一项国

[①] 绿色方案的档案原来存在希特勒的大本营，后来为美军在上萨尔斯堡一地窖中缴获。希特勒—凯特尔 4 月 21 日会谈摘要是其中第二份文件。全部档案在纽伦堡提出作为证据，编号为纽伦堡文件 388—PS。英译文载《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 3 卷，第 306—709 页。收在《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 2 卷，第 239—40 页上的英译文较佳。

内问题，20 年来一直未能完全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少数民族的问题，捷克斯洛伐克国内有 100 万匈牙利人，50 万卢西尼亚人和 325 万苏台德日耳曼人。这些民族都依恋不合地仰望着他们的“ 祖国 ” ——匈牙利、俄罗斯和德意志。虽然苏台德人从来没有归属过德国（除了曾是组织松散的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而只归属过奥地利。至少可以说，这些少数民族要求得到比已有的更多的自治。

就是在 1000 万捷克斯洛伐克人中占 1/4 的斯洛伐克人,也要求某种程度的自治。斯洛伐克人虽然在种族上和语言上同捷克人十分接近，在历史上、文化上和经济上的发展却迥然不同，主要是因为受了匈牙利人几百年统治的缘故。1918 年 5 月 30 日，美国的捷克流亡者和斯洛伐克流亡者在匹兹堡签订了一项协定，规定斯洛伐克人有自己的政府、议会和法院。但是布拉格政府并不认为自己受这一协定的约束，也没有予以遵守。

可以肯定他说，同绝大多数其他国家，即使同西方国家，即使同美国境内的少数民族比起来，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少数民族也过得并不坏。他们不但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利和公民权利——包括投票权在内——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有自己的学校，并且能保持他们自己的文化传统。少数民族政党的领袖常常担任中央政府的部长。虽然如此，捷克人自己还没有完全摆脱奥地利人几百年[359]压迫的影响，在解决少数民族问题方面还有许多欠缺之处。他们往往有沙文主义的表现，而且常常不讲究策略。我还记得我以前在那里的时候所体会到的斯洛伐克人对监禁伏伊特赫·都卡博士一事的愤慨。都卡在当时是一位有声望的教授，他以“ 叛国罪 ” 被判处 15 年徒刑，然而很难说除了争取斯洛伐克自治而外，他还犯了什么别的罪。最重要的是，少数民族集团感到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并没有遵守马萨里克和贝奈斯在 1919 年的巴黎和会上所作的诺言，即建立类似瑞士那样的联邦制度。

大有讽刺意味的是，从下面要谈到的情况看来，苏台德日耳曼人在捷克斯洛伐克国家里过得相当好——肯定要比这个国家内任何其他少数民族过得好，而且也比在波兰和法西斯意大利的日耳曼少数民族过得好。他们固然憎恶在地方上作威作福仿佛土皇帝般的捷克官员，固然憎恶布拉格不时发生的对他们歧视的事件，他们固然失去了过去在哈布斯堡时代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统治地位，因而感到不甘心，但是，他们集居在新共和国绝大部分工业集中的西北部和西南部，生涯日益繁荣富裕，而且随着时间的消逝，他们逐渐达到了同捷克人比较和睦地相处的状态，不过同时也一直在继续要求给他们以更多的自治，对他们在语言和文化方面的权利给以更大的尊重。在希特勒崛起以前，那里并没有什么值得重视的要求更多权利的政治运动。苏台德区绝大多数的选票是投给社会民主党和其他民主党派的。

后来到了 1933 年，在希特勒当了总理以后，国家社会主义的病毒也感染了苏台德日耳曼人。那一年成立了苏台德德国人党（S.D.P.），领导人是一个举止温和的体操教员，名叫康拉德·汉莱因。到 1935 年，这个党就已经受到德国外交部的秘密资助，每月数达 15000 马克。[②]不到两年，它已得到了大部分苏台德日耳曼人的拥护，只有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留在外边。到合并奥地利的时候，汉莱因的 3 年来一直听命于柏林的党，已随时准备执行希

[②] 德国外交部 1938 年 8 月 19 日秘密备忘录，见《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 6 卷，第 855 页（纽伦堡文件 3059—PS）。

特勒的命令了。

为了接受希特勒的命令，汉莱因曾在奥地利被并吞以后两周赶赴柏林，并且曾在 3 月 28 日同希特勒密谈过 3 小时，里宾特洛甫和赫斯当时也在场。据外交部的一份备忘录所载，希特勒的指示是，“苏台德德国人党应当提出捷克政府所不能接受的要求”。汉莱因本人对元首的意见总结为，“我们必须老是提出永远无法使我们满足的要求”。[③]

因此，捷克斯洛伐克境内日耳曼少数民族的困境，对希特勒说来，就像一年以后但泽之于波兰一样，不过是一个借口，以便让他用来在自己所垂涎的土地上制造纠纷，进行颠覆，用来迷惑其友邦，掩饰他的真实意图。至于这种真实意图到底是什么，希特勒已经在 11 月 5 日向军事领袖们所作的演说和绿色方案的头［360］几个指示中表示得清清楚楚了：消灭捷克斯洛伐克，攫取它的领土与人民，使之归属第三帝国。尽管有了奥地利的先例，法国和英国的领导人仍然没有憬悟到这一点。整个春天和夏天，几乎一直到最后，张伯伦首相和达拉第总理同世界上其他绝大部分国家一起，显然还硬是由衷地相信，希特勒的全部要求，不过是要为捷克斯洛伐克境内他的同胞申张正义而已。

事实上，当春天一天比一天暖和起来的时候，英国和法国政府还特意对捷克政府施加压力，要它给予苏台德日耳曼人以范围极广的让步。5 月 3 日，德国新任驻伦敦大使赫伯特·冯·狄克森向柏林报告，哈利法克斯勋爵曾告诉他，英国政府不久将在布拉格采取一项步骤，“其目的在于劝说贝奈斯对苏台德日耳曼人表示最大限度的和解”。[④]四天以后，据德国公使向柏林报告说，驻布拉格的英、法公使就在 5 月 7 日采取了这一外交步骤，敦促捷克政府“尽最大限度”来满足苏台德人的要求。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看到英、法政府如此热心帮助，大概甚为高兴。

话虽如此说，在这一时期，隐蔽德国的目标比过去更为必要。5 月 12 日，汉莱因秘密访问了柏林威廉街。里宾特洛甫当即向他面授机宜，指示他当晚到伦敦去看英国外交大臣首席外交顾问罗伯特·凡西塔特爵士和其他英国官员时如何愚弄英国人。威兹萨克所写的一份备忘录曾记下了应采取的方针如下：“汉莱因将在伦敦否认他是按柏林指示行动的……最后，汉莱因将谈到捷克政治结构逐步解体的问题，以便让那些以为自己仍能为保全这一政治结构而进行干涉的人士知难而退。”[⑤]同一天，德国驻布拉格公使打电报给里宾特洛甫，认为必须预先采取措施，来掩护公使馆给苏台德德国人党以津贴与指示的工作。

美国驻柏林大使休·R·威尔逊在 5 月 14 日拜访威兹萨克，讨论了苏台德危机。威兹萨克告诉他，德国人担心的是，捷克当局为了设法防止“捷克斯洛伐克的解体”正在处心积虑地挑起一次欧洲危机。两天以后，5 月 16 日，施蒙特少校代表当时在上萨尔斯堡休假的希特勒发出了一项紧急的而且是“绝密的”电报，询问最高统帅部，“一旦动员的话”，在捷克前线有多少个师“随时能在 12 小时以内挺进”。最高统帅部的蔡茨勒中校立即复电说“12 个”。希特勒对此感到不满足，又去电追询：“请告各师番号。”[361] 复电

---

③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 2 卷，第 197—98 页。

④ 同上，第 255 页。

⑤ 成兹萨克 1938 年 5 月 12 日备忘录，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 2 卷，第 273—74 页。

来了，列举了 10 个步兵师的番号，还加上了一个装甲师和一个山地师。[6]

希特勒越来越急于采取行动。第二天，即 5 月 17 日，他又向最高统帅部要有关捷克人在苏台德山区国境上建筑工事的确切情报。这些工事当时被称为捷克的马奇诺防线。蔡茨勒当天就从柏林回复了一个很长的“绝密”电报，十分详尽地向元首报告了捷克防御工事的情况。他说明这些工事相当坚固。[7]

第一次危机：1938 年 5 月

从 5 月 20 日那一个星期五开始的周末，渲变成了一个危机的周末，后来被称为“五月危机”，在此后 48 小时之中，伦敦、巴黎、布拉格和莫斯科的政府都惶惶不安，以为欧洲迫近战争之程度为 1914 年夏天以来所未有。这种情况也许主要是由于德国进攻捷克斯洛伐克的新计划可能泄漏所致。这个计划是德军最高统帅部为希特勒所草拟并且在星期五向他提出的。无论如何，至少在布拉格和伦敦，人们都认为希特勒马上就要对捷克斯洛伐克发动侵略了。从这种看法出发，捷克人就开始动员，而英国、法国和俄国在各该国政府认为已迫在眉睫的德国威胁面前也表现了坚定和团结的精神。此后这种精神就消失了，直到一场新的世界大战差点儿把它们消灭掉的时候才又重新出现。

5 月 20 日星期五这一天，凯特尔将军打电报给当时在上萨尔斯堡的希特勒，提出了绿色方案的新草案，这个草案是元首在 4 月 21 日会议上决定了总方针以后由凯特尔和他的助手一直在仔细拟定的。凯特尔在就新计划给领袖的一封极尽阿谀谄媚之能事的信中，说明新计划已考虑到了“由于奥地利并入德国而造成的局面”，新计划在“您，我的元首”予以批准并且在上面签字以前将不会同三军总司令进行讨论。

对“绿色方案”的新指示是 1938 年 5 月 20 日在柏林发出的，它是一个有趣而且重要的文件。它是后来全世界都熟知的纳粹式侵略计划的一个标本。

> [新指示一开头就说]我无意在最近无缘无故即以军事行动粉碎捷克斯洛伐克。除非捷克斯洛伐克境内[原件为着重体]……发生不可避免的局势，迫使我们采取行动，或者欧洲政局的演变给了我们以时不再来的特殊有利机会。[8]

文件中考虑了有三个可以“开始军事行动的政治上的可能性”，其中第一个，“不必有合适的外部借口就发动突然进攻”的可能被拒绝了。[362]

> 最好在下列两种情况下采取军事行动：
>
> （a）经过一段时间的日益严重的外交争吵和军事准备所造成的紧张局面后，再利用这种局面来把战争罪过转嫁到敌方。
>
> （b）根据某一件严重事件，发动闪电式进攻。这种事件使德国遭到无可忍受的挑衅，至少在世界上一部分舆论看来，是构成采取军事行动的迫义上的理由。
>
> 方案（b）更为可取，无论从军事的还是政治的观点来看都是如此。

至于军事行动本身，则要求在 4 天之内就能取得这样的胜利，其后果足以“向企图干涉的敌国表明捷克军事地位业已绝望，同时向那些对捷克有领

---

[6] 所交换的四封电报全文，见《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 3 卷，第 308—9页（纽伦堡文件 388—PS）。

[7] 同上，第 309—10 页。

[8] 凯特尔的信和指令全文载《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 5 卷，第 299—303 页。

土要求的国家提供一种刺激，使之迅即联德反捷”。后一类国家是匈牙利和波兰，这个计划是把它们参加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估计在内的。德国人认为，法国是否会遵守它对捷克人的义务很可以怀疑，但是“预计俄国将企图给捷克斯洛伐克以军事援助”。

德国最高统帅部，至少是凯特尔和希特勒，深信法国不会参战，因此只需“拨出最低限度的兵力来作为西线后卫”，并且还强调“全部兵力都必须用于进攻捷克斯洛伐克”。“陆军主力的任务”是在空军协助下“击溃捷克斯洛伐克陆军，尽快占领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

这将是一场总体战，在德国军人历来的作战计划中，这是第一次强调了指示中所说的“宣传战”和“经济战”的价值，并且把它们编进了全面的军事进攻计划之中。

> 宣传战[原件为着重体]一方面必须以威胁手段恫吓捷克人并瓦解其抵抗力；另一方面也必须给各少数民族以如何支援我们的军事行动的暗示，并且影响中立分子同情我们。
>
> 经济战[原件为着重体]的任务是使用一切经济资源来加速捷克的最后崩溃……在进行军事行动的同时，必须协助加强经济战的全面努力，其方法是迅速收集关于重要工厂的情报，并使各工厂尽速恢复生产，因此，在军事行动允许的范围内，保全捷克的各个工厂与各项工程一事可能对我们有决定性竹意义。

这一纳粹侵略方式后来一直保持着基本来变，而且应用时取得了惊人的胜利，直到很久以后，到全世界对此有所警觉以后为止。

5 月 20 日中午刚过不久，德国驻布拉格公使发出了一封“火，[363]急绝密”的电报，向柏林报告，捷克外交部长刚才用电话通知他，捷克政府对“[德国]军队在萨克森集结的消息颇感困惑”。他说，他已回答说“绝无任何理由对此惊惶”，但是他要求柏林，如果有什么行动的话，马上把情况通知他。

在这个震撼欧洲的周末的一系列紧张的外交来往中，这是第一炮。震撼的原因是人们担心希特勒即将再次行动，而且这一次免不了要发生大战。就我所知，英国和捷克的谍报局究竟根据什么得知德军在捷克边境集中的情报迄今还是秘密。不过，对于仍然因为德军占领奥地利而惊魂未定的欧洲来说，当时情况不无蛛丝马迹可寻。5 月 19 日，莱比锡有一家报纸曾发表了一则德军调动的消息。苏台德的纳粹领袖汉莱因曾在 5 月 9 日宣布他的党同捷克政府之间的谈判已告破裂，而且据说，他在 5 月 14 日自伦敦回国途中曾折赴伯希特斯加登会见希特勒并且仍然逗留未返。在苏台德发生了开枪射击的骚动。5 月整整一个月中，戈培尔博士大肆渲染捷克对苏台德日耳曼人的“恐怖行动”的宣传战有增无已。紧张局势似乎正在趋向顶点。

当时，德军因为进行春季演习而有若干调动，特别是在东部地区，然而从缴获的德国文件中迄今没有找到任何足以表明当时在捷克边境有任何新的突然集结的证据。相反，倒有两份日期为 5 月 21 日的德国外交部的文件，上面有最高统帅部的约德尔上校写给威廉街的内部保证，说不论在西里西亚还是下奥地利都没有这样的集结。约德尔在不准备给外国人看到的函电中说，“除平时演习而外”并无他事。[9]然而，这也不是说，捷克边境就没有德国军队了。我们从上面已经知道，德军最高统帅部曾在 5 月 16 日答复希特勒的紧急询问时报告他说，在捷克边境有 12 个德国师“随时能在 12 小时内挺进”。

---

[9] 同上，第 307—8页。

捷克或者英国的谍报局有没有可能从交换上述情况的电报中得到了什么风声呢？他们有没有可能已经知悉凯特尔在 5 月 20 日电呈希特勒批准"绿色方案"的新指示呢？因为第二天，捷克参谋总长克莱奇将军就告诉德国驻布拉格武官土圣待上校说，他有"无可反驳的证据足以说明有 8 个到 10 个［德国］师在萨克森集结"。[⑩]有关德国师的数目的情报，相差并不太远，虽然关于它们部署的情况多少有些出入。不论怎么说，5 月 20 日下午，在布拉格的赫拉德欣宫，在贝奈斯总统主持下举行了内阁紧急会议以后，捷克人就决走立即实行部分动员。有一级服役年龄的后备兵应召入[364]伍了，某些技术后备人员也动员起来了。捷克政府同两个月以前的奥地利人不一样，不准备不战而降。

捷克的动员，虽然只是部分的，也使希特勒暴跳如雷，柏林德国外交部送到上萨尔斯堡来的电报也不能使他息怒。这些电报都是报告英、法大使一再来访，警告德国，侵犯捷克斯洛伐克就意味着一场欧洲大战。

德国人从来没有受过像英国人在这个周未所施加的那种疲劳轰炸式的外交压力。英国大使尼维尔·汉德逊爵士三番四次地访问德国外交部，询问德军调动的情况并且告诫德国要小心。汉德逊原来是张伯伦首相派到柏林来，发挥他职业外交家的特长，来对希特勒进行姑息的，而他也确实尽了自己的长才。毫无疑问，他是受哈利法克斯勋爵和英国外交部的催促，因为这位温文尔雅的外交家对捷克人并没有多大同情，当时在柏林认识他的人都知道这一点。他在 5 月 21 日见了里宾特洛甫两次。第二天虽然是星期天，还去见了外交部国务秘书冯·威兹萨克，因为里宾特洛甫已经匆促应召到上萨尔斯堡去见希特勒去了。汉德逊递交了哈利法克斯本人出面的一封强调形势严重的信件。在伦敦，英国的外交大臣也在这个安息日召见了德国大使，向他着重指出时局的严重。

从英国的这些外交来往中，德国人并不是没有注意到，英国政府虽然确实知道法国会驰援捷克斯洛伐克，却并没有明白声明英国也会这样做，德国大使冯·狄克森在见了哈利法克斯以后发回来的一份电报中就曾指出这一点。英国人肯做的，像狄克森所说哈利法克斯已做的那样，充其量不过是提出这种警告："欧洲一旦发生战事，英国能否置身事外，殊难逆料。"[①]事实上，这也就是张伯伦政府充其量所肯做的——等到后来再要制止希特勒就为时已晚了。从那时起一直到最后，作者当年在柏林所得到的印象是，如果张伯伦直率告诉希特勒，英国将采取它后来在纳粹侵略面前终于采取的行动的话，元首是决不会发动后来酿成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冒险的。在研究了德国机密文件以后，我的这种印象就更大大地加深了。这就是这位好心肠的首相的致命的错误。

阿道夫·希特勒在他的伯希特斯加登山间别墅里反复思量，认为自己受到了捷克人的极大侮辱，也受到了支持他们的伦敦、巴黎甚至还有莫斯科的极大侮辱。对于这位德国独裁者来说，丢人之难堪，莫此为甚。尤其使他生气的是，他打算要犯的侵略罪行[365]在将犯未犯之际就受到了控告。就在这一周末，他还审查了凯特尔所提出的关于"绿色方案"的新计划。不过这一方案现在不能立即执行了。他只好忍着一肚子气，命令柏林的外交部在星期

[⑩] 德国驻布拉格公使和武官 1938 年 5 月 22 日的电报，同上第 309—10 页。

[①] 冯·狄克森大使 1938 年 5 月 22 日的电报，同上第 322—23 页。

一即 5 月 23 日告诉捷克公使，德国对捷克斯洛伐克没有任何侵略意图，德军在捷克边境集结的传闻毫无根据。布拉格、伦敦、巴黎和莫斯科的政府领导人都松了一口气。他们以为危机已经克服了，希特勒已经得到了一次教训。他现在想必已经懂得，他不能再像他在奥地利那样轻易地进行侵略而侥幸得逞了。

这些政治家们实在不怎么了解这位纳粹独裁者。

他在上萨尔斯堡生了几天闷气，心中怒火如焚，要向捷克斯洛伐克、特别是贝奈斯总统报复，他认定后者是存心丢他的面子。5 月 28 日，他突然出现在柏林，并且在总理府召集国防军高级军官，下达了一项重大决定。8 个月以后，他亲自在对国会所作的演说中谈到这项决定的内容是：

> 我决心要一劳永逸地、彻底地解决苏台德问题。5 月 28 日，我下令：
>
> 1.应当进行准备，以便在 10 月 2 日以前对该国采取军事行动。
>
> 2.我国在西线的防御工事应大大扩大，并且加紧进行……计划立即动员 96 个师，开始先……[①]

他对在场的党羽戈林、凯特尔、勃劳希契、贝克、雷德尔海军上将、里宾特洛甫、牛赖特大声咆哮：“ 把捷克斯洛伐克从地图上抹掉，是我的不可动摇的意志！ ”[②]绿色方案再次提了出来，并且再次修改。

约德尔的日记说明了希特勒报仇心切的思想活动。

> 元首不想在目前挑起捷克问题的初衷，现在已经改变。原因是捷克军队在 5 月 21 日作了战略性的集结，而当时并不存在来自德国方面的任何威胁，也不存在导致集结的丝毫理由。由千德国采取了克制态度，此一行动的后果损害了元首的威望，这是他不愿重见的。因此，在 5 月 30 日发布了关于 “ 绿色方案 ” 的新指示。[③]

希特勒 5 月 30 日签发的关于绿色方案的新指示,其细节与 9 天以前向希特勒提出的基本上并无不同。不过有两项重大的改变。5 月 31 日指示的第一句话是 “ 我无意在最近无缘无故即以军事行动粉碎捷克斯洛伐克 ”，而新指示却是这样开头的 :“ 我的不可空更的决心就是在最近即以军事行动粉碎捷克斯洛伐克。 ”

所谓“ 最近 ” 的涵义，已由凯特尔在一封随件附发的指示信[366]中加以说明。他命令 :“ 务须保证绿色方案最迟到 1938 年 10 月 1 日能够付诸执行。” [④]

这是希特勒不惜赴汤蹈火，不惜冒一次又一次危机，甚至不惜冒大战的危险也要楔而不舍，务见其成的一个日期。

将军们的动摇

约德尔在 5 月 30 日的日记中谈到希特勒签发关于‘ 绿色方案 ’的新指示，也谈到因为新指示要求 “ 在 X 日当天立即攻下捷克斯洛伐克……陆军原来的

[①] 1939 年 1 月 30 日在国会的演说，收 在《我的新秩序》中，第 563 页。

[②] 据希特勒一名当时在场的副官弗里 茨 · 维德曼后来说，他 “ 对这句话极 感震惊 ”。见《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 5 卷，第 743—44 页（纽伦堡文件 3037—PS）。

[③] 约德尔日记，日期未注明，见《主要 战犯的审汛》，第 28 卷，第 372 页 （纽伦堡文件 1780—PS）。

[④] 绿色方案档案第 11 件，见《纳粹的阴 谋与侵略》，第 3 卷，第 315—20 页 （纽伦堡文件 388—PS），另见《德国 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 2 卷，第 357—62 页。

打算必须大加改变”。然后，他又写了下面这样一段话：

> 元首的直觉与陆军的意见之间又一次形成了尖锐的对比。元首的直觉是我们必须在今年就动手；陆军的意见是我们目前还不能动手，因为西方国家几乎肯定会干涉，而我们目前还不足与之抗衡。[①]

这位有先见之明的国防军参谋已经指出在希特勒和某些最高级将领之间出现了一条新的裂痕。不同意元首的侵略宏图的反对派是由陆军参谋总长路德维希·贝克将军所领导的，他从此以后就成了第三帝国内部反对希特勒的微弱的抵抗运动的领袖。后来，这位敏感、聪明、正派然而不能当机立断的将军还将在更广泛的方面同那位纳粹独裁者作斗争。然而，到 1938 年春天为止，虽然已经经过了 4 年多的国家社会主义的统治，贝克还只是从狭隘的本职范围以内的专业理由来反对元首。他的理由是，德国当时还没有强大到足以与西方国家——也许还有俄国——一决雌雄。

我们知道，贝克曾欢迎过希特勒上台，并且曾公开赞扬过元首不顾凡尔赛和约而重建德国征兵制。上文曾提到，早在 1930 年，当贝克还是一个无名的团长的时候，就曾挺身而出为他的三个因在军队中鼓吹纳粹主义而被控犯叛逆罪的部属辩护，而且还曾在最高法院为他们出庭作证。在他之前，希特勒也曾在那里出过庭，并提出警告说，在他当权之后，将会有“人头落地”的事。看来使他清醒过来的并不是元首对奥地利的侵略——那是贝克支持的——而是冯·弗立契将军由于秘密警察的诬陷而人头落地这一事实。在擦去了障眼的尘翳以后，他开始看清了，希特勒不顾高级将领的忠告，处心积虑，不惜冒与英国、法国和俄国作战的风险的政策，如果付诸实施，就会使德国毁灭。

贝克对希特勒与凯特尔在 4 月 21 日的会谈曾有所风闻。希特勒在那次谈话中曾指示国防军加速制定进攻捷克斯洛伐克的计划。从 5 月 5 日开始，贝克给新任陆军总司令冯·勃劳希契将军[367]上了一系列的条陈，坚决反对这种行动。[①]文章写得十分精辟，对一切不容乐观之处痛陈利害，极为坦率，立论也是条分缕析，无懈可击。虽然贝克对英国和法国的意志力量，对两国领袖政治上的狡猾，对法国陆军的力量等估计过高，而且对捷克问题的结局的估计后来也证明是错误的，但是，就德国而言，他的长远预言最后看来都是一一应验，极其准确的。

贝克在 5 月 5 日的条陈中说，他深信，德国如果对捷克斯洛伐克发动进攻，就会引起欧洲大战，英国、法国和俄国都会反对德国，而美国将成为西方民主国家的兵工厂。德国要取胜，实无希望。仅仅缺乏原料这一点，就使它无法赢得战争。他认为，事实上，德国的“军事一经济状况比它在 1917—1918 年”德皇的军队开始崩溃时的处境还要糟糕。

5 月 28 日，希特勒在“五月危机”以后，在总理府召见高级将领，叫嚣要在秋天就把捷克斯洛伐克从地图上抹掉，贝克当时也是在场听训的一个。他对元首的讲话仔细作了笔记。两天以后，就在希特勒签发关于“绿色方案”的新指示，规定要在 10 月 1 日发动进攻的那一天，贝克又给勃劳希契上了一个措辞更为尖锐的条陈，逐点批评了希特勒的论点。为了要使那位谨慎的总

[①] 《主要战犯的审讯》，第 28 卷，第 373 页，收有德文原文。约德尔日记摘录 的英译文收在《纳粹的阴谋与侵略》， 第 4 卷，第 360—70 页中。

[①] 沃尔夫冈·福斯特著上引书第 81—119 页中有备忘录原文。

司令能充分了解自己的意思，贝克亲自向他读了这个条陈。最后，勃劳希契已不大高兴，但他还是对这位比较浅薄的上级强调指出，在“最高级军事领导人”中间存在着危机，曾经造成混乱，如果不予解决的话，军队的命运，事实上，也是德国的命运，将是“一片漆黑”。几天以后，贝克又在 6 月 3 日给勃劳希契发出了另外一个条陈，他在其中声明，关于“绿色方案”的新指示，“从军事上看是不妥当的”，陆军参谋总部对此不表同意。

虽然如此，希特勒还是一意孤行。从被缴获的“绿色方案”档案中可以看出，这年夏天，他变得越来越疯狂。他下令，例行的秋季演习必须提前，以便军队能准备就绪，可以随时出击，必须进行“突袭攻坚”的特种演习。凯特尔将军得到通知“元首一再强调必须加速建筑西线的防御工事”。6 月 9 日，希特勒又一次要关于捷克军备情况的情报，并且马上得到了一份有关捷克人所用的各种大小武器的详细报告。同一天，他又电询：“捷克的据点是否仍然由不满员的驻军防守。”他当时正在他的山间别墅避暑，周围都是些阿谀取宠的屑小之徒，他一直不断地玩火，情绪时而高涨，时而低沉。6 月 18 日，他又发出了一项新的关于“绿色方案”的“总的原则性指示”：

> [368] 目前并无对德国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的危险……只有在我坚信……法国不会出兵，因此英国不会干涉之时，我才会决定对捷克斯洛伐克采取行动。

虽然如此，到 7 月 7 日，希特勒还是提出了如果法国和英国出而干涉该怎么办的几点“考虑”，他说，“第一点考虑”是要在荡平捷克而能移军西向以前“坚守西线”。事实上，当时已没有军队可以用来坚守西线，然而在他发热的脑子里却根本没有这个问题。他警告说，“俄国十有八九会进行干涉”，而且波兰是否就不进行干涉，他目前也还不敢肯定。这种后果必须提防，然而他并没有说如何提防。

希特勒当时远在上萨尔斯堡，多少是处于与世隔绝的环境中，显然还没有听到陆军参谋总部高级军官中间的不同意见。尽管贝克再三上书勃劳希契，这位参谋总长到 7 月间也已觉察到，他那拿不定主意的总司令并没有把他的意见上达元首。因此，贝克在 7 月中旬决定：还是不顾一切，作一番最后的努力，不论用什么方式把事情闹穿，7 月 16 日，他给勃劳希契上了最后一个条陈。他要求陆军告诉希特勒停止备战。

> 在充分意识到这一行动的严重性而同时也充分意识到自己的责任的情况下，我认为，我有责任向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指希特勒]迫切要求取消他对战争的准备并放弃以武力解决捷克问题的意图，除非军事状况有根本改变。就目前而言，我认为它是毫无希望的，这种意见也是参谋总部全体高级军官所共有的。

贝克亲自把这个条陈递交勃劳希契，并且口头补充一项建议：如果希特勒固执己见，陆军将领应采取一致行动。他还具体建议，在这种情况下，高级将领应立即全体总辞职。在第三帝国史上，他第一次提出了一个后来屡次在纽伦堡审讯中提出的问题：一个军官，除了对元首忠诚而外，还有没有更高的忠诚？在纽伦堡，许多将官以否定的回答来洗刷自己的战争罪行。他们说，他们必须服从命令。但是，贝克在 7 月 16 日却持有不同的见解，他坚持这种见解直到最后，虽然多半没有成功。他说，当良心、知识和责任不许可执行某项命令的时候，一个人对最高统帅的忠诚就有了“限度”。他觉得，将官们已经达到了这种限度。如果希特勒坚持要战争，他们就应当集体辞职。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战争就打不起来，因为那样就没有人来领导军队了。

德国陆军参谋总长在他一生中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大彻大[369]悟。他的

眼睛去掉了阴翳，终于看到了德意志民族所面临的危险事大，一个意气用事、不惜冒大战之危险而执意要进攻一个弱小邻邦的歇斯底里的元首可能归于失败事小。第三帝国的全部蠢剧，它的暴虐，它的恐怖，它的腐败，它对古老的基督教精神的蔑视。忽然一下子都被这个一度亲纳粹的将军看透了。3 天以后，7 月 19 日，他再度去见勃劳希契，面陈他的这种觉悟。

他坚持说，将领们不但应当以罢工来阻止希特勒发动战争，而且应当出一把力量来清理第三帝国。德国人民和元首本人都必须免于党卫队和纳粹党棍的恐怖压迫。必须恢复法治的国家和社会。贝克把他的改革计划归纳如下：

> 拥护元首，反对战争，反对党魁统治，同教会和解，结束契卡*恐怖，开放言论自由，恢复法制，削减拔给党的经费的半数，停建各种厅堂大厦，为平民建造住宅，发扬普鲁士的清廉朴素的传统。

贝克在政治上太天真了，他看不到，造成使他反感的当前德国局面的人正是希特勒自己，他所应负的责任要比其他任何一个人都大。虽然如此，贝克当前必须做的仍然是继续吓唬犹疑不决的勃劳希契，使他代表陆军向希特勒提出一项最后通牒，要他停止备战。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他安排在 8 月 4 日召集高级将领举行一次秘密会议。他准备了一篇发聋震聩的讲稿，由陆军总司令来宣读，要高级将领一致要求，不容许任何纳粹冒险引向武装冲突。出乎贝克意料的是，勃劳希契竟没有勇气来宣读。贝克无奈，只好宣读了他自己在 7 月 16 日上的条陈。它在大部分将官中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德国陆军高级军官的会议并没有采取什么决定性的行动就散了。他们没有勇气能够像他们的先辈在霍亨佐伦皇帝和帝国总理面前一样，要希特勒悬崖勒马。

勃劳希契还是鼓足了勇气给希特勒看了贝克 7 月 16 日的条陈。希特勒的反应不是召见支持这一条陈的抗命的高级将领们，而是召见他们下面一级的军官，即陆军和空军各司令部的参谋长。这批人都是少壮派军官，希特勒以为自己只要鼓其如簧之舌，加一番煽惑就可使他们俯首听命。这批人在 8 月 10 日应召到了伯格霍夫——希特勒整整一夏天几乎没有离开过他的山间别墅——在会餐以后面聆希特勒的演说，据当时在场并且把经过如实记入日记的约德尔说，这篇演说讲了将近 3 小时之久。不过这一次，元首的辩才并没有像他原来所希望的那样有效。当时在场的约德尔和曼施坦因，后来都谈到冯·维特斯海姆将军同希特勒之间发生了“一场极严重而且最不愉快的冲突”。维特斯海姆是与会的高级军[370]官，当时是威廉·亚当将军所指挥的西线陆军的内定参谋长。他直言不讳地提出了希特勒和最高统帅部避而不谈的关键问题：在几乎全部兵力用于进攻捷克斯洛伐克的情况下，德国在西线已无防务可言，法国势将乘虚而入，他报告说，事实上，西壁防线无法坚持 3 星期以上。

> 元首[约德尔在日记中说]闻言大怒，暴跳如雷，他说，情况要是果真如此，整个陆军就不值一文钱，“我告诉你，将军先生，[希特勒咆哮说]阵地必然能坚守，不是 3 星期，而是 3 年！”[①]

用什么来守，他并没有说。8 月 4 日，亚当将军曾向高级将领会议报告说，他在西线只有 5 个师可用，如与法军交战，势必寡不敌众。维特斯海姆

[①] 约德尔日记，见《主要战犯的审讯》， 第 28 卷，第 374 页。英译文载《纳粹 的阴谋与侵略》，第 4 卷，第 364 页 （纽伦堡文件 1780—PS）。

大概也曾把同样的数字报告给希特勒，但是元首置若罔闻。约德尔虽然是一位精明的参谋，但是当时完全匍匐在领袖的魔力之下，会后颇感沮丧，认为将领们似乎并不了解希特勒的天才。

这种在陆军参谋总部中不幸极为流行的灭自己志气的意见[指维特斯海姆的意见]，所根据的理由有好几条。

第一条是，它[指参谋总部]未能摆脱对往事的回忆，而且认为自己对政治上的决定也应负责任，而不仅是用从并执行军事上的任务。应当承认，它是以固有的忠诚来执行这一任务的，然而内心却缺乏热忱，因为，归根到底，它并不相信元首的天才。而人们也许是会把他同查理十二* 相比的。

这种失败主义[Miesmacherei]将不仅在政治上产生坏影响，因为人人都在谈论将领与元首之间的意见冲突了，而旦在部队士气方面也要产生坏影响。这种情况正如水往低处流一样是势所必然的。不过，我毫不怀疑，在时机到来之际，元首是能振作士气的。[②]

约德尔也许还可以加上一句，希特勒也是能压平将军们的反叛的。据曼施坦因 1946 年在纽伦堡审讯时说,这次会议是希特勒允许军方可以提出问题或进行讨论的最后一次会议。[①]8 月 15 日在于侍堡阅兵时，希特勒对将军们重申，他已下走决心“以武力解决捷克问题”，这时已没有一个军官敢于——或者说获准——再发一言表示反对了。

贝克看到，自己之所以失败，主要是由于自己的袍泽弟兄们骨头太软。8 月 18 日，他辞去了陆军参谋总长之职。他曾设法使勃劳希契步自己的后尘，但是这位陆军总司令现在已如醉如痴地。[371]拜倒在希特勒的魔力之下，他当时正准备同一个狂热信仰纳粹主义的女人结婚，这一点无疑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哈塞尔这样说他：“勃劳希契耸一耸肩说，‘我是一个军人，服从是我的天职。’”[②]

在通常情况下，陆军参谋总长，特别是像贝克将军这样德高望重的人，在国家用兵之际辞职引退，本来会在军界引起震动，甚至在国外引起反响。但是，希特勒在这里又一次表现了他的权术。虽然他立即接受了贝克的辞呈，而且感到如释重负，他却严禁报纸，甚至政府和军方的官方公报中提到这件事情，并且命令退职的贝克和他的同僚军官严守秘密。理由是，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不能让英法政府得知德国陆军首脑部有意见分歧。很可能，巴黎和伦敦在柏林 10 月底正式宣布这一消息之前，一直都蒙在鼓里。人们大可猜测，如果他们知道了这件事情的话，历史也许竟会走上另外一个方向，对元首的姑息也许不至像后来那样严重。

贝克本人，从爱国和忠于军队的感情出发，也并没有想把他辞职的消息引起公众的注意。不过，他也颇为伤心失望，因为在同意并支持他反对战争的将级军官中竟没有一个人感到应当仿效他的榜样而辞职引退。他并不想劝他们这样做。哈塞尔后来说到他的时候说，他是一个“纯粹的克劳塞维兹，而没有一点勃吕彻尔或者约克的气味”，[①]他是一个有原则、有思想的人，而不是一个能实际行动的人。身为陆军总司令的勃劳希契居然在德国历史的一个决定性的时刻把他甩掉，使他十分愤懑。贝克的这位传记作家和朋友在若

[②] 同上。

[①] 《主要战犯的审讯》，第 20 卷，第 606 页。

[②] 《冯·哈塞尔日记》，第 6 页。

[①] 同上，第 347 页。

干年后提到，这位将军每当提到他的上级的时候总是“ 极为愤懑 ”。在这种场合，他总是激动得浑身发颤，喃喃自语：“ 勃劳希契在紧要关头把我甩掉了。 ”[②]

继贝克出任陆军参谋总长的是 54 岁的弗朗兹·哈尔德——不过他的任命被希特勒保守了几个星期的秘密，一直到危机过去才宣布。他出身于巴伐利亚的一个军人世家，他的父亲是一个将军。本人原来受过炮兵训练，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在巴伐利亚王太子卢伯莱希特的参谋部内担任过军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希特勒在慕尼黑活动的时代，他是罗姆的朋友，虽然这件事本来也许会引起柏林方面对他有某种猜疑，他仍然升迁极快，前一年就已担任贝克的副手。实际上，是贝克向勃劳希契推荐哈尔德做自己的继承人的，因为他知道，他的副手同他的见解是一样的。

哈尔德担任德国陆军参谋总长，在巴伐利亚人中间和天主教徒中间还是第一个，这对军官团新教徒和普鲁士的传统是一次重[372]大的改变。哈尔德是一个博学多闻的人，特别喜欢数学与生物（我自己对他的第一个印象是，他看起来像一个大学数理教授），也是一个虔诚的教徒。他的品德与才干都足以无愧为贝克的继承人。问题是，他是否也像他那位卸任的上级那样缺乏在恰当的时机采取决定性行动的决心；而如果他并不缺少这种决心的话，他是否会在时机到来之际，具有那种毅力，能够不顾自己效忠于元首的誓言而毅然决然起来反对他。因为哈尔德同贝克一样，虽然并没有一开头就参加当时已在酝酿的反希特勒的密谋，然而并不是毫无所闻，而且显然也像贝克一样，是愿意给以支持的，他在出任参谋总长以后，在这第一次认真尝试推翻第三帝国独裁者的密谋中就成了关键性的人物。

反希特勒的密谋的形成

在经过国家社会主义的 5 年半统治以后，对于那些反对希特勒的少数德国人来说，他们心里十分明白，只有陆军拥有能推翻他的实际力量。工人们，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即使有此心也无此力。除纳粹党的组织而外，他们别无组织，当然更没有武装。虽然对于德国的“ 反抗 ”运动本书以后还有许多东西要写，然而，它自始至终都极为微弱，当然，它是由一小部分勇敢而正直的人领导的，却没有群众。

应当承认，仅仅维持本身的存在，在一个侦探密布的恐怖统治的警察国家内就已经是极其困难的事情。而且，一个小小的集团——即使是一个较大的集团，如果有的话——怎么能起而反抗党卫队的机关枪、坦克车和火焰喷射器呢？

一开头的时候，对希特勒的任何反对都是发自文职人员，如上所述，对于将军们来说，纳粹制度挣脱了凡尔赛条约的束缚，给了他们以重建一支伟大的军队这个他们梦寐以求的传统任务，他们欢喜之不暇，也就说不上有什么反对，大有讽刺意味的是，起而领导反对派的文职人员都是曾为元首服务并且身居要职的人，其中大多数最初都曾对纳粹主义抱有热忱。这种热忱直到 1937 年他们开始认识到希特勒是在把德国引向一场几乎肯定要失败的战争时才归于消失。

[②] 福斯特著上引书，第 122 页。

这些最早开始觉醒的人中间有一个是莱比锡市长卡尔·戈台勒。他原来是勃鲁宁任命的物价管制局局长，希特勒上台后继续担任该职 3 年之久。戈台勒是一个保守派，从内心来说还是一个保皇党，他又是一个虔诚的新教徒，聪明能干，精力过人，然而失之不够谨慎与刚愎自用。他在 1936 年因为反对纳粹党人的排犹运动和疯狂扩军而同他们决裂，同时辞去了两项职务，一心一意[373] 地进行反对希特勒的工作。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在 1937 年去法国、英国和美国，用心良苦地警告它们注意纳粹德国的危险。

稍后觉醒的两个后来终于也同谋反对希特勒的人是普鲁士财政部长约翰内斯·波比茨和沙赫特博士，两个人都曾因为在改组德国经济使之适应战争目的方面卓著劳绩而得到过纳粹党的最高勋章——金质荣誉章。两个人都是到 1938 年才开始憬悟到希特勒的真实意图。两个人看来都因为过去的历史和本人的性格而没有受到反对派核心的完全信任。沙赫特太机会主义，哈塞尔在日记里曾说，这位国家银行总裁能够“ 说的是一回事，做的又是一回事 ”，他说贝克将军与冯·弗立契将军对此也有同感。波比茨虽然才华过人，然而见异思迁。他是一个杰出的经济学家，也是一个优秀的希腊学者，同贝克将军和哈塞尔一起参加了星期三俱乐部，这是一个 16 名知识分子的组织，每周集会一次讨论哲学、历史、艺术、科学和文学的问题，它在时机成熟——或者不如说时机坐失——以后形成了反对派的中心之一。

乌里希·冯。哈塞尔成了反对派领导人的某种外交顾问式的人物。他在阿比西尼亚战争和西班牙内战时期曾任驻罗马大使，我们在上文中已经知道，他发出来的电报都是建议柏林如何使意大利同英国和法国纷争不已，从而使意大利站在德国一边。后来他开始担心，如果同法国和英国交战，这将会使德国导致致命的后果，即使德国与意大利结盟，这也会造成同样的结果。他所受的文化教养至深，因此对国社主义的粗鄙庸俗，除了嫌恶鄙弃而外，实在谈不上有什么好感。虽然如此，他可也没有自动弃官，不为这个政权服务。他是在希特勒 1938 年 2 月 4 日所策划的军事、政治、外交人事大改组中彼刷掉的。哈塞尔出身于汉诺威贵族世家，妻子是德国海军的创始人冯·铁比茨海军元帅的女儿，全部气质都是一个纯粹的老派绅士。他同许多同阶级的人一样，看来非得要等到被纳粹党人一脚踢开后才有所震动而想做点什么来推翻他们。一旦过了这一关，这个敏感的、聪明的、矜持的人就专心致志地来从事这项工作，而到最后，我们会看到，为此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遭到了极惨的结局。

还有一些别的人，不那么知名，大多也比较年轻，从一开头就反对纳粹，逐渐结成了各种各样的反抗集团。其中有一个集团的一个杰出之士是埃瓦尔德·冯，克莱施特。他是一个乡下绅士，是大诗人埃瓦尔德·冯·克莱施特的后裔。同他亲密合作的有恩斯特·涅克希和费边。冯·施拉勃伦道夫。前者从前是一个社会民主党人，后来是《维德施但报》（《反抗报》）的主编。后者是一个年轻的律师，是维多利亚女王的私人医生和心腹顾问冯·施托克马尔男爵的外曾孙。也有从前的工会领导人，例如：尤利乌斯·莱伯，雅可布·凯撒，威廉·刘希纳。两个秘密警察的官员：阿图尔·奈比（他是刑事警察的头子）和伯恩德·吉斯维乌斯[374] （他是一个年轻的职业警官），随着反抗密谋的发展而成为得力的助手。后者后来在纽伦堡审讯中成了美国检察官的宠儿，并且写过一本书，虽然大部分历史学家对这本书和它的作者的可靠性都打了很大的折扣，但它还是透露了反希特勒阴谋的许多真相。

还有德国许多名门望族的子弟：赫尔莫特·冯·毛奇伯爵，他是著名的毛奇元帅的侄曾孙，后来组织了一个由一批青年理想主义者组成的反抗集团，名为克莱骚集团：艾尔布莱希特·冯·伯恩斯多夫伯爵，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驻华盛顿大使的侄子；卡尔·路德维希·冯·古登堡男爵，他是直言无忌的天主教月刊的主编；狄特里希·波霍弗牧师，他的先人，不论父系母系都有过杰出的新教教士，他认为希特勒是反基督的，而且认为“把他消灭”是一个基督徒的天职。

几乎所有这些勇敢的人都曾不屈不挠地进行过斗争，最后终于被捕，在受到拷打之后，或者被绞死，或者被砍头，或者干脆被党卫队暗害。

有很长的时间，这种文人的小小的反抗组织在吸引军人来参与他们的工作方面几乎毫无成就，冯·勃洛姆堡元帅在纽伦堡作证时说：“在 1938—1939 年以前，德国将领并不反对希特勒。既然他带来了他们所希望的结果，也就没有反对他的理由。”戈台勒同冯·哈麦施但因曾有过若干接触，但是这位前德国陆军总司令在 1934 年就退休了，对现役将领没有什么影响。在纳粹政权的初期，施拉勃伦道夫曾与卡纳里斯海军上将在德军最高统帅部谍报局内的主要助手汉斯·奥斯特上校有过联系，发现他不但坚决反对纳粹，而且愿意做文人和武人之间的桥梁。然而，直到 1937—1938 年的岁尾年头，在将军们受到一连串的震动以后，他们中间才有人开始警觉到这个纳粹独裁者对德国的危险。这些震动是，希特勒一定要打仗的决定，他对军事指挥系统的大改组，他亲自执掌军权的行动，他对冯·弗立契将军卑劣的处置。

1938 年 8 月底在捷克危机日益紧迫之际，贝克将军的辞职起了进一步促人猛省的作用。虽然他的袍泽军官并没有如他所希望的那样，与他同时引退，但是，事情马上就很明显，这位下野的参谋总长是所有不易驾驭的将官们和文职的反抗领袖们的一个团结的中心。两个集团都尊敬他，信任他。

另外一重考虑，两个集团现在也都看清了：要制止希特勒，就必须用武力，而只有陆军有武力。然而陆军方面有谁能掌握它呢？不是哈麦施但因，甚至也不是贝克，因为他们都已退休了，大家明白，迫切需要的是联络上当时实际指挥驻防柏林内外的部队的将领，以便一旦举事就能立即采取有效行动。新任陆军参谋总长哈尔德将军实际上并无兵权。冯·勃劳希契固然能号令全军，但［375］是不能完全信任。密谋策划者认为，他的权威是有用的，不过只有到最后一刻，才能让他预闻大事。

后来的事实是，很炔就发现了有几位属于要害地位的将领愿意协助，后来也实际参加了酝酿中的密谋。其中有 3 个人掌握着可以决走大事成败的位置，他们是：埃尔温·冯·维茨勒本将军，他是举足轻重的第三军区司令，这一军区包括柏林和柏林周围地区；伯爵埃里希·冯·勃洛克道夫—阿尔菲尔德将军，他是波茨坦驻军司令，该驻军由第二十三步兵师组成；埃里希·霍普纳将军，他指挥驻在图林吉亚的一个装甲师，在必要时，这个师能击退任何企图从慕尼黑来解救柏林的党卫队。

到 8 月底的时候，密谋分子的计划是：在希特勒最后下令进攻捷克斯洛伐克的时候，立即逮捕他，把他拉到他自己设立的人民法庭上去，控诉他轻举妄动地把德国投入欧洲大战，因而他失去执政的资格。与此同时，在一个短时期内实行军事独裁，然后再成立由社会上知名人士领导的临时政府，在适当的时期以后，组织一个保守的民主政府。

有两点考虑是这次政变成败所系的关键，而且与两个主要的政变策划人

哈尔德将军与贝克将军有关。第一点是时间问题。哈尔德同最高统帅部安排好，把希特勒最后下令进攻捷克斯洛伐克的时间在 48 小时以前通知他个人。这样就可以使他有时间在德军越过捷克边境以前就把政变的计划付诸实施。这样他不但可以逮捕希特勒，而且可以防止造成大战的致命的一步。

第二点是贝克必须在事先使将军们而且在事后还要（在计划中的对希特勒进行审讯时）使德国人民相信，进攻捷克斯洛伐克会使英法参战，从而酿成欧洲大战，而德国对这一战争并无准备，必然要归于失败。这本来是他在整个夏天所写的一系列条陈的中心思想，也是他现在所要做的一切——推翻希特勒以保全德国，使它免于一场他认为会使它毁灭的欧洲战争——的根本出发点。

然而，对贝克而且对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前途极为不幸的是，结果证明对于爆发大战的可能性摸得更准的是希特勒，而不是新近辞职的参谋总长。贝克是一个有学识、有历史眼光的欧洲人，他料不到英国和法国居然会硬是牺牲自己的利益而不干涉德国对捷克斯洛伐克的进攻。他懂得历史，然而却不懂得当代的政治。而希特勒却懂得。他相当时期以来就已经感到越来越可以相信自己的判断：张伯伦首相宁肯牺牲捷克而不肯参战，而在这种情况下，法国也不会履行它对布拉格的条约义务。[376]

威廉街并没有漏过纽约报纸早在 5 月 14 日发表的一则电讯。他们驻伦敦的记者报道了张伯伦在阿斯托夫人家里吃饭时一次非正式的谈话。据记者们说，这位英国首相曾说，一旦德国发动进攻，不论英国还是法国，也许还有俄国，都不会出兵驰援，捷克国家不能按目前的形式存在下去，为了和平的利益，英国赞同把苏台德区划归德国。德国人也注意到，尽管在下院内提出了愤慨的质询，张伯伦并没有否认美国记者的电讯的真实性。

6 月 1 日，张伯伦首相曾对英国记者发表了有一部分不能公开发表的谈话，两天以后，《泰晤士报》就开始发表一系列的社论来拆捷克人的台；它要求捷克政府允许国内各少数民族“自治”，“即使这意味着脱离捷克斯洛伐克”，它第一次建议以公民投票的办法来决定苏台德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要求。几天以后，伦敦德国大使馆报告柏林，《泰晤士报》的社论是根据张伯伦的不供发表的谈话写出来的，而且是反映了他的意见的。6 月 8 日，冯·狄克森大使告诉威廉街，张伯伦政府将乐于见到苏台德地区脱离捷克斯洛伐克，只要这是由公民投票所决定的，而且“没有受到德国方面的强制措施的干扰”。[①]

所有这些想必是希特勒所乐于听到的。莫斯科来的消息也不坏，到 6 月底的时候，德国驻俄大使弗雷德里希·瓦尔纳·冯·德·舒伦堡伯爵报告柏林说，苏联“极少可能出兵保卫一个资产阶级国家”，即捷克斯洛伐克。[②]到 8 月 3 日，里宾特洛甫通知德国各主要驻外使节说，不必担心英国、法国、俄国会对捷克斯洛伐克问题进行干涉。[③]

就在 8 月 3 日这一天，张伯伦派了伦西曼勋爵带着一项奇怪的使命到捷克斯洛伐克去充当苏台德危机的“调解人”。他到布拉格那天，我刚好在那里，在参加了记者招待会并且与他的随行人员谈话以后，我在日记上记着，

[①] 1938 年 6 月 8，9 日电报，见《德国外 交政策文件汇编》，第 2 卷，第 395， 399—401 页。

[②] 6 月 22 日电报，同上，第 426 页。

[③] 同上，第 529—31 页。

“伦西曼的全部使命气味不正”。7 月 26 日在下院宣布伦西曼将衔命出使的时候，张伯伦本人曾撒了一个在英国议会史上独一无二的谎言。首相说，他派伦西曼赴捷是“应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请求”。事实上，伦西曼是张伯伦强迫捷克政府同意他去的。不过背后还有一个更大的骗局，人人都知道，张伯伦也知道，伦西曼要在捷克政府和苏台德人之间进行“调解”是不可能而且是讲不通的，他们知道苏台德人的领袖汉莱因[377]并不是一个能自作主张的人，他并不能参加谈判，目前的纠纷是布拉格和柏林之间的问题。从伦西曼到达捷克的当天晚上以及以后几天，我的日记表明，捷克人完全知道伦西曼是张伯伦派来为把苏台德区转交给希特勒一举铺平道路的。这是一个卑鄙的外交花招。

现在 1938 年的夏天已经几乎过完了。伦西曼仆仆往返于苏台德区和布拉格之间。对苏台德日耳曼人的友好姿态越来越多，对捷克政府的要求也越来越多，苏台德人要什么，就要捷克政府给什么。希特勒，他的将军们，他的外交部长也都忙得像发狂似的。8 月 23 日，元首在基尔湾举行海军演习的时候，在派特里亚号邮船上接待了匈牙利的摄政霍尔蒂海军上将和匈牙利政府的成员。希特勒告诉他们，他们如果要想在捷克的宴席上分尝一脔，他们必须赶快采取行动，他说，“谁要想坐席，至少得帮厨”。[①]意大利大使伯纳多·阿托利科也是船上的贵宾。但是，当他追问里宾特洛甫“德国人对捷克斯洛伐克行动”的日子，以便墨索里尼能有所准备的时候，那位德国外交部长却顾左右而言他。很清楚，德国人并不完全信任他们的法西斯盟友能守得住秘密。对于波兰他们倒是完全相信的。整个夏天，驻华沙的冯·毛奇大使都在向柏林报告，波兰不但不愿让俄国人假道以军队和飞机援捷，而且波兰外交部长约瑟夫·贝克上校还对捷克的一块领土特青地区垂涎欲滴。贝克的致命的短视这时已表露出来，而那年夏天在欧洲这种短视的观点却是一个流行的观点，到头来将证明，这种短视的观点为害之大是他所不可能想像到的。

德军最高统帅部和陆军总司令部这时正在日夜工作，忙于草拟能使军队准备就绪好在 10 月 1 日向捷克斯洛伐克挺进的最后计划。8 月 24 日，最高统帅部的约德尔上校给希特勒上了一个紧急条陈，强调“确定能给德国进行军事干涉以口实的‘事件’的确切日期，实为当务之急”。他解释说，调日的日期完全要根据它来决定。

> [他接着说] 在 X 减 1 日* 以前不能采取任何没有正当理由的事前行动。要不然的话，我们就会显得是蓄意制造这一事件的了。如果由于技术上的理由而认为这一事件应当安排在晚上的话，那末就不能以第二天为 X 日，X 日必须再晚一天……所以提出这一点的用意是想说明军方对这一事件极为关切，而且必须及时得悉元首的意图——因为谍报局迄今并未奉命组织这一事件。[①]

到夏天将完的时候，突袭捷克斯洛伐克的周密准备显然已经[378]诸事就绪。然而，如果法国人履行他们对捷克人的诺言而发动进攻的话，西线的防务怎么办？8 月 26 日，希特勒出发到西线巡视工事，随行的有约德尔和负责建造西壁工事的工程师托特博士、希姆莱和党内其他官员。8 月 27 日，指挥西线部队的威廉·亚当将军也参加巡视，在以后的两天中，他亲眼看到希特勒由于莱因兰人对他的热烈欢迎感到乐极忘形，可是亚当将军这位直率而能

[①] 同上，第 611 页。

[①] 绿色方案档案第 17 件，见《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 3 卷，第 332—33 页（纽伦堡文件 388—PS）。

干的巴伐利亚人并不感到高兴，而是大为吃惊。8 月 29 日，在希特勒的专用车厢里演出了惊人的一幕。亚当突然要求同希特勒单独谈话。据这位将军后来说，希特勒在冷笑一下以后就屏退了希姆莱和其他的党羽。亚当二话不说，单刀直入他说明不论把西壁吹得如何天花乱坠，他用手下现有的军队是守不住的，希特勒急躁了起来，并且对他发了一通长篇大论，大吹他已经使德国比英国和法国加起来还要强。

“ 谁要守不住这些工事， ” 希特勒咆哮说，“ 谁就是混蛋！ ”*

虽然如此，除了亚当以外的将领们心中对这一点的怀疑还是与日俱增。9 月 3 日，希特勒在伯格霍夫召见了最高统帅部和陆军总司令部的首脑凯特尔和勃劳希契。当时议定，各野战部队应当在 9 月 28 日在德捷边境沿线进入阵地，最高统帅部必须在 9 月 27 日中午知悉调日究竟是哪一天。希特勒对“ 绿色方案 ”，的作战计划还不满意，下令作了几处修改。据施蒙特少校所保存的有关这次会议的笔记，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至少勃劳希契——凯特尔已谄媚成性难为直言了——再次提出了如何固守西线的问题。希特勒骗他说，他已经下令加速建筑西线的工事了。[②]

9 月 8 日，海因里希 · 冯 · 施图尔纳格尔将军来见约德尔。后者在日记中记下了这位将军对西线军事态势的悲观看法。他们两个人都清楚，希特勒的情绪由于受到刚刚开幕的纽伦堡纳粹党大会的狂热气氛的鼓动而大为高涨，已决意进攻捷克斯洛伐克，而根本不顾法国是否干涉。连一向乐观的约德尔也说：“ 我必须承认，我也感到担心。 ”

第二天，9 月 9 日，希特勒把凯特尔、勃劳希契和哈尔德召到纽伦堡举行会议。这次会议从晚上 10 点一直开到第二天早晨 4 点。据凯特尔后来对约德尔私下透露（约德尔后来把凯特尔的话写到了日记上），会上争论异乎寻常地激烈。哈尔德先前感到自己处境微妙，必须小心谨慎，因为身为要在希特勒下进攻令时举事推翻他的密谋的主角，却不得不十分详尽地解释参谋总部关于进［379］攻捷克斯洛伐克的计划，后来他又感到十分难受，因为他眼看着希特勒把这一计划撕成粉碎，并且不但把他，而且还把勃劳希契痛骂一顿，骂他们胆小，骂他们在军事上无能。[①]据约德尔在 9 月 13 日的日记里写道，纽伦堡的这一场面和德国陆军首脑人物中的出现的“ 失败主义 ” 使凯特尔感到“ 极度震惊 ”。

> 向元首提出了陆军总司令部方面存在着失败主义……凯特尔宣称他决不能容忍最高统帅部有任何军官再事批评埋怨，动摇犹豫，消极悲观……元首已经知道，陆军总司令［指勃劳希契］曾要所属将领支持他，来打开元首的眼界，让他看到他不顾一切希图一逞的冒险。他自己［指勃劳希契］已再也得不到元首的信任了。
>
> 因此纽伦堡的空气极为阴沉，全国都支持元首而唯独陆军高级将领却是例外，诚属不幸。

所有这一切都使少年气盛、自命不凡的约德尔大为扫兴，他已经把自己的前程完全寄托在希特勒身上了。

> 只有通过行动［这些将军们］才能光荣地弥补由于他们缺乏意志力量与服从精神所造成的损失。这是同 1914 年一样的问题。陆军方面抗命的例子只有一个，而这就是将军们的抗命。从根子上来说，这是由于他们骄傲自大。他们准也不相信，谁也不服从，因为

[②] 1938 年 9 月 3 日会议记录，见《纳粹的阴谋与侵略卜第 3 卷，第 334—35 页（纽伦堡文件 388—PS）。

[①] 9 月 9 日会议施密特记录，同上，第 335—38 页。在绿色方案档案中是第 19 件。

他们不承认元首的天才。许多人仍然把他看成是世界大战中区区一个下士，不知道他是俾斯麦以后最伟大的政治家。[①]

当时任陆军总司令部第一处处长并且参与哈尔德的密谋的冯·施图尔纳格尔将军在 9 月 8 日同约德尔谈话时，曾向最高统帅部要求书面保证，保证陆军总司令部能在 5 天以前得到希特勒进攻捷克的命令。约德尔答复说，由于气候难以预料，只能保证在两天以前给予通知。虽然如此，对于反叛分子来说，这也已经够了。

不过，他们还需要另外一种保证——说到最后，他们究竟能否假定，如果希特勒决意进攻捷克斯洛伐克的话，英国和法国一定会对德宣战。为此，他们决定派密使去伦敦，不但要弄清英国政府的意图，而且如果必要，还要影响英国政府的决策。为此目的，将告诉英国政府：希特勒已决定在秋季某一天进攻捷克，参谋总部是知悉这一日期的，也是反对此事的，如果英国能对希特[380]勒坚决反对到底的话,参谋总部准备采取最有决定性的行动来防止此事。

第一个派出的密使是谍报局的奥斯特上校听选派的埃瓦尔德·冯·克莱施特。他在 8 月 18 日到达伦敦，当时早已急于要把希特勒在捷克斯洛伐克所要的任何东西部给他的汉德逊大使，从柏林电告英国外交部，“在任何官方场合接待他（指克莱施特）都是不明智的””。虽然如此，外交大臣的首席外交顾问、伦敦方面反对姑息希特勒的主要人物之一罗伯特·凡西塔待爵士，在克莱施特到达伦敦的当天下午就接见了他,而且当时仍然在野的温斯顿·丘吉尔也在第二天就接见了他。两个人都对来客的严肃和诚恳有极深的印象。克莱施特对他们讲了他受命要讲的活，强调希特勒已定好日子对捷克人发动侵略，大部分将领是反对他的，并且将有所行动，然而如果英国继续姑息希特勒的话，那就是拆他们的台。如果英国和法国肯公开宣布：一旦希特勒对捷发动进攻，它们决不袖手旁观，如果英国某些知名的政治家肯对德国发出严重的警告，指出纳粹侵略能造成的后果的话，那未，德国将领们就会起来制止希特勒。[①]

丘吉尔写了一封振奋人心的信，让他带回德国去鼓励他的同事：

我确信德国陆军或空军大举越过捷克斯洛伐克边境将引起世界大战。我像 1914 年 7 月底一样确信，英国将同法国一起出兵……我祈求诸位，千万不要在这一点上有所误信……”

凡西培特对克莱施特的警告颇为重视,因此曾立即就此事向[381]英国首相与外交大臣提出报告。而且张伯伦虽然在给哈利法克斯勋爵的信中说他倾向于“对他（指克莱施特）所说的话大打折扣”，他也还是说，“我不能肯定说我们不该有所行动”。[①]他的行动就是在制造了一些空气以后，在 8 月 28 日把汉德逊大使召回伦敦“有所咨询”。

他指示他驻柏林的大使做两件事情：向希特勒提出严肃的警告，其次，秘密准备他同元首之间的“个人接触”。据汉德逊自己的说法，他劝首相放

[①] 约德尔日记中关于 9 月 13 日的笔记，见《主要战犯的审讯》，第 28 卷，第 378—79 页（纽伦堡文件 1780—PS）。

[①] 关于克莱施特此行的报告收在《英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 3 卷，第 2 册。

[①]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 3 卷，第 2 册，第 686—87 页。

弃第一点要求。[②]至于第二个要求，汉德逊求之不得，当然乐于遵命。*

这是走向慕尼黑，走向希特勒最大的不流血胜利的第一个步骤。

柏林的密谋分子没有看到张伯伦的这种转向，还想进一步对英国政府提出警告。8 月 21 日奥斯特上校派了一个使者去告诉英国驻柏林的武官，希特勒想在 9 月底侵入捷克斯洛伐克，他告诉英国人：“ 如果外国能以强硬行动使希特勒于最后一刻宣布放弃其目前的打算的话，他在受到这一打击后必将垮台。同样，一旦发生战争，法国和英国如能立即干涉，也会使这个政权倒台。 ”尼维尔 · 汉德逊爵士尽责地把这一警告报告了伦敦，不过却把它说成是“ 显然是有偏向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宣传 ”。随着危机的越来越严重，这位温文尔雅的英国大使眼上的尘瞖似乎也越来越厚了。

哈尔德将军隐隐感到密谋分子并没有能把他们的信息有效地通知英国人，因此在 9 月 2 日派了他自己的密使——已退休的陆军军官汉斯 · 包姆-待特尔巴赫中校——前往伦敦，同英国陆军部和军事情报局取得联系。虽然照这位中校自己的说法，他曾见到了伦敦某些有名人物，然而他似乎并没有给他们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

最后，密谋分子只好利用德国外交部和驻英大使馆来进行最后的努力，设法使英国保持强硬，德国驻英大使馆的参赞兼临时代办是西奥多 · 科尔特，他的弟弟埃里希也在德国外交部任职，是里宾特洛甫的秘书处长。两个人都是冯 · 威兹萨克男爵手下的红人。威兹萨克身任德国外交部的国务秘书，无疑是外交部的大脑，他在战后曾大事宣扬自己反对纳粹的历史，然而却一直为希待勒和里宾特洛甫效命出力，几乎到最后。不过，从缴获的德国外交部的文件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当时确是反对侵略捷克斯洛伐克[382]的，理由同将领们相同，认为那样做，一定会引起战争，而战争又必然会导致失败。在威兹萨克的默许之下，在同贝克、哈尔德、戈台勒商量之后，密谋分子一致同意应由西奥多 · 科尔特去对唐宁街发出最后的警告。他身任大使馆参赞，访问英国当局是不会招人怀疑的。

他在 9 月 5 日见到了张伯伦的亲信霍拉斯 · 威尔逊爵士。威尔逊认为他的话极端重要、极端紧急，马上从后门把他带进了唐宁街外相官邸。他直率地告诉哈利法克斯，希特勒已计划在 9 月 16 日下总动员令，并且已确定至迟在 10 月 1 日进攻捷克斯洛伐克,德国陆军已准备在最后下进攻令时起事反对希特勒，如果英法态度坚定，此事定能成功。他也告诉哈利法克斯，希侍勒 9 月 12 日在纽伦堡党代表大会的闭幕演说将是有爆炸性的，很可能促使在捷克斯洛伐克摊牌，那将是英国站出来反对这个独夫的时候。[①]

科尔特虽然曾同唐宁街不断有个人接触，这次又向外交大臣坦率陈辞，但也不知道当时伦敦的风向。然而，他同任何其他人一样，两天以后，看了 9 月 7 日伦敦《泰晤士报》一篇著名的社论以后，就恍然大悟了，这篇社论说：

> 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值得考虑一下，是否应当完全排除某些人士曾表赞同的计划，也就是割弃某些异族居民所住的与其本种族的国家接壤的边缘地区，从而使捷克斯洛伐克成为一个更加单纯的国家的计划……可以想像，捷克斯洛伐克在种族上如能成为一个更单纯的国家，其利益将超过失去边境上苏台德日耳曼人地区的显著的不利。

[②] 尼维尔 · 汉德逊：《使命的失败》，第 147，150 页。

[①] 埃里希 · 科尔特在其所著《回忆散记》中提供了他兄弟对这次会见的叙述，见该书第 279—81 页。

这篇社论完全没有提到这样一个明显的事实：捷克人一旦把苏台德区割让给德国以后，将不但失去波希米亚周围作为天然防线的高山，而且也将失去他们的“马奇诺防线”，从而在纳粹德国面前处于无险可守的地位。

虽然英国外交部很快就否认《泰晤士报》的社论代表政府的观点，科尔特第二天还是打电报给柏林说，这篇社论可能是“根据首相左右给与《泰晤士报》编辑部的暗示”。其实岂止是可能呢！

目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危机重重的年月里，已很难回忆纽伦堡纳粹党代表大会期间对欧洲各国首都所造成的阴暗的、几乎难以忍受的紧张气氛。这次大会是 9 月 6 日开始的，在 9 月 12 日达到高潮。希特勒预定在这一天向大会作闭幕演说,而世人则[383]预料他将向全世界宣布对捷究竟是战是和的最后决定。我那个星期正在危机中心布拉格，令人奇怪的是，尽管有日耳曼人在苏台德区发动的武力骚动，尽管有柏林的威胁，有英法政府要它屈服的压力，有担心它们会对捷克斯洛伐克撒手不管的恐惧，捷克首都的气氛却比任何其他地方都要平静——至少外表上如此。

9 月 5 日，贝奈斯总统看到，要挽救和平的话，已非由他来采取决定性的行动不可，于是在赫拉德欣宫召见了苏台德人的领袖孔恃和西伯科夫斯基，通知他们以书面提出他们的全部要求。不论这些要求是什么，他都将接受。第二天，苏台德人的副领袖卡尔·赫尔曼·弗朗克叫道：“我的天，他们给了我们一切。”不过，这却正是苏台德的政客们和他们在柏林的主于们最不愿见到的事情。9 月 7 日，汉莱因就在德国的指示下，根据捷克警察在摩拉夫斯卡一俄斯特拉伐有所谓过火行为这样说不过去的借口，而中断了同捷克政府之间的一切谈判。

9 月 10 日，戈林在纽伦堡纳粹党大会上发表了一篇好战的演说。“欧罗巴的一块小小的地方在折磨着全人类……这个可怜的侏儒般的民族[指捷克人]在压迫着一个文明的民族，站在他们背后的是莫斯科和犹太鬼。”但是贝奈斯在同一天所作的广播一点也没有提到戈林的恶骂；那是一篇安详地、庄严地呼吁双方平心静气相见以诚的演说。

虽然表面上如此，捷克人骨子里是紧张的。在贝奈斯博士讲完了话以后，我在捷克广播大厦的前厅遇见他时，看到他的脸色非常沉重，而且看起来完全意识到自己处境极为困难。威尔逊火车站和飞机场挤满了犹太人，争先恐后想得到一个位子转到安全一点的地方去。防毒面具也在这个周未分发给群众。巴黎来的消息说，法国政府因为看到有战争的危险而惊慌失措，伦敦来的消息说张伯伦在考虑采取豁出去的措施来满足希特勒的要求——当然，是以牺牲捷克为代价。

就在这种情况之下，全欧洲都在等待着希特勒 9 月 12 日在纽伦堡的讲话。然而，这位元首在党大会最后一天晚上对纽伦堡体育场上的如醉如狂的纳粹信徒发表的演说虽然粗鲁激烈，而且充满了对捷克国家，特别是对捷克总统的恶毒咒骂，却还并不是一份宣战书。他——至少在公开场合——没有宣布最后决定，事实上，我们从缴获的德国文件中知道，他早已确定以 10 月 1 日为越过捷克边界的日子。在纽伦堡的演说中，他不过要求捷克政府给与苏台德日耳曼人以“公平待遇”。要是它不照办的话，德国就要设法让它一定办到。

希特勒的这番发作，影响颇为可观。在苏台德地区，它引起了一场叛乱，经过两天激战，捷克政府赶紧派兵镇压并且宣布戒[384]严之后方才平息。汉

莱因偷渡边境到了德国，宣布现在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把苏台德地区割让给德国。

我们已经看到，这正是在伦敦日益占上风的解决办法。然而必须首先得到法国的同意之后才能促使其实现。在希特勒讲话以后的第二天，即 9 月 13 日，法国内阁开了整整一天的会，内阁认为德国进攻已经迫在眉睫，然而在法国究竟应否履行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条约义务这一点上陷入分裂，无法得出一致意见。当天晚上，英国大使埃立克 · 菲普斯爵士正在喜剧歌剧院观剧之际，中途被请去同达拉第总理进行紧急磋商，后者要求张伯伦立即设法同那位德国独裁者谈判，尽可能取得最好的结果。

可以猜想，张伯伦先生在这方面毋须促驾，当天晚上 11 点，这位英国首相就给希特勒发出一份急电：

> 鉴于局势日益严重，我提议立即前来见你，以寻求和平解决办法。我提议乘飞机前来，并且准备就在明天启程。
>
> 请赐告你最早能在什么时候见我，并请赐告会面的地点，盼尽早赐复为感。[①]

两小时以前德国驻伦敦的代办西奥多 · 科尔特，曾电告柏林，说张伯伦的新闻秘书告诉他，首相“已准备研究德国的多方面的建议，包括举行公民投票在内，协力促其实现，并且在公开场合加以鼓吹”[②]。

最后在慕尼黑臻于完成的投降就此开始。

张伯伦在伯希特斯加登：1938 年 9 月 15 日

“我的天哪！”（“Ich bin vorn Himmelge fallen！”）希特勒在看到张伯伦的电报时这样叫了起来。[③]他又惊又喜。那位掌握着大英帝国命运的人，那位已经是 69 岁高龄而且从来没有坐过飞机的人居然肯降尊纡贵，不惮作 7 小时的长途飞行到德国最僻远的伯希特斯加登来向他央求，真使他喜出望外，希特勒毫不客气，连建议在莱因兰找一个地点相会都不愿意，而那样原是可以使路程缩短一半的。

英国人似乎认为首相之长途跋涉是要完成阿斯奎斯先生和爱[385]德华 · 格莱爵士在 1914 年所没有做到的事情——警告德国：对小国的任何侵略，不但会引起法国而且会引起英国参战，联合反德。然而不论英国人方面如何热心*，从德国的秘密文件和以后的事态演变看来，希特勒很明白，张伯伦的行动对他说来是一个天赐良机。德国驻英大使馆早已报告过说英国领导人准备倡议实行“德国的多方面建议”，元首十分肯定：张伯伦此次前来等于是进一步保证，英国和法国，将如他一贯认为的那样，不会为捷克斯洛伐克而出兵干涉。首相同他会面还不到一小时，这种事先的估计就成了确定的事实了。

会谈刚开始的时候，虽然希特勒照例只顾自己说话，双方还是有过一番外交上的小交锋。[①]张伯伦是 9 月 15 日中午在慕尼黑机场着陆的，然后就坐

[①]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 2 卷，第 754 页。

[②] 同上，第 754 页。

[③] L·B·纳米尔：《外交前奏曲》，第 35 页。

[①] 关于这次会议的材料不少。唯一在场 充当译员的保罗 · 施密特的正式报 告全文，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 编》，第 5 卷，第 786—98 页。施密特 在他所著《希特勒的译员》一书中提 供了一个目击者的记述，

着一辆敞篷汽车到火车站，再从那里坐 3 小时的专车到伯希特斯加登。他看到一列一列满载德国军队和重炮的火车不断在他眼前开过。希特勒并没有到伯希特斯加登火车站来迎接，而是在伯格霍夫高高的台阶上等候他的贵宾。据德国方面的译员施密特博士后来回忆，这时下起雨来，空中一阵黑似一阵，乌云遮住了群山，时间已经是下午 4 点了，而张伯伦从天明到现在一直都在赶路。

喝过了茶以后，希特勒和张泊沦到了二楼希特勒的书房，这就是 7 个月以前这位德国独裁者接见许士尼格的地方。在汉德逊大使的要求下，里宾特洛甫没有参加会谈。这使这位爱面子的德国外交部长大为恼怒，以致第二天竟拒绝把施密特关于会谈的笔记交给英国首相——这是一种罕见的然而典型的不礼貌行为——弄得张伯伦以后竟不能不光靠自己的脑子来回想希特勒和他的谈话。

希特勒首先讲话，就像他往常的演说一样，长篇大论地吹嘘他对德国人民、对国际和平、对英德亲善的丰功伟绩。他现在下定决心“不论用什么方法”都要解决一个问题。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三百万日耳曼人必须“重返”德国。*

[据施密特的正式记录说]他希望不要对他的绝对的决心产生任何怀疑，他决不能容忍一个小小的二等国家把有 1000 年历史的强大的德国看作仿佛是次一等的国家……他今年 49 岁，如果德国为捷克斯洛伐克问题而卷入一场世界大战的话，他希望他能以壮盛之年的全部精力领导德国度过危难……当然，如果由于这个问题而竟然引起世界大战，他将不胜遗憾。不过这种危［386］险决不能使他的决心有任何动摇……他为此准备迎接任何战争，甚至世界大战。世界上其他各国爱怎么办就怎么办，他决不会后退一步。

希特勒滔滔不绝，大放厥辞，张伯伦简直无法插一言。他的耐心实在惊人，然而也有限度。就在这个时候，他打断了希特勒的话头说：“如果元首已决定用武力来解决这个问题，甚至根本不想在我们之间讨论一下的话，那么为什么还要让我来？我浪费了时间了。”

德国独裁者没有想到别人这样同他顶嘴，因为这时已经没有任何一个德国人敢这样做了。张伯沦的反唇相讥看来起了一点作用，希特勒平静了下来。他认为他们可以谈一谈“最后是否也许还有和平解决希望的问题”。接着，他就猛然提出了他的建议。

英国是否愿意同意割让苏台德区？……按民族自决的原则作出的割让？

这一建议并没有使张伯伦感到震惊。说真的，他还表示满意，因为他们“现在终于接触到了问题的核心”。按照张伯伦根据自己的记忆所作的追述，他回答说，在他同阁员和法国人商量以前还不能把话说死。按照施密特在作口译时的速记记录，张伯伦确实说了这番话，不过他还加上“他可以代表个人说，他承认苏台德区脱离［捷克斯洛伐克］的原则……他希望回到英国向政府报告他的个人态度，并且取得政府的批准”。

自从在伯希特斯加登作出这个投降以后，其他一切就跟着都来了。

显然，这一投降没有引起德国人的惊奇。就在伯希特斯加登会议的当儿，汉莱因从埃格尔给希特勒写了一封密信，上面标的日期是 9 月 15 日，正是他

见该书第 90—95 页。张伯伦的笔记，见《英国 外文政策文件汇编》，第 3 卷，第 338—41 页。他就这次会议写给他的 妹妹的信，见凯思·法林著《尼维尔·张伯伦传》第 366—68 页。另见汉德逊著《使命的失败》第 152—54 页。

越过边境到德国的前夕。

我的元首：

我昨天通知英国代表团［指伦西曼代表团］，继续谈判……只能以实现同德国的统一为基础。

张伯伦很可能建议这样的统一。[①]

第二天，9 月 16 日，德国外交部向驻华盛顿大使馆和驻其他若干国家首都的大使馆发出了下列密电：

元首昨天告诉张伯伦，他已下定最后决心要在最短期间内用一切办法来结束苏台德区不可容忍的局面。现在要考虑的已不是苏台德日耳曼人的自治问题，而是把这一地区割让给德国的问题。张伯伦个人已表示赞同，他现在 正在同英国内阁商量并且同巴黎交换意见。元首与张伯伦之间下一次的会[387]谈，计划在最近举行。[①]

在同希特勒的会谈快结束的时候，张伯伦总算从他那里挖出了一项保证：在他们两人再次会商以前，他不采取任何军事行动。这时候，首相对元首的话还是极为信任的，一两天以后，他在私人场合曾说：“ 尽管我想我在他脸上可以看出这个人凶狠无情，我还是觉得他是一个在作了保证以后可以相信的人。 ”[②]

当张伯伦陶醉在这种自我安慰的幻想中的时候，希特勒却在一股劲儿地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准备进攻捷克斯洛伐克。约德尔上校代表最高统帅部同宣传部制定了一项计划，他在日记中把它称之为“ 在否认我们自己违反国际法方面的联合准备 ”。未来的战争将是一场残酷的战争，至少在德国方面来看是如此，而戈培尔博士峋工作就是为纳粹的过火行为辩解。关于他如何撒谎的计划，定得极为详细[③]，9 月 17 日，希特勒指定最高统帅部的一名参谋去协助现在拜罗伊特郊外顿道夫的一座古堡中设立总部、从事其活动的汉莱因组织苏台德自由团。苏台德自由团装备着奥地利的武器，它从元首那里奉到的命令是：同捷克人不断保持“ 冲突和纠纷 ”。

9 月 18 日这一天，张伯伦忙着争取他的内阁阁员和法国人同意他的投降政策。对于希特勒和他的将军们说来，这一天也是一个忙日子。5 个军团（第二、第八、第十、第十二、第十四军团）共计 36 个师（包括 3 个装甲师）的行动时间表下达了。希特勒也批准了 10 个军团的指挥官人选。亚当将军，尽管桀骜不驯，仍然统率西线德军。奇怪的是，两个密谋反叛的退职将军居然也重新起用，贝克将军指挥第一军团，冯 · 哈麦施坦因将军指挥第 四军团。

为了对捷克进行最后打击，政治方面的准备也在加紧进行。缴获的德国外交部文件充满了不断对匈牙利和波兰增加压力，要它们参与分肥的文件，德国人甚至还拉斯洛伐克人下水来制造麻烦。9 月 20 日，汉莱因鼓动他们把他们的自治条件提得“ 更加尖锐 ”。同一天，希特勒接见了匈牙利总理伊姆雷第和外交部长卡尼亚，对布达佩斯所表现的畏缩犹豫大加申斥。有一项外交部的备忘录曾详细地谈到这次会晤的情况。

首先，元首对这两位匈牙利先生斥责了匈牙利举棋不定的态度。他，元[388]首，已决意解决捷克问题，即使冒引起世界大战的危险也在所不惜……（不过）他深信不论英国

---

①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 2 卷，第 801 页。

① 同上，第 810 页。

② 法林著上引书，第 367 页。

③ 《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 6 卷，第 799 页（纽伦堡文件 C—2）。

还是法国都不会干涉。匈牙利要参与大事，现在已是最后的机会了。它要是不参加的话，他就不能为匈牙利的利益说话。他的意见是，最好就是消灭捷克斯洛伐克……

他向匈牙利人提出两项要求：

（1）匈牙利应当马上提出在它所希望取得的领土内进行公民投票的要求。

（2）它对任何方面提出的关于确定捷克斯洛伐克新边界的建议应不作任何保证。[①]

从希待勒向匈牙利人说得很明白的话里可以看出，不论张伯伦愿意怎么办，就是残存的那个捷克斯洛伐克，希特勒也不打算让它长期存在。至于对英国首相：

元首宣称，他将把德国的要求直截了当地提交给张伯伦，他的意见是，军队的行动将能提供最能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不过，还是有捷克人可能接受一切要求的危险。

在这位德国独裁者同毫不见疑的英国首相以后举行的历次会议上，这是他一直担心的危险。

在柏林的鼓动下，波兰政府在 9 月 21 日向捷克人提出，要求在有大量波兰人居住的特青地区举行公民投票，并且把部队开到了这一地区的边境。第二天，匈牙利政府也如法炮制。就在这一天，即 9 月 22 日，苏台德自由团在德国党卫队的支援下侵占了为德国领土包围的两个捷克边境小城——阿舍和埃格尔。

9 月 22 日，事实上在全欧洲都是一个紧张的日子，因为在那天早晨，张伯伦又再次出发到德国去同希特勒会谈了。现在必须简单回顾一下英国首相两次访问德国元首之间在伦敦做的事情。

在 9 月 16 日回到伦敦的当晚，张伯伦就召集了一次内阁会议，让他的阁员们了解希特勒的要求，同时电召伦西曼勋爵从布拉格回国提出建议。这些建议叫人大吃一惊。热中于姑息希特勒的伦西曼居然比希特勒还要干脆。他主张把主要由苏台德人居住的地区立即移交德国，根本不必费事举行什么公民投票。他竭力主张以合法手段制止“各政党或个人”对德国在捷克斯洛伐克所作所为的一切批评。他要求捷克斯洛伐克，甚至在它的山地天险和防御工事已被剥夺因而已处于绝境以后，还要“改变它的外交政策，使各邻邦相信它决不会向它们发动进攻或者由于对其他国家所负的义务而参预反对它们的任何侵略行为”。伦西曼在这个时候居然还会担心一个残存的捷克国家有对纳粹德国发动侵略的危险，似乎不可思议，但是，他这种异想天开的建议，显然对英国内阁造成了深刻的印象，并且使张伯伦打算满足希特勒的要求的[389]想法更加加强了。*

达拉第总理和他的外交部长乔治·庞纳 9 月 18 日到伦敦同英国内阁商量。根本没有考虑让捷克人参加。英国人和法国人不惜任何代价力求避免战争，没有花多少时间就商定共同提出一项一定要捷克人接受的建议。凡居民半数以上为苏台德日耳曼人的领土必须交给德国，以保证“和平得以维持而捷克斯洛伐克的根本利益亦得以确保安全”。英国利法国则另外同意一起作出一项“担保新边界……不受无端侵略……的国际保证”。这种保证将代替捷克斯洛伐克与法国和俄国之间现有的互助条约。对法国人来说，这是一条方便的下台阶的办法，在庞纳的带头之下（后来的局势演变证明，庞纳已决心在姑息希特勒方面胜过张伯伦），他们立刻抓住不放。然后就发生了下面的一番伪善的哀告：

[①]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 2 卷， 第 863—64 页。

[他们在给捷克的一次正式照会中说]法英两国政府明白为了和平事业要求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作出何等巨大的牺牲。但是由于这一事业既关系到欧洲全体，也关系到捷克斯洛伐克本身，它们认为，它们有责任一起坦率提出获致和平所必需的条件。

而且，它们的行动也赶得很紧。德国的独裁者已经迫不及待了。

首相必须立即与希特勒先生重新会谈，至迟不超过星期三[9 月 22 日]。若有可能，越早越好。我们因此感到我们必须请求你们尽早答复。[①]

就这样,英国和法国驻布拉格公使在 9 月 19 日中午一起向捷克政府递交了英法建议。捷克政府在第二天以一项庄严的复照拒绝了这个建议，它的预言一样的解释是，接受这个建议将使捷克斯洛伐克“迟早置于德国的完全统治之下”。复照提醒法国注意它所负的条约义务，并且提醒法国注意一旦捷克屈服以后法国在欧洲所处的地位，然后建议把整个苏台德问题按照 1925 年 10 月 16[390]日的德捷条约提付仲裁。*

但是，英国和法国根本不愿意让“条约神圣”这类的原则来妨碍它们已确定要走的道路。9 月 20 日下午 5 点钟，英法驻布拉格使馆刚刚接到拒绝照会，英国公使巴锡尔·牛顿爵士就警告捷克外交部长卡米尔·克罗夫塔博士，如果捷克政府坚持己见，英国就将不再过问捷克的命运。法国公使德。拉克瓦先生也代表法国表示同意这一声明。

同时，伦敦和巴黎对捷克照会也极不客气，张伯伦召集了核心内阁会议，并且整整一晚上都接通了巴黎的电话，不时同达拉第和庞纳通话。双方同意应当对布拉格继续施加压力，必须告诉捷克人，如果他们一意孤行的话，他们就不必指望能得到法国或者英国的什么援助。

这时，贝奈斯总统已明白他原来以为是朋友的人已经在打算抛弃他了。但是他还是作了一次最后的努力，想至少能拉住法国。9 月 20 日晚上 8 点刚过，他让克罗夫塔博士向德·拉克瓦提出了下面这个决定命运的问题：一旦德国进攻的话，法国到底是否准备履行他对捷克斯洛伐克的保证？到 9 月 21 日凌晨 2 点一刻，牛顿和德·拉克瓦就把贝奈斯从床上请了起来，要求他收回拒绝英法建议的照会，并且声称，除非他撤回这一照会并且接受英法建议，捷克斯洛伐克只能单独对德作战。捷克总统要法国公使把这番话写成书面文字。他大概已经绝望了，然而还想留下一个历史的见证。*

第二天（9 月 21 日）一整天，由于疲劳过度、睡眠不足和眼睁睁看着国家被人出卖、大祸即将临头而深感痛心的贝奈斯，同政府阁员、各党派领导人和统帅部高级将领进行商谈，他们在敌人威胁面前曾经表现出勇气，然而在被朋友和盟邦背弃的时候却开始动摇了。英法靠不住，那么俄国呢？就在那一天，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长李维诺夫在日内瓦发表了一篇演说，重申苏联将信守它同捷克斯洛伐克之间的条约。贝奈斯召见了苏联驻布拉格公使，后者也重申了李维诺夫的话。可怜的捷克人，他们这时才发现同俄国的条约规定，苏联人只有在法国出兵支援的条件下才能出兵，而法国人这时已经背约了。

9 月 21 日下午，捷克政府屈服了，它接受了英法计划，政府[391]发表的一项公报愤懑地解释说：“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因为我们被抛弃了。”在背地，贝奈斯说得更干脆：“我们被卑鄙地出卖了。”第二天，内阁辞了职，陆军总监扬·西罗维将军受命组成了“民族集中政府”。

[①] 《英国白皮书》，编号 Cmd5847，第 2 号。另见《德国外文政策文件汇编》，第 2 卷，第 831—32 页。

张伯伦在戈德斯堡：9 月 22—23 日

虽然张伯伦给希特勒带来了后者在伯希特斯加登会谈中所要求的全部东西，但是他们在 9 月 22 日下午在莱因河畔的小城戈德斯堡再次会面的时候，两个人都感到不自在。德国代办在伦敦飞机场送张伯伦启程之后就立刻给柏林发了一个急电："张伯伦一行是带着沉重的心情动身的……毫无疑问，对张伯伦的政策的反对正在增强。"

希特勒则处在一种十分神经质的状态中。9 月 22 日早晨，我正在举行会谈的德莱森饭店的阳台上吃早饭，眼看着希特勒走到河边去看他的游艇。他看起来似乎患有一种奇怪的痉挛，每走几步路就要神经质地耸一耸右肩，左腿就往前一提，眼睛下面有一圈黑影。照我那天晚上在日记里记的话，他似乎已处在神经崩溃的边缘上。坐在我旁边的一位德国朋友轻轻他说了一声"Teppichfresser（啃地毯的人）！"他是暗中鄙视纳粹的一个报纸编辑，他给我解释说，过去几天中，希特勒为捷克问题而处于一种癫狂状态中，曾不止一次地完全失去自制，甚至趴到地上啃地毯的边。因此才叫他"啃地毯的人"。早一天晚上，我在德莱森饭店同几个纳粹党御用文人谈话时，我曾听到过有人用这个名字叫元首——当然，是小声叫的。[①]

张伯伦先生尽管由于国内对他的政策的反对越来越大而忧心忡忡，然而在到达戈德斯堡和驱车到彼得霍夫的时候看来却精神极好。彼得霍夫是一个古堡式的旅馆，坐落在莱因河对（右）岸的彼得斯堡山顶上，张伯伦的行馆就设在这里。为了欢迎他，一路上不但挂着德国的卐字旗，而且也挂着英国的米字旗。他此来不但要满足希特勒在伯希特斯加登所提出的全部要求，而且还有所加码。现在已只需要确定细节了，正是为了这一点，他不但带来了霍拉斯·威尔逊爵士和威廉·斯特兰（后者是外交部的东欧事务专家），还带来了外交部文件与法律司的司长威廉·马尔金爵士。[392]

这天下午，首相坐渡船渡过莱因河到了德菜森饭店，*希特勒在那里等着他。这一次总算——至少在开头的时候——一直是张伯伦在说话。根据施密特博士冗长的记录来判断，[①]英国首相想必谈了足足一小时以上，他先解释了自己在经过"吃力的谈判"以后，已经争取到不但使英法两国内阁而且使捷克政府也都接受了元首的要求，然后他就详尽地提出了实现这些要求的办法。他已经接受了伦西曼的建议，现在准备使苏台德区不经公民投票就转交给德国。至于杂居地区的前途，则可以交给由一个德国人、一个捷克人和一个中立国代表组成的三人委员会来决定。不仅如此，元首极为反感的捷克斯洛伐克同法国和俄国之间的互助条约也将以一项国际担保来代替，担保捷克斯洛伐克不致受到无故的进攻，而后者今后"应保持完全的中立"。

对于这位由英国商人出身的爱好和平的英国首相说来，这一切看起来都

[①] 见《柏林日记》，第 137 页。

[①] 戈德斯堡会议的主要来源是：施密特关于戈德斯堡两次会议的笔记，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 2 卷，第 870—79，898—908 页。施密特在《希特勒的译员》一书中的叙述，见该书第 95—102 页。9 月 23 日希特勒与张伯伦的通讯，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 2 卷，第 887—92 页。寇克派特里克的会议记录，见《英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 3 卷，第 2 册，第 463—73，499—508 页。汉德逊在《使命的失败》中的叙述，见该书第 156—62 页。

是极简单、极合理、极合乎逻辑的。据一个在场目击的证人说，他以一种显然可见的自满心情停了下来等候希特勒的反应。

“我是否可以理解为英国、法国和捷克政府已协议把苏台德区转交德国？”希特勒问道。*据他后来告诉张伯伦，他对让步如此之大、如此之快不禁感到惊奇。

“是的。”首相微笑着回答。

“我极其抱歉，”希特勒说，“由于过去几天内形势的发展，这个计划已经再也没有什么用处了。”

据施密特博士后来回忆，张伯伦听了这话吓了一跳，他那猫头鹰似的脸因为又惊又气，胀得通红。不过显然一点也不是因为恨希特勒骗了他，恨希特勒像普通一个敲竹杠的人一样，只要对方一答应，就立刻又涨价。几天以后首相对下院所作的一个报告中，说明了他自己在这一刻的感受：

> 我并不想要下院认为希特勒是在存心骗我——我从来没有这样看——但是，我原来以为，当我回到戈德斯堡的时候，我尸需同他细细地商量我带[393]去的建议就够了；当他告诉我……这些建议不能接受的时候，对我是极大的震动……

张伯伦看到他以捷克人为牺牲而如此“吃力地”建立起的和平大厦就嫁纸牌搭成的一样垮了下来。他告诉希特勒，他“既感到失望，又感到奇怪。他应当有理由说元首已经从他那里得到他所要求的一切了”。

> 为了做到这一点，他[指张伯伦]把他的全部政治生命作了孤注一掷……他被英国某些人士指责为出卖了捷克斯洛伐克，向独裁者屈膝投降，而且在那天早上离开英国的时候，确实还有人嘘他。

但是英国首相的个人不幸并没有打动元首的铁石心肠。他仍然要求，苏台德地区必须立即由德国予以占领。这一问题“至迟要在10月1日完全地、最后地解决”。他手头有张地图说明哪些领土必须立刻割让。

这样，据张伯沦后来告诉下院说，他心里“充满了凶事临头的预感”，只好退回到莱因河波岸去“考虑我该怎么办”。那天晚上，他在电话中同自己的阁僚以及法国政府的大员商量以后，几乎看不出有什么解决的希望，大家只好同意伦敦和巴黎应当在第二天通知捷克政府：它们不能再“继续承担建议捷克政府不要动员的责任”*。

这天晚上7点20分，凯特尔将军从戈德斯堡打电话给陆军总部说：“（X日的）日期还不能最后确定。继续按照计划进行准备。如果绿色方案执行的话，也不会在9月30日之前，如果提前执行，多半会临时修正。”[①]

这是因为阿道夫·希特勒自己这时也处在进退两难之中。当然张泊伦不知道，元首的真实意图，如他在5月危机以后在给最高统帅部的指示中所说的那样，是“以军事行动粉碎捷克斯洛伐克”。接受捷克人（不论多么不情愿）已同意接受的英法计划，不但可以把苏台德日耳曼人给予希特勒，而且可以有效地消灭捷克国家，因为此时它已毫无防御可言。然而这样就不是用军事行动了。而元首却已下定决心，不但一定要羞辱5月间惹恼了他的贝奈斯总统和捷克政府，而且要暴露西方国家没有骨头的可怜相。要做到这一点，至少必须要有军事占领。它可以像对奥地利的军事占领那样是不流血的，然而仍然必须是军事占领。对于傲慢的捷克人，至少得要报复到这种程度。

9月22日晚上，两个人并没有进一步接触，但是张伯伦在带着问题睡了

[①] 约德尔日记，1938年9月26日，同上。

一宵，再加上在俯瞰着莱因河的阳台上来回踱步了一[394]早晨之后，吃完早饭就坐下来给希特勒写了一封信。他表示愿意把德国的这些新要求提交给捷克人，但是他不认为他们会接受。事实上，他毫不怀疑，如果德军立即占领的话，捷克人定将用武力抵抗。不过，既然各方面都已同意把苏台德区转交给德国，他还是愿意向布拉格建议，在该区正式移交以前，由苏台德日耳曼人自己来维持当地的法律和秩序。

对于这样一种妥协，希特勒听都不要听。他让英国首相等了几乎一整天，才终于回了一个措辞激烈的照会，再次长篇大论地重弹捷克人如何对不起德国人的老调，再次拒绝改变自己的态度，最后的结语是：只有战争“看来才能解决问题了”。张伯伦的答复很简短，他要求希特勒把新要求写成书面，“附上一张地图”。由他“作为调解人”送交布拉格。他最后说：“我看不出我在这里还有什么用处，因此我打算回英国。”

在这样做以前，他再次来到德莱森饭店同希特勒举行最后一次会议。会议从 9 月 23 日晚上 10 点 30 分开始。希特勒以备忘录的方式提出了他的要求并且附有地图。张伯伦发现自己面对着一个新的限期：捷克人应在 9 月 26 日也就是两天以后上午 8 点开始撤出割让地区，而在 9 月 28 日撤退完毕。

“这不是无异下最后通牒吗！”张伯伦慨叹说。

“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希特勒立刻反驳，当张伯伦反唇相讥说这里用得上德文 Diktat（命令）这个字的时候，希特勒回答说：“这根本不是什么命令。请看，文件上明明写着是‘备忘录’。”

这时，一个副官给元首送来了一份急电，他看了一眼就把它扔给了正在翻译的施密特并说：“把这念给张伯伦先生听。”

施密特遵命照念：“贝奈斯刚刚在电台上宣布捷克斯洛伐克实行总动员。”

据施密特后来回忆，房间里顿时一片死寂。然后，希特勒开口了：“当然，现在一切都定局了。捷克人根本不想把任何领土割让给德国。”

根据施密特的笔记，张伯伦不同意这种说法，继之就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论。

> [希特勒说]是捷克人先动员的。张伯伦对此表示不同意。是德国首先动员的……元首否认德国已经动员。

这样，谈话一直继续到凌晨 1 点多钟，最后，张伯伦问希特勒，德国的备忘录是不是“果真绝无商量余地”，希特勒回答说确是如此。接着，首相

> [395]回答说，继续会谈已无意义。他已经尽了他的最大努力，他的努力已归失败。他将带着沉重的心情离开，因为他到德国来的时候所抱的希望已成泡影。

那位德国独裁者并不愿意张伯伦就此脱钩而去，因此提出了一项“让步”。

“我很少给别人做过这样的事情，你是难得的一个。”他说得挺爽快，“我准备只给捷克人撤退的期限规定一个日期—10 月 1 日——如果那样能便于你完成任务的话。”他一边说着，一边就拿一技铅笔自己把日期改掉了。这当然根本不是什么让步。

10 月 1 日一直就是 X 日。*

然而对英国首相来说，这却似乎颇有作用。据施密特的记录，他曾说“元首在这方面的考虑，他十分领情”。不过，他又说，他不能对这项建议表示接受还是拒绝，他只能转达。

无论如何，僵局总算是打破了。当会谈在凌晨 1 点 30 分结束的时候，不论在此以前发生了什么，两个人在个人关系方面似乎比他们初次会面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显得更亲近些。我自己有幸在 25 英尺之外一个看门人的小屋里（我在那里设了一个临时广播室）亲眼看到他们在离旅馆大门不远的地方道别。他们彼此的亲密态度使我感到惊奇。我当时听不见的话，施密特记下来了。

> 张伯伦真挚地同元首道别。他说他感到由于过去几天的会谈在他和元首之间已产生了一种相互信任的关系……他仍然希望目前困难的危机将能克服，那时他将本着同样的精神同元首讨论其他仍然悬而未决的问题。
>
> 元首感谢张伯伦的这一番活，并且告诉他，他也抱有同样的希望。他已经说过几次，捷克问题是他要在欧洲提出的最后一次领土要求。

希特勒否认还要攫取领土的声明看来对告辞回国的英国首相也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为他随后在下院发表的报告中，曾强调指出希特勒作这番表示时“怀有极大的诚意”。

当张伯伦在将近凌晨 2 时回到旅馆时，有一个记者问他：“先生，局势是不是已经绝望了？”[396]张伯伦回答说：“我并不想这样说。现在一切要取决于捷克人怎么办了。”[①]

十分明显，他根本没想到，局势也要取决于德国人和他们那种荒谬绝伦的要求。

事实上，首相在 9 月 24 日回到伦敦后，就马上设法做他曾告诉希特勒他不会做的事情：说服英国内阁接受纳粹的新要求。不过，这次他碰到了没有料到的反对。海军大臣达夫·古柏坚决反对他。令人惊讶的是哈利法克斯勋爵也反对他，虽然十分勉强。张伯伦已控制不了他的内阁了。他同样也不能说服法国政府，后者在 9 月 24 日拒绝了戈德斯堡备忘录，并且在同一天下令部分动员。

当达拉第总理率领法国部长们在星期天（9 月 25 日）到达伦敦的时候，两国政府都已知道了捷克政府正式拒绝戈德斯堡建议的行动。*法国人除了重申他们将履行自己的诺言在捷克斯洛伐克受到攻击时予以援助而外，再没有别的路可走。但是他们还得了解一下英国人打算怎么办。在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或者看起来是这样的情况下），张伯伦最后同意通知希特勒，如果法国由于履行其对捷克人的条约义务而与德国交战的话，英国也将感到必须予以支持。

但是，他要先向德国独裁者作一次最后的呼吁。希特勒原定 9 月 26 日要在柏林体育馆发表演说。为了劝诱希特勒不要把文章做绝，张伯伦又一次赶写了一封亲笔信给希特勒，并且在 9 月 26 日下午由他的心腹霍拉斯·威尔逊爵士乘专机赶送到柏林。

9 月 24 日凌晨张伯伦离开德莱森饭店以后，德国人就陷入了优虑之中。战争现在看来就在面前了，他们中间至少有一些人并不怎么高兴，这天凌晨作者留在旅馆休息室里还在吃着头一天晚上耽误了的晚饭，戈林、戈培尔。里宾特洛甫、凯待尔将军和地位稍次一些的人物都站在附近，说得很起劲，看来，战争的前景使他们感到有点茫然。

就在这一天，我后来到柏林的时候，发现希望又渐渐在复活了。在威廉

[①] 1938 年 9 月 24 日伦敦《泰晤士报》。

街，人们的感觉是，既然身居英国首相之尊的张伯伦已经同意把希特勒的新要求转达布拉格，就必须假定这位英国领导人是支持希特勒的建议的。我们已经看到，这种假定——就假定的范围而言——是完全正确的。

9 月 25 日是星期日，这是柏林一个可爱的风和日暖的日子。毫无疑问，这年秋天只有最后这么一个气候宜人的周末了，因此，全城居民倒有一半都涌到郊外的湖畔和森林中去。尽管有消息说，希特勒因为听到戈德斯堡的最后通牒被巴黎。伦敦和布拉格所拒[397]绝而暴跳如雷，柏林并不感到有什么大的危机，更谈不上有什么战争狂热。那天晚上我在日记里写着：“简直很难相信会打仗。”*

到紧跟着来的星期一，局势突然恶化了。下午 5 点钟，霍拉斯·威尔逊爵士在汉德逊大使和英国大使馆一等秘书艾冯·寇克派特里克陪同下，带着张伯伦的信到了总理府。[1]他们发现希特勒脾气极坏——很可能是故意在酝酿情绪，准备在 3 小时后在体育馆发表演说。

施密特博士开始翻译这封信，其中说到捷克政府正如张伯伦在戈德斯堡时曾经预言过的那样，已经通知首相，戈德斯堡备忘录“完全不能接受”。这时，据施密特说，希特勒猛一下跳了起来，一边叫：“再谈判已毫无意义！”一边就向门外走。[2]

照施密特的说法，这真是令人难受的一幕。“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亲眼看到希特勒完全失去理智。”照在场的英国人的说法，元首后来又大步回到椅子上，不断大声叫嚷地打断施密特的翻译。“把德国人当黑人看……到 10 月 1 日我就要捷克斯洛伐克乖乖地听我的话。法国和英国要是决定干涉，那就随它们的便……我一点也不在乎。”

张伯伦在信中建议，由于捷克人已经情愿把希特勒所要的苏台德区交给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和德国应立即各派代表举行会议“达成协议”来解决“移交这块领土的办法”。他还说，他愿意让英国代表也列席这次会议。希特勒的答复是，只有捷克人先接受了（他们刚刚拒绝了的）戈德斯堡备忘录，并且同意德国在 10 月 1 日占领苏台德区，他才肯同他们谈判细节。他说，他一定要在 44 小时内——在 9 月 28 日下午 2 时以前得到肯定的答复。

那天晚上，希特勒似乎已破釜沉舟，把一切后路都绝了，至少在我们那些在挤得满满的柏林体育馆内愕然听他那疯狂地叫嚣的人看来是如此，他时而狂吼，时而尖叫，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他任性发作到这种地步。他恶毒地对“贝奈斯先生”进行人身攻击，宣称和平与战争的问题现在要看捷克总统怎么办来决定，不论怎么说，他都要在 10 月 1 日拿下苏台德区。他滔滔不绝、怒不可遏的语言和群众中不断迸发的欢呼喝彩，使他忘乎所以，如醉如狂。虽然如此，他还是很狡猾，没有忘记给英国首相一点甜头。他感谢他争取和平的努力并且重申这是他在欧洲的最后一次领土要求。他鄙夷不屑地嘟囔：“我们不想要捷克人！”

在整个演说的过程中，我一直坐在刚好在希特勒顶上的楼座[398] 里，尽力想把他的演说当场随讲随译广播出去，可是不大容易。那天晚上，我在

---

[1] 张伯伦 1938 年 9 月 26 日致希特勒的信的全文，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 2 卷，第 994—95 页。

[2] 德国外交部文件中虽无施密特博士关于这次会议的笔记，但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叙述了经过，上引书，第 102—3页。寇克派特里克的笔记，见《英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 3 卷，第 2 册，第 1 号，第 118 页。汉德逊的叙述，见他的上引书第 163 页。

日记里记着：

> 自从我观察他这么些年以来，他今天晚上看起来完全失去了自制，在他坐下来以后，戈培尔就跳上讲坛，对着话筒大叫："有一点是肯定的：1918 年再不会重演了！"希特勒抬头看着他，眼睛里有一种疯狂、急切的神色，似乎这句话就是他想了一下午而没有想出来的。他跳了起来，眼睛里闪着我永远也忘不了的狂热的光芒，把右手大挥了一下，然后向桌子一捶，用尽了他那强有力的肺部的全部力量大叫一声："Ja（对）！"接着就精疲力竭地瘫倒在椅子上。

第二天（9 月 27 日）中午，他第二次接见霍拉斯·威尔逊爵士的时候，已经完全恢复了，这位英国特使并不是受过什么特殊外交训练的人，不过也像首相一样（如果不是更甚的话）急于把苏台德区送给希特勒，只要这位独裁者肯和和平平地接受。他请希特勒注意张伯伦昨天后半夜为答复元首在体育馆的演说而在伦敦发表的一项特别声明。张伯伦说，鉴于德国总理对捷克问题的诺言缺乏信心，英国政府将认为自己"负有道义上的责任"来保证捷克的诺言"顺利地、充分地而且以尽量合理的速度"付诸实现。他相信总理将不会拒绝这一建议。

但是，希特勒对此并不感到兴趣。他说，他再也没有什么信要带给张伯伦先生。现在一切要看捷克人了。他们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绝他的要求。要是他们拒绝的话，他怒气冲冲地大叫道："我就要消灭捷克斯洛伐克！"他继续发出这一威胁，显然极为得意。

即使对于好说话的威尔逊来说，这显然也太过分了。他站起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奉首相之命作下述声明：'如果法国为履行其条约义务而参加对德作战的话，联合王国将认为有义务支援法国。'"

"我只能表示已注意到这种态度，"希待勒火气很大地回答说，"这意味着，如果法国决定进攻德国的话，英国将感到也有义务进攻德国。"

霍拉斯爵士回答说，他并没有这么说，到底是和平还是战争，最后要看希特勒如何办来决定了。这时，希特勒已经把情绪酝酿到了火儿相当大的程度，他叫道："要是法国和英国要打，就让他们打罢！我根本不在乎。今天是星期二，到下星期一，我们就在打仗了。"

从施密特关于会议的正式记录来看，威尔逊显然还想把谈话继续下去，但是汉德逊大使劝他停下来。虽然如此，这位毫无经验的特使还是在会谈完了以后趁自己同元首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向[399]他谈了一句话,他向希特勒保证,"我将设法使那些捷克人头脑清楚一点"*，后者表示他"对此表示欢迎"。也许，元首一定认为，还可以哄张伯伦再走几步，来让捷克人"头脑清楚一点"。总之，那夭晚上，他就口授了一封措辞狡猾的信给首相。

写这封信是有充分理由的,柏林——还有别的地方——在 9 月 27 日这一天，有许多情况已经改变了。

下午 1 点钟，威尔逊刚走不久，希特勒就发出了一个"绝密"的命令，命令由大约 21 个加强团，也就是 7 个师组成的突袭进攻部队，从训练地区进驻捷克边境的出击点。命令说："他们必须在 9 月 30 日准备好按照'绿色方案'行动，决定将在前一天中午 12 时作出。"几小时以后，元首又下令作进一步的秘密动员。在当时所采取的各项措施中，有一项是又动员了 5 个师到西线。[①]

[①] 绿色方案档案第 31—33 件，见《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 3 卷，第 350—52 页（纽伦堡文件 388—PS）。

但是即使希特勒一股劲儿进行军事行动，这一天之内还有许多事情使他感到犹豫不前。为了在群众中激起战争狂热，希特勒下令在黄昏时分乘几十万柏林人下班上街的时候在德国首都检阅一个摩托师。结果，至少对最高统帅说来是一场大失败。普通的柏林老百姓根本就不想听到战争。我那天晚上的日记记下了这一幕令人感到意外的景象。

我到了菩提树下大街，当时（军队的）队伍正转向威廉街。我预料将看到一场盛大的示威。我想像着我曾在报纸上读到过的 1914 年的情景，那时，就在这条街上，欢呼的人群向行进中的士兵投掷鲜花，少女们跑上去吻他们……但是今天，他们只顾急急走到地下铁道站，根本就不想看 ·稀稀落落站在人行道上的那几个人也是一声不响，完全沉默……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触目的反战示威。

在一个警察的怂恿下，我沿着威廉街走到总理广场。希特勒就站在总理府的阳台上检阅队伍。

……那里大约有 200 来人，希特勒的脸色由阴沉而转为恼怒，很快就回到了屋里，让军队自己行进，根本不加检阅。今天晚上所看到的事情几乎重新燃起了我对德国人民的一点信心。他们是十足反对发动战争的。

在总理府内，还有更坏的消息——这是从国外来的。从布达[400]佩斯来的消息说，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通知匈牙利政府，如果它进攻捷克的话，它们就将对匈牙利采取军事行动。这样战争就要扩大到巴尔干，而这却是希特勒所不愿见到的。

巴黎来的消息更严重。那里的德国武官打来一份不但是给外交部而且是给最高统帅部和参谋总部的“特急”电报，它报告说，法国的部分动员几乎不亚于总动员，“因此我估计，到下动员令以后的第 6 天，第一批 65 个师就可以在德国边境部署完毕”。希特勒明白，在这样大的兵力面前，德国人一共只有 12 个师，其中半数是战斗力成问题的后备部队。不但如此，德国武官还报告说：“一旦德国采取战争行动……法军很可能立即从下阿尔萨斯和洛林向美因兹发动进攻。”

最后，这位德国军官报告柏林，意大利在法意边界上完全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牵制法国军队。[①]那位豪迈的盟友墨索里尼看来是要在决定性的关头抛弃希特勒。

而且，美国总统和瑞典国王也突然横加干涉，就在前一大，9 月 26 日，罗斯福向希特勒发出呼吁，请他协力维持和平。虽然希特勒在不到 24 小时内就给了他答复，说和平完全取决于捷克人。可是美国总统在当天 9 月 27 日星期三又发来了一份电报，建议各有关国家立即举行会议，并且暗示，如果爆发战争，全世界将视希特勒为戎首。[①]

在 1914—1918 年的大战中曾证明是德国忠实朋友的瑞典国王,态度更为直率。这天下午，德国驻斯德哥尔摩公使给柏林发来了一份电报，说国王匆促召见了他，告诉他，如果希特勒不把 10 月 1 日的限期推迟 10 天的话，世界大战就不可避免地一定要爆发。德国是唯一要对此负责任的国家，而且，“从目前各个国家的组合情况看来”，同样不可避免地，德国一走要失败。在斯德哥尔摩冷静、中立的气氛下，这位精明的国王至少在估计军事形势方面要比柏林、伦敦和巴黎的政府首脑客观得多。

[①] 巴黎发的电报，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 2 卷，第 977 页。

[①] 罗斯福的两次呼吁和希特勒对第一次呼吁的答复全文，同上，第 2 卷。

罗斯福总统，也许是因为必须考虑到美国人的心情，强调指出美国对战争不会干涉，甚至也不愿“在目前的谈判中”承担任何责任，这样，他的两次和平呼吁就大大减少了力量。德国驻华盛顿大使汉斯·狄克霍夫因此认为必须在当天就发一个“特急”电报给柏林。他指出，如果希特勒最后诉诸武力而英国对此反对的话，他有理由假定“美国的全部法码都将投在英国这一边”。而且，这位通常在元首面前进言的时候总是十分胆怯的大使还加了一[401]句，“我认为我有责任大大强调这一点”。他不想看见德国政府在估计美国的态度方面重犯它在 1914 年犯过的错误。

那末布拉格如何呢？那里是不是有了软化的迹象呢？这天晚上，德国武官土圣特上校给最高统帅部来了一个电报：“布拉格情况平静，最后的动员措施业已完成……征召入伍的兵员总数估计为 100 万人，其中野战军占 80 万人……”[②]这个数目等于德国在东西两线所有有训练的兵员的总数。捷克人和法国人加在一起，兵力超过德国人一倍以上。

面对着这些事实与发展，而且无疑也充分考虑到威尔逊临走时的话和张伯伦的性格及其对战争的极端恐惧，希特勒在 9 月 27 日天刚黑就口授了一封信给张伯伦。应召前来把这封信翻译成英文的施密特博士，感到这位独裁者似乎是“在要采取极端步骤”的时候缩了回去。那天晚上，英国政府已下令舰队动员，希特勒对此事是否知悉，无从证实。不过，雷德尔海军上将要求在晚上 10 点钟晋见元首，可能德国海军已经探悉英国的行动。英国的动员令是晚上 8 点钟下达，11 点 38 分公布的，关于这些，雷德尔可能都已在电话中报告了希特勒。不论怎么样，雷德尔到了以后，他所做的是请求元首不要打仗。

希特勒这时确实知道的是：布拉格毫无畏惧，巴黎在急速动员，伦敦态度转硬，他自己的人民漠然无动干中，他的将领坚决反对他，而他关于戈德斯堡建议的最后通碟到第二天下午两点钟就要到期了。

他这封信措辞极妙，用意深沉，一字一句都算好了要打动张伯伦，信的语调是温和的，它否认希特勒的建议会“剥夺掉捷克斯洛伐克得以生存的一切保证”，否认他的军队到了分界线以后会继续前进。他打算同捷克人谈判细节。他打算“给予捷克斯洛伐克剩余的部分以正式的保证”。捷克人所以坚持已见只是因为他们希望在英国和法国的援助下发动一场欧洲大战。虽然如此，他还是不准备对和平的最后一线希望砰然关上大门。

> [他最后说]我必须请你来判断，在这些事实面前，你是否认为应当继续努力……来破坏这种阴谋并且使布拉格政府在这个最后时候恢复理智。[①]

最后时刻

希特勒的信是用急电拍给伦敦的，在 9 月 27 日晚上 10 点 30 分到达张伯伦手中，首相刚刚过完了忙碌的一天。

这天下午刚回到伦敦的霍拉斯·威尔逊爵士，带来了关于他[402]同希特勒第二次会谈的令人不安的消息，起了刺激张伯伦和他的核心内阁采取行动的作用。他们决定了动员英国舰队，征召空军辅助队，并且宣布了紧急状态。

[②] 布拉格发出的电报，同上，第 2 卷，第 976 页。

[①] 希特勒 1938 年 9 月 27 日的信的全文，同上，第 2 卷，第 966—68 页。

在公园和广场上已经开始挖起防空壕来，伦敦学校里的儿童也开始疏散。

首相还马上给布拉格的贝奈斯总统发出了一份电报，警告后者，他从柏林得到的消息“表明，如果到明天[9月28日]下午两点，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还没有接受德国的条件的话，德国军队马上就会得到越过捷克斯洛伐克边界的命令”。但是张伯伦虽然尊敬地把消息通知了捷克人，却还是忍不住要在电文的最后一段教训他们：“波希米亚将受到德国军队的蹂躏，另外一个或几个国家不论做什么，都不能挽救你的国家和你的人民免于这种命运。不论世界大战的结果如何，都一定是这样。”

这样，张伯伦就不是把战争的责任放在希特勒头上，而是把它成到了贝奈斯的头上。他在这里所提出的军事上的看法，我们知道，就是连德国的将军们都认为是胡说八道。不过，他最后还是加了一句，他不愿承担告诉捷克人该怎么办的责任。这要由他们自己来决定。

然而，难道真的是由他们自己来决定吗？贝奈斯还没有来得及回答这份电报，第二份电报马上又来了。这一回，张伯伦可是努力要告诉捷克政府该怎么办了。他建议在10月1日接受德国人的某种有限度的军事占领——即占领处于捷军工事之外的埃格尔和阿舍——然后由德、捷、英三方联合组成一个边界委员会迅速确定其他应转交给德国人的地区。*接着，首相还提出了进一步的警告。

这个计划如果不能实现，贵国除遭到武力侵略与武力肢解以外，将别无其他出路。而且，虽然这可能引起损失无数生命的冲突，但是不论这一冲突的结果如何，捷克斯洛伐克都将再也不能接原有疆界重建故国。[①]

这样，捷克人受到了他们的朋友的警告（法国也参加这些最新的建议），就是说：即使他们和他们的盟邦在大战中打败了德国，捷克斯洛伐克也必须把苏台德区让给德国。含意十分明白：既然苏台德区总归不是你们的了，为什么还要冒险把欧洲投入战争？[403] 办完了这件事情以后，首相就在晚上8点30分向全国广播：

为了在一个遥远的国家里我们对之毫无所知的人们之间的争吵，我们居然……在这里挖壕沟，这有多么奇怪，多么荒诞，多么不可思议！……

希特勒已经得到了“他实际上所要求的东西”。英国已经保证捷克人将接受这一要求，并且付诸实施。

我将毫不犹豫地到德国去作第三次访问，只要我认为这样做有好处……

不论我们如何同情一个强邻压境下的小国，我们决不能不顾一切地使整个大英帝国仅仅为了它而陷入一场大战。如果我们要打仗，也必须是为了比这更大的问题……

我从灵魂深处来说是一个爱好和平的人，国与国之间的武装冲突，对我说来无异于梦魔；但是，如果我看到任何国家执意要用武力的恐怖来统治世界的话，我将认为必须予以抵抗，因为在这种统治之下，信仰自由的人们将感到生活己失去价值。但是战争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在我们进入战争以前，我们必须十分清楚，我们所不惜冒险以争者确实是重大的问题。

按照惠勒一贝纳特的记载，英国大部分人在听了这一广播以后上床睡觉的时候，都认定英国和德国将在24小时以内开战了。[①]但是普通老百姓并不

[①] 张伯伦的计划，同上，第2卷，第987—88页。惠勒一贝纳特根据捷克档案在《慕尼黑》中引用了首相的信，见该书第151—52，第155页。

[①] 同上，第158页。

知道那天深夜在唐宁街后来又发生了些什么。

10 点 30 分，希特勒的信到了。这正是首相急切要抓住的一根救命的稻草。他马上答复元首说：

> 读了你的信以后，我确信你可以不必打仗，而且不用等待就会得到一切主要的东西。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已准备立刻亲自到柏林来同你和捷克政府的代表以及同法国和意大利的代表一起讨论有关移交的各项安排，我深信，我们能在一周之内达成协议。我不能相信你会为了在解决这个长期未决的问题方面有几天的拖延，就不惜承担发动将使人类文明化为乌有的世界大战的责任。

首相还发了一份电报给墨索里尼，请他敦促元首接受这一计划，并且同意出席拟议中的会议。

召开这样一次会议的主意已经在首相心里酝酿相当久了。早在 7 月中，尼维尔·汉德逊爵士就曾在给伦敦的电报中提出过同样的建议。他建议由德、意、英、法四大国来解决苏台德问题。但是英国外交部告诉大使和首相，要召开这样一次会议，将很难排[404]除其他国家参加。[①]所谓“其他国家”指的就是同布拉格订有互助条约的俄国以及捷克斯洛伐克，张伯伦从戈德斯堡回来以后就深信希特勒决不会同意参加任何包括苏联在内的会议，他的这种看法是完全正确的。首相本人也并不希望有苏联参加。虽然连英国最普通的人都明白，万一对德开战的话，苏联参加到西方一边来将有极大的价值，丘吉尔也曾一再向英国政府首脑指出这一点，但是，首相似乎没有看到这一点。如我们所知，在德国并吞奥地利以后，俄国曾建议召开一个会议来讨论对付德国下一步侵略的问题，但是张伯伦拒绝了这个建议。尽管有莫斯科对捷克斯洛伐克的保证，尽管直到当时李维诺夫还在声明俄国将信守这一保证，张伯伦却无意让苏联人来干涉他把苏台德区给希特勒为代价来维持和平的决心。

但是直到 9 月 28 日星期三,他的思想还没有发展到把捷克人排除在会议之外的地步。而且就在 9 月 25 日，在布拉格方面拒绝希特勒在戈德斯堡提出的要求以后，首相还曾召见了捷克驻伦敦大使扬·马萨里克，建议捷克斯洛伐克应当同意在“有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和其他国家参加的国际会议”上进行谈判。第二天，捷克政府表示接受这一建议。现在，我们从张伯伦 9 月 27 日深夜给希特勒的电报中看到，他特别提出“捷克斯洛伐克的代表”应当参加拟议中的德、意、法、英会议。

“黑色的星期三”和哈尔德反对希特勒的计划

被称为“黑色的星期三”的 9 月 28 日来临的时候，柏林、布拉格、伦敦和巴黎都惴惴不安，满怀重忧。战争看来是躲不过了。

“一场大战再也难以避免了”，这是约德尔在日记里记下来的戈林在这天早晨说的一句话。戈林还说：“战争可能要进行 7 年，而我们一定会胜利。”[①]

在伦敦，挖防空壕，疏散学童，迁移医院，一切都在继续进行。在巴黎，人们争先恐后地往已经塞得满满的火车上挤，在城外的公路上，汽车挤得开

[②] 全文见《英国白皮书》，Cmd5848，第 1 号。这封信是由汉德逊在次日中午 交给希特勒的。

[①] 汉德逊著上引书，第 144 页。见《英 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 3 卷，第 2 册，第 614 页。

[①] 约德尔 1938 年 9 月 28 日日记，见 《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 4 卷，第 368 页（纽伦堡文件 1780—PS）。

都开不动。德国西部的景象也差不多。约德尔在那天上午的日记中记下了德国难民逃离边境地区的消息。下午两点，希特勒所定下的要捷克斯洛伐克接受戈德斯堡建议的期限就要到了。然而布拉格并没有任何会接受这些建议的迹象。不过，别的迹象倒还有一些：威廉街的活动极为紧张，法国的、英国的、意大利的大使发狂似地来而复去，去而复来。但是，一般[405]群众，事实上还有德国的将领们，对此都是蒙在鼓里的。

对某几个将军，特别是对参谋总长哈尔德将军来说，实现他们推翻希特勒的密谋的时候已经到来了。他们要这样来挽救自己的祖国，使它不致于投入一场他们认为注定要失败的欧洲大战。据幸存者后来的记述，*整整 9 月一个月，密谋分子一直都在忙着筹划这件大事。

哈尔德将军同奥斯特上校以及后者的上司谍报局局长卡纳里斯海军上将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卡纳里斯设法使哈尔德随时能知悉希特勒的政治行动和国外情报。我们上面已经知道，密谋分子曾把希特勒准备在 9 月底进攻捷克斯洛伐克的决心通知过英国，并且曾请求英国政府表明，英国将同法国一起以武力回击德国的侵略。几个月以来，负责柏林军区因而应提供大部分军队来实行政变的维茨勒本将军一直有所犹豫，因为他怀疑伦敦与巴黎已在暗中容许希特勒在东方自由行动，因而不会为捷克斯洛伐克而参战——这种见解也是其他几个将军所共有的，也正是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希望别人持有的。如果事实确是如此的话，那未照维茨勒本和哈尔德这样的将军们看来，推翻希特勒的计划就毫无意义了。因为在第三帝国目前这个阶段，他们所关心的只是想法除掉元首来避免一场德国在其中绝无取胜希望的欧洲大战。如果确实没有触发大战的危险，如果张伯伦打算满足希特勒对捷克斯洛伐克的要求而不会打仗，那末他们就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举行叛乱。

为了要让这些将军们确信法国和英国真的会打，奥斯特上校和吉斯维乌斯给哈尔德将军和冯·维茨勒本将军安排了同沙赫特会面。沙赫特因为曾为德国重整军备计划筹款并且仍然留在内阁内而在军方享有根高的威信，除此而外，他还被认为是英国事务专家。沙赫特向他们担保，如果希特勒想以武力来对付捷克的话，英国是会打的。

9 月 13 日深夜，密谋分子之一埃里希·科尔特在德国外交部得到了张伯伦紧急提议“立即坐飞机前来”设法和平解决捷克危机的消息。这个消息在密谋分子中间引起了惊愕。他们本来估计[406]希特勒在纽伦堡开完党大会以后就会在 14 日回到柏林，并且，据科尔特说，计划在这一天或者第二天就起事。然而，元首并没有回到首都，”相反，他到慕尼黑去了，而且在 14 日又到了伯希特斯加登，在那里等候英国首相第二天来访。

密谋分子感到极度失望，理由有两层：第一，只有希特勒在柏林，他们的计划才能实行，由于纽伦堡大会己使捷克危机更为激化，他们认定他一定要立即回到首都。第二，虽然有几个密谋分子像英国人民一样，自安自慰地认为，张伯伦飞到伯希特斯加登去是为了警告希特勒在估计英国在德国发动侵略时会采取什么态度这一点上不要重犯威廉二世在 1914 年的错误,但是科尔特是深悉底蕴的。科尔特曾见到张伯伦的紧急电报，上面明明说他想见希特勒是“为了要设法求得和平解决的办法”。不但如此，他还看到过他的哥哥德国驻伦敦大使馆参赞西奥多·科尔特发来的电报，报告说，首相准备大

大满足希特勒对苏台德区的要求。[①]

科尔特说："这件事情对我们的计划的影响肯定是致命的。在英国首相要前来德国同希特勒讨论'世界和平'的时候，要举事推翻希特勒，当然是不可思议的。"

虽然如此，据埃里希·科尔特说，到 9 月 15 日晚间，也已参加密谋的保罗·施密特博士（我们知道，他是希特勒一张伯伦会谈中的唯一翻译者——也是唯一的目击者）通过"事先安排好的暗号"通知他，元首仍然执意要征服捷克斯洛伐克全境，他已向张伯伦提出无法接受的条件，"希望会遭到拒绝"。这个情报使得密谋分子又振奋了起来。科尔特当晚就把它通知了奥斯特上校。后来的决定[407]是，等希特勒一回到柏林就执行原计划。"不过最重要的是"，奥斯特说，"我们必须让这只鸟儿飞回到它在柏林的笼子里来。"

这只鸟儿在戈德斯堡会谈完了以后,就在 9 月 24 日下午回到它的'笼子"里来了。9 月 28 日，也就是"黑色的星期三"的早晨，希特勒在柏林已经呆了将近四天了。在 9 月 26 日，从他在体育馆那一场发作看来，他显然已决心破釜沉舟，把自己的后路都绝了。9 月 27 日，霍拉斯·威尔逊爵士从他那里回到伦敦的时候，两手空空，一无所获，英国政府的反应是下令舰队动员，并且警告布拉格防范德国的突然进攻。我们也知道，希特勒在这一天还曾命令他的"进攻部队"进驻捷克边境的阵地，并且准备在 9 月 30 日——即 3 天以后——"行动"。

密谋分子还在等什么呢，他们自己所规定的条件都已经具备了。希特勒在柏林，他已决定打仗。他已选定在 9 月 30 日进攻捷克斯洛伐克——离现在只有两天了。要就马上举事，要就坐失时机。

科尔特说，在 9 月 27 日这一天，密谋分子选定了采取行动的日子：9 月 29 日。吉斯维乌斯在纽伦堡作证的时候以及在他写的书里都说，将军们——哈尔德与维茨勒本——在 9 月 28 日得到了希特勒在前一天晚上向张伯伦'提出无礼要求"的"侮辱信"的一份抄本以后，决定立即行动。

> 那天[9 月 27 日]深夜，奥斯特得到了这封"侮辱信"的一份抄本，9 月 28 日早晨，我把这封信交给了维茨勒本。维茨勒本又带着它去见哈尔德。现在，参谋总长终于得到了他所希望的、毫不含糊地证实希特勒并不是在虚声恫吓而硬是要发动战争的真凭实据了。
>
> 哈尔德脸上滚下了愤怒的眼泪……维茨勒本坚持现在是行动的时候了。他劝哈尔德去见勃劳希契。过了一会，哈尔德回来了，他说他带来了好消息：勃劳希契也生气了，很可能会参加起事。[①]

但是，要不是这封信在转抄过程中有了改动，就是将军们误解了它的意思，因为，我们上面已看到，这封信在语调上实在是十分温和的，它充满了要"同捷克人谈判细节"并且"给予捷克斯洛伐克剩余部分以正式保证"的诺言，在建议张伯伦不妨继续努力这一点上也表现得富有和解精神，因此英国首相在接读以后，立即打电报给希特勒，建议召开大国会议来解决各项细节问题，并且同时致电墨索里尼请他也支持这一建议。

将军们对这最后一刻钟的姑息行为，显然毫无所知，但是，陆军总司令冯·勃劳希契将军可能微有所闻。据吉斯维乌斯说，维茨勒本从哈尔德的办

[①] 见本书原文第 384 页。

[①] 吉斯维乌斯：《至死方休》，第 325 页。 另见他在纽伦堡的证词，载《主要战 犯的审讯》，第 12 卷，第 219 页。

公室打电话给勃劳希契，告诉他一切均已就绪，请求他亲自领导起事，但是这位陆军总司令却不置可否。他[408] 告诉哈尔德和维茨勒本说，他得先到元首的总理府去看一看，搞清楚将军们对形势的估计是否正确。吉斯维乌斯说，维茨勒本接着就急急忙忙赶回他的司令部。

“吉斯维乌斯，”他兴奋地宣布，“时间已经到了！”

9 月 28 日那天上午 11 点钟，德国外交部科尔特的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齐亚诺从罗马打来了电话，要求立即同德国外交部长讲话。里宾特洛甫当时不在——他在总理府——因此那位意大利外相就要求把电话改接意大利大使伯纳多·阿托利科。德国人偷听了这次通话并且把它录了音。原来是墨索里尼，而不是他的女婿要讲话。

墨索里尼：我是领袖，听得清吗？

阿托利科：听得清。

墨索里尼：要求立即会见总理。告诉他，英国政府通过珀思勋爵*要求我出面调停苏台德问题。双方分歧很小，告诉总理，我和法西斯意大利支持他。他必须作出决定。不过，告诉他，我赞成接受这个建议。听清楚了吗？

阿托利科：听清楚了。

墨索里尼：快去！[①]

当阿托利科大使满脸通红、上气不接下气（这是翻译员施密特博士注意到的）赶到总理府的时候，希特勒正同法国大使弗朗索瓦一庞赛在密谈。弗朗索瓦一庞赛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见到总理的。早一天深夜，执意要超出张伯伦一头的法国外交部长庞纳，曾打电话给他的驻柏林大使，指示他尽快去见希特勒，提出法国关于交出苏台德区的建议，其内容比英国建议还要慷慨得多。英国首相在 9 月 27 日晚上 11 时向希特勒发出的建议还只是让希特勒在10月1日占领苏台德区的第一区——这不过是对一块被包围的领土的象征性占领——现在法国人竟然建议在 10 月 1 日交出 3 个大区,其中包括绝大部分双方意见有分歧的地区。

这是一项诱人的礼物，然而法国大使要把它送出去居然还碰到了极大的困难。他在 9 月 28 日上午 8 点钟打电话求见总理，到了 10 点钟还没有回音，于是他就派他的武官赶到参谋总部去把这个他还无法提出的建议通知德国的将军们。后来，他请尼维尔·汉德逊爵士帮忙，这位随时乐意为任何可能——不论什么代价——防止战争的人效劳的英国大使马上给戈林元帅打了一个电[409] 话。戈林回答说，他将设法安排这一约会。事实上，汉德逊在设法给自己找一个见希特勒的机会，因为他奉到命令要向希特勒提出一封“首相亲自写的最后信件”，也就是张伯伦在前一天深夜写的信”，其中保证希特勒“不必打仗，不用等待”就能得到他所希望得到的一切，并且建议召开大国会议来确定细节。[①]

希特勒在上午 11 点 15 分接见了弗朗索瓦一庞赛，大使发现他神情甚为紧张不安。法国大使手里拿着一张仓猝画成的地图，上面标着捷克斯洛伐克的主要盟国法国现在准备拱手交给希特勒的大片捷克土地。他竭力劝说希特勒接受法国的建议，使欧洲得以避免一场大战。尽管里宾特洛甫作了否定的

[①] 埃里希·科尔特给本作者的备忘录。 艾伦·杜勒斯著《德国的地下运动》， 第 46 页也谈到了这次访问。

[①] 9 月 28 日上午在总理府的会议，有几个参与者的叙述：施密特著上引书，第 105—8页；弗朗索瓦—庞赛奢上引书，第 265—68 页；汉德逊著上引书，第 166—71 页。

评论（据法国大使自称，对这些评论曾不客气地加以驳斥），希特勒听了倒是颇为动容——特别是，据施密特博士的观察，对大使提出的那张慷慨的地图颇感兴趣。

到 11 点 40 分，谈话突然被打断了，有人通报说，阿托利科带着墨索里尼给元首的紧急口信来了。希特勒带着施密特走出去欢迎那位气喘吁吁的意大利大使。

“我给你带来了领袖的紧急口信。”天生一副粗嗓子的阿托利科，隔着老远就嚷了起来。[2]他转达完了以后，又加上一句说，墨索里尼要求元首不要下动员令。

据现在还活着的唯一见证人施密特说，就在这个时候作出了维持和平的决定。这时正当中午，离希特勒给捷克人的最后通牒所规定的限期只有两小时了。

“告诉领袖，”希特勒对阿托利科说，显然感到松了一口气，“我接受他的建议。”[1]

高潮过去了，这一天余下来时间内所发生的事就只是尾声了，汉德逊继阿托利科和弗朗索瓦一庞赛之后来到了希特勒的面前。

“在我的伟大的朋友和盟友墨索里尼的请求下，”希特勒告诉汉德逊说，“我已经延迟 24 小时动员我的军队。””他将在同墨索里尼再次商量之后再就诸如拟议中的大国会议等其他问题作出决定。[2]

在此以后，柏林和罗马之间打了不少电话——施密特说两位法西斯独裁者还曾直接通过一次话。9 月 28 日下午 2 时以前几分钟，就在希特勒的最后通碟即将到期之际，他终于打定了主意，对英法意三国政府首脑匆匆发出了请帖，请他们在第二天中午到慕尼黑来与元首会同解决捷克问题。对布拉格和莫斯科没有发出请[410]帖。希特勒不能容许与法国一起保证捷克斯洛伐克在受到德国进攻时维护其领土完整的俄国来插手干涉，至于捷克人，则甚至在被判决死刑的时候也不让他们参加。

尼维尔·汉德逊爵士在回忆录中把在这一关键时刻挽回和平的功绩主要归于墨索里尼，在这一点上他得到了绝大部分写这一章欧洲史的历史学家的支持。*然而这肯定是慷慨过度了。意大利是欧洲大国中最弱的一个，它的军事力量实在无足轻重，以致德国的将军们，就像他们的文件中所表明的那样，简直视之为一个笑柄。英国和法国是德国人心目中唯一要盘算的力量。然而，从一开头起就千方百计说服希特勒，要他相信可以不战而取得苏台德区的却正是英国首相。造成慕尼黑从而保持了整整 11 个月和平的是张伯伦，而不是墨索里尼。对他自己的国家，对它的盟邦和朋友来说，这样一桩功绩所花的代价，我们以后还要谈到，不过，不论这笔帐怎么算，按其后果来看，这种代价几乎是无可忍受的。

“黑色的星期三”2 点 55 分，伦敦的天气似乎不像早晨那样黑暗阴冷了，英国首相就在这时开始向下院演说，他详尽地报告了捷克危机的经过以及他和他的政府为企图解决这一问题所作的努力。按照他的说法，局势仍然是不稳定的，然而已经有了好转，他说，墨索里尼已成功地使希待勒把动员令推

---

[2] 施密特著上引书，第 107 页。

[1] 同上。

[2] 汉德逊著上引书，第 168—69 页。施 密特著上引书，第 108 页。

迟了 24 小时。现在已是 4 点一刻了，张伯伦已讲了一个钟头又 20 分钟，他的演说已将近结束了。就在这个时候，他的演说突然被打断了。坐在前排的财政大臣约翰·西蒙爵士递给他一份文件，那是坐在贵族席上的哈利法克斯勋爵传过来的。

> 不论尊贵的议员诸君对墨索里尼先生有什么看法，[张伯伦这时正在说]我相信人人部会欢迎他这种……维护和平的表示。

首相停了下来，看了一下文件，然后笑了。

> 事情还没有完，我还有几句话要告诉下院。我现在得到希特勒先生的通知，他请我明天早晨到慕尼黑去同他会面。他也邀请了墨索里尼先生和达拉第先生。墨索里尼先生已经接受了邀请，我毫不怀疑达拉第先生也将接受。我也没有必要说我的答复将如何了……

确实已没有必要了。这所古老的议事堂，这个巴力门（议会）之母，以它悠久的历史上没有前例的狂热掌声来回答首相的[411]演说。欢呼狂叫响成一片，议事日程单扔得满场乱飞，许多人热泪纵横，在这番狂乱激动之中，大家听到一个超乎一切的声音，它表达了所有人的深切感情：“ 为我们的首相感谢上帝！ ”

捷克公使、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国父的儿子扬·马萨里克从外交官席上皇卜采，看到这一幅景象，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后来，他到唐宁街拜会了首相和外交大臣，想探明他那将作出全部牺牲的国家是否会被邀参加慕尼黑会议。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回答说，它不会被邀请，希特勒不会赞成。马萨里克，眼睁睁地盯着这两个敬神畏天的英国绅士，费了好大的力气才克制住了自己的感情。

“ 如果你们在牺牲了我的国家后能够维持住世界和平的话， ”他最后说，“ 我将是第一个向你们欢呼的人。但是要是不能如此，那么，两位先生，愿上帝拯救你们的灵魂！ ”[①]

那些密谋分子，那些将军和文官，哈尔德将军、冯·维茨勒本将军、沙赫特、吉斯维乌斯、科尔特以及其他的人们，他们在这决定命运的一天中午前不久还曾相信（如维茨勒本所说）时机已经到来，现在他们又怎么样呢？可以用他们自己的话来作简单的答案。不过，这些话都是事情过了很久，一切已成陈迹以后才说出来的，这时他们急于要向世人表白，他们多么反对希特勒和多么反对他那使德国在经过一场长期的流血的战争后归于完全毁灭的蠢剧。

全是尼维尔·张伯伦不好！他们都这样说。由于他同意参加慕尼黑会议，因而逼得他们在最后一分钟取消了他们推翻希特勒和纳粹政权的计划！

1946 年 2 月 25 日，在进行了很久的纽伦堡审判临近尾声的时候，哈尔德将军受到了美国检察当局方面一位纽约青年律师山姆·哈里斯上尉的单独盘问。

> ［哈尔德说］原来的计划是，本着避免流血的精神，用军队占领总理府，占领为党员和希特勒的积极支持者所把持的政府各官署，特别是各部，然后就在德国全国人民面前审判这一集团……到了这一天[9 月 28 日］，维茨勒本在中午到我的办公室来看我。我们讨论了这个问题。他请我给他下执行的命令。我们讨论了其他的细节——诸如他需要多少时间等等。在讨论过程中，得到了英国首相和法国总理同意到希特勒这里来作进一步谈判的

---

① 马萨里克后来把这一场面告诉过本作者，他也告诉过他的许多其他友人。但我的笔记已遗失，此处因的是惠勒—贝纳特在《慕尼黑》中所作的动人叙述，见该书第 170—71 页。

消息。维茨勒本当时在场。我因此收回了执行的命令，因为，由于发生了这一情况，采取行动的全部基础已经消失了……

我们坚决相信，我们是会成功的，但是不料来了个张伯伦先生，战争的危险一下子就扭转了……需要使用武力的时机避免掉了……只能等待新的机会到来……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你是说，要是张伯伦不到慕尼黑来[412]的话，你们的计划就会执行，而希特勒早就会被推翻？”哈里斯上尉问他。

“我只能说计划会执行，”哈尔德回答说，“我不知道，它是否会成功。”[①]

在纽伦堡审讯中和在战后所写的书中显然夸大了自己在历次反希特勒密谋中的作用的沙赫特博士，也认为德国人所以没有实行 9 月 28 日的计划，罪在张伯伦：

从历史后来的发展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由维茨勒本和我所策划的第一次政变的尝试是唯一真正能够扭转德国命运的一次尝试。它是唯一及时计划好并准备好了的一次尝试……在 1938 年秋天，仍然有可能指望把希特勒交付最高法院审判，但是以后历次想推翻他的努力，就都须设法搞掉他的生命才行了……我曾经及时地作好了发动一场政变的一切准备，而且差一点儿就大功告成。历史执意与我作对。外国政治家的干涉是我所不能事前估计在内的事情。[②]

在纽伦堡审讯中在证人席上成为沙赫特最坚决的辩护士的吉斯维乌斯补充说：

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竟然发生了。张伯伦和达拉第飞到慕尼黑来了。我们的起事完蛋了。有几个钟头，我一直在设想，不管怎么样，我们还能起事。但是维茨勒本不久就告诉我，部队决不会反叛取得胜利的元首……张伯伦救了希特勒。[③]

是不是他救了希特勒呢？还是说，这只是德国的文官和将军为他们没有及时行动找到的借口呢？

哈尔德在纽伦堡受讯问的时候，向哈里斯上尉解释说，进行“革命行动”要能够成功，有 3 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要有清醒而坚决的领导。第二个条件是，人民群众愿意拥护革命的主张，第三个条件是，要正确选择时机。照我们看来，第一个条件所要求的清醒而坚决的领导是存在的。第二个条件我们认为也是具备的。因为……德国人民不要战争，因此，全国人民因为害怕战争是愿意同意革命行动的。第三个条件——正确选择时机——也很好，因为我们原来预料在 48 小时内就会得到采取军事行动的命令。因此，我们坚决相信，我们是会成功的。

可是，不料来了个张伯伦先生，战争的危险一下子就避免了。

人们大可怀疑哈尔德将军的第一个条件究竟是否像他所说的[413]那样具备。因为，要是果真有“清醒而坚决的领导”的话，这些将军怎么会犹豫了 4 天之久呢？他们手里有着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希特勒和他的政权扫除掉的军事力量：维茨勒本在柏林城内外有整整一个军——第三军；勃洛克道夫一阿尔菲尔德在波茨坦附近有一个精锐的步兵师；霍夫纳在南边还有一个装甲师，此外在首都还有两名高级警官冯·赫尔道夫伯爵和冯·德·舒伦堡伯爵，他们掌握着很大一支装备精良的警察部队可为臂助。据密谋分子自己说，只

[①] 根据 1946 年 2 月 25 日对哈尔德的提审，见《纳粹的阴谋与侵略》，附件 B，第 1553—58 页。

[②] 沙赫特著上引书，第 125 页。

[③] 吉斯维乌斯著上引书，第 326 页。

要哈尔德一声令下，所有这些军官就可以以压倒的兵力应声行动，而被希特勒将挑起战争一事吓得要命的柏林老百姓会——就作者本人亲身体会所能判断而言——自动地起来支持这一政变。

要是张伯伦不同意到慕尼黑来的话，哈尔德和维茨勒本到底会不会行动，是一个永远不能有多少把握来回答的问题。这些将军当时所以想推翻希特勒，只是为了避免一场肯定要失败的战争，而不是为了结束希特勒统治的恐怖与暴政。考虑到他们这个具体态度，那末要是没有慕尼黑会议的话，他们很可能已经采取行动了。然而，到底这个密谋是否确已准备得十分充分，武装部队是否确已枕戈待命，而哈尔德与维茨勒本是否确实差一点儿就要下令行动，迄今为止，我们并没有材料足以证实这一切。我们只有几个密谋参加者的一面之词，他们在战后都急于表白自己多么反对国家社会主义，而且他们所说的和所写的自辩之词往往是相互矛盾而且混淆不清的。”

如果，像这些密谋分子所说的那样，他们的计划曾经如箭在弦上的话，那末，张伯伦宣布愿去慕尼黑的消息肯定是拆了他们的台。在人人都能看到希特勒不用战争就能取得重大胜利的时候，这些将军确实很难把他逮捕并且把他当作战争罪犯来审判。

在这一切不能肯定的情况中，有一点是肯定的——在这里必须承认沙赫特博士的看法是对的——那就是，对于想推翻希特勒、迅速结束第三帝国、挽救德国和世界免于战争的德国反对派来说，这样的天赐良机是一去不返了。如果可以一概而论的话，那末可以说，把自己的无能倭过于外国人，正是德国人的弱点。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达拉第和庞纳，对慕尼黑从而也对此后一切灾难[414]性的结局所负的责任是超乎一切的。但是，他们没有十分认真地看待德国内部有一批将军和文官准备“谋反”的消息，这却是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原谅的。因为这批人中大部分直到当时都还在以他们极大的才干为希特勒尽忠效力，张伯伦等，至少是他们在伦敦和巴黎的某些顾问，也许还会回忆起最近的德国历史上的一些阴暗事实：正是军队，它帮助这个前奥地利下士取得了政权；正是军队，因为希特勒给了它以重新武装的机会而满怀欢喜；军队也显然并不反对国家社会主义制度对个人自由的摧毁；而且，军队对它的自己人施莱彻尔将军之被暗杀，自己的总司令冯。弗立契将军之被卑鄙诬陷以致免职也都不吭一声；就在最近，军队还支持了对奥地利的并吞，事实上还提供了武装力量助其实现。不论伦敦和巴黎的那些主要的绥靖姑息主义者头上可以加上什么样的罪责，而且尽管这种罪责无疑极大，事实仍然是，德国的将军们自己以及他们的文官共谋者错过了大好时机，没有能毅然采取行动。

慕尼黑的投降：1938 年 9 月 29—30 日

9 月 29 日午后 12 点 30 分，阿道夫·希特勒在巴伐利亚的这个巴罗克式的城市里，在这个他曾在破破烂烂的小咖啡馆的阴黯后室里开始其卑微的政治生涯的城市里，在这个他曾在大街上遭到啤酒馆政变失败惨剧的城市里，俨然像一个征服者一样，欢迎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政府首脑。

那天一清早，他就到前德奥边境上的库夫施但因去迎接墨索里尼，并且为在会议上采取共同行动而打下了基础。在到慕尼黑的火车上，希特勒怀着好斗的情绪，指着地图向那位意大利的领袖解释，他打算怎样“清算”捷克

斯洛伐克。他说，要是那天开始的谈判不能立刻取得结果，他就要诉诸武力。据当时在场的齐亚诺引用希特勒自己的话说，“此外，终有一口我们要并肩对英国和法国作战”。墨索里尼表示同意。[①]

张伯伦并没有像希特勒那样事先去看达拉第，为两个西方民主国家制定一个共同战略，来同两个法西斯独裁者对垒。事实上，我们这些在慕尼黑同英国和法国代表团有接触的人中间，有许多人都越来越看清楚，张伯伦到慕尼黑来的时候，已经打定主意不让任何一个人，当然不让捷克人，甚至也不让法国人，阻碍他同希特勒迅速达成协议。”至于达拉第，他整整一天都像是晕头转向地那样跟着跑，根本不需要提防他，然而业已下定决心的首相还是不放心。[415]会谈是12点45分在柯尼斯广场的所谓元首府里开始的，这次会谈不过是高潮的尾声，只是办一个正式手续，把希特勒的要求不折不扣地按时交给他而已。据在场负责德、法，英3种文字翻译工作的那位不知疲劳的译员施密特博士的观察，会谈一开始就有一种“普遍亲善的气氛”，汉德逊大使后来回忆说，“他们在会谈的任何时候都没有发热”。没有人当主席，整个进程都是很随便的。根据战后发现的德国人的记录[②]来看，英国首相和法国总理拼命迎合希特勒。甚至在他作了如下的开幕发言以后，他们还要拼命地迎合他：

> 他在体育馆演说里声明，他无论如何都要在10月1日进军。他得到答复说，这一行动将具有暴力行动的性质。因此需要使这一行动不具有这种性质。虽然如此，仍然必须立即采取行动。

会议在墨索里尼发言时接触到了实质问题。他是第三个发言的（达拉第被留在最后）。他说，“为了提供一个实际解决问题的办法”，他带来了一个明确的书面建议。这个建议的来源是很有趣的一件事，而且我相信，张伯伦到死都不知道，从弗朗索瓦一庞赛和汉德逊的回忆录来看，他们两个人也是蒙在鼓里。事实上，在这两位独裁者不得善终以后很久才真相大白。

意大利领袖当作他自己的折中方案拿出来骗人的东西原来是前一天在柏林德国外交部由戈林、牛赖特和威兹萨克背着外交部长冯·里宾特洛甫草拟出来的，因为他们3人不相信他的判断。戈林把它拿去给希特勒看，希特勒说可以。于是马上就由施密特博士赶译成法文，送给意大利大使阿托利科，阿托利科把它全文用电话传到罗马，那位意大利独裁者在要上火车赴慕尼黑之前刚刚收到。这样，所谓“意大利建议”不但成为这次非正式会议上的唯一议程，而且成为后来慕尼黑协定的基本条款，而实际上，这只不过是在柏林制造出的德国建议。建议的措辞同希特勒被拒绝的戈德斯堡要求极为相似，因此，上面这一事实本来似乎应当是十分明显的，但是对达拉第和张伯：[416]伦或者现在随他们来开会的英法驻德大使来说，却并不是如此。据德国人的记录说，法国总理“欢迎意大利领袖的建议，说它是本着客观和现实的精神提出来的”，英国首相“也欢迎意大利领袖的建议，并且宣称他本人也想到过一个同这个建议相似的解决办法”。至于汉德逊大使，据他以后写的书说，他认为墨索里尼“巧妙地结合了希特勒的建议和英法建议而作为他自己的建议提了出来”；弗朗索瓦一庞赛大使的印象是，与会者是根据“由霍

[①] 《齐亚诺秘密日记（1937—1938年）》，第166页。墨索里尼在1940年6月26日的电报中提醒希特勒，在慕尼黑时他曾保证参加进攻英国。电报全文收入《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10卷，第27页。

[②] 两次慕尼黑会议记录，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2卷，第1003—8和第1011—14页。

拉斯·威尔逊起草的”一项英国备忘录在进行工作。[1]这些不惜一切代价一心只想姑息的英法政治家与外交家真是容易欺骗啊！

既然“意大利”建议受到全体与会者这样热烈的欢迎，剩下的就只有少数细节还要推敲了，也许本来就不意外，过去是生意人出身而且曾任财政大臣的张伯伦，想知道在苏台德区的公有财产转交给德国人以后，由谁来赔偿捷克政府。希特勒（据弗朗索瓦一庞赛说，他因为不能像墨索里尼那样听得懂用英、法文进行的谈话，看起来脸色不大好而且心情也颇为烦恼）激动地回答说，根本不给什么赔偿。首相反对规定捷克人在迁出苏台德区时，甚至不能带走他们的牲畜（这原来是戈德斯堡建议的一条），他说：“难道这是说，农民要被逐出，而他们的牲畜倒要被留下吗？”这时，希特勒冒火了：

“我们的时间太宝贵了，不能浪费在这些细枝末节上！”他对张伯伦嚷了起来[2]。首相就此再也不提这回事了。

他开头确也曾坚持应当有一个捷克代表出席，或者至少用他的话来说，“随叫随到”。他说，“如果没有来自捷克政府的保证的话，他的国家当然不能担保这一地区[指苏台德]能在10月10日（这是墨索里尼建议的日子）撤退完毕”。达拉第给了他不怎么热心的支持。他说，法国政府“绝不容许捷克政府在这件事情上拖延”，不过，他认为“在必要时能供咨询的捷克代表如能出席，是有好处的”。

但是希特勒寸步不让。他不允许有任何捷克人在他面前。达拉第驯顺地退让了，但是张伯伦最后还是赢得了一个小小的让步。大家同意，像首相所建议的那样，可以有一位捷克代表等“在隔壁房间里”，随叫随到。

那天下午会议上果然来了两个捷克代表，一个是捷克驻柏林公使伏伊特赫·马斯特尼，一个是布拉格外交部来的休伯特·马萨里克博士，他们被冷淡地带进了隔壁一个房间里。他们在那里冷冷清清地从下午2点一直等到下午7点，最后，天终于打他们头上坍下来了。就在7点钟的时候，曾参加伦西曼代表团而现在又跟张伯伦当随员的弗朗克·阿希东一格瓦特金跑过来向他们宣[417]布了坏消息。已经达成了全面的协议，不过他还不能告诉他们细节，总之，它要比法英建议“苛刻”得多。马萨里克问他能不能让捷克人陈述意见，据这位捷克代表后来向政府报告说，这个英国人的答复是“我似乎太不了解大国的处境多么困难，而且我简直不懂得同希特勒谈判多么难办”。

晚上 10 点，这两个郁郁不乐的捷克人给带去见首相忠实的顾问霍拉斯·威尔逊爵士。威尔逊代表张伯伦把四国协议的要点通知了他们，并且交给他们一张捷克人应立即撤出苏台德区的地图。当两个捷克使者想提出抗议的时候，那位英国外交官打断了他们的话头，他说，他没有话要说了，接着就马上离开了房间。两个捷克人继续向跟他们在一起的阿希东一格瓦特金表示抗议，然而一点用处都没有。

阿希东一格瓦特金也要走了，临走的时候，他告诫他们说：“你们要是不接受的话，就得完全单独地去同德国人打交道。也许法国人同你们说这句话的时候可能说得更客气一点，不过你们可以相信我，他们同我们的看法是一样的，他们不想管你们的事。”

虽然这话必然使两位捷克使者十分伤心，但说的却是老实话。9月30日

---

[1] 汉德逊著上引书，第171页。弗朗索瓦一庞赛著上引书，第271页。

[2] 施密特著上引书，第110页。

凌晨刚敲过一点，*希特勒、张伯伦、墨索里尼和达拉第就顺这个次序在慕尼黑协定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这个协定规定德国军队将如元首过去一再预言的那样，在 10 月 1 日进军捷克斯洛伐克，并且在 10 月 10 日完成对苏台德区的占领。希特勒已经得到他在戈德斯堡所没有得到的东西了。

现在还剩下一件痛苦的——至少对牺牲者来说是痛苦的——［418］事情要办，那就是通知捷克人该在什么时候放弃什么东西。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对这一部分仪式不感兴趣，接着就退席了，任务于是就落到捷克斯洛伐克的盟邦法国和英国的头上。马萨里克在对捷克外交部的正式报告中，对这个场面有十分生动的叙述：

> 凌晨 1 点 30 分，我们被带到举行会议的大厅。在场的有张伯伦先生、达拉第先生、霍拉斯·威尔逊爵士、莱若先生[法国外交部秘书长]、阿希东一格瓦特金先生、马斯特尼博士和我。气氛是令人窒息的，判决马上就要宣布了。法国人显然十分紧张，看来还竭力想在法庭面前保持法国的威信。张伯伦讲了很长的一段话，介绍了协定的内容，并且把协定的文本交给了马斯特尼博士……

捷克人开始问了几个问题，但是

> 张伯伦先生不停地打呵欠，一点也不想掩饰他的倦怠，我问达拉第和莱若两位先生，他们是否希望我国政府对这个协定作一项答复或者发表一项声明。可以看得出来，达拉第先生的神情十分紧张，莱若先生回答说四位政治家没有多少时间。然后他以一种故作随便的态度急急忙忙接着说，并不要求我们作答复，他们认为这个计划已被接受，我国政府必须在这一天，至迟到下午 3 点钟，派代表到柏林去参加国际委员会的会议，最后还说，捷克斯洛伐克要派出的军官应当在星期六到柏林，去商定第一个地区撤退工作的细则。他说，空气已开始变得对全世界都危险了。
>
> 他对我们讲话的态度称得上是够生硬的了。这还是一个法国人……张伯伦先生一点也不想掩饰他的困倦，他们给了我们另一张略有改正的地图。然后，他们对我们的话就说完了，我们可以走了。[①]

我还记得在这个决定命运的夜里，希特勒在开完会以后趾高气扬地走下元首府宽阔的台阶时眼睛里闪耀出的那种胜利的光芒，还记得穿着那特制的民兵制服的墨索里尼那副不可一世的神情，还记得张伯伦打呵欠的样子和回到摄政宫饭店的时候那副睡意盎然的模样。

> 至于达拉第，[我在那天晚上的日记里写道]看起来像是一个完全被打败而且完全垮了的人。他到摄政宫饭店同张伯伦道别……有人问他，或者说刚开始问他：“总理先生，你对这个协定满意吗？”他转过身来，口里似乎要说什么，然而他这时已精疲力尽，因此话没有出口就一声不响踉踉跄跄地推门出去了。[①]

张伯伦同希特勒会谈世界和平问题还没有完。第二天（9 月 30 日）早晨，他经过几小时的睡眠，精神已经恢复过来了，心里也［419 ］为前一天劳累的成绩沾沾自喜，他又到元首在慕尼黑的寓所去看希特勒，想同他进一步讨论欧洲的局势，并且从希特勒那里得到一点他显然认为会加强他在国内的政治地位的小小让步。

据给这次意料不到的会面当翻译而且是唯一的见证人的施密特博士说，

[①] 根据马萨里克博士给捷克外交部的正式报告。本节关于慕尼黑会议的材料来源有：同本章 600 页注 2；协定全文，同上，第 1014—16 页：《英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 3 卷，第 2 册，第 1 号，第 227 页；齐亚诺、施密特、汉德逊、弗朗索瓦—庞赛、威兹萨克等著上引书。

[①] 《柏林日记》，第 145 页。

希特勒这天显得脸色苍白，情绪阴郁。他心不在焉地听着那位精力过人的英国政府首脑表示，相信德国在“实施慕尼黑协定方面会采取大度包容的态度”，并且再次表示希望捷克人不会“不讲理到制造什么困难”的程度，而如果他们造成了什么困难的话，希望希特勒不会轰炸布拉格，以免“在平民中造成可怕的损失”。这些话还只是张伯伦所要说的杂乱无章的长篇大论的开端。要不是施密特把它记录在德国外交部的正式报告上的话，即使张伯伦在前一天夜里已经对德国独裁者作了那样下贱的投降，人们也简直不能想像这番话会出自一个英国首相之口。就是在今天，人们在读这个缴获文件的时候也很不容易相信。

不过，这位英国领袖的开场白还只是后文的前言。在那位脾气不好的德国独裁者听来，张伯伦的话想必都不过是滔滔不绝的空话。他建议英德两国进一步合作来结束西班牙内战（在这场战争中，德国和意大利的“志愿军”正在为佛朗哥赢得胜利），建议促进裁军，促进世界经济繁荣，加强欧洲政治和平，甚至还建议解决俄国问题，然后，首相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来，上面已经写好了他希望两个人能在上面签字并且立即发表的东西：

> 我们，德国元首兼总理和英国首相，今天再次举行了会议，一致认为英德关系的问题对两国和对欧洲都具有最大的重要性。
>
> 我们把昨夜签字的协定和英德海军协定看成是我们两国人民再也不想彼此交战的愿望的象征。
>
> 我们决心以协商的办法作为处理任何其他涉及我们两国的问题的办法，我们决心继续努力，消除可能引起分歧的原因，从而有助于确保欧洲的和平。

据施密特在正式报告中说，希特勒看了一下这个宣言，很快就在上面签了字，使张伯伦大为满意，施密特的印象是元首本来“有几分勉强……只是为了让张伯伦高兴”才同意的，而张伯伦，据他接着说，“对元首表示热烈感谢……再三强调他预料这一文件将产生巨大的心理影响”。

这位蒙在鼓里的英国首相当然不知道（如几个德国和意大利秘密文件很久以后所透露出来的那样），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就在这次慕尼黑会议中已经商量好，时候一到，他们就将“并肩”对英［420］国作战。我们很快就会看到，他也识不破在希特勒那阴郁的心底里已经又有许多别的东西在酝酿着了。①

张伯伦胜利地回到了伦敦——达拉第也同样地回到了巴黎。得意洋洋的首相挥舞着他同希特勒签署的宣言来迎接拥到唐宁街来的大群人们。他们向他高喊“好佯的尼维尔”！还对他高唱“因为他是一个呱呱叫的好人”。张伯伦笑逐颜开，站在唐宁街 10 号 3 楼的阳台上向他们讲了几句话。

“我的好朋友们，”他说，“在我国历史上，这是第二次把光荣的和平从德国带回到唐宁街来。”我相信，这是我们的时代的和平。”

《泰晤士报》宣称：“没有一个征服者从战场上得胜归来的时候曾带着比这更高贵的桂冠。”居然有一个自发的运动来筹集一笔“全国感恩基金”来向张伯伦致敬，不过，他谦虚地拒绝了。只有海军大臣达夫·古柏一个人因此辞职，在继之而来的下院辩论中，当时仍是在野的温斯顿·丘吉尔在那篇值得纪念的发言中说：“我们遭到了一场全面的十足的失败。”然而，据他自己后来回忆，他被迫停了下来，一直等到暴风雨般的抗议声平息以后才能接着讲下去。

布拉格的情绪当然大相径庭。9 月 30 日清晨 6 点 20 分，德国代办就把

捷克外交部长克罗夫塔博士从床上叫起来，交给他慕尼黑协定的文本和一份要捷克斯洛伐克派两名代表参加“国际委员会”下午 5 点在柏林举行的第一次会议的邀请书。这个国际委员会是负责监督协议的执行的。

贝奈斯总统整个上午都在赫拉德欣宫中同政界与军界的领袖会商。对他来说，除了屈服而外，别无其他出路。英国和法国不但抛弃了他的国家，而且如果他拒绝慕尼黑条件的话，它们还将支持希特勒使用武力。下午 12 点 50 分，捷克斯洛伐克投降了。为此发表的官方公报说，它是带着“对全世界提出的抗议”投降的。新任总理西罗维将军在下午 5 点向捷克人民所作的广播中愤懑地解释说：“我们被抛弃了，我们是孤独的。”

一直到最后，英国和法国都还在对被它们诱骗、出卖的国家施加压力。这一天，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公使见了克罗夫塔博士，想确实弄清楚捷克人会不会在最后一分钟起而反对投降。德国代办汉克博士在发给柏林的一份电报里描述了这个场面。

> 法国公使想对克罗夫塔说些安慰的话，然而被外交部长打断了：“我们是被迫落到这种地步的；现在一切都完了，今天轮到的是我们，明天轮到的就［421］是别人了。”英国公使期期艾艾地跟上去说张伯伦已尽了最大努力，但是也得到了像法国公使得到的一样的答复。外交部长已经是一个完全垮了的人。他暗示只有一个愿望：3 位公使赶快离开。[①]

贝奈斯总统在柏林的要求下于 10 月 5 日辞职，后来因为看到他的生命有危险，就飞到英国，开始度流亡生涯。他所遗下的总统职务由西罗维将军暂代。11 月 30 日，国民议会选举心地善良然而性格软弱的六六衰翁、最高法院院长艾米尔·哈查为残存的捷克一斯洛伐克的总统，从这时起，这个国家的名字就在捷克和斯洛伐克之间正式加上了一个连接号。

凡是张伯伦和达拉第在慕尼黑忘了给德国的东西，都由所谓“国际委员会”一一交出了。这个草草组成的委员会由意、英、法三国驻柏林大使、捷克驻柏林公使和德国外交部国务秘书冯·威兹萨克男爵组成。每一次德国人多要土地时，委员会就总是按照他们的愿望来解决问题，不止一次是在希特勒和最高统帅部扬言要用武力的威胁下这么做的。最后，委员会在 10 月 13 日表决通过取消慕尼黑协定关于要在有争议地区举行公民投票的规定。这一套已经用不着了。

波兰人和匈牙利人在扬言要对孤立无援的捷克斯洛伐克采取军事行动之后，就像食尸的饿鹰一样，乘虚而入，分得了一片土地。在以后 12 个月中即将成为本书下章主角的外交部长约瑟夫·贝克的要求下，波兰得到了特青周围大约 650 平方英里的土地，上面居住着 22.8 万居民，其中倒有 13.3 万是捷克人。里宾特洛甫和齐亚诺在 11 月 2 日给匈牙利分配了一块大一点的土地，共有 7500 平方英里，上面住着 50 万马扎尔人和 27，2 万斯洛伐克人。

除此而外，柏林还逼着这个肢体残缺、防务荡然的国家成立一个显然具有法西斯倾向的亲德政府。人人都了然，从此以后，捷克斯洛伐克国家只是在第三帝国领袖的鼻息之下苟延残喘而已。

慕尼黑的后果

[①]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 4 卷，第 4—5 页。

根据慕尼黑协定，希特勒得到了他在戈德斯堡所要求的一切，而“国际委员会”又在他的威胁之下拱手奉上更多的东西。

1938 年 11 月 20 日的最后解决，强迫捷克斯洛代克割与德国 1.1 万平方英里的土地，上面住着 280 万苏台德日耳曼人和 80 万捷克人。在这个地区之内有着大量的捷克工事，它们构成了在当时来说是 [422] 欧洲最坚强的防线，只有法国的马奇诺防线可能除外。

这还不算，捷克斯洛伐克的全部铁道、公路、电话和电讯系统都被打烂了。根据德国人的统计，这个国家在被肢解以后丧失了 66%的煤，80%的褐煤，86%的化学工业，80%的水泥工业，80%的纺织工业，70%的钢铁工业，70%的电力工业，40%的木材工业。好端端的一个富庶繁荣的工业国仅仅在一夜之间就被瓜分豆剖而破产萧条了。

无怪乎约德尔在慕尼黑协定签字那天晚上那样兴高采烈写他的日记了。

> 慕尼黑条约已经签字了，捷克斯洛伐克作为一个国家力量来说已经不复存在了……由于元首的英明睿断，由于他那甚至世界大战都决不回避的决心，我们再一次不用武力就取得了胜利。现在希望的是，那些怀疑成性、意志薄弱而犹豫观望的人也许已经转变过来了，并且希望他们今后这样保持下去。[1]

许多犹豫观望的人转变了，至于少数没有转变的人就陷入了绝望之中。像贝克，哈尔德、维茨勒本这样的将军和他们的谋士们再一次证明是错了。希特勒得到了他要求得到的东西，他不发一枪就完成了又一次伟大的征服。他的威望达到了空前的新高度。没有一个像作者那样在慕尼黑会议之后到过德国的人能够忘记德国人民的狂喜，他们因为战争业已避免而如释重负。他们对希特勒的兵不血刃的胜利感到得意洋洋，这不但是对捷克斯洛伐克的胜利，而且是对英国和法国的胜利。他们告诉你，在短短 6 个月之内，希特勒征服了奥地利和苏台德区,给第三帝国平添了 1000 万人口和一大片有战略意义的领土，为德国称霸东南欧打开了大门。而赢得这样的丰功伟绩竟不曾牺牲一个德国人的性命！他以德国历史上所罕见的天才人物的本能，不但看穿了那些中欧小国的弱点，而且看穿了西方两个主要的民主国家英国和法国的弱点，逼得它们向他的意志屈服。他发明了一套可以称为政治战的新的战略战术，而且取得了惊人的成就，这种政治战已经使得真刀真枪的战争成为不必要了。

在仅仅 4 年有半的时间内，这个出身微贱的人已经使一个在政治上一片混乱、在军事上解除武装、在经济上接近崩溃的德国，欧洲大国中这个最孱弱的大国，一跃而被认为是旧大陆最强大的国家，所有其他的国家，甚至英国和法国，都在它的面前发抖，在这个令人目眩的跃进过程中，没有一个凡尔赛条约的战胜国阻挡过它的进路，即使在它们有力量这样做的时候，也没有这样做的胆量，事实是，在他取得了最大的胜利的慕尼黑会议上，英国和法国还曲意予以支持。而且想必使希特勒自己也最感诧异的，也［423］肯定使贝克将军、哈塞尔以及参加他们那小小的反对派的一伙人莫名其妙的，是主宰着英国和法国政府的那些人（元首在慕尼黑会议后有一次在背后轻蔑地管他们叫“小蛆虫”）当中，竟然没有一个人看到由于他们对这位纳粹领袖的每一步侵略行动都不加回击而造成的后果。

在英国，似乎只有温斯顿·丘吉尔一个人看到了这一点。再没有别的人

---

[1] 约德尔的日记，见《纳粹的阴谋与侵 略》，第 4 卷，第 368 页（纽伦堡文件 1780—PS）。

比他 10 月 5 日在下院的演说里把慕尼黑的后果说得更明白的了。

> 我们遭到了一场全面的十足的失败……我们正处在第一等的大祸之中。到多瑙河的门户……到黑海的门户已经洞开了。所有中欧的和多瑙河流域的国家都将一个接一个落入……以柏林为中心的……庞大的纳粹政治体系中……不要以为这是结尾。它不过是开始……

然而，丘吉尔并不是在朝之身，他的话并没有受人注意。

法国和英国在慕尼黑的投降是有必要的吗？阿道夫·希特勒不是在虚声恫吓吗？

说来矛盾的是，我们现在知道，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不”。所有战后还活下来的接近希特勒的将军都一致认为，要是没有慕尼黑的话，希特勒就会在 1938 年 10 月 1 日进攻捷克斯洛伐克，他们还认为，不论伦敦、巴黎和莫斯科会出现什么样暂时的犹豫，英国、法国和俄国最后都一定会参战。

而对这一段历史说来最重要的一点是，德国的将军们一致认为，在这场战争中德国将打败仗，而且败得很快。支持张伯伦和达拉第的人——他们在当时占绝大多数——说，慕尼黑妥协挽救了西方，慕尼黑妥协不但使西方免于战争，而且使西方免于在这场战争中失败，因而也保全了伦敦和巴黎，使它们没有被德国空军夷为平地。这种论调至少就后两点来说，受到了最有资格作判断的德国将军们，特别是最接近希特勒而且从头至尾最狂热的支持他的德国将军们的有力的驳斥。

后一类人中最重要的一个人就是凯特尔将军，他是最高统帅部长官，又是经常随侍在希特勒身边的宠臣。在纽伦堡审讯时，当问到德国将领对慕尼黑妥协的反应是什么时，他回答说：

> 我们特别高兴，因为没有采取军事行动……我们一直认为我们要用来进攻捷克斯洛伐克边境工事的装备是不够的，从纯军事的观点看，我们缺少能突破边境工事的手段。[①]

盟国的军事专家总是估计德国军队可以轻而易举地攻下捷克[424]斯洛伐克，然而凯特尔的证词却说情况并非如此。除此而外，还必须加上后来成为德国最杰出的战地指挥官之一冯·曼施坦因元帅的证词。当他在纽伦堡（不像凯特尔和约德尔那样，他没有受到可能判处死罪的起诉）就慕尼黑事件时期的德国实力作证时说明当时的情况说：

> 如果战争爆发，无论是我国的西部边境还是我国的波兰边境，都无法有 效防守，而且不论怎么说都毫无疑问的是，只要捷克人起而自卫，我们就会被他们的工事所拦阻，因为我们没有突破它的手段。[①] *

那位最高统帅部的“智囊”约德尔，在纽伦堡出庭为自己辩护的时候，是这样说的：

> 要以 5 个作战师和 7 个后备师的兵力在还只是一个施工现场的西线工事来档住 100 个法国师的进攻，是完全谈不上的，这在军事上是不可能的。[②]

如果，确实像这些德国将军承认的那样，希特勒的军队缺乏突破捷克防线的手段，而且要在西线抵挡占压倒优势的法国兵力，德国又确实处在一种“军事上不可能的”形势，不但如此，像我们前面所知道的那样，在将领中间还存在着严重的分歧，甚至陆军参谋总长都在准备推翻元首以躲避一场无

[①] 凯特尔 1946 年 4 月 4 日作的证词，见 《主要战犯的审讯》，第 10 卷，第 509 页。

[①] 曼施坦因 1946 年 8 月 9 日作的证词， 同上，第 20 卷，第 606 页。

[②] 约德尔 1946 年 6 月 4 日作的证词，同 上，第 15 卷，第 361 页。

法取胜的战争——既然如此，那末，为什么法国和英国的参谋总部居然会不知道？还是说，他们毕竟是知道的呢？如果他们确实知道的话，英国和法国政府的首脑又怎么能在慕尼黑被逼到牺牲自己那么多的根本利益的地步呢？在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的时候，我们碰到了直到现在都没有弄清楚的慕尼黑时代的一个谜。甚至对军事问题素来关心的丘吉尔来说，在他卷帙浩繁的回忆录中，也几乎没有涉及这个问题。

不能想像英国和法国的参谋总部和两国政府会不知道德国陆军参谋总部反对欧洲大战。因为，上面已经说过，柏林的密谋分子在 8 月和 9 月之间至少曾通过四条线把这一点告诉了英国人。而且我们已经知道连张伯伦本人都知道了这件事情。到 9 月初，巴［425］黎和伦敦决不能不知道贝克将军的辞职，也决不能不知道德国陆军中威信最高、能力最强的领袖的抗命对部队的影响。

当时在柏林的人一般都承认，英国和法国的军事情报工作是做得相当好的。简直难以相信，伦敦和巴黎的军事首脑人物会不知道德国陆军与空军的显著的弱点以及它们不可能在两条战线上同时作战的事实。法国陆军参谋总长甘末林将军——就算他天性谨慎达到极点也罢——掌握着将近 100 个师，到底还有什么理由怀疑他对付不了德国人摆在西线的 5 个正规师和 7 个后备师而不能摧枯拉朽，长驱直人到德国去呢？

总的说来，据甘末林后来自己说[①]，他并没有多少怀疑。9 月 12 日，就在希特勒在纽伦堡大会闭幕会议上大发雷霆对捷克斯洛伐克百般威胁的那一天，这位法军统帅曾经向达拉第保证，如果战争爆发的话，“西方民主国家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来决定和平条件”。他还写了一封信给达拉第说明他所以如此乐观的理由。9 月 26 日，正当捷克危机在戈德斯堡会议以后处于最高潮的那一天，随法国政府领导人同赴伦敦的甘末林又向张伯伦重申了他的保证，并且具体分析了军事形势，想不但给英国的首相而且也给自己那位动摇的总理打气。他在这一方面显然没有达到目的。最后，就在达拉第飞赴慕尼黑前夕，甘末林又向他简括地说明了在苏台德区问题上要作出领土让步时可以不致危及法国安全的最大限度，主要的捷克要塞，还有铁路干线，某些战略性的支线和主要的国防工业，决不能给德国。除此而外，他还说，决不能让德国人切断摩拉维亚山峡。要是在法德交战时捷克斯洛伐克能对法国有什么用处的话，这些都是不错的意见。然而，我们已经看到，达拉第不是能照此行事的人。

在慕尼黑时代，人们说得极多的是，张伯伦投降的理由之一是害怕伦敦将被德国的轰炸所毁灭，毫无疑问，法国人也是一想到他们美丽的首都会从空中被炸毁就胆战心惊的。但是据现在所弄明白的德国空军在当时的实力看来，伦敦人和巴黎人，同他们的首相和总理一样，是惊慌过度了。德国的空军已同陆军一样用来集中于对付捷克斯洛伐克了，因此也就同陆军一样不可能在西线进行严重的战斗。即使德国人能匀得出那么几架飞机去空袭伦敦和巴黎的话，也很可怀疑它们能不能到达目的地。英国和法国战斗机的防御力量尽管很弱，德国人也并没有足够的战斗机来掩护他们的轰炸机，就算他们有战斗机，它们的基地也太远了。

[①] 甘末林：《为国效劳》，第 344—46 页。这是一本令人失望的书！贝提纳所著《法兰西的掘墓人》一书第 3 页中证实了这位将军的话。甘末林在 9 月 26 日和 28 日的意见的来源同此。

也有人，特别是弗朗索瓦一庞赛和汉德逊这两位大使，认为[426] 慕尼黑妥协给了西方民主国家几乎一年的时间，使它们能在整军方面赶上德国。事实证明，这种论点不过是谎言。正如丘吉尔所说，而且也为盟国方面一切严谨的军事历史学家所同意的那样，“号称因慕尼黑妥协而‘得到’的一年喘息时间，使英国和法国同德国对比起来处于比慕尼黑危机时期坏得多的地位”。[①]我们下面就可以看到，德国方面一年以后所有的军事计划都证明了这一点，而以后发生的事变，当然又消除了任何怀疑。

现在根据我们所获得的德国秘密文件和德国人战后自己的亲口供认，回过头再来看这一段历史，就可以作出在慕尼黑时代所无法作出的下面这样一个总结。

德国在 1938 年 10 月 1 日没有能力对捷克斯洛伐克和法国、英国作战，更不用提再加上一个俄国了。要是它打的话，它将很快、很容易地被打败，那也就会是希特勒和第三帝国的末日。要是在最后一分钟由于德国陆军的干预而避免了一场欧洲大战的话，希特勒就可能被哈尔德和维茨勒本以及他们的同党所推翻，他们将在他最后下令进攻捷克斯洛伐克之际按照预定计划把他逮捕。

希特勒公开吹嘘“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他将在 10 月 1 日进军苏台德区，因此就给自己堵死了退路，弄得自己下不了台。他已处在贝克将军所早已预见到的“无法维持”的地位。要是他在作了这一番斩钉截铁的威胁和宣言之后自己又退了回来的话，他就存在不了多久，独裁政治就是这么一回事，而他的独裁政治尤其是如此。对他来说，后退，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也是极端困难的，要是他想后退的话，那末，他在欧洲，在本国人民当中，尤其重要的是在他的将领当中，势必威信扫地，其结果就将置他于死地。

张伯伦对希特勒的要什么就给什么这种执迷不悟的态度，他的伯希特斯加登和戈德斯堡之行，还有最后那一次决定命运的慕尼黑之行，挽救了希特勒，使他有了下台的梯子，把他在欧洲、在德国、在军队中的威信，提高到几个星期以前还无法想像的程度，这一切也把第三帝国同西方民主国家和俄国相抗衡的力量提高到无可估量的程度。

对法国来说，慕尼黑是一场大灾祸。实在不懂的是，为什么巴黎当时居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法国在欧洲的军事地位毁了。如果德国完全动员起来的话，法国的军队决不及德国军队的半数以上，因为德国的人口几乎比它多一倍；法国的军火主产能力也比德国为小；由于这两个原因，法国煞费苦心地在东欧即在德国——还有意大利——的侧翼同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等较小的国家建立了同盟，这些国家加在一起的军事潜力也抵得上一个大国。部署在坚固的山地工事中的 35 个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捷克师，牵制着比这个数目还要大的德国军队，现在法［427］国军队失去这支力量无异乎失去一条臂膀。然而这还不是一切，在慕尼黑事件之后，法国在东欧剩下的盟国还有哪个能对它的旦旦信誓有什么信任呢？同法国结盟还有什么价值呢？在华沙、布加勒斯特和贝尔格莱德能听到的答复是：价值不大。这些首都现在都争先恐后地想在为时尚未太晚的时候，同纳粹征服者做一笔尽可能不赔本的买卖。

莫斯科虽然没有发生争先恐后的忙乱，但是也引起了一些活动。虽然苏

[①] 丘吉尔：《风暴欲临》，第 339 页。

联同捷克斯洛伐克和法国都有军事同盟，法国政府却径自同德国和英国打交道而一声不吭就把苏联排除在慕尼黑会议之外。这一手是斯大林决不能忘怀的，而两个西方民主国家也为此在今后的几个月中付出了极大的代价。10 月 3 日，也就是慕尼黑会议以后 4 天，德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参赞瓦尔纳·冯·提伯尔斯克希向柏林报告了慕尼黑事件对苏联政策的“后果”。他认为斯大林将由此“得出结论”；他肯定苏联将“重新考虑它的外交政策”，将对它的盟邦法国不那么友好，而对德国的态度将“更加积极”。事实上，这位德国外交官认为“目前的局势给德国与苏联间缔结新的更广泛的经济协定提供了有利的机会”。[①]在德国秘密档案中，这是第一次提到柏林和莫斯科之间的风向要转了，不论这时的风势如何微弱，用不了一年，它就会产生重大的后果。

尽管希特勒取得了惊人的胜利，也尽管他不但给了捷克斯洛伐克而且给了西方民主国家以难堪的屈辱，希特勒对慕尼黑妥协的结果还是感到失望。沙赫特曾听见他在回柏林途上对他的党卫队警卫人员嚷着说：“那个家伙[指张伯伦]破坏了我进入布拉格的计划！”[①]这是他心里一直想要得到的东西。自从前一年的 11 月 5 日他对他的将领们第一次讲过这种打算以后,这也是他一再向他们说到过的东西。当时他就向他们说明，征服奥地利与捷克斯洛伐克，只是在东方大规模夺取生存空间和在西方同法国在军事上一决雌雄的前奏。他在 9 月 20 日曾对匈牙利总理说过，最好的事情还是“消灭捷克斯洛伐克”。他说“这才是唯一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他所担心的“危险”就是捷克人会向他的全部要求屈服。”

现在，张伯伦先生拿着他那把名闻天下的雨伞来到慕尼黑，逼着捷克人接受了他的全部要求，这样就剥夺了他进行军事征服的机会。从材料中可以看得十分清楚，这就是希特勒在慕尼黑以后一桩曲折的心事。他后来曾向他的将领们吐露，“从最初起，我就明白，我不能以苏台德日耳曼人的土地为满足，这只是一种部分的解决办法”。[②]

在慕尼黑事件以后没有几天，这位德国独裁者就开始把实现全面解决的计划付诸实施了。[428]

---

①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 4 卷， 第 602—4页。

① 沙赫特在纽伦堡的证词，见《主要战 犯的审讯》，第 12 卷，第 531 页。

② 1939 年 11 月 23 日对三军总司令的 讲话，见《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 3 卷，第 573 页（纽伦堡文件 789—PS）。

第十三章　捷克斯洛伐克再也不存在了

慕尼黑协定签字还不到 10 天，甚至苏台德区的和平占领还没有完成，阿道夫·希特勒就给最高统帅部长官凯特尔将军发出了一份绝密急电。

> 1.在目前形势下，要击破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捷克人的全部抵抗力量需要多少增援部队？
>
> 2.集结或者调动新部队需要多少时间？
>
> 3，上述措施如果在实行原定的复员、撤兵计划之后执行的话，需要多少时间？
>
> 4.要达到 10 月：日那样的待命状态需要多少时间？[①]

凯特尔在 10 月 11 日给元首回了一个电报，作了详尽的答复。不需要很长的时间，也不需要太多的增援部队，在苏台德区已经有 24 个师，其中包括 3 个装甲师和 4 个摩托化师。凯特尔说，“统帅部认为，鉴于目前捷克抵抗力量微弱，有可能无需增援即能开始行动”。[②]

在得到这样的保证以后 10 天，希特勒就把他的想法通知他的军事负责人。

> 绝　密
>
> 柏林，1938 年 10 月 21 日
>
> 武装部队未来的任务以及为执行此项任务所需进行的战争准备工作，我将在以后的命令中予以规定。
>
> 在该项命令下达以前，武装部队必须随时准备：
>
> 1.确保德国边界的安全。
>
> 2.请算捷克斯洛伐克的残存部分。
>
> 3.占领默默尔区。

默默尔是波罗的海沿岸一个大约有 4 万人口的港口,是德国[429]人在凡尔赛条约以后割让给立陶宛的。既然立陶宛比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还要小、还要弱，夺取这一城市对德国军队来说实在算不了一回事，而希特勒在这个命令中也只是说，它应予“归并”。至于捷克斯洛伐克：

> 必须在任何时候都能够扫荡残存的捷克斯洛伐克，如果它采取敌视德国的政策的话。
>
> 武装部队为应付上述事变所需进行的准备工作，规模要比“绿色方案”小得多；不过，因为这一次没有事先计划好的动员措施，他们必须保证处于高度的准备状态，受命执行这一任务的部队的编制、战斗序列与准备状态，在平时即应接进行突然袭击的需要予以安排，俾使捷克斯洛伐克没有任何可能进行有组织的抵抗，目标是迅速占领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并且切断斯洛伐克。[③]

当然，斯洛伐克是可以用政治手段来切断的，这样就可以不必动用德国军队。德国外交部正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在努力工作。10 月份头几天，里宾特洛甫和他的助手们就不断催促匈牙利人要求在斯洛伐克分一杯羹。但是当匈牙利（其实它并不需要德国人来吊它的胃口）说到要干脆拿下斯洛伐克的时候，威廉街就拿出它自己的主意来了。它对这块地方的前途还有别的打算。布拉格政府在慕尼黑会议以后己立即给了斯洛伐克以范围极广的自治，德国

[①] 绿色方案档案第 48 件，见《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 3 卷，第 372—74 页（纽伦堡文件 388—PS）。

[②] 同上。

[③] 希特勒 1938 年 10 月 21 日的指令，同 上，第 6 卷，第 947—48 页（纽伦堡 文件 C—136）。

外交部建议暂时“容忍”这种处理，至于将来，那末德国外交部政治司司长恩斯特·瓦尔曼在 10 月 7 日的备忘录中把德国的想法概括地说明了。他写道：“一个独立的斯洛伐克先天就是软弱的，因此最有利于德国向东方渗入与殖民。”[4]

这对第三帝国说来又是一个转折点。这是希特勒第一次想动手征服非日耳曼人居住的地区。在过去 6 个星期之内，他一直在私下或者公开向张伯伦担保苏台德区是他在欧洲最后的领土要求。尽管英国首相在相信希特勒的话这方面容易受骗到几乎难以置信的程度，但是他确有一些根据可以认为这位德国独裁者在吸收了原来住在德国境外而现在住在德国境内的日耳曼人以后是会罢休的。元首不是一再说过他在第三帝国之内不要一个捷克人吗？他不是在《我的奋斗》和无数次公开演说里面一再重申德国要强大就得在种族上保持纯粹，因而决不能要外国人特别是斯拉夫人的那种纳粹理论吗？这些都是他说过的。但是也许伦敦忘掉了，他也曾在《我的奋斗》中多次以狂妄的口气宣扬德国的前途在于在［430］东方征服生存空间。1000 多年以来，这块空间一直是斯拉夫人占着的。

砸玻璃窗的一周

1938 年秋天，纳粹德国又到了另一个转折点。它发生在后来在党内称为“砸玻璃窗的一周”内。

11 月 7 日，一个叫做赫尔彻尔·格林兹本的 17 岁的德籍犹太难民开枪刺杀了巴黎德国大使馆三等秘书恩斯特·冯·腊特。这个年轻人的父亲不久以前同其他 10000 个犹太人被装在封闭式货车车皮里押送出境到波兰。这个青年人为了给父亲报仇，为了报复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迫害，特意到德国大使馆去想刺杀德国大使约翰内斯·冯·韦尔兹克伯爵。但是出来接见他的人却是那位年轻的三等秘书，因而就把他当做了替死鬼，腊特可谓死得冤枉，因为他本人是反纳粹的，因此已受到秘密警察的监视，至少他从来不赞成德国统治者的排犹狂。

11 月 9 日晚上，纳粹党的头子们在希特勒和戈林的领导下对慕尼黑啤酒馆政变举行了一年一度的庆祝。庆祝刚完，第三帝国迄今为止最疯狂的排犹运动就开始了。照戈培尔博士和他所控制的报纸的说法，这是德国人民听到巴黎的凶讯以后“自发”举行的示威。但是在战后发现的文件证明了这种运动到底有多少“自发性”。[5]这些文件是战前纳粹时代的秘密档案中暴露性最强的——也是最骇人听闻的——一批文件。

据党内法庭的首席法官瓦尔特·布赫少校所作的一份秘密报告说，戈培尔博士曾在 11 月 9 日黄昏发出指示要在当晚“组织并进行”“自发的示威”。

[4]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 4 卷，第 46 页。

[5] 海德里希指示警方组织这次暴行的命令，见《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 5 卷，第 797—801 页（纽伦堡文件 3051—PS），他给戈林的关于死伤损失的报告，同上，第 854 页（纽伦堡文件 3058—PS—）。党内首席法官瓦尔特·布赫关于这次暴行的报告，同上，第 5 卷，第 868—76 页（纽伦堡文件 3063—PS）。布赫少校对于许多起杀害犹太人事件作了生动的叙述，把这些暴行归咎于戈培尔。戈林和内阁阁员、政府官员以及一名保险公司代表在 11 月 12 日的会议的速记记录，同上，第 4 卷，第 425—57 页（纽伦堡文件 1816—PS）。该记录虽残缺不全，但缴获部分达一万字。

但是实际上组织的人是仅次于希姆莱的党卫队第二号人物莱因哈德·海德里希。他年方 34 岁，为人凶残阴险，掌管着党卫队的保安处和秘密警察，他那天晚上用电传打字机发出去的命令现在已在缴获的德国文件中发现了。

11 月 10 日凌晨 1 点 20 分，他用电传打字机向国家警察和党卫队保安处的各分部和各站发出了一道紧急命令,指示他们会同党和党卫队的领导人“ 商议组织示威的问题 ”。

甲、采取的行动须不致危及德国人的生命财产。（举例来说，只有在火势不致延及邻近房屋对方得焚毁犹太人会堂。）* ［431］乙、犹太人的店铺与私人住宅可以捣毁，但不得劫掠……

丁、……2.警察不得拦阻即将举行的示威……

5.犹太人，特别是有钱的犹太人应予逮捕，人数视现有监狱能容纳多少而定……逮捕这些犹太人以后，应立即与有关的集中营联系，以便尽快把他们关进集中营。

在整个德国，这一夜都是恐怖的一夜。犹太人会堂，犹太人的住宅和店铺，到处都烈焰飞腾，犹太男女老幼在逃出火窟的时候，有很多被杀死了。第二天（11 月 11 日）海德里希就给戈林打了一个初步的秘密报告。

犹太人店铺和住宅摧毁的规模还不能得到确切的数字……就纵火所造成的实际损害而言，已知有 815 处店铺被毁，171 处住宅着火或捣毁，然而这只是一小部分而已……有 119 处犹太人会堂着火，另有 76 处完全捣毁……有 20000 犹太人被捕。据报死亡者有 36 人，受重伤者也有 36 人。上述死伤者都是犹太人……

那一天晚上被杀害的犹太人的最后数字估计要比初步数字大好几倍。海德里希自己在作上述初步报告之后的第二天就说，犹太人店铺遭到抢劫的有 7500 家。还发生了几起强奸案，这在布赫少校的党内法庭（根据他自己的报告来看）看来是比杀人更坏的事情，因为这违反了禁止非犹太人与犹太人发生性关系的纽伦堡种族法律。犯这一法律的人都被开除出党而交给普通法庭处理。布赫少校认为，党员如果只是杀害犹太人“ 不得予以惩办 ”，因为他们不过执行命令。在这一点上，布赫倒是说得十分坦率。他还写道：“ 社会上尽人皆知，像 11 月 9 日那样的政治运动是由党所组织和指挥的，不论党是否承认这一点。 ”*无辜的德国犹太人由于腊特在巴黎被刺而受到的苦难还不仅是被杀、被焚、被抢劫而已。犹太人还得自己赔偿自己的财产损失。因为他们应得的保险金被国家没收了。不但如此，他们还得集体［432 ］付出一笔 10 亿马克的罚款，用戈林的话来说，“ 赎回他们可恶的罪行等等 ”这笔附加的罚款，是在这位肥头胖耳的元帅所主持的、有 12 名内阁部长和高级军官参加的一次奇怪的会议上确定的，这次会议还有一部分速记记录保留到今天。

德国保险公司如果要讲信用而对那些洗劫一空的房子和砸得稀烂的货物付保险金的话，那末有很大一批都得破产。这些房子虽然是犹太人住的，然而绝大部分房主都是非犹太人。据到会议上去为保险公司说话的希尔加德先生告诉戈林，仅仅砸破的门窗玻璃一项就值 500 万马克（合 125 万美元），而且大部分替换的玻璃要角德国非常缺乏的外汇到外国去买。

“ 不能再这样干了！ ”戈林嚷了起来。要知道他不但担任许多要职，而且还是德国经济的主宰。“ 照这样干的话，我们受不了。不行！ ”他接着又冲着海德里希叫道：“ 我宁愿你杀掉 200 个犹太人也不要毁掉那么多值钱的东西！ ”*

“ 已经杀掉 35 个了。 ”海德里希答道，他是在为自己辩护。

当然在保留下来的这一部分 10000 字速记记录中，并不是所有的对话都是这样一本正经的。戈林与戈培尔在研究如何进一步侮辱犹太人的问题时说了不少寻开心的话。宣传部长说应当让犹太人来清除犹太会堂的废墟，把腾出来的地方做停车场，他认为什么地方都不能让犹太人去：学校、戏院、电影院、休养地、海滩、公园、甚至连德国的森林都不许去。他建议铁路上要有专门给犹太人乘的车厢和房间，不过只有在全体亚利安人都有了座位以后才能给他们用。

戈林哈哈大笑地说：“很好，要是火车太挤了的话，我们就把犹太人撵出去，让他们一路都单独呆在厕所里。”

当戈培尔一本正经地要求禁止犹太人进入森林的时候，戈林回答说：“我们应当给犹太人一部分树林，好让不少长得特别像犹太人的野兽——大角鹿就有他们那样的鹰钩鼻子——也到那里去过日子。”

在 1938 年这个严酷的一年中，第三帝国的领导人就是以这种谈话和更多类似的谈话来打发时间的。

但是由谁来赔偿国家所鼓动和组织的排犹运动所造成的 2500 万马克的损失的问题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对于现在负责纳粹德国经济状况的戈林来说尤其如此。希尔加德代表保险公司指出，如果他们对犹太人不守信用的话，那末，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人们对德国保险业的信任就要丧失净尽。另外一方面，他又实在［433］看不出许多小公司要是付出保险费的话怎么能不破产。

这个问题很快就被戈林解决了。保险公司足够地赔偿了犹太人的损失，但是每笔钱都由国家没收，然后再由国家补偿保险公司一部分损失。这种办法并没有使希尔加德感到满意，从会议记录看来，他一定感到自己碰上了一群疯子。

戈林：犹太人可以从保险公司得到保险金，不过这笔保险金将予以没收。保险公司因为可以不必负担全部的损失，因此还可以落得一点赚头。希尔加德先生，你该觉得自己的运气还不错哩！

希尔加德：我没有理由这样觉得。我们不过是不必赔偿全部损失而已，你却说这有赚头！

这位元帅是不习惯于听这种话的，他很快就压了一下这个莫名其妙的生意人。

戈林：等一等！照规矩你本来非得出 500 万不可。突然间，你面前来了一位像我这样有点胖胖的天使，告诉你可以留下 100 万，说句良心话，这算不算是赚头？我倒想跟你二一添作五平分呢，或者随便你怎么说都行。我一眼就看出来了，你满意得浑身都轻松了。你得到了好大一笔好处！

这位保险商人还是很难领悟。

希尔加德：所有的保险公司都要赔钱。事实本来就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谁都说不出有什么两样。

戈林：那你为什么不注点意，让玻璃窗少砸破几块！

元帅跟这位一副生意脑筋的人实在谈不下去了。希尔加德先生被请走，从此在历史上就不再出现了。

有一名外交部代表居然大胆提出，对犹太人采取下一步行动的时候得考虑到美国舆论的反映。”这个意见气得戈林大叫：“那个流氓的国家！……土匪的国家！”［434 ］过冗长的讨论之后，大家一致同意以下述方式解决

犹太人问题：把犹太人从德国经济中清除出去；把全部犹太人的企业和产业，包括珍室和艺术品在内，转交给亚利安人，对犹太人则以证券的形式给予若干赔偿，犹太人可以动用这种证券的利息，但是不得动用本金，关于把犹太人排除出学校、休养地、公园、森林等等地方的问题，以及在剥夺了他们的全部财产以后是驱逐他们出境还是把他们封锁在犹太隔离区内进行强迫劳动的问题，由一个专门委员会以后再去研究。

正如海德里希在会议快要结束时所说的那样："即使把犹太人清除出经济生活，主要的问题还会存在，那就是把犹太人撵出德国的问题。"财政部长施维林·冯·克罗西克，这位荣获罗得奖学金在牛津留过学，自命为在纳粹政府中代表"传统的、正派的德国"的伯爵表示同意说，"我们要尽一切力量把犹太人撵到外国去"。至于犹太隔离区问题，这位德国贵族温顺他说："我想，犹太隔离区的景象不是看了很舒服的。这个建议不是个十分令人愉快的建议。"

在进行了将近四小时的讨论之后，到下午 2 点 30 分，戈林结束了会议。

> 我想以这几句话来结束这次会议：德国的犹太族应当捐献出 10 亿马克，以此作为对他们各种可恶的罪行的惩罚。这是会起作用的。这些猪猡将再也不敢杀人了。附带说一句，我要说，我是不想在德国做一个犹太人的。

这个人，这个国家，还有它的元首，以后还给了犹太人比这次严重得多的打击，时间也隔了没有多久。从 1938 年 11 月 9 日那一个到处起火、全国鼎沸的夜晚开始，第三帝国就一心一意走上了一条再也不能回头的黑暗野蛮的道路。在此以前也有许许多多犹太人被杀害，被拷打，被抢劫，但是这些罪行，除了在集中营里的而外，大部分还是褐衫党的暴徒由于本人的残忍与贪欲而犯的，至于国家当局则只是袖手旁观或者假装没看见。现在，德国政府自己组织和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排犹运动。11 月 9 日夜间的杀人、抢劫、放火烧毁犹太人的会堂、住宅和店铺，都是它干的事情。而且向犹太人强征 10 亿马克、把他们排除在经济生活之外、剥夺他们剩余的财产而且把他们赶入犹太隔离区的官方法令，也是它在《国家公报》上公布的，其中 3 个就是在戈林召集会议的当天公布的。

在这样一个自称有上千年基督教和人道主义文化传统的国家里，竟发生这样野蛮的行为，这不免使世界舆论震惊和激动。反过来，希特勒又因为全世界的这种反应而怒不可抑，并且更加认定这只不过证明了"犹太人的世界性阴谋"的力量和规模。［435］ 现在回过头来看的话，不难发现，11 月 9 日加诸德国犹太人身上的恐怖和此后马上用来对付他们的横暴残忍的手段，不过是预示纳粹统治已开始趋于削弱的一个凶兆，最后终将为那个独裁者、他的政权和他的国家带来彻底的崩溃。希特勒的自大狂是我们在本书几百页的记载中到处可以看得见的，然而，直到现在为止，他在他和他的国家上升的每一个重大关头，他对这种自大狂一般都能加以克制。在那种关头，他表现出不但能大胆行动而且往往只是在对可能发生的后果仔细盘算以后才行动的天才，因而取得了一个接着一个的压倒的胜利。但是现在，11 月 9 日的事件及其后果清楚地表明，希特勒已开始失去自制能力。他的自大狂已经占了上风。那份由戈林在 11 月 12 日召开的会议速记记录表明，归根到底，希特勒才是那一夜浩劫的罪魁祸首；批准发动这场暴行的是他，要戈林提出把犹太人排斥出德国社会生活的也是他。从此以后，这位第三帝国的绝对主宰就很少再表现出过去曾一再使他自己脱身危难的那种自制能力。虽然他个人的

以及他的国家的天才以后还会继续取得不少惊人的胜利，对于这位独裁者和他的国家来说，引向最后自我毁灭的有毒的种子，现在就已经种下了。

希特勒的病是有传染性的，整个国家都感染上了，就像感染上一种病毒一样。从每一个个人来说，作者根据亲身的体验感觉到，许多德国人对 11 月 9 日的暴行正如美国人、英国人和其他外国人一样感到惊恐。但是，不论是基督教会的领袖们，还是将军们，还是任何其他所谓“善良的”德国的代表，都没有一个人立刻公开提出抗议。他们慑服在冯·弗立契将军所称为“不可避免的”东西或者“德国的劫数”面前。

慕尼黑的气氛很快就烟消云散了。那年秋天，在萨尔布鲁根，在魏玛，在慕尼黑，希特勒都发表了气势汹汹的演说，警告其他各国，特别是英国人，还是专管自己的事情好，不要管“德国疆界以内的德国人的命运”。他咆哮说，德国人的命运纯粹是德国自己的事情。用不了很久，即使是对德国政权作了这样多姑息的尼维尔·张伯伦，也开始认识到德国政权的本性了。在多事的 1938 年渐渐向凶险的 1939 年过渡的时候，英国首相已逐步风闻到，他为欧洲和平着想而曾尽心竭力想讨好的德国元首在背地里策划些什么勾当了。*

慕尼黑会议以后不久，里宾特洛甫就到了罗马。据齐亚诺在［436］10 月 28 日的日记中说，他的心思“完全都在”战争上。⑨

> 元首[德国外交部长告诉墨索里尼和齐亚诺说]深信，我们不可避免地必须估计到在几年之内也许在 3 年或 4 年之内同西方民主国家发生战争……捷克危机已经表明了我们的力量！我们处于能先发制敌的有利地位，并且能完全掌握局面。我们是不会受人进攻的。军事形势好到无与伦比：从［1939 年]9 月起，我们就可以同各民主大国打仗了。①

在这位年轻的意大利外相看起来，里宾特洛甫是“自命不凡、举止轻浮而且喋喋不休的”。他在日记里作了这样一番描写以后又加上一句说：“领袖说你只要看一看他的脑袋就可以看得出他的脑子有多小了。”德国外交部长到罗马来是为了说服墨索里尼签订德日意军事同盟条约。在慕尼黑的时候，这个条约的草案就已经交结了意大利人，但是墨索里尼一直在拖时间。据齐亚诺说，他还没有打算对英国和法国关上大门。

希特勒自己那年秋天一直在想离间法国和同它隔海相望的盟国。

10 月 18 日当希特勒在伯希特斯加登高山顶上那座名为“鹰巢”的怪诞的堡垒中”接见弗朗索瓦一庞赛的时候，他在那位来向他告别的法国大使面前，对英国大加攻击。大使发现元首脸色苍白，满脸倦容，但是还没有疲劳到没有力气痛骂英国的程度。他说，英国接连不断“以威胁和要动武”的口吻叫嚷着，它是自私的而且总带着“优越的”架子。英国人毁掉了慕尼黑精神，以及诸如此类的话。法国就不同了，希特勒说，他希望同法国建立更友好更紧密的关系。为了证明这一点，他愿意立即签订一项友好条约，保证尊重它的现有边界（因此也就是再次表示德国对阿尔萨斯一洛林没有任何领土要求），并且建议以协商的方法解决以后的任何分歧。

---

⑨ 《齐亚诺秘密日记》，1938 年 10 月 28 日，第 185 页；《齐亚诺外交文件集》，第 242—46 页。

① 德国方面关于里宾特洛甫 10 月 28 日在罗马同齐亚诺的谈话的记录（那是施密特博士记的）证实了里宾特洛南的好战态度，他曾说德国和意大利必须对在“此时此地……即同西方民主国家发生武装冲突”有所准备。在这次会议上，里宾特洛甫也向齐亚诺保证慕尼黑已经表明了美国国内孤立主义的力量，“因此对美国是没有什么可以害怕的”。

这项条约终于在 1938 年 12 月 6 日由德法两国外长在巴黎签 了字。当时,法国已从慕尼黑会议刚过以后那种失败主义的惊恐[437]中多少恢复过来了一点儿。条约签字那天作者刚好在巴黎，因而得以亲身感受到那种阴冷的气氛。当里宾特洛甫坐着汽车在街道上经过时，街上没有一个人欢迎他。有好几位内阁阁员和法国政治界和文化界的领袖人物，包括参众两院议长让尼纳和赫里欧在内，都拒绝出席招待这位纳粹贵宾的社交活动。

庞纳和里宾特洛甫的这次会面产生了对今后的事变会起一定影响的一些误解。德国外交部长宣称庞纳曾向他保证，在慕尼黑会议以后，法国对东欧已不再感兴趣，他后来就把这一点解释为法国将听任德国在这一地区自由行动，特别是对残存的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庞纳却不承认这一点。根据施密特对这次会谈的记录，庞纳在回答里宾特洛甫要求法国承认德国在东欧的势力范围这一点时曾宣称，“ 自从慕尼黑会谈以来，局势已有了根本的改变 ”。[①]这种模棱两可的说法很快就被狡猾的德国外交部长引伸为一种明确的表示。他是这样报告希特勒的：“ 在巴黎的时候，庞纳宣称他不再对有关东欧的问题感到兴趣。 ”法国在慕尼黑那样快就屈服早就使元首相信了这一点。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斯洛伐克“ 赢得了独立 ”

希特勒在慕尼黑庄严地答应，德国要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残存部分给予担保，而今如何呢？当新任法国驻柏林大使罗伯特 · 考仑德雷 1938 年 12 月 21 日向威兹萨克问起这一点的时候，那位德国外交部的国务秘书回答说，捷克斯洛伐克的命运是在德国掌握之中，他拒绝英法担保的建议。在此以前，当新任捷克外交部长弗朗吉席克 · 契瓦尔科夫斯基在 10 月 14 日卑躬屈膝地到慕尼黑来乞讨希特勒手中的那一点残羹剩饭，并且问德国是否准备同英国和法国一起保证他的国家的大大缩短了的边境时，元首鄙夷不屑地回答说 :“ 英国人和法国人的担保不值一文钱……只有德国的担保才有用。 ”[①]

可是，到 1939 年年初，仍然迟迟不见这种担保，理由十分简单。元首并不想给予这种担保。这种担保会影响他紧跟着慕尼黑会议以后就定下的计划。很快就根本不会有捷克斯洛伐克的存在了，还要什么担保呢？要实现这一点，首先得引诱斯洛伐克分裂出去。

慕尼黑会议过了没有几天，戈林就在 10 月 17 日接见了两个斯洛伐克领袖斐迪南 · 杜尔坎斯基和马赫，还有斯洛伐克境内日耳曼少数民族的领袖弗朗兹 · 卡马辛。杜尔坎斯基是新近取得自［438］治地位的斯洛伐克的副总理，他向戈林保证，斯洛伐克所真正需要的是“ 完全独立，同时与德国建立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十分紧密的联系 ”，同一天外交部的一项秘密备忘录中曾提到，戈林决定，斯洛伐克的独立必须予以支持。“ 一个没有斯洛伐克的捷克国家，更可以受我们自由摆布。斯洛伐克境内的空军基地在对东方作战时十分重要。 ”[②]这就是 10 月中旬戈林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①] 施密特著上引书，第 118 页；他关于这次会议的笔记，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 4 卷，第 471—77 页。

[①] 同上，第 69—72 页。

[②] 同上，第 82—83 页。

我们在这里必须同时注意德国计划中的两套平行的做法：一方面是使斯洛伐克脱离布拉格而独立，一方面是准备用军事占领捷克本上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办法来清算这个国家的剩余部分。如前面所述，希特勒在 1938 年 10 月 21 日曾命令德国国防军准备好进行上述清算，*12 月 17 日，凯特尔将军发布了他所谓的“对于 10 月 21 日命令的补充命令”：

绝　密

关于“清算残存的捷克国家”，元首下达了下列命令。

作战行动的准备工作，应以估计不会有值得一提的抵抗为前提。

在外界看来，此项行动必须清楚地显得仅仅是一项和平的行动，而不是一种作战的行为。

因此，此项行动必须仅仅由平时的武装部队执行，不必用动员办法增援……[①]

尽管捷克斯洛伐克亲德的新政府尽力讨好希特勒，它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也已逐渐认识到这个国家的命运已经定局了。为了进一步讨好希特勒，捷克内阁在 1938 年圣诞节以前就解散了共产党，并且解除了日耳曼人学校里所有犹大教员的工作。1939 年 1 月 12 日，外交部长契瓦尔科夫斯基在给德国外交部的一份电报中强调说，他的政府“将在各方面满足德国人的愿望，以此来努力证明它的诚心善意”。同一天，他还促请驻在布拉格的德国代办注意“捷克斯洛伐克即将并入德国”之说甚嚣尘上。[②]

为了想探明这点残山剩水还能不能挽救，契瓦尔科夫斯基最后说服希特勒答应于 1 月 21 日在柏林接见他。这是一幕极惨的景象，虽然对捷克人说来，接踵而来的下一幕还要更惨，捷克外交 [439] 部长在这个不可一世的德国独裁者面前摇尾乞怜，希特勒当时盛气凌人的样子达到了极点。希特勒说，捷克斯洛伐克是由于“德国的克制”才免于惨遭浩劫。虽然如此，捷克人若不改弦易辙，他还是要“消灭”他们。他们必须忘却自己的“历史”，那不过是“给小学生听的废话”。他们必须唯德国人的命令是听，这是他们唯一的自全之道。具体地说，捷克斯洛伐克必须退出国际联盟，大大缩减它的军队——“因为反正它一点作用也没有”——参加反共公约，在外交政策方面接受德国的指导，同德国订立优惠的贸易协定，其中有一个条件是，未经德国同意，捷克不得建立任何新工业，*解雇一切对德国不友好的政府官员和报刊编辑，最后还有，像德国人已经根据其纽伦堡法律所做的那样，宣布犹太人不受法律保护。（希特勒对他的客人说：“在我们看来，犹太人是要加以消灭的。”）同一天，契瓦尔科夫斯基又从里宾特洛甫那里听到了新的要求。后者威胁说，捷克人若不立即悔过自新，并且照办德国人要他们做的一切行事，将有“不堪设想的后果”。这位德国外交部长在希特勒面前虽然是一个驯良的奴才，在他能占上风的人面前却是一个霸道的好汉，他叮嘱契瓦尔科夫斯基不能对英国人和法国人提起德国的新要求，而只坚决照办就是。[②]

[①] 同上，第 185—86 页；另见《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 6 卷，第 950—51 页（纽伦堡文件 C—138）。

[②] 代办的电报，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 4 卷，第 188—89 页。

[②] 契瓦尔科夫斯基 1939 年 1 月 21 日同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的两次会谈的报告，同上，第 190—202 页。契瓦尔科夫斯基本人 1 月 23 日向捷克内阁的报告，存捷克档案，惠勒—贝纳特在《慕尼黑》中曾加引用，见该书第 316—17 页。另见《法国黄皮书》，第 55—56 页。

捷克斯洛伐克这么做的时候，且不用担心德国究竟会不会对捷克边界作出担保！在巴黎和伦敦，显然没有什么人有这种担心。慕尼黑协定签订以后已经过去 4 个月了，希特勒仍然还没有履行他的诺言——在英法的担保之外，加上德国的担保。一直到 2 月 8 日，英国和法国才终于向柏林联合提出了一项口头照会，说两国政府“现在如能获悉德国政府将以何种最佳的方式来实施在慕尼黑达成的关于给予捷克斯洛伐克担保的谅解，将不胜欣慰”。[③]

据缴获的德国外交部文件证实，德国的答复是希特勒亲自起草的，而且直到 2 月 28 日才作出。它说由德国方面作出担保的时机尚未到来。德国将‘首先等待捷克斯洛伐克内部局势的澄清”。[①]

元首早就在左右那里的“内部局势”，使之按显而易见的结局发展了。2 月 12 日他在柏林总理府接见了伏伊特赫·都卡博士，后者是斯洛伐克的领袖之一，由于长期被囚禁而对捷克人深怀怨愤。”据关于这次会见的德国秘密文件的记载，都卡博士称希特［440］勒为“我的元首”，他要求这位德国独裁者使斯洛伐克独立自主。

“我把我国人民的命运交在你的手中，我的元首，”他说，“我国人民期待从你这里获得完全的解放。”

希特勒的答复多少有点闪烁其词。他说，很不幸，他不了解斯洛伐克问题。要是他知道斯洛伐克人想要独立的话，他在慕尼黑早就会这么安排了。“斯洛伐克一旦能够独立，将使他至感快慰……他可以在任何时候担保斯洛伐克独立，甚至今天都可以……”对都卡教授来说，听到这些话同样至感快慰。[②]他后来说：“这是我一生中最伟大的一天。”

捷克斯洛伐克悲剧的下一场现在可以开幕了。在这里又出现了一次在本书中屡见不鲜的历史恶作剧，逼着这场戏没有完全准备好就提前开幕的竟是布拉格的捷克人。1938 年 3 月初，他们陷入了进退两难、走投无路的局面。我们上面已经知道，由德国政府所鼓动起来的斯洛伐克和卢西尼亚的分裂运动（在卢西尼亚，还要加上匈牙利的鼓动，后者如饥如渴地要并吞那块弹丸之地）已闹到这样的地步，如果不把它们镇压下去，捷克斯洛伐克就会瓦解。在这种情况下，希特勒肯定会占领布拉格。然而，如果分裂主义者被中央政府压下去，同样可以肯走的是，元首也会利用由此引起的纷乱，照样进军布拉格。

捷克政府在反复犹豫之后，最后只是在对分裂主义者的挑衅已忍无可忍的情况下，选择了第二条路。3 月 6 日，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哈查博士解散了卢西尼亚的自治政府。3 月 9 日夜间，又解散了斯洛伐克的自治政府。第二天，他下令逮捕了斯洛伐克总理提索神甫、都卡博士和杜尔坎斯基并且宣布在斯洛伐克实行戒严。这个对柏林百依百从的政府一共就采取了这么一个勇敢行动，然而这个行动却很快就变成了使它遭到毁灭的一场惨祸。

摇摇欲坠的布拉格政府居然采取如此果断的行动，这完全出乎柏林的意料。戈林这时已经到阳光明媚的圣雷莫休假去了。希特勒正准备动身去维也纳庆祝德奥合并一周年。但是这位善于当机立断的大师现在立刻紧张地工作起来，3 月 11 日，他决定发出最后通碟，要占领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这个

[③] 全文，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 4 卷，第 207—8页。

[①] 全文，同上，第 218—20 页。

[②] 会议的报告，同上，第 209—13 页。

文件是由凯待尔将军奉希特勒之命在当天起草并且在当天送达德国外交部的。它要求捷克人接受军事占领时不得抵抗。[①]不过，它暂时还是“最高军事机密”。

现在是希特勒“解放”斯洛伐克的时候了。哈查总统任命斯洛伐克自治政府驻布拉格代表卡洛尔·西多尔代替提索出任斯洛伐克的新总理。西多尔于 3 月 11 日（星期六）回到斯洛伐克的首［441］府布腊提斯拉伐，当天就马上召集了新内阁会议。到晚上 10 点钟的时候，会议突然被一群奇怪的不速之客打断了，奥地利的吉斯林、纳粹省长赛斯一英夸特和奥地利的纳粹党组织领袖约瑟夫·贝克尔率领五名德国将军闯进了会议厅，要阁员们立即宣布斯洛伐克独立。如果他们不这样宣布的话，那末现在已经决定马上彻底解决斯洛伐克问题的希特勒就将再也不管斯洛伐克的命运了。[①]

西多尔是反对同捷克人割断一切联系的，因此迟迟不决。但是第二天，提索神甫就从他据说是受软禁的一个修道院里逃了出来。他本人虽然已不再是阁员，却要求立即召开内阁会议。为了防止受到德国高级官员与将军们的干扰，西多尔把阁员们召集到自己的寓所来开会，后来看到这样也不安全——因为德国冲锋队已开入市区接防——他又把会议挪到当地一家报纸的办公室里继续开下去。这时提索通知他，他刚刚收到贝克尔的一份电报，请他立刻到柏林去见元首，贝克尔威胁他，要是他拒绝这项邀请的话，在布腊提斯拉伐附近多瑙河对岸的两师德国军队就将开进来，而斯洛伐克也将由德国和匈牙利瓜分。第二天早晨（3 月 13 日，星期一），这位矮小圆胖的神甫”就到了维也纳，他本来想在那里搭火车去柏林，不料一到那里就被德国人装上飞机送到了柏林。对元首说来，是一点时间都不许浪费的。

当提索和杜尔坎斯基在 3 月 13 日晚上 7 点 40 分到达柏林总理府的时候，他们发现希特勒旁边不但坐着里宾特洛甫，而且还坐着两名最高级将领：德国陆军总司令勃劳希契和最高统帅部长官凯特尔。虽然这两位斯洛伐克人也许不熟悉，但是他们两人还是发觉元首这时正处于一种典型的精神状态中。这里，我们又一次多亏缴获了会议的内部记录，才得以透过这位德国独裁者不可思议的心灵，看到他日益严重的自大狂，看到他如何编造荒唐的谎言，发出可怕的威胁，而在当时他一定是自以为这种谎言和威胁只有在场的人你知我知，决不会为外人所知的。[①]

“捷克斯洛伐克，”他说，“完全靠德国的恩惠才得以免于进一步被肢解。”德国已经表现了“最大程度的自制”。然而捷克人却还不知道感恩戴德。“最近几个星期以来，”他毫不费力地就酝酿出一腔怒气，接着说下去，“情况变得无法容忍了。过去的贝奈斯精神又在借尸还魂了。”

斯洛伐克人也使他失望了。慕尼黑协定签订以后，他曾经因[442]为不让他的匈牙利朋友并吞斯洛伐克而同他们“发生了争吵”。他本来以为斯洛伐克是想要独立的。

> 他现在把提索召来，是要他在极短的时间内*澄清这个问题……问题是：斯洛伐克究竟是否想要独立过日子？……这不是可以用几天来考虑答复的问题，而是在几个小时内就要答复的问题。要是斯洛伐克想独立的话，他会给予支持，甚至给予担保……如果它犹豫

[①] 全文，同上，第 234—35 页。

[①] 根据英国驻布拉格公使后来的报告，见《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 7 卷，第 88—90 页（纽伦堡文件 D—571）。

[①] 提索一希特勒会谈秘密记录，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 4 卷，第 243—45 页。

不决或者不愿同布拉格脱离关系，他就听任今后发生的事情去决定斯洛伐克的命运，而他对这些事情再也不能负什么责任了。

就在这个当儿，据德国记录透露，里宾特洛甫“交给元首一份刚刚收到的报告，报告中说匈牙利军队已在斯洛伐克边境调动。元首看了这份报告，把内容告诉了提索，并且表示希望斯洛伐克马上就作出决定”。

提索当时并没有表明自己的决定，他请元首“原谅他，在听了德国总理这番话以后，他还不能立刻作出确定的决定”。不过，他马上又说，斯洛伐克人“将证明自己不会辜负元首的恩惠”。

在那天在德国外交部一直进行到深夜的会议上，斯洛伐克人终于证明了自己没有辜负元首的恩惠。并吞奥地利前夕曾在维也纳充当希特勒的秘密代理人的凯普勒，现在又在布腊提斯拉伐充当同样角色，他后来在纽伦堡作证时说，德国人帮助提索起草了一份好让这位“总理”一回到布腊提斯拉伐就发出的电报，其中将宣告斯洛伐克独立并且迫切要求元首负责保护这个新国家。[①]它使人想起刚好一年以前由戈林口授的赛斯—英夸特那份吁请希特勒派遣德国军队到奥地利的电报。这一次，纳粹党人制造“电报”的技术已臻完善无缺。这份电报大为简短，由提索在 3 月 16 日及时发到了柏林，希特勒马上答复说，他将乐于“负责保护斯洛伐克国家”。

那天晚上，里宾特洛甫也在德国外交部起草了一份斯洛伐克“独立”宣言，并且把它赶译成斯洛伐克文让提索带回到布腊提斯拉伐。第二天（3 月 14 日，星期二）这位“总理”就向议会宣读了这份宣言（据一位德国特务报告说，宣读时曾略有更动）。有几个斯洛伐克议员提出至少还该对它进行一下讨论，但是就连这种提议也被日耳曼少数民族的领袖卡马辛压了下去，他警告说，要是对宣布独立再有任何耽误的话，德国军队就要来占领了。在这样的威胁面前，狐疑满腹的议员门只好屈服。

“独立的”斯洛伐克就这样在 1939 年 3 月 14 日诞生了。虽然英国的外交代表很快就向伦敦报告了它诞生的经过，我们马上就会看到，在希持勒当天晚上（3 月 14 日）完成了他在慕尼黑会议[443] 上来完成的事业以后，张伯伦很快就抓庄了斯洛伐克的“独立”作为英国所以没有履行它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担保的借口。

马萨里克和贝奈斯缔造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至此已经寿终正寝。布拉格被逼得走投无路的领导人又一次帮了希特勒的忙，完成了自己国家的最后一幕悲剧。龙钟老迈、不知所措的哈查总统请求希特勒予以接见。*希特勒慷慨地答应了。这正好给了他一个机会，使他有一个舞台来演出他一生事业中最厚颜无耻的一场戏。

这位德国独裁者在 3 月 14 日等候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光临的时候,舞台上的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了。在他的巧妙的摆布之下，斯洛伐克和卢西尼亚都已宣布独立，因而布拉格政府手里现在只剩下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这两块捷克人的土地了。捷克斯洛伐克，这个英国和法国曾担保其边界完整的国家，实际上不是已经不再存在了？同希特勒在慕尼黑一起作出庄严的担保的张伯伦和达拉第早已“下戏退场”了。他们会这样做，他是没有怀疑的——而且是料得很准的。这就消除了任何引起外国干涉的危险。但是为了要做得加倍保险——为了保证他的下一步行动按照国际法的含混的标准来说，能做得至

[①] 同上，第 250 页。

少在纸面上看起来完全合法完全正当，他就要强迫那个登门求见的软弱昏聩的哈查接受他本来打算用武力达到的解决办法。用这种做法，他就可以使人感到那确实是捷克斯洛伐克总统正式请求他这样做的——就像并吞奥地利和慕尼黑会议所已经证明了的一样，在欧洲只有他一个人完全掌握了这种兵不血刃就夺人之国的新式手段。他在取得德国政权时做得天衣无缝的“合法”外表，在征服非德国的领土时也将做得无懈可击。

希特勒还演了一场活剧来欺骗德国人民和其他容易受骗的欧洲人民。好几天以来，德国的挑衅分子都一直设法在布拉格、布鲁恩和伊格劳这样一些捷克城市里寻衅滋事。然而，他们并没有取得多大的成就，因为据德国驻布拉格使馆报告，捷克“警察奉命即使受到挑衅，也不得对日耳曼人采取任何行动”。[①]不过，虽然滋事不成，戈培尔博士也还是煽动德国报纸捏造捷克人迫害可怜的日耳曼人的消息，并且据此进行疯狂的宣传。据法国大使考仑德雷报告巴黎说,这些消息就是戈培尔博士在苏台德危机时期所[444]编造出来的消息，连标题也是那样——其中包括捷克野兽击倒怀孕的日耳曼女人以及捷克蛮人使赤手空拳的日耳曼人普遍受到“Blutbad”（“血浴”）这类的消息。这样，希特勒就可以向自尊的德国人民保证，他们的同胞决不会长此以往，无人保护。

“这就是当时的形势，这就是希特勒的计划。我们现在从德国档案中得知，就在这样的局面下，载着哈查总统和他的外交部长契瓦尔科夫斯基的火车在 3 月 14 日晚间 10 点 40 分开进了柏林安哈尔特车站。因为心脏衰弱，哈查总统不能乘坐飞机。

哈查博士的劫难

德国人的礼节是无可挑剔的。捷克总统受到了一个国家元首所应当享有的一切正式的礼遇。车站上排列着仪仗队，德国外交部长亲在迎接贵宾并且塞给他的女儿一束鲜花。总统一行在豪华的阿德隆饭店最好的套房里下榻。那里专门为哈查小姐备着巧克力糖，那是希特勒亲自送的礼物，他认为人人都同他那样喜欢吃甜食。当年迈的总统和他的外交部长到达总理府的时候，那里还有党卫队的仪仗队向他致敬。

他们直到夜半 1 点 15 分才见到希特勒。哈查想必已经知道有什么在等待他了。他的火车还没有离开捷克的国境，他就得到布拉格来的消息说，德国军队已经占领了重要的捷克工业城市摩拉夫斯卡——俄斯特拉伐，而且沿着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边境摆好了阵势。他在深更半夜一走进元首的书房，就看到除了里宾特洛甫和威兹萨克以外，希特勒旁边还站着戈林元帅（他是在圣雷莫休假地奉急令赶回来的）和凯特尔将军。他在走进这个龙潭虎穴的时候，大概没有注意到希特勒的私人大夫、江湖庸医西奥多·莫勒尔博士也在那里。然而，那位医生确实就在旁边，他在旁边是大有理由的。

德国方面的秘密记录表明，会谈一开头就是一副悲惨的场面。可怜的哈查博士，尽管过去当过德高望重的最高法院法官，却抛弃了一切个人尊严，在傲慢自大的德国元首前面摇尾乞怜。也许总统认为只有用这种办法才能使希特勒大发慈悲，为他的人民挽回一点东西，但是不管他的动机如何，从德

[①] 1939 年 3 月 13 日布拉格发出的电报，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 4 卷，第 246 页。

国秘密档案中的记录看来，他所说的话即使在事隔多年以后的今天看来也是令人作呕的。哈查要希特勒相信他自己从来没有搞过政治。他很少见到缔造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马萨里克和贝奈斯，即使偶而在他们身上所看到的东西，也都是他所不喜欢的。他说他们的政府对他来[445]说是“格格不入”的——“格格不入到这样的程度：甚至在[慕尼黑会议以后]政府刚刚改组，他就自己问自己，捷克斯洛伐克成为一个独立国到底是不是一件好事”。

> 他深信捷克斯洛伐克的命运是操在元首手中……而且他认为在元首的手中是保了险的……然后他谈到了他所最关心的事情就是人民的分运。他感到元首会完全理解他认为捷克斯洛伐克有权保持民族传统……捷克斯洛伐克的错处在于那里仍然还有许多人支持贝奈斯制度……政府正在用一切办法来压制他们。这大体上就是他要说的东西。

阿道夫·希特勒于是讲了要讲的话。在详细列举了马萨里克和贝奈斯的捷克斯洛伐克种种对不起德国和德国人的事情，并且再次表示捷克人在慕尼黑会议以后不幸没有丝毫改变以后，他说到节骨眼儿上来了：

> 他认为总统这次不辞年高体弱，长途跋涉，对他的国家会有极大的好处，因为现在离德国出兵干预不过只有几小时了……他对任何国家都不抱恶意……残存的捷克斯洛伐克国家所以能存在完全是由于他的一片好心……去年秋天，他并没有想得出最后的结论，因为他认为两国还可能共处，但是他毫不怀疑，如果贝奈斯的倾向不能完全消失的话，他就要把这个国家完全消灭。

这种倾向并没有消灭，他举出了“例子”。

> 因此，在上星期日，即 3 月 12 日，他作出了最后决定……他已下令德国军队进驻捷克斯洛伐克，并且下令把捷克斯洛伐克并入德国。*

据施密特博士的观察，“哈查和契瓦尔科夫斯基坐在那里，就像一块木头似的。只有他们的眼睛才表明他们还活着”。但是希特勒还没有完，他还得用条顿式的恐怖[①]的威胁来羞辱他的客人。

> 德国军队[希特勒继续说]已经在今天进军了。在某一处兵营遇到了抵抗，但已经无情地予以扑灭。
>
> 明天早晨 6 点钟，德国军队即将从四面八方进入捷克，德国空军将占领捷克飞机场。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是德军进驻时可能发生战斗。在这种情况下，一切抵抗均将以凶猛的武力予以扑灭。另外一种可能性是德军[446]进驻将以和平方式实现，在这种情况下，元首不难慷慨允许捷克斯洛伐克保持它自己的生活方式，允许给它以自治以及某种程度的民族自由。
>
> 他之所以要做这一切，都不是出于仇恨，而是为了保护德国。要是去年秋天捷克斯洛伐克没有让步的话，捷克民族早已消灭干净了。没有人会阻止他这样做。要是打仗的话……两天之内捷克军队就不会再存在了。当然，也会有一些德国人死伤，而这只会产生仇恨，而这种仇恨又会迫使他为自卫计，而拒绝给予[捷克人]自治。全世界谁也不会管这件事。他在读外国报纸的时候是同情捷克人民的。他所得到的印象可以用一句德国谚语来概括：“摩尔人已经尽到责任了，摩尔人可以走了。”……
>
> 正因为如此，他才请哈查到这里来，这是他能对捷克人民做一番好事的最后一个机会……也许哈查此行可以防止发生最坏的情况。……
>
> 时间 1 小时 1 小时地过去。到 6 点钟，德国军队就要开进去了。他几乎不好意思说，德国和捷克的兵力比例是德军一个师对捷军一个营。他现在愿意建议他[哈查]还是同契瓦

[①] 古代条顿民族实行一种裁判法，被告把手放到火、热水中或服毒药，若不受伤，便算无罪，这里所谓“条顿式的恐怖”即指类似的酷刑。——译者

尔科夫斯基下去商量一下该怎么办才好。

该怎么办才好呢？完全垮了的总统并不需要退下去作决定。他立刻就告诉希特勒，“形势十分清楚。抵抗是无谓的”。但是，问题是，现在已经过了两点了，他怎么才能在短短 4 小时的时间里设法使全体捷克人民克制自己不要抵抗呢？元首回答说，他最好同他的同伴去商量。德国的军事机器已经开动因而已经无法停止了。哈查应当立即同布拉格联系。根据德国人的会议记录，希特勒最后说：“这是一个严重的决定，然而他也在这上面看到两国人民之间可能获致长期和平的时代的曙光。要是这个决定换一个样子的话，他就会看到捷克斯洛伐克的毁灭。”

说完了这些话，他就请客人们暂时退出去。那时是早晨 2 点 15 分，在隔壁的一间房间里戈林和里宾特洛甫对那两个苦命人加紧施压力。法国大使发给巴黎的一份正式电报中描绘了这个场面。据他说，他从他认为确实可靠的方面获悉，哈查和契瓦尔科夫斯基抗议对他们的国家的凌辱。他们说，他们不能在投降的文件上签字。如果他们这样签了字，他们将永远受到他们的人民的诅咒。

> 两位德国部长[指戈林和里宾特洛甫]毫无任何怜悯之心[考仑德雷先生在他的电报中写道]。他们硬是围着桌子追逐哈查博士和契瓦尔科夫斯基先生，一次又一次把放在桌上要他们投降的文件掷到他们面前，把笔塞到他们手里，不断地重复说，要是他们继续拒绝的话，两小时之内，布拉格就有一半会被炸成废墟，这还不过是开始。成百架轰炸机正在等待起飞的命令，如[447]果不签字的话，他们在早晨 6 点钟就会得到命令。*

似乎不论什么时候，不论什么场合，只要第三帝国的戏剧达到高潮的时候总会设法在场的施密特博士，在这个当口听到戈林大声叫莫勒尔医生。

“哈查昏过去了！”戈林大叫。

这些纳粹凶徒当时很害怕那位精疲力竭的捷克总统会死在他们手里，而且据施密特说，害怕“第二天全世界都会说他是在总理府被谋害的”。莫勒尔医生的专长是打针——几年以后他差一点儿把希特勒给打针打死——这回也给哈查博士打了针，使他醒了过来。总统总算恢复了一些，能够拿得住德国人塞给他的电话听筒，在里宾特洛甫下令接通的专线上同他在布拉格的政府讲话。他把所发生的事情告诉了捷克内阁并且建议投降。然后，莫勒尔医生又给他打了一针，他的精神多少又好一些。这样，已经完蛋了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总统又踉踉跄跄地回到阿道夫·希特勒的面前，在他自己国家的死刑判决书上签了字。时间是 1939 年 3 月 15 日清晨 3 点 55 分。

据施密特的记载，文件是“希特勒在事先”准备好的，而当哈查晕倒的时候，这个德国翻译又在忙着誊写官方公报。公报也是在“事先”写好的，也是要强迫哈查和契瓦尔科夫斯基签字的。公报的全文如下：

柏林，1939 年 3 月 15 日

> 元首应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哈查博士和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长契瓦尔科夫斯基博士的要求，今天在柏林接见他们。接见时，外交部长冯·里宾特洛甫也在座。在会谈中，双方以完全坦率的精神研究了最近几个星期以来在目前的捷克斯洛伐克领土上发生的事件所造成的严重局势。
>
> 双方一致认为，必须尽一切努力来保全中欧这一部分的安宁、秩序与和平。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宣告，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并且为实现最后的和平起见，他满怀信心地把捷克人民和捷克国家的命运交到德国元首的手中。元首接受了这一宣告，并且表示他愿意把捷克人民置于德国保护之下，并且保证 (448]他们的民族生活能够在自治的条件下按照合乎

他们的特点的方式得到发展。

至此，希特勒诡辩欺诈的伎俩也许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了。

据他的一个女秘书说，希特勒在签完了字以后，冲进他的办公室，拥抱了每一个在场的女人，高声叫道：“孩子们！这是我平生最伟大的一天！我将以最伟大的德国人而名垂青史！”

他没有想到，捷克斯洛伐克的末日可能就是德国的末日的开始。他怎么能想到呢？我们现在都已看到，从 1939 年 3 月 15 日的黎明开始，引向战争，引向失败，引向灾难的大路已经平铺在面前了。这是一条又短又直的路。希特勒一旦走上了这条路，顺势而下，就像他以前的亚历山大和拿破仑一样，就是要停也停不住了。[①]

3 月 15 日，清晨 6 点钟，德国军队大举进入了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他们一点抵抗都没有遇到。因此到黄昏的时候，希特勒就可以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布拉格。在他看来，由于张伯伦在慕尼黑的捣鬼，使他当时没有能够实现这个愿望。在离开柏林以前，他对德国人民发表了一篇堂皇的宣言，重复那些无聊的谎言，说什么捷克人的“野蛮行为”和“恐怖行为”逼得他不得不出面制止。然后，他狂妄地宣告“捷克斯洛伐克再也不存在了”！

那天晚上，他睡在俯视着伏尔塔瓦河的赫拉德欣堡里。这是古代波希米亚国王宝座所在的地方，也是不久以前才被抛弃的马萨里克和贝奈斯住在那里为中欧历史上第一个民主国家工作的地方。元首的报仇是彻底的，而且从他所发布的一系列告示中表示出他感到报仇的甜蜜滋味。30 年前，他作为一个奥地利人在维也纳流浪的日子里对捷克人所怀的宿怨，以及去年因为贝奈斯胆敢反抗他这位不可一世的德国独裁者而重又燃起的新仇，这一下完全报清了。

第二天，他就在赫拉德欣堡宣布成立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这个国家，虽然声明说要让捷克人“自主和自治”，但是它的措辞本身就已经说明要使捷克人完全匍匐在德国人脚下。一切权力都交给“德国保护长官”，交给他的国务秘书和他的民政首脑，他们全由元首任命。为了缓和英国和法国舆论的激烈反对，希特勒起用了早已打入冷宫的“温和分子”牛赖特，任命他为保护长官。*苏台德的两位最高领袖康拉德·汉莱因和打手头子卡尔·[449]赫尔曼·弗朗克分别被任命为民政首脑和国务秘书，好让他门有机会对捷克人肆意报仇雪恨。不久以后，德国警察头子希姆莱就在保护国确立了坚强的控制。他让臭名远扬的弗朗克为他工作，做了保护国的警察头子兼党卫队队长。[②]

[①] 以上这节“哈查博士的劫难”的材料来源是：希特勒和哈查会谈的秘密记录，《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 4 卷，第 263—69 页，另见《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 5 卷，第 433—40 页（纽伦堡文件 2798—PS）。德捷两国政府 1939 年 3 月 15 日宣言全文，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 4 卷，第 270—71 页。第一部分作为公报发表，实际上是 3 月 14 日在外交部起草的。元首 3 月 15 日对全国人民的文告，见《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 8 卷，第 402—3页（纽伦堡文件 TC—50）。考仑德雷的电报，见《法国黄皮书》，第 96 页（第 77 号）。施密特关于会议的描述，上引书，第 123—26 页。汉德逊著上引书，第 9 章。同女秘书们场面，见佐勒编：《希特勒私生活》，第 84 页。

[②] 把这里所说的这一出戏里几个角色的下场先在这里提一下是很有意思的。弗朗克在战后被捷克法院判处死刑，而且于 1946 年 5 月 22 日在布拉格公开绞死。汉莱因 1945 年在被捷克抵抗军逮捕以后自杀了。契瓦尔科夫斯基成了保护国驻柏林的代表，在 1944 年被盟国飞机炸死。哈查于 1945 年 5 月 14 日被捷克人逮捕，

[希特勒在他那宣布保护国成立的公告里说]1000 年以来，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一直是德国人民生存空间的一部分……捷克斯洛伐克已表明是先天就不能存在的，因此现在已不能不归于解体。德国不能容忍这些地区继续动乱不已……因此，德国按照自卫的法则现在决定断然加以干涉，在中欧重建一种合理秩序的基础。因为 1000 年来它的历史已经证明，由于德国人民的伟大与品格，只有他们才能承担这一任务。

德国野蛮统治的漫漫长夜现在已降临到布拉格和捷克的土地上了。

3 月 16 日，希特勒答复了号称是提索总理发来而实际上我们已经知道是在柏林起草的电报，把斯洛伐克也置于他的仁慈的保护之下，德国军队很快就开进了斯洛伐克以实行“保护”。3 月 18 日，希特勒到维也纳去批准“保护条约”。这个条约由里宾特洛甫和都卡博士于 3 月 23 日在柏林签字，它附有一项秘密议定书，把开发斯洛伐克经济的权利完全交给了德国人。[①]

至于位在捷克斯洛代克东端的卢西尼亚，它在 3 月 14 日宣布成立“喀尔巴阡—乌克兰共和国”，但是它的独立只存在了 24 小时。它要求希特勒予以“保护”的呼吁没有起作用。希特勒早已把这块土地赏给匈牙利了。在缴获的德国外交部档案中有一封很有趣的信是匈牙利摄政米克洛斯·霍尔蒂在 3 月 13 日亲笔写给阿道夫·希特勒的。

阁下，谨致衷心的感谢！我无法表达我有多么快乐，因为这块水源地区[卢西尼亚]对匈牙利说来——我不喜欢用夸大的字眼——是一个根本问题……我们以极大的热忱来处理这件事情。计划已经制定了。星期四即 3 月 16 日将发生边境事件，星期六将继之以大举进攻。[②]

事情发展的结果是，并不需要什么“事件”。匈牙利军队只要[450]在 3 月 15 日早晨 6 点钟开进卢西尼亚就行了。进军的时间是同德国人在西方行动的时间配合好了的。第二天这块土地就正式并入了匈牙利。

这样，哈查抵达柏林总理府是在 3 月 15 日清晨 1 时 15 分，而到这一天结束时，捷克斯洛伐克就像希特勒所说的已不再存在了。

不论是英国还是法国，都没有动一动来挽救它，虽然在慕尼黑会议的时候它们都曾庄严地担保捷克斯洛伐克不受侵略。

在那次兰会议以后，不但希特勒而且连墨索里尼都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英国太软弱了，正因为如此，英国的首相才变得那样事事通融，他们今后对伦敦已不必再放在心上了。1939 年 1 月 11 日，张伯伦在哈利法克斯勋爵陪同下到了罗马，希望改进英意关系。当这两个英国人到罗马车站的时候，作者也刚好在那里。我在当天的日记里记着墨索里尼在欢迎客人的时候，“做作出一副笑脸”。在这一批人离开车站，“墨索里尼在我面前经过的时候，他同他的女婿[齐亚诺]开着玩笑，说着俏皮话”。[①]当然，我听不出他们到底在谈什么，但是，齐亚诺后来在他的日记里透露了他们所谈的要点。

张伯伦到达。[齐亚诺在 1 月 11 日和 12 日的日记中写道]……我们同这些人的距离有多远！那是另一个世界，我们在饭后同领袖一直在谈这个题目。他说：“这些人同创造了大英帝国的弗朗西斯·德莱克那样一些伟大冒险家不是一样材料做成的人。说到底，这些人不过是一个有钱人的没出息的末代子孙而已，他们会把他们的帝国败掉的。”

但是在审讯以前就死了。

[①] 全文，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 6 卷，第 42—45 页。

[②] 全文，同上，第 4 卷，第 241 页。

[①] 《柏林日记》，第 156 页。

> 英国人没有斗志。他们想尽可能退得慢一点，然而他们并不斗争……我们同英国人的会谈结束了，但是什么结果都没有。我给里宾特洛甫打了电话，告诉他这次访问是“一个大空炮”[一场笑剧]……
>
> 我随领袖到车站去给张伯伦送行[齐亚诺在 1 月 14 日写道]……当火车开动的时候，张伯伦眼睛里充满了眼泪，他的同胞们就唱“因为他是一个刮刮叫的好人”。领袖问道：“他们唱的什么歌？”[②]

虽然在苏台德危机的时候希特勒还顾到张伯伦的意见，但是从缴获的德国文件中却找不出一个字可以证明，从那时以后，在他不顾英国的担保从而也就是不顾慕尼黑协定而消灭残存的捷克斯洛伐克时英国首相会怎么想，他有什么顾忌。3 月 14 日，当希特勒在柏林等着要羞辱哈查的时候，当伦敦下院就德国策划斯洛伐克的“分裂”以及此事对英国保证布拉格不受侵略的担保的影响提出愤怒的质问的时候，张伯伦气冲冲地回答：“根本没有发生[451]这样的侵略。”

但是到第二天（3 月 15 日）在这样的侵略已经发生以后，首相就又利用斯洛伐克宣告“独立”来作为不履行诺言的借口了。他解释说：“这一宣告已使我国承诺担保其国界的国家，因为内部分裂而归于结束。英王政府因此认为自己已不再受到这项义务的任何约束。”

希特勒的战略因此取得了尽善尽美的结果，他给了张伯伦一个下台阶的机会，而张伯伦也果然接受了。

有趣的是，首相甚至不愿指责希特勒食言悔约。他说，“我经常听到有人在传播关于背信弃义的指责，这些话在我看来似乎并没有充分的根据，因此我今天并不愿意支持任何这类性质的指责”。他对元首连一个字的非难都没有，甚至对他对待哈查的做法，对 3 月 15 日这一天清早显然在德国总理府设下的那一套卑鄙的骗局——即使当时还不能知道细节——也一个字的非难都没有。

因此，就无怪乎那一天英国人提出的抗议——如果可以称做抗议的话*——会那样不痛不痒，也无怪乎德国人对它以及英法两国以后的意见采取那样自大、那样藐视的态度了。

> 英王政府无意不必要地干涉其他政府可能对之有更直接的关系的事情……不过，它深为关切一切在欧洲恢复信任与缓和紧张的努力能获得成功，这一点德国政府想必也能理解。它对任何能在中欧挫伤这种普遍信任的行动都感到遗憾……[①]

这份照会是作为哈利法克斯勋爵的一份正式函件由汉德逊大使在 3 月 15 日交给里宾特洛甫的，其中一个字都没有具体提到这一天发生的事情。

法国人倒至少还具体一点。新上任的法国驻柏林大使罗伯特·考仑德雷，既没有汉德逊那种对捷克人的轻蔑，也没有他的英国同事那种对纳粹主义的幻想。3 月 15 日上午，他要求见里宾特洛甫，但是这位爱好虚荣而且报复心重的德国外交部长已经动身到布拉格去了，他想同希特勒一起去羞辱一个打垮了的民族。那天中午，国务秘书冯·威兹萨克接见了考仑德雷。大使一上来就说出了张伯伦和汉德逊还没有准备说的话：由于对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进行军事干涉，德国已经违反了慕尼黑协定和 12 月 6 日[452]的法德宣言。后来自称一直坚决反纳粹的冯·威兹萨克男爵，当时态度极为傲慢，足以使

[②] 《齐亚诺日记（1939—1943 年）》，第 9—12 页。

[①] 全文，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 4 卷，第 274—75 页。

里宾特洛甫相形见绌。据他自己在关于这次会见的报告中说：

> 我对大使说得很不客气，并且告诉他不要再提他硬说已被违反的慕尼黑协定，不要再给我们作教训……我告诉他，从昨天晚上同捷克政府达成的协议看来，我看不出法国大使有什么理由要采取任何行动……我可以肯定，在他回到大使馆的时候，就会看到新的指示，可以让他安心。[②]

3 天以后，到 3 月 18 日，英国和法国政府才在国内愤怒的舆论的压力下最后向德国提出了正式抗议。这一次威兹萨克在傲慢狂妄方面又胜过了他的上司里宾特洛甫，而且又是他自己提供了证据。在从德国外交部档案中发现的一份报告中，他以显然洋洋自得的口吻谈到他如何拒绝接受法国的正式抗议照会。

> 我立刻把照会装回到信封中，扔还给大使，并且说，我断然拒绝从他手里接受有关捷克—斯洛伐克问题的一切抗议。我也不愿表示已注意到了这项照会，我愿建议考仑德雷先生请他的政府修改这一照会……[①]

考仑德雷并不像这时汉德逊那样是一个被德国人一吓就倒的大使。他回敬说，他的政府的照会是经过适当的考虑以后才写的，他无意请求加以修改。当国务秘书仍然拒绝接受这一文件时，大使请他注意通常的外交惯例，并且说，法国完全有权让德国政府知道它的观点。威兹萨克最后（据他自己的说法）就让那份照会放在桌子上，并解释说，他将“认为它是通过邮政局寄给我们的”。但是在他厚着脸皮作出这番表示以前，还曾说出了这样一番话：

> 从法律的观点来说，事实上有一项由元首和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共同发表的宣言。捷克总统自己请求来到了柏林，然后马上宣布他愿意把他的国家的命运置于元首的手中。我不能设想法国政府能比教皇还要管得宽，甚至想干涉柏林和布拉格已经合适地解决了的问题。*

[453]英国大使在 3 月 18 日傍晚递交了英国政府的抗议书。威兹萨克对这位好好先生的态度大不相同。英国现在说，它“不能不认为过去几天内发生的事情是对慕尼黑协定的彻底否定”，并且认为“德国的军事行动”“缺乏任何法律根据”。威兹萨克在写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指出英国照会在这方面并不如法国的抗议那样严重，因为法国照会曾说，法国“不承认德国占领的合法性”。

汉德逊在 3 月 17 日就曾见过威兹萨克，告诉他自己奉召返国，“以备咨询”。而据这位国务秘书说，汉德逊还向威兹萨克试探一些“他可以提供张伯伦能用以对付其政敌的论点……汉德逊解释说，英国对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土并没有切身利益。他——汉德逊——所关心的更多的是将来”。[①]

甚至希特勒摧毁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动都没有使这位英国大使惊醒，使他认清他所奉使的政府的本质，他也似乎丝毫没有觉察到他所代表的政府这一天发生了什么。

因为，非常出人意料地，尼维尔·张伯伦在 3 月 17 日，也就是希待勒消灭捷克斯洛伐克以后两天，突然感到大梦初醒。这是受到相当大的外界刺激的结果。对希特勒最近这一次侵略，绝大部分英国报纸（甚至包括《泰晤士报》在内，不过没有《每日邮报》）和下院反应都极为强烈，这使张伯伦大

[②] 同上，第 273—74 页。

[①] 同上，第 6 卷，第 20—21 页。

[①] 同上，第 16—17，20 页。

吃一惊。更严重的是，议会里许多支持他的人和内阁里他的半数阁员都起来反对对希特勒作任何进一步的姑息。据德国驻英大使给柏林的报告，哈利法克斯勋爵尤其极力主张首相要认清新的形势并且当机立断，改弦更张。[②]张伯伦开始感到他自己作为政府首脑和保守党领袖的地位已岌岌可危了。

他改变主意来得非常突然。直到 3 月 16 日晚间，约翰・西蒙爵士代表政府在下院发言时，他对于捷克人的态度还是极其冷酷无情的，整个发言充满了“慕尼黑精神”，因此，据报纸报道，在议会里引起了“罕见的愤慨”。第二天，张伯沦在 70 寿辰的前夕，原来预定要在他的家乡伯明翰发表一篇演说。他已经起草好了一篇专谈国内问题而且特别着重谈社会福利的演说。到下午火车开往伯明翰的时候，据法国外交界人士告诉本书作者，张伯伦最后下了决心。他扔掉了准备好的讲稿，很快写下了一份完全不同的演说提纲。

张伯伦对全英国而且也对世界大部分地区（这篇演说是广播的）道歉，因为两天以前他感到不得不向下院作了一篇“极其克制、极其谨慎……而且有点失之于冷淡和客观的声明”。他说“我希望在今天晚上纠正那个声明”。

首相终于看到阿道夫・希特勒欺骗了他。他重新举出了希特[454]勒的历次保证：希特勒曾经说过，苏台德区是他在欧洲最后的领土要求，他“不想要一个捷克人”，而现在他却食言背信了——“他是一个无法无天的人”。

> 现在他们告诉我们并吞这块土地是捷克斯洛伐克国内纷扰的局面逼出来的……如果那里有动乱的活，难道不是从外部煽动起来的吗？这到底是一场老的侵略的结束呢，还是一场新的侵略的开始呢？这到底是最后一次对一个小国的进攻呢，还是会有别的进攻继之而来呢？是不是这在事实上只是想以武力征服世界的计划中的一个步骤呢？我虽然并不准备作出什么新的泛泛的保证，说我国在现在不能预见的条件下将如何行动，但是，如果以为我国由于认为战争是一件无谓而残酷的事情因而已失尽血性，以至在受到挑战的时候也不会尽其全力来同其他国家一起予以抵抗，那就是大错而特错了。

对张伯伦和英国来说，这是一个突然的而且决定性的转折。第二天，希特勒就接到机警的德国驻伦敦大使的警告。赫伯特・冯・ 狄克森 3 月 18 日发出了一份长篇报告，告诉德国外交部，“继续幻想英国对德国的态度无根本改变就错了”。[①]

对于任何一个读过《我的奋斗》，看过一眼地图并且看到德国军队在斯洛伐克的新部署，对慕尼黑会议以后的德国外交行动的风向有些了解的人来说,或者对任何一个曾经研究过过去 12 个月中希特勒对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兵不血刃的征服的行动规律的人来说，哪一个小国是希特勒的“时间表”上的下一个目标，是十分明显的。张伯伦，像几乎任何别人一样，也是完全了然的。

3 月 31 日，在希特勒进入布拉格之后 16 天，首相告诉下院说：

> 如果一旦发生显然威胁到波兰的独立而且波兰政府认为必须尽全力予以抵抗的行动，英王政府将认为自己有责任立即给予波兰政府以全力支持。他们已给予了波兰政府大意与此相同的保证。我还可以加一句，法国政府也授权我明白表示，它在这个问题上与我们持同样的立场。

现在已轮到波兰了。

[②] 狄克森 1939 年 3 月 18 日的报告，同上，第 24—25，36—39 页。

[①] 同上，第 39 页。

第十四章　轮到了波兰

[455]

1938 年 10 月 24 日，慕尼黑会议之后不到一个月，里宾特洛甫在伯希特斯加登的格兰德饭店请波兰驻柏林大使约瑟夫·利普斯基吃饭。波兰，同德国一样，而且事实上同德国沆瀣一气，夺得了一块捷克的土地。这顿饭吃了 3 个钟头。据德国外交部的一份材料指出，餐桌上的谈话“是在非常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①]

虽然如此，那位纳粹外交部长闲话不多就言归正传。他说波兰和德国之间达成全面解决的时机已经来了。他接着说，第一件事情就必须“同波兰谈一谈但泽的问题”。那块地方应当“归还”德国。德国还想造一条超级公路和一条双轨铁路经过波兰走廊把德国同但泽和东普鲁士连接起来。两者都要享有治外法权。最后，希特勒还希望波兰参加反共公约对付俄国。为了报答这些让步，德国情愿把波德条约从 10 年延长到 20 年并且担保波兰的边界完整。

里宾特洛甫强调说，他是把这些问题作为“极端秘密的事情”提出来的。他建议波兰大使“口头”向贝克外交部长报告——“因为要不然的话，就有极大的危险可能走漏风声，特别是可能走漏给报界知道”。利普斯基答应向华沙报告，不过他告诉里宾特洛甫，他个人“看不出有什么可能”会把但泽归还德国。他还进一步提醒德国外交部长注意最近发生的两件事情——在 1937 年 11 月 5 日和 1938 年 1 月 14 日，希特勒曾两次亲自向波兰人保证他不会主张对但泽法规作任何变更[②]。里宾特洛甫回答说，他并不希望现在就得到答复，不过他建议波兰人“考虑考虑”。

华沙政府并不需要很多时间来仔细思量。一个星期以后，10 月 31 日，外交部长贝克就给波兰驻柏林大使发来了如何答复德国人的详细指示。但是直到 11 月 19 日，后者才有机会见到[456]里宾特洛甫，纳粹党人显然要波兰人好好地考虑考虑他们的答复。答复是否定的。不过作为一种表示谅解的姿态，波兰愿意签订一项关于但泽的地位的德波协定来代替国际联盟对这个自由市的担保。

“任何其他的解决办法，”贝克在他给利普斯基的备忘录中写道，“特别是任何想把这个自由市并入德国的企图，一定会不可避免地引起冲突。”他还在这份由利普斯基读给里宾特洛甫听的备忘录中说，已故的波兰独裁者毕苏斯基元帅曾在 1934 年谈判一项互不侵犯条约的时候说过：“但泽问题是判断德国对波兰的意图的最可靠的标准。”

这样的答复是不合里宾特洛甫的口味的。“他对贝克所采取的态度感到遗憾”，并且忠告波兰人“值得再费一番脑筋来认真地考虑考虑德国的建议”。[③]

[①] 德国方面关于这次会谈的报告，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 6 卷， 第 104—7 页。利普斯基致贝克的报 告，见《波兰白皮书》，第 44 号，载 《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 8 卷，第 483 页（纽伦堡文件 TC—73，第 44 号）。

[②] 希特勒于 1937 年 11 月 15 日给利普斯基的保证，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 汇编》，第 6 卷，第 26—27 页。1938 年 1 月 14 日给贝克的保证，同上，第 39 页。

[③] 贝克于 1938 年 10 月 31 日给利普斯 基的指示，见《波兰白皮书》，第 45 号，载《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 7 卷， 第 484—86 页。里宾特洛甫关于 11 月 19 日与利普斯基会谈的报告，见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

对波兰在但泽问题上的拒绝，希特勒的反应要激烈得多。11 月 24 日，在里宾特洛甫—利普斯基会晤以后 5 天，他对三军司令又发出了一个命令。

绝 密

> 元首下令：除了在 1938 年 10 月 21 日训令中所提及的三项紧急任务* 而外，还应当作好准备，使德国军队能出敌不意占领但泽自由邦。
>
> 准备工作应在下面的基础上进行：条件是，利用政治上有利的形势，对但泽实行准革命式的占领，而不是对波兰发动战争[②]……
>
> 用于这一目的的部队决不能同时担任占领默默尔的任务，以便在必要时，两项军事行动得同时进行。海军将从海上进击，以支援陆军的作战……各兵种作战计划应在 1939 年 1 月 10 日以前交上来。

虽然贝克刚刚警告过，德国如企图夺取但泽，将“不可避免地”引起冲突，但希特勒现在却深信他可以办到这一点而不致引起战争。但泽是在当地的纳粹党人控制之下，而他们是像苏台德人一样听命于柏林的。因此不难在那里造成一种“准革命式的”形势。

因此,兵不血刃就占领了奥地利和苏台德区的希特勒在 1938 年临近岁尾的时候，又已经一心在盘算进一步征服残存的捷克斯洛伐克、默默尔和但泽了。凌辱一下许士尼格和贝奈斯并没有费什么力气。现在要轮到约瑟夫·贝克了。

可是，刚过了新年不久，1939 年 1 月 5 日，元首在伯希特斯[457]加登接见波兰外交部长的时候，他还没有准备给他以他刚给过许士尼格和很快也就要给哈查的那种待遇。先得把残存的捷克斯洛伐克清算掉再说。从波兰人和德国人关于这次会晤的秘密记录看来，希特勒的态度显得比较和解。一开头，他就说，他“随时准备为贝克效劳”。然后，他又问，波兰外交部长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心事？贝克回答说，但泽是他心上的一块疙瘩。显然，这也是希特勒心上的一块疙瘩。

“但泽是德国人的”，元首对他的客人说，“它永远是德国人的，而且迟早要成为德国的一部分。”不过，他可保证，“不会在但泽制造什么既成事实”。

他要求得到但泽，要修一条经过走廊的德国公路和德国铁路。要是他和贝克能够“摆脱老方式而按照全新的方式寻求解决办法的话”，他肯定他们会达成对两国说来都是公平合理的协议。

贝克可不敢这样肯走。虽然，他第二天对里宾特洛甫老实说，他当时并不想对元首过于直率，他还是回答说“但泽问题是极其困难的一个问题”。他在总理的建议中看不出能给波兰什么“对等的东西”。希特勒因此指出，“波兰的对德边界包括走廊在内受到条约的担保”对波兰说来是“极大的好处”。这显然并不能打动贝克，不过，最后，他答应继续考虑这一问题。[④]

在盘算了一夜以后，波兰外交部长第二天同里宾特洛甫在慕尼黑作了一次谈话，他请后者转告元首，虽然以前同德国人的历次谈话都使他十分乐观，

编》，第 5 卷， 第 127—29 页。

② 原件为着重体。

④ 施密特关于这次会谈的报告，同上， 第 152—58 页。波兰的记录，见《波 兰白皮书》，第 48 号，载《纳粹的阴 谋与侵略》，第 8 卷，第 486—88 页 （纽伦堡文件 TC—73）。

而同希特勒的会面却第一次使他今天深为悲观。特别是在总理所提出的但泽问题上，他“看不出有什么可能取得协议”。[⑤]

贝克上校，像本书所写过的许多其他人一样，是经过了一段时间才有所觉醒而有这种悲观的看法的。同绝大多数波兰人一样，他是激烈反俄的。不但如此，他也不喜欢法国人。他在 1923 年在巴黎任波兰大使馆武官时，曾经被法国当局以出卖同法国陆军有关的文件的罪名驱逐出境，因此对法国人怀有宿怨。也许对他这样一个人来说，在 1932 年成为波兰外交部长以后，倾向德国是很自然的。他从一开头就对纳粹独裁政权抱有热烈的同情。过去 6 年之中，他曾尽力使他的国家接近第三帝国而削弱它同法国的传统关系。

在所有同德国接壤的国家中，从长期来说，波兰是最应该有所戒惧的。但是在所有这些国家中，它却是最没有看到德国的危险的。凡尔赛和约之中，再没有哪一条比建立波兰走廊、给波兰[458]以出海通道并且把东普鲁士同德国分开的条款更使德国人怨恨的了。把自古以来汉萨同盟的港口但泽从德国分割出去，使它成为处于国际联盟监督下然而在经济上又完全处于波兰支配下的一个自由市，这件事情也同样引起德国舆论的愤怒，就是软弱和平的魏玛共和国也把这看成是波兰毁伤了德国的肢体而不肯予以承认。我们上面已经看到，*早在 1922 年，冯·西克特将军已经这样说明了德国陆军的态度。

> 波兰的存在对德国生存的基本条件来说是不能容忍的，不能并存的。波兰必须去掉——由于它自己内在的孱弱而且由于俄国的行动的结果——也一定会在我们的协助下去掉……消灭波兰必须成为德国政策的一个根本目标……[这]是可以利用俄国并且在俄国的协助下达到的。

多么像预言啊！

德国人忘记了，也许是不愿意记起，凡尔赛和会给予波兰的土地，包括构成了波兰走廊的波森省和波属波麦腊尼亚（波莫瑞）在内几乎全部都是在普鲁士、俄罗斯和奥地利 3 国瓜分波兰时被普鲁士抢走的。有 1000 多年，那里住的都是波兰人——在很大的程度上，目前也仍然是如此。

凡尔赛和约所缔造的新国家，没有一个像波兰那样命运多舛。在刚刚复国以后那几年动荡的岁月里，它对俄国、立陶宛、德国，甚至捷克斯洛伐克都曾进行过侵略战争（同捷克斯洛伐克的那一次是为了争夺煤矿丰富的特青地区）。波兰人由于有 150 多年被剥夺了政治自由，因而缺乏现代的自治经验，他们无法建立稳定的政府，也不能开始解决经济问题和农业问题。1918 年革命的英雄毕苏斯基元帅，在 1926 年引兵进入华沙，夺取了政权并且逐步地以他自己的独裁统治（虽然他是一个老社会党人）代替了混乱的民主政体。他在 1935 年逝世以前最后所做的事情中,有一件就是同希特勒签订了一项互不侵犯条约。这项条约是在 1934 年 1 月 26 日签订的，上面已经说过，*这是最早开始破坏德国的东方邻国和法国之间的同盟体系、削弱国际联盟和它的集体安全观念的行动之一。在毕苏斯基死后，波兰主要是由一小群“上校”统治着，他们是在毕苏斯基麾下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对俄国作战的波兰军团的一些领导人。居于魁首地位的是斯密格莱—利兹元帅，他是一个出色的军人，然而却完全不是一个政治家。外交政策归于[459]贝克上校掌握，从 1934 年起，这个政策就越来越亲德了。

[⑤] 里宾特洛甫关于会谈的报告，见《德 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 5 卷，第 159—61 页。波方记录，见《波兰白皮 书》，第 49 号，《纳粹的阴谋与侵略》， 第 8 卷，第 488 页（纽伦堡文件 TC—73）。

这种政策必然是自杀的政策。说真的，谁要是研究一下波兰在凡尔赛和约以后的欧洲的地位，很难不得出下面的结论：波兰人在 20 世纪 30 年代，就像在几个世纪以前一样，被他们民族性中某种致命的弱点所驱使而走向自我毁灭，而这一次，就像前几次一样，他们自己就是自己最大的敌人，只要但泽和波兰走廊继续保持现状，在波兰和纳粹德国之间就不可能有持久的和平。波兰的国力也决不足以吃得消同它的两个强大的邻国俄国和德国发生不和。它同苏联的关系自从 1920 年以来一直是不好的，在那一年，它进攻了由于世界大战和内战而大为削弱的俄国，结果发生了一场残酷的战争。*

希特勒采取主动同波兰签订了 1934 年的波德条约,目的就是要乘机取得一个如此坚决反俄的国家的友谊，而且同时使它疏远日内瓦和巴黎，从而破坏凡尔赛和约所造成的欧洲体系。这在德国并不是一个很得人心的行动，从西克特将军的时代起就是亲俄反波的德国陆军是对之愤愤不满的。但是当时这对希特勒却有很大的好处。波兰对德国同情友好的关系使他能腾出手来办该先办的事情：进兵莱因兰，摧毁独立的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对所有这些加强德国、削弱西方、威胁东方的行动，贝克和华沙的其他上校们都以无法解释的完全盲目的态度欣然作壁上观。

如果波兰外交部长，像他自己所说，在新年开始的时候就已因为希特勒的要求而陷入悲观的话，他的情绪随着春天的到来而更加大大低沉了。虽然 1939 年 1 月 30 日，希特勒在向国会作一年一度的讲话时，客气地谈到了“ 德国和波兰之间的友谊 ”, 并且宣称这是“ 保持欧洲政治生活稳定的因素之一 ”, 里宾特洛甫在天以前到华沙作国事访问时却谈得要直率得多。他再次向贝克提出了希特勒关于但泽和走廊交通的要求，一再说这些要求是“ 极其公道的 ”。但是不论在这些问题上，还是在要波兰参加反共公约[460]对付苏联的问题上，这位德国外交部长都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6]贝克上校对他的朋友现在非常警惕，事实上他已开始有所行动了。2 月 26 日，德国驻华沙大使报告柏林，贝克已主动设法使英国邀请他在 3 月底访问伦敦，而且他还可能在那以后访问巴黎。尽管为时已晚，波兰，正如德国大使毛奇在电报里所说的那样，还是“ 希望同西欧民主国家取得联系……[因为它]害怕可能在但泽问题上同德国发生冲突 ”。[7]贝克就像别的许多想迁就希特勒永无餍足的欲壑的人们一样，眼睛里的翳障开始掉下来了。

当 3 月 15 日希特勒占领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并且派兵保护“ 独立的 ” 斯洛伐克的时候，他们的眼睛里的瞖障终于完全而且永远掉下来了。波兰在那关早晨醒来的时候发现它的南部边界已经被斯洛伐克的德国军队包围上了，就像它的北部边界早已就被在波麦腊尼亚和东普鲁士的德国军队包围上了一样，仅仅一夜之间它在军事上就三面被围，变得无可防守了。

1939 年 3 月 21 日，在欧洲走向战争的这一段历史上是一个值得记忆的日子。

这一天在柏林、华沙和伦敦都有频繁的外交活动。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在外交部长庞纳陪同下，到达英国首都进行国事访问。张伯伦向法国人建议，他们两国同波兰和苏联一起发表一项正式声明，宣布四国将立即协商制止在

---

[6] 里宾特洛甫关于 1939 年 1 月 26 日在 华沙与贝克会谈的报告，见《德国外 交政策文件汇编》，第 5 卷，第 167—68 页。贝克的记录，见《波兰白皮 书》，第 52 号。

[7] 毛奇在 1939 年 2 月 26 日的电报，见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 6 卷， 第 172 页。

欧洲进行进一步侵略的步骤。3 天以前，李维诺夫曾建议——像他在刚好一年以前在德国并吞奥地利以后曾建议过的那样——召开欧洲会议，这一次由法国、英国、波兰、俄国、罗马尼亚和上耳其参加，它们将采取共同行动来制止希特勒。但是英国首相认为这一建议“尚未成熟”。他对莫斯科十分不信任，因而认为由四国（包括苏联在内）发表一项宣言，就是他所能做的极限了。*

他的建议由英国驻华沙大使在同一天（3 月 21 日）提交给贝克，但是就包括俄国人在内这一点而论，却受到了颇为冷淡的对待。波兰外长甚至比张伯伦还要不相信苏联，除此而外，他也同英国首相一样认为俄国的军事援助没有什么价值。他保持着这种看法，一直到大祸临头都毫未改变。

但是，在 3 月 21 日这一天，对波兰说来最致命的事件还是发生在柏林。里宾特洛甫请波兰大使在中午去见他。据利普斯基在事后所写的报告中说，德国外长这一次破天荒地对他不但态度冷[461]淡，而且咄咄逼人。里宾特洛甫警告说，元首“对波兰的态度已愈来愈感到惊讶”。德国希望它关于但泽和通过走廊的铁路和公路的要求能得到满意的答复。这是继续维持波德友好关系的一个条件。里宾特洛甫明白指出，“波兰必须认清它不能在俄国和德国之间采取中间道路”。它唯一的自救之道就是“同德国和它的元首保持合理的关系”。其中就包括采取共同的“反苏政策”。不但如此，元首还希望贝克“早日访问柏林”。同时，里宾侍洛甫极力地建议波兰大使赶回华沙亲自向他的外交部长解释目前的局势。利普斯基向贝克报告说，“他建议，不要推迟[同希特勒的]会谈，免得总理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认为波兰已拒绝了他的全部建议”。⑧

附带一表一场小型侵略

在离开威廉街以前，利普斯基问里宾特洛甫能否告诉他一点同立陶宛外交部长谈话的内容。德国人回答说，他们曾讨论了默默尔问题，“这个问题应该解决了”。

实际上，里宾特洛甫确曾在前一天接见了访问罗马以后回国途中路过柏林的立陶宛外交部长约礼斯·埃尔巴伊斯，要求立陶宛立即把默默尔区归还德国。要不然的话，“元首就要以闪电般的速度采取行动了”。他还警告说，立陶宛人决不能欺骗自己，以为可以希望“从外国得到什么援助”。⑨

事实上，几个月以前，在 1938 年 12 月 12 日，法国大使和英国代办曾请德国政府注意传闻默默尔境内的日耳曼人在计划策动叛乱的消息，并且请德国政府运用其影响，务使由英法两国担保的默默尔法规能受到尊重。德国外交部的答复表示对英法这一行动“不胜惊异”，而且里宾特洛甫还下了命令，如果今后还有这类行动，就该告诉两国大使馆“我们真心希望法国和英国最后会对干涉德国的事情感到厌倦”。⑩

---

⑧ 利普斯基关于这次会谈给华沙的电报，见《波兰白皮书》，第 61 号，载《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 8 卷，第 489—92 页（纽伦堡文件 TC—73，第 61 号）。里宾特洛甫关于会谈的报告，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 6 卷，第 70—72 页。

⑨ 外交部关于这次会谈的报告，同上，第 5 卷，第 524—26 页。

⑩ 同上，第 502—4页。

相当一个时期以来，德国政府的领导人，尤其是党和党卫队的领袖们，就在按照我们在奥地利事件和苏台德事件中已经熟知的那种手法，组织默默尔的日耳曼人闹事了。德国武装部队也受命予以合作，而且，我们已经知道，*慕尼黑会议以后 3 个星期,希特勒就曾命令他的军事首脑在准备清算残存的捷克斯洛伐克的同时，准备占领默默尔。因为海军没有得到机会分享向四面都是[462]陆地围绕的奥地利和苏台德区进军的光荣,希特勒决定默默尔应从海上出兵占领。11 月间，海军方面就已经拟好了执行这次侵略的计划，代号叫做“斯德丁运输演习”。希特勒和雷德尔对于显示海军威力的小小表现兴趣极高，硬是在 3 月 22 日从施魏恩缪恩德出海，登上袖珍战斗舰德意志号前往默默尔。这一天刚好是元首胜利进入布拉格之后的一星期，毫无防御的立陶宛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向德国人的最后通牒表示屈服。

3 月 21 日，若干年以后自称对纳粹的残暴手段一贯反感的威兹萨克通知立陶宛政府，必须派全权代表“在明天乘专机”到柏林来签字，把默默尔地区交给德国,“绝不容许拖延时间”。立陶宛人顺从地在 3 月 22 日下午来了，但是，尽管由里宾特洛甫亲自施行压力，尽管晕船的希特勒坐在他那战斗舰上不断催促，他们在决定是否投降的问题上还是要花些时间。据缴获的德国文件透露，元首从德意志号上两次发出急电给里宾特洛甫，问他立陶宛是否已按照德国人的要求投降。这位独裁者和他的海军上将必须知道他们是否不得不开炮冲进默默尔港。最后，到 3 月 23 日清晨 1 点 30 分，里宾特洛甫才总算能发电报，把立陶宛人已经签字的消息告诉他的主子。[①]

3 月 23 日下午 2 点 30 分，希特勒再一次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一个刚刚被占领的城市，并且在默默尔市戏院里再一次对着如醉如狂的“解放了的”日耳曼人发表演说。凡尔赛和约上又一条被撕毁了。又一次不流血的征服完成了。尽管元首不可能知道，这是最后的一次不流血的征服了。

波兰问题炽热化

德国并吞默默尔这一举对波兰政府说来是“一桩极不愉快的意外”，这是德国驻波大使汉斯—阿道夫·冯·毛奇在第二天从华沙报告柏林的话。他还说，“主要的理由是，人们普遍担心下一次就该轮到但泽和走廊了”。[①]他还报告德国外交部，波兰的后备兵已征召入伍。第二天，3 月 25 日，谍报局局长卡纳里斯海军上将报告说，波兰已动员了三级役龄的后备兵，并且正在把部队向但泽周围地区集中。凯特尔将军并不认为这能表明“波兰人有什么寻衅的意图”，不过他指出,“但是陆军参谋总部却持有比较严重的看法”。[②]

希特勒在 3 月 24 日从默默尔回到了柏林，第二天就同陆军总司令冯·勃劳希契作了长时间的谈话。从后者关于这次谈话的内部记录看来，领袖看来还没有下定决心到底用什么办法来搞波[463]兰。[③]事实上，他那一刻不停的脑筋里似乎充满了各式各样的矛盾。利普斯基大使第二天就该回来了，但是元首却并不打算见他。

[①] 这一段来源，同上，第 528—30 页。

[①] 同上，第 6 卷，第 97 页。

[②] 同上，第 110—11 页。

[③] 《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 7 卷，第 83—86 页（纽伦堡文件 R—100）。

> 利普斯基将在星期天（3 月 26 日）自华沙返任[勃劳希契写道]。他原来是奉命前去探询波兰是否愿在但泽问题上达成妥协的。元首在 3 月 25 日晚间走了：他不愿在利普斯基回来的时候待在柏林。里宾特洛甫将首先同他谈判。不过元首并不愿意用武力解决但泽问题。他不想因此把波兰推入英国的怀抱之中。
>
> 只有在利普斯基暗示波兰政府在波兰人民面前负不起自动割让但译的责任的情况下，才会考虑对但泽实行军事占领。这种解决办法将造成一种既成事实而使波兰政府易于应付。

这对希特勒当时的心思和性格是一个很有趣的透视。3 个月以前，他曾经亲自向贝克保证，德国不会在但泽制造什么既成事实。可是他也还记得波兰外交部长曾向他强调指出，波兰人民永远不会容许把但泽转交德国。要是德国人干脆把它拿了过来的话，是否会使波兰政府比较容易接受这样一个既成事实呢？迄今为止，希特勒在估计他的外国敌手的弱点和利用这种弱点方面一直是一个天才，但是这一次，他的判断第一次开始失灵了。统治着波兰的“上校们”是一批昏庸糊涂的人，然而在但泽问题上他们却实在不想要、也不会接受什么“既成事实”。

这个自由市是希特勒心上的第一件大事，但是他想的还不止于此，正如他在慕尼黑会议给了他苏台德区以后他还想要捷克斯洛伐克一样。

> 就目前来说[勃劳希契写道]，元首并不想解决波兰问题。不过现在就该着手了。在最近的将来寻求解决，必需要有特别有利的政治条件。在这种情况下，波兰将被彻底打垮，以至在今后几十年内不必视为一个政治因素。元首心里想的解决办法是要把边界线推进到从东普鲁士的东部边界直到上西里西亚的东端。

勃劳希契十分清楚这条边界的意义。那是德国在战前的东部边界，它是被凡尔赛会议所取消的，而且过去只有在没有波兰存在的情况下才存在过。

如果希特勒对波兰将作什么答复曾有怀疑的话，那末当利普斯基大使在星期天（3 月 26 日）回到柏林并且以书面备忘录的形式提出波兰的答复[①]以后，这种怀疑就都消散了。里宾特洛甫马上就看了这个备忘录而且拒绝了它。他对波兰的动员措施大发雷霆，[464]并且警告大使注意“可能的后果”。他也宣布波兰军队对但泽领土的任何侵犯都将被认为是对德国的侵略。

波兰的书面答复，虽然是用息事宁人的口气措辞的，但是对德国的要求来说，却是坚决的拒绝。它表示愿意进一步讨论便利德国在波兰走廊的铁路交通和公路交通的方法，但是拒绝考虑给予这类交通以治外法权。至于说到但泽，波兰愿意以波德联合担保来代替国际联盟的担保，但是并不想看到这个自由市成为德国的一部分。

纳粹德国这时还从来没有碰到过一个小国敢于拒绝它的要求，因此里宾特洛甫对利普斯基说“这使他想起另一个国家所采取过的某些冒险的步骤”——所谓另一个国家显然是指波兰帮着希特勒一起肢解掉的捷克斯洛伐克。当利普斯基第二天再次被里宾特洛甫召到德国外交部去的时候，他心里一定也清楚，第三帝国现在要用它过去用来对付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而非常成功的同样手段来对付波兰了。纳粹外交部长对据说在波兰境内发生的对日耳曼少数民族的迫害大发雷霆。他说，这件事情“在德国”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①] 全文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 6 卷，第 122—24 页。里宾特洛甫关于 3 月 26 日与利普斯基会谈的报告，同上，第 121—22 页。波兰的记录，见《波兰白皮书》，第 63 号。

最后，[德国]外交部长表示他再也无法理解波兰政府的态度了……波兰大使昨天交来的建议不能认为是解决争执的基础。两国之间的关系已因此迅速恶化。[①]

华沙并不像维也纳和布拉格那样容易吓倒。第二天，3 月 28 日，贝克召见了德国大使并且告诉他，为了答复里宾特洛甫所称波兰对但泽的任何行动都将形成开战的理由，他不得不声明，由德国或者由纳粹的但泽参议会任何改变这个自由市现状的企图都将被波兰认为是开战的理由。

“你这是想用刺刀逼着谈判！”大使大声说。

“这是你们自己的方法。”贝克回答道。[①]

觉醒了的波兰外交部长对柏林所以能够比贝奈斯更硬，是因为他知道，一年以前还是竭力帮助希特勒实现他对捷克斯洛伐克的要求的英国，现在在波兰问题上已采取了完全相反的方针。贝克本人因为宣称波兰拒绝在任何形式下与俄国联合在一起，而曾搞垮了英国提出的发表四国宣言的建议，在 3 月 22 日，他却向英国驻华沙大使霍华德·肯纳德爵士建议立即缔结一项秘密的英波协定，规定在遭到第三国进攻的威胁时，两国立即进行协商。但是，这时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已经听到德国在但泽和走廊地区附[465]近调集军队的消息，听到英国情报机关提供的德国对波兰提出要求的消息（但是狡诈的贝克却向英国人否认有这回事），他们要求两国关系不仅止于“协商”，而且还要更进一步。

3 月 30 日晚间，肯纳德向贝克递交了英法两国的联合建议，主张同波兰签订互助条约，以便在一旦受到德国侵略时互相支援。*但是就是这一个行动也已经赶不上事态的发展了。英国政府又接到了德国可能立刻进攻波兰的消息，这使它当天晚上就问贝克，他是否反对英国单方面对波兰的独立作出临时担保。张伯伦要求在第二天就得到答复，因为他要回答议会就这个问题提出的质询。贝克——可以想见他心上一定感到一块石头落了地——对此当然没有什么好反对的。事实上，他告诉肯纳德，“他毫无犹豫地表示同意”。[①]

第二天，3 月 31 日，如我们上面已知道的那样，张伯伦在下院作了他那历史性的演说，宣布如果波兰受到进攻并且进行抵抗的话，英国和法国“将给予波兰政府全力支持”。*

对任何一个在 1939 年 3 月最后一个周末曾在柏林的人(作者刚好也在那里）来说，英国突然对波兰作出单方面保证的消息，虽然受到德国东西两方的邻邦的欢迎，却似乎是无法理解的。我们已经看到，一次又一次，当 1936 年德国人进军不许驻兵的莱因兰的时候,当 1938 年他们夺取奥地利而且以发动欧洲大战相威胁而夺取苏台德区的时候，甚至在半个月以前他们夺走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时候，英国和法国本来都可以在俄国的支持下采取行动来制止希特勒的，而它们自己只要付出很小的代价。但是，如饥似渴要求和平的张伯伦却避不采取这样的行动。不但如此，他还做过了头，用他自己的话说，他不惜以自己的政治生命为赌注来帮助希特勒在毗邻各国取得他想要的东西。他没有做任何事情来挽救奥地利的独立。他配合那位德国独裁者摧毁了捷克斯洛伐克的独立，而捷克斯洛伐克却是德国东方唯一真正的民主国家，西方的唯一友邦，唯一支持国际联盟和集体安全的国家。他甚至连捷克斯洛

[①] 施密特关于这次会谈的报告，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 6 卷，第 135—36 页。

[①] 毛奇的电报，同上，第 147—48 页。《波兰白皮书》，第 64 号。

[①] 同上，第 485，518，538（英法建议全文），561，563，566，571，573 号。

伐克在山地工事中凭险固守的 35 师训练与装备俱臻上乘的军队对西方的军事价值都不加考虑，而这个时候，英国还只能拿出两个师到法国去，而德国军队又不能在两条战线上同时作[466]战，而且照德国将领们看来，甚至没有力量击破捷克的防线。

现在一夜之间，张伯伦在一心一意、毫无顾惜地抛弃了许多东西以后，终于对希特勒占领残存的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动感到了可以理解的愤慨，终于单方面出面担保一个由一批政治上愚钝的“上校们”所统治的东欧国家了，这批上校到目前为止一直是同希特勒密切合作的，而且像一群狼一样同德国人一起瓜分了捷克斯洛伐克，就因为他们和英国人帮助德国征服了捷克斯洛伐克，他们的国家才陷入了军事上无法防守的地位。”张伯伦在最后关头决定冒这样一场风险的时候，还根本不想得到俄国的帮助，他在一年之内已经两次拒绝了它关于采取联合行动以防止纳粹进一步侵略的建议。

终于，他做了恰恰是一年多以前他坚决声称英国永远不会做的事情：让另外一个国家来作出他自己的国家是否走向战争的决定。

虽然如此，首相这个激烈的行动，尽管已经拖得很晚了，还是给希特勒造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局面。十分明显，从现在起，英国已成了阻挡他实行进一步侵略的障碍。他再也不能施展过去的伎俩，对周围的国家逐个地蚕食鲸吞，而西方民主国家却只是站在一旁讨论怎么办才好。不但如此，张伯伦的行动看起来是形成各国反对德国的同盟的第一个认真的步骤，这个同盟如果不能很好地加以对付的话，就很可能再次形成自从俾斯麦时代以来德国一直所恐惧的包围。

白色方案

张伯伦给予波兰担保的消息，使得德国独裁者又一次暴跳如[467]雷。他当时刚好同谍报局局长卡纳里斯海军上将在一起。据后者说，希特勒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就绕室狂走，攥着拳头使劲捶大理石的桌面，他气得咬牙切齿，嘴歪眼斜。他大骂英国人：“我要给他们点苦头尝尝，教他们受不了！”[①]

第二天，4 月 1 日，他在威廉港举行的战斗舰“铁比茨”号下水典礼上发表演说，当时的情绪极其好斗，看来显然连他自己都对自己的话感到没有把握，因此临时下令取消把他的演说直接广播。他指示可以在以后用他的录音重新广播，而录音是可以改编的。*

然而就是改编过的重新广播的演说也有不少对英国和波兰的警告。

> 如果它们[指西欧盟国]以为今天的德国会耐心十足地坐在一旁，一直等到它们建立起卫星国而且拿它们来对付德国的话，那么它们就是把今天的德国错当成战前的德国了。
>
> 那种宣称自己准备为那些大国从火中取栗的人必须明白他会烫坏自己的手指头……
>
> 他们在自己国内说，他们将武装起来，并且将继续不断武装下去，我只能对那些政治家们说：“你们休想把我拖垮！”我下定决心要这样继续干下去。

从取消直接广播这一点就看得出，希特勒还相当谨慎，知道避免过份刺激外国舆论。那一天，柏林本来有消息说，他将宣布废除英德海军条约作为对张伯伦的第一个回击。但是，他在演说里只是说，如果英国不再想遵守这一条约的话，德国“将毫不在乎地予以同意”。

[①] 吉斯维乌斯在上引书中引用，第 363 页。

希特勒这一回也像过去那样，用呼吁和平的老调来结束他的演说：“德国没有任何进攻他国人民的打算……正是出于这种愿望，我在三个星期以前决走把即将召开的党代表大会命名为‘和平的党代表大会’。”——这是一个随着 1939 年夏季形势的演变越来越令人啼笑皆非的口号。

这是做给群众看的。实际上，在两天以后，希特勒就在 4 月 3 日以最秘密的方式给了张伯伦和贝克上校以答复。这个答复包含在给武装部队的一项绝密命令中。它一共只复写了 5 份，代号叫做“白色方案”，它在以后的世界史中带来了越来越严重的威胁。[468]

绝　密

白色方案

波兰目前的态度要求……在军事上开始进行准备，以便在必要时永远消除从这个方向来的威胁。

1.政治上的要求与目的

……目的是要消灭波兰军事力量并且在东方造成一种能满足国防要求的局面。至迟在战争爆发之时，必须宣告但泽自由邦为德国领土的一部分。

政治领导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任务是在可能范围年孤立波兰，这就是说把战争限制在波兰境内。

法国国内危机日益发展，英国态度因此而趋于持重，有可能在不太远的将来就形成这样一种局面。

俄国的干涉……不能认为会对波兰有什么用处……意大利的态度是罗马—柏林轴心已经决定了的。

2.军事上的结论

加强德国武装部队这一伟大目标仍然要由西方民主国家的对立程度来决定。“白色方案”只包括这类准备工作的一些预行补充措施……

如果我们能以突然的、有力的打击来开始战争，并且迅速取得进展的话……孤立波兰将格外容易做到，即使在战端已启以后也是如此。

3.武装部队的任务

德国国防军的任务是歼灭波兰武装力量。为达到这一目的，必须准备进行突然袭击。

至于对但泽：

如果出现有利的政治形势可资利用，对但泽的突然占领也许会在“白色方案”之外单独执行……军事占领将由东普鲁士境内的陆军予以执行，海军将从海上支持陆军的行动。

白色方案是一个冗长的文件，另外还有若干“附件”、“附录”和“特别命令”，其中绝大部分曾在 4 月 11 日一起重新发布过，后来随着冲突的时间日益逼近，当然还有所增补。但是，早在 4 月 3 日，希特勒就已经给白色方案加上了下列命令：

1.准备工作之进行，务须做到能在 1939 年 9 月 1 日以后的任何时间内发动军事行动。

希特勒在取得苏台德区以前很早就定下了行动的日期——[469]1938 年 10 月 1 日，这一回也是一样，1939 年 9 月 1 日这个更加重要的日期也要严格遵照。

2.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负责定出白色方案的确切的时间表，并且负责协调海陆空三

军的行动时间。

3.三军作战计划与详细的时间表务须在 1939 年 5 月 1 日以前送交最高统帅部。[①]

现在的问题是希特勒到底能不能像他在奥地利人和（在张伯伦的帮助下）在捷克人身上所做到的那样对波兰人施加压力，一直搞到他们肯接受他的要求的程度，或者说波兰人到底会不会坚持立场，在纳粹进攻的时候予以抵抗，而如果抵抗的话，用什么来抵抗。作者曾花了 4 月份第一个星期的时间在波兰寻求答案。就作者所能见到的来说，答案是，波兰人不会向希特勒的威胁屈服，如果他们的国土受到侵略，他们是会起来抵抗的，然而从政治上和军事上来说，他们的地位实在糟糕透顶。他们的空军已经过时了，他们的陆军臃肿不灵，他们受到德国人的三面包围的战略地位几乎是绝望的。不但如此，德国已经加强了它的西壁防务，因而在波兰受到进攻时，英法要对德国发动攻势将极为困难。最后，越来越清楚的是，即使德国人已经到了华沙的大门口，那批刚愎自用的波兰“ 上校们 ” 也永远不会同意接受俄国的援助。

事变发展得越来越快。4 月 6 日贝克上校在伦敦同英国签订了一项协定，把英国单方面的担保改变为一项临时的互助条约。双方宣布，一俟细节商妥以后即将签订长期条约。

第二天（4 月 7 日）墨索里尼派兵进入阿尔巴尼亚，这样他在征服了埃塞俄比亚以后，又征服了这个小小的山国。他因此得到了一块进入希腊和南斯拉夫的跳板。在欧洲已经十分紧张的空气中，这使得敢于抵抗轴心国家的小国更加胆战心惊。德国外交部的材料证实，意大利的行动是在德国完全赞同之下进行的，意大利事先就把意图通知了德国，4 月 13 日，法国和英国对希腊和罗马尼亚作了担保，以此来回击轴心国家。这样，双方的阵线就在逐渐形成了。4 月中旬，戈林到了罗马，而且颇使里宾特洛甫难堪地在 15 日、16 日两日同墨索里尼进行了两次长谈。[①]他们同意，他们“ 需要 2—3 年的时间 ” 来准备一场“ 全面战争 ”，但是戈林宣称，就是战争来得更快的话，“ 轴心国家的地位也已十分坚强 ”，“ 能够击败任何可能的敌人 ”。

这次会谈也谈到了在 4 月 15 日到达罗马和柏林的罗斯福总统的一项呼吁。据齐亚诺说，领袖开头连看都不屑一看，戈林说[470]根本不值得给予答复。墨索里尼认为这是“ 小儿麻痹症的结果 ”*，但是戈林的印象是“ 罗斯福害了初期神经病 ”。美国总统在给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电报里提出了一个直率的问题：

你们是否愿意作出保证，声明你们的武装部队不会进攻或者侵入下列独立国家的领土？

下面开列了 31 个国家的名单，其中包括波兰、波罗的海诸国、俄国、丹麦、荷兰、比利时、法国和英国。总统希望这种不侵略的担保有效期“ 至少应有 10 年 ”，或者“ 1/4 世纪，如果我们敢于看得那么远的话 ”。如果能作出这种保证的话，他答应美国将参加世界范围的“ 谈判 ”，来使世界解除“ 军

[①] 白色方案全文，见《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 6 卷，第 916—28 页。部分译文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 6 卷，第 186—87，第 223—28 页（纽伦堡文件 C—120）。德文原文见《主要 战犯的审讯》，第 34 卷，第 380—422 页。

[①] 德国方面关于戈林—墨索里尼会谈的机密报告，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 6 卷，第 248—53，第 258—63 页。另见《齐亚诺日记》，第 66—67 页。

备竞赛的重负”，并且打开国际贸易的道路。

“你曾一再声明，”他提醒希特勒说，“你和德国人民并不想要战争。如果这是真的话，世界上就不需要战争了。”

现在看起来，这似乎像一个天真的呼吁，但是元首却感到颇为狼狈，因而不得不表示他要答复——不是直接答复，而是在德国国会 4 月 28 日专门召集的一次会议上发表演说。

与此同时，从缴获的德国外交部材料得知，威廉街在 4 月 17 日一份电报中，向除了波兰、俄国、英国和法国 4 个国家而外所有罗斯福所曾提到的国家，提出两个问题：它们是否感到自己受到德国的任何威胁？它们曾否授权罗斯福作这一呼吁？

里宾特洛甫在发给驻在上述各国的使节的电报中说，“我们毫不怀疑，对两个问题的答案都将是否定的，但是，虽然如此，为了特殊的理由，我们想要立即得到确凿的证实”。所谓“特殊的理由”，到希特勒在 4 月 28 日演说的时候就完全清楚了。

到 4 月 22 日，德国外交部就可以向元首提出报告，绝大部分国家，包括南斯拉夫、比利时、丹麦、挪威、荷兰和卢森堡在内，都“已经对两个问题作了否定的答复”——这个答复很快就表明这些国家的政府对第三帝国的看法多么天真。然而，从罗马尼亚还是来了一个尖刻的答复，“德国政府自己知道是否会有这样的威胁”。波罗的海边上的小小的拉脱维亚开头不知道到底要它作出什么样的答复，但是德国外交部马上让它明白了过来。4 月 18 日，威兹萨克打电话给他驻在里加的公使：

> 告诉他，我们不懂拉脱维亚外交部长对我们就罗斯福来电所提出的问题[471]的答复。其他的政府几乎都已经答复了这个问题，而且当然是否定的，可是门特斯先生却把这种可笑的美国宣传当作一个他要同内阁讨论的问题。要是门特斯先生不能对我们的问题干脆回答“不”的话，我们就要把拉脱维亚算在那些甘愿做罗斯福先生的同党的国家里面去了。我是说，我估计，只要冯·科兹先生[德国公使]照上面这些话去说，就足以从他那里得到明白的答复了。[①]

结果果然如此。

希特勒对罗斯福的答复

这些答复都是给希特勒的弹药，在 1939 年 4 月 28 日这个宜人的春日里，当他口若悬河地开始了对国会演说的时候，他充分地利用了这些材料。我相信这是他从来没有作过的最长的重要公开演说，讲了足足两小时以上。在许多方面，特别在打动德国人和纳粹德国在外国的朋友这一点上，也许是他空前最精采的一次演说，肯定是作者亲耳听到他所作的最了不起的演说。他雄辩滔滔，机锋横溢，极尽尖酸刻薄，虚伪狡诈之能事，这种本领已经达到空前未有的高峰，而且以后再也没有能达到过。演说虽然是 准备给德国人听的，但它不仅在全德国电台上广播，而且在全世界几百家电台上广播：在美国也由各大广播公司转播。在此以前和以后，都不曾再有过他那天那么遍及全世界的听众。*

[①] 1939 年 4 月 17 日电报，见《德国外交 政策文件汇编》，第 6 卷，第 264—65 页。外交部关于各方答复的报告，同上，第 309—10 页。威兹萨克 4 月 18 日对德国驻里加公使的访问，同上，第 283—84 页。

在通常一上来先诉说一通凡尔赛和约的罪恶和它所加在德国人民头上的种种不平和长期痛苦的开场白以后，这篇演说首先对英国和波兰作了答复，这个答复震动了忧心忡忡的欧洲。

他先说他对英国的钦佩和友谊，然后就攻击它对他不信任，攻击它对德国实行新的“包围政策”，他宣布废除 1935 年的英德海军条约。他说，“它的基础已经消失了”。

对波兰也一样，他公开了一直保守秘密的他关于但泽和走廊地带向波兰提出的建议，把这个建议称做“为了欧洲和平的利益而可能想像得出的最大的让步”，并且告诉德国国会，波兰政府已经拒绝了这个“独一无二的建议”。

> 我对波兰政府这种不可理解的态度感到遗憾……最坏的是，波兰现在同[472] 捷克斯洛伐克一年前一样，在一个国际诽谤运动的压力之下，相信它非征召军队不可，虽然德国并没有征召过一个人，而且连想都没有想到过要以任何方式来反对波兰。这件事本身就是令人遗憾的，后代终有一天将能够判断它拒绝这一建议是否确实正确……这是我一度提出的……实在是独一无二的妥协……

说德国打算进攻波兰的消息——希特勒接着说——“不过是国际新闻界的捏造”。（在上千万听他演说的人里面，不见得有一个人能知道，仅仅 3 个星期以前，他就给他的武装部队下达了书面命令，要他们准备“至迟”在 9 月 1 日消灭波兰。）新闻界的这种捏造——他继续说——已使得波兰同英国签订了一个协定，这种协定“在某种条件下会强迫波兰对德国采取军事行动”。因此，波兰已经背弃了波德互不侵犯条约！“因此，我认为这一协议已经受到波兰单方面的破坏，从而已经不再有效。”

在他自己单方面地撕毁了两个正式条约以后，希特勒接着向国会说，他愿意商谈一个替换办法！“我只能欢迎这样的建议，”他说，“没有人比我对这种前景更感到高兴了。”我们已经知道，这是他过去每当撕毁一项条约时常用的老手法，但是，这一回却行不通了，尽管他很可能还不知道。

希特勒下面就转向罗斯福总统，德国独裁者的辩才在这里发挥到了顶点。可以肯定地说，在普通人听来，这些话充满了伪善与欺骗，但是对那些仔细挑选出来的国会议员们和成千万德国人说来，他那运用自如的喜笑怒骂，听起来却真是一番享受。当德国元首用越来越动人的效果，几乎无止无休地取笑美国总统的时候，那些脑满肠肥的议员们不断地哄堂大笑。他先把罗斯福来电中的论点一个一个举出来，然后笑容满面地停了一会，于是就像一个教师那样压低了嗓子说了一个字，“答”——然后就作了答复。（本书作者只要一闭上眼睛，就能看见当时的景象，希特勒每过一会儿就要停下来，轻轻说一声：

“Antwort”[答]，这时高高坐在主席座位上的戈林就忍俊不禁笑了起来，而议员们早就等着，只要“Antwort”这个字一出口，就大笑大叫起来。）

> 罗斯福先生宣称，他认为一切国际问题都可以在会议桌上解决。
>
> 答：……要是这些问题果真能在会议桌上得到解决的话，我将不胜高兴。然而，我的怀疑是有事实做根据的，那就是，最明显地表示不信任会议有用处的国家正是美国自己。因为历史上最伟大的会议就是国际联盟……它代表全世界各国人民，并且是按照一位美国总统的意志而建立起来的，然而，第一个在这种努力面前表示退缩的国家就是美国……只是在无目的地参加了[473][国际联盟]好多年以后，我才决意学美国的样……
>
> 北美的自由并不是从会议桌上获得的，同样，南北战争也不是在会议桌上决定胜负的。至于为达到最后征服整个北美大陆而进行的无数斗争，我就不说了。

我所以提起这些话，只是为了要表明您的意见，罗斯福先生，尽管毫无疑问应当受到最大的尊重，然而却不能在您自己国家的历史或者世界其他各国的历史里找到任何证明。

希特勒提醒总统，德国曾经参加过——在凡尔赛开的——次会议，不是去参加讨论，而是去听别人叫它做什么：它的代表“受到的屈辱甚至比苏安族*的酋长所受到的屈辱还要大”。

希特勒对罗斯福总统要求他保证不进攻 31 个国家中任何一个国家所作的答复，最后接触到了核心。

答：罗斯福先生怎么知道哪一个国家认为自己受到德国政策的威胁而哪一个国家又认为自己没有受到这种威胁呢？或者说，罗斯福先生，既然在他自己的国家内定然有大量的工作压在他身上，怎么还居然能够自以为认识到其他国家人民和政府的所有这些内在的精神上和心理上的感受呢？

最后，罗斯福先生要求我们向他保证德国武装部队不会进攻，尤其是不会侵入下列各独立国家的领土或者属地……

希特勒然后慢吞吞地宣读了各个国家的名字，我还记得，在他抑扬顿挫拉着调子念到这些名字的时候，国会的笑声越来越大。我相信，没有一个议员，没有一个在柏林的人，包括作者本人，曾注意到他狡猾地漏掉了波兰的名字。

这时候，希特勒就打出了他的王牌，至少他自己心里一定是这样想的。

答：我曾经不厌其烦向上面所提到的那些国家调查了一下，第一，它们是否认为它们自己受到了威胁，而最重要的是，第二，美国总统向我们所提出的问题是应它们的请求提出来的呢，还是至少在它们的同意下提出来的呢？

所有的答复都是否定的……诚然，我并没有对某些国家提出询问，因为这些国家——例如，叙利亚——目前还没有取得自由，而是在民主国家的军队占领之下，因而被剥夺了它们的权利。

虽然如此，除了这些国家而外，一切与德国接壤的国家都得到了保证……比罗斯福先生在他那奇怪的电报里要我作的保证……约束力要大得多……[474]

我必须请罗斯福先生注意一两个历史的错误。他提到了，举例来说，爱尔兰，并且要求我声明德国不会进攻爱尔兰。我刚刚读到爱尔兰总理德·瓦勒拉* 的一篇演说，奇怪的是，他在这篇演说里，同罗斯福先生的意见相反，并没有非难德国压迫爱尔兰，而是谴责英国不断侵略爱尔兰……

同样，罗斯福先生也没有注意到下面的事实：巴勒斯坦目前并不是在德国军队占领下而是在英国军队占领下，这个国家的自由受到了最残暴的武力手段的压制。……

希特勒接着说，虽然如此，他还是准备“给予罗斯福先生所提出来的每一个国家以他所要求的那种保证”。而且，还不仅如此！说到这里，他的眼睛猛然亮了起来。

我不想错过这个机会，因此首先要对说到最后是美国总统最为担心的地区，即美国本国和美洲所有其他国家，向他提出保证。

我在这里庄严地宣告一切关于德国打算进攻或者侵入美洲的说法，不论以何种方式在流传，都是纯属捏造的欺人之谈。且不谈这种说法，仅就军事上的可能性来说，也只能出自愚蠢的想象。

德国国会议员们笑得声震屋瓦，然而希特勒却一丝笑容不露，保持着他那一本正经的神态，以期达到最大的效果。

下面就是长篇大论的结束语——我相信在德国人的耳朵听起来，一定是

他历来讲得最精采的一段演说了。

> 罗斯福先生！我深知贵国幅员广大，财富充盈，使您目许要对全世界的历史和所有国家的历史负责任。而我，先生，所处的地位却要平凡得多，局面也要小得多……
>
> 我接受了这样的一个国家，它因为信任外国的诺言和由于民主政府的恶劣制度而面临着彻底的毁灭……我克服了德国的混乱，重新建立了秩序，并且大大增加了生产……发展了交通，使庞大的公路网得以兴建，运河得以开凿，巨大的新工厂得以出现，同时也致力于提高我国人民的文化与教育水平。
>
> 我曾做到了使 700 万失业工人全体重新得到工作……我不但使德国人在政治上团结了起来，而且使他们重新武装了起来，我也曾致力于一页一页[475]地撕毁那长达 448 条的条约，其中包含着任何国家人民和任何一个人都无法忍受的最卑鄙的压迫。
>
> 我把 1919 年从我们手里抢走的地方夺回来给了德国。我把成百万被迫与我们分离而饱受辛酸的德国人领回到了自己的祖国……然而，罗斯福先生，没有流一滴血，没有给我国人民，当然也没有给别国人民带来战争的苦难……
>
> 你的任务，罗斯福先生，比较起来要容易得多。你在 1933 年出任美国总统，我也在那一年出任德国总理。你在发轫之初就是世界上最大最富的国家的首脑……贵国的局面之大，足以使你有时间，有闲暇来注意世界性的问题……你的关心和主张所涉及的地区要比我的地区大得多，因为，罗斯福先生，上苍所命我托生的地区，因而也是我必须为之工作的地区，不幸要小得多，虽然对我来说，它要比任何其他东西更加可贵，因为它完全是我国人民所有的！
>
> 虽然如此，我相信，正是这样，我才能对我们全都关心的事情尽最大的贡献，那就是：全人类的正义，幸福，进步和和平。

就欺骗德国人民这一点来说，这篇演说是希特勒最光辉的杰作。但是对前一些日子里曾在欧洲旅行过的人来说，可以很容易地看得出，它已不像希特勒以前许多演说那样再能欺骗外国的人民和政府了。和德国人相反，他们能够看破这种骗人的迷魂阵。而且他们明白这位德国元首，尽管是辩才无碍而似乎把罗斯福驳得体无完肤，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答复总统的根本问题：他的侵略是否已经到头？它是否要进攻波兰？

从后来的事实来看，这是希特勒一生中在和平时期所作的最后一篇重大的公开演说。迄今为止这个前奥地利流浪汉是尽可能以他的口才来建功立业的，从今以后，他就企图在历史上给自己留下征战者的名声了。

希特勒随后就到伯希特斯加登避暑去了。虽然贝克上校 5 月 5 日在向议会作演说时对他的演说作了答复而且当天又给了德国一份正式的政府备忘录，希特勒对之并没有作公开的答复。波兰的声明和贝克的演说提出了一种语调和解然而立场坚定的庄严答复：

> 十分清楚，[它说]那种只有一个国家提出要求而另外一个国家必须对这些要求照单全收的谈判并不是谈判。

俄国的插手：一

[476]

希特勒在 4 月 28 日对国会的演说中，没有像往常那样攻击苏联。他一个字都没有谈到俄国。贝克上校在答复中提到德国所作的“许多其他暗示”“比表面上谈到的问题含义远为深远”，并且表示保留“在必要时回到这个问题”的权利——话虽说得很含蓄，然而指的显然是德国以前想劝诱波兰参

加反共公约一起对付俄国的企图。不过贝克并不知道，张伯伦也不知道，这些反俄的努力现在已经放弃了，柏林和莫斯科都在酝酿着新的念头。

纳粹德国和苏维埃俄国之间达成后来在全世界产生了巨大后果的谅解一事，在两国首都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采取步骤的，很难确切搞清楚。上面曾经提到，*早在 1938 年 10 月 3 日，也就是慕尼黑会议以后 4 天，就可以微微看出风向开始转变的迹象了。当时德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参赞报告柏林，斯大林将从苏台德问题的解决中（这次解决是把他排除在外的）得出某种结论，很可能变得对德国“ 更加积极 ”。这位外交官竭力主张“ 扩大 ”两国之间的经济合作，而且一个星期以后又在第二份电报中重新提出了这项建议。[①]到 10 月底，德国驻莫斯科大使弗雷德里希・瓦尔纳・冯・德・舒伦堡伯爵通知德国外交部说，他“ 打算在最近的将来去见人民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设法找到解决妨碍德苏关系的问题的办法 ”。[②]鉴于希特勒以往一直对莫斯科抱极端仇视的态度，这种主意很难是大使自己设想出来的。这种暗示想必是从柏林来的。

研究缴获的德国外交部档案的结果表明，事实果然如此。在德国人看来，第一步应当改进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1938 年 11 月 4 日，外交部有一项备忘录透露，“ 戈林元帅办公室催得很紧，至少要设法恢复我们同俄国的贸易，特别是在俄国的原料方面 ”。[③]俄德经济协定到那年年底就要期满了，因此双方就延长这一协定进行了谈判，威廉街这个时期的档案中尽是反映这次谈判过程的材料。双方彼此都有很大的猜疑，但是大体上又都有所接近。12 月 22 日这一天，俄国贸易官员和德国第一流的解决经济问题的老手尤利乌斯・施努尔举行了长时间的谈判。

新年刚过，苏联驻柏林大使亚历克赛・梅利卡洛夫颇为难得地光临威廉街，通知德国外交部“ 苏联希望在德苏经济关系方面[477]开始一个新时代 ”。双方举行了前途似乎大可乐观的谈判有几个星期之久，但是到 1939 年 2 月就几乎完全停顿了。表面上是因为解决不了应当在莫斯科还是在柏林举行主要的谈判的问题，然而德国外交部经济政策司司长 1939 年 3 月 11 日的一份备忘录表明， 真正的理由是：虽然德国急需俄国的原料，而且戈林一直在要求把这些原料弄到手，德国却没有商品来同苏联交换。司长认为，“ 就德国在原料方面所处的地位而言 ”，“ 谈判破裂 ”是“ 极可惋惜的 ”。[①]

但是，即使第一次加强两国经济关系的尝试暂时失败了的话，当时还不乏其他一些迹象。1939 年 3 月 10 日，斯大林在莫斯科第十八次党代表大会上作了长篇演说，3 天之后，用心细密的舒伦堡就为这篇演说给柏林打了一个长长的报告。他认为，“ 斯大林对英国的讽刺和批评要比对所谓侵略国家、特别是对德国的讽刺和批评尖锐得多，这点很值得注意 ”。大使着重举出了斯大林说的这几句话：“ 民主国家的弱点……清楚地表现在它们已经放弃了集体安全的原则而转向不干涉政策和中立政策这一事实上。这个政策骨子里是希望使侵略国转而以其他国家为目标。 ”他还援引苏联独裁者指责西方盟国

[①] 同上，第 4 卷，第 602—7页。

[②] 同上，第 607—8页（1938 年 10 月 26 日电报）。

[③] 同上，第 608—9页。

[①] 同上，第 631 页。

在继续推动德国人东进，容许他们得到可能轻易获得的胜利品，而且劝告他们说：“你们只要对布尔什维克开战就行了，以后一切都会顺遂的。这看来很像是鼓励……看起来目的似乎……是要激起苏联对德国的愤怒……挑拨我们去同德国发生没有根据的冲突。”

在结论中，斯大林提出了下列指导原则：

1.继续实行维护和平和巩固我国和世界各国经济联系的政策。

2.……决不让那些惯于使他人为自己火中取栗的战争贩子把我国拖入到冲突中去。

②

决定俄国大政方针的那个人是在发出明白的警告，声明苏联不打算中别人的圈套，去同纳粹德国打仗而使英法得以脱身。如果伦敦没有注意到这一点的话，至少柏林是注意到了这一点的。*[478]

即令如此，斯大林的演说和随之而来的许多外交往来表明，苏联的外交政策虽然十分审慎，仍然是完全公开的。我们上面曾提到，纳粹在 3 月 15 日占领捷克斯洛伐克 3 天之后，俄国政府就曾建议召开六国会议来讨论防止进一步侵略的办法，[③]可是张伯伦说它还“没有成熟”而把它否定掉了，[④]那是 3 月 18 日的事情。两天以后，莫斯科发表了一项官方公报，否认苏联曾向波兰和罗马尼亚保证“在它们一旦受到侵略时”给予援助。理由是：

“不论是波兰还是罗马尼亚都没有要求苏联政府给以援助，也没有告诉[它]它们遭到任何威胁。”[①]德国大使急急忙忙把这个声明拍电报报告柏林。

英国政府在 3 月 31 日对波兰所作的单方面担保,很可能使斯大林相信英国人认为同波兰人结盟要比同俄国人结盟好，而且张伯伦一心一意要把苏联排除在欧洲大国集团之外，就像他在慕尼黑时代所做的一样。[②]

在这种情况下，德国人和意大利人开始看到了有些空子可钻。现在在外交方面对希特勒已有重大影响的戈林在 4 月 16 日到罗马去见了墨索里尼,并且请那位意大利领袖注意斯大林最近在共产党代表大会上的演说。他自己对苏联独裁者所说“俄国人决不会让资本主义国家利用自己做炮灰”的话印象甚深。他说他“要问一下元首是否有可能谨慎地对俄国放出一些触角……试探有无修好的希望”。他还提醒墨索里尼“在元首最近的一些演说中绝口没有提到过俄国”。据德国方面关于这次会谈的秘密记录记载，意大利领袖热烈地欢迎轴心国家同苏联修好的建议。意大利独裁者[479]也感到莫斯科有一些变化；他认为修好可能“比较容易地实现”。

目标是[墨索里尼说]要诱使俄国大体根据斯大林的演说的方针，对英国的包围政策表示冷淡和不赞成的态度……不但如此，轴心国家在反对富豪政治和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斗争方面，在某种程度上同俄国政府的目标是相同的。[③]

[③] 见本书原文第 460 页。

[④] 哈利法克斯勋爵曾在 3 月 19 日向苏联驻伦敦大使伊凡·迈斯基解释英国为什么认为俄国所提出的最好在布加勒斯特举行会议的建议是“不能接受的”。他说英国政府没有一个大臣抽得出时间到布加勒斯特去。这一拒绝十分明显伤了俄国人的感情，使他们因此而在以后伍次同英国人和法国人的谈判中闹别扭。迈斯基后来告诉保守党议员罗伯特·包思拜说，这次对俄国建议的拒绝对“争取有效的集体安全的政策是又一次毁灭佳的打击”，而且它决定了李维诺夫的命运。

[①]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 6 卷，第 88—89 页。

[②] 同上，第 139 页。

[③] 德国方面 1939 年 4 月 16 日关于戈林与墨索里尼会谈的报告，同上，第 259—60 页。

这在轴心国家政策方面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毫无疑问，要是张伯伦知道了的话，他一定会吃惊的。也许这也会使李维诺夫吃惊。

就在戈林和墨索里尼会谈的当天（4 月 16 日），这位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在莫斯科接见了英国大使，并且正式建议英国和法国同苏联缔结三边互助条约。这个条约要求缔约国签订一项军事协定来使互助条约具有实效，还要求由签字国（如果认为合适的话，还可以加上波兰），对中欧和东欧所有认为自己受到纳粹德国威胁的国家作出担保。这是李维诺夫最后一次努力争取三国结盟对付第三帝国，这位俄国外交部长是把自己的政治生涯押在以集体行动制止希特勒的政策上的，他这次一定认为自己终将能够把西方民主国家同俄国团结起来以实现这一政策的目的。正如在 5 月 4 日发表演说、抨击伦敦迟迟不接受苏联建议的丘吉尔所说，“ 如果没有俄国的积极协助，要组成一条反对纳粹侵略的东方战线是决不可能的 ”。东欧任何其他国家（肯定包括波兰在内）都没有在那个地区维持一条战线的力量。然而俄国的建议却竟然在伦敦和巴黎引起了惊愕。

但是，甚至在这一建议被拒绝以前，斯大林就采取了第一步认真的行动，同另一方面打起交道来了。

在李维诺夫向英国驻莫斯科大使提出内容广泛的建议的第二天，即 4 月 17 日，苏联驻柏林大使就前往德国外交部拜访了威兹萨克。据这位国务秘书在事后的纪要中说，这是梅利卡洛夫将近一年以前上任以来第一次来访。在开头就德俄经济关系谈了一些意见以后，大使就转到政治方面来，并且

> 直截了当地问我[威兹萨克写道]对德俄关系抱什么看法……大使的话大致如下：
>
> 俄国的政策是始终一贯的。主义上的分歧对俄国和意大利之间的关系并 694 没有发生多大不利的影响，也不应当妨碍它同德国的关系。俄国并没有利用德国和西方民主国家之间的摩擦来反对我们，它也不想这样做。就俄国而论，[480]它没有理由不该同我们在正常基础上相处，而从正常的关系之中就可以产生越来越改善的关系。
>
> 梅利卡洛夫先生是以这番话（这是他这次谈话的最终目标）来结束这次会谈的。他打算在一两天内回莫斯科去。[①]

在这位苏联大使要到那里去述职的俄国首都，正在酝酿着一件非常的事情。

事情在 5 月 3 日透露了出来。这一天，在苏联报纸里页，一个不引人注意的地方，在叫做“ 简讯 ”的一栏里面，夹着一条短短的消息：“ 李维诺夫已因为他自己的请求而被解除了外交人民委员的职务。 ”他的职位由人民委员会主席维亚契斯拉夫 · 莫洛托夫继任。

第二天，德国代办就这次人事更动向柏林作了如下的报告：

> 这次突然更动在此间引起了最大的惊奇，因为李维诺夫正在同英国代表团谈判，而且在五一节的捡阅中就站在斯大林的近旁……
>
> 因为李雏诺夫刚在 5 月 2 日接见了英国大使，而且就在昨天的报纸上还出现在五一节检阅的要员席名单中，他的免职看起来一定是斯大林自己临时决定的……在上一次党代表大会上，斯大林曾要求人们小心，免得苏联被人拖入冲突。莫洛托夫不是犹太人，而且以斯大林“ 最亲密的朋友和最紧密的合作者 ”著称。他的任命显然是为了要保证使外交政策能严格按照斯大林制定的路线执行。[②]

[①] 同上，第 266—67 页。

[②] 同上，第 419—20 页。

李维诺夫突然免职一事的重要性是谁都看得到的。这意味着苏联外交政策有了剧烈的转变。李维诺夫是鼓吹集体安全，鼓吹加强国际联盟的力量，鼓吹以同英国和法国结盟对付德国来保障俄国安全的主要人物。张伯伦在缔结这样一种同盟的建议面前迟疑退缩，注定了这位俄国的外交人民委员的命运。照斯大林的判断——而在莫斯科只有他的判断才能算数——李维诺夫的政策已经失败了。不但如此，这种政策还有使苏联被拖到一场同德国进行的战争中去的危险，而西方民主国家却很可能设法置身局外。斯大林因此感到现在是该试一试新方针的时候了。”如果张伯伦能同希特勒拉关系的话，难道这位俄国独裁者就不能吗？至于李维[481]诺夫这个犹太人被(德国大使馆在致柏林的电报中着重指出不是犹太人的）莫洛托夫所代替这一事实，可以想象在高级纳粹人士中是会有相当影响的。

为了使德国人不致于看不到这一人事更动的重要性，苏联代办格奥尔基·阿斯塔霍夫在 5 月 5 日同德国外交部东欧经济问题专家尤利乌斯·施努尔博士会谈时也提到了这件事情。

> 阿斯塔霍夫谈到了李维诺夫免职的事情[施努尔报告说]并且设法……打听这件事情是否会引起我们对苏联的态度的改变。他着重指出莫洛托夫的身份具有极重要的意义。他决不是在外交政策方面的一个专家，然而他却会对未来的苏联外交政策起更大的作用。[①]

这位代办也请德国人恢复在 2 月间破裂了的贸易谈判。

英国政府对苏联 4 月 16 日关于缔结军事联盟的建议直到 5 月 8 日才答复，而答复实际上是拒绝。它使得莫斯科更加怀疑张伯伦不愿意同俄国缔结军事条约来防止希特勒取得波兰。

因此，俄国人也就无怪要加紧同德国人拉关系了。5 月 17 日，阿斯塔霍夫再次到外交部见了施努尔，在讨论过有关贸易的问题以后，就把话题又转到了更大的问题上。

> 阿斯塔霍夫宣称[施努尔报告说]德国和苏联之间在外交政策上并没有冲突，因此在两国之间并没有抱敌意的理由。确实，在苏联有一种受德国威胁的感觉。但是，毫无疑问，这种受威胁的感觉和在莫斯科的不信任心理是有可能消除的……在回答我偶然问到的一个问题时，他谈到了英苏谈判，大意是说，照目前的情况看来，英国所希望的结果很难成为现实。[②]

3 天以后，到 5 月 20 日，冯·德·舒伦堡大使同莫洛托夫在莫斯科作了一次长谈。新上任的外交人民委员态度“至为友好”，并且告诉德国大使，如果能建立必要的政治基础的话，两国之间的经济谈判是可以恢复的。这是莫斯科的一种新的试探，然而老奸巨猾的莫洛托夫做的却非常审慎。当舒伦堡问他所谓“政治基础”是什么意思时，这位俄国人回答说，这是两国政府都该考虑[482] 的东西。大使用尽一切办法想从这位足智多谋的人民委员嘴里套出点东西来，结果都是枉然。“他是”，舒伦堡告诉柏林说，“以态度有点顽强著称的。”大使在离开俄国外交部的时候，乘便去看了一下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弗拉季米尔·波将金，告诉后者，他没有能搞清楚莫洛托夫要的政治性质的东西是什么。舒伦堡报告说，“我请波将金先生帮我搞清楚”。[①]

[①] 同上，第 429 页。

[②] 同上，第 535—36 页。

[①] 《纳粹—苏联关系（1939—1941 年）》，第 5—7，8—9 页。

柏林和莫斯科之间重新恢复接触一事，并没有逃过法国驻德大使的警惕的眼睛。早在 5 月 7 日，在李维诺夫免职以后 4 天，考仑德雷先生就报告法国外交部长，根据元首的一个亲信告诉他的消息，德国正在设法与俄国取得谅解，其结果，除了别的不谈，将意味着波兰的第四次瓜分。两天以后，法国大使又给巴黎发出了一个电报，谈到柏林新近谣传“ 德国已经或者即将向俄国提出瓜分波兰的建议 ”。[②]

钢铁盟约

虽然德国武装部队的高级将领对意大利的军事实力评价很低，希特勒现在却急于要同意大利成立军事同盟，而墨索里尼却一直不忙于缔结。两国最高统帅部参谋人员之间的谈判从 4 月份起就已经开始了，凯特尔向最高统帅部报告他的“ 印象 ”是，无论是意大利的部队还是它的军备，情况都不佳。他认为，要打仗就得当机立断，要不然意大利人就不会参加了。[③]

到 4 月中旬，齐亚诺在日记里说，[④]他觉察到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德国随时都可能进攻波兰，从而掀起一场意大利思想上并无准备的欧洲大战。他对此颇为震惊。4 月 20 日，在柏林的阿托利科大使打电报告诉齐亚诺说，德国对波兰的行动已“ 迫在眉睫 ”以后，齐亚诺就催大使赶快安排他同里宾特洛甫的会谈，好让意大利不致弄得措手不及。

5 月 6 日，两位外交部长在米兰会面了。齐亚诺带来了墨索里尼的书面指示，向德国人强调指出意大利至少在 3 年之内希望避免战争，大出意大利人意外的是，里宾特洛甫同意德国也希望能维持这么久的和平。说真的，齐亚诺觉得那位德国外交部长还是“ 第一次 ”那样“ 心平气和，轻松愉快 ”。他们研究了欧洲的形势，同意改进轴心国同苏联的关系，然后休会进晚餐，庆祝会谈成功。

晚餐以后，墨索里尼来了电话，要了解会谈进行得怎么样。齐亚诺告诉他进行得很顺利，这时，意大利领袖突然心血来潮，要他的女婿向报界发表一项公报，宣布德国和意大利已决定缔结军事同盟。里宾特洛甫开头有些犹豫，最后同意把这件事情向希特勒请示，而德国元首一接到电话以后，马上就同意了墨索里尼的[483] 建议。[①]

这样，墨索里尼在经过一年多的徘徊犹豫以后，就在这一时冲动之下，把自己同希特勒的命运无可改变地结合到一起了。这件事情也是一个最早的迹象，表明这位意大利的独裁者，同德国的那位一样，已开始丧失那种铁一般的自制力。而直到 1939 年这一年为止，他们两个人都一直是靠这种自制能力来冷静清醒地谋求自己的民族利益的。对墨索里尼说来，后果很快就证明是一场灾难。

这个条约后来被称为“ 钢铁盟约 ”。它是 5 月 22 日在柏林总理府以相当

[②] 《法国白皮书》，第 123，125 号电报。我采用了法文本，但我相信英文本编号相同。

[③]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 6 卷，第 1，111 页。本卷附录 I 中有一些根据德国海军档案的参谋会议备忘录。

[④] 《齐亚诺日记》，第 67—68 页。

[①] 米兰会议德国方面纪录，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 6 卷，第 450—52 页。齐亚诺的记录，见《齐亚诺外交文件集》，第 282—87 页。

盛大的排场签订的。齐亚诺赠给里宾特洛甫一枚阿农齐亚塔颈章。它不但使得戈林妒火中烧，而且，据意大利外长的观察，还使得他差一点眼泪都流了出来。事实上，这位肥头胖耳的元帅硬是闹了一场，大发牢骚说这个颈章实际上应当赠给他，因为真正促成了这一同盟的是他。

“我答应[德国驻罗马大使]马肯森，”齐亚诺报告说，“我会设法给戈林弄到一枚颈章。”

齐亚诺发现希特勒看起来“身体甚好，举止安详，不那么咄咄逼人”。虽然他看起来似乎老了一些，眼角周围的皱纹也似乎更深了一些，这很可能是因为缺乏睡眠的缘故。*当元首看着两位外交部长在文件上签字的时候，他的精神极好。

这是一个措辞直率的军事同盟条约。它的侵略性质突出地表现在希特勒一定要放在序言里的一句话上。这句话说：两国“为它们的主义的内在的血缘关系团结在一起……决心并肩协力行动以取得它们的生存空间”。条约的核心是第三条。

> 如果违反缔约双方的愿望而发生其中有一方陷入与另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的军事纠纷之中的情况，则另一个缔约国应立即以盟国的身份以其全部军事力量在地面、海上和空中予以援助和支持。

第五条规定在一旦发生战争时，两国中的任何一国都不得单独停战或媾和。[①]

后来的事实证明，墨索里尼打开头就没有遵守前一条，而到结局的时候也没有遵守后一条。

希特勒破釜沉舟：1939 年 5 月 23 日

[484]

在钢铁盟约签字的次日，5 月 23 日，希特勒就把他的军事首脑召到了柏林总理府的书房里，直率地告诉他们，若不流血就不可能再取得什么胜利，因此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这次会议比 1937 年 11 月 5 日同样的一次会议要大一些，那一次元首首次把他要进行战争的决定告诉了三军首长。*这一次在场的军官有 14 人，其中包括陆军元帅戈林，海军元帅雷德尔（现在他已晋级元帅），勃劳希契将军，哈尔德将军，凯特尔将军，空军总监埃哈德·米尔契将军，海军参谋长奥托·施尼温海军上将等。元首的副官鲁道夫·施蒙特中校也在场；而且从历史的观点来说，值得庆幸的是，他作了记录。在缴获的德国文件中就有他的这项记录。十分明显，希特勒在这次会议上讲的话是当作头等机密的，因此没有誊录任何副本；我们所引用的是施蒙特手写的原稿。[①]

在说明希特勒如何走向战争的秘密文件中，这是最能说明问题也是最重要的文件之一。在一小撮将在一场武装冲突中指挥武装部队的军官面前，希

[①] 同盟条约全文，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 6 卷，第 561—64 页。秘密议定书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

[①] 施蒙特 1939 年 5 月 23 日的记录，见《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 7 卷，第 847—54 页（纽伦堡文件 L—79）。英译文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 6 卷，第 574—80 页。德文全文见《主要战犯的审讯》，第 37 卷，第 546—56 页。

特勒抛开了他自己那一套宣传和外交上的欺骗，老实说明了他为什么一定要进攻波兰，而且在必要时还要对英国和法国作战。他以令人咋舌的精确性，对战争的进程，至少是头一年的战争进程作了预言。但是尽管他讲得十分干脆率直，他的演说——这次会上只有这位独裁者一个人说话——仍然透露出他迄今为止还没有完全表现出来的心里的惶惑和混乱。尤其是， 英国和英国人总是使他感到摸不透，这种情况一直要继续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天。

但是关于战争在什么情况下到来以及他在发动战争时的目标，他是说得十分清楚十分确切的,没有哪一个陆海军将领在 5 月 23 日离开总理府的时候心里还不明白到夏天完了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一开头就说，德国的经济问题只有在欧洲取得更多的生存空间后才能解决，而“ 如果不侵略或者不进攻其他国家人民的领土，这是办不到的 ”。

> 不流血已再也不能取得新的胜利了……
>
> 但泽根本不是争执的中心问题。中心问题是要把我们的生存空间向东方扩张，是要得到我们的粮食供应，是要解决波罗的海国家的问题……在欧洲已没有别的出路……如果命运强迫我们同西方摊牌的话，能在东方拥有大片地区就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我们在战时要比在平时更难依靠丰收。

除此而外，希特勒还说，还可以从东方非日耳曼国家的领土[485]上的居民那里得到劳动力——这里已经露出了他后来实施的奴隶劳动制度的端倪。

以谁为第一个对象是十分明显的。

> 根本不存在放过波兰的问题，我们只有一个决定要做：
>
> 一有合适的时机就进攻波兰。*
>
> 我们不能期望重演捷克事件。这次得打仗了。我们的任务是孤立波兰。能否把它孤立是有决定性意义的。

这样，这次是得打仗了。是不是同“ 被孤立了的 ”波兰一国打呢？元首在这一点上并没有说清楚。事实上，他显得思想有点混乱，而且自相矛盾。他说，最后发动攻击的命令必须由他来下。

> 决不能同时同西方——法国和英国——摊牌。
>
> 如果不能肯定德波冲突不致导向同西方作战的话，那末，战斗主要应当针对英国和法国。
>
> 因此根本问题是：（以进攻波兰开始的）同波兰的冲突只有在西方国家置身事外的条件下才能取胜。
>
> 要是不能办到这一点的话，最好一面同西方干起来，一面把波兰结束掉。

在听到这种连珠炮式的前后矛盾的话的时候，那些将军们想必曾感到犹豫畏缩，也许松了一松他们的单镜片，虽然在施蒙特的记录里并没有说到发生过这种事情，也没有说到在这批经过挑选的听众中有人胆敢提出问题，要求把事情说得明白一些。

希特勒接着把话题转到了俄国。他说，“ 俄国也许不想过问消灭波兰的事情，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 ”。另一方面，如果苏联同英国和法国结盟的话，“ 那就将使我给英国和法国来几下破坏性的打击 ”。这将是重犯威廉二世在 1914 年所犯的错误，但是，虽然在这次演说中，希特勒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得出了若干条教训，他却并没有得出这一条。他的思路现在转到了英国身上。

> 元首怀疑有同英国实行和平解决的可能。必须对摊牌有思想准备。英国把我国的发展看成将形成一种称霸的局面而削弱英国的地位。因此英国是我们的敌人，同英国的冲突是生死斗争。

这种冲突究竟将是什么样的一种局面呢？*

英国不可能用几次有力的打击就把德国结束掉，把我们打倒。对英国来[486]说，把战争尽可能推进到鲁尔区一举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他们将不惜流法国人的血。(西壁呢！）我们能存在多久，决定于我们能否保有鲁尔。

在下定决心蹈德皇之覆辙——如果英法同俄国结盟就向它们进攻——以后，希特勒现在宣布，他还将在另一点上步德皇之后尘，这一点最后证明给德国带来了大祸。

必须对荷兰和比利时的空军基地实行军事占领。中立的宣告可以置之不顾。如果英国想干涉波兰战争的话，我们就必须对荷兰进行闪电式的进攻。我们的目标是必须在荷兰境年建立一条新的防线，一直推到须德海。对英法的战争是一场决定生死存亡的战争。

认为我们可以侥幸取胜的想法是危险的；这种可能性是没有的。我们必须破釜沉舟，有进无退，而且它将不再是谁是谁非的问题，而是 8000 万人民生死存亡的问题。

虽然他刚刚宣布德国将“一有合适的时机”就进攻波兰，虽然他的听众知道几乎德国的全部军事力量都已集中起来要达到这个目的，希特勒一边唠唠叨叨，一边还是忘怀不了英国。

“英国，”他强调说，“是反对德国的主力。”从此开始，他就讨论起英国的长处和短处来了。

英国人的本性是骄傲、勇敢、顽强、坚忍的，而且是天生的组织家。他们懂得如何利用每一种新形势。他们爱好冒险，而且有着北欧人种固有的胆略……

英国本身就是一个世界大国：300 年来一直如此，它的力量由于有盟国而更加强大。这种力量不但表现在具体的东西上，而且还必须看到是一种心理上的力量，它遍布整个世界。

除此而外，还有无可估量的财富以及随之而来的偿付能力。

还有地缘政治上的安全地位，而且受到强大的海军和英勇的空军的保护。

但是，希特勒告诉他的听众说，英国也有它的弱点，接着他就一一列举如下：

要是我们在上次大战中再多两艘战斗舰和两艘巡洋舰，而且从早晨就开始日德兰战役的话，英国舰队早就被歼灭，英国早就屈服了。*世界大战就会那样结束。在从前……要征服英国就必须派兵入侵。因为当时英国可以自给粮食，今天它再也办不到了。

一旦英国的供应被切断，它就将被迫投降。因为粮食和石油的进口完全要靠海军保护。

德国空军袭击英国不会迫使它投降。但是如果英国舰队被歼灭的话，它[487] 就会立即投降。没有疑问，突然袭击可以迅速决定大局。

拿什么来进行突然袭击呢？雷德尔海军元帅肯定会认为希特勒是在吹牛。按照 1938 年年底制定的所谓 Z 字计划，德国的海军力量要到 1945 年才能开始赶上英国。而当时在 1939 年的春天，德国还没有足以击沉英国海军的重型军舰，即使突然袭击也不行。

也许英国还可以用别种办法来加以打垮。这里希特勒倒又是实事求是的，他提出了一项战略计划，一年之后，这项计划居然一一实现，而且获得了惊人的成功。

必须要做到在一开始就猛击敌人或者给以最后的决定性的打击。关于谁是谁非，条约义务之类的考虑可以根本不去管它。这只有当我们在波兰问题上没有“滑入”对英作战的情况下才能做到。

必须既为长期战争也为突然袭击进行准备，英国在大陆上可能进行的任何干涉都必须予以击溃。

陆军必须占领对海军和空军有重要意义的基地。如果我们能占领并且保住荷兰和比利时同时打败法国的话，就创造了能够战胜英国的基础。

这样，空军就能从法国西部就近封锁英国，而海军就能以潜艇作范围更广的封锁。

一年多以后发生的情况竟然同他所说的完全一样。元首在 5 月 23 日还着重提出另一个决定性的战略计划也要付诸实行。他说，如果德军在上次大战开始的时候不向巴黎进攻而向英吉利海峡各港口迂回包抄的话，战争的结局就会不同。也许是那样。无论如何他要在 1940 年这样试一试。

希特勒在结束的时候说：“ 目标永远是要逼得英国屈膝投降。 ”他显然已经暂时完全把波兰抛到脑后了。

还有一个最后的考虑。

保密是成功的决定性前提。我们的目标必须对意大利和日本保守秘密。

就是希特勒自己的陆军参谋总部，虽然它的参谋总长哈尔德将军也坐在那里静听，都没有受到完全的信任。元首宣布，“ 我们的计划工作决不能交给参谋总部，那样秘密就无法保证了 ”。他下令最高统帅部成立一个计划小组来制定各项军事计划。

这样，希特勒就在 1939 年 5 月 23 日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下[488] 定了破釜沉舟的决心。仗是打定了。德国要在东方取得生存空间。为此，在一有机会的时候就要进攻波兰。但泽算不了一回事。那不过是一个借口。英国是主要的障碍，它是反对德国的主力。好，连它一起搞掉拉倒，法国也一样。这是一场生死斗争。

当 1937 年 11 月 5 日元首第一次对他的三军首脑讲起他的侵略计划的时候，冯 · 勃洛姆堡元帅和冯 · 弗立契将军曾提出过抗议——至少是认为德国没有力量打一场欧洲大战。*第二年夏天，贝克将军为了同样的理由辞去了陆军参谋总长的职务。但是在 1939 年 5 月 23 日，至少从记录上看，竟没有任何一个陆海军将领敢吭一声，对希特勒的方针是否明智提出任何疑问。

他们看到，他们的工作不是提出疑问，而是盲目服从。他们早已运用他们的大才制定军事侵略的计划了。早在 5 月 7 日，同冯 · 伦斯德将军和冯 · 曼施坦因将军一起组成一个“ 工作小组 ”的陆军参谋总部的古恩特 · 勃鲁门特里特上校，就已经就实行白色方案可能遭遇的形势提出一项估计。事实上它就是征服波兰的计划。这是一个设想大胆的计划，后来在实际执行中只作了很少的改动。[①]

雷德尔海军元帅在 5 月 16 日签发的一项绝密命令中提出了白色方案的海军作战计划。[②]因为波兰只在但泽以西沿波罗的海有几英里的海岸线，而且只有一支极小的海军，因此并没有估计会遭到什么困难。元帅所主要担心的是法国和英国。波罗的海的门户将由潜艇布防。两艘袖珍战斗舰和两艘战斗舰准备同“ 其余的 ”潜艇一起在“ 大西洋作战 ”。根据元首的指示，海军应当准备好在 9 月 1 日执行“ 白色方案 ”所规定给它的任务。但是雷德尔催他属下的司令官赶紧把计划定好，因为“ 由于最近的政局发展 ”，行动可能来得更快。[①]

[①] 计划详情，见纽伦堡文件 NOKW—2584。载《战犯的审讯》。

[②] 《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 6 卷，第 926—27 页（纽伦堡文件 c—120）。

[①] 《主要战犯的审讯》，第 34 卷，第 428-42 页（纽伦堡文件 C-126）。这个文件的英译文载《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 6 卷，第 937-38 页，但删节过多，无甚价值。

在 1939 年 5 月完了的时候,德国预定在夏末开始战争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在全力进行了。巨大的军火工厂日夜开工，紧张地生产着枪炮、坦克、飞机和军舰。陆军、海军、空军的能干的参谋人员拟订计划的工作已经进入最后一个阶段。部队也因为征召新人进行 “ 夏季训练 ” 而扩大了。希特勒看到他所取得的成就大可心满意足了。

在希特勒向他的军事首脑讲话的第二天，5 月 24 日，最高统帅部经济与军备局局长格奥尔格 · 托马斯将军在对外交部工作人员所作的一次内部报告中就曾列举了这些成就。托马斯告诉他的[489] 听众，从前的帝国陆军花了 16 年的时间——从 1898 年到 1914 年——才把兵力从 43 个师增加到 50 个师，而第三帝国的陆军在 4 年之内就从 7 个师一跃增加到 51 个师。其中有 5 个重装甲师，4 个轻装甲师，一支任何其他国家都没有的 “ 现代化骑兵 ” * 。海军在几乎是一无所有的基础上建立了一支有两艘 26000 吨的战斗舰,[3]两艘重巡洋舰，17 艘驱逐舰和 47 艘潜水艇的舰队。它已经有两艘 35000 吨的战斗舰，1 艘航空母舰，4 艘重巡洋舰，5 艘驱逐舰，7 艘潜艇下了水，而且还在计划造多得多的舰艇。空军从完全一无所有开始，白手成家建立了一支有飞机 21 个中队、人员 26 万人的力量。至于军火工业，托马斯将军说，已经在生产比它在上次大战产量最高的时期还要多的军火，而且在大部分部门内，产量远远超过任何其他国家。这位将军宣布，事实上，德国重整军备的总成绩 “ 在世界上很可能是独一无二的 ” 。

尽管德国的军事力量在 1939 年夏初已经十分强大,希特勒计划在秋初进行的战争能否取胜还要看这是一场什么样的战争。德国仍然还没有也许永远不会强大到能打败法国、英国和俄国再加上波兰的联合力量。在这个决定命运的夏天开始的时候，一切都决定于元首有没有能力限制战争的范围——首先是，使俄国不致同西方结成军事同盟。这种军事同盟是李维诺夫刚在他下台以前还曾建议过的，而且是张伯伦虽然在最初似乎已予以拒绝但到 5 月底的时候又在重新考虑的。

俄国的插手：二

在下院 5 月 19 日的辩论中,英国首相继续对苏联建议采取了被丘吉尔认为是冷淡甚至不屑的态度。他有点懒洋洋地向下院解释说，“ 在两国政府之间有一道幕，或者说一道墙，极难穿过 ” 。另一方面，丘吉尔在劳合 · 乔治的支持下争论说，莫斯科提出了一个 “ 公平的建议 ” ……比张伯伦自己的建议要 “ 更简单，更直接，更有效 ” 。他请英王政府 “ 给脑袋里装上点儿残酷的现实。如果没有一条有效的东方战线，就不可能在西方有令人满意的防务，而[490] 如果没有俄国，就不可能有一条有效的东方战线 ” 。

张伯伦在四面八方暴风雨般的批评之下只得屈服,最后在 5 月 27 日指示英国驻莫斯科大使表示同意开始谈判互助条约、军事条约和对受希特勒威胁的国家作出担保。*冯 · 狄克森大使从伦敦通知德国外交部，英国政府虽然采

---

[3] 在谈到德国战斗舰的吨位的时候，托马斯将军甚至是在欺骗德国外交部。有一份日期标明为 1938 年 2 月 18 日的德国海军文件很有意思地提到，曾根据英德海军协定把假的战斗舰吨位数字提供给英国政府。它说，号称 26000 吨的舰只，实际吨位是 31300 吨；号称 35000 吨的战斗舰（这是英国和美国海军舰只的最高吨位），实际吨位是 41700 吨。这是纳粹骗术的一个绝妙的典型。

取这一步骤，心里是“老大不愿意的”。不但如此，狄克森还看穿了很可能是张伯伦所以采取这一行动的主要理由。他在发给柏林的急电中报告说，英国外交部已经得到“德国在莫斯科伸出触角”的风声，并且害怕德国可能会做到使苏俄保持中立甚至诱使它保持同情的中立。那样就将是包围政策的彻底瓦解。②

5 月份的最后一天，莫洛托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以外交人民委员的身份作他上任以后的第一次演说，他痛斥西方国家犹豫不前，并且宣告，它们要是认真想同俄国一起制止侵略的话，就必须抛开枝节问题，在 3 个主要点上达成协议：

1.缔结一项纯属防御性质的 3 边互助条约。

2.对中欧和东欧的国家，包括所有与苏联接壤的欧洲国家在内，作出担保。

3.缔结一项明确的协定，规定 3 国彼此间提供并且向受到侵略威胁的小国提供的即时而有效的援助的形式和范围。

莫洛托夫还宣布,同西方谈判并不意味着俄国将放弃同德国和意大利‘从实际出发建立商务联系”。他说，事实上，可能同德国恢复商务谈判的问题“并非不在考虑之中”。冯·德·舒伦堡大使在向柏林报告这篇演说内容的时候指出，莫洛托夫表示俄国仍然准备同英国和法国缔结条约，“条件是必须接受它的全部要求”，但是从这篇演说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出，还得花很长的时间才能达。他指出莫洛托夫曾“避免刺激德国并且表示愿意继续进行已在柏林和莫斯科开始的谈判”①

希特勒在柏林现在也突然表示出愿意继续谈判了。

5 月份最后的 10 天，希特勒和他的顾问们想尽了千方百计，要解决如何向莫斯科提出建议来阻挠英俄谈判的棘手问题。莫洛托夫在 5 月 20 日同冯·德·舒伦堡大使的谈话* 给柏林的感觉[491]是给德国泼了冷水。第二天（5 月 21 日），威兹萨克就打电报给大使说，鉴于外交人民委员说的话“我们必须静坐等待，看俄国人是否会说得更明白点”。②

但是希特勒已经把 9 月 1 日规定为进攻波兰的日子，因而无法静坐等待了。在 5 月 25 日或者这一天前后，里宾特洛甫把威兹萨克和德国外交部法律司司长弗雷德里希·高斯召到了他在佐内堡的乡间别墅，（据高斯在纽伦堡提出的口供④说）告诉他们，元首想“在德国和苏联之间建立比较过得去的关系”。里宾特洛甫写好了一个给舒伦堡的指示草稿，相当详细地说明了他应当对莫洛托夫采取的新路线，并且要他立即去见莫洛托夫，“越快越好”。这份草稿现在也在缴获的德国外交部文件中。③

根据文件上面的一个批注来看，这项文件是 5 月 26 日交给希特勒的。它

---

② 5 月 31 日“急”电，见《德国外交政 策文件汇编》，第 6 卷，第 616—17 页。

① 6 月 1 日电报，同上，第 624—26 页。

② 同上，第 547 页。

④ 此项口供曾遭到纽伦堡法庭的拒绝，未被当作书面证据，也未收入《纳粹的阴谋与侵略》（《NaziConspiracyandAggression》）或者《主要战犯的审讯》《《Trial oftheMajOrWarCriminals》）的几大卷书面证据集。然而这并不能损害其真实性。法庭对一切涉及纳粹—苏联在这一时期的合作的文件都处理得十分谨慎，4 位法官中有一位是俄国人。

③ 同上，第 589—93 页。

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材料。它表明，到这一天，德国外交部还深信，英俄谈判可以成功，除非德国进行决定性的干涉。里宾特洛甫因此建议舒伦堡告诉莫洛托夫：

德国和苏俄之间在外交事务方面并不存在着实际的利害对立……现在是考虑使德苏关系和平化和正常化的时间了……意德同盟并不是针对苏联的，它完全是针对英法联盟的……

如果事与愿违，我们竟致同波兰发生冲突的话，我们坚定地相信，就是这样的事情也完全毋需引起对苏饿的利害冲突……我们甚至可以说到这样的地步，在解决波德问题的时候，不论解决的方式如何，我们将尽可能考虑到俄国的利益。

下面接着就要指出俄国同英国结盟的危险。

我们还看不出有什么东西能真正诱使苏联积极参加英国的包围政策……这意味着俄国要承担单方面的义务而得不到英国任何真正有价值的报[492]酬……不论条约怎么订法,英国都无法给予俄国任何真正有价值的报酬。由于西壁的存在，一切西欧的援助都是不可能的……我们因此深信，英国将再次遵行它的传统政策，让其他国家为它火中取栗。

舒伦堡还得强调说明德国“对俄国没有任何侵略意图”。最后，他还奉命告诉莫洛托夫，德国不但准备同苏联讨论经济问题，而且还准备同它讨论“在政治关系方面恢复正常”的问题。

希特勒认为这份草稿说过了头，因此下今留下不发。据高斯说，元首对两天以前张伯伦在 5 月 24 日的乐观声明印象甚深。首相当时告诉下院说，由于英国提出新建议的结果，他希望“不久”就可以同俄国达成全面的协议。希特勒害怕的是碰钉子。他并没有放弃同莫斯科修好的想法，但是决定暂时还是以采取比较谨慎的态度为好。

5 月份最后一周之内，元首心中的逡巡犹豫，在缴获的德国外交部文件中也有记载。5 月 25 日或者这一天前后——确切的日期无法确定——他突然主张立即同苏联谈判来阻挠英俄谈判。舒伦堡为此要立刻去见莫洛托夫。但是里宾特洛甫给他的指示在 5 月 26 日给希特勒看了以后根本没有发出去。元首把它取消了。那天晚上，威兹萨克打电报给舒伦堡，要他保持“完全保留的态度——你个人在得到进一步的指示以前不能采取任何行动”。①

德国外交部国务秘书给驻莫斯科大使的这份电报和一封信都是 5 月 27 日写好的，然而直到 5 月 30 日加上一段重要的附言以后才发出去。这很足以说明柏林的犹豫。②威兹萨克在 5 月 27 日给舒伦堡写信的时候告诉他，柏林的看法是英俄协议“很不容易防止”，因此德国徘徊犹豫，不想对之进行决定性的干涉，因为害怕那样会在莫斯科引起“一阵鞑靼人的大笑”。此外，国务秘书还透露，日本和意大利对德国打算在莫斯科采取的行动反应冷淡，盟国的这种保留态度也对柏林产生了影响，使它决定静观待变。他最后说，“因此，我们现在还想观望一下莫斯科和巴黎—伦敦相互间的关系到底搞到多深”。

由于某种理由，威兹萨克并没有把他的信立即发出；也许他觉得希特勒还没有完全打定主意。当他到 5 月 30 日发出这封信的时候,他加了一个附言。

附言：除以上所写的而外，我还必须再说几句。元首已经批准，即令如上所述，现在还得同俄国人进行一次联系，虽然是一次十分有限的联系。这件事将通过我今天同俄国代办谈话来进行。[493]

这次同格奥尔基·阿斯塔霍夫的谈话并没有太多的收获，但是它表明德

---

① 同上，第 593 页。

② 威兹萨克 5 月 27 日给舒伦堡的信和 5 月 30 日的附笔，同上，第 597—98 页。

国人作了一番新的尝试，威兹萨克召见俄国代办的借口是讨论苏联驻布拉格贸易代表团的前途。俄国人渴望继续保持这个代表团。两位外交家围绕这个题目兜来兜去，想摸对方的底。威兹萨克说，他同意莫洛托夫所说，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不能截然分开，并且表示对“苏德关系正常化”感兴趣。阿斯塔霍夫说，莫洛托夫并不打算“把今后的苏德谈判关上大门”。

虽然两个人都小心翼翼，德国人还是感到受了鼓励。在 5 月 30 日晚上 10 点 40 分，威兹萨克给在莫斯科的舒伦堡发出了一份“特急”电报：[①]

同迄今为止所采取的策略相反，我们现在已最后决定同苏联进行某种程度的接触。*

也许是墨索里尼在5月30日给希特勒的一份长长的秘密备忘录加强了元首转向苏联的决心，虽然这种转向是十分谨慎的。在夏季开始的时候，意大利领袖对于很快就开战的主意是否明智越来越感到怀疑。他对希特勒说，轴心国家“同富豪统治的、自私自利的。保守主义的国家之间的战争”，他认为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意大利需要有一个准备的时期，时间可能要延长到 1942 年年底……只有从 1943 年开始，进行战争的努力才能有最大的成功希望”。在列举了为什么“意大利需要有一段和平时期”的一些理由以后，意大利领袖的结论是：“由于所有这些理由，意大利不希望匆促进行欧洲大战，虽然它深信这样的大战是不可避免的。”[①]

希特勒还没有把他已经决定在 9 月 1 日进攻波兰的秘密告诉他这位好友与盟友。他回答说，他以“最大的兴趣”读了墨索里尼的秘密备忘录，并且建议两位领袖在将来会面时进行讨论。同时，元首决定试一试能不能在克里姆林宫墙上撬开一条缝。6 月份[494]整整一个月，德国大使馆和俄国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阿那斯塔斯·米高扬之间一直在莫斯科进行关于签订新贸易协定的预备性谈判。

苏联政府对柏林仍然是十分猜疑的。据舒伦堡在 6 月 27 日给柏林的报告，克里姆林宫认为德国人之所以迫切要谈判贸易协定，是想破坏俄国同英法的谈判。他告诉柏林说：“他们害怕一等到我们达到了这个目的，我们就会让谈判慢慢不了了之。”[②]

6 月 28 日，舒伦堡同莫洛托夫作了长谈。据他在给柏林的一份“急密”电里说，这次谈话是“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虽然如此，当德国大使以一种向对方提保证的口吻谈到德国刚刚同两个波罗的海国家缔结的互不侵犯条约* 时，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尖刻地回答说：“鉴于波兰的经验，他必须怀疑这种条约的持久性。”舒伦堡对这次谈话的结论是：

我的印象是，苏联政府对了解我们的政治观点和同我们保持接触感到很大的兴趣。虽然莫洛托夫所说的话，毫无问题地表现出强烈的不信任，他还是说同德国关系的正常化是值得欢迎的，也是可能的。[①]

大使要求用电报指示他下一步该怎么办。舒伦堡是西克特、马尔赞、勃洛克道夫—伦佐派硕果仅存的人物。这一派在 1919 年以后一直主张德国同苏俄修好，并且在拉巴洛条约中实现了这种修好。他在 1939 年整整一年中所发的电报表明，他真诚地想恢复魏玛共和国时期同俄国的密切关系。但是，也

[①] 同上，第 608—9页。

[①] 同上，第 618—20 页。

[②] 同上。第 790—91 页。

[①] 同上，第 805—7页。

像所有老派的德国职业外交家一样，他不了解希特勒。

突然在 6 月 29 日,希特勒从伯希特斯加登的山间别墅中下令中断同俄国人的谈判。

伯希特斯加登，1939 年 6 月 29 日

……元首决定如下：

告诉俄国人，我们从他们的态度中看出，他们要把我们是否接受他们在 1 月份给两国经济谈判所确定的原则，作为今后的谈判能否继续的条件。因 [495] 为这些原则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我们目前没有兴趣同俄国恢复经济谈判。

元首已同意上项答复可以稍稍推迟几天。[②]

事实上，这项命令的内容在第二天就用电报告诉了莫斯科德国大使馆。

外交部长[威兹萨克在电报中说]……的意见是，在有新的指示以前，在政治方面说的话已经够了，在目前来说，我们不要再提出谈判。

关于可能同俄国政府举行的经济谈判，此间的考虑还没有结论。在这一方面，你暂时也不要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听候指示，[①]

在德国秘密文件中找不到任何迹象能解释希特勒为何突然改变主意。俄国人本来已经开始对他们在 1、2 月份提出的建议表示让步了。而施努尔早在 6 月 15 日就曾警告过，经济谈判的破裂，对德国说来，不但是经济上的挫折，而且是政治上的挫折。

英法苏谈判当时进展迟缓，因此也不可能使希特勒丧气到要采取这样的决定。他从莫斯科德国大使馆的报告中知道，俄国同西方国家在对波兰、罗马尼亚和波罗的海国家提供担保的问题上陷入了僵局。波兰和罗马尼亚很乐意得到英国和法国的担保，但是在一旦德国对之侵略的时候，英法两国除了采取建立西方战线的间接办法而外，很难对它们有什么帮助。可是它们又拒绝接受俄国的担保，甚至不许苏联军队通过它们的国境去抗击德国的进攻。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芬兰也坚决不愿接受俄国的任何担保。这种态度，照德国外交部文件后来的透露，是由于德国悍然威胁要是它们的决心动摇的话，就要对它们采取报复。

在这种僵局之下，莫洛托夫在 6 月初建议英国派外交大臣到莫斯科来参加谈判。显然，在俄国人看来，这样不但有助于打破僵局，而且将表明英国是有诚意要同俄国达成协议的。哈利法克斯勋爵不愿意去。*安东尼 ·艾登（他至少是前任外交大臣）表示愿意代他前去，可是张伯伦拒绝了他的建议。后来决定派外交部一位能干的职业外交官威廉 · 斯特兰去。斯特兰曾在莫斯科英国大使馆任职而且能讲俄语，但是在国内外都并不知名。派这样一[496]个低级的人物去领导这样重要的一个代表团，而且是去同莫洛托夫和斯大林直接谈判，这对俄国人说来是一个信号——他们后来这么说——表明张伯伦仍然没有严肃认真地看待同苏联建立同盟来制止希特勒这样一件事情。

斯特兰在 6 月 14 日到达莫斯科。但是，虽然他和法国代表一起同莫洛托夫会谈了 11 次，他的出场对英苏谈判的进展并没有多大影响。半个月以后，俄国的猜疑和愤懑公开在《真理报》的一篇文章上表现了出来。那是安德烈 ·日丹诺夫写的，题目叫做《英国和法国政府不想在平等的基础上同苏联缔结条约》。虽然日丹诺大自称是“ 作为私人而不是代表苏联政府 ”写的，但是他

[②] 同上，第 810 页。

[①] 同上，第 813 页。

不但是政治局委员和最高苏维埃外交委员会主席，而且，如舒伦堡在就此事向柏林所作的报告中所说的那样，还是“斯大林的心腹之一，[他的]文章无疑是奉上面的命令写的”。

在我看来[日丹诺夫写道]，英国和法国政府似乎并不想努力达成一项苏联能接受的真正的协议，而只是想谈论谈论一项协议，以便向他们本国的舆论表明所谓苏联的不妥协态度，从而好同侵略者缔结协定。今后几天之内就将表明事实是不是如此。[①]

斯大林对英国和法国的不信任以及他对西方盟国可能到最后像一年以前在慕尼黑那样同希特勒作成一笔交易的猜疑，就这样公诸于世而让大家都来考虑。冯·德·舒伦堡大使在考虑了它以后，告诉柏林，这篇文章的目的之一是“把谈判可能的破裂归咎于英国和法国”。[②]

计划进行总体战

阿道夫·希特勒仍然还不肯来吞俄国的钓饵。也许这是因为整个6月份他都在伯希特斯加登忙着监督一项工作：把夏末进攻波兰的军事计划准备完毕。

到6月15日，他就收到了冯·勃劳希契将军关于陆军对波兰进行军事行动的绝密计划。[①]这位陆军总司令学着他主子的话说："进行这一军事行动的目的，是摧毁波兰的武装力量。政治领导上要求战争应当以沉重的突然打击开始，而且迅速取得胜利。陆军总司令部的打算是要用突然攻入波兰领土的方法不让波兰军队进行通常的动员与集中，同时以西里西亚为一翼，以波麦腊尼亚—东[497] 普鲁士为另一翼向同一中心发动进攻，歼灭大概集中在维斯杜拉河—那累夫河一线以西的波军主力。"

为了实现他的计划，勃劳希契成立了两个集团军——南路集团军：由第八军团、第十军团、第十四军团组成；北路集团军：由第三军团、第四军团组成。南路集团军由冯·伦斯德将军指挥，将从西里西亚发动进攻，"以华沙为总方向，击溃抗击的波兰军队，以尽可能强大的兵力尽速占领维斯杜拉河两岸的华沙，目标在于同北路集团军合作，歼灭波兰境内仍然在顽抗的波兰军队"。北路集团军的第一个任务是打开走廊，"建立德国和东普鲁士之间的联系"。各个集团军所属备军团和空军及海军都有详细具体的目标。

勃劳希契说，在开战的第一天，但泽就要被宣布为德国领土，并且将由德国指挥下的地方力量把它拿下来。

同时发布的一项补充命令规定，为执行"白色方案"而部署军队的命令将于8月20日执行，"一切准备工作必须在那一天完成"[②]一个星期以后，即6月22日，凯特尔将军向希特勒交上了一份"白色方案的初步时间表"。[①]元首审阅以后表示"基本上"同意，但是"为了不致因征召较通常数量为大的后备兵入伍而惊动群众起见……在一切非军事的机构、雇主或其他私人问到时，就告诉他们，这次征兵是为了要进行秋季演习"。希特勒还规定，"为

[①] 1939年6月29日《真理报》。

[②] 6月29日的电报，见《德国外交政策 文件汇编》，第6卷，第808—9页。

[①] 《主要战犯的审讯》，第34卷，第 493—500页（纽伦堡文件C—142 号）。在《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6卷 第956页上的英译文简短得多。

[①] 同上，第4卷，第934页（纽伦堡文 件c—126）。

了安全的理由，陆军总司令部所建议的在 7 月中把边境一带的医院腾空的工作切勿进行”。

希特勒所计划打的是总体战，它不但要求军事动员，而且要求国家全部资源总动员。为了统一调度这个规模庞大的工作，第二天（6 月 23 日）就在戈林主持下召开了国防会议。出席会议的大约有 35 名高级文武官员，包括代表军队的凯特尔、雷德尔、哈尔德、托马斯、米尔契和内政部、经济部、财政部和运输部的部长以及希姆莱等人。自从国防会议成立以来，这还只是第二次开会，但是，据戈林解释，这个机构只有在要作出最重要的决定时才开会，而且从缴获的这次会议的秘密记录可以看出，他毫不含糊地让到会者都明白，战争已近在眼前，但是在为工农业提供劳动力和其他许多有关全面动员的问题上还有许多工作有待完成。[②]

戈林告诉国防会议，希特勒已决定征召大约 700 万人，为了扩大劳动力的供应，经济部长丰克博士应安排“何种工作可以交给战俘和交给监狱及集中营里的犯人去做”。希姆莱马上凑上来［498］说，“在战时可以大大利用集中营”。戈林接着又说：“可以从捷克保护国雇几十万工人到德国在监督之下做工，特别在农业方面。他们可以住在临时营房里。”很明显，纳粹的奴隶劳动计划已经在形成了。

内政部长弗立克博士保证在“公共行政方面节约劳动力”。他承认在纳粹统治之下，官僚的人数已经增加了“20 倍到 40 倍——真是一件吃不消的事情”。会议因此大为活跃，结果决定成立一个委员会来纠正这种可悲的局面。

陆军参谋总部运输处处长鲁道夫·格尔克上校所作的报告，甚至于还要悲观。“在运输方面，”他直率地说，“德国目前还没有准备好打仗。”

德国的运输条件能否适应任务的要求，当然要看战争能否限制在波兰而定。如果德国要在西线对法国和英国作战的话，那么运输系统根本就不够用。国防会议 7 月间曾召开两次紧急会议，目的就在于“使西壁防线至迟到 8 月 25 日能用到当时为止尽最大努力所能取得的物资达到最大程度的准备状态”。克虏伯兵工厂和钢铁卡特尔的高级职员被请来设法一点一滴地搜罗必要的钢铁来完成西线工事的装备。因为德国人知道，在德军主力投入波兰的时候，英法军队是否会对德国西部发动重大进攻将取决于西线工事的坚固程度。

虽然希特勒在 5 月 23 日曾难得那么坦率地告诉他的将领们说，但泽根本不是同波兰发生争执的原因，但是这个自由市在这年仲夏还是有几个星期好像成了一个火药桶，随时都有可能爆炸而引起战争。相当一个时期以来，德国人一直在把武器偷偷运入但泽，并且偷偷运入正规军军官去训练当地的警卫队使用这些武器。* 武器和军官都是从东普鲁士越过边境偷运进去的，而为了对他们加强监视，波兰人还增加了海关官员和边防部队。这时已完全按照柏林的命令行事的但泽地方当局，就设法阻挠波兰官员执行任务，以此来进行对付。［499］

这种冲突在 8 月 4 日达到了高潮，当时有 4 名波兰驻但泽的外交代表通知地方当局，波兰海关稽查已奉命“携带武器”执行他们的任务，但泽市民任何妨碍他们执行任务的行动都将被认为是对波兰官员的“暴力行为”，如

[②] 德国国防会议 1939 年 6 月 23 日会议 秘密记录，同上，第 718—31 页（纽 伦堡文件 3787—PS）。

果发生这种情况，波兰政府将“毫不延迟地对自由市采取报复”。

对希特勒说来，这是又一个表明波兰人不能吓倒的迹象，德国驻华沙大使的意见又加深了这种印象。他在7月6日给柏林的电报中说，如果“明显地侵犯了”波兰在但泽的权利，波兰是会打仗的，这点“已很难有什么怀疑”。从这封电报边上里宾特洛甫的亲笔批语中可以知道，它是给元首看过了的。[①]

希特勒怒不可遏，第二天（8月7日）就把但泽的纳粹党领袖艾伯特·福斯特召到伯希特斯加登，告诉后者说，他对波兰人的耐心已经达到了极限。柏林和华沙之间连续交换了怒气冲冲的照会——语调之激烈使双方都不敢公布。8月9日，德国政府警告波兰，它要是再给但泽下最后通牒，“将造成德波关系的严重化……德国政府对此决不能负任何责任”。第二天，波兰政府尖刻地回答说：

它将一如既往继续反对自由市当局想损害波兰在但泽所享有的利益的任何企图，并且将以它自己认为合适的手段与方法来这样做，它将把德国政府的任何干涉……视为侵略行为。[②]

没有一个横在希特勒道路上的小国曾用过这样的措辞。第二天，8月11日，当希特勒接见国际联盟驻但泽高级专员卡尔·布克哈特的时候，脾气极坏，希特勒告诉这位已经接受了德国对但泽的大部分要求的瑞士人说：“如果波兰人敢动一个小指头的话，他就将用他手中的强大武器以雷霆万钧之势压下去，这种武器波兰人连想都没有想到过。”

布克哈特先生说［这位高级专员看来报告说］，这样会引起全面冲突。希特勒先生回答说，要是他不得不打仗的话，他与其留到明天打，还不如就在今天打，他不会像威廉二世时代的德国那样行事，德国皇帝对充分使用各种武器，老是有各式各样的顾忌，而他将毫无怜悯，无所不用其极。[①]

这是对付谁呢？当然是对付波兰。必要时也要对付英国和法[500]国。是不是也要对付俄国呢？对苏联来说，希特勒终于拿定了主意。

俄国的插手：三

俄国人采取了一个全新的主动步骤。

7月18日，苏联驻柏林的商务代表巴巴林带着两名助手，到德国外交部拜会了尤利乌斯·施努尔，通知他俄国愿意延长并且加强德苏经济关系。他带来了一份详细的备忘录，建议签订一项贸易协定，大大增加两国货物的交易，并且宣称，如果双方之间少数分歧之点能得到澄清的话，他已受权能在柏林签订一项贸易条约。施努尔博士关于这次会谈的内部报告表明，德国人对此颇为高兴。施努尔指出，这样一个条约，“至少在波兰和英国不会不产生影响”。[②]4天以后，在7月22日，俄国报纸在莫斯科宣布，苏德贸易谈判已在柏林恢复。

就在这一天，威兹萨克相当兴奋地用电报给在莫斯科的冯·德。舒伦堡大使发去了一些颇为有趣的新指示。关于贸易谈判的问题，他告诉大使说，“我们将在这里以明显的合作态度采取行动，因为这里出于总的考虑，希望

[①] 同上，第864—65页。

[②] 全文，同上，第7卷，第4—5，9—10页。

[①] 布克哈特1940年3月19日致国际联盟的报告全文，见《国际问题文件集（1939—1946年）》，第1卷，第346—47页。

[②]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6卷，第936—38页。

尽可能早日签订条约”。他接着还说：

“就我们同俄国人的谈判的纯政治方面而言，我们认为，在我们[6 月 30 日]的电报*中要你静观等待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你因此有权在那里把线再接起来，不过也不必做得太急，”①

这种线事实上是 4 天以后即 7 月 26 日在柏林接上的。施努尔博士奉里宾特洛甫之命请苏联代办阿斯塔霍夫和巴巴林在柏林一家豪华的饭馆里吃饭，向他们进行试探。这两个俄国人并不用怎么试探，据施努尔在关于这次谈话的内部报告中说，“俄国人一直呆到夜半 12 点半”，而且“以非常活泼而又关心的态度谈到了我们感兴趣的政治和经济问题”。

在巴巴林的热烈赞同下，阿斯塔霍夫宣称苏德政治修好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他说，在莫斯科，人们总是无法了解为什么纳粹德国对苏联这样敌视。而那位德国外交官在回答的时候就解释说，“德国在东方的政策现在已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方针”。

就我们这方面来说，根本不存在威胁苏联的问题。我们的目标针对着一[501]个完全不同的方向……德国的政策是针对英国的……我可以想象在适当地考虑到对俄国极为重要的问题的情况下，会对双方的利益作出意义深远的安排。

虽然如此，一旦苏联同英国结盟反对德国的话，这种可能性就不存在了。

现在是德国和苏联达成谅解的良好时机，但是在同伦敦缔结条约以后就不再会如此了。

英国能给俄国什么呢？说得最好，也无非是参加欧洲大战和同德国作对。与此对比，我们能给俄国什么呢？中立和使之置身于可能发生的欧洲冲突之外，而且，如果莫斯科愿意的话，还有德苏对两国共同利益的谅解，这种谅解，正如过去历次一样，将有利于两国……从波罗的海到黑海到远东全线，在我看来，都不存在[德国和俄国之间]有争执的问题。除此之外，尽管它们对生活的看法有所不同，在德国、意大利和苏联的意识形态方面有一点是共同的：它们都反对西方的资本主义民主政体。①

这样，在 7 月 26 日的深夜，在柏林一家小小的饭馆里，靠着一顿由几个二流外交家享用的美酒佳肴，德国第一次认真地提出了想同俄国完成一笔交易的要求。施努尔所采取的新路线是由里宾特洛甫面授的。阿斯塔霍夫听得十分高兴。他答应施努尔立即把他的话报告莫斯科。

在威廉街，德国人焦急地等待着要看苏联首都会有什么样的反应。3 天以后，威兹萨克让信使给在莫斯科的舒伦堡送去了一份密信。

我们急欲知道对阿斯塔霍夫和巴巴林谈的话是否在莫斯科引起了任何反应，此事对我们十分重要。如果你能有机会安排再同莫洛托夫作一次谈话的话，请循同样的方针对他进行试探。如果莫洛托夫放弃了他迄今为止所采取的矜持态度的话，你可以再进一步……在波兰问题上尤其是如此。不论波兰问题如何发展，我们都准备……保全苏联的利益并且同莫斯科政府达成谅解。在波罗的海地区的问题上，如果谈判进行得顺利的话，也可以提出，我们将调整我们对波罗的海国家的态度，以尊重苏联在波罗的海的重大利益。②

两天后，7 月 31 日，国务秘书又给舒伦堡发了一个“急密”电：

参看我们 7 月 29 日的信件，该信将由信使于今日送达莫斯科：在你与莫洛托夫下一次会晤的日期确定以后，请立即电告日期和时间。我们急盼你能早日见到他。①[502]

柏林给莫斯科的指示中有着急的表示，这还是第一次。

---

① 同上，第 955—56 页。

① 施努尔的报告，同上，第 1106—9页。

② 同上，第 1015—16 页。

① 同上，第 1022—23 页。

柏林的着急是有充分理由的。7 月 23 日，法国和英国已最后同意了俄国的建议——立即举行军事参谋人员的谈判，拟定一项具体规定三国如何对付希特勒军队的军事条约。虽然张伯伦直到 7 月 31 日才在下院宣布了这一协议，德国却早就得到了风声。7 月 28 日，冯 · 韦尔兹克大使从巴黎电告柏林，他从“ 一个消息极其灵通的人士 ”那里得悉，法国和英国已在筹组军事代表团赴莫斯科，法国代表团将由杜芒克将军率领，大使把他说成是“ 一个特别能干的军官 ”，曾在马克西姆 · 魏刚将军手下任副参谋总长。[②]据德国大使在两天后发来的一份补充电报中说，他的印象是，巴黎和伦敦已同意举行军事参谋人员谈判，并把这看作是防止莫斯科谈判中断的一个最后办法。[③]

这个印象是有充分根据的。从英国外交部的内部文件中可以看出，莫斯科的政治谈判到 7 月份最后一个星期已陷入僵局，主要因为无法对“ 间接侵略 ”下定义。英国人和法国人认为，俄国人对这个名辞的解释太宽了，这样它就有可能会被俄国人利用为干涉芬兰和波罗的海国家的借口，即使那里并没有什么严重的纳粹威胁。对于后面这一点，至少伦敦是不能同意的，法国人倒准备比较马虎一点。

而且，俄国人在 6 月 2 日还坚持在签订互助条约的同时签订一项军事协定，详细规定三国彼此问的军事援助的“ 方法、方式和范围 ”。西方国家对俄国的军事力量估价并不太高，*因此想推脱莫洛托夫的这一要求。他们只同意在签订政治协定以后才开始军事参谋人员的谈判。但是俄国人坚不让步。后来，英国人为了想做成这笔交易，在 7 月 17 日建议立即开始军事参谋人员的谈判，条件是苏联不再坚持同时签订政治协定和军事协定，并且——外加一条——接受英国关于“ 间接侵略 ”的定义，但是，莫洛托[503]夫的答复是干脆的拒绝。他说，除非法国人和英国人同意把政治和军事协定一揽子解决，就没有继续进行谈判的必要。俄国人要终止谈判的威胁在巴黎引起了惊慌，那里对苏联一纳粹之间暗送秋波的行动似乎比伦敦要感觉敏锐得多。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法国的压力,英国政府才在8月23日一面拒绝接受俄国人关于‘ 间接侵略 ”的解释，一面勉强同意了开始谈判三国军事条约。[②]

张伯伦对军事参谋人员谈判这件事实在谈不上有什么热心 ”。8 月 1 日，狄克森大使从伦敦报告柏林,英国政府人士对同俄国人举行军事谈判一事‘ 都抱怀疑态度 ”。

这一点[他写道]可以从英国军事代表团的成员来证明。[④]那位海军上将……事实上已列入退休名单，而且从来没有在海军参谋部工作过。那位陆军将领也纯粹是一员作战军官。那位空军将领是一位出色的驾驶员和教练，但并不是一位战略家，这似乎可以表明这个军事代表团的任务与其说是去缔结作战协定，还不如说是去摸一摸苏军战斗力的底……德国武官也看到英国军界人士对即将同苏联武装部队举行的谈判抱有一种令人吃惊的怀疑态度。[②]

事实真是如此，英国政府的怀疑态度竟然严重到忘了给德拉克斯海军上将以参加谈判的证明文件——伏罗希洛夫元帅在第一次参谋人员会议上就对

[②] 同上，第 1010—11 页。

[③] 同上，第 1021 页。

[②] 同上，第 6 册，第 329，338，346，357，358，376，399 号。

[④] 英国代表团的人员是海军上将雷金纳德 · 普伦克特—恩尔—埃尔—德拉克斯爵士（他曾在 1935—1938 年任朴次茅斯基地司令），空军中将查尔斯 · 伯纳特爵士和陆军少将海伍德。

[②] 8 月 1 日的两封电报，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 6 卷，第 1033—34 页。

这样一种疏忽（如果可以称之为疏忽的话）表示不满。这位海军上将的全权证书直到 8 月 21 日才送到，这时早已没有用处了。

但是，虽然德拉克斯海军上将没有带着书面的证明文件，他可确实带着书面的秘密指示，告诉他在莫斯科的军事谈判中该采取什么方针。据很久以后公布的英国外交部文件透露，德拉克斯海军上将奉命要“ 使[军事]谈判进行得极慢，密切注视政治谈判的发展 ”，一直等到政治方面达成协议为止。[①]这项指示还向他[504]说明，在政治条约签订以前，不能告诉俄国人什么机密的军事情报。

但是，既然政治谈判已在 8 月 2 日中断，而且莫洛托夫已经表明，除非军事谈判能有若干进展，他不会同意重开谈判，人们就很难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张伯伦政府并不急于确定参加拟议中的互助条约各国所承担的军事义务，而是蓄意拖延时间。*事实上，英国外交部的机密文件使人很难怀疑，到 8 月初的时候，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几乎已经放弃了同苏联达成协议以制止希特勒的希望，当时他们认为，如果他们能继续莫斯科的军事谈判的话，这倒也许还可以制止德国独裁者在今后 4 个星期之内采取触发战争的决定性步骤。[④]

同英国人和法国人相反，俄国人派出的军事代表团成员都是最高级的军官：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元帅，红军总参谋长沙波希尼科夫将军和海军及空军的最高司令官。俄国人不可能不注意到，英国人曾在 7 月间派帝国参谋总长陆军上将埃德蒙 · 埃昂赛德爵士到华沙去同波兰参谋总部谈判军事问题，而现在竟然不考虑派这样高级的军官到莫斯科来。

英法军事代表团实在不能说是赶赴莫斯科的。坐飞机的话，一天就到了。可是他们却是坐一条慢船，一条既载客又装货的轮船去的，路上所花费的时间足够玛丽皇后号把他们送到美国去。他们在 8 月 5 日启旋开赴列宁格勒，到 8 月 11 日才到莫斯科。

这时已经太迟了，希特勒已经抢在他们头里了。 [505] 当英国和法国的军官们还在等他们那条把他们送到列宁格勒去的慢船的时候，德国人却在迅速行动。在柏林和莫斯科。8 月 3 日是一个关键性的日子。

那天中午 12 点 58 分，历来都是无例外地让国务秘书冯 · 威兹萨克来起草电报的外交部长冯 ·里宾特洛甫，亲自给莫斯科的舒伦堡发了一份标明‘ 机密一特急 ”的电报。

> 我昨天曾同阿斯塔霍夫作了一次很长的谈话，详情另电告知。
>
> 我表示，德国方面希望改善德俄关系，并且说，从波罗的海到黑海没有一个问题不能加以解决，使双方都感满意。阿斯塔霍夫希望就目前重大问题进行更具体的会谈，为此……我宣称，如果苏联政

[①]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附录 V，第 763 页。

[④] 8 月 16 日，空军中将查尔斯 · 伯纳特爵士从莫斯科报告伦敦：“ 我认为，如果我们不能使对方同意签订条约的话，政府的政策就是把谈判尽可能地延长。 ”英国驻莫斯科大使西兹也在 7 月 24 日，即英国政府同意举行军事谈判的第二天，打电报给伦敦：“ 我对军事谈判的成功不表乐观，我也不认为军事谈判能迅速结束。但是现在开始谈判，将给轴心国家一种有益的震动，也可以给我们的友邦一种刺激，而且这一谈判可能延长到足以避过今后几个危险的月份。 ”英法谍报机关早就知道，莫洛托夫曾同德国大使会谈过，知道德国力图使俄国参与再次瓜分波兰——那是考仑德雷早在 5 月 7 日就警告过巴黎的（见本书原文第 482 页）——知道德国已在波兰边境集结重兵，也知道希特勒的意图，从这些事实看来，英国人还相信能在莫斯科耍拖延策略，真有点令人吃惊。

府愿意通过阿斯塔霍夫通知我，他们也希望把德俄关系置在新的确定的基础之上的话，我自己随时准备参加这种会谈。[①]

外交部已经知道，舒伦堡当天稍晚的时候将去会见莫洛托夫。在里宾特洛甫的电报发出以后一个小时，威兹萨克也发出了自己的电报，同样标明"机密一特急"。

鉴于政局演变甚快，并且为了利于迅速行动，不管你今天同莫洛托夫的谈话结果如何，我们都急需更加具体地在柏林继续进行协调德俄意图的谈判。为此目的，施努尔将在今天接见阿斯塔霍夫，并将告诉他，我们准备更加具体地继续谈判。[①]

虽然里宾特洛甫突然表示希望就从波罗的海到黑海的每一个问题进行"具体"谈判一举定然会使俄国人大吃一惊——里宾特洛甫在下午 3 点 47 分发给舒伦堡的第二份电报中说，他曾"给了[阿斯塔霍夫]一个微微的暗示，表明我们将同俄国对波兰的命运达成谅解"——这位德国外交部长却向他驻莫斯科的大使强调，他曾告诉俄国代办"我们并不着急"。[②]

这是装腔作势，而那位机灵的苏联代办也看透了这一点。他在 12 点 45 分在外交部见到施努尔的时候故意说，虽然施努尔看起来很着急，德国外交部长昨天"可并没有表示这么着急"。对此，施努尔巧妙地应付了过去。

我告诉阿斯塔霍夫先生[他在一份内部报告中写道]，[③]虽然外交部长昨夜并没有对苏联政府表示任何着急，我们仍然认为最好是利用今后几天*来继续谈判，好尽快打下一个基础。[506]

这样，对德国人来说，这就成了今后几天就要见分晓的问题。

阿斯塔霍夫告诉施努尔说，他从莫洛托夫那里得到了对德国建议的"一个临时答复"。这个答复在很大程度上是否定的。虽然莫洛托夫也希望改善关系，但是阿斯塔霍夫说，"莫洛托夫说，迄今为止对德国的态度还不了解有什么具体的东西"。

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那天晚上在莫斯科直接向舒伦堡表达了他的看法。午夜刚过，德国大使就发回了一个长长的电报[①]，报告他曾同莫洛托夫谈了 1 个小时又一刻钟，莫洛托夫"放弃了他往常那种矜持的态度而显得不平常地直爽"。这点看来是没有什么疑问的。因为在舒伦堡重申了德国认为两国之间"从波罗的海到黑海"都不存在任何分歧的看法，而且重申了德国想"达成"谅解的愿望以后，那位硬梆梆的俄国外长就举出了几件德国对苏联的敌对行为：反共公约，支持日本反俄，不让苏联人参加慕尼黑会议。

莫洛托夫问道，"怎么能说德国最近的声明能同这三件事情没有矛盾呢？德国政府态度的改变目前还没有证明"。

舒伦堡看来有点灰心了。

我的总的印象是[他打给柏林的电报说]，苏联政府目前已决心同英国和法国缔结协定，只要他们能满足苏联全部愿望……我相信我的话已经给莫洛托夫留下了印象，但是我们这方面仍然要作巨大的努力，才能使苏联政府改变方针。

虽然这位德国老外交家对俄国事务十分熟悉，他显然过高估计英法谈判代表在莫斯科的进展。他也还看不出柏林为了作出他认为要改变苏联外交方

[①]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 6 卷，第 1047 页。

[①] 同上，第 1048—49 页。

[②] 同上，第 1049—50 页。

[③] 同上，第 1051—52 页。

[①] 同上，第 1059—62 页。

针所必需的“巨大努力”现在已准备作到什么程度。

在威廉街，对苏联外交方针可以改变的信心越来越高。要是苏联保守中立的话，英国和法国就不会为波兰打仗，就是打的话，也可以很容易把他们挡在西线工事之外，等到德国军队把波兰人迅速打垮以后，再以全力回师西向来对付他们。

机警的法国驻柏林代办雅克·塔尔比·德·圣哈杜因注意到了德国首都气氛的改变，就在8月3日这一天，当柏林和莫斯科两地苏德外交活动十分频繁的时候，他报告巴黎说：“过去一个星期之内，在柏林可以觉察到政治气氛有一种十分肯定的改变……在纳粹领导人当中，进退两难，徘徊犹豫，想拖延时间，甚至想[507]姑息迁就的时期已经让位给一个新的时期了。”[①]

德国的盟国的犹豫

德国的盟国意大利和匈牙利的态度就不然了。夏天一天天过去，布达佩斯和罗马的政府越来越害怕自己的国家会被拖到希特勒发动的战争中去，而且是站在德国一边。

7月24日，匈牙利总理特莱基伯爵给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发出了内容完全相同的信，通知他们“一旦发生全面战争的话，匈牙利将按照轴心国家的政策决定其政策”。说完这番豪语以后，他又缩了回来。同一天，他就给两位独裁者发出了第二封信，声明“为了防止对我7月24日的信可能发生任何误解，我……再说一遍，从道义立场来说，匈牙利不能够对波兰采取武装行动”。[②]

布达佩斯来的第二封信使希特勒又一次大发雷霆。当他8月8日在上萨尔斯堡接见匈牙利外交部长察基伯爵的时候（里宾特洛甫也在场），他一开头就说匈牙利总理的信使他“大为震惊”。据为外交部所写的内部纪要说，他强调指出，在“一旦发生德波冲突的时候”，他从来也没有指望要匈牙利——或者任何其他国家——援助。他还说，“特莱基伯爵的信是不能忍受的”。他提醒他的匈牙利客人，匈牙利是靠了德国的慷慨大度才从捷克斯洛伐克收回那么多的领土。要是德国在战争中失败了的话，他说，“匈牙利也必然会随之被粉碎”。

缴获的外交部文件中有德国方面关于这次谈话的纪要，它暴露了希特勒在这个决定命运的8月份的心理状态。他说，波兰对德国来说，在军事上根本不是什么问题。尽管如此，他还是从一开头就在考虑同时在两条战线上作战。他口出大言：“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攻破德国的西线工事，在我的一生中没有一个人能够吓唬我，英国也办不到。我也不会因人们经常预言的神经衰弱而垮下来。”至于俄国：

> 苏联政府是不会对我们打仗的……苏联人不会重复沙皇的错误，为英国流血牺牲。虽然如此，他们可能设法使自己不参加军事行动，而靠牺牲波罗的海国家或者波兰来占点便宜。

希特勒这一番话效果十分显著，在同一天举行的第二次会谈结束的时候，察基伯爵要求他“把特莱基写的两封信就当没有写[508]一样”。他还说，他也要对墨索里尼作同样的请求。

[①] 《法国白皮书》，法文版，第250—51页。

[②] 两封信的全文，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6卷，第973—74页。

几个星期以来，意大利领袖一直在为德国元首可能把意大利拖入战争而焦躁不安。他派驻柏林的大使阿托利科不断送来越来越使他吃惊的消息，报告希特勒已决心进攻波兰。*自从 6 月初以来，墨索里尼一直在要求同希特勒再次会晤，终于在 7 月中决走于 8 月 4 日在勃伦纳山口会晤。7 月 24 日，他通过阿托利科向希特勒提出了关于他们的讨论的“若干基本原则”。如果元首认为战争“不可避免”的话，意大利将站在它一边。但是领袖提醒元首，对波兰的战争是不能限制在波兰境内的，它将扩大为欧洲大战。墨索里尼认为，现在还不是轴心国发动这样一场战争的时候。他因此提出“在今后几年内实行建设性的和平政策”，德国同波兰，意大利同法国都通过外交谈判来解决它们的分歧。不但如此，他还建议举行另一次大国会议。②

元首的反应，据齐亚诺在 7 月 26 日的日记中所记，是不赞同的。因此，墨索里尼决定最好还是推迟他同希特勒的会晤。③8 月 7 日，他提出两国外交部长立即会晤，以代替原来的首脑会议。齐亚诺在这些日子里写的日记表明，罗马的不安情绪在与日俱增。8 月 6 日，他写道：

我们必须寻找一条出路。要是一味跟随德国的话，我们就将走向战争，而且是在对轴心国，尤其是对意大利，最为不利的条件下进入战争。我们的黄金储备已经减少到几乎荡然无存了。我们的钢铁储备也是如此……我们必须避免战争。我向领袖建议由我同里宾特洛甫会谈……在这次会谈中，我将设法继续讨论墨索里尼关于举行世界会议的建议。[509] 8 月 9 日——里宾特洛甫已同意了我们会谈的建议。我决定在明天晚上动身，以便同他在萨尔斯堡会面。领袖切望我用确凿的证据向德国人证明，在这个时候爆发战争是一件蠢事。

8 月 10 日——领袖比过去更加深信必须推迟战争。他亲自拟定了关于萨尔斯堡会谈的报告的大纲。报告的结尾暗示应举行国际谈判来解决如此危险地扰乱了欧洲生活的各种问题。

在让我走以前，他嘱告我应该坦率地告诉德国人，我们必须避免同波兰发生冲突，因为这种冲突将无法限制在波兰境内，而全面的大战对人人都是一场灾难。①

这位年轻的法西斯外交部长是带着这样一种值得称赞的、然而在当时的环境下是天真的想法和建议到德国去的，在那里，在以后的 3 天内——8 月 11 日、12 日、13 日——他从里宾特洛甫那里，尤其是从希特勒那里，经历了他一生中最大的震惊。

齐亚诺在萨尔斯堡和上萨尔斯堡：8 月 11 日、12 日、13 日

8 月 11 日，齐亚诺同里宾特洛甫在萨尔斯堡郊外后者的别墅中谈了大约 10 个小时。这所别墅在富许尔，是那位纳粹外交部长从一个奥地利的保皇党人那里夺过来的，至于那位保皇党人，为方便起见，已经送到集中营里去了。那位容易冲动的意大利人发现（他后来报告），气氛甚为阴冷。当两个人在圣·沃尔夫冈的白马旅舍吃晚饭的时候，一句话都没有交谈。实在也没有多大必要。里宾特洛甫这天早些时候已经告诉过他的客人，进攻波兰的决定是不容修改的。

“那末，里宾特洛甫，你们到底想要什么？”齐亚诺说他曾这样问过，

---

②

③ 威兹萨克备忘录，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 6 卷，第 971—72 页。③《齐亚诺日记》，第 113—14 页。

① 同上，第 116—118。

“是走廊还是但泽？”

“再也不是那点儿东西了，”里宾特洛甫用他那闪闪发亮的眼睛冷冷地瞪着他回答说，“我们要战争！”

齐亚诺说，同波兰的冲突不可能限制在波兰，如果波兰受到攻击，西方民主国家会打仗；但是这种种论据都遭到了干脆的拒绝。4 年以后，1943 年圣诞节的前两天，当齐亚诺躺在维罗纳监狱的第 27 号牢房中等待处决（那是德国人指使的）的时候，他仍然还记着在萨尔斯堡郊外富许尔所度过的 8 月 11 日这阴冷的一天。在 1943 年 12 月 23 日，他在他最后一页日记上写道，里宾特洛甫“有一次同他在萨尔斯堡的奥地利皇宫饭店里冷冰冰地吃饭的时候”曾同他打赌说，法国和英国一定会保守中立，里宾特洛甫以一批古代德国盔甲同齐亚诺赌一幅意大利名画——他不堪回首地提到，输家以后根本就没有付出这笔赌注。[①]

齐亚诺后来又到了上萨尔斯堡。希特勒在 8 月 12 日和 13 日在那里的两次会议上重申法国和英国决不会打仗。同纳粹外交部长相反，元首的态度倒很亲热，但是他要打仗的决心却一样没有[510]转弯的余地。这不但可以从齐亚诺的叙述中得到证实，而且可以从缴获文件中德国方面关于这次会谈的秘密记录中得到证实。[②]意大利外长看到希特勒站在一张大桌子前面，上面摊着军用参谋地图。他一开头就解释德国的西壁防线的力量。他说，这是攻不破的。除此之外，他轻蔑地补充说，英国只能派 3 个师到法国去。法国的师当然要多得多，但是因为波兰“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会被击败，德国那时就可以在西线集中 100 个师来进行“那时就将开始的生死存亡的斗争”。

事实会不会如此？几分钟以后，被齐亚诺的初步反应弄得心烦意乱的元首就自相矛盾起来了。意大利外交部长按照原来的打算向希特勒慷慨陈辞。据德国人的记录说，他表示“意大利对完全意料不到的严重局势大感惊讶”。他抱怨德国没有经常把情况通知它的盟国。“相反，德国外交部长 5 月间在柏林和米兰］还曾声明但泽问题将在适当时候予以解决。”当齐亚诺接着宣称对波兰的战争将扩大为欧洲大战的时候，他的主人打断了话头说，他的看法并不如此。

“我个人，”希特勒说，“绝对相信西方民主国家到最后无路可走的时候就会退缩而不敢发动全面战争。”德国方面的记录接着说，对这番话，齐亚诺回答说，“他希望元首的话会证明是对的，不过他可并不相信”。意大利外交部长接着就详细列举了意大利的弱点，照德国人的记载看来，他这番长篇诉苦最后想必已经使希特勒认识到意大利在未来的战争中对他并没有多大用处。*齐亚诺说，墨索里尼所以要推迟战争的理由之一是，他“极为重视按原定计划举行 1942 年的世界博览会”。希特勒这时已经完全沉迷在军事地图上，一心在盘算怎样打仗，听了这句话一定感到很惊异。同样一定曾使他

[①] 8—191582—83 页。齐亚诺关于与里 宾特洛甫会谈的记录，见《齐亚诺外 文文件集》，第 297—98 页，另见《意 大利外交文件汇编》，第 8 卷，第 13 册，第 1 号。德国方面的记录没有找 到。

[②] 德国方面关于 8 月 12 日和 13 日会谈的记录，在纽伦堡提出时编号为 1871—PS 和 TC—77。后者较完全，英译文载《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 8 卷，第 516—29 页。我用的是施密特签名的一份，载《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 7 卷，第 39—49 页，第 53—56 页。齐亚诺的记录，见《齐亚诺外 交文件集》，第 303—4 页，另见《意 大利外交文件汇编》，第 13 册，第 4 号，第 21 号。1939 年 8 月 12 日和 13 日及 1943 年 12 月 23 日的日记，见他 的《日记》，第 119—20，582—83 页。

大感意外的是，齐亚诺居然天真地拿出一份公报的草稿请他同意发表，其中说轴心国外交部长的会议“重申了两国政府的和平愿望”，并且表示相信能“通过正常的外交谈判”来保持和平。齐亚诺说明领袖心里本来想的是要举行一个有欧洲主要国家参加的和平会议，但是由于尊重“元首的顾虑”，他愿意退而求其次，只进行通常的外交谈判。

希特勒在头一天还没有完全拒绝举行国际会议的建议，但是他提醒齐亚诺，“在今后列强开会时已再也不能把俄国排除在外面了”。这是第一次提到苏联，然而并不是最后一次。［511］

最后，当齐亚诺设法想要他的主人明确表示到底决定在哪一天进攻波兰的时候，希特勒回答说，因为秋天多雨，他的装甲师和摩托师那时在一个很少有高级路面的公路的国家里会无法行动，因此“同波兰算账就必须在 8 月底的时候，不是用这种办法就是用那种办法来进行”。

齐亚诺终于得到了这个日期，或者说是可能的一个日期中最后的一个日期。因为过了一会儿之后，希特勒就又大发雷霆，说要是波兰人采取任何新的挑衅行动的话，他决定“在 48 小时之内进攻波兰”。因此，他接着说，“任何时候都可能对波兰采取行动”。这场发作结束了第一天的谈话，只是希特勒还答应要考虑一下意大利的建议。

在给了这些建议以 24 小时的考虑以后，他在第二天告诉齐亚诺，最好还是不要就他们的谈话发表任何种类的公报。*由于预计秋天的气候不好，

就很有必要：[他说]第一，让波兰在尽可能最短的时间内明白表明其意图。第二，德国将决不容忍任何进一步的挑衅行动。

齐亚诺问他，“什么叫尽可能最短的时间”，希特勒回答说，“至迟到 8 月底”。他解释说，虽然打败波兰只要半个月就够了，“彻底清算”还得再花两个星期到 4 个星期——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精确的预言。

最后，到会谈结束的时候，希特勒又按他的惯例对墨索里尼大加奉承，而事实上他从齐亚诺的话里一定已经明白，他再也不能指望墨索里尼了。他说，他个人感到十分有幸“生在这样一个时代，除了他自己以外，另外还有一个政治家将作为伟大而独特的人物而名垂青史。他能同这样一个人交朋友是他个人极大的幸[512]福。当共同战斗的时刻到来的时候，不论发生什么情况，他都将永远在领袖的左右”。

不论爱戴高帽子的墨索里尼会被这些话打动到什么程度，他的女婿可是无动于中，他第二次同希特勒会谈以后，在 8 月 13 日的日记中写道：“我回罗马的时候，对德国人，对他们的领导人，对他们办事的方法，真是讨厌透顶了。他们出卖了我们，对我们撒谎。现在他们是在把我们拖进一场冒险中去。这场冒险是我们不想干的，而且是会危及我们的政权和我们整个国家的。”

但是，当时意大利是希特勒最不在乎的国家。他的心思集中在俄国身上。在 8 月 12 日同齐亚诺的谈话临近结束的时候，有“一封莫斯科来的电报”（德国方面的记录是这样说的）交给了元首。由于希特勒和里宾符洛甫要看电报，谈话中断了一会儿。然后他们把电报的内容告诉了齐亚诺。

“俄国人，”希特勒说，“已经同意德国派一个政治谈判代表去莫斯科了。”[513]

第十五章 纳粹—苏联条约

8 月 12 日下午，希特勒在上萨尔斯堡向齐亚诺透露内容的“莫斯科来的电报”，就像在本书以前所出现过的某些“电报”一样，来源甚为可疑。在德国档案里并没有找到这样一份从俄国首都来的电报。舒伦堡确实曾在 8 月 12 日从莫斯科发过一份电报给柏林，但是它只不过报告了英法军事代表团的到达以及俄国人同他们的客人亲热地相互敬酒的消息而已。

可是，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显然想用来打动齐亚诺的“电报”也仍然不无根据。8 月 12 日曾从威廉街向上萨尔斯堡传去过一份电报，报告俄国代办那一天在柏林拜会施努尔的结果。阿斯塔霍夫通知施努尔说，莫洛托夫现在准备讨论德国人提出来的问题，包括波兰和其他政治性问题在内。苏联政府建议以莫斯科为谈判地点。但是，阿斯塔霍夫说明，此事不必着急。施努尔在那份显然赶发到上萨尔斯堡的报告中谈到，阿斯塔霍夫强调说：“莫洛托夫给他的指示中主要着重之处就在‘逐步’这个词上……谈判只能逐步进行。”[①]

但是，阿道夫·希特勒可不能等待同俄国的谈判。“逐步”进行。正如他刚刚对震惊莫名的齐亚诺透露的那样，他已经把突袭波兰的最后期限规定在 9 月 1 日，而现在已经将近 8 月半了。如果他要有效地破坏英法同俄国之间的谈判而同斯大林办成他自己的交易的话，就该快动手——不是一步一步来，而是大跳一步。

8 月 14 日是星期一，又是一个关键性的日子。这一天，显然并没有完全得知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天机的冯·德·舒伦堡大使从莫斯科给威兹萨克打了一个电报，说莫洛托夫是一个“古怪而难办的人”，而“我仍然认为在对苏关系方面应当避免采取任何操之过急的行动”，然而，就在同时，柏林却给他发去了一份“特[514]急”电报。[②]这份电报是里宾特洛甫发出的，发报地点是威廉街（外交部长当时仍旧在富许尔），时间是 8 月 14 日晚上 10 点 53 分。它指示德国大使立即去见莫洛托夫并向他“一字不改地”照读一封长信。

这封信，说穿了，是希特勒出的大价钱。里宾特洛甫的电报说：德苏关系已经“临到了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德国和俄国之间并不存在任何实际的利害冲突……历史上，当两国是友邦的时候就一切顺遂，当两国是敌国的时候，那就不然了”。

> 由于英国的政策而在波德关系上所发生的危机，[里宾特洛甫接着说]以及实行那种政策势所必至的组织联盟的企图，已使迅速澄清德俄关系成为必要。要不然的话，情况……很可能逆转，而使两国政府不再有恢复德俄友谊从而协同澄清东欧领土问题的可能。因此，两国领导人决不能坐失时机而应该当机立断。如果，由于双方不了解彼此的观点与意向而使两国人民终归仳离的话，将是极大的不幸。

德国外交部长因此“以元首的名义”，准备在适当时机采取行动。

> 我们获悉，苏联政府也有澄清德俄关系的愿望。不过，根据过去的经验。这种澄清通过通常的外交途径只能慢慢地来达到，因此，我准备到莫斯科作一短期访问，以元首的名义向斯大林先生提出

[①] 施努尔关于这次会谈的备忘录，根据 他在 1939 年 8 月 14 日致莫斯科大使 馆的电报，载《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 编》，第 7 卷，第 58—59 页。

[②] 舒伦堡的信全文，同上，第 67—68 页。

元首的意见。在我看来，只有通过这样的直接讨论才能使局面有所改变，从而不是不可能为德俄关系的最后解决奠定基础。

英国外交大臣一直不愿到莫斯科去，而现在德国外交部长却不但愿意去，而且急着要去——纳粹领袖们正确地估计到，这样一种对比一定会给多疑的斯大林以强烈的印象。*德国人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要把他们的意见直接提给那位俄国独裁者本人。因此里宾特洛甫在他的急电后面又加上了一个“附言”。

我要求你[里宾特洛甫告诉舒伦堡]不要把这项书面指示交给莫洛托夫先生，而是要使它尽可能像我所指示你的那样确切地豆达斯大林先生；我授权你，如果有机会的话，请莫洛托夫先生允许你代表我晋见斯大林先生，那[515]样，你就可以把这封重要的信件直接向他面陈了。除了同莫洛托夫会晤以外，同斯大林进行详细讨论也是我作这次访问的一个条件。[③]

在德国外交部长的建议里，有一个没有什么掩饰的钓饵，德国人一定认为克里姆林宫是会上钩的。德国人这样想不是没有理由的。在重申“从波罗的海到黑海没有任何问题不能按两国完全满意的方式解决”的时候，里宾特洛甫具体提到了“波罗的海国家、波兰、东南欧问题等等”，而且他还说，有必要“协同澄清东欧的领土问题”。

德国已经准备同苏联瓜分东欧，包括波兰在内。这是英国和法国所无法出的大价钱，而且显然，即使他们能够出，也是不愿出的。希特勒在出了这笔价钱以后，显然很有把握不会被拒绝，因此，就在当天（8 月 14 日）再次召集了他的三军司令长官，来听他讲进行战争的计划和预测。

上萨尔斯堡的军事会议：8 月 14 日*

“伟大的戏剧，”希特勒告诉他的挑选来的听众说，“现在已经接近高潮了。”虽然要取得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胜利就不能不冒风险，他还是肯定英国和法国不会打仗。光说一点就够了，英国“没有一个真正有胆略的领袖。我在慕尼黑领教过的人物都不是能打一场新的世界大战的人物”。但是就像前几次同他的军事首脑们开会时一样，元首总是忘怀不了英国，他相当详细地谈到了英国的力量和弱点，特别是后一方面。

[据哈尔德的记录说]同 1914 年不同，英国不会再冒冒失失参加一场要持续好几年的战争了……这就是富国的命……即使英国，现在也没有钱打世[516]界大战。英国要打仗是为了什么？谁肯为了一个盟国而找死？

希特勒问道，英国和法国在军事上有什么办法呢？

硬攻西壁是不大可能的[他自己回答道]。向北经过比利时和荷兰包抄不可能迅速取胜。这些办法都帮不了波兰人的忙。

这些因素都表明英国和法国不会参加战争……没有什么东西逼它们非打不可。到慕尼黑来的那批人是不会冒险的……英国和法国的参谋总部对武装冲突的前途有清醒的估计，因而是反对打仗的……

所有这一切都支持这样一种看法：虽然英国可能大唱高调，甚至召回大使，也许在贸易上实行全面禁运。它还是肯定不会进行武装干涉。

因此，波兰很可能单独应战，但是希特勒解释说，仍然必须把它“在一两个星期内”打败，好让全世界都看到它已完全垮台，这样就不会再设法搭

---

③ 里宾特洛甫电报全文，同上，第 62—64 页。

救它了。

希特勒还没有完全准备好告诉他的听众，他就在这一天同俄国做的那笔交易要达到什么样的程度，虽然这个消息一定会使那些深信德国不能同时在两条战线上打一场大战的将军们大为快慰。不过他告诉他们的那一点也已经足以引起他们要求知道更多消息的欲望了。

“俄国，”他说，“决不是肯为人火中取栗的”。他讲了一下同莫斯科之间从贸易谈判开始的“稀疏的接触”。他现在正在考虑是否“该派一个谈判代表到莫斯科去，这个人是否该是一个显要人物”。他说，苏联并不感到对西方负有什么义务。俄国人是了解必须摧毁波兰的道理的。他们对“划定势力范围”是有兴趣的。元首“准备同他们互相迁就”。

在哈尔德记得十分详尽的速记记录中，没有一处提到，这位陆军参谋总长自己，或者陆军总司令冯·勃劳希契将军，或者戈林，曾对元首把德国引入欧洲大战的方针提出过异议——因为，虽然希特勒信心十足，法国和英国是不是一走不会打仗，俄国是不是一定会袖手旁观，还决不是绝对肯定的。事实上，刚好一个星期以前，戈林就曾接到过一个直接的警告说，如果德国进攻波兰的话，英国人肯定会打仗。

7 月初，他有一个名叫比尔格·达勒鲁斯的瑞典朋友。曾设法让他相信英国舆论再也不会容忍纳粹进一步的侵略行动。当德国空军总司令表示怀疑的时候，达勒鲁斯 8 月 7 日又曾在靠近丹麦边境的石勒苏益格一荷尔斯泰因自己的一所房子里安排了一个机会，让戈林以私人的身份会见了 7 名英国企业界人士。这几个英国人竭尽全力要戈林相信，如果德国发动进攻的话，英国一定会[517]履行它对波兰的条约义务。他们不但在口头上说，而且还提出了一个书面备忘录。他们是否达到目的是可以怀疑的，不过，自己也是一个商人的达勒鲁斯是相信他们达到了目的的。*这位好事的瑞典人肯定在柏林和伦敦都同上层有联系。在今后几个紧张的星期中，他曾在德国和英国之间担当了某种调解人的角色。他能直通唐宁街，而且曾于 7 月 20 日在那里受到了哈利法克斯勋爵的接见，他同后者讨论了英国企业界人士即将会见戈林的事情。此后不久，他又被希特勒和张伯伦亲自召见。但是，虽然他争取和平的努力出于好意，他实在太天真了，要当一个外交家，更是幼稚外行得惊人。几年以后在纽伦堡审讯中，大卫·马克斯威尔一费夫爵士曾多方盘洁，使这个瑞典业余外交家痛苦地承认上了戈林和希特勒的大当。[4]

哈尔德将军是 11 个月以前要推翻希特勒的密谋中的为首人物,为什么他在 8 月 14 日不发言反对元首走向战争的决定呢？或者,如果他认为说话没有用的话，为什么不根据慕尼黑前夕同样的理由——战争将给德国带来大祸——再次策划推翻那位独裁者呢？多年以后，哈尔德在纽伦堡受审的时候解释说，甚至在 1939 年 8 月中旬，他还根本不相信希特勒，不管他嘴上怎么说，[5]到头来会冒险发动战争。哈尔德在 8 月 15 日即伯格霍夫会议后的次日所记

---

[4] 英国企业家的备忘录是在戈林办公室档案中发现的，同上，第 6 卷，第 1088—93 页。上面有许多戈林手迹的批语。有好几处，他显然不相信与他想法相反的话，他批上“嘿！”达勒鲁斯斡旋和平这件异想天开甚至有点荒诞不经的事情的经过，见他本人著《最后的尝试》。另见他在纽伦堡的证词，载《主要战犯的审讯》，第 9 卷，第 457—91 页，另见刘易斯·纳米尔爵士著《外交前奏曲》，第 417—33 页，该章名为“外行插手外交”。

[5] 1946 年 2 月 26 日对哈尔德的提讯，见《纳粹的阴谋与侵略》，附件 B，第 1562 页。

的日记还表明，他也不相信法国和英国会冒战争的危险。

至于勃劳希契，他不是一个能对希特勒已经打定的主意提出疑问的人。在8月15日从吉斯维乌斯那里知道了上萨尔斯堡军事会议的消息的哈塞尔曾托人带话给这位陆军总司令说，他“绝对相信”，如果德国侵入波兰的话，英国和法国一定会干涉。然而哈塞尔在日记中伤心地写道，“同他没有什么好谈的。他不是害怕，就是根本不懂这件事……对这些将军们是没有什么指望了……只有几个人脑袋还清醒：哈尔德、卡纳里斯、托马斯”。[⑥]

只有最高统帅部才智出众的经济与军备局局长托马斯将军敢公开对元首提出异议。8月14日的军事会议过了没有几天，托马斯在同现在大体上已不活动的密谋分子戈台勒、贝克和沙赫特讨[518]论以后，写了一个条陈，亲自读给最高统帅部长官凯特尔听。他说，速战速和完全是幻想。对波兰的进攻将触发世界大战，而德国却缺少进行这场大战的原料和粮食。但是全部思想完全来自希特勒的凯特尔，却对这种认为会引起大战的看法置之一笑。他说，英国大老朽了，法国大腐败了，美国太不关心了，它们都不会为波兰来打仗的。[⑦]

这样当1939年8月下半月开始的时候,德国的军事首脑们就全力准备起消灭波兰的计划来了，同时也准备万一西方民主国家出乎一切预料而出兵干涉的时候保卫德国西部。原定在9月份第一个星期开始举行的一年一度的纽伦堡党代表大会，希特勒曾在4月1日把它宣布为“和平的党代表大会”的，在8月15日暗暗地取消了。有25万人被征召入伍，到西线的军队中去。对铁路提前发出了动员令。陆军总司令部已计划好迁移到柏林东面的佐森。同一天，海军方面报告，袖珍战斗舰“斯比伯爵”号和“德意志”号及21艘潜水艇已准备好开赴大西洋防区。

8月17日，哈尔德将军在日记里记下了一段奇怪的活：“卡纳里斯同第一局[作战局]查对过。希姆莱、海德里希，上萨尔斯堡：给上西里西亚送150套附件齐全的波兰军眼。”

这是什么意思？直到战后才弄清楚。这牵涉到纳粹党人所制造的最离奇的一个事件。我们还记得，为了能使侵略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有所借口，希特勒和他的将领们曾打算制造过像谋杀德国公使这样的“事件”，这一次也正如过去一样，他们因为看到时间越来越少，就又想制造一个事件，至少照他们的想法，这样就可以使他们在全世界面前有了侵略波兰的理由。

这一事件的代号叫“希姆莱计划”，做法十分简单——也十分露骨。党卫队的秘密警察将利用集中营里的死囚穿着波兰陆军的制服向靠近波兰边境格莱维茨地方的德国广播电台发动假进攻。这个地方靠近波兰边境，这样就可以指责波兰进攻了德国。8月初，最高统帅部谍报局局长卡纳里斯海军上将，接到了希特勒的手令，要他发给希姆莱和海德里希150套波军制服和若干波军小型武器。这使他大为奇怪，8月17日，他问最高统帅部长官这是怎么回事。那位没有骨气的凯特尔说，他也不怎么看得起“这种 行为”，不过他告诉卡纳里斯说，既然是元首亲自下的命令，也就“没有什么法子”了。[⑧]

---

⑥ 哈塞尔著上引书，第53，63—64页。

⑦ 托马斯：《思想和境遇》，载《瑞士月刊》，1945年12月号。

⑧ 卡纳里斯关于1939年8月17日同凯特尔谈话的备忘录，见《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3卷，第580页（纽伦堡文件795—PS）。

卡纳里斯虽然十分反感，但还是服从了希特勒的命令，把制服交给了海德里希。

这位党卫队保安处处长选定了一个叫做阿尔弗雷德·赫尔莫特·瑙约克斯的年轻的党卫队老特务来执行这项计划。对这个奇[519]怪的人物来说，接受这样的任务既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早在 1939 年 3 月，在德国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以前不久，瑙约克斯就曾受海德里希指使把炸药运入斯洛伐克，据他后来供认，这批炸药就是用来“ 制造事件 ”的。

阿尔弗雷德·瑙约克斯是党卫队秘密警察的典型产物，是一种有文化的匪徒。他曾在基尔大学学过工程，在那里第一次尝到了同反纳粹分子殴斗的滋味，有一次他的鼻子给共产党人打瘪了。他是在 1931 年参加党卫队的，在 1934 年保安处成立时就到了那里。像海德里希周围许多别的年轻人一样，他喜欢从事党卫队内被认为是一种花脑筋的研究——特别是“ 历史 ”和“ 哲学 ”。同时他也很快地成了一个被认为是难对付的年轻人（另一个斯科尔兹内也是这样一个人），可以被委托去执行希姆莱和海德里希所设想出来的那种不大光彩的任务。*1944 年 10 月 19 日，瑙约克斯投奔了美国人，一年以后在纽伦堡作了一批画押口供，其中之一就是希特勒为了使进攻波兰能有所借口而制造的“ 事件 ”的经过，这样就为历史保存了一段实录。

1939 年 8 月 10 日或者这一天前后，保安处处长海德里希亲自下令，让我伪装进攻波兰边境附近的格莱维茨电台，[瑙约克斯在 1945 年 11 月 20 日在纽伦堡的一份画押口供中说]而且要装作这支进攻部队像是波兰人组成的那样。海德里希说：“ 对外国报界和德国宣传来说，都需要有足以证明是波兰人进行这次进攻的真凭实据…… ”

给我的命令是攻占广播电台，占领时间要长到足以让一名归我指挥的能说波兰活的德国人广播完一篇波兰语的演说。海德里希告诉我说，这篇演说应当讲到德国人同波兰人之间开战的时间已经到了……海德里希还告诉我说，他预料德国在几天之内即将进攻波兰。

我到格莱维茨去，在那里等候了 14 天……8 月 25 日至 31 日之间，我去见了秘密警察头子海因里希·缪勒，他当时正在附近的奥普林。缪勒当着我[520]的面同一个叫做梅尔霍恩的人*讨论了制造另一个边境事件的计划，要把事情做得看起来是波兰士兵进攻德国军队那样……缪勒说他有 12 名到 13 名的死囚，要让他们穿上波军制服，把他们弄死后放在出事地点，以此表明他们是在进攻时被打死的。为了这个目的，海德里希部下的医生要给他们打毒药针，然后再用枪打，在他们身上造成伤口。事件发生之后，要把报界人士和其他人士带到现场去……

缪勒告诉我，他从海德里希处得到一个命令，要给我这样一些死囚来布置格莱维茨的事件。他在提到这批死囚时所用的代号是“ 罐头货 ”。[⑨]

当希姆莱、海德里希和缪勒在希特勒的命令下准备利用这批“ 罐头货 ”为德国侵略波兰制造借口的时候，元首在部署三军方面也作出了第一个决定性的行动，准备应付可能会打大的战争。在 8 月 19 日——这是又一个关键性的日子——给德国海军下达了出发的命令。

21 艘潜水艇奉命进入不列颠群岛以北和西北的阵地，“ 斯比伯爵 ”号启碇开赴巴西沿岸海面，它的姊妹舰“ 德意志 ”号也进驻能切断北大西洋中英国海上航路的阵地。[④]

向各战舰下达出发令以准备可能对英国采取行动的这一天是十分重要

[⑨] 瑙约克斯的供词，同上，第 6 卷，第 390—92 页（纽伦堡文件 2751—PS）。

[④] 潜水艇是在 8 月 19 日与 23 日之间启航的，“ 斯比伯爵 ”号的启航日期是 8 月 21 日，“ 德意志 ”号是 8 月 24 日。

的。因为正是在 8 月 19 日这一天，在柏林进行了一个星期的疯狂的呼吁以后，苏联政府终于给了希待勒以他所要求的答复。

纳粹一苏联谈判：1939 年 8 月 15—21 日

冯·德·舒伦堡大使在 8 月 15 日晚上 8 时见了莫洛托夫，而且，按照柏林的指示，向他宣读了德国外交部长表示准备到莫斯科来解决苏德关系的急电。据那天深夜德国大使发往柏林的“特急绝密”电报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以最大的兴趣”听取了他的陈述，并且“热烈欢迎德国想改善对苏关系的愿望”。虽然如此，莫洛托夫毕竟是要外交的老手，仍然不露一丝着急的迹象。他说，像里宾特洛甫所建议的那种访问，“要求有充分的准备，才能使双[521]方的意见交换得到结果”。

什么结果？这位诡计多端的俄国人是给了一点暗示的。他问道，德国政府是否有兴趣在两国之间签订一项互不侵犯条约呢？它是否准备发挥它对日本的影响来改善苏日关系并且“消除边境冲突”呢？（指的是在满洲一蒙古边境上已经打了整整一夏天的没有宣战的战争。）最后，莫洛托夫问道，如果苏德联合担保波罗的海国家的话，德国以为如何呢？

他最后说，所有这一类问题“都必须具体讨论，那样，在德国外交部长来到了这里以后，就不会仅仅是交换交换意见，而是能作出具体决定”。他再一次强调“对这些问题进行充分的准备是必不可少的”。[⑩]

这样看来，缔结纳粹一苏联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还是俄国人第一个倡议的——而且是在他们同法国和英国谈判必要时协同作战来制止德国侵略的时候倡议的。*希特勒对“具体讨论”这样一个条约当然大喜过望，因为这个条约将使俄国置身于战争之外，从而能使他放胆进攻波兰而无需害怕苏联干涉。而如果苏联置身于外的话，他深信英国和法国是会不寒而栗的。

莫洛托夫的这些建议正好就是希特勒所希望的东西；而且，它们比他所敢于提出的更具体，更痛快。只有一个困难：8 月份快完了，而莫洛托夫还在那里坚持在德国外交部长访问莫斯科以前要有“充分准备”，希特勒可等不及苏联人这种慢吞吞的步子。威廉街在 8 月 16 日清晨 6 点 40 分就把舒伦堡关于他同莫洛托夫的谈话的报告用电话传给了在富许尔的里宾特洛甫，里宾特洛甫又急急忙忙翻过山到上萨尔斯堡去向元首请示。到了午后，他们就拟好了给莫洛托夫的答复，从电传打字机上传给在柏林的威兹萨克，指示他立即以“特急”电报发往莫斯科。[②]

纳粹独裁者无条件地接受了苏联的建议。舒伦堡奉里宾特洛甫之命再次进见莫洛托夫并且通知他：

> 德国准备同苏联缔结一项互不侵犯条约，而且，如果苏联政府也有同样愿望的话，这项条约的期限可定为 25 年，期满以前不得废除。除此而外，德国还准备同苏联一起对波罗的海各国作出担保。最后，德国也愿意发挥影[522]响来改进并巩固俄—日关系。

德国政府一切装作不急于同莫斯科做交易的伪装都抛掉了。

[⑩] 舒伦堡 8 月 16 日早上二点四十八分发出的电报，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 7 卷，第 76—77 页。他后来由信使带去一份比较全面的报告，并在致威兹萨克的信中补充了细节，同上，第 87—90，99—100 页。

[②] 里宾特洛甫 8 月 16 日发给舒伦堡大 使的电报，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 编》，第 7 卷，第 84—85 页。

元首的意见是［里宾特洛甫的电报接着说］，鉴于目前时局的变化，并且鉴于不论哪一天都有可能发生严重的事变（在这一点上请向莫洛托夫先生说明，德国决不能无限期地容忍波兰的挑衅），亟需从根本上迅速澄清德俄关系，并澄清各自对当前问题的态度。

为此，我已准备在星期五（8 月 18 日）以后的任何时候飞赴莫斯科，由元首授以全权，来谈判德俄关系的全部问题，而且，如果时机成熟的话，签订相应的条约。

里宾特洛甫再次在这封电报后面加上了一段“附言”——他个人给大使的指示。

我要求你再一次把这一指示逐字读给莫洛托夫听，并且要求立即知道俄国政府和斯大林先生的意见。为让你心中有数起见，再告诉你一句绝对要保密的话，如果我能在本周末或者下周初到莫斯科的话，对我们将特别有利。

第二天，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在高山顶上十分着急地等待着莫斯科的回答。莫斯科和柏林之间电讯来往当然不可能说来就来——然而那两位高居在巴伐利亚阿尔卑斯山顶上的人却似乎忘记了这一事实。到 8 月 17 日中午，里宾特洛甫又给舒伦堡发了一封“特急”电，要求对方“用电报报告：你是什么时候求见莫洛托夫的，会谈安排在什么时候”。①到吃晚饭的时候，那位被逼得很紧的大使的复电来了，也是“特急”，说的是他在前一天深夜 11 点钟才接到外交部长的电报，要进行任何外交活动都太晚了。今天（8 月 17 日）早上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同莫洛托夫约好在晚上 8 点见面。②

对于现在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一般的纳粹领导人来说，这次会谈的结果是失望的。俄国外交人民委员不但知道希特勒在着急，而且无疑也完全知道是为了什么理由，因此他就想种种办法耍弄他们。在舒伦堡向他读里宾特洛甫的电报的时候，莫洛托夫并不怎么关心它的内容，听完了以后，他就拿出了苏联政府对德国外交部长 8 月 15 日第一次来信的书面答复。［523］

这份复照一开头就尖刻地回溯了纳粹政府以前对苏俄的敌视行为，并且说，“直到最近以前，苏联政府行事都一直假定德国政府是在找机会同苏联发生冲突……更不用提德国政府利用所谓反共公约努力建立而且已经建立了一批国家反对苏联的统一战线这件事实了”。复照解释说，正是由于这个理由，俄国“才参与组织一个反对[德国]侵略的联合防御阵线”。

虽然如此[照会继续说]，如果德国政府现在要对过去的政策实行改变，准备认真改善同苏联的政治关系的话，苏联政府尸能对这样一种改变表示欢迎，并且准备在自己这方面修改政策，以便认真改善对德关系。

但是，俄国照会坚持，这一定要通过“认真而实际的步骤”来做到——而不是像里宾特洛甫所建议的那样跨一大步。

到底是什么样的步骤？

第一步：缔结一项贸易与贷款协定。

第二步：“可在不久以后”缔结一项互不侵犯条约。

在采取第二个步骤的同时，苏联人要求“签订一项特别议定书，明确规定缔约双方在这个或那个外交政策问题上的利益”。这显然是暗示，至少是在瓜分东欧问题上，莫斯科已经同意德国人的意见，认为可以作一笔交易了。

至于德国方面所建议的里宾特洛甫访苏之举，莫洛托夫宣称，苏联政府对此“甚为满意”，“因为派遣这么一位显要的政治家前来，突出地表明了

---

① 同上，第 100 页。

② 同上，第 102 页。

德国政府的态度是十分认真的，与英国适成显著的对比，后者只派了像斯特兰那么一个二流角色到莫斯科来。虽然如此，对德国外交部长的来访，仍然需要作充分准备。这种访问必然会大事张扬，苏联政府却并不喜欢招摇，而宁愿不声不响地做些实际工作”。[①]

莫洛托夫提都没有提到里宾特洛甫所说的他要在周末到莫斯科来的那项迫切的具体的建议，而舒伦堡则也许因为谈话的结果有点出乎他意料之外，也没有多提这件事。

第二天，里宾特洛甫在接到大使的报告以后，就催起这件事来了。十分明显，希特勒现在是不顾一切了。8 月 18 日晚间，从他在上萨尔斯堡的夏令总部又给舒伦堡发出了一封由里宾特洛甫署名的“特急”电报。这封电报是在 8 月 19 日清晨 5 点 45 分到达莫斯科德国大使馆的，它指示大使“立即安排再次晋见莫洛托夫先生，并且尽可能争取马上同他会谈”。再也没有时间可以坐失[524]了。“我要求你，”里宾特洛甫在电报里说，“告诉莫洛托夫以下的话”：

……我们在正常情况下，当然也愿意通过外交途径来设法调整德俄关系，并且以通常的方式予以实现。但是目前的不同寻常的形势，按照元首的意见，已使我们有必要采取不同的方法以取得迅速的结果。

德波关系一天比一大尖锐。我们必须估计到不论哪一天都可能发生会使公开冲突无法避免的事件……元首认为，我们必须不致在正当努力澄清德俄关系的时候，对德波冲突的突然爆发缺乏心理准备。他因此认为，必须在事先就加以澄清。仅仅为了在发生这样一种冲突的时候能考虑到俄国的利益就有此必要，如果不加以澄清的话，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

德国大使还要说，莫洛托夫所提到的谈判的“第一步”即缔结贸易协定已经在当天（8 月 18 日）在柏林完成了，现在是“着手”第二步的时候了。为此，德国外交部长建议自己“立即动身来莫斯科”。他来的时候“将由元首授以全权，来全面地而且最后地解决全部问题”。里宾特洛甫补充说，到了莫斯科以后，他将能够“考虑俄国人的愿望”。

什么愿望？德国人现在已不再兜圈子了。

我也将能够[里宾特洛甫接着说]签订一项特别认定书，明确规定缔约双方在这个或那个外交政策问题上的利益；例如在波罗的海地区划定势力范围的问题。然而，这种解决只有口头讨论才办得到。

这一次，大使决不能从俄国人嘴里得到一个“不”字。

请你强调[里宾特洛甫最后说]，德国的外交政策在今天达到了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请你一定要求对方迅速同意我访问莫斯科，并且有力地反对俄国人任何相反的意见。在这一点上，你必须牢牢记住这样一个决定性的事实，即公开的德波冲突可能很快爆发，因此，我能立即访问莫斯科是我们最大的利益。[①]

8 月 19 日是决定性的一天，让德国潜水艇和袖珍战斗舰开赴英国海面的命令一直压在那里，要等莫斯科来了回音才发。这些[525]舰艇要是打算在希特勒预定发动战争的日期 9 月 1 日到达指定地点的话，它们本应该马上出发的，因为剩下的时间已只有 13 天了。

受命突袭波兰的两路大集团军也应该立即进入阵地了。

柏林，特别是上萨尔斯堡，空气的紧张几乎叫人不能忍受。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神经质地等待着莫斯科的决定。外交部那一天的各种文电透露了威

[①] 舒伦堡 8 月 18 日上午五点五十八分 电报，同上，第 114—16 页。

[①] 里宾特洛甫 8 月 18 日上午十点四十 八分电报，同上，第 121—23 页。

廉街这种紧张不安的感觉。施努尔博士报告同俄国人关于贸易协定的谈判已经在前一天晚上“达成完全协议”后结束了，但是苏联却拖着不肯在上面签字。他说，签字仪式本来要在今天（8 月 19 日）中午举行，但是到了中午，俄国人又打电话来说，他们得等莫斯科来的指示。施努尔报告说，“显然，他们是得到了莫斯科的指示，为了政治上的理由而拖延签字”。[①]从上萨尔斯堡，里宾特洛甫又给舒伦堡发去了一份“特急”电报，要他一定用电报报告莫洛托夫所说的任何一句话，或者足以表明“俄国人的意向”的每一个迹象，但是这天白天，从大使那里一共只收到了一份电报，那是照转苏联通讯社塔斯社在莫斯科的一则辟谣声明。塔斯社否认外传俄国和英法军事代表团之间已在远东问题上陷于僵局，不过，它又说 3 国代表团在“完全不同的问题上”存在分歧。对希特勒来说，这是一个信号——还有时间，也还有希望。

然后，到 8 月 19 日晚上 7 点 10 分，那份望眼欲穿的电报终于来了。

机　　密

特　急

苏联政府同意德国外交部长在经济协定宣告签字以后一星期到莫斯科来。奠洛托夫说，如果缔结经济协定的消息明天公布的话，德国外交部长就可以在 8 月 26 日或者 27 日到达莫斯科。

莫洛托夫交给了我一份互不侵犯条约草案。

关于我今天同奠洛托夫所作的两次谈话的详细报告以及苏联草案的全文将立即用电报发上。

舒伦堡[①]

据大使报告，8 月 19 日下午 2 时在克里姆林宫开始的第一次谈话继续了一个小时，进行得并不很好。看起来，似乎无法一下子迫使俄国人接待德国外长，“莫洛托夫坚持，”舒伦堡在电报中说，“即使要在大体上确定访问的日期，目前也是办不到的，因为那需要充分的准备……对于我再三指出而且极其强调的必需赶快的理由，莫洛托夫答称，迄今为止，甚至第一个步骤——缔结经[526]济协定——都还没有完成。首先，经济协定要签字并公布，而且要在国外发生预期的影响。然后才轮得到互不侵犯条约和议定书。

“莫洛托夫显然毫不为我的异议所动。莫洛托夫声称，他已把苏联政府的观点告诉了我，已经再也没有别的话要补充了，在这以后，第一次谈话就结束了。”

但是，很快，他就有话要补充了。

“这次谈话结束以后还不到半小时，”舒伦堡继续报告说，“莫洛托夫通知我，要我在下午 4 点 30 分再到克里姆林宫去见他。他为麻烦我表示歉意，并且向我解释，他已经向苏联政府作了报告。”

接着，这位外交人民委员就交给这位又惊又喜的德国大使一份互不侵犯条约草案，并且告诉他，如果贸易协定能在明天签字并公布的话，里宾特洛甫就可以在 8 月 26 日或者 27 日到莫斯科来。

“莫洛托夫并没有对他突然改变主意举出什么理由。”舒伦堡在电报上补充说，“我猜想是斯大林过问了这件事。”[②]

这个猜想无疑是正确的。据丘吉尔说，苏联想同德国签订条约的意图是

[①] 施努尔 8 月 19 日备忘录，同上，第 132—33 页。

[①] 舒伦堡 8 月 19 曰下午六点二十二分 电报，同上，第 134 页。

[②] 舒伦堡 8 月 20 日上午十二点八分电 报，同上，第 149—50 页。

斯大林 8 月 19 日晚上向政治局宣布的。[①]从舒伦堡的电报中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一天略早一点的时候——大概在下午 3 点到 4 点半之间——他把他那决定大局的决定告诉了莫洛托夫。

整整 3 年以后，在 1942 年 8 月间，“有一天清早”（丘吉尔后来报告说）这位苏联独裁者给当时在莫斯科访问的英国首相谈到了他所以采取这一厚颜无耻的行动的一些理由。[②]

我们形成了这样一个印象，[斯大林说]英国和法国政府并没有决心在波兰受到攻击的时候打仗。但是他们希望英国、法国和俄国在外交上的联合会吓退希特勒。我们肯定，这样做是达不到目的的。斯大林曾问过：“法国动员起来以后，能拿出多少个师来对付德国？”答复是：“大约 100 个。”他又问：“英国能拿出多少个？”答复是：“两个，以后还可以再加两个。”“啊，两个，以后再加两个。”斯大林重复了一遍。然后他问道，“你知道不知道，要是我们同德国打仗的话，我们得在俄国战场上投入多少个师？”停了一下，他自己回答说：“300 个以上。”

舒伦堡在报告关于他 8 月 19 日同莫洛托夫谈话的结果的电报中还曾说，他想劝诱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同意里宾特洛甫早日访问莫斯科的企图，“不幸，没有成功”。

不过，对德国人来说，此事非成功不可，侵入波兰的全部时间表，实际上也就是到底能不能在秋雨大降以前的短短时期内发[527]动进攻的问题,全要看这一点来决定。德国人害怕，要是莫斯科不能在 8 月 26 日或者 27 日以前接待里宾特洛甫的话，要是俄国人稍稍拖延一下的话，9 月 1 日的预走日期就无法保持了。

在这个成败关头，阿道夫·希特勒决定直接同斯大林打交道。他放下了架子，亲自请求这位他长期以来一贯痛骂诅咒的苏联独裁者立即同意他的外交部长到莫斯科去。他给斯大林的电报是在星期天（8 月 20 日）下午 4 点 45 分急急发到莫斯科去的，离他收到舒伦堡的电报刚好 12 个小时。元首指示大使“立即”把它交给莫洛托夫。

莫斯科

斯大林先生：

我衷心地欢迎新的德苏商务协定的签字，认为它是改变德苏关系的第一步。*

同苏联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对我说来，意味着确立德国的长期政策。德国从此将恢复过去若干世纪中对我们两国都属有益的政治方针……

我接受你的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先生交来的互不侵犯条约草案，但是认为迫切需要尽快地澄清与之有关的问题。

苏联所希望的补充议定书的内容，我深信，在最短期间就能够得到澄清，如果能有一位负责的德国政治家亲自到莫斯科去谈判的话。如若不然，德国政府就无法明白，这项补充议定书怎么样才能在短时期内澄清并解决。

德国和波兰之间的紧张关系已变得不可容忍了……不论哪一天都可以爆发危机。德国已经下定决心从现在起以在它支配下的一切手段来保护它的国家利益。

在我看来，鉴于我们两国都有建立彼此间新关系的愿望，最好是不要丧失任何时间。我因此再次建议你在星期二（8 月 22 日）接见我的外交部长，至迟到星期三，8 月 23 日。德国外交部长有最充分的权力来拟定并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和议定书。鉴于目前的国际形势，外交部长在莫斯科只能逗留一天，至多两天，再长是不可能的。我将十分高兴得到你尽早的答复。

[①] 丘吉尔：《风暴欲临》，第 392 页，他 未指明来源。

[②] 同上，第 391 页。

阿道夫·希特勒[①]

在以后的 24 小时中，从星期天（8 月 20 日）晚间希特勒给斯大林的呼吁通过电台发向莫斯科开始，到第二天的傍晚，元首一直是处在近乎精神崩溃的状态中。他连觉都不能睡。半夜里，他[528]还打电话给戈林，说他心里嘀咕斯大林对他的电报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并且对莫斯科迟迟不作答复感到惶惶不安。到 8 月 21 日凌晨 3 点钟，外交部接到了舒伦堡的“特急”电，说威兹萨克早先通知他的希特勒要发给他的电报还没有收到。大使提醒外交部，“公务电报从柏林到莫斯科要四到五小时，包括两小时的时差在内。此外还必须加上翻译密码的时间”。[①]8 月 21 日（星期一）上午 10 点 15 分，急得不得了的里宾特洛甫给舒伦堡发了一个急电说：“请竭尽全力保证我能成行，日期如前电所示。”[②]中午过了不久，大使通知柏林：“我将于今日下午 3 时往见莫洛托夫。”[③]

最后，到 8 月 21 日晚上 9 点 35 分，斯大林的复电才到了柏林。

致德国总理

阿·希特勒：

我感谢你的来信。我希望德苏互不侵犯条约将成为改善我们两国关系的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

我们两国人民都需要彼此间的和平关系。德国政府赞成缔结一项互不侵犯条约，为在我们两国之间消除政治方面的紧张状态并且实现和平与合作提供了基础。

苏联政府命我通知你，他们同意冯·里宾特洛甫先生在 8 月 23 日到达莫斯科。

约·斯大林[④]

就翻云覆雨、不讲信义这一点而言，纳粹独裁者在苏维埃暴君身上真算得上是棋逢敌手了。现在他们两个人已经打开了道路，可以在一起最后完成这个不体面的时代一桩最卑鄙的交易了。

斯大林的复电是晚上 10 点 30 分转到在伯格霍夫的希特勒那里的。本书作者还记得,几分钟以后——晚上 11 点刚过——德国广播电台的音乐节目突然中断了，广播员宣布：“德国政府和苏联政府已经协议缔结一项互不侵犯条约。德国外交部长将在 8 月 23 日，星期三，到莫斯科完成这项谈判。”

希特勒在得到斯大林亲自保证俄国将成为一个友好的中立国以后，第二天（1939 年 8 月 22 日）再一次把他的最高级将领召到了上萨尔斯堡，向他们宣扬他自己的伟大，并且要求他们打起仗来必须残酷无情，不要有任何怜悯，并且告诉他们，他很可能在 4 天以后即星期六（8 月 26 日）就下令进攻波兰——比原定计划提前 6 天。成全了这样一件事情的是斯大林，是元首的不共戴天的敌人。［529]

1939 年 8 月 22 日的军事会议

将军们发现希特勒又来了他那股极其狂妄和毫不妥协的劲儿。*他告诉他们说，“我把你们叫来，是为了要你们了解目前政治局势的轮廓，这样可以

[①] 希特勒 8 月 20 日致斯大林电报，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 7 卷，第 156—57 页。

[①] 舒伦堡 8 月 21 日早上一点十九分电报，同上，第 161—62 页。

[②] 里宾特洛甫 8 月 21 日电报，同上，第 162 页。

[③] 舒伦堡 8 月 21 日下午一点四十三分电报，同上，第 164 页。

[④] 斯大林 8 月 21 日致希特勒的信，同上，第 168 页。

使你们对我据以作出我的无可更改的决定的各项因素能有深入的了解，也可以加强你们的信心。在此以后，我们就可以讨论军事上的各项细节了”。首先，他说，是两项关于个人的考虑。

我自己这个人和墨索里尼这个人。

从根本上说，一切都决定于我，决定于我的存在，原因就在于我的政治才能。除此而外，也在于这个事实：很可能再也没有一个人能享有我所享有的德国全体人民的信任了。从今以后很可能再也没有任何一个人能有比我更大的权力了。我的存在因此就具有极大的价值。但是，任何时候我都可能被一个罪犯或者一个疯子干掉。

第二个个人的因素是意大利领袖。他的存在也是决定性的。要是他有个三长两短的话，意大利对这个联盟的忠诚就不再靠得住了。意大利的王室基本上是反对那位领袖的。

佛朗哥也是一支力量。他会保证西班牙保持“同情的中立”。至于说到“对方”，那末，他向他的听众担保，“在英国和法国没有什么杰出的人物”。

这位恶魔一般的大独裁者，大概一直不断地这样唠叨了有好几个钟头，中间只因吃一顿迟开的中饭中断了一会。从记录上，找不到任何迹象表明有任何一个陆军将领、海军将领、空军将领敢[530]于打断他的话头，对他的判断提出异议，甚至对他的谎言也不敢否认。他说，他在春天就已经决定同波兰开战是不可避免的，不过他认为他首先得对付西方。不过，后来逐渐“明白”，在那种情况下，波兰会进攻德国，因此，它应当在现在就予以清算。

无论怎么说，发动战争的时间已经来到了。

对我们来说，并不难作出决定。我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损失；我们只能得到好处。我们的经济情况是，我们支持不了几年了。戈林可以证实这一点。我们没有别的选择，我们必须行动……

除了个人的因素而外，政治形势也是对我们有利的；在地中海，意大利、法国和英国在争雄；在远东，存在着紧张局面……

英国处在极大的危险中，法国的地位也在恶化。人口出生率在下降……南斯拉夫内部潜伏着崩溃的种子……罗马尼亚比从前更弱了……在凯末尔死了以后，统治土耳其的是一批眼光短浅、动摇不定、软弱无能的人物。

所有这些有利的形势在两三年后就不会存在了。谁也不知道我会活多久。因此，最好现在就摊牌，要再拖延个四五年就不保险了。

这些就是纳粹领袖的疯狂的推理。

他认为西方“非常可能”不会打仗，不过这点风险是必须要冒的。难道他过去没有冒过险吗？在将军们想后退的时候进军莱因兰，难道不是冒险吗？在占领奥地利、苏台德区和残存的捷克斯洛伐克的时候，难道他没有冒过险吗？“汉尼拔在坎尼，腓德烈大王在拉顿，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在坦能堡，”他说，“都是冒了险的，因此我们现在也必须冒只能由铁的决心来制胜的风险。”决不容许软弱退缩。

有许多身居高位而心存观望的德国人，在捷克问题解决了以后给英国人谈过话，写过信，这造成了很大的损害。就在你们动摇失志而过早地屈服的时候，元首达到了他的目的了。

哈尔德、维茨勒本和托马斯，也许还有别的参加过慕尼黑密谋的将军在听到这几句话的时候，一定打了一个寒战。希特勒所知道的，显然比他们以为他所知道的要多。

不论怎么说，现在是要他们全体表现出自己的战斗能力的时候了。希特勒提醒他们，他已经用“政治上的恐吓”建立了一个大德意志，现在必须要“考验军事机器”了。“在西线的大决战以前，军队必须进行一场真刀真枪的战斗。”波兰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机会。

话头接着又转到了英国和法国。

西方要同我们作战只有两个可能：[531]

1.封锁：这起不了作用。因为我们能自给自足，而且我们能从东方得到援助。

2.从马奇诺防线进攻西线。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另外一个可能性是侵犯荷兰、比利时和瑞士的中立。英国和法国不会侵犯这些国家的中立。事实上，它们帮不了波兰的忙。

会不会变成一场长期战争？

谁都不指望打一场长期战争。要是冯·勃劳希契先生告诉我说，我要花 4 年的时间才能征服波兰，我就会回答说那不行。说英国想打一场长期战争是胡扯。

在踌躇满志地说完了波兰、英国和法国的问题以后，希特勒打出了他最大的王牌，把话题转到俄国。

敌人还有一个希望，希望我们征服波兰以后，俄国会与我们为敌。敌人没有估计到我有这样大的决心。我们的敌人是小蛆虫，我在慕尼黑已经领教过他们了。

我深信斯大林是不会上英国人的当的。只有瞎了眼的乐观派才会相信斯大林会傻到看不穿英国人的打算。维持波兰的存在对俄国人并没有什么好处……李维诺夫的免职是决定性的。对我来说，这就像轰的一声炮响一样，显示了莫斯科对西方国家态度转变的迹象。

我逐步对俄国作了转变，我们借商务条约转入了政治谈判。最后俄国人提议签订一项互不侵犯条约。4 天以前，我采取一项特别步骤，结果，俄国在昨天宣布它愿意签字了。同斯大林的个人接触已经建立了。里宾特洛甫后天就要去签订条约。波兰现在已处在我要它处的地位了……摧毁英国的霸主地位已经开始了。我已经完成了政治上的准备，底下的路要由军人来走了。

底下的路要由军人来走了，这就是说，如果张伯伦不再来一个慕尼黑的话。“我只怕，”希特勒对他的将领们说，“有些 Schweinehund*会提议调停。”

到这里，会议中断，大家吃中饭去了。不过在吃饭以前，戈林还曾对元首表示感谢，感谢他给大家指出了道路，并且向他保证三军一定尽自己的天职。④

希特勒下午的演说主要是用来给他的军事首脑打气，设法使 [532]他们坚强起来担当面前的任务。从所有 3 份粗略的笔记都可看出这番话的性质。

我们必须有最坚强的铁一般的决心。在任何情况面前都不容退缩。每一个人都必须认清我们已经下定决心从一开始起就同西方国家作战。一场生死的斗争……长期的和平对我们不会有什么好处……一种大丈夫的气概……我们的人比他们强……对方比我们弱……我国在 1918 年所以崩溃是因为精神上准备不足。腓德烈大王所以顶得住，只是因为他坚忍不拔。

打垮波兰是第一件要做到的事。目标是消灭有生力量，而不是为了到达一条规定好的界线。即使西线爆发战争的话，打垮波兰仍然是首要目标。由于季节的理由，必须速战速决。

我将提出发动战争的宣传上的理由——不必管它讲得通，讲不通。胜利者在事后是没有人问他当初说的是不是实话的。在发动战争和进行战争时，是非问题是无关紧要的，紧要的是胜利。

---

④ 根据《纽伦堡文件 C—3》（见本书原文第 529 页脚注）的记载。戈林跳到了桌子上并且作了“杀机大动的感谢和杀气腾腾的保证。他像一个野人一样转着跳舞。有几个心存怀疑的人，一声也没有吭”。1945 年 8 月 28 日到 29 日戈林在纽伦堡受审的时候，对这段描写大为恼怒。戈林说，“我否认我曾站在桌子上。我希望你们知道这篇演说是在希特勒私邸的大厅里讲的。我并没有在私人住宅里跳到桌子上去的习惯。这是同一个德国军官的仪态完全不相称的行为”。“但是，事实是，你在讲话完了以后领导大家鼓了掌，你有没有这样做？”讯问他的美国人约翰·哈兰·阿门上校这时向他提出了这个问题。“是的，不过不是在桌子上，”戈林答道。

心要狠！手要辣！

8000 万人民一定要得到他们应得的权利……谁强就是谁对……心要硬，不要发慈悲！要心如铁石，不要有怜悯！谁若是仔细想过这个世界的道理的话，谁就懂得它的意义就在于优胜劣败，弱肉强食……

元首这时的情绪已到了条顿式盛怒的程度，在大发了这样一通尼采式的训诫以后平静了下来，对马上要进行的战役发出了几点命令。最根本的是速度。他对德国军人有“不可动摇的信任”，如果发生任何危机的话，只可能是因为司令官丧了胆。第一个目标是要从东南方楔入维斯杜拉河地区，同时从北方楔入那累夫河和维斯杜拉河之间的地区。他说，军事行动决不能受他在打败波兰以后可能对波兰所作的处置的影响。不过对这一点他说得很模糊。他说，新的德国边疆将根据“确当的原则”来决定。可能他会在德国与俄国之间成立一个小小的波兰缓冲国。

他最后说，开战的命令将在以后下达，很可能在星期六（8 月 26 日）早晨。

第二天，8 月 23 日，在最高统帅部各局首长会议以后，哈尔德将军在日记里写道：“Y 日已确定在 8 月 26 日（星期六）。”[533]

莫斯科盟国谈判的僵局

到 8 月中旬的时候，西方民主国家同苏联之间在莫斯科的军事谈判事实上已陷于停顿——在这方面，波兰人的不肯妥协要负主要责任。大家还记得，英法军事代表团坐了一条慢船到列宁格勒以后，于 8 月 11 日到达莫斯科，刚好在出使失败的斯特兰先生离开这个俄国首都一星期之后。斯特兰能把同俄国人谈判这个困难而不愉快的差事交给将军们去办，显然感到如释重负。*

现在需要赶快拟定的是一项军事条约，其中将详细规定在什么地方，以何种方式，用什么武力来对付纳粹军队。但是据英国方面对军事谈判的详细记录和英国代表的报告透露，[2]英法军事代表团不是派到莫斯科去讨论细节的，而是讨论“一般原则”的。虽然如此，俄国人还是坚持要立即着手讨论实际的具体的而且——在英法方面看来——难办的问题。对于英法方面由杜芒克将军在第一次会议上所宣布的原则，伏罗希洛夫的反应是，它们“太抽象、太不具体了，没有使任何人承担做任何事情的责任……我们在这里开会”，他冷冷地说，“不是为了作抽象的宣言，而且要制定一项全面的军事条约”。

这位苏联元帅提出了一些非常具体的问题：有没有什么条约规定波兰该

---

[2] 同上，第 3 卷，第 7 册，附录 II，第 558—614 页。附录中有莫斯科军事会谈每日详尽记录，在盟国方面关于这次会谈的材料中，这是我所见到的最全面的。其中并有伯纳特空军中将和海伍德将军在会谈期间向伦敦发出的报告，德拉克斯海军上将所写的英国代表团最后报告。还有杜芒克将军和伏罗希洛夫元帅在 8 月 22 日晚间的一次戏剧性会谈的逐字记录，当时这位法国军事代表团长拼命想挽回局势，尽管已宣布里宾特洛甫将于次日抵达莫斯科。还有盟国代表团 8 月 26 日与伏罗希洛夫最后一次痛苦的会谈的记录。第 7 册中还收英国外交部与驻莫斯科大使馆的许多函电往来，说明了这次事件的经过。本章此节主要根据的是英国的这些机密文件。不幸，据我所知，俄国人从来没有发表过他们方面的材料，虽然尼科诺夫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因》一书提供了苏联方面的记述，其中充分利用了英国外交部的文件。苏方的记述还可见波将金编的《外交史》。

采取什么行动？一旦战争爆发的话，英国拿得出多少军队来援助法国军队。比利时会怎么办？他所得到的答复是不大能令人放心的。杜芒克说，他对波兰的计划一无所知。海伍德将军说，英国人预期“在战争初期可以第一批派出 16 个师，以后再派出第二批 16 个师”。伏罗希洛夫逼着要他说明在爆发战争的时候手边到底有多少个师，海伍德回答说，“目前英国有 5 个正规师和 1 个机械化师”。这种不像样的数目在俄国人听起来，完全出乎意外而且令人不快，他们说，他们已准备好，战争一开始就摆开 120 个步兵师来对付从西面来的侵略者。

至于比利时，杜芒克将军在回答俄国人的问题时说，“法国军队不能进入［比利时］，除非人家请他们进去，但是法国准备答应任何请求”。

这种答复，在莫斯科的军事谈判代表们面前提出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而这却正是英国人和法国人渴望避免的问题。首先在第一次会议上，接着又在 8 月 14 日一次关键性的会议上，伏罗希洛夫元帅强调，根本的问题是波兰是否愿意允许苏联军队进入它[534]的领土去迎击德国人的问题。如果不愿意的话,盟国又怎么能阻止德国军队迅速席卷波兰呢？在 8 月 14 日那一次会议上，他具体问道：“英国和法国的参谋总部是否认为苏军可以越过波兰，特别是越过维尔那山峡和加利西亚去同敌军接触？”

这是问题的核心。据西兹打电报告诉伦敦说，俄国人现在

> 提出了军事谈判成败所系的根本性问题，这个问题确实也是政治谈判开始以来成为我们一切困难的根子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在苏联的邻国始终维持某种抵制的情况下同苏联达成任何有效的协议，而这种抵制只有到……为时已晚以后才会取消。

如果这个问题提出来的话（它怎么可能不提出来呢？），德拉克斯海军上将锦囊之中是有英国政府教给他如何对付的指示的。英国内部文件中透露出来的这项指示，在今天看起来，实在是天真到令人不可置信。鉴于波兰和罗马尼亚对于“可能进行合作的计划甚至连考虑也不愿考虑”，他要采取的“论点”是：

> 对波兰和罗马尼亚的侵略将大大改变它们的看法。不仅如此，德国如果能在俄国大门口占据一块地盘的话，也是对俄国大大不利的事情……因此，从俄国自己的利益出发，如果波兰和罗马尼亚受到侵略的话，它应当有援助这些国家的计划的。
>
> 如果俄国人建议英国和法国政府应当向波兰、罗马尼亚或者波罗的海国家提出同苏联政府或者总参谋部实行合作的建议，代表团不应作任何承诺，而应该向国内请示。

他们果然这样做了。

在 8 月 14 日的会议上，伏罗希洛夫要求对他的问题作“直截了当的答复”。“如果没有确切而毫不含糊的答复的话，”他说，“军事谈判继续下去是没有用处的……苏联军事代表团，”他补充说，“不能向自己的政府建议参加这样一个显然注定要失败的事业。”

甘末林将军从巴黎指示杜芒克将军设法把俄国人从这个题目上引开去。但是俄国人不是好甩开的。[①]

据杜芒克将军后来报告，8 月 14 日的会议颇富于戏剧性。英国和法国代表被将死了。他们自己也知道，然而却还想尽量回避这个问题。德拉克斯和

[①] 保罗·雷诺：《斗争最前线》，第 212 页。雷诺在第 210—33 页中提出了法国方面关于 1939 年 8 月莫斯科会谈的情况的叙述。他在第 211 页中说明了材料来源。庞纳在其所著《欧洲的末日》一书中提出了他的看法。

杜芒克硬是说，他们肯定波兰人和罗马尼亚人在自己的国家受到进攻时一定会马上请求俄国人援助。杜芒克十分有把握地说，他们会“ 央求元帅支持他们的 ”。德拉克斯认为，说他们不会请求苏联援助是“ 不可想象的 ”。他还——看起来不怎么合乎外交策略——加了一句，“ 如果他们在必要时还不请[535]求援助，而让他们自己被征服的话，就可以预料他们将成为德国的省份 ”。这是俄国人最不愿见到的事情，因为它意味着纳粹军队陈兵苏联边境，伏罗希洛夫特别注意到了这位海军上将这句不该说的话。

最后，如坐针毡的英法代表认为，伏罗希洛夫提出了他们所没有资格处理的政治问题。德拉克斯宣称，既然波兰是一个主权国家，首先得由它的政府来许可俄国军队入境。不过由于这是一个政治问题，它应当由有关政府去解决。他提议苏联政府把这个问题向波兰政府提出来。俄国代表团同意这是一个政治问题。但是它坚持必须由英国和法国政府把这个问题向波兰人提出来，并且对他们施加压力，使他们懂道理。

鉴于俄国人在这个时候也在同德国人打交道，他们到底是真心诚意地同英法军事代表进行谈判呢，还是他们像英法外交部（更不用提德拉克斯海军上将了）后来所说的那样，仅仅为了拖延谈判以便等待同希特勒成交而坚持取得军队开进波境的权利呢？*

据英国和法国内幕人士透露，在开头的阶段，西方盟国的确认为苏联军事代表团是真心诚意地在谈判，甚至还认为苏联代表团把这件工作看得过于认真了。8 月 13 日，在军事谈判进行了两天之后，西兹大使打电报给伦敦说，俄国军事首脑似乎当真“ 要搞点名堂出来 ”。结果，要德拉克斯海军上将“ 慢吞吞进行 ”的指示改变了。8 月 15 日英国政府就要他支持杜芒克“ 尽快 ”使军事谈判得出结果来。原来不让他把机密军事情报告诉俄国人的限制也取消了一部分。

杜芒克将军从达拉第总理那里得到的指示，同英国海军上将原来得到的拖延指示不同，是要设法尽早同俄国缔结一项军事条约。尽管英国人害怕消息可能走漏给德国人，杜芒克在第二天的会议上就把法国兵力的数字告诉了俄国人。他把这称之为“ 高度机密的数字 ”，而苏联代表也答应一俟会议结束，立即把他们[536]“ 忘掉 ”。

杜芒克和德拉克斯要求本国政府指示如何回答俄国人关于波兰的问题，等了 3 天都没有回音。到 8 月 17 日，杜芒克就给巴黎打电报：“ 苏联是想要军事条约的。它不想要我们给它一张没有具体保证的废纸。伏罗希洛夫元帅宣布……只要他所说的那个关键性问题解决以后，一切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 ”杜芒克强烈地要求巴黎设法使华沙同意接受俄国的援助。

不但在莫斯科，而且也在西方国家首都，当时流行的看法都是，英法政府并没有做任何工作来劝说波兰人同意苏联军队在波兰领土上迎击德国人。事实并非如此，从最近发表的文件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伦敦和巴黎是做了相当多的工作的——不过还不够多。同样清楚的是，波兰人的反应，其愚蠢简直不能令人置信。[①]

8 月 18 日，在英法两国第一次试图打开波兰人的眼界让他们认清现实以

[①] 文件见《英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 7 册（见本章注①）。有意义的是，《英国蓝皮书》和《法国黄皮书》中都只字未提英法在华沙进行的外交活动（这些活动的目的是要使波兰人接受苏联的援助），也没有提到莫斯科军事会谈的情况。

后，波兰外交部长贝克告诉法国大使利昂·诺尔，俄国人“在军事上没有什么价值”，而波兰参谋总长斯塔契维奇将军也支持这种看法，宣称他“看不出让红军在波兰领土上作战有什么好处”。

第二天，英法大使再次进见贝克，敦促他同意俄国建议。波兰外交部长还是拖，不过答应在翌日给他们正式答复。这一天英法使节在华沙的外交行动是同一天（8 月 19 日）法国外交部长庞纳和英国代办在巴黎会谈的结果。使这位英国人感到有点意外的是，姑息希特勒最积极的庞纳，因为看到有可能因为波兰人的顽固而失去俄国这样一个盟友也居然着急起来了。

［庞纳告诉他说］如果由于波兰人的拒绝而使同俄国的谈判归于破裂的话，结果将不堪设想……波兰人的拒绝是讲不过去的，因为这是在德国进攻时唯一能立即见效的援助。如果我们要求我们自己的国家参加战争，来保卫拒绝了这一援助的波兰的话，英国和法国政府将处于毫无办法的地位。

如果情况果真如此——毫无疑问它一定如此——那末，英法政府为什么不在这个千钧一发的时刻对华沙施加最后的压力，干脆说除非波兰政府接受俄国援助，英国和法国看不出它们参战援［537］波有什么用处呢？正式的英波共同安全条约当时尚未签订。为什么不能把波兰接受俄国军事援助作为缔结这一条约的一个条件呢？*

庞纳在 8 月 19 日同英国驻巴黎代办的谈话中是提出了这个建议的。但是，伦敦政府对这样一种“计策”（唐宁街是这样叫它的）感到不合适。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不肯走这样的极端。

8 月 20 日上午，波兰参谋总长告诉英国驻华沙的武官说，“在任何情况下都决不能同意苏联军队进入波兰”。当天晚上，贝克就正式拒绝了英法的要求。同一天晚上，哈利法克斯通过他驻华沙的大使，敦促波兰外交部长重新加以考虑，并且用强烈的措辞着重指出波兰的态度“破坏了”莫斯科的军事谈判。但是贝克丝毫不为所动。他告诉法国大使说：“我认为，对于外国军队使用我国领土的问题，不论什么样的讨论都是不能进行的。我们同苏联没有军事协定，我们也不想要。”

在波兰政府这样一种盲目顽固的态度面前，法国总理达拉第着急了，他后来在 1946 年 7 月 18 日对法国制宪议会讲话时说，他决定不顾一切，自行其是。在再一次呼吁波兰人要现实一点以后，他在 8 月 21 日早晨打电报给杜芒克将军，授权他同俄国人按他所能争取到的最好的条件签订军事条约，不过，有一个条件：这项条约一定要由法国政府批准。与此同时，法国驻苏大使保罗—艾米尔·纳吉亚尔也得到庞纳的命令（这是后者以后说出来的）通知莫洛托夫，法国“原则上”同意苏联军队在德国进攻波兰时通过波兰领土。

但是只要波兰人还没有答应，这就只是一种无用的姿态——而且，我们今天可以知道，鉴于俄德之间正在进行交易，这还是一种毫无意义的姿态。杜芒克直到 8 月 21 日晚上才接到达位第的电报。当他第二天晚上——正是里宾特洛甫动身赴莫斯科的前夕——把它告诉伏罗希洛夫的时候，这位苏联元帅表示非常怀疑。他要求看一看叫那位法国将军说法国政府已授权他签订一项准许俄国军队通过波兰的军事条约（杜芒克是已经这么说了的）的证明。显然，杜芒克拒绝了这一要求。伏罗希洛夫下一步要求知道英国的反应如何，是否已经得到了波兰的同意。这些都是没法回答的［538］问题，杜芒克只好答复说，他并无所知。

但是到这个时候，无论是问题还是答案都已经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它

们提得太晚了。里宾特洛甫已经在到莫斯科的路上了。他的访问是前一天晚上宣布的，同时还宣布了此行的目的是：在纳粹德国和苏联之间缔结一项互不侵犯条约。

伏罗希洛夫看来似乎已经对那位法国将军产主了一种真正的好感，很婉转地向他示意：他们之间的接触就快结束了。

［伏罗希洛夫说］我只担心一件事情。法国和英国方面已经让政治和军事谈判拖得太长了。因此，在这个时候，我们决不能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也许会发生某种政治事件。*

里宾特洛甫在莫斯科：1939 年 8 月 23 日

所谓“ 某种政治事件 ”现在发生了。

里宾特洛甫是 8 月 22 日坐飞机动身去莫斯科的。他随身带着希特勒亲笔的全权证书，握有同苏联缔结一经签字立即生效的互不侵犯条约和“ 其他协定 ”的大权，也带着大批随员。第一天晚上，德国代表团在东普鲁士的柯尼斯堡过夜，据施密特博士说，里宾特洛甫在那里工作了整整一宵，不断同柏林和伯希特斯加登通电话，而且为准备同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会谈而作了大量的笔记。

载着德国代表团的两架“ 秃鹫 ”式运输机在 8 月 23 日正午到达莫斯科。在大使馆匆匆吃完午饭以后,里宾特洛甫就急急忙忙[539]赶到克里姆林宫去会见苏联独裁者和他的外交人民委员。第一次会议继续了 3 个小时，据里宾特洛甫在“ 特急 ”电报中告诉希特勒，这次会议对德国人说来进行得很好。[①]从德国外交部长的电报来判断，根本没有任何困难就在将使苏联置身于希特勒发动的战争之外的互不侵犯条约的条款达成了协议。事实上，据他报告，唯一的困难是如何瓜分赃物这样一个显然很小的问题。俄国人要求德国人承认拉脱维亚的利包和温道两个小港“ 在他们的势力范围之内 ”。由于拉脱维亚全境都划在两国势力范围的界线的苏联一面，这个要求并不是什么多大的问题，希特勒很快就同意了。里宾特洛甫在第一次会议后还告诉元首说，“ 预期将就整个东欧地区划分势力范围的问题签订一项秘密议定书 ”。

全部文件——互不侵犯条约和秘密议定书——当天晚上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第二次会谈的时候签字了。德国人和俄国人达成协议太容易了，因此在这次一直开到第二天清早一两点钟的宴会式的会议上，绝大部分时间不是花在什么严重的讨价还价上，而是用来对世界局势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地进行热烈而友好的讨论，中间还充满了克里姆林宫庆祝会上决不可少的敬酒干杯。出席这次会议的德国代表团的一个团员曾写了一份秘密备忘录记下这个外人难以想象的场面。[②]

斯大林曾问到德国的伙伴——意大利和日本——的野心，里宾特洛甫对此作了爽快的、令人放心的回答。谈到英国的时候，苏联独裁者和那位现在举止尽量表现得规矩的纳粹外交部长也发现彼此的看法马上一致。斯大林告诉他的客人说，英国派到莫斯科来的军事代表团“ 从来也没有告诉苏联政府，他们到底要什么 ”。里宾特洛甫在回答时着重点出，英国老是想破坏德国和

[①] 里宾特洛甫 8 月 23 日下午九点五分从莫斯科发出的电报，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 7 卷，第 220 页。

[②] 8 月 24 日德国秘密备忘录，同上，第 225—29 页。

苏联之间的良好关系。他大言不惭地说，“ 英国是软弱的，只想叫别人给它打仗，好让它狂妄地僭取统治全世界的霸权 ”。

这份德国备忘录说，“ 斯大林极表同意 ”，他还说，“ 如果英国真的统治了全世界的话，那是因为老是让自己被它吓唬的其他国家太傻的缘故 ”。

这个时候，苏联的统治者和希特勒的外交部长已经相处极为融洽，即使提起反共公约也不能使他们感到尴尬了。里宾特洛甫再次解释这个条约不是针对苏联而是针对西方民主国家的。斯大林插话说，“ 事实上，反共公约主要是吓坏了伦敦城[指英国金融界] 和英国的店主们 ”。

在这个时候，据德国的备忘录透露，里宾特洛甫由于斯大林[540]这种圆通的态度，兴致高到竟然想说一两句笑话——对这样一个毫无幽默感的人来说，这实在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德国外交部长［备忘录接着说］开玩笑地说，斯大林先生肯定没有像伦敦城和英国的店主们那样被反共公约吓倒。德国人民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可以拿一个笑话来说明，那是一向以机智和幽默出名的柏林人编出来的，他们说，斯大林自己早晚都会参加反共公约的。

最后，纳粹外交部长絮絮不休地谈到德国人民将如何热烈地欢迎同俄国达成的谅解。“ 斯大林先生回答说，”德国备忘录写道，“ 他确实相信这一点。德国人要求和平。 ”

这样的噱头到互相敬酒的时候就愈来愈不堪了。

斯大林先生自动地提议为元首干一杯：

“ 我知道德国民族多么爱他们的元首，我因此要为他的健康喝一杯。 ”

莫洛托夫先生提议为德国外交部长的健康干一杯……莫洛托夫先生和斯大林先生一再提议为互不侵犯条约，为德俄关系的新时代，为德意志民族干杯。

德国外交部长也提议为斯大林先生，为苏联政府，为德国和苏联两国关系的顺利发展干杯。

尽管在这些直到最近以前还是不共戴天的死敌之间说了这么多热情的话，对纳粹党人能否信守这个条约，斯大林看来在思想上还是有保留的。当里宾特洛甫告辞的时候，他把他拉到一旁并且说，“ 苏联政府对这个新条约是十分认真的。他可以用他的荣誉来担保，苏联决不会出卖它的伙伴 ”。

这一对新伙伴到底签订了些什么呢？

在公开发表的条约中，双方约定，任何一国都不得进攻对方。如果其中一方成了第三国的“ 敌对行动的目标 ”，另一方将“ 决不以任何形式给予该第三国以支持 ”。德国和俄国也决不“ 参加直接或间接针对另一方的任何国家集团 ”。*

[541]　这样，希特勒就取得了他具体希望得到的东西：一旦波兰受到进攻，而英国和法国又履行其条约义务出兵救援时，苏联同意不参加到英法一起。*

他所付出的代价是在这个条约的“ 秘密附属议定书 ”里：

值此德国和苏联互不侵犯条约签字之际，在下面签字的全权代表在严守机密的会谈中讨论了在东欧划分他们各自的利益范围的问题。

1 · 在一旦波罗的海国家（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所属的领土上发生领土的或政治的变动时，立陶宛的北部边界应成为德国和苏联两国利益范围的边界。

2 · 在一旦波兰国家所属的领土上发生领土的或政治的变动时，德国和苏联两国的利益范围将大体上以那累夫河、维斯杜拉河和散河一线为界。

缔约双方的利益是否需要维持一个独立的波兰国家以及这个国家的边界应如何划定的问题，只有在今后政治局势的发展中方能予以明确规定。

在任何情况下，两国政府都将以友好的谅解来解决这个问题。

德国和俄国就像在德皇和沙皇时代一样再一次就瓜分波兰取得了一致。而希特勒还给了斯大林在波罗的海东岸自由行动的权利。

最后，在东南欧，俄国人强调他们在比萨拉比亚（那是苏联在 1919 年割给罗马尼亚的）的利益，而德国人宣布他们对这一地区没有利害关系——这个让步是里宾特洛甫后来感到后悔的。

议定书最后说，“本议定书将由双方严守秘密”。[①]

事实上，它的内容直到战后缴获了德国秘密档案以后才为世人所知。

第二天（8 月 24 日），当兴高彩烈的里宾特洛甫飞返柏林的时候，在莫斯科的英法军事代表团要求见伏罗希洛夫。德拉克斯海军上将还曾给那位元帅送去了一封急信，要求他表明对继续谈判[542]的看法。

伏罗希洛夫过了一天之后在 8 月 25 日下午 1 时给了英法军事参谋人员以答复：“鉴于政治形势业已改变，继续谈判已经没有什么用处了。”

两年以后，当德国军队违反上述条约而大举侵入俄国的时候，斯大林仍然认为他背着到莫斯科谈判的英法军事代表团而同希特勒进行的这笔丑恶的交易是有理的。1941 年 7 月 3 日他在对俄国人民的广播中自吹自擂地说：“我们保证了我国获得一年半的和平及准备自己的力量来回击敌人的可能，如果法西斯德国敢于冒险违反条约来进犯我国的话。因此这毫无疑义是我们赢了，而法西斯德国输了。”*

究竟是不是如此呢？从那时以来，人们对这一点一直在争论。这一笔卑鄙的买卖给了斯大林一个喘息时间——俄文叫 peredysh-ka——正如沙皇亚历山大一世 1807 年在替尔西特从拿破仑手里和列宁 1917 年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从德国人手里所取得的一样，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它也在一个短时期内给了苏联一个远在俄国原有边界之外的抗德前进阵地，其中包括在波罗的海国家和芬兰的基地——而付出代价的是波兰人、拉脱维亚人、爱沙尼亚人和芬兰人。尤其重要的是，如官方的苏联《外交史》（《HistO－ry of Diplomacy》）后来所特别强调的那样，它使克里姆林宫可以放心，如果俄国在以后受到德国的进攻的话，西方国家也已经无可挽回地卷入了反对第三帝国的战争，而苏联就不会像斯大林在 1939 年整整一个夏天都在担心地那样，单独对抗强大的德国了。

所有这些毫无疑问都是事实。但是还有相反的论点。到希特勒掉头进攻俄国的时候，波兰和法国的军队以及英国派到大陆来的远征军已经被摧毁了，因此德国可以调动全欧洲的人力、物力扑向俄国，而又没有西方战场束缚它的手脚。

1941 年、1942 年和 1943 年整整 3 年，斯大林一直在抱怨欧洲没有开辟第二战场，俄国不得不承担抗击几乎全部德国军队的压力。现在 1939—1940 年是有一个能够牵制德国军队的西方战场的。如果俄国支持波兰而不是在背后给它一刀的话，它也不可能在半个月之内就被扫荡净尽。不但如此，如果希特勒知道他要打波兰和英法就必须也要打俄国的话，很可能根本就打不起来。即使是在政治上胆怯的德国将领们，如果可以根据他们后来在纽伦堡的证词来判断的话，也可能立定脚跟反对同这样强大的一个联盟来进行战争。

[①] 1939 年 8 月 23 日德苏互不侵犯条约和秘密议定书全文，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 7 卷，第 245—47 页。

据法国驻柏林大使说，在 5 月底的时候，凯特尔和勃劳希契都曾警告过希特勒，如果俄国参加敌人一方，德国很少有战胜的可能性。

没有一个政治家，即使独裁者也罢，能够预言长期的形势发[543]展。丘吉尔说，斯大林同希特勒做交易一举固然足以令人齿冷，然而“在当时却是高度现实主义的”，[①]这种说法是可以讨论的。斯大林的首要考虑，就同任何其他国家政府首脑的考虑一样，是他自己的国家的安全。据他后来告诉丘吉尔说，他在 1939 年夏天深信，希特勒就要打仗了。他决定俄国决不能被别人骗到单独对德作战的倒霉局面中去。如果同西方结成靠得住的联盟证明已不可能的话，那为什么不转而联合希特勒呢？他不是已突然来敲门求教了吗？

到 1939 年 7 月底的时候，斯大林显然已经深信，法国和英国不但不要一个有约束力的联盟，而且英国张伯伦政府的目的根本就是诱使希特勒在东欧发动战争。他似乎已经十分怀疑英国会对波兰信守自己的条约义务，就同法国没有对捷克斯洛伐克信守义务一样。而过去两年在西方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有助于加强他的猜疑：张伯伦在德奥合并和纳粹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以后拒绝了苏联关于召开国际会议制定制止希特勒侵略的计划；张伯伦到慕尼黑去姑息希特勒，而且把俄国排除在这次会议之外；张伯伦在就缔结防御同盟共同对付德国而进行的谈判中拖延退缩,而一任 1939 年夏天稍纵即逝的时光在空话中消磨净尽。

有一件事情，除了对张伯伦以外，几乎对谁都是肯定无疑的。在希特勒每一次行动面前都要动摇的英法外交，现在已经完全破产了。*这两个西方民主国家一步一步后退：

1935 年，希特勒公然藐视它们而下令征兵；

1936 年，他进军莱因兰；

1938 年，他夺取了奥地利；同一年，他要求得到而且果然得到了苏台德区；

1939 年 3 月，他占领了残存的捷克斯洛伐克，而英法只有坐在一旁眼睁睁地看着。有苏联在它们一边，它们还能使那位德国独裁者对发动战争有所顾忌，而如果不能阻止他发动战争的话，它们还有可能迅速把他击败。但是现在，它们把这样一个最后的机会都断送了。*现在，它们只好在坏到不能再坏的时机和坏到不能再坏的［544］条件下，来承担在波兰受到进攻时给它以援助的义务。

伦敦和巴黎对斯大林的两面手段的指摘声浪甚高而且语调激烈。多年以来，这位苏联的专制暴君一直在痛骂“法西斯野兽”，而且号召一切热爱和平的国家团结起来制止纳粹侵略。而现在他自己居然也入伙干起这样的行当来了。克里姆林宫大可为自己辩护（它也这样辩护了），苏联只不过是做了一年以前英国和法国在慕尼黑所做的同样的事情：以牺牲小国为代价，买得了和平和整军经武以备对付德国的时间。如果张伯伦在 1938 年 9 月以牺牲捷克斯洛伐克来姑息希特勒是正当的而且很光彩的话，斯大林在一年以后以牺牲始终拒绝任何苏联援助的波兰来姑息德国元首又有什么错误和不光彩的地方呢？

斯大林同希特勒协议瓜分波兰并且得到希特勒默契并吞拉脱维亚、爱沙尼亚、芬兰和比萨拉比亚的无耻密约，除柏林和莫斯科而外，外界是没有人

[①] 丘吉尔：《风暴欲临》，第 394 页。

知道的。但是，它很快就从苏联的举动中叫人看出来了。甚至在事隔多年以后的今天，它也仍然会使世界上大部分人震惊骇异。俄国人也许可以说（他们也这样说了），他们只不过是恢复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从他们那里拿走的土地而已。但是，这些土地上的人民并不是俄罗斯人，而且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想回到俄国去的愿望。只有武力，只有苏联人在李维诺夫政策的全盛时代表示要避免采用的武力才能使他们回来。

自从参加国际联盟以后，苏联曾树立了一定的道义上的力量，以和平的维护者和法西斯侵略的主要反对者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现在，那种道义上的资本已经丧失净尽了。

最严重的是，由于同纳粹德国完成了这笔龌龊的买卖，斯大林已发出了一场战争就要揭幕的信号，而这场战争又肯定将演变成为世界大战。他毫无疑问是明白这一点的。*后来的事实表明，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错误。[545]

第十六章　最后几天的和平日子

英国政府并没有袖手坐待德苏条约在莫斯科正式签订。8 月 21 日深夜柏林宣布里宾特洛甫乘机飞往莫斯科缔结德苏协定的消息，使英国内阁行动起来。22 日下午 3 时，内阁举行会议，会后发表了一个公报，断然声明，“英国对波兰所承担的义务曾经一再公开宣布，并且决心履行，绝不受［德苏互不侵犯条约的］影响”。与此同时，议会也决定在 8 月 24 日开会，要通过《紧急权力（国防）法案》。此外还采取了某些预防性的动员措施。

虽然内阁声明已经说得尽可能的明白，但是张伯伦还是要让希特勒不发生任何疑问，于是便在内阁会议结束之后立刻又以个人名义给这位元首写了一封信。

……柏林某些方面显然认为，德苏协定一经宣布，大不列颠为维护波兰利益而进行干预的可能就已无需再加考虑。这是一个莫大的错误。无论德苏协定的性质可能如何，都绝不能改变大不列颠对波兰所承担的义务……

有人曾经说过，要是英王陛下政府在 1914 年把立场表示得更明确一些，那场巨大的灾难就可能不致发生。姑不论这种说法是否有道理，这一次英王陛下政府决心不再让这种悲剧性的误解重演。

一旦发生上述这种情况，英王陛下政府决心并且准备毫不迟延地使用所拥有的一切力量。而敌对行动一旦发生之后，其结果是难以逆料的……[①]

这位首相“这样彻底明确地阐明了我国的立场”（这是他自己后来附加的话）之后，再一次呼吁希特勒通过和平途径来解决他和波兰之间的分歧，并再次表示英国政府愿意提供合作来实现这[546]一点。

这封信由汉德逊大使从柏林乘飞机送到伯希特斯加登，于 8 月 23 日午后 1 点过后不久交给了希特勒，这位纳粹独裁者看了之后勃然大怒。汉德逊在拍给哈利法克斯的电报中说：“希特勒暴跳如雷，不论说什么话他都不肯听，当他提到英国和提到波兰的时候，措辞都极为粗暴而又夸张。”[②]关于希特勒那段长篇攻击的内容，汉德逊在这次会见的报告中所作的记载跟后来从被缴获的纳粹档案中所发现的德国外交部有关这一问题的备忘录是一致的。他咆哮道，波兰的顽固全是英国造成的，就像一年以前它应该对捷克斯洛伐克不讲道理的态度负有责任一样。波兰有数以万计的日耳曼族人正在受到迫害。他声称甚至还发生了 6 起阉割事件——这是一桩使他忐忑不安的事。他说他已经忍无可忍。要是波兰人再继续迫害日耳曼人，就会马上引起实际行动。

我在每一个问题上都和他作了争辩[汉德逊拍给哈利法克斯的电报写道]，并且一再指出他的话是不确实的，但结果只是又引起他一通长篇攻击。

最后，希特勒答应两小时以后就英国首相的来函提出一个书面答复。于是汉德逊便回到萨尔斯堡去稍事休息。*当天下午晚些时候，希特勒召见这位大使，把复信交给了他。据汉德逊向伦敦提出的报告，同第一次会见相比，这位元首“显得十分安详而且始终没有提高嗓门”。

希特勒说［汉德逊报告道］，他已经 50 岁了，要打现在就打，他不想等到 55 岁或者 60 岁再打。

这位德国独裁者在山顶别墅中发出叫嚣时所显露的不可一世的狂妄态

---

① 《英国蓝皮书》，第 96—98 页。

② 汉德逊 1939 年 8 月 23 日电报，同上，第 98—100 页。德国外交部关于这次会议的报告，见《德国外文政策文件汇编》，第 7 卷，第 210—15 页。汉德逊就 8 月 24 日第二次会议提出了报告（见《英国蓝皮书》，第 100—2 页）。

度，在德国人的会谈记录中甚至表现得更加露骨。记录在记述了他表示愿意在 50 岁的时候打仗而不想等到以后再打的话之后，接着写道：

［希特勒说］英国最好别忘了，作为一个上过前线的军人，他懂得战争是怎么一回事，并且会使用一切可以使用的手段。不用说谁都明白，如果世界大战［指 1914—1918 年的战争］期间由他当德国首相，德国是不会战败的。

自从波兰人胆敢和希特勒对抗以来，希特勒一直在对国外人士和德国人民吹牛说谎、虚声恫吓。他给张伯伦的复信就是集这种谎言与恫吓之大成的混合物。他说，德国并不想和大不列颠发生冲突。德国一直准备“以一个真正空前慷慨大度的建议为基［547］础”同波兰人讨论但泽和走廊问题。但是英国对波兰的无条件的保证，只是鼓励波兰人“对居住在波兰境内的 150 万日耳曼居民掀起骇人听闻的恐怖迫害的浪潮”。他宣布，这样的“暴行对于受害者来说是可怕的，而对于德意志帝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则是不能容忍的”。德国将不再容忍这种暴行。

最后他谈到英国首相保证英国将信守对波兰所承担的义务这一点，他用坚定的口吻告诉英国首相说，“这丝毫不能动摇德国政府捍卫德国利益的坚定意志……如果英国竟然发动进攻，它将发现德国是有准备而且有决心的”。[③]

这次函件来往的结果如何呢？现在，希特勒从张伯伦那一方得到了一个庄严保证说，一旦德国进攻波兰，英国就要投入战争。而首相从元首方面得到的回答是：这不会有什么不同的结果。但是，此后紧张的 8 天中的一系列事件表明，在 8 月 23 日那一天，他们两个人谁也不相信自己所听到的对方的话已无转圜余地了。

希特勒尤其是这样。来自莫斯科的好消息使他大为振奋，他相信，尽管张伯伦刚刚写了那封信给他，在俄国转了向之后，英国一定会重新考虑是不是要履行对波兰的义务的问题，而在英国之后，法国也会重新考虑。因此，这位元首在 8 月 23 日傍晚当汉德逊飞返柏林的时候,决定了向波兰发动进攻的日期：8 月 26 日，星期六，拂晓 4 点 30 分。

“关于发动进攻的具体日期和时刻，将不再发布命令，”哈尔德将军在日记中写道，“一切都将按计划自动进行。”

但是这位陆军参谋总长没有说对。8 月 25 日发生了两件事，使希特勒在他的部队按计划应当突破波兰国境之前不到 24 小时的时候从灾难的深渊边缘缩了回来。一件事发生在伦敦，另一件发生在罗马。

希特勒在 8 月 24 日回柏林欢迎了从莫斯科归来的里宾特洛甫,听取了关于俄国人方面的情况的第一手报告，然后在 25 日这天上午给墨索里尼发了一封信。这封信就他何以未能把他和苏联谈判的情况及时通知这位轴心伙伴的原因作了事后的解释。他说他“没有想到”谈判会进展得这样快，会得到这样的结果。他说，苏德条约“必须看成是轴心方面所能取得的最重大不过的收获”。

但是，这封已从缴获的文件中找到原件的信的真正目的，还在于先向这位意大利领袖打一个招呼，告诉他德国随时可能对波兰发动进攻。不过希特勒并没有把他所定的确切日期告诉他的盟友。他说，“波兰方面如果发生令

[③] 希特勒 8 月 23 日致张伯伦信的全文，同上，第 102—尽页。另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 7 卷，第 216—19 页。

人不可容忍的事件，我将立即采取行动……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能够预言下 1 个小时将会发生什么事情 ”。希特勒没有明确要求意大利给予援助。因为根据意德同盟条约，意大利自动给予援助是理所当然的事。因此他在信中仅表示希望获得意大利的谅解。[4]虽然如此，他仍然盼望立即得到［548］一个答复。这封信由里宾特洛甫亲自从电话中口述给德国驻罗马大使，于当天午后 3 点 20 分送到那位领袖手里。

在这期间，元首于午后 1 点 30 分在总理府接见了汉德逊大使。他摧毁波兰的决心毫未动摇，但是他比两天前在伯希特斯加登同汉德逊谈话的时候更加急于作最后一次努力，使英国置身于战争之外。*据大使发给伦敦的报告，他发现元首“ 十分冷静和正常，话也说得非常认真，显然流露出诚意 ”。尽管有着过去一年来的切身经验，汉德逊甚至到了这个时刻还看不透这位德国元首的“ 诚意 ”。因为希特勒要说的话是十分荒唐的。他对那位大使说，他“ 承认 ”英帝国的存在，他个人准备“ 亲自保证英帝国的继续存在，并且愿意用德意志帝国的威力来达到这一目的 ”。

他希望［希特勒解释道］，对英国采取一个其性质同对俄国所采取的行动一样具有决定意义的行动……元首准备同英国缔结协定，不仅要在一切情况下（只要涉及德国）保证英帝国的存在，而且如有必要的话，还愿意保证不论英帝国在哪方面需要援助，德国都将给予援助。

他补充道，他“ 还准备接受一项合理的军备限制 ”，并且把德国的西部国境看成是最后的疆界。据汉德逊讲，希特勒说着说着又像惯常一样，开始唠唠叨叨地说起一些矫柔造作的话来，虽然这位大使向伦敦发出的电报中重述那段话时并没这样说。元首说：

他的天性是一个艺术家而不是政治家，一旦波兰问题解决以后，他就要作为一个艺术家而不是作为战争贩子了此余生。

但是这位独裁者却是用另外一种调子结束他的发言的。

元首重复强调[据德国人拟给汉德逊的口头声明说]，他是一个意志坚定的人……这是他最后的建议。如果他们［英国政府］拒绝他所提出的这些意见，那么就会发生战争。

在会谈的过程中，希特勒不止一次地指出，他对英国提出的“ 慷慨而又全面的建议 ”附有一个条件，那就是这一建议只有“ 在德波问题解决以后 ”才能生效。汉德逊一再表示，除非这意味着德波问题的和平解决，否则英国将不能考虑他的建议。希特勒的回答是：“ 如果您认为我的建议毫无用处，那您就不必把它发回去。 ”[549]

但是，这位大使刚刚回到威廉街上离总理府没有几步远的大使馆，施密特博士就带着希特勒那番谈话的书面副件（其中颇有删节）扣门求见，同时还带来元首的话说，元首请汉德逊敦促英国政府“ 十分认真地对待这一建议 ”，并且主张这位大使亲自乘飞机把建议送到伦敦去，德国政府可以派一架飞机供他使用。读者已经读完本书这么多章节，自然就会知道，要想看透希特勒那颗狂热的脑袋中的那些离奇古怪、异想天开的想法不是那么容易的。他在 8 月 25 日提出那个荒唐的“ 建议 ”，说要保证英帝国存在，显然是他一时心血来潮的杰作，因为两天以前在他和汉德逊讨论张伯伦的来信以

---

[4] 希特勒 8 月 25 日致墨索里尼信的全文，同上，第 281—83 页。

[5] 希特勒 8 月 25 日对汉德逊口头声明的全文，由里宾特洛甫和施密特起草，同上，第 7 卷，第 279—84 页；另见《英国蓝皮书》，第 120—22 页。汉德逊 8 月 25 日的电报记述了这次会见，见《英国蓝皮书》，第 122—23 页。另见汉德逊著《使命的失败》，第 270 页。

及就此复信的时候，连提都没有提到过这么个建议。即使说这位独裁者神经有点失常，也难于相信他本人在这个问题上的确像他对英国大使提出时那样认真。再说，当时张伯伦根本连信也来不及看，纳粹军队就要在第二天拂晓冲进波兰（这位元首此时尚未更改他原定的发动进攻的日期），试问，又怎么能够指望英国政府像他所要求的那样“十分认真”地看待这个建议呢？

但是在这个“建议”的背后确实隐藏着一个认真的打算。希特勒显然相信，张伯伦和斯大林一样，也希望得到一个借口，能让他的国家置身于战争之外。”两天以前，他付出一笔代价，让俄国人在东欧方面“从波罗的海到黑海”的整个地区内自由行动，已经买得了斯大林的善意中立。难道他就不能向英国首相保证第三帝国永远不会像霍亨佐伦德国那样成为英帝国的威胁，以此为代价买到英国的不干涉吗？可是希特勒当时没有认识到——同样斯大林也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这使得他后来付出了可怕的代价——现在终于睁开眼睛看清了现实的张伯伦认为，德国称霸欧洲大陆对英帝国来说是一切威胁中最大的威胁。其实，对于苏俄帝国又何尝不是如此。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一书中早已说过，若干世纪以来，英国外交政策的首要任务就是防止任何一个国家单独称霸欧洲。

午后 5 点 30 分，希特勒接见了法国大使，但并没有对他说什么重要的话，只是再一次重复“波兰对于德国的挑衅”已经到了令人不能容忍的地步，说他不会进攻法国，但是如果法国竟然参与冲突，他就要和法国拼到底。谈到这里，希特勒就从椅子上站起来，对法国大使表示送客了。但是考伦德雷对这位第三帝国的元首却还有些话要说，而且坚持非说出来不可。他凭军人的荣誉向希特勒担保，他毫不怀疑，“一旦波兰遭到攻击，法国将以全力[550]支持波兰”。

希特勒的回答是：“想到不得不同贵国交战，是使我感到痛心的事，但是问题不决定于我。请把这个意思转告达拉第先生。”[6]

这是柏林时间 8 月 25 日午后 6 点钟的事。首都的紧张气氛在这一天里有增无已。从中午刚过一会儿的时候起，同国外的一切无线电、电报以及电话联系，都按照威廉街的命令被切断了。前一天晚上，最后一批英法记者和无官职平民都已经匆匆奔向最近的国境线。25 日是星期五，在那一天里，人们都知道了德国外交部已经用电报通知驻在波兰、英国和法国的大使馆和领事馆，叫他们要求德国公民选择最快的路线离境。我在 8 月 24 日和 25 日所记的日记到今天还能使我回想起当时笼罩着整个柏林的紧张气氛。天气闷热，所有的人都好像热锅上的蚂蚁似的。在这个大城市里，到处支起了高射炮，轰炸机群不断地从头顶上掠过，朝着波兰的方向飞去。

24 日晚间我在日记上匆匆忙忙地划了这样几个字：“已是一片战争景象。”第二天，我又重复了一句：“战争迫在眉睫。”我还记得，在那两天的晚上，我们在威廉街上看见德国人窃窃私语相互传告：希特勒已经命令部队在第二天拂晓开入波兰国境。

我们现在知道，给他们的命令是要在 8 月 26 日星期六拂晓 4 点 30 分进攻。*而直到 25 日那天下午 6 点，所发生的事情都不能使希特勒按照预定的时间表发动侵略的决心有丝毫动摇，汉德逊和考仑德雷两位大使关于英、法两国一定将履行对波兰的义务的个人保证肯定也没有发生这种影响。但是到

---

[6] 考仑德雷 8 月 25 日电报，见《法国黄皮书》法文版，第 312—14 页。

了下午大约 6 点钟，或者说 6 点稍过一点的时候，来自伦敦和罗马的消息使得这位看起来是意志不可动摇的人犹豫起来了。

德国的秘密档案和威廉街官员们战后的证词，都没有清楚地说明希特勒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得知英波正式条约在伦敦签字的，这个条约把英国对波兰的单方面保证变成了一项互助协定。[①]但［551］在哈尔德的日记和德国海军记事册中有一些证据表明,威廉街在 8 月 25 日中午就得到了这一条约将于当天签字的风声。参谋总长在他的笔记中说，中午 12 点，他接到最高统帅部的一个电话，问他进攻计划推迟执行的最后时限。他回答说：午后 3 点。海军记事册也说，有关英波条约以及“意大利领袖的通知”的消息是在中午收到的[⑦]。但是，这是不可能的。根据德国人在墨索里尼的信上所作的标记来看，送到的时间不会早于“午后 6 点钟左右”。希特勒一直要到那个时间前后才可能知道英波条约在伦敦签字的消息,因为签字直到午后 5 点 35 分才举行——而且那个时间距离波兰驻伦敦大使爱德华·拉仁斯基伯爵接到本国外交部长授权签字的电话的时间也仅仅 15 分钟。*

无论是什么时候收到的——午后 6 点钟左右是个正确可靠的推测——总之，伦敦的消息使希特勒动摇了。这很可能是英国对他那个“建议”的答复，那个建议的内容这时一定已经送到了伦敦。这就是说，他企图像买通俄国人那样买通英国人的打算落空了。报告送到时施密特博士正在希特勒办公室里，据他后来回忆，元首看完报告之后，就坐在书桌旁沉思起来。[⑧]

墨索里尼临阵胆怯

他的沉思很快就被罗马传来的同样不利的消息打断了。据施密特博士的描写，这位德国独裁者整个下午都怀着“毫不掩饰的焦躁情绪”等待着意大利领袖的复信。下午 3 点钟，汉德逊前脚刚走，意大利大使阿托利科后脚就应召来到总理府，但是这位大使只能告诉元首，他还没有收到罗马方面的回信。这时候，希特勒神经紧张到了极点，他叫里宾特洛甫去用长途电话找齐亚诺谈话，可是外交部长没法找到他通话。于是，施密特说，阿托利科就被“不大客气地”打发走了。[⑨]

若干天以来，希特勒不断收到罗马方面传来的报警消息，说他的轴心伙伴可能在他进攻波兰的紧要关头抛下他不顾。这个情报不是没有根据的。齐亚诺在 8 月 11 日到 13 日同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举行了那场使他幻想破灭的会谈后，一回去就着手撺掇墨索里尼抛弃德国人，他的这种活动没有逃过罗马德国大使馆严密监视的耳目。这位法西斯外交大臣的日记，详细地记载了他力图说服意大利独裁者认清大局，及时避免被希特勒拖入战争的种种经过。[⑩]8 月 13 日，齐亚诺从伯希特斯加登回来，当天晚上马上就去晋见领袖，

[①] 这一条约附有一份秘密议定书，其中声明，条约第一条所提到的两国如遇需要实行军事互助以对付其侵略的那个“欧洲强国”指的是德国。由于这一规定，才使英国政府在苏联红军与德国人合谋侵入波兰东部的时候不致于有必要采取向苏联宣战这一严重的步骤。

[⑦] 《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 6 卷，第 977—98 页。得自海军总司令部档案中发现的俄德关系材料。

[⑧] 施密特著上引书，第 144 页。

[⑨] 同上，第 143—44 页。

[⑩] 《齐亚诺日记》，第 120—29 页。

向他报告同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会谈的经过之后，[552]就试图说服他的上司，“德国人已经背弃了我们，欺骗了我们”，并且“正在拖着我们跟着他们一起去冒险”。

领袖的反应变化无常［那天晚上齐亚诺在日记里写道］。起初，他同意我的看法。隔了一会他又说，为了信誉关系，他必须同德国人并肩前进。最后，他表示他要把克罗地亚和达尔马提亚作为他的一份战利品。

8月14日——我发现墨索里尼忧心忡忡，于是便毫不迟疑地想尽一切方法极力挑起他心中可能对德国人抱有的反感。我说他的威望已减，他所扮演的是个次要的二等角色。最后，我给他看一堆文件，证明德国人在波兰问题上对我们言而无信。两国同盟所根据的前提条件现在已经被他们否定了；他们既然背信弃义，我们就应当抛弃他们，不必有所顾虑。但是墨索里尼仍然顾虑重重。

第二天，齐亚诺为这个事情同墨索里尼彻底谈了6个小时。

8月15日——领袖……已经相信，我们不应该盲目地跟着德国人走。但是……他要有一个时期作好准备才能和德国人决裂……他越来越相信，民主国家一定会打的……这一回就意味着一场大战。而我们却不能卷入战争，因为我们的困难处境不容许我们这样做。

8月18日——上午与领袖谈了一次话。他还和往常一样三心二意。他仍然认为民主国家有可能按兵不动，德国人会做成一笔大有好处的便宜买卖，他不愿看着这笔买卖不能插上一手。同时，他还怕希特勒会发火。他相信，废除同盟条约或类似的行动可能使得希特勒丢下波兰问题而同意大利算账。凡此种种考虑，弄得他心烦意乱，坐立不安。

8月20日——领袖突然变了卦。他要在这场迫在眉睫的冲突中不惜任何代价地支持德国……墨索里尼同我和阿托利科进行了商谈。［那位大使已从柏林回罗马述职。］大意是：现在要背弃德国已经为时太晚了……全世界的舆论都会说意大利胆怯……我试图争辩，但已无济于事。墨索里尼顽固地坚持他的看法……

8月21日——今天，我把话说得很明白……我一进屋，墨索里尼就肯定地说，他决心和德国人同进退。“领袖，您不能这样做，万万不能这样做……我到萨尔斯堡本来是去商定共同行动的方针的，但是我所碰到的却是一项Diktat［绝对命令］。背弃盟约的是德国人而不是我们……撕了那个条约吧！把它扔给希特勒！……”

这次谈话的结果是，让齐亚诺去和里宾特洛甫安排第二天在勃伦纳山口举行会谈，并且通知他，意大利将置身于德国进攻波[553]兰所挑起的冲突之外。中午时分齐亚诺给里宾特洛甫打电话，等了好几个钟头都没有来接，但是到下午5点30分的时候他终于来接电话了。纳粹外交部长表示，勃伦纳会谈通知得这样仓促，他不能立刻作答，因为他“正在等候莫斯科方面的一份极为重要的电报”，要过一会儿再给齐亚诺回电话。晚上10点30分，他回电话了。

8月22日——昨晚10点30分，新的一幕开始了［齐亚诺在日记上说］。里宾特洛甫打电话告诉我，他希望在因斯布鲁克而不在国境线上和我会见，因为会后他就要动身到莫斯科去同苏联政府签订一项政治协定。

对于齐亚诺和墨索里尼来说，这是一个新闻，而且是最为惊人的新闻。他们认定两国外长的会晤“已不再适宜了”。他们的德国盟友不让他们知道德国和莫斯科进行的秘密交易，又一次表现了对他们的轻视。

这位领袖的犹豫动摇，齐亚诺的反德情绪，以及意大利可能背弃《钢铁盟约》第三条所规定的义务，即缔约一方一旦“卷人同另一国家的敌对行动中”时另一方就自动参战，在8月22日里宾特洛甫动身到莫斯科去以前，柏林方面就已经知道了。

8月20日，意大利驻柏林代办马西莫·马吉斯特拉蒂伯爵到外交部拜会

威兹萨克。这位国务秘书在一份秘密备忘录里告诉里宾特洛甫说[①]，那位伯爵向他透露了“意大利人的心情，虽然我对此并不感到惊讶，但是我认为肯定必须加以考虑。马吉斯特拉蒂引起威兹萨克注意的是，既然德国没有遵守盟约中规定双方在重大问题上必须保持紧密联系和进行磋商的条款，而且又把它和波兰之间的冲突完全看作德国一国的问题，“这样德国就自己放弃了意大利方面的武装援助”。因此，如果事情的发展同德国的看法相反，德国同波兰的冲突竟然发展成为一次大战，意大利就会认为同盟的“前提条件”已不再存在。一句话，意大利在寻找脱身的借口。

两天以后，8 月 23 日，柏林又收到汉斯·格奥尔格·冯·马肯森大使从罗马发来的警告。他写信给威兹萨克，报告了一些“幕后”情况。根据缴获的这封信上威兹萨克亲笔写下的批语，这封信已“呈交元首”。这封信一定使希特勒打开了眼睛。马肯森在报告中说，墨索里尼同齐亚诺和阿托利科进行了一系列的商谈以后，意大利的态度是：德国如果进攻波兰，就破坏了《钢铁盟约》，因为这盟约的基础是双方同意在 1942 年以前不投入战争。而且，同德国的看法相反，墨索里尼相信，如果德国进攻波兰，英国和法国都会出面干涉，“而且过不了几个月，美国也会出面干[554]涉”。当德国在西线处于守势的时候，法国和英国

据这位领袖看来，就会倾全力攻打意大利。在这种情势下，意大利将不得不首当其冲，承受战争的全部重担，以使德国有机会在东方收拾残局……[①]

希特勒考虑了这些警告之后,终于在 8 月 25 日上午给墨索里尼发去一封信，怀着越来越焦急不安的心情等回信足足等了一天。头天夜里里宾特洛甫向元首详细陈述了他在莫斯科所取得的胜利，半夜刚过不久的时候，他“在元首的指示下”给齐亚诺去了个电话，把“由于波兰的挑衅所引起的极端严重的局势”通知了对方。”威兹萨克有一则笔记透露出，这次电话的用意在于“使意大利人没有借口说事态的发展出乎他们意料之外”。

到 8 月 25 日午后 3 点 30 分，马肯森大使在罗马威尼斯宫把希特勒的那封信交给墨索里尼的时候，这位领袖才知道德国人对波兰的进攻马上就要开始了。同希特勒的看法不同，他肯定相信英国和法国会立即参战，这会给意大利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因为意大利的海军不是英国地中海舰队的对手，而它的陆军又不堪法国的一击。*马肯森晚间 10 点 25 分发给柏林的急电描述这次会见的情形说，墨索里尼当面把这封信仔细地看了两遍以后声称他“完全同意”德苏条约，他认识到“同波兰的武装冲突已不再能避免”。最后——马肯森报告说，“他特别强调这一点”——“他将尽一切力量无条件地站在我们这一边”[①]

但是，这位德国大使并不知道，这位领袖写给元首的信里却不是这样说的。这封信是由齐亚诺匆匆地用电话传给已经回到柏林任所的阿托利科的，阿托利科‘大约在午后 6 点钟左右’到总[555]理府亲自把信交给了阿道夫·希特勒。据当时在场的施密特说，这封信就像一颗炸弹一样打击了元首。墨索里尼在表示了他对德苏条约的“完全同意”和“对波兰问题的谅解”之后，就掉转话头，言归正传。他写道（信中的着重体是他自己用的）：

[①] 成兹萨克 8 月 20 日的报告，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 7 卷，第 160 页。

[①] 马肯森 8 月 23 日给威兹萨克的信，同上，第 240—43 页。

[①] 马肯森 8 月 25 日电报，同上，第 291—93 页。

至于在一旦发生军事行动时意大利的实际态度，我的观点如下：

如果德国进攻波兰，而冲突又是局部化的，那么意大利就会根据德国的要求提供一切的政治援助和经济援助。

如果德国进攻波兰[④]，而后者的盟国又向德国展开反攻，那么我事先通知您，鉴于目前意大利的战争准备状况，我觉得最好在军事行动方面不采取主动行动。关于意大利的战争准备状况，我们曾经不止一次地而且及时地告诉过您，元首，也告诉过冯·里宾特洛甫先生。

不过，如果德国能立即把军事物资和原料交给我们，以便抵抗法国和英国主要是针对我们的进攻，我们就可以立即参战。

在我们历次的会谈中，战争都预定在 1942 年；到那时候，按照预先协商的计划，我在陆、海、空三方面将准备就绪。

我还认为，意大利目前已经采取的纯军事措施以及以后将采取的其他措施，都会在欧洲和非洲牵制住数量可观的法国和英国的兵力。

我认为，作为一个忠实的盟友，我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必须把全部真相如实奉告，并且事前把实际情况通知您，否则将会给我们双方带来不愉快的后果。这就是我的看法。由于我必须在最短期间召开最高级政府机构会议，我请您把您的意见告诉我。

墨索里尼* [①]

［556］因此，虽然俄国已经稳在囊中，成为友好的中立国而不参战，但是和德国签订了“钢铁盟约”的盟邦却脱身出去，而且这种情形正好是出现在英国由于同波兰签订了抵抗德国侵略的互助条约而不可挽回地承担了义务的那一天发生的。希特勒看完来信之后告诉阿托利科说，他将立即复信，然后就冷冰冰地把这位意大利使节打发走了。

阿托利科走后，施密特博士听到希特勒愤慨地说：“意大利人又要玩 1914 年的那一手了。”当天晚上，总理府里到处是责骂这个“背信弃义的轴心伙伴”的不客气的话。但光是说话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按预走的时间表，再过 9 小时德国的陆军就要对波兰发动猛攻了。因为现在已经是 8 月 25 日午后 6 点 30 分，而计划规定，入侵行动将于 8 月 26 日拂晓 4 点 30 分开始。面对着来自伦敦和罗马的消息，这位纳粹独裁者必须立刻作出决定，是仍然按照原订计划进攻呢，还是推迟或者干脆取消进攻。

施密特陪着阿托利科走出希特勒书房时，同急急忙忙跑来见元首的凯特尔将军撞了个满怀。几分钟之后，这位将军匆匆地从里面走出来，兴奋地对他的副官叫道：“进攻的命令又得延期了！”

被墨索里尼和张伯伦逼到墙角的希特勒，已立刻作出了决定。哈尔德在日记里写道：“元首受到极大的震动”，随后又写道：

下午 7 点 30 分——波兰和英国之间的条约已经批准。敌对行动没有开始。一切军队调动必须停止，即使已到了边境也必须停止，如果不可能及早停止的话。

下午 8 点 35 分——凯特尔证实此事。卡纳里斯说：对英法的电话管制解除了。证实了事态的发展。

德国海军记事册对进攻延期的记载更为简明，并且还提出了原因：

[④] 战后从德国外交部档案中发现的墨索里尼这封信件的德文译本中，也就是我在这里所用的文本中，“德国”一字被勾掉了而在上面用打字机打上了“波兰”的字样，于是念起来就成为“如果波兰进攻……”但是在意大利政府战后公布的意大利文原本上，这段话却是“Sela Germania attacca la Polonia”（如果德国进攻波兰）。令人惊奇的是，甚至收藏在他们政府档案中的秘密文件，纳粹也要加以篡改伪造。

[①] 墨索里尼 8 月 25 日致希特勒的信，同上，第 285—86 页。

8 月 25 日——由于政治局势的变化，已经开始进行的“白色方案”将于 20 点 30 分（下午 8 点 30 分）停止。（8 月 25 日中午获悉英波订立互助条约。又获悉意大利领袖通知，他将信守盟约，但要求大量供应原料。）[1]

纽伦堡的主要被告中有 3 名被告在诘询下各自对延期进攻作了说明。[2]里宾特洛甫说，当他听到英波条约的消息并且“听说”“正在对波兰采取军事步骤”（他仿佛一直不知道有进攻波兰那回 [557] 事似的）以后，他就“立刻”去找元首，力劝他取消对波兰的入侵。“元首立刻就同意了”。这当然完全是鬼话。

凯特尔和戈林的供同至少看来还比较诚实。凯特尔在纽伦堡法庭上追述当时情况说：“我突然被叫到总理府会见希特勒，他对我说：‘立刻停止一切行动。马上把勃劳希契找来。我需要时间进行外交谈判。’”

戈林在纽伦堡一次预审提讯中也证实，直到这时候，希特勒还相信他能够谈判出一条摆脱绝境的出路来。戈林说：

就在英国向波兰正式提出保证的那一天，元首打电话告诉我说，他已经下令停止执行进攻波兰的预定计划。我问他这是暂时的还是永久的。他说，“不是永久的.我必须看一看能不能避免英国方面的干预”。

墨索里尼在最后一分钟发生变卦，对希特勒固然是个沉重的打击，但是从上述证词中显然可以看出，促使这位德国领袖推迟进攻的因素中，比较有力的因素还是英国和波兰签订互助条约这一行动。然而奇怪的是，当天汉德逊大使曾经再次向他提出警告说，一旦波兰受到攻击，英国将参战，并且英国这时又已经在正式条约中庄严地宣布了这一保证；在这之后，他居然仍旧像他对戈林所说的那样，相信自己能够“避免英国方面的干预”。这大概是他根据过去同张伯伦在慕尼黑打交道的经验，以为只要能安排一条出路，这位英国首相就会再次屈膝投降。但是仍然令人不解的是，像他这样一个人，原先对外国政治曾表现出很有洞察力，居然不知道张伯伦这个人和英国的立场已经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毕竟全都是希特勒自己一手造成的。

要在 8 月 25 日晚上叫德国军队一下子停住，是颇费周折的事情，因为许多部队已经开始行动了。在东普鲁士，取消进攻的命令直到晚间 9 点 37 分才送达贝茨尔将军的第一军。在几个军官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急忙追上先头部队之后，才算止住了部队的前进。南面的冯·克莱施特将军那一军的摩托化纵队，在黄昏时分已经逼近波兰边境。一个参谋军官驾着小型侦察机在国境上快速着陆后才把它们在边界上拦住。更有少数地区在打响了以后才接到命令。但是由于好几天以来德国人一直在整个边境沿线挑衅闹事，波兰参谋总部显然没有怀疑到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在 8 月 26 日那一天，波兰参谋总部倒的确提出过这样一个报告，“德国匪徒”多股越过国界，以机关枪与手榴弹袭击我碉堡与关卡，“其中一起为德国正规部队所为”。[558]

“密谋分子”的欢欣和混乱

---

[1] 《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 6 卷，第 977—78（纽伦堡文件 C—170）。

[2] 1945 年 8 月 29 日对里宾特洛甫的提讯，同上，第 7 卷，第 535—36 页。1945 年 8 月 29 日对戈林的提讯，同上，第 534—35 页。1946 年 4 月 4 日凯特尔在纽伦堡对质时的证词，见《主要战犯的审讯》，第 10 卷，第 514—15 页。

8 月 25 日晚上希特勒取消进攻波兰计划的消息，使得谍报局里的密谋分子欢欣若狂。奥斯特上校把这消息告诉沙赫特和吉斯维乌斯时嚷道，“元首完蛋了”。到第二天早晨，卡纳里斯海军上将甚至比他更加想入非非，他宣称：“希特勒绝对经不起这次打击。今后 20 年的和平算是保住了。”他们俩人都以为没有必要再去为推翻这个纳粹独裁者而操心；他已经完蛋了。

原来在这个决定人类命运的夏季行将结束的最后几个星期里，那些自以为是在进行密谋的人曾经又忙碌了一阵。至于他们究竟怀着什么目的，则很难弄清楚。戈台勒、亚当·冯·特罗特、赫尔莫特·冯·毛奇、费边·冯·施拉勃伦道夫和鲁道夫·贝彻尔都曾先后来到伦敦；他们不仅告诉张伯伦和哈里法克斯，并且还告诉丘吉尔以及其他英国领导人说，希特勒打算在 8 月底进攻波兰。这些反对希特勒的德国人可以亲眼看到，整个英国，上至那位手里老带着一把雨伞的张伯伦，从慕尼黑的那些日子以来都已经改变了态度。一年前这些德国人自己曾提出一个条件：要他们决心驱逐希特勒，英国和法国就必须宣布将以武力制止纳粹的任何进一步的侵略，现在这一条件已经实现了。他们还要求什么呢？从他们所留下的文字材料来看，这一点是不清楚的，我们所能得到的印象是，连他们自己也不明白。虽然他们的用意良善，但是他们的思想混乱，达于极点，一种无能为力的感觉瘫痪了他们的手脚。希特勒对德国的统治——也就是对陆军、警察、政府和人民的统治——太严密了，不是他们所能够想出的办法可以动摇或推翻的。

8 月 15 日那一天，哈塞尔到沙赫特博士在柏林的独身新寓所中登门造访。这位被解职的经济部长刚刚从印度和缅甸旅行了 6 个月归来。哈塞尔在日记里写道：“沙赫特的看法是，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有留神等待，他认为事态将循着必然的道路发展。”根据哈塞尔自己的日记记载，他在同一天告诉吉斯维乌斯说，他“也赞成把直接行动暂时往后推一推”。

但是当时又有什么“直接行动”要推迟呢？哈尔德将军和希 特勒同样热衷于毁灭波兰，这时候根本不想推翻这位独裁者。至于冯·维茨勒本将军，一年前预定在推翻元首的活动中由他负责领导部队的，现在正在西部指挥一个集团军，即使他有心也无法参加柏林的行动。然而他是否真正有心呢？吉斯维乌斯到他的司令部去拜访他的时候，发现他正在收听英国广播公司从伦敦发出的新闻广播，于是马上就看清了这位将军的兴趣只在于弄清楚当前的局势动向。

至于哈尔德将军，他正在一心忙着拟订进攻波兰的最后计划，[559]根本就不再考虑推翻希特勒的这种造反的念头。在 1946 年 2 月 26 日战后纽伦堡的审讯中，问到他和另外几个所谓纳粹政权的敌人在 8 月的最后几天为什么没有作出任何努力推翻那位元首从而使德国免于卷入战争时，他说得非常含糊。他说，“当时没有可能”。为什么？因为冯·维茨勒本将军被调到西方去了。没有维茨勒本，陆军就不能动手。

那么德国人民呢？美国讯问官山姆·哈里斯上尉提醒哈尔德，指出他说过德国人民反对战争，于是问他：“如果说希特勒已经下了无可挽回的决心要发动战争，为什么你们不能在侵略波兰前夕依靠人民的支持呢？”哈尔德回答道：“请您原谅，我听了您的话忍不住好笑。当我听到‘无可挽回’这个字眼和希特勒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我就必须说没有什么事是无可挽回的。”这位参谋总长继续解释说，即使迟至 8 月 22 日，当希特勒在上萨尔斯堡会议上向他的将领们透露他已经“无可挽回”地下了决心要进攻波兰、并且如果

必要也同西方作战时，他本人并不相信元首当真会说到做到。[①]这段话同哈尔德本人在这段时期的日记对照来看，确实令人感到惊讶。但是不仅哈尔德如此，大多数其他密谋分子也如此。

哈尔德的前任陆军参谋总长、公认的密谋分子领袖贝克将军，这时又在哪里呢？据吉斯维乌斯说，贝克给冯·勃劳希契将军写过一封信，但是这位陆军总司令甚至不签个收到信的回条。吉斯维乌斯说，后来贝克同哈尔德作过一次长谈，后者同意，一场大战将意味着德国的毁灭，但是他认为“希特勒是绝不会打世界大战的”，因此当时无需设法推翻他。[①]

8 月 14 日，哈塞尔同贝克单独进餐，在日记上记述了他们的颓丧情绪。

贝克（是）极有教养、极有风采、极有见识的人。不幸的是，他非常瞧不起陆军中的领导人。因此，他认为我们不能在那里取得立足点。对于第三帝国各种政策的罪恶性质，他是深信不疑的。[②]

贝克以及他周围那些人的信念是崇高的，但是当希特勒准备把德国投入一场战争的时候，这些可敬的德国人却没有一个采取任何行动来制止他。这一任务显然是艰巨的，而且在这么晚的时候，也许是无法实现的。但是他们连试都没有试一下。

托马斯将军也许试了一下。他在 8 月中旬亲自向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长官凯特尔宣读了一份备忘录之后，*紧跟着又在 8 月 27 日星期日那一天拜访了凯特尔；并且据他自己说，当时还“交给他一份附有图表的统计材料……［这个材料］清楚地表明了西[560] 方国家在军事和经济两方面的巨大优势以及我们将遇到的灾难”。凯特尔以往常罕见的勇气把这份材料送给希特勒看，希特勒的答复是，他并不像托马斯将军那样“耽心爆发一场世界大战，特别是他现在已经把苏联争取到自己这一边来了”。[③]

这些“密谋分子”为防止希特勒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所作的尝试到此就告终了。只有沙赫特博士后来还作了一些微不足道的最后努力，这位精明的理财家在纽伦堡法庭为自己辩护时还把这种努力大大地吹嘘了一番。8 月间他从印度归来以后，给希特勒、戈林和里宾特洛甫分别写了几封信，在这个紧要关头，所有这些反对派的领袖的行动似乎都仅仅限于写写信和写写备忘录。但是据他后来说，他“万万没想到”这些信件竟然毫无回音。后来他决定到柏林东南几英里的佐森去亲自见见冯·勃劳希契将军，陆军总司令部当时在那里设立了波兰战役作战指挥部。他打算对冯 勃劳希契将军说什么呢？沙赫特在纽伦堡证人席上说，他打算去告诉那位陆军总司令，德国不经过国会批准就进行战争是违反宪法的！因此，这位陆军总司令有义务遵守忠于宪法的誓词！

真可惜，沙赫特博士根本没有去见勃劳希契。卡纳里斯警告他，如果他到佐森去的话，陆军总司令“可能马上把我们抓起来”。在这位希特勒旧日的支持者看来，这个下场似乎并不怎么合他的心意。[①]但沙赫特所以没有到佐森去执行他那可笑的使命（如果希特勒不嫌麻烦，愿意办一下这个正式手续的话，他要让那个橡皮图章似的国会批准他的战争是易如反掌的事），其真

[①] 《纳粹的阴谋与侵略》，附件 B，第 1561—63 页。

[①] 吉斯维乌斯著上引书，第 358—59 页。

[②] 哈塞尔著上引书，第 59 页。

[③] 托马斯：《思想和境遇》，见上引《瑞士月刊》。

[①] 沙赫特博士 1946 年 5 月 2 日在纽伦堡的证词，见《主要战犯的审讯》，第 12 卷，第 545—46 页。

正原因由吉斯维乌斯在纽伦堡出庭为沙赫特作证时一言道破。沙赫特原打算在 8 月 25 日到佐森去,后来因为那天晚上希特勒取消了第二天进攻波兰的预定计划，所以他也就没有去了。据吉斯维乌斯的证词，3 天以后，沙赫特又打算到佐森去完成他的使命，但是卡纳里斯告诉他说为时已经太晚了[②]。所以，并不是“密谋分子们”错过了班车，而是他们根本就没到车站去赶车。

正像那一小撮反纳粹的德国人没有能制止希特勒动手一样，这时向希特勒呼吁要他避免战争的各中立国家的领导人也是白费了一番唇舌。8 月 24 日，罗斯福总统向希特勒和波兰总统分别发出急电，敦请他们解决彼此间的分歧而不要诉诸武力。莫斯切斯基总统第二天就在一封措词颇为得体的复电中提醒罗斯福，“提出要求并且要求让步”的并不是波兰，但是尽管如此，波兰还是愿意按照美国总统的建议，通过直接谈判或者中间调停同德国人解决争端。希特勒则根本没有答复（罗斯福还提醒希特勒说，他还没有答复总统在 4 月间给他的呼吁）。第二天，8 月 25 日，罗斯福[561] 又给希特勒发了一封电报，把莫斯切斯基的和解态度通知他，恳求他“同意已为波兰政府接受的和平解决的原则”。

这第二封电报也没得到答复；不过在 8 月 26 日晚上，威兹萨克约见了美国驻柏林代办亚历山大·寇克，要他转告美国总统，元首已经收到那两份电报，并且已经“交给外交部长，供政府考虑”。

8 月 24 日，教皇通过电台广播呼吁和平，“凭着基督的血……祈求强者倾听我们的呼吁，希望他们不要因为肆行不义而变成弱者……如果他们不愿意自己的力量成为毁灭的原因的话”。8 月 31 日下午，教皇又以内容相同的照会分送给德国，波兰、意大利和两个西方大国的政府，“以上帝的名义祈求德意志和波兰两国政府……避免任何不幸事件”，并且要求英、法和意大利三国政府支持这一呼吁，他还说：

> 教皇不愿放弃通过即将举行的谈判取得公正的和平解决的希望。

教皇，也像世界上几乎所有的人一样，不知道所谓“即将举行的谈判”只不过是希特勒用来给侵略作借口的一个宣传伎俩。实际上，我们不久就可看到，在那最后一个和平的下午根本就没有进行什么真诚的谈判。无论是即将举行也好，不即将举行也好。

几天以前，在 8 月 23 日，比利时国王以“奥斯陆”国家（比利时、荷兰、卢森堡、芬兰和三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统治者的名义，也广播了一篇动人的和平呼吁，要求“对事态发展负有责任的人，通过公开的谈判来解决他们的争执和要求”。8 月 28 日，比利时国王和荷兰女王联名表示“愿为避免战争”进行斡旋。[①]

尽管这些中立国家发出的呼吁的方式和用意是高贵的，但是今天重读之下，却给人一种不现实和悲观的感觉。仿佛美国总统、教皇和那些北欧民主小国的统治者同第三帝国不是生活在一个星球上似的，他们对柏林方面的事情就同对火星上的情况一样缺乏了解。他们竟全然不知道阿道夫·希特勒的思想、性格和目的，全然不知道德国人，除了极少数例外，愿意置伦理、道德、荣誉或基督教的人道观念于不顾，而准备盲目地跟着希特勒走，不论他走向哪里，采取什么道路。他们这样全然无知将在未来的岁月中使得罗斯福

[②] 吉斯维乌斯 1946 年 4 月 25 日在纽伦堡的证词，同上，第 224—25 页。

[①] 这些呼吁的全部原文均载《英国蓝皮书》，第 122—42 页。

和比利时、荷兰、卢森堡、挪威、丹麦各国的君主领导下的人民付出惨重的代价。[562] 我们这些在最后几天紧张的和平日子里留在柏林企图向外界报道消息的人，对于总理府和外交部所在地威廉街和军事总部所在地班德勒街发生的事情也知道得很少。我们尽可能地密切注意威廉街上政府各部出出进进、川流不息的人群。我们每天在一大堆谣言、传闻、谎话，诳骗中间沙里淘金。普通老百姓和我们所认识的政府官员、党的领袖、外交家以及军人的情绪，我们是了解的。但是有些事情，我们和普通老百姓一样蒙在鼓里，比如汉德逊大使频繁地和希特勒、里宾特洛甫举行会晤，而且常常争得面红耳赤，其中说些什么我们就没法知道；希特勒与张伯伦之间、希特勒与墨索里尼之间、希特勒与斯大林之间有书信往返，其中的内容，我们也摸不清；里宾特洛甫与莫洛托夫之间、里宾特洛甫与齐亚诺之间举行过会谈，他们到底说了些什么，我们也无从得知；至于那些忙得晕头转向、心慌意乱的外交家与外交部官员之间互相交换的密码电报的内容，以及军方首脑正在策划和采取的各种行动，我们就更莫名其妙了。

当然，有少数一些事情，我们和公众是知道的。比如德国人大吹大擂的德苏条约，大家自然知道，只不过瓜分波兰和东欧其余部分的秘密议定书直到战后才知道。我们都知道，甚至在这一条约还没签字以前，汉德逊就飞到伯希特斯加登郑重地告诉希特勒，这个条约不能阻止英国履行它对波兰的保证。8 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开始以后，我们在柏林就感觉到，除非再来一个慕尼黑，否则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了，而且已经是不出几天的事。到 8 月 25 日，最后一批英、法侨民都离了境。原来预定于 8 月 27 日在坦能堡举行大规模的纳粹集会，希特勒将在会上发表演说。

26 日，这次集会也宣布取消了。原定于 9 月第一个星期在纽伦堡召开的一年一度的党代表大会，希特勒曾正式称之为“ 和平的党代表大会 ”，同样也取消了。8 月 27 日政府宣布，食品、肥皂、鞋、纺织品和煤从第二天开始实行配给制，我记得，主要是这个公告使德国人民意识到了战争的迫近，他们对这一公告的牢骚不满是可以很清晰地听到的。8 月 28 日，星期一，柏林的居民看到源源不绝的军队穿过市区开往东方。他们被装在所能搜寻到的各种各样的运货的卡车里运走。

这种情况也必然使普通老百姓警觉到要发生什么事了。我记得那个周末又闷又热，大多数柏林人不顾战争已经就在眼前，还是到首都周围的湖泊和树林中去消暑度假。星期日晚上回到城里以后，他们从无线电里听到国会在总理府举行了一次非正式的秘 密会议的消息。德意志通讯社的公报说：“ 元首在会上扼要地阐述 [563] 了局势的严重性。 ”这是德国公众第一次听到希特勒告诉他们时局已经严重了。会议的详细内容没有披露，除了国会议员和希特勒的亲信以外，没有一个外人知道那位纳粹独裁者那天的心情。过了很久以后,我们才从哈尔德 8 月 28 日的日记中看到谍报局奥斯特上校告诉他的当天开会情况的记述：

> 午后 5 点 30 分在总理府举行会议。有国会议员和若干党内显要参加……局势非常严重。无论如何决心要解决东部问题。最低要求：归还但泽，解决走廊问题。最高要求“ 取决于军事形势 ”。如果最低要求不能得到满足，就进行战争：野蛮！他将亲临前线。意大利领袖的态度对我们极为有利。
>
> 战争将非常困难，也许毫无希望。“ 只要我还活着，就谈不到投降。 ”苏联条约在党内受到广泛的误解。这是一个为了赶走魔王而与撒旦结盟的条约……“ 有人按照一定的暗示鼓掌，但是稀疏零落。 ”

个人对元首的印象是：疲惫、憔悴、嗓音嘎哑、心事重重。“他现在已经完全被他在党卫队里的顾问包围了。”

一个外国观察家在柏林也可以看到，报纸在戈培尔的巧妙操纵下，怎样欺骗了天真的德国人民。自从纳粹对所有的日报实行“一体化”，摧毁了新闻出版自由以后，6 年以来德国人民对于外界真相一直是隔绝的。有一个时期，在德国的大报摊上还可以买到苏黎世和巴塞尔出版的瑞士德文报纸，那上面还登着一些客观的消息。但是近几年来，德国不是在国内禁止销售这些报纸，就是把数量限制到极为有限的几份。懂英文和法文的德国人，偶然可以弄到几份伦敦和巴黎的报纸，不过读到的人却很少。

我在 1939 年 8 月 10 日的日记中写道，“德国人民生活在一个完全与世隔绝的世界里，看一看过去和今天的报纸，就会有这种感觉”。当时我是在华盛顿、纽约和巴黎作短期休假后回到德国来的，两天以前离开我在瑞士的家登上火车时，我买了一束柏林和莱因兰的报纸。它们把我一下子推回到了疯狂的纳粹世界，它和我刚刚离开的那个世界迥然不同，就好像是在另一个星球上一样。我到达柏林以后，8 月 10 日又继续写道：

全世界都认为和平将受到德国的破坏，是德国在威胁着要进攻波兰……但是在德国，被本国报纸蒙在鼓里，说法恰恰相反……纳粹报纸正在叫嚷的是：扰乱欧洲和平的是波兰，是波兰在以武装入侵威胁德国……

《柏林日报》以大字标题提出警告：“当心波兰！”并说：“对于肆无忌惮［564）地蹂躏欧洲和平与人权的波兰的答复！”

我在火车上买到的卡尔斯鲁厄《领袖》日报的标题是：“华沙杨吉将轰炸但泽——极端疯狂的波兰人发动了专人难以置信的挑衅！”

你也许会问：德国人民不可能相信这些谎言吧？你就去和他们淡淡吧。很多人是这么相信的。

到希特勒原定进攻波兰的日子 8 月 26 日，星期六，戈培尔在报纸上发动的宣传攻势达到了顶峰。我在日记里记下了当时报纸上的一些标题：

《柏林日报》：“波兰完全陷于骚乱之中——日耳曼人家庭在逃亡——波兰军队推进到德国国境边缘！”《12 点钟报》：“这样的玩火行为太过分了——3 架德国客机受到波兰人射击——走廊地带许多日耳曼人农舍成为一片火海！”

半夜我到“广播大厦”去，路上买了一份 8 月 27 日星期天版的《人民观察家报》。第一版顶端高达一英寸的通栏标题是：

波兰全境均处于战争狂热中！150 万人已经动员！军队源源运往边境！上西里西亚陷入混乱！

当然，关于德国的动员情况只字未提，虽然我们亲眼看到德国早在半个月以前就开始动员了。

最后 6 天的和平日子

8 月 25 日傍晚送到柏林的墨索里尼来函，迎头泼了希特勒一盆冷水。这封信加上英波同盟条约签字的消息，使希特勒不得不推迟原定第二天就要发动的进攻；他冷静下来以后，立即给意大利领袖发去一封短信，问他，为了保证意大利能够“参加一场大规模的欧洲冲突”，“您需要什么样的武器装备和原料，并要在什么时限内提供”。这封信由里宾特洛甫亲自于当晚 7 点 40 分用电话传给德国驻罗马大使，在 9 点 30 分就到了那位意大利独裁者手

中。[①]

第二天上午，墨索里尼在罗马召集意大利三军首长开了一个[565]会，拟订了一份作战 12 个月的最低需要清单。用参加拟制清单的齐亚诺的话来说，这份清单“足能气死一头牛，如果牛认得字的话”。[②]清单中包括 700 万吨石油、600 万吨煤、200 万吨钢、100 万吨木材以及一长串其他物品，一直到 600 吨辉钼矿、400 吨钛和 20 吨锆。除此之外，墨索里尼还要 150 门高射炮来保护意大利北部距法国空军基地只有几分钟航程的工业区，这是他在当时写的复信中提醒希特勒的。这封信由齐亚诺于 8 月 26 日中午刚过的时候用电话传给柏林的阿托利科，后者马上就交给了希特勒。[③]

这封信开列的不仅仅是一长串所需要的物资。现在事情已经很明显，这位泄了气的法西斯领袖已经下定决心要摆脱他对第三帝国所承担的义务。元首在读完这第二封信之后，对于这一点不可能再有丝毫的怀疑了。

元首，［墨索里尼对他的伙伴写道］如果当初按照我们以前商定的办法，让我有时间来积累物资和加快自给自足的速度，我现在就不会向您提出这份清单，即使提出，项目也会比这少，数字也会小得多。

我有责任奉告，除非我肯定能得到这些物资供应，否则我要求意大利人民作出牺牲……就可能成为徒劳，并可能损害您和我自己的事业。

阿托利科大使本人是反对战争的，尤其反对意大利在战争中参加德国一方，因此他在递交这封函件时自作主张地向希特勒强调说，“所有这些物资都必须在战事开始以前运到意大利”，并且说这个要求是“不可变更的”。”

墨索里尼仍然希望会出现另一个慕尼黑事件。所以他在信上特别附上一段说，只要元首认为“还有一线希望在政治领域内求得解决”，他将一如既往，随时准备给他的德国同志以充分的支持。尽管他们两人个人关系十分密切，并且缔结了钢铁盟约，尽管过去几年中彼此曾经多次大吹大擂地表示要团结一致互相支援，但是事实仍是：即使临到这个最后关头，希特勒仍然没有把他要毁灭波兰的真正意图推心置腹地吐露给墨索里尼，这位意大利伙伴仍然完全被蒙在鼓里。一直到这一天（26 日）快要完了的时候，他们之间的这个隔膜才最后沟通。[566] 在 8 月 26 日当天，希特勒在不到 3 小时之内就给墨索里尼的来信回了一封很长的复信。下午 3 点零 8 分，又由里宾特洛甫把这封信用电话传给驻在罗马的冯·马肯森大使，这位大使在 5 点刚敲过不久的时候连忙把它送给了墨索里尼。希特勒说，意大利提出的某些要求，如煤、钢之类，可以如数供给，但许多其他物资则难以办到。阿托利科坚持这些物资必须在战争爆发之前运到，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

这时候希特勒才终于把他立即就要开始实现的真实目的吐露给他的盟友。

由于法国或英国都不可能在西方取得任何决定性的胜利，而德国由于和俄国达成了协议，在击败波兰之后就可以腾出东方的全部兵力……所以我即使冒在西线发生纠葛的风险，也不会在解决东方的问题上退缩。

领袖，我了解您的处境，我只请您进行积极的宣传，并适当采取您自己已经向我建议的军事姿

---

① 希特勒 8 月 25 日下午六点四十分致墨索里尼函，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 7 卷，第 289 页。

② 《齐亚诺日记》，第 129 页。

③ 墨索里尼 8 月 26 日下午十二点十分致希特勒函，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 7 卷，第 309—10 页。

态，设法为我牵制英、法军队。[①]

这是德国文件中所出现的第一个证据，表明希特勒在取消进攻波兰 24 小时以后又恢复了信心，而要继续进行他的计划，“即使冒”同西方作战的“风险”也在所不顾。

8 月 26 日当天晚上，墨索里尼又作了一点努力再次劝阻希特勒。他又给元首写了一封信，齐亚诺又用电话传给阿托利科，这封信在快到下午七点钟的时候送到了帝国总理府。

元首：

我相信阿托利科无意造成的误会已经立即得到了澄清……除高射炮以外，我请求您供给的其他物资可以在今后 12 个月内陆续运到。不过，纵使误会已经澄清，您显然还是不可能大力帮助我补足意大利在埃塞俄比亚和西班牙战争中所耗损的大量军备。

因此我将采取您所建议的态度，至少是在冲突的最初阶段，一方面尽最大能力加速军事准备，一方面就像目前己在进行的那样尽可能多地牵制住法国和英国的军队。

这位意大利领袖由于自己在这样一个紧要关头扮演这样一个不光彩的角色而深感苦恼，尽管如此，他还不死心，仍然认为应当试一试，看看是否有可能再来一次慕尼黑式的妥协。

……我不揣冒昧（他接着写道）再次请您试一试寻求政治解决的机会，这决不是出于与我的天性格格不入的和平主义性质的考虑，而是为了我们两国人民和两国政权的利益。我认为现在还有政治解决的可能性，而且认为这样[567]一个解决办法一定能使德国在道义上和物质上都完全得到满足。[①]

现在已经可以从档案材料看出，当时这位意大利独裁者努力争取和平是因为他还没有为战争作好准备。但是他为自己所扮演的角色而感到很难过。他在 8 月 26 日最后这次信件交换中对希特勒说：“在这行动的时刻，我出于非我力之所及的原因而不能给您真正的支援，此种心情，阁下当可想见。”齐亚诺在这忙碌的一天结束时在日记中写道：“领袖的确很难过。他的好战本能和荣誉感驱使他走向战争。理智现在已经制止了他。然而这使他大为伤心……现在他已经不得不正视严酷的事实了。而对领袖来说，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经过这番穿梭般的信件往返之后，现在希特勒也只好让墨索里尼临阵脱逃了。8 月 26 日深夜，他又给他的轴心伙伴去了一封信。这封信是在 27 日零时 10 分从柏林用电报拍出的，送到墨索里尼手里是那天上午 9 点。

领袖：

我已经收到您表示最后态度的来信。我尊重促使您作出这个决定的理由和动机。在一定情况下，这样做还是可能有良好结果的。

但是我认为，先决条件是意大利不应使外人知道它所打算采取的态度，至少在战争开始以前应当如此。因此，我诚恳地请求您用您的报纸和其他手段在心理上支持我们的斗争。我还要请求您，领袖，如果有可能的话，就在军事上采取示威性措施。至少要牵制住一部分英法军队；即使不能如此，无论如何也要使他们狐疑不定。

不过，领袖，最重要的一点是：事情万一和我所说过的那样发展成一次大战，东线的局势就必须在西方两大强国能操胜算之前予以解决。然后今年冬天，最迟也不过明年春天，我将以至少和法、英数量相等的兵力在西线发动进攻……

[①] 希特勒 8 月 26 日下午三点零八分致墨索里尼函，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 7 卷，第 313—14 页。

[①] 墨索里尼 8 月 26 日下午六点四十二分致希特勒函，同上，第 323 页。

领袖，现在我有一件事要求您鼎力协助。在这一场艰巨的斗争中，您和您的人民所能给我的最大帮助是派来意大利劳工，从事工农业劳动……希望您慷慨应允，对您过去为我们的共同事业所作出的努力谨表谢忱。

阿道夫・希特勒[①]

意大利领袖当天下午作了一个温顺的答复，表示外界绝不会“在战争爆发以前知道意大利的态度”，他一定严守秘密，并答应 [568]设法牵制住尽可能多的英、法陆海军力量，他还将向希特勒派出所要求的意大利劳工。[②]据冯・马肯森大使对柏林提出的报告来看，墨索里尼那一天在回这封信之前，曾经“郑重其词地”再次向这位德国大使表示，“他仍然相信，达到我们的全部目的而不诉诸战争还是可能的”，并且说，他将在给元首的信里再一次提出这一点。[①]但是他在信中并没有提及。看来他当时已经心灰意懒，连提也不想再提了。

战争一旦突然爆发，法国虽然能几乎全部提供盟国方面在德国的西方国境线上所需的军队，而且在最初几个星期内，盟军在数量上也会远远地超过那里的德国驻军，但是在 8 月将尽的那几天里，希特勒对于法国的动向似乎满不在乎。8 月 26 日，达拉第总理写给他一封慷慨陈词、颇为动听的信，提醒他法国会采取的行动，并声明一旦波兰遭到攻击，法国就一定出兵作战。那封信中写道：

除非您认为法国人民的国家荣誉感不如我本人认为德国人民所具有的国家荣誉感，否则就不应当怀疑法国将恪守自己对其他国家，诸如波兰，所作的庄严保证……

达拉第在呼吁希特勒通过和平途径解决他同波兰的争端之后，补充说：

如果像 25 年以前一样，法兰西和德意志在一场时间更长和杀人更多的战争中再次流血，两国人民都会抱着必胜的信心进行决战，但是最有把握的胜利者将是毁灭和野蛮的力量。[②]

考仑德雷大使在递交总理的这封信时，还加上了他个人热情的口头呼吁，恳求希特勒“看在人道的份上，为了他自己良心的安宁，不要放过这个和平解决的最后机会”。但是这位大使却不得不怀着“遗憾的心情”向巴黎报告，达拉第的来信未能打动这位元首——“他无动于衷”。

希特勒第二天给法国总理的复信，巧妙地利用了法国人不愿“为但泽送命”的心理，不过他没这么讲，这话留给法国的姑息妥协派说去了。希特勒宣称，自从归还了萨尔之后，德国就对法国放弃了一切领土要求；因此，两国之间没有理由一定要兵戎相见。如果竟然发生了战争，责任决不在他，而且他会感到“非常痛心”。

在最后那个和平的星期中，德、法两国在外交上的接触仅此而已。自从 8 月 26 日那次会见以后，考仑德雷一直到大势已去、无可挽回的时候为止，没有再去见过希特勒。在这个紧要关头对 [569]这位德国总理关系最大的国家是英国。正如 8 月 25 日晚上希特勒推迟了入侵波兰的行动以后对戈林所说的，他要看一看能不能“排除英国的干涉”。

最后关头的德英关系

---

① 希特勒 8 月 27 日上午十二点十分致墨索里尼函，同上，第 346—47 页。

② 墨索里尼 8 月 27 日下午四点三十分致希特勒函，同上，第 353—54 页。

① 马肯森 8 月 27 日的电报，同上，第 351—53 页。

② 这位第 8 月 26 日致希特勒函，同上，第 330—31 页。另见《法国黄皮书》，法文版第 321—22 页。

罗马和伦敦传来的消息迫使希特勒从战争的悬崖边缘退缩回来以后，哈尔德将军曾在他 8 月 25 日的日记中写道：“ 元首受到了极大的震动 ”。可是第二天下午，这位参谋总长发现领袖的态度又骤然改变了。“ 元首非常镇静而开朗 ”，这是他在那天下午 3 点 22 分随手写下的日记。这种变化不是没有来由的，这位将军的日记道出了这个原因。“ 要为‘ 第七动员日 ’的早晨做好一切准备。进攻在 9 月 1 日开始。 ”希特勒用电话向陆军总司令部发出了这个命令。

这就是说，希特勒准备动手打波兰了。这一点既然已确定，他就要尽一切可能使英国置身局外。哈尔德的日记道出了元首及其亲信在 8 月 26 日那个决定命运的一天的想法。

传说英国有意考虑德国的全面建议。*汉德逊归来后就可知道详情。另外有谣言说，英国强调，波兰的切身利益受到威胁是必须由英国来宣布的事。在法国，向政府提出的反战抗议书越来越多……

计划：我们要求取得但泽，一条穿过“ 走廊 ”的走廊，在和萨尔相同的基础上进行公民投票。英国也许会接受。波兰多半不会。这是分化它们的楔子。[①]

着重字体是哈尔德自己写的，在某种程度内这无疑正确地反映了希特勒当时的想法。他想在波兰和英国之间打进一个楔子，并给张伯伦一个借口，让他摆脱对华沙的保证。在命令军队准备于 9 月 1 日进军以后，希特勒就等着看伦敦方面对他那个“ 保证 ”英帝国存在的狂妄自大的建议有什么反应。

当时他与英国政府有两次接触，而伦敦的德国大使馆没有参预那最后一刻钟的紧张的谈判活动，因为德国驻伦敦大使狄克森正在休假。一次接触是通过汉德逊大使的官方接触,汉德逊在 8 月 26 日星期六一清早带着元首的建议乘坐一架德国专机飞到了伦敦。另一次接触是非官方、秘密的，而且结果证明是相当外行的接触。这次的中间人是戈林的瑞典朋友，那位喜欢到处奔走的比尔格·达勒鲁斯，早在前一天他就带着这位德国空军司令给英国政府的一封信从柏林飞到了伦敦。

[570]“ 在这个时期， ”后来戈林在纽伦堡法庭的一次提讯中说，“ 我同哈利法克斯在正常外交途径之外通过一个特别信使保持着联系。 ”*[①]这位瑞典“ 信使 ”在 8 月 25 日星期五下午 6 点 30 分飞到伦敦就是去找英国外交大臣的。前一天，戈林把他从斯德哥尔摩找到柏林来，告诉他，尽管前一天夜间签订了德苏条约，德国还是想同大不列颠达成一项“ 谅解 ”，他把自己的一架专机交给这个瑞典人使用，以便让他能火速飞往伦敦，把这件重要的事情通知哈利法克斯勋爵。

这位在一小时以前签订了英波互助协定的英国外交大臣感谢达勒鲁斯的奔走，并告诉他说，汉德逊刚在柏林同希特勒进行了商谈，马上就要带着元首的新建议飞回伦敦；既然柏林同伦敦之间的官方联系现在已经重新打开，他认为这位瑞典人的居间奔走已经不再需要。但是不久证明这种奔走还是需要的。当达勒鲁斯于当晚打电话给戈林报告他同哈利法克斯会谈经过时，那位元帅告诉他，由于英波条约的签订，局势已经恶化，大概只有英、德两国

[①] 哈尔德 8 月 28 日日记，追记前五天的“ 前后事件 ”。这一部分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 7 卷，第 564—66 页。

[①] 1945 年 8 月 29 日在纽伦堡对戈林的提讯，见《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 8 卷，第 534 页（纽伦堡文件 TC—90）。

代表举行会谈才能挽救和平。据戈林后来在纽伦堡作证时说，他和墨索里尼一样，当时都想再来一次慕尼黑式的妥协。

当天深夜，那位不知疲倦的瑞典人把他同戈林的谈话通知了英国外交部，次日早晨他接到邀请同哈利法克斯再作一次会谈。这一次他说服了英国外交大臣给戈林写了一封信，他把戈林说成是唯一能够防止战争爆发的德国人。那封措辞笼统的信很简短，而且话说得很含混。它只是重申了英国对于达成和平解决的愿望，并且强调需要“几天的时间”才能办到。”

虽然如此，这位肥胖的元帅却认为这封信“极其重要”。达勒[571]鲁斯于当晚（8月26日）就把这封信交给了戈林，当时戈林正坐着一列专车去柏林郊外奥兰宁堡空军司令部的途中。专车在第二站就停住了，两人临时征用了一辆汽车直奔总理府。到那里时已经半夜了，总理府一片漆黑，希特勒已经上床睡觉了。但是戈林一定要把他叫起来。到这时为止，达勒鲁斯也和很多其他的人一样，总认为希特勒并不是一个不讲道理的人，他会像一年前在慕尼黑所做的那样，接受一个和平解决的办法。这个瑞典人这回却要破题儿第一道领教这位天赋神赐的独裁者的思想多么荒唐离奇，脾气多么喜怒无常。[①]这是一次使他灰心丧气的经历。

达勒鲁斯从哈利法克斯那里带来的这封信，戈林认为事关重要，必须在深更半夜把元首叫起来看看，可是希特勒却根本不加理睬。他反而对这个瑞典人滔滔不绝他讲了20分钟他早年的奋斗经过、他的伟大成就以及他为了同英国人取得谅解而作出的各种努力。接着，当达勒鲁斯插上一句说他曾经在英国当过工人时，这位总理马上就询问他有关这个古怪的岛国和这个古怪的民族的情形，他说他曾花了很大的努力，可是始终还没有能了解他们。接着他又大谈了一通德国的军事威力，有些地方还是从技术角度来谈的。达勒鲁斯后来说，这时候他认定他的夜访“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了”。不过这个瑞典人到底抓住一个机会，把他所了解到的一些英国人的情况告诉了他的主人。

希特勒一直听下去，没有打断我的话头……但是后来他突然站起来，变得非常激动而且神经质，在屋子里来回地走着，一面自言自语地说，德国是不可抗拒的……突然，他在房间中央站住，眼睛直挺挺地望着前面。他的声音变得含糊不清，他那样子完全是一个神经失常的人。他断断续续地说道：“如果发生战争，我就要造潜水艇，造潜水艇，潜水艇，潜水艇，潜水艇！”他的话越来越不清楚，最后根本就听不出他在说些什么了。接着他定了定神，就像在对大庭广众发表演说似地拉开嗓门，尖声尖气地叫了起来：“我要造飞机，造飞机，飞机，飞机！我要消灭我的敌人。”那神情活像小说里的一个妖魔，而不像是个真人。我惊讶地注视着他，又回过头来看看戈林的反应，他却若无其事。

[572] 最后，这位激动的元首大踏步走到他的客人面前，对他说，“达勒鲁斯先生，你是很了解英国的。你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我想同英国达成协议，可是总也不能成功？”达勒鲁斯自称他“最初犹豫了一下”不知怎样回答，但是后来答道：据他个人看来，原因在于英国人“不信任他和他的政府”。

“这些白痴！”据达勒鲁斯说，当时希特勒把右臂一甩，用左手拍着自己的胸口，对他吼道，“我这一辈子几时说过谎话？”

随后这位纳粹独裁者平静下来，他们讨论了希特勒通过汉德逊提出的建

[①] 关于达勒鲁斯的活动，参见上引他的著作和他在纽伦堡的证词。他终于在纽伦堡明白了他对他的那些纳粹朋友未免太天真了。见本书第十五章注

议；最后决定让达勒鲁斯飞回伦敦去，再交一份建议给英国政府。戈林反对把它写下来，他要这位脾气随和的瑞典人把它记在心里。这个建议包括 6 点：

1.德国希望同英国缔约或者同英国结盟。

2.英国要协助德国取得但泽和走廊，但是波兰可以在但泽拥有一个自由的港口，保留波罗的海上的格丁尼亚港和通在该港的走廊。

3.德国将保证波兰的新国界。

4.德国要收回自己的殖民地或者与此相当的土地。

5.必须对波兰境内的日耳曼少数民族作出保证。

6.德国方面将保证保卫英帝国。

达勒鲁斯牢牢记住这些建议之后，于 8 月 27 日星期日上午飞往伦敦，中午 12 点多钟，为了避开那些到处打听的新闻记者，被悄悄地绕道带到了张伯伦、哈利法克斯勋爵、霍拉斯·威尔逊爵士和亚历山大·贾德干爵士的面前。显然，英国政府现在十分重视这位瑞典信使。

他身上带着记述头天夜晚同希特勒和戈林会见经过的个人笔记，这是他在飞机上仓促草就的，那两位英国内阁领导人这时接过来仔细阅读，他在其中力称，会晤时希特勒是“安详而镇静的”。虽然在外交部的档案中找不到有关这次星期日破例会见的记录，但外交部文件汇编在第 3 辑第 7 卷中根据哈利法克斯勋爵和贾德干所提供的材料以及那位密使的备忘录追述了这件事。英国政府文件上的说法和达勒鲁斯在他的书中以及在纽伦堡法庭上所说的情形有一些出入，但是把各种说法放在一起来看，下面的叙述似乎是我们所能得到的一个最可靠的报道。

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立刻看出他们所面临的是希特勒的两套建议，一套是交给汉德逊带来的，一套是现在由达勒鲁斯带来的，内容是不同的。第一套建议说希特勒将在他同波兰人算了帐以后再来保证英帝国的存在，而第二套建议似乎是说：元首准备通过英国来谈判归还但泽和走廊的问题，然后他将“保证”波兰的新边疆。张伯伦前回在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上已经吃过希特勒一次苦头了，这话在他听来完全是一套 老调，他对达勒鲁斯代表元首概述的建议不敢轻信。他对这个瑞典人说，他“从这些条件看不到解决问题的前景，波兰人可能让出但泽来，但是他们宁可作战也不会放弃走廊。

最后大家同意让达勒鲁斯产刻回柏林去，把他们初步的非正式答复告诉希特勒，然后在正式答复拟好并由汉德逊第二天晚上带到柏林去以前先把希特勒的反应告诉伦敦。据英国的文件，正如哈利法克斯所说：“由于通过达勒鲁斯先生的这种非正式的秘密接触，问题可能发生一些混乱。[因此]有必要说明，达勒鲁斯于当晚回柏林去，不是传递英王陛下政府的答复，而是为汉德逊送去的正式复信准备条件。”[①]

这位默默无闻的瑞典商人作为欧洲两个头号强国政府的谈判中间人，地位已经非常重要，所以据他自己说，在这个千钧一发的时刻，他曾向英国首相和外交大臣建议，“他们应该让汉德逊在伦敦等到星期一[第二天]，以便他们在听到希特勒对英国立场的反应之后再作答复”。[①]

那么，什么是达勒鲁斯要对希特勒阐明的英国立场呢？关于这个问题，双方说法有些混乱。根据哈利法克斯的概略记录，他给达勒鲁斯的口头指示

[①]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 7 册，第 287 页。

[①]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 7 册，第 287 页。

中所表示的英国立场仅仅是：

1.庄严保证谋求 G.（德国）与 Gt.B.［英国］之间充分谅解的愿望（缩写字母是哈利法克斯原来用的）。没有一个政府成员不是如此想法。2.Gt.B.有责任履行自己对波兰的义务。3.德波争端应当和平解决。[①]

但是根据达勒鲁斯的说法来看，英国政府托他转达的非正式答复却更为全面：

自然，第六点，关于保卫英帝国的建议遭到了拒绝。同样，只要德国还处于动员状态之中，他们就不能讨论殖民地问题。关于波兰边界，他们主张由 5 大国来保证。关于走廊，他们建议立即同波兰举行谈判。至于（希特勒建议的]第一点，英国在原则上愿意同德国达成一项协定[②]

星期日晚上达勒鲁斯飞返柏林，将近午夜时见到了戈林。那 [574]位元帅认为英国的答复不是“很令人满意”，但于半夜谒见了希特勒以后，戈林在深夜 1 点钟的时候打了一个电话给住在旅馆里的达勒鲁斯，对他说，如果汉德逊星期一晚上带来的正式答复与他所说的一致的话，总理准备“接受英国的立场”。

戈林很高兴，达勒鲁斯当然更高兴。这个瑞典人在半夜 2 点钟叫醒了英国大使馆的参赞乔治·奥吉尔维·福比斯爵士，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他。达勒鲁斯不仅转达了这个消息，由于至少他自以为他当时已经处在那种能说话的地位，所以他还对英国政府提供了意见，告诉他们在正式答复中应当说些什么。达勒鲁斯强调说，汉德逊在 8 月 28 日这天带来的那份复照应当保证英国将说服波兰同德国立即举行直接谈判。

达勒鲁斯刚从戈林办公室里来过电话[后来福比斯在 8 月 28 日的一份电报中这样说]，他认为提出以下两点建议是极端重要的。

1.英国政府给希特勒的答复绝不能提及罗斯福的计划。*

2.希特勒怀疑波兰人恐将设法规避谈判。因此答复中应该明确说明，已经竭力劝说波兰人立即同德国进行接触和举行谈判。[③] [①]

这时这个已满怀信心的瑞典人，在整个这一天里不仅接二连三地向福比斯提供意见（福比斯都用电报如实地转给了伦敦），而且还亲自打电话给英国外交部，向哈利法克斯转去进一步的建议。

在世界历史的这个危急关头，这位临时客串的瑞典外交家的确成了柏林同伦敦之间的枢纽人物。哈利法克斯一方面从柏林的英国大使馆、另一方面从达勒鲁斯本人打给外交部的电话中知道了这个瑞典人的紧急意见以后，就在 8 月 28 日下午两点钟的时候用电报通知英国驻华沙大使霍华德·肯纳德爵士，要他“立刻”去见波兰外交部长贝克，促使后者授权英国政府通知希特勒，“波兰准备同德国立即开始直接磋商”。哈利法克斯急不可待。他想要把波兰方面授权英国这么做一点列入汉德逊等着在当天带回柏林向[575]希特勒提出的正式复文中。他叫他的驻华沙大使尽快把贝克的答复用电话向他

[①]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 7 册，第 319 页注。

[②] 《主要战犯的审讯入第 9 卷，第 466 页。

[③] 必须说句公道话，达勒鲁斯并不像他的某些电信所表现的那样亲德。同一星期一的夜里，他和戈林在奥兰宁堡空军总部呆了两小时以后，给福比斯打了一个电话，告诉他，“德国军队将于星期三到星期四，即 8 月 30 日到 31 日的夜间作好进攻波兰的最后准备”。福比斯尽可能迅速地把这个情报通知了伦敦。

[①]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 7 册，第 321—22 页。

报告。傍晚，贝克根据要求同意授权，这一点马上就列入了英国的复照中。[②]

汉德逊于 8 月 28 日晚间带着这个复照返回柏林，到达总理府时党卫队仪仗队举枪击鼓致敬，这种表面上的外交礼貌直到最后一分钟还维持着。然后他被带到希特勒面前，这时是夜间 10 点 30 分，他把复文的德文译本交给了希特勒。这位总理立刻就打开来看。

照会说，英国政府“完全赞同”他的主张，认为“首先”必须解决德波之间的分歧。“可是，”照会接着说，“一切问题取决于解决办法的性质以及达成解决的方式。”照会指出，关于这一点，德国总理一直“避而不谈”。希特勒“保证”英帝国存在的建议被婉言谢绝了。英国政府“不能为了许给大不列颠的任何利益而同意采取一种使曾经得到大不列颠保证的一个国家的独立受到危害的解决办法”。

这一保证必须信守，但是德国总理不可因为英国政府“一丝不苟”恪守本身对波兰所承担的义务，就认为不盼望问题获得公平解决。

因此，下一步骤应该是开始进行德波两国政府之间的直接磋商，其基础是……维护波兰的根本利益不受侵犯，并争取国际上来保证这一解决办法。

（英国政府）已经收到波兰政府明确保证，他们准备在此基础上进行磋商，英王陛下政府希望德国政府也愿意赞同这一方针。

……德波问题的……公平解决可能为世界和平开辟道路。如果解决归于失败，德国同大不列颠之间取得谅解的希望就会归于破灭，两国将因此而发生冲突，并且很可能使全世界投入战争之中。这样的结局将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①]

希特勒看完照会以后，汉德逊开始根据他的笔记对照会作了进一步的补充，他告诉希特勒说，这是他同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谈话时记下来的。他后来说，在他同希特勒历次会见中，唯有这一次大部分是由他在说话的。他所说的无非是英国希望得到德国的友谊并且希望和平，但是如果希特勒进攻波兰，英国就一定要出兵。当时这位元首并未缄口不言，他的回答是唠叨不休地大谈波兰的罪状和他自己为了谋求同波兰达成和平解决而提出的“慷慨”的建议，他说这是他最后的一次建议，以后不会再提了。事实上，今天“只有归还但泽和全部走廊才能令他满意，同时还须改正西里西亚的现状，那里的居民在战后公民投票中有 90%都投德国的票”。这一点并非事实，同样，他接着提出的另一个辩驳[576]也不是事实，那就是他说 1918 年以后有 100 万德国人被赶出走廊，其实据 1910 年德国的人口调查，那里只有 385000 个德国人。当然，这时候这位纳粹独裁者以为所有的人都会毫不辨察地听信他的谎言。那位英国大使又听信了这种谎话，因为他在《最后的报告》中宣称，“这一回希特勒的态度又表现得很友善而且通情达理，看来对我带给他的答复并没有感到不满”。不过，这是他出使柏林的失败史上最后一次听信希特勒的谎话了。

汉德逊于凌晨 2 点 35 分拍了一个很长的报告这次会晤情况的电报，他在电报中说：“最后我向他提出两个干脆的问题”。[①]

他是否愿意直接同波兰人谈判？他是否准备讨论交换居民的问题？对于后一点，他作了肯定的答复（虽然我毫不怀疑他同时在考虑修改边界）。

[②] 《英国蓝皮书》，第 125 页，和《英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 7 册，第 318 页。

[①] 英国 8 月 28 日致德国的照会全文，见《英国蓝皮书》，第 126—28 页。

[①] 汉德逊 8 月 29 日上午二点三十五分致哈利法克斯的电报，同上，第 128—31 页。

至于第一点，他表示首先要对英国的整个照会作一番“仔细的考虑”再说。汉德逊在电报中追述道，当时总理转身对里宾特洛甫说：“我们必须把戈林找来同他商量商量。”希特勒答应第二天，即 8 月 29 日星期二，对英国的来照作出书面答复。

“虽然双方的态度都非常坚定，”汉德逊特别告诉哈利法克斯说，“谈话却是在十分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尽管汉德逊同他的东道主亲身打过不少交道，大概他还是没有完全了解为什么希特勒要制造这样一种友好气氛。这位元首仍然决定在这个周末进攻波兰。尽管英国政府和汉德逊已经把话说得很明白，他仍然相信能够使英国置身事外。

希特勒显然是受了不学无术、一味逢迎的里宾特洛甫的怂恿，压根儿就不相信英国人所说的是真话，尽管嘴上说相信。

汉德逊拍出那份长电之后，第二天，又追加了一段：

> 希特勒再三声明，他不是虚声恫吓，谁要是认为他是虚声恫吓，那就会铸下大错。我回答他说，我对于这一点毫不怀疑，不过我们也不是在虚声恫吓。希特勒先生表示，他对于这一点完全明白。[①]

话虽这样说，但他真的明白么？因为他在 8 月 29 日的答复中还是竭力企图欺诳英国政府，看样子他当时一定是认为，他这样就既捡了便宜又卖了乖。

英国的答复和希特勒的初步反应，在柏林，特别是在戈林的巢穴里，产生了一阵乐观的气氛，那位历史上绝无仅有的达勒鲁斯现在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那里度过的。8 月 29 日凌晨 1 点 30 分，这个瑞典人接到那位元帅的一个副官从总理府打来的电话。汉德[577]逊走后，希特勒、里宾特洛甫和戈林 3 人在那里研究了英国的复照。达勒鲁斯从他的德国朋友那里听到的是，英国的答复“非常令人满意，战争的威胁极有希望已成过去”。

当天早晨达勒鲁斯就用长途电话把这个好消息通知了英国外交部，他告诉哈利法克斯说，“希特勒和戈林认为和平解决现在肯定有可能了”。上午 10 点 50 分，达勒鲁斯见到了戈林，戈林热情洋溢地和他招呼，使劲儿握着他的手，大声说道：“要和平了！和平保住了！”有这样可喜的保证撑腰，这位瑞典信便立刻前往英国大使馆，把这个喜讯告诉至今尚未和他见过面的汉德逊。据那位大使描述这次会见的电报说，达勒鲁斯对他讲，德国人极为乐观。他们同意英国答复中的“主要观点”。达勒鲁斯说，希特勒“仅仅”要求取得但泽和走廊——不是全部走廊，而是通往但泽的铁路沿线的窄窄一条走廊。达勒鲁斯还对他说，事实上，元首准备采取“极其讲道理的态度。他愿意尽量同波兰人妥协”。[①]

那时终于有点醒悟过来的尼维尔·汉德逊爵士并不那么相信。据他的客人说，他告诉他的客人，希特勒的话一句也信不得，达勒鲁斯的朋友赫尔曼·戈林也是一样，他曾经对这位大使说过“无数次”谎话。汉德逊认为，希特勒正在玩弄一套背信弃义的把戏。

但是，那位瑞典人当时正处于事件中心，汉德逊没法让他改变看法。他的醒悟甚至比汉德逊还要晚。他为了加一层保障，不使自己劳碌奔波的成果受到那位大使难以理解的悲观情绪的破坏，在黄昏 7 点 10 分的时候又打了一个电话，叫英国外交部给哈利法克斯留一个口信，告诉他“德国的答复中不会有什么困难”。不过这位瑞典人劝英国政府叫波兰人的“行为必须得体”。

---

① 汉德逊 8 月 29 日致哈利法克斯的电报，同上，第 131 页。

① 汉德逊 8 月 29 日的电报，见《英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 7 册，第 360 页。

②

5 分钟以后，即 8 月 29 日晚上 7 点 15 分，汉德逊到总理府去取元首的正式答复。事情马上就清楚了，戈林和他的瑞典朋友空欢喜了一场。在这次会见时，据这位大使事后立刻给哈利法克斯的报告，“ 双方争吵得非常激烈，希特勒先生远不如昨天讲道理。 ”

德国的正式书面照会重申了德国希望同大不列颠友好的愿望，但强调指出，“ 不能牺牲德国的根本利益来换取这种友谊 ”。接着照会上就长篇大论地重弹老调，指责波兰人的过错，波兰人的挑衅和“ 上天难容的野蛮虐待行为 ”，然后才破天荒第一次用书面正式提出希特勒的要求：归还但泽和走廊，保护波兰境内的日耳曼人。照会接着又说，要消除“ 目前这种状况，不能再拖多少日 [578]子，更谈不上再拖几星期，恐怕只能有几小时的时间 ”。

照会接着说，德国不能再同意英国的看法，认为通过同波兰的直接谈判可以取得解决办法。不过，“ 完全 ” 为了让英国政府感到满意，为了维护英德友谊，德国准备“ 接受英国的建议，同波兰进行直接谈判 ”。“ 如果重新划分波兰领土 ”，德国政府未经苏联同意是不能给予任何保证的。（英国政府当然不知道德苏条约瓜分波兰的秘密议定书。）照会宣布，“ 至于其他方面，德国政府在提出这些建议时绝对无意触犯波兰根本利益或对独立的波兰国家的存在表示异议 ”。

接着，到最后，来了圈套：

> 因此，德国政府接受英国政府的建议，同意由英国出面斡旋，请波兰派遣一位全权特使前往柏林。本政府指望该特使子 1939 年 8 月 30 日星期三到达。
>
> 德国政府将立即拟出一个自己所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并且愿意在可能办到的情形下将该方案在波兰谈判代表到达之前交给英国政府。①

汉德逊阅读照会的时候，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都一声不响地在一旁看着他。最后他看到了德国期望波兰全权特使于第二天到达的那一段。

“ 这口气听来像最后通牒， ” 他说。但是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矢口否认。他们说，他们只是想强调指出，“ 当两国充分动员的军队已在严阵对峙的时候，时机是多么紧迫 ”。

这位大使无疑还记得希特勒给予许士尼格和哈查的接待，因而问他，如果波兰全权代表来了，是否会受到“ 良好的接待 ”，磋商是否能“ 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 ”。

“ 那当然。 ” 希特勒回答说。

接着在某一点上由于希特勒提出了一个“ 毫没来由 ”的指责（汉德逊语），引起了一场激烈的舌战。希特勒的指责是这位大使对于有多少日耳曼人在波兰遭到屠杀的问题“ 一点儿也不在乎 ”。汉德逊说，他对于这一点立刻作了“ 激烈的驳斥 ”。 ”

“ 那天晚上我从德国总理府出来时，心里充满了最阴黯的不祥之感。 ” 汉德逊后来在回忆录中这样追述,不过他在当晚发给伦敦[579]的电报中似乎没有提到这一点。在谈话中，希特勒曾经对他说：“ 我的士兵在问我，‘ 打还是不打？ ’ ” 他们已经错过了一个星期的时间，他们不能再损失一个星期了，“ 因为波兰的雨季将有利于他们的敌人 ”。

---

② 同上，第 361 页。

① 德国 8 月 29 日复照的全文，见《英国蓝皮书》，第 135—37 页。

虽然如此，从这位大使的正式报告和他后来写的书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当时他还不太明白希特勒这个圈套的用意所在；直到第二天，当希特勒又扔出一个圈套时，汉德逊才识破了他的诡计。这位独裁者的把戏从他的正式照会中来看是昭然若揭的。他在 8 月 29 日晚上要求参加谈判的波兰全权特使在第二天就在柏林出现。毫无疑问，他是打算用对待奥地利总理和捷克斯洛伐克总统的那一套办法在类似的情况下来对待波兰的特使。如果波兰人像他所确信的那样，不赶紧派特使前来柏林，或者即使派来了谈判代表而又拒绝接受希特勒的条款的话，他就可以把拒绝"和平解决"的罪名加在波兰头上，这样就可以诱使英法在波兰受到攻击 时不予援助，这个圈套很幼稚，但是却简单而又明了。*

但是 8 月 29 日那天晚上，汉德逊还没有看得这样明了。他一面草拟拍给伦敦的报告他同希特勒会昭情况的电报，一面把波兰大使请到他的大使馆来。他把德国的照会以及他本人和希特勒的谈话统统告诉了波兰大使。根据他自己的记述，他"竭力使对方明白立即采取行动的必要。我请他为了波兰本身利益着想，敦促他的政府立即指派一名代表出席建议中的谈判"。[①]

但是在伦敦外交部里，头脑则比较清醒。哈利法克斯在仔细估量了德国的答复以及汉德逊关于同希特勒会晤的报告之后，于 8 月 29 日[④]清晨 2 时电告这位大使说，英国虽将慎重考虑德国的照会，但"要我们今天就在柏林变出一个波兰代表来显然是无理的，德国政府不应当作这种指望"。[②]这时候，外交家和外交部的官员们都日以继夜地忙个不停,汉德逊在清晨 4 点 30 分就把这个电报送到了威廉街。

8 月 30 日这一天，他又传达了 4 份伦敦的来电。一份是张伯伦给希特勒的私人短简，告诉他英国政府正在"紧急"考虑德国的复照，将在当天下午较晚的时候作出回答。在此之前，这位首相要求德国政府避免边境冲突，他说他已经向波兰政府提出了同样的要求。至于其他方面，他说"在目前的意见交换中，英德之[580] 间表现出互相谅解的愿望，是值得欢迎的"。[③]第二份是哈利法克斯的一封内容类似的信。第三份是英国外交大臣致德国政府的照会，说英国政府接到关于德国人在波兰境内进行破坏的报告，并要求德国人停止这类活动。第四份是哈利法克斯于下午 6 点 50 分发来的电报，其中反映出英国外交部和英国驻柏林大使的态度都在趋于强硬。

汉德逊经过进一步的考虑之后，曾在这一天早一些时候给伦敦拍去了一份电报。

> 一方面我仍然主张，波兰政府应该作出最后的努力，直接同希特勒建立联系，即使仅仅是让全世界知道他们准备为了维护和平而作出牺牲，也应当如此；但是从另一方面说来，我们从德国的答复中只能作出这样一个结论：希特勒已经拿定主意，如果可能，就以所谓和平而公正的手段来达到他的目的，如果不可能，就诉诸武力。[①]

到这时候，甚至连汉德逊也对另一次慕尼黑式的妥协没有胃口了。至于波兰人，他们从来就没有想到给自己搞这样一种妥协。8 月 30 日那天上午 10

[①] 汉德逊：《使命的失败》，第 281 页。

[④] 应为 30 日。——译者

[②] 《英国蓝皮书》，第 139 页。

[③] 张伯伦 8 月 30 日致希特勒照会的全 文，见《德国外交文件汇编》.第 7 卷， 第 441 页。

[①] 《英国蓝皮书》，第 139—40 页。

点，英国驻华沙大使电告哈利法克斯，他确信“ 不可能说服波兰政府派贝克先生或任何其他代表立即前往柏林，在希特勒建议的基础上讨论解决办法。他们宁愿战斗而死，也不愿接受这样的羞辱，特别是已经有了捷克斯洛伐克、立陶宛和奥地利的前车之鉴 ”。他指出，如果是“ 在平等基础上 ”的谈判，就应当在某个中立国家举行。[②]

哈利法克斯的强硬态度得到驻柏林和驻华沙大使的支持之后，就给汉德逊发了一个电报，说明英国政府不能“ 劝使 ”波兰人按照希特勒的要求派遣全权代表前往柏林。这位外交大臣说：“ 这是完全不合理的。 ”

你是否能够［哈利法克斯补充说］向德国政府建议，请他们在建议拟好之后按照正常程序为见波兰大使，把廷议交给他转呈华沙，并征询关于进行谈判的意见。[①]

对希特勒最后那次照会，英国政府已经答应提出答复，这个复照于 8 月 30—31 日午夜由汉德逊交给了里宾特洛甫。接着就开始了一次场面非常紧张激烈的会谈，当时唯一在场的施密特博士后来说：这是“ 我当 23 年翻译以来所参与的一次最激烈的会谈 ”。[②]

“ 我必须告诉您， ”事后那位大使马上就电告哈利法克斯说，“ 在这次不愉快的会晤中，里宾特洛甫整个态度完全模仿希特勒的最恶劣的表现。 ”汉德逊在 3 个星期以后写的《最后的报告》中，追述那位德国外交部长当时“ 深怀敌意，我每转达一段话，他的[581]敌意态度就随之强烈一步。他情绪极其激动，不断地从椅子上跳起来，问我的话说完了没有。我就不断地回答他说：‘ 还没有完 ’ ”。据施密特博士说，汉德逊也从自己的椅子上站起来。那位唯一的目击者说，有一次两个人都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彼此怒目相视，其气势之凶，使这位德国翻译官生怕他们会动起手来。

但是对历史来说，重要的不是这位德国外交部长与英王陛下政府驻柏林大使 8 月 30—31 日午夜会晤中的这个滑稽场面,而是在这次暴风雨式的会见中的一件事，这件事是希特勒这场骗局中的最后一着诡计，终于使汉德逊在第三帝国的真面目上受到了全面的事实教育，虽然为时已晚。

原来里宾特洛甫对英国的照会几乎连看都不看一眼，他也根本不听汉德逊的解释。*当汉德逊鼓起勇气，问起希特勒在上一份照会中答应向英国提出的德国与波兰和解的建议时，里宾特洛甫以轻蔑的口吻驳斥他说，既然到了半夜还不见波兰特使来到，现在已经太晚了。不过，德国人已经把建议拟好了，说罢里宾特洛甫就开始宣读。

汉德逊报告说，他用德语读，“ 速度飞快，也可以说是稀里糊涂地尽快对我念了一遍，声调极其不耐烦 ”。汉德逊在报告中说：

16 条之中，我只能记住六七条的大意。但是，如果不细对原文，就是这几条也不可能保证绝对准确。因此，当他读完之后，我要求他让我看看原本。里宾特洛甫竟断然拒绝，以极其轻蔑的姿态把文件往桌子上一扔，说由于直到半夜仍然没有波兰代表前来，这份建议已经过时了。[③]

[②] 同上，第 140 页。

[①] 同上，第 142 页。

[②] 施密特著上引书，第 150—55 页。另 见施密特在纽伦堡的证词，载《主要 战犯的审讯》，第 10 卷，第 196—222 页。

[③] 在本书作者看来，纽伦堡法庭上所有的主要被告人中，以里宾特洛甫最为尴尬，他所作的辩护也最为软弱无力。他在证人席上声称，这 16 务是希特勒“ 亲自口述 ”的，并“ 明白告诉我，不可让这份建议离开我的手 ”。为什么？他没有说，讯问时也没有问。里宾特洛甫供认，“ 希特勒告诉我，在我认为适宜的时候，

这份建议可能是过时了，因为德国人是有意要使它过时的。但[582]是更重要的是，德国人从来就没打算要别人认真对待这个建议，他们根本就没有这个打算。事实上，这个建议是个骗局。这只不过是用来欺骗德国人民，如果可能的话，也用来欺骗世界舆论的东西，企图要天下人相信，希特勒在最后一分钟还在为合理解决他对波兰的要求而努力。希特动也承认是这样。施密特博士后来听到他说："我需要一个口实，特别是要向德国人民表明，为了保持和平，我已经尽了一切努力。这就说明了我为什么要提出关于但泽和走廊问题的慷慨建议。"*

和他最近一些日子以来的要求相比，这个建议的确是慷慨的，慷慨得令人吃惊。在这个建议中，希特勒所要求的只是把但泽归还德国。走廊的命运由公民投票决定,而且要留待 12 个月以后当大家的激动情绪都已经平静下来的时候再投票。波兰将保有格丁尼亚港。无论哪一方在公民投票中取得了走廊，都将让另一方保留一条享有治外法权的穿过走廊的公路和铁路——这同他在春天提出过的"建议"完全相反。还要进行一次居民交换，并给本国境内的另一国居民以充分的权利。

我们可以推测，如果这些建议是认真提出来的，无疑至少可以成为德波两国谈判的基础，很可能使得这个世界在一代之内不会发生第二次大战。这个建议在希特勒发出进攻波兰的最后命令 8 个半小时以后，于 8 月 31 日晚 9 点在电台上向德国人民广播了。就我在柏林所看到的情况来看，这个建议达到了欺骗德国人民的目的。肯定地说，作者当时也被这个建议迷惑住了，当我从无线电里听到的时候，我深深地感到这个建议是非常合情合理的，并在那最后一个和平的夜晚对美国广播时这样说了。

汉德逊后来说,当他在 8 月 30—31 日那个深夜回到英王陛下大使馆的时候，他相信"和平的最后希望已经破灭了"。但是他仍在努力。半夜两点，他把波兰大使从床上叫起来，请他赶紧到英国大使馆来，"有意毫不夸张地以客观的态度叙述"了他同里宾特洛甫的谈话，提到德国建议中主要两点是割让但泽和在走廊地带实行公民投票，并且说，据他看来，"这些建议还不算太不合理[583]的"，他主张利普斯基建议本国政府，立刻提出由斯密格莱一利兹元帅同戈林元帅举行会晤。"我觉得应该补充说明一句，"汉德逊说，"如果德方的谈判代表是冯·里宾特洛甫先生的话，那么我就不能想象谈判会成功。"* ①

在此期间，那位不知疲倦的达勒鲁斯也没有闲着。8 月 29 日夜间 10 点戈林把他找到家里去，把希特勒、里宾特洛甫同汉德逊刚刚进行完毕的"不能令人满意的会谈经过"告诉了他。这位满身脂肪的元帅那股歇斯底里的老脾气又发作了，他当着这位瑞典朋友把波兰人和英国人臭骂了一通。平静下来以后，他郑重地告诉他的客人，元首正在给波兰起草一份"宽宏大量的"（"grosszuegig"）建议，其中唯一的要求是归还但泽，而把走廊的未来归属问题慷慨地交由"国际监督"下的公民投票去决定。达勒鲁斯轻轻地问了

可以让英国大使知道这份建议，不过只限于它的梗概。可是我比这更进了一步，我把建议从头到尾都念了。"施密特博士否认里宾特洛甫用德文宣读建议全文时曾快到汉德逊无法听清的程度。他说，外交部长"并没有特别急忙地念过去"。施密特说，汉德逊"对德语不十分精通"，在这种紧要的会谈中，他如果使用本国语言就能更加应对自如。里宾特洛甫的英语非常好，但是他拒绝在这样一些谈判中使用英语。

① 汉德逊：《最后的报告》，Cmd 6115 号，第 17 页。另见上引书第 287 页。

他一句举行公民投票的地区范围，于是戈林随手从一份旧地图中扯下一页，用红蓝铅笔标明了“波兰”部分和“德国”部分；德国部分不仅仅包括战前的普鲁士所属的波兰，还包括1914年边界以东60英里处的工业城市罗兹。这位毛遂自荐的瑞典中间人当然没法不注意到第三帝国决定这样重大问题时竟然如此“随便轻率”。不过他还是答应戈林，可以立刻飞回伦敦，向英国政府强调指出希特勒仍然希望和平，并向他们暗示希特勒正在准备对波兰提出最慷慨的建议，以此作为证明。

似乎永远不知疲倦的达勒鲁斯于8月30日一早4点飞往伦敦,他在赫斯顿机场驶往城里的途中,为了甩掉报馆记者的跟踪[事实上根本就没有一个记者知道他的存在]，曾经换了好几次汽车，于上午10点30分到达唐宁街，立刻得到了张伯伦、哈利法克斯、威尔逊和贾德干的接见。

但是前 3 位制造慕尼黑事件的英国设计师（贾德干是外交部的常任官员，从来就没有受过纳粹的迷惑）现在已经不会再上希特勒和戈林的当了，对达勒鲁斯的努力，他们并没有当成什么了不起的事看待。这位好心的瑞典人发现他们对于德国的两位领袖“很不信任”，并且“倾向于认为现在已经无法阻止希特勒对波兰宣战了”。此外，他们还毫不隐讳地告诉这位瑞典中间人,英国政府并没有中希特勒的诡计而要求波兰全权代表在24小时内来到[584] 柏林。

但是达勒鲁斯，就像在柏林的汉德逊一样，还在继续努力。他给柏林的戈林打了电话，建议波兰和德国的代表“在德国境外”会晤，对方给他直截了当地回答说：“希特勒在柏林”，因此会谈必须在柏林举行。

于是这位瑞典中间人这次飞行算是白跑了一趟。他于半夜回到了柏林，应当说，在柏林他又得到了一个可以多少帮些忙的机会。他在午夜12点半钟来到戈林的总部，发现那位空军统帅兴致又特别好。戈林说，元首刚刚把他对波兰提出的“民主、公平而且切实可行的建议”让里宾特洛甫转交给汉德逊。在唐宁街会谈之后，达勒鲁斯好像清醒了一点，他于是打电话给英国大使馆的福比斯查询这事，这才知道里宾特洛甫念那个建议的时候是“稀里糊涂”地飞快念过去的，汉德逊没有能够完全听清，而且这位大使要一份原文也遭到了拒绝。据达勒鲁斯说，他当时曾对戈林说，这绝不是“对待像大不列颠这样一个帝国的大使”所应有的态度，他要求这位元帅准许他把16条建议的内容（戈林手里正有一个副本）用电话告诉英国大使馆。戈林略微踌躇了一下就同意了。*

就这样，由于一个无名瑞典商人的劝说，在那位空军元帅的默许下，终于瞒过了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让英国方面知道了德国给波兰的“建议”。这位元帅在处理外交事务方面决不是不聪明的，也并非毫无经验，这时也许已经比元首和他那位善于奉承的外交部长先一步看出了，把这个秘密终于透露给英国人可能得到什么好处。

为了加倍可靠地使汉德逊知道这个建议的准确内容，戈林又于 8 月 31 日星期四上午10点打发达勒鲁斯把一份16条建议的打字副本送到英国大使馆去。汉德逊仍在想办法说服波兰大使同德国人建立“所希望的接触”，上午8点，他又一次催促利普斯基（这回用的是电话），警告他如果波兰到了中午还不采取行动，战争就要爆发了。*达勒鲁斯带着德国建议来到大使馆不久，汉德逊就打发他同福比斯一道到波兰大使馆去。利普斯基从来没有听说[585] 过有达勒鲁斯这样一个人，见到这个瑞典人时有点莫名其妙。利普斯

基这时候就像柏林大多数重要的外交官一样紧张不堪，疲于奔命。因此当达勒鲁斯催他立刻到戈林那里去接受元首的建议时，他不耐烦了。他请那位瑞典人到隔壁屋里去向他的秘书口授那 16 条建议，然后抱怨福比斯不该到了这个时候还把一个“陌生人”扯到这么重大的问题中来。这位受到打扰的波兰大使一定为了汉德逊对他和他的政府施加压力，要他们立即以刚才偷偷地通过非正式途径送来的那份建议为基础进行谈判而感到很不高兴；但是这位英国大使又重复前一天夜里对他说过的话，说觉得这个建议“总的来说，还不算太不合理”。*他不知道汉德逊的看法并未得到唐宁街的认可。他只知道自己不打算接受一个来历不明的瑞典人的劝告，尽管这个人是英国大使打发来的；同时他也不打算到戈林那里去接受希特勒的“建议”，即使他被授权这样做他也不愿意，何况他并没有这种权力。*

最后一天的和平日子

[586]

英法政府自以为已使德国人和波兰人同意进行直接谈判之后，尽管它们对希特勒深为怀疑，但还是集中力量为实现这一谈判而努力。在这项活动中，英国走在头里，法国则在柏林，特别是在华沙从外交上予以支持。虽然英国人没有劝波兰人接受希特勒的最后通碟，在 8 月 30 日派一个全权特使到柏林去（因为他们认为这种要求，正如哈利法克斯在给汉德逊的电报中所指出的，是“完全不合理的”），但是他们却敦促贝克上校宣布准备“毫不迟延地”同柏林举行谈判。这就是哈利法克斯在 8 月 30 日深夜拍给驻华沙大使的那封电报的大意。根据这份电报，肯纳德须把汉德逊准备提交给里宾特洛甫的英国照会的内容告诉贝克，向他保证英国将忠于对波兰的义务，但是强调波兰必须同意立刻和德国举行直接谈判的重要性。哈利法克斯的电报说：

从德国内部形势和国际舆论的观点来看，我们认为至为重要的是，只要德国政府表示准备谈判，就不应该让他们有机会把引起冲突的罪责推在波兰身上。[①]

肯纳德于半夜访晤了贝克，这位波兰外长答应在请示他的政府以后在 8 月 31 日中午再给他一个“慎重的答复”。英国外交部于上午 8 时收到了肯纳德叙述这次会见的报告，哈利法克斯对此并不十分满意。中午时分——这已经是 8 月的最末一天了——他又打电报给肯纳德，叫他“偕同”驻在华沙的法国同事（法国驻波兰大使利昂·诺尔）一起去提醒波兰政府，

他们现在应该告诉德国政府说，他们已经知道了我们给德国政府的最后答复；而且还应当证实，他们已经接受了直接谈判的原则。这话最好是由他们自己直接告知，否则就通过我们告知。

法国政府耽心德国政府会利用波兰政府方面的沉默。[②]

哈利法克斯勋爵对于他的波兰盟友仍然感到不放心，过了不到两小时，也就是午后 1 点 45 分的时候，他又给肯纳德拍去一份电报：

[587] 请立刻转告波兰政府并劝告他们：既然他们已经接受了直接谈判的原则，便应当立即指示波兰驻柏林大使告知德国政府，如果德国有什么建议，他随时准备转致本国政府，以便他们能立即考虑并提出自己的意见，以便及早讨论。[③]

---

① 《英国蓝皮书》。第 144 页。

② 同上，第 147 页。

③ 同上。

但在这份电报发出之前不久，贝克为了回答半夜那个 demarche*，已经用书面照会通知英国大使，波兰政府“证实准备……同德国政府直接交换意见”；除此之外，他还曾口头向英国大使保证，他定将指示利普斯基去会见里宾特洛甫，告诉他“波兰已经接受英国的建议”。肯纳德问贝克，利普斯基如果接到里宾特洛甫交来的德国建议时将怎么应付。这位外交部长的回答是，他不打算授权给他的柏林大使接受这种建议，因为“鉴于过去的经验，这种建议很可能附有最后通牒之类的东西”。贝克说，重要的是重新建立接触，“然后再就谈判的地点、人选以及谈判的基础等细节进行讨论”。根据这位一度亲德的波兰外长所提到的“过去的经验”来讲，他这种看法是不无道理的。据肯纳德在电报中向伦敦报告，贝克还说：“如果德国邀请他去柏林，他当然不去，因为他不想去受哈查总统所受的那种接待。”[①]

实际上，贝克给利普斯基的指示和上面所说的不完全一样。他并没有让利普斯基去对德国人说，波兰“接受”了英国建议，而是要他说波兰“正以赞成的态度考虑”英国的建议，并且“最迟不出数小时”即将作出正式答复。

贝克给利普斯基的指示还不止于此，这一点德国人是知道的，因为他们掌握了波兰人的密码。

由于一个我们不久就会明白的简单而充分的原因，德国人并不急于接见那位驻柏林的波兰大使。当时已经为时太晚了。午后 1 点，也就是收到华沙发来的电报指示几分钟以后，利普斯基就去求见里宾特洛甫，说要传达波兰政府的一个照会。一直等了两三个小时，他才接到威兹萨克的电话，后者代表德国外交部长问他，是作为全权使节还是“以某种其他身份”前来会晤。

“我回答他，”利普斯基后来在他的最后报告[①]中说，“我以大使的身份请求会见，递交我国政府的一项声明。”

接着又等了很久。午后 5 点，阿托利科来访里宾特洛甫，说“领袖迫切希望”元首接见利普斯基，“至少要通过这种方式建立为避免最后的决裂所必须的最低限度接触”。德国外交部长答应把意大利领袖的这番心意“转达”给元首。[②] [588] 在这 8 月的最末一天，为了设法挽救和平，这位意大利大使到威廉街来奔走，这已不是第一次了。那天上午 9 点，阿托利科向罗马报告说，局势“极为严重”，除非“出现某种新变化，否则几小时后战争就要爆发”。于是墨索里尼就在罗马和齐亚诺凑在一起商议，企图寻找“某种新变化”。他们商量的第一个结果是，齐亚诺打电话告诉哈利法克斯说，除非能给希特勒送去一个“相当大的好处：但泽”，否则墨索里尼就不能出面调停。可是这位英国外交大臣没有上钩。他告诉齐亚诺，目前最要紧的是先通过利普斯基在德国人和波兰人之间建立直接接触。

于是，午前 11 点 30 分阿托利科到德国外交部去见威兹萨克，告诉他，墨索里尼正在同伦敦方面进行接触，建议以归还但泽为解决德波问题的第一步，但是领袖需要一定的“时间宽限”来完成他拯救和平的计划。在此期间，德国政府能不能接见一下利普斯基呢？

[①] 波兰 8 月 31 日致英国书面复照全 文，同上，第 148—49 页；肯纳德 8 月 31 日的电报（到下午七点十五分伦敦才收到）同上，第 148 页。

[①] 关于利普斯基的最后报告，见《波兰白皮书》。摘录载《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 8 卷，第 499—512 页。

[②]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 7 卷，第 462 页。

利普斯基要求接见之后足足等了 5 个多钟头，在午后 6 点 15 分的时候，里宾特洛甫才接见了他。会见的时间并不长。这位大使虽然疲惫不堪，而且心力交瘁，但是举止不亢不卑。他向纳粹外交部长宣读了一份书面照会。

昨夜波兰政府从英国政府方面获悉，英国政府曾与德国政府就波、德两国政府进行直接谈判的可能性交换了意见。

波兰政府正以赞成的态度考虑英国政府的建议，并将于未来数小时内对此作出正式答复。

“我还声明，”利普斯基后来说，“我从午后 1 点起就一直在等着要递送这份照会。”里宾特洛甫问他是不是受权前来谈判的代表，这位大使回答道，“目前”他只接到指示要他传递方才宣读的照会，说毕就把那份照会交给了这位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说，他还以为利普斯基是作为“全权代表”前来谈判的。当这位大使再一次声明这并不是他的任务以后，里宾特洛甫就站起来送客了。他说，他将报告元首。[①]

“当我回到大使馆的时候，”利普斯基后来说，“就发现自己已经无法同华沙取得联系，因为德国人已经把我的电话线切断了。”

威兹萨克和里宾特洛甫之所以询问这位大使的谈判代表身份，纯粹是一个形式，无疑为的是好把他的回答载入记录；因为事实上在中午利普斯基收到华沙拍来的那份照会时，德国人就已经知道他不是如他们所要求的那样以全权代表身份前来的。他们当时立刻就译出了那份密码电报，并将一份抄件送交戈林。戈林把它拿给达勒鲁斯看，并要他火速送给汉德逊，以便让英国政府［589］“尽快地知道波兰的态度有多么顽固”。这是这位陆军元帅后来在纽伦堡法庭的被告席上解释的。戈林在法庭上宣读了当时利普斯基所收到的秘密指示，根据这份指示，这位大使“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进行任何正式的谈判，而必须坚持他“并未受有全权”，他仅仅受命递交本国政府的正式照会。这位陆军元帅在供词中在这一点上大作其文章，妄图说服纽伦堡的法官们，是波兰“破坏”了希特勒为和平而提出的最后建议；而且照他自己说，他戈林本人并不希望打仗，而且为了避免战争曾尽了一切努力。但是戈林的话的可靠性，比里宾特洛甫强不了多少；例证之一是，他竟进一步在法庭上说，希特勒只是在利普斯基于 8 月 31 日 6 点 15 分来过威廉街之后才决定“第二天入侵的”。

但事实完全不是如此。实际上 1939 年 8 月最末一天下午和晚间，那些精疲力竭的外交家以及站在他们背后指挥的疲惫不堪的政府决策者，在这最后关头急急忙忙进行的活动，完全是水中捞月、枉费心机；而在德国人方面，则完全是一场蓄意的欺骗。

因为 8 月 31 日中午 12 点半钟，也就是在哈利法克斯勋爵敦促波兰人采取较为和解的态度以前，在利普斯基去见里宾特洛甫以前，在德国人公布他们对波兰的“宽宏大量”的建议以前，并且在墨索里尼试图调停以前，阿道夫·希特勒就已经作出了最后决定，发出了把这个星球投入空前血腥的战争中的决定性命令。

武装部队最高统帅

绝　密

1939 年 8 月 31 日于柏林

[①] 利普斯基方面的记述，见他的最后报告，上引《波兰白皮书》。施密特博士有关德国方面的记述，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 7 卷，第 463 页。

第一号作战指令

1.用和平方式处理东部国境上为德国所不能容忍的局势的政治可能条件既已告罄，我已决定以武力解决。*

2.对波兰的进攻将按照“白色方案”所规定的准备工作进行，但陆军方面由于目前部署几乎已经全部完成，故有所变更。

任务分配以及作战目标则照旧。

进攻日期：1939 年 9 月 1 日。

进攻时间：拂晓 4 点 45 分[时间是用红铅笔填入的]。

这一时间规定也运用于格丁尼亚、但泽湾以及德却奥桥的作战行动。

3.在西线，重要的是必须使开启战端的责任完全在英国和法国方面。目［590］前对于无足轻重的侵犯边界活动，应当只用局部行动加以应付。

对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瑞士的中立我们曾经给予保证，应该认真遵守。

在地面，不经我明确准许不得越过德意志西部疆界。

在海上，同一原则适用于一切战争行动和可以视为战争行动的一切行动。*

4.如果英国和法国对德国开始作战，西线武装部队的各部队的任务是，尽可能地保存实力，以便保持必要条件胜利结束对波兰的作战。在此限度之内，尽可能地摧毁敌军及其战争经济资源。但在任何情况下没有我的命令不得转入进攻。

陆军应坚守“西壁”并作好准备，以防西方国家破坏比利时或荷兰的领土主权，假道该两国从北方包抄“西壁”……

海军将攻击商船，主要是针对英国……空军的首要任务是防止法国和英国的空军袭击德国陆军以及德国的 Lebensraum［生存空间］。

对英国作战时，应准备用空军切断英国的海上供应，炸毁其军火工厂，并阻止其向法国派遣军队。要把握一个有利战机，对密集的英国舰队，特别是战斗舰与航空母舰，进行有效的袭击。对伦敦的攻击听侯我的决定。

要作好进攻英国本土的准备，同时切记，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避免以不充足的兵力取得不完全的胜利。

阿道夫·希特勒[①]

就这样，希特勒在 8 月 31 日中午 12 点以后不久正式用书面下达了于次日拂晓对波兰发动进攻的命令。正如他的第一号作战指令所表明的，他还不太清楚英国和法国会采取什么行动。他打算自己先不去攻击它们。但如果对方采取敌对行动，他就准备迎击。也许事情会像哈尔德在 8 月 28 日的日记中所说的那样，英国人只在表面上作一作对波兰信守义务的姿态，“虚应故事地打一打”。如果真是这样，元首是不会因此而“见怪”的。

这位纳粹独裁者的这个关系人类命运的决定，大概是在 8 月［591］最末一天中午 12 点 30 分之前不久的时候作出的。前一天午后 6 点 40 分，哈尔德在日记里记下了冯·勃劳希契将军的副官库特·西瓦尔特中校给他的一个通知：“作好一切准备，以便能够在 9 月 1 日拂晓 4 点 30 分发动进攻。如果由于伦敦的谈判而需要推迟，则改在 9 月 2 日发动进攻。果然改期，我们将在明天下午 3 点以前接到通知……元首说：不是 9 月 1 日就是 9 月 2 日。过了 9 月 2 日，一切作罢。”由于秋季多雨，进攻必须立即开始，否则就得完全

[①] 希特勒指令的德文原文载《主要战犯的审讯》，第 34 卷，第 456—59 页（纽伦堡文件 C—126），英译文见《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 6 卷，第 935—39 页，另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 7 卷，第 477—79 页。

取消。

8 月 31 日一早，希特勒还在声称他正在等着波兰的谈判使节的来到，而德国军队就已经接到了命令。上午 6 点 30 分，哈尔德写道：“ 帝国总理府的消息，进攻令已下，定于 9 月 1 日。 ”那天上午 11 点 30 分，他又记道：“ 施图尔纳格尔将军报告，进攻时间定在 0445［清晨 4 点 45 分］。据说西方干涉将不可避免，尽管如此，元首仍然决意进攻。 ”1 小时以后，正式的第一号指令就下来了。

我记得那一天柏林笼罩在一种阴暗而凄惨的气氛中。每个人都是一副茫然若失的样子。上午 7 点 25 分，威兹萨克给“ 密谋分子 ”之一乌里希·冯·哈塞尔去了一个电话，要他赶快来见他。这位国务秘书认为现在只剩下了一个希望：就是由汉德逊去说服利普斯基和他的政府立刻指派一个全权代表，或者至少是声明打算派遣这样一个代表来。他问解职在野的哈塞尔能不能为此目的马上去拜访一趟他的朋友汉德逊和戈林。哈塞尔去尝试了一下。他到汉德逊那里跑了两次，还去找了一趟戈林。尽管他是外交界的老手，现在又是个反纳粹分子，可是他却好像还没有认识到事态的发展已经不是这种微不足道的努力所能挽回的了。他也没有认清他自己以及威兹萨克和所有那些“ 好心的 ”德国人思想糊涂到了什么程度；这些德国人要和平，这是没有问题的，但他们要的是建立在德国条件上的和平。因为，到了 8 月 31 日这一天，他们应该已经看清楚，要么希特勒让步，要么波兰人让步，否则就只有战争，可是不论哪一方都丝毫没有让步的可能。然而正如哈塞尔在这一天的日记中所表明的，他还在期望波兰人会让步，期望他们会步奥地利人和捷克人的后尘，走上那条国破家亡的道路。

汉德逊向哈塞尔指出，“ 主要的困难 ”是由于德国人所用的方式引起的，他们想要“ 对待傻孩子 ”那样地把波兰人呼来喝去。哈塞尔竟反驳说：“ 波兰人一味沉默也不见得就对。 ”他还表示“ 一切都取决于利普斯基的出场——不是来提问题，而是宣布他愿意谈判 ”。可见就连哈塞尔也认为，波兰人虽然岌岌可危地即将在纳粹捏造的罪名下遭到进攻，但也没有提问题的权利。当这位前任大使就战争爆发的问题作出“ 最后结论 ”时，他一方面责备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 有意冒同西方作战的危险 ”，另一方面又把许多责任推在波兰人甚至英国人和法国人的身上。“ 从波兰人这方面来说， ”他写道，“ 他们既有波兰人的狂妄自大，又有斯拉夫式的任其自流的脾气，仗恃有英国和法国的支持，把避免战争的最后机［592］会全都错过了。 ”人们不禁要问，除了向希特勒的全部要求屈服之外，他们还错过了什么机会？哈塞尔还说：“ 伦敦政府……在这最后的时刻放弃了努力，而采取一种‘ 管他娘 ’的态度。法国亦步亦趋，只不过更加犹豫迟疑而已。倒是墨索里尼真正竭尽全力避免战争。 ”①如果像哈塞尔这样一个有教养、有学问、有经验的外交家在思想上还如此糊涂，那么希特勒轻而易举地欺骗了德国人民群众又还有什么奇怪呢？

接着，在那最末一天的和平日子行将消逝的下午，还发生了一个有点滑稽的插曲。现在我们已经知道，根据那天的决定，空军司令戈林要执行次日黎明即将对波兰展开的大规模空袭的任务，这位元帅想必一定忙得不可开交了。事实却不然。中午达勒鲁斯把他邀到爱思普兰德饭店去吃饭，用美酒佳肴殷勤地向他劝杯敬菜。达勒鲁斯请他喝的白兰地真是酒中上品，以致戈林临走时还非带走两瓶不可。提起了他的兴致之后，达勒鲁斯就建议他把汉德

逊请来谈谈。戈林在请示了希特勒以后，便邀请汉德逊和福比斯下午 5 点到他的寓所去喝茶。达勒鲁斯（汉德逊在他的《最后的报告》或著作中都没有提到有这个人在场）说，他当时建议由戈林代表德国到荷兰去和波兰代表举行谈判，汉德逊应允将这个建议转达给伦敦。据这位英国大使在他那《最后的报告》中的叙述，在这次茶会中，戈林“谈了两小时波兰的罪状以及希特勒先生和他自己同英国友好的愿望。这是一场毫无结果的谈话……我的总印象是，这是他最后一次徒劳的努力，想使英国抛弃波兰……他在这样的时刻竟肯让我占据他这么多的时间，对此我当时有一种非常不妙的预感……如果不是事无大小，一切都安排停当了，他决不会在这种时候还有时间来陪我谈话的”。

关于这次奇特的茶会，福比斯在纽伦堡回答戈林的辩护律师的询问时，作了第三方面的、同时也是最辛辣的一种描述。

当时的气氛是沉闷紧张的，虽然尚为友好……戈林对英国大使说的话是：如果波兰人不肯让步，德国就会把他们像虱子一样掐死，如果英国决定宣战，他将感到非常遗憾，但英国以后会知道这是一种极为轻率的举动。[①]

据汉德逊自己说，那天晚上他给伦敦拟发了一份电报：“现在如由我再向他们提任何建议，都是徒劳无益的，因为任何建议都会被目前形势的发展抛在后面，我们唯一能采取的方针就是表示［593］我们有不可动摇的决心以武力对付武力。”*

尼维尔·汉德逊爵士好像已经感到彻底幻灭了。几年来为了千方百计满足这位欲壑难填的纳粹独裁者，他费尽了心力，但是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他出使德国还是辱命了。在这个 8 月的最末一天快要结束的时候，这个思想浅薄但态度温文的英国人极其盲目地在柏林搞了一阵个人外交之后，准备勇敢地面对他的希望归于破灭，计划归于流产。虽然第二天，战争爆发的那一天，他还要犯一次更为典型的和令人难于置信的过错，但是他已经开始认识到一条古老的真理：在某些时候，某些场合，正像他终于说出的那样，武力必须以武力对付。*

1939 年 8 月 31 日的夜幕笼罩欧洲的时候,150 万德国军队已经开始进入波兰沿境的最后阵地，只等次日拂晓出击；这时希特勒剩下要做的事情就是开动宣传机器，玩弄一套欺骗伎俩，使德国人民对于这一场突如其来的侵略战争在精神上有所准备。

当时的德国人民正需要这样一剂药。在戈培尔和希姆莱的帮助下，希特勒早已成为精于此道的专家。我当时曾在柏林街头上徘徊，同许多普通德国老百姓谈过话，那天上午我在日记里写道：“人人都反对战争。人们公开地这样说。当人民这样坚决地反对战争的时候，一个国家怎么可能投入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呢？”尽管我对第三帝国有这样一段亲身体验，却提出了这样一个幼稚的问题！希特勒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知道得非常清楚。一星期以前他岂不是在巴伐利亚的山顶上对他的将领们说过，他要“提出发动战争的宣传上的理由”，并且叫他们“不必管它讲得通，讲不通”？他告诉他们，“胜利者在事后是没有人问他当初说的是不是实话的。在发动战争和进行战争

[①] 达勒鲁斯在纽伦堡的证词，见《主要战犯的审讯》，第 9 卷，第 470—71 页：福比斯在纽伦堡对戈林的律师所提出的问题的答复，见纳米尔著《外交前奏曲 L 第 376—77 页。汉德逊的记述，见他所著《最后的报告》，第 19 页。

时，是非问题是无关紧要的，紧要的是胜利。”

晚间 9 点，我们已经知道，所有的德国电台都广播了元首对［594］波兰的和平建议，当我从无线电中听到这些建议的时候，我这个受骗的记者感到这个建议是非常合情合理的。可是希特勒从来没有向波兰人提出过这个建议，甚至对英国人也不曾正式提出过，只不过是在不到 24 小时以前含糊其词地而且非正式地向英国大使提了一下而已，这一事实广播电台却完全没说。这位总理发表了一篇十分冗长的声明，向德国人民解释德国政府如何为了保持和平用尽了一切外交手段；的确，从这里面可以看出，他用尽了自己那一套弄虚作假、混淆视听的手法，当然少不了戈培尔的协助。这篇声明说，8 月 28 日，英国政府表示愿意为德、波两国之间的争执出面斡旋，第二天德国政府就作出了如下的答复：

尽管我们对波兰政府愿意达成谅解的诚意抱着怀疑，但是仍然宣布，准备为了和平的利益而接受英国的调停或建议……我们认为，如果要避免一场灾祸的危险，就必须毫不犹豫地立刻采取行动。我们宣布，我们准备在 8 月 30 日夜间以前接待一位波兰政府指派的代表，但该代表不仅要有进行讨论的权力，而且要有进行谈判和缔结协议的权力。

但是，德国政府表示愿意取得谅解之后，所接到的第一个答复不是行将派遣一名受权代表前来谈判的声明，而是波兰动员的消息……

不能指望德国政府无尽无休地一再声明愿意举行谈判并且实际上作好这种准备，而结果却只让波兰方面用空洞的遁辞和毫无意义的宣言拖延时日。

波兰大使目前所采取的外交行动再一次证明：该大使既没有参加讨论的全权，甚至也没有进行谈判的全权。

元首与德国政府就这样空等了两天，始终来见波兰谈判代表来到。

在这种情况下，德国政府认为自己的建议这一次又被……拒绝了，虽然我们认为这个建议，按照同时也向英国政府提出的方式，完全是诚恳的、公道的和切实可行的。

希特勒和戈培尔从经验中懂得，好的宣传如果要有效果，仅仅依靠言词是不够的，它需要有实际行动，不论其中有多大成分需要捏造出来。现在德国人民已经相信（关于这一点，本书作者可以根据亲身的观察作证）是波兰人拒绝了元首慷慨的和平建议，剩下来要做的就是制造一个行动来“证明”先动手的是波兰而不是德国。

读者想必记得，德国人已经根据希特勒的指示为这最后一桩见不得天日的勾当小心翼翼地作好了准备。*党卫队那个有文化［595］的恶棍阿尔弗雷德·瑙约克斯，已经在靠近波兰边境的格莱维茨等候了 6 天，准备对当地的德国电台表演一场伪装波兰方面的进攻。这个计划已经作了修改。由穿着波兰陆军制服的党卫队人员开枪射击，把事先麻醉过去的集中营囚徒放在地上，充当电台方面被打得奄奄一息的“伤亡”人员——这套把戏的这个“喜剧性”部分，我们已经知道，用的角色有一个意味深长的代号叫“罐头货”。他们准备制造若干起这种伪造的“波兰进攻”，但最主要的一起预定发生在格莱维茨电台。

8 月 31 日中午，［瑙约克斯在纽伦堡法庭上供称］我从海德里希那里接到预定在当天晚上 8 点进行攻击的密令。海德里希说：“执行这一攻击前，可向缪勒领取‘罐头货’”。我照办了，并且指示缪勒把那人弄到电台附近来交给我们。我收到了这个人，就把他放在电台的门口。他还活着，但已完全失去了知觉。我掰开他的眼睛看一看，不过我不能从他的眼睛上辨别出他是否活着，只是他还有呼吸。我没有见到枪伤，但是他脸上抹满了血污，穿的是便服。

我们按照命令夺下了电台，通过一个紧急备用发射台广播了三四分钟的演说*，用手枪打了几

枪之后才离去。[③] [②]

那天夜晚，除了报道元首对波兰的“建议”和波兰“进攻”德国领土的外发新闻电报和电台广播以外，柏林同外界的联系几乎全部中断。我想和华沙、伦敦以及巴黎通电话，但是我得到的回答是同这几国首都的通讯连络已经切断了。从外表上看来，柏林一切都和平常一样。不像巴黎和伦敦，这里没有疏散妇孺，也不像其他国家首都所发出的消息所报道的那样，商店的橱窗前面也没有堆起沙袋。9月1日清晨4点钟光景，我作完了最后一次广播，从广播大厦驱车返回阿德隆饭店。街上空荡荡的。住家的屋子里一片漆黑，人们正在熟睡。我心里这样想，他们也许是抱着最好的希望——对和平的希望——上床安息的。

希特勒本人这一天却心情舒畅、精神奕奕。8月31日下午6点，哈尔德将军在日记里记道，“元首镇定自若；睡得很好……决定［在西部］不疏散这点说明，他预料法国和英国不致于采取[596]行动”。*

最高统帅部谍报局局长卡纳里斯海军上将，反纳粹密谋分子中的主要人物之一，心情却泅然不同。卡纳里斯集团曾经发誓要搞掉这位独裁者来避免战争，现在希特勒正在把德国推入战争，采取行动的时刻到了，可是却不见这些密谋分子有何动静。

接近黄昏的时候，吉斯维乌斯被奥斯特上校请到最高统帅部来。这个德国军事力量的神经中枢里乱哄哄的，显得忙碌不堪。卡纳里斯把吉斯维乌斯拉到一条灯光黯淡的走廊里，感情激动地对他说：

“德国这一下算完了。”[①]

[③] 格莱维茨的“波兰进攻”第二天就被希特勒在国会演说中利用上了，并被里宾特洛甫、威兹萨克和外交部其他官员在宣传活动中一再引述，作为纳粹发动侵略的借口。《纽约时报》和其他几家报纸在1939年9月1日报道了这个事件以及其他类似的事件。这里需要补充的一点是，根据谍报局拉豪森将军在纽伦堡的供词，所有这些穿着波兰制服参加那天晚上假冒袭击的党卫队人员“全都被干掉了”。

[②] 瑙约克斯口供，出处同上。

[①]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7卷，第472页。

第十七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

[597]

1939 年 9 月 1 日破晓，也就是早在 4 月 3 日希特勒在“白色方案”的第一个指令中就规定了的那一天破晓，德国军队大举越过波兰国境，分北、南、西三路进逼华沙。

天空中，德国机群吼叫着飞向自己的目标：波兰的部队、军火库、桥梁、铁路以及不设防的城市。几分钟之后，这些飞机就要使波兰人不分军民第一次尝到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来自空中的突然死亡和毁灭的滋味，同时也带来了一种恐怖，在此后 6 年间欧亚两洲千百万男女老幼将经常处于这种恐怖之下。而在核弹出现之后，这种恐怖将以完全毁灭的阴影笼罩着全人类。

在柏林，那是一个灰暗的、有些闷热的早晨，乌云低垂，对防止敌机轰炸起了一些保护作用，不过所担心的敌机从来没有来过。

我注意到，尽管无线电和晨报号外相继传来重要的新闻，但街道上的老百姓却非常冷淡。* 在阿德隆饭店街对面的伊·格·法本化学公司的新建筑工地上，早班工人已来上工，就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似的。当报童叫卖着号外走过工地时，竟没有一个人放下工具去买一份。我想也许是德国人民在这 9 月开头第一天的早晨，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已经处于战争之中，惊得发呆了。他们原来深信自己的元首一定会设法避免这场战争的。现在战争已经降临，但他们还是不能相信。

人们不禁想起,这种灰溜溜的冷漠情景同 1914 年德国投入战争时的情景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照！那时候是一片狂热。■集街 [598]头的人群表现出如醉如狂的热情，向出征的军队投掷鲜花。向德皇兼最高统帅威廉二世疯狂地欢呼。

这一次，人们对军队和那位纳粹统帅都没有这样的表示。上午将近 10 点钟的时候，这位纳粹统帅从总理府驱车驶过冷清清的街道前往国会，去向全国人民报告他刚刚毫无人性地蓄意挑起的重大事件。当这位独裁者开始解释为什么德国在这一天早上突然投入战争的时候，就连那些由希特勒一手指派、大部分属于党棍的傀儡议员的反应也都不太热烈。他往常在这个华丽的克罗尔歌剧院大厅内就比较次要的问题发表演说时所得到的掌声要比这一次热烈得多。

他在讲话的时候，虽然有时很蛮横无理，但奇怪的是，他仿佛是站在被告的立场上在为自己辩护；而且我当时一面听一面觉得，他的演说从头至尾都有一种奇怪的紧张感觉，仿佛他在自己所造成的这种进退维谷的困境中也有点张惶失措，甚至有点慌乱了。他对于他的意大利盟友为什么规避当然义务不来相助的解释，甚至在这一群亲手挑选的听众当中也不能说是成功的。

> 我愿意[他说] 在这里首先向意大利致谢，他们始终一贯地支持我们。但是诸位应该了解，在进行当前的这场斗争中，我们不打算请求外国的援助。我们要靠自己的力量完成这项任务。

过去他在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时候，已经不知说了多少谎话，在这个历史的严重关头，他也免不了要对那些幼稚的德国人民再吼叫几句谎言来为他那荒唐的行为辩护。

> 诸位知道，我曾一再作出努力，争取在奥地利问题以及随后的苏台德地区、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等问题上通过和平途径澄清事态并取得谅解。但是一切都归于徒劳……
>
> 在我同波兰政治家们的会谈中……最后我提出了德国方面的建议……没有比这个建议更起码更诚恳的建议了。我愿意在此告诉全世界的人，只有我才有条件能够作出这样的建议，因为我清楚地知

道，这样做是要受到千百万德国人民反对的。但是这些建议却遭到了拒绝……

整整两天，我和我的政府在等待着，看看波兰政府是否方便，能够派遣一位全权代表前来，但是，如果把我对和平的热望和我的耐心当做是软弱或者甚至是胆怯的话，那就看错我了……我再也看不到波兰政府有任何诚意同我们进行认真的谈判……因此，我决定用波兰人在过去几个月中对我们使用的一种语言来对波兰说话……

昨天夜间，波兰正规军已经向我们的领土发起第一次进攻。我们已于清［599］晨 5 点 45 分起开始还击。从现在起，我们将以炸弹回敬炸弹。

读者已经知道，德国人自己对格莱维茨德国电台的那次进攻是由身穿波兰制服的党卫队人员在瑙约克斯的率领下进行的，现在就这样被这位德国总理用来作为他对波兰进行残酷侵略的口实。而且德国最高统帅部在最初的一批公报中也的确把他们的军事行动称之为“反攻”。甚至威兹萨克也在尽力散布这个笨拙的谎言。那天他从德国外交部向所有的驻外使节发出了一份通电，就他们所应采取的态度作了指示。

为了抵御波兰的进攻，德国军队已于今晨开始对波兰采取行动。这一行动在目前不得称为战争，而只能称作是由波兰的进攻所引起的接触。[①]

甚至对那些能够亲眼看到是谁首先在波兰边境上发动进攻的德国士兵，希特勒也要向他们灌输一顿自己的谎言。他在 9 月 1 日一份冠冕堂皇的告德国军队书中说：

波兰已经拒绝了我所期望的两国关系的和平解决，而且诉诸了武力……为一个大国所不能容忍的一系列侵犯边境的事件，证明波兰已经不愿尊重德国的边界。

为了制止这种疯狂行为，我别无他策，此后只有以武力对付武力。

那天只有一次，希特勒说了实话。

我要求于德国人的［他告诉国会］，只不过是我自己 4 年来准备做的……从现在起，我只是德意志帝国的第一名军人。我又穿上了这身对我来说最为神圣、最为宝贵的军服。在取得最后胜利以前我决不脱下这身衣服，要不然就以身殉国。

从最后下场来看，这一次他总算是说话算数的。但是那天我在柏林遇到的德国人中间却没有一个人注意到，元首这句相当直率的话的意思是，一旦战败，他是不敢正视也不敢承担战败的责任的。

希特勒在自己的演说中说，如果他遭遇不测，戈林将成为他的继承人。他又指定赫斯为继戈林之后的第二个继承人。“万一赫斯遭遇不幸，”希特勒建议，“就依据法律召开参议院会议，由参议员中推选一位最相称的，也就是说，最勇敢的继承人。”什么法律？什么参议院？根本全都不存在！

希特勒一回到总理府，另一种更恶劣的情绪就代替了他在国［600］会中的比较克制的态度。那位老跟在戈林屁股后面到处走的达勒鲁斯，发现希特勒处于一种“异常神经质而又十分激动”的状态中。

他对我说［那位瑞典调停人后来作证时说］，他早就疑心英国想打仗。他还告诉我，他要打垮波兰并且要把它全部吞并掉……

他越来越激动，挥拳攘臂地对着我吼道：“如果英国准备打一年，我就打一年；如果英国想打 2 年，我就打 2 年……”他略为顿了一顿，接着就疯狂地挥舞起双臂，用失厉的声音叫嚷着说：“如果英国要打 3 年，我就打 3 年……”

这时他的身体也随着他的胳臂摇动起来，最后他吼了一声：“Und wennes erforderlich ist, will ich zehn Jahre kaempfen。”（“如果有必要，我愿意打它 10 年。”）说着他举起一个拳头向

[①]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 7 卷，第 491 页。

下一挥，几乎碰着了地板。[②]

尽管这样歇斯底里地大叫大嚷了一阵，希特勒还是不相信他非得跟大不列颠兵戎相见不可。这时中午已经过了，德国的装甲部队已经深入波兰境内好几英里，正在迅速向前推进，大多数波兰城市，包括华沙在内，都遭到了轰炸，平民死伤的数目相当可观。但是伦敦和巴黎却没有任何消息表示英国和法国急于要履行它们对波兰的保证。

这两个国家的方向似乎是明确的，可是达勒鲁斯和汉德逊却好像竭力要使这个方向糊涂起来。

上午 10 点 30 分，这位英国大使用电话向哈利法克斯报告：

据我了解[他说]，波兰人在夜里炸毁了德却奥桥* 。另据了解，同但泽人发生了战斗，希特勒接到这个消息以后就下令把波兰人从国境线上赶回去，并命令戈林摧毁边界线上的波兰空军。

只是在这个报告的结尾处，他才提了一句：

这个情报来自戈林本人。

希特勒在开完国会以后可能要召见我，作为挽救和平的最后一次努力。[③]

什么和平？对英国的和平吗？这时候，德国已经动员它的全部军事力量同英国的盟国打了 6 个小时了。[601] 希特勒在国会演说以后，并没有召见汉德逊，这位好说话的大使向伦敦传达了戈林关于波兰人首先发动进攻的谎言之后有点感到灰心——但还没有完全灰心。上午 10 点 50 分，他又给哈利法克斯打了一个电话。他那富于想象力而又极为糊涂的脑子里出现了一个新的主意。

我觉得有责任 [他报告道]向您陈述我的信念，不论其实现的前景多么渺茫，我认为现在要拯救和平，唯一可能的希望就是斯密格莱—利兹元帅宣布他愿意立即前来德国，作为军人也作为全权代表同戈林元帅就全部问题进行商讨。[④]

这位天下少有的英国大使好像就没有想到，斯密格莱—利兹元帅可能正忙于抵抗德国的这种大规模的无端进攻而无法分身：即使有可能离开，在目前情况下，他作为“ 全权代表 ” 到柏林来也无异于投降。波兰人可能很快就被打败，但是他们绝不愿投降。

在德国对波兰发动进攻的这一天，达勒鲁斯甚至比汉德逊还要积极活跃。上午 8 点，他去见了戈林，戈林对他说：“ 战争已经爆发了，起因是波兰人进攻了格莱维茨的电台并且炸毁了德却奥附近的一座桥。 ” 这个瑞典人立刻把这个消息用电话通知了伦敦外交部。

“ 我告诉过某人说， ” 后来在纽伦堡法庭的讯问中他回答说。“ 据我所得到的情报，波兰人发动了进攻。当我这么说的时候，他们自然觉得很奇怪，我是怎么搞的。 ”[⑤]不过话得说回来，他所说的话也只是英王陛下政府驻柏林大使两小时以后来的电话所说的话。

英国外交部一份秘密备忘录，记载了那位瑞典人上午 9 点 5 分打来的电话。达勒鲁斯学着戈林的口吻硬对伦敦说，“ 波兰人把一切希望都破坏了 ”，

[②] 参见达勒鲁斯上引书，第 119—20 页；另见他在纽伦堡的证词，载《主要战犯的审讯》，第 9 卷，第 471 页。

[③] 《英国外文政策文件汇编》，第 7 册，第 466—67 页。

[④] 同上。

[⑤] 《主要战犯的审讯》，第 9 卷，第 436 页。根据这里所刊的来看，达勒鲁斯的证词有一个排错的地方，他说的话成了波兰人“ 受到攻击 ”，因此是完全令人误解的。

而且说他有“证据证明他们从来就不打算谈判”。[6]

中午12点半钟，达勒鲁斯又给伦敦外交部挂了一个长途电话，这次他找着了贾德干。他又一次谴责波兰人炸毁德却奥桥从而破坏了和平，并且提议让他和福比斯再坐飞机去一趟伦敦。但是生性严厉、为人耿直的贾德干对这位达勒鲁斯已经有些腻烦了，因为他所力图避免的战争现在已经爆发。贾德干对这个瑞典人说，“现在什么行动也都无济于事了”。

然而贾德干只不过是外交部的常务次官，连内阁阁员都不是。达勒鲁斯坚持要他把他的要求直接转达给内阁，并且傲慢地告诉贾德干说，一小时以后他还要来电话。他后来的确打了电话，也得到了答复。

> 当德军还在侵略波兰的时候[贾德干告诉他说]，任何调停的想法都是谈不到的。现在要避免一次世界大战，唯一的途径就是（一）停止敌对行动，[602]（二）德国军队立即撤出波兰领土。[7]

上午10点，波兰驻伦敦大使拉仁斯基伯爵拜会了哈利法克斯勋爵，把德国侵略的消息正式通知他，并且指出，“这显然是条约中规定要对付的一种情况”。这位外交大臣的回答是，他对这些事实毫不怀疑。10点50分，他在外交部约见了德国代办西奥多·科尔特，问他有没有什么情报。科尔特回答说，他既没收到有关德国进攻波兰的情报，也没有接到任何指示。于是哈利法克斯就宣布，他所收到的报告中说明的事实已经“造成了一种非常严重的局势”。但是他的话也就到此为止。科尔特于上午11点45分用电话向柏林报告了这件事。

因此，到这天中午的时候，希特勒还有理由希望：英国虽然认为局势严重，但是还不致于参战。但是这个希望很快就破灭了。

下午7点15分，英国驻柏林大使馆的一个人员给德国外交部打了一个电话，说“有紧急公事”，要求里宾特洛甫“尽快”接见汉德逊和考仑德雷。几分钟以后，法国大使馆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里宾特洛甫拒绝同时会见两位大使，他于晚上9点接见了汉德逊，过了一小时接见了考仑德雷。他从英国大使手中接到了一份英国政府的正式照会。

> ……除非德国政府准备向英王陛下政府提出令人满意的保证，即德国政府已经停止对波兰的一切侵略行动，并准备立即从波兰领土上撤出其军队，英王陛下政府将毫不犹豫地履行自己对波兰所承担的义务。[8]

法国通碟的措词与此完全相同。

里宾特洛甫对两位大使都回答说，他将把照会转呈希特勒，接着他就唠唠叨叨地发了一通议论，宣称“根本不存在任何德国侵略的问题”，而只有波兰的侵略，并且一再重复那个到现在已经有了馊味的谎言，说什么波兰“正规”部队在前一天侵袭了德国领土。不过外交上的礼节仍然保持着。尼维尔·汉德逊爵士在当夜向伦敦报告这次会见的经过时，在电报中没有忘记提到里宾特洛甫的态度“彬彬有礼”。当这位大使准备起身告辞的时候，两人又发生了一场争论，争论的问题是在他们两天前的那次激烈的会见中，德国外交部长在宣读德国对波兰的“建议”时，是否含糊不清、速度太快。汉德逊说确

---

[6]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7册，第474—75页。

[7] 同上，第651，652号，第479—80页。

[8] 原文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7卷，第492页，另见《英国蓝皮书》，第168页。施密特博士关于里宾特洛甫对汉德逊和考仑德雷的话所记的笔记，分别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7卷，第493页和第495页。

实是这样。里宾特洛甫则说，他读得“缓慢而且清楚，甚至还对其中一些主要之点作了口头解释，因此他可以认定汉德逊一定完全听明白了”。这个争执是永远也不会得到解决的——可是，到了这个时候，这还有什么关系呢？[9]

9 月 1 日夜晚，当德国军队继续深入波兰国境、德国空军在[603] 不停地进行轰炸的时候，希特勒从英、法两国的照会中认识到了，如果不立即停止进攻并撤出军队——这当然是不可想象的——他就已经把一场世界大战惹上身了。还是说，他那天晚上还在盼望着他的运气、他那慕尼黑的运气会来呢？因为他的朋友墨索里尼被战争的来临吓坏了，生怕英、法的压倒优势的海陆空军会袭击意大利，所以便在拼命设法再安排一次慕尼黑会议。

墨索里尼最后一分钟的调停

读者想必记得，迟至 8 月 26 日，这位意大利领袖为了逃避意大利在钢铁盟约中所承担的义务，还在对那位元首说“政治解决”仍然有可能，这种解决可以使“德国在道义上和物质上都完全得到满足”。*可是希特勒懒得同他的这位朋友和同盟者争论这个问题，这使得那位轴心小伙伴感到丧气。尽管如此，我们已经知道，8 月 31 日，墨索里尼和齐亚诺在得到他们驻柏林大使关于形势紧急的报告后，曾经力劝希特勒至少应当见一见波兰大使利普斯基，并告诉他，他们正在努力使英国政府同意把归还但泽当作和平谈判的‘第一步”。[①]

但是那时已经为时太晚了，希特勒对这样的小诱饵已经没有胃口。正如希特勒对他的将领所说的，但泽不过是个借口而已。他要的是消灭波兰。但是那位意大利领袖却不明白这一点。9 月 1 日清晨，他必须作出抉择，要不宣布意大利中立，就得冒英、法大军进击的危险。我们可以从齐亚诺的日记中清楚地看出，这种前景对他那位泄了气的岳父大人是一场多么可怕的恶梦。*

9 月 1 日一清早，这位愁肠百结的意大利独裁者亲自打电话给柏林的阿托利科，“催促他去恳求希特勒给他来一个电报，解除他在同盟条约中的义务”。（齐亚诺语）[①]那位元首很快地甚至可以说是欣然地应允了他的请求。上午 9 点 40 分，希特勒在临动身去国会之前给他的朋友发了一份电报，为了节省时间，这份电报是用电话打给德国驻罗马大使馆转达的。

领袖：

[604]您近来在外交上和政治上对德国及其正义事业给予支持，谨致最真诚的谢意。我确信，我们能够凭德国的军事力量完成当前强加干我们的这一任务。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预计不致需要意大利的军事支持。领袖，我还要预先感谢您今后定将为法西斯主义以及国家社会主义的共同事业作出的一切努力。

阿道夫·希特勒[③] [②]

---

[9] 施密特关于这次争论的记述，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 7 卷，第 493 页。汉德逊在 1939 年 9 月 1 日晚上发出的电报中有篇短的记述，见《英国蓝皮书》，第 169 页。

[①] 见本书原文第 588 页。

[①] 《齐亚诺日记》第 135 页。

[③] 下午 4 点 30 分，在罗马大臣会议结束之后，意大利电台广播了该会议“致意大利人民”的公告，宣布“意大利将不率先采取军事行动”。紧接着又广播了希特勒致墨索里尼的解除意大利同盟义务的电报。

中午 12 点 45 分，希特勒已经在国会发表了演说，并且对达勒鲁斯咆哮了一阵，心里显然已经平静下来了，他灵机一动，又给墨索里尼发了个电报。他说他原是准备“通过谈判”解决波兰问题的，“我整整等了两天，波兰谈判代表还是没有到来”，“昨天一夜之间又发生了 14 起犯境事件”，因而他“现在决定以武力回答武力”了。末了，他再一次向这位临阵脱逃的伙伴表示感激。

领袖，对您所作的一切努力，我表示感谢。我还要特别为了您的出面调停向您致谢。但是我从一开始就怀疑这种努力不会有任何效果，因为如果波兰政府具有丝毫和解的诚意，问题本来是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解决的。然而，他们拒绝了……

因此，领袖，我才不愿意让您去冒险充当调停人；根据波兰政府的顽固态度来看，这种调停多半是徒劳无功的……

阿道夫·希特勒[①]

但是在齐亚诺的怂恿下，墨索里尼最后还是咬了咬牙，决心去冒险充当调停人。前一天中午刚过，齐亚诺就已经向驻罗马的英、法两国大使提出，如果他们的政府同意，墨索里尼愿意邀请德国在 9 月 5 日来举行一次会谈，以便“审查已经成为当前纷争根源的凡尔赛和约的一些条款”。

人们可能认为，第二天早晨德国进攻波兰的消息一定会使墨索里尼的建议成为多余。但是使意大利人感到意外的是，法国外交部长、绥靖专家乔治·庞纳竟在 9 月 1 日上午 11 点 45 分给法国驻罗马大使弗朗索瓦—庞赛打了一个电话，要他通知齐亚诺，法国政府欢迎这样一个会议，但未与会各国的问题不得在会上讨论，［605］而且该会不能只限于探求“当前有限问题的局部的临时解决办法”。庞纳提出的会谈条件中没有谈到德军的撤退，甚至连停止继续前进也没有提及。[①] *

但是英国人却坚持这个条件，并且最后总算拖着那个四分五裂的法国内阁和他们一道走，在 9 月 1 日晚上能够向柏林递交两份内容相同的警告照会，其中宣布，德国如果不从波兰撤军，英、法就要出兵。由于这两份照会当晚就公布了，所以令人感到有趣的是，墨索里尼当时已是慌不择路，任何一根稻草都要抓住，甚至不存在的稻草也要抓一下，第二天早上仍然向希特勒再次提出呼吁，就好像他根本没有把英、法的警告当真。

正如汉德逊在《最后的报告》中所说的那样，9 月 2 日是在一种悬虑不安的情况下度过的。[④]他和考仑德雷焦急地等着希特勒对他们照会的答复，可是毫无消息。中午刚过不久的时候，只见阿托利科气喘吁吁地走进英国大使馆，对汉德逊说，他要立刻弄清楚一件事情：头天晚上的英国照会是不是最后通牒？

汉德逊后来写道：“我当即对阿托利科说，如果那位外交部长问我的话，我授权可以告诉他，那不是最后通牒，而只是一个警告，但是他并没有问。”

[②]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 7 卷，第 483 页。

[①] 同上，第 485—86 页。

[①] 庞纳 9 月 1 日上午十一点四十五分致弗朗索瓦—庞赛的电报，见《法国黄皮书》，法文版，第 377—78 页。墨索里尼关于在 9 月 5 日举行会议的建议，见弗朗索瓦—庞赛 8 月 31 日致庞纳的电报，同上，第 360—61 页。

[④] 前一天下午，汉德逊已经按照哈利法克斯的指示焚毁了他的密码和秘密文件，并正式请求美国代办“在万一发生战争的情况下对英国的利益惠予照顾”。（《英国蓝皮书》第 21 页）

[③]

得到了这句话之后，这位意大利大使又顺着威廉街急急忙忙地奔向德国外交部。原来那天上午 10 点阿托利科就带着墨索里尼的一份照会来到威廉街，人家告诉他，里宾特洛甫身体不适，他于是把照会交给了威兹萨克。

1939 年 9 月 2 日

意大利希望通知德国政府，我国仍有可能使法国、英国和波兰同意在下列基础上同德国举行一次会谈，这项消息仅供参考，取舍之间自然全由元首决定：

1.双方军队留在目前原地停火。[着重体为原件所有]

2.两三天内举行谈判。[606]

3.解决德波争端。根据现状，这种解决肯定会有利于德国。

这个提议原先是领袖提出的，现在已经特别得到法国的支持。*

但泽已为德国所有，并且德国还取得了可靠保证来实现其大部分要求。

此外，德国已经得到了“道义上的满足”。如果它接受建议举行会谈，就有可能达到它的全部目的，同时又避免了一场战争，这场战争甚至在目前看来就已经有可能发展成为全面和长期的战争。

领袖并不想坚持自己的主张，但是他认为将上述情况立刻通知冯·里宾特洛甫先生和元首是极其重要的。[①]

里宾特洛甫那点儿病马上就好了。看了上面的建议之后，怪不得他在中午 12 点 30 分见到阿托利科时就向他指出，意大利领袖的建议与头天晚上英法的照会是不“协调”的，因为英法两国的照会具有一种“最后通碟的性质”。

这位意大利大使在避免世界大战的问题上和他的首脑同样热心，而且可以肯定更为真诚。不等里宾特洛甫说完，他就打断话头说，英国和法国的声明“已经由于他的领袖最后的这个照会而取消了”。当然，阿托利科是没有权利作这种声明的，这根本不是事实，不过他大概是以为在这种紧急关头，冒失一点也无妨，反正不会有什么损失的。德国外交部长对此表示怀疑，可是阿托利科一口咬定他的话不放。

法国和英国的声明［他说］，已经不在考虑之列。齐亚诺伯爵是在今晨 8 点 30 分来的电话，这已经是在意大利电台公布两国声明以后的事。由此可见，两国声明必然已被视为取消了。齐亚诺伯爵还说，法国特别赞成领袖的建议。目前推动这事的是法国，不过英国一定也会跟着动起来。[①]

里宾特洛甫仍然怀疑。他说，他刚同希特勒讨论过墨索里尼的建议，元首想知道英法的照会是不是最后通碟。这位外交部长最后同意了阿托利科的建议，让这位意大利大使去问一下汉德逊和考仑德雷，把情况弄清楚。

这就是阿托利科造访英国大使馆的原因。当时充当翻译的施密特后来写道：“那天的情景至今仍然历历在目，年岁已经不小的阿托利科从里宾特洛甫的房间里急急忙忙出来，跑下楼梯去找汉德逊和考仑德雷……半小时以后，阿托利科跟离开时一样，上气［607］不接下气地跑着回来了。”[②]

喘过气来以后，这位意大利大使就报告道，汉德逊刚才告诉他，英国的照会并非最后通牒。里宾特洛甫回答说，虽然“德国必然要拒绝英法的声明，但是元首正在研究意大利领袖的建议，如果罗马证实英法声明并非最后通牒，元首将在一两天内给予答复”。由于阿托利科催着早些答复，里宾特洛

[③] 汉德逊：《最后的报告》，第 22 页。

[①] 原文载《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 7 卷，第 509—10 页。

[①] 这一场面系根据施密特的报告写成，同上，第 512—13 页。

[②] 施密特著上引书，第 156 页。

甫终于同意第二天，即 9 月 3 日星期日中午给他回话。

这时候在罗马，墨索里尼的希望却在逐渐破灭。下午 2 点，齐亚诺接见了英、法两国大使，并且当着他们的面用电话把阿托利科同德国外交部长的谈话告诉了哈利法克斯和庞纳。庞纳满腔热情，一如既往；据他自己的记述（见《法国黄皮书》），他热烈地向齐亚诺道谢，感谢他为和平所作的努力。哈利法克斯却比他冷淡。他证实英国照会不是最后通牒。政治家们在一个名词上像这样抠字眼，真令人感到惊讶，因为英法声明本身已经说得明明白白。不过他接着又说，他个人认为，除非德军撤出波兰，英国不可能接受墨索里尼关于会谈的建议。而在这个问题上，这一次庞纳又一声不吭。哈利法克斯答应齐亚诺把英国内阁对这个问题的决定用电话通知他。

晚上 7 点刚敲过不久，英国内阁的决定传来了。英国接受意大利首相的建议，但是条件是希特勒必须把他的军队撤回德国境内。意大利外交大臣知道，希特勒决不会接受这个条件，因此正如他在日记里写的那样，“现在已经完全没有办法可想了”。

我不想去向希特勒提出这个建议，这一定会遭到他断然拒绝，也许还会受到他的白眼。［齐亚诺在日记上写道］我把这一点告诉了哈利法克斯以及那两位大使和领袖，最后我打电话给柏林，通知他们，除非德国人有相反的意见，否则我们就放弃谈判了。最后一线希望破灭了。[①]

于是在 9 月 2 日晚上 8 点 50 分，那位精疲力竭、心灰意懒的阿托利科，再次拜访柏林的威廉街。这次里宾特洛甫在总理府接见了他，当时他正在那里同希特勒商谈问题。缴获的外交部备忘录中对这个场面有如下的记载。

意大利大使告诉外交部长说，英国人不准备以意大利的调停建议为基础举行谈判。英国方面要求德国军队在谈判开始之前立即全部从波兰占领区和但泽撤出……

最后，意大利大使声明，领袖现在认为他的调解建议已经不复存在。外交部长听到意大利大使的传达后，未置一词。[①]

这位不辞劳苦的阿托利科费了这样多力气，竟然没有讨到一［608］句感谢的话！有的只是无言的轻蔑，因为这个同盟者想骗掉德国在波兰已经到手的战利品。

避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点点希望，现在也已烟消云散了。大家现在显然都已经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但是在这场戏里有一个角色却是例外。晚间 9 点，怯懦成性的庞纳又给齐亚诺打了一个电话，再次表示法国给德国的照会不具有“最后通牒的性质”，并且重申法国政府准备一直等待德国的答复，直到 9 月 3 日（即第二天）中午为止。不过，“为使会谈取得良好的结果”，庞纳告诉齐亚诺，法国政府同意英国政府的意见，即德国军队必须“撤出”波兰。这是庞纳第一次提到这一点——这一次也只是因为英国方面的坚持才不得已提出的。齐亚诺的回答是，他认为德国政府不会接受这个条件。但是庞纳还不死心。那天深夜，他又作了最后一次努力，想逃脱法国对于正在受到轰击和围攻的波兰所承担的义务。齐亚诺在 9 月 3 日的第一段日记里追述了这桩怪事。

夜里，外交部来人把我叫醒了，因为庞纳找到瓜里吉利亚（意大利驻巴黎大使），问我们能不能使德国撤出波兰，哪怕是象征性的撤军也行……我把这个建议扔进了废纸篓，根本没有呈报领袖。

[①] 《齐亚诺日记》，第 136—37 页。

[①]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 7 卷，第 524—25 页。

不过从这里可以看出，法国是毫不热心地而且是彷惶不定地来接受这个巨大的考验的。[①]

波兰战争变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1939 年 9 月 3 日，星期日，柏林的天气是一个可爱的夏秋之交的日子，阳光灿烂，空气中飘着馥郁的芳香——我在那天的日记里写道：“ 碰到这样的天气，柏林人总爱到近郊的树林里或是湖上去度假的。 ”

天刚一亮，英国大使馆就收到了哈利法克斯勋爵发给尼维尔·汉德逊爵士的一份电报，指示他设法同德国外交部长在上午 9 点举行一次会晤，把一份随电报发来的照会递交给他。

张伯伦政府在这条路上已经走到尽头了。它在大约 32 小时以前照会希特勒，如果德国不从波兰撤军，英国就将宣战。可是一直没有答复，于是英国政府决心履行它的诺言。正如法国驻伦敦大使查理·考平在头一天下午 2 点 30 分给那位踌躇不定的庞纳的报告所说的，前一天英国政府就耽心希特勒可能故意迟迟不作答复，以便尽量攫取波兰领土，等到把但泽、走廊等地稳稳地抓[609]在自己手里以后,他就可以在他 8 月 31 日那 16 条的基础上提出一个“ 宽宏大量 ”的和平方案。[②]

为了不上这个圈套，哈利法克斯要法国人考虑，如果德国政府不在几小时之内对 9 月 1 日英法两国的声明作出令人满意的答复，这两个西方国家就对德国宣战，英国内阁在 9 月 2 日下午作出了明确的决定后哈利法克斯就具体建议，在当天半夜由两国一同向柏林提出一个限于 9 月 3 日上午 6 点以前答复的最后通牒。[①]但是庞纳不同意采取这样性急的步骤。

事实上，四分五裂的法国内阁在上个星期经过了重重难关，才勉强决定首先要履行法国对波兰（同时也是对英国）所承担的义务。原先在那黑暗的 8 月 23 日，庞纳听说里宾特洛甫已经到莫斯科去缔结德苏互不侵犯条约之后，吃惊之下曾力劝达拉第召开一次国防委员会会议，研究法国今后的步骤。*出席这次会议的除了达拉第总理和庞纳之外，还有陆、海、空三军部长，甘末林将军，海、空军首脑，以及另外 4 位将军—共计 12 人。

据会议记录所载，达拉第曾提出 3 个问题：

1.法国是否能够坐视波兰与罗马尼亚（或其中一国）从欧洲地图上被抹掉？

2.法国能用什么办法加以反对？

3.目前应该采取什么措施？

庞纳本人在说明了事态的严重变化之后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始终是他心中最为重视的问题：

权衡当前的局势，是忠于我们的义务而立刻参战好呢，还是重新考虑我们的态度，利用这段赢得的时间？……对于这个问题的答复，基本上是军事

[①] 《齐亚诺日记》，第 137 页。法国的一位失败主义参议员德·蒙齐在其所著《在此以前》一书第 146—47 页中证实了这件事的经过。

[②] 考平的电报，见《法国黄皮书》，法文版，第 395 页。

[①] 这一节系根据《英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 7 册中关于 9 月 2—3 日的情况写成。阿诺德。托因比和弗罗尼卡·托因比所编《大战前夕 1939 年》一书中有一段很精彩的摘要，所根据的是英国外交部的机密文件和少数一些法国材料。纳米尔的《外交前奏曲》也很有用。我特意略去了好几十处《英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的出处，免得文字间尽是注释号码。

性质的。

见到责任推到了自己的身上，甘末林和达尔朗海军上将便接着答道：

陆军和海军都已有准备。在战争的最初阶段，他们在打击德国方面不能有多大作为。但是法国一经动员，就会把相当一部分德国军队牵制在我们的边境上，从而将在某种程度上减轻波兰的负担。

……甘末林将军在回答波兰和罗马尼亚能够抵抗多久这个问题时说，他[610]相信波兰会光荣地进行抵抗，这将使德军主力在明年春天以前无法调转过来对付法国；而到那个时候，英国已经可以和我们并肩作战了。*

经过了不少的讨论以后，法国人才作出了决定。这一决定正式载入会议记录，内容是这样：

在讨论过程中，指出了这样一点，如果说几个月以后我们的力量能够有所增强，德国也将由于得到波兰和罗马尼亚的资源而变得更为强大。

因此，法国别无其他选择。

唯一的办法就是……洛守我们在同苏联进行谈判以前对波兰所承担的义务。

这样打定了主意之后，法国政府开始行动了。散会之后，就在 8 月 23 日那一天，宣布全国处于戒备状态，所有边防部队都进入了作战阵地。第二天，36 万预备役人员被召入伍。8 月 31 日，内阁发布了一项公报，声明法国将“坚决履行”它的义务。次日，也就是德国进攻波兰的头一天，庞纳经哈利法克斯的一再坚持，同意法国和英国联合一致向柏林方面提出警告：英法两国将履行自己对盟国所提出的保证。

但是在 9 月 2 日，当英国人催促法国人同意在半夜就向希特勒提出最后通牒的时候，甘未林将军和法国参谋总部却踌躇起来了。毕竟，如果德国人在西线立刻发动进攻的话，不得不孤军作战的将是法国。没有一个英国兵会来支援他们。参谋总部坚持要求再等 48 小时提出最后通牒，为的是好顺利地进行总动员。

下午 6 点，哈利法克斯打电话给英国驻巴黎大使埃立克·菲普斯爵士，并对他说：“英国政府不能再等 48 小时。法国的态度使英王陛下政府深感为难。”

两小时以后，英国政府的处境之难已经到了难以支撑的地步，张伯伦在下院站起来讲话的时候，大多数议员，不论属于哪个党派，对英国方面迟迟不履行它的义务都已经感到极不耐烦。等到[611]听了张伯伦的发言之后，他们几乎快按捺不住自己了。张伯伦告诉议会，英国政府还没有收到柏林的答复。除非德国给予答复并且保证从波兰撤退，否则英国“必将采取行动”。如果德国人果真同意撤退，那么，英国政府“就愿意认为局势依旧同德军越境进入波兰以前一样”。目前英国政府正在同法国就两国对德最后通牒的时限问题进行联系。

在波兰战事已经进行了 39 小时之后，下院再也不能接受这种拖延策略了。从政府席上似乎发散出一股慕尼黑的气味。当反对党工党的临时议会领袖阿瑟·格林伍德站起来准备发言的时候，利奥波德·阿末利从保守党席上向他大叫：“请你代表英国发言吧！”

格林伍德说：“在这样的时刻，英国和英国所拥护的一切以及全人类的文明都遭到了威胁，我不知道我们还打算犹豫到什么时候……我们应当和法国人一起并肩前进……”

问题就在这里。当时事实证明要推动法国前进是很困难的。下院怒气冲天，使张伯伦感到坐立不安，他不得不打断激烈的争论为自己辩护说，要通

过电话同巴黎磋商，使“看法与行动取得一致是需要时间的”。他接着说，“如果下院竟然有人认为我所提出的声明流露出本政府或法国政府有丝毫的动摇，我就不免感到震惊”。他说，据他所知，法国政府“这时正在开会”，“几小时以后”将可得到他们的消息。总之，他极力安慰激愤的议员说：“我预料明天我将只可能有一种答复给下院……我相信下院……一定会认为我说的完全是实话……”

正如纳米尔后来所写的那样，英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考验，是“用一种特别少见的迟迟艾艾的方式”宣告其无情的来临的。

正如英国的机密文件所表明的那样，张伯伦知道得很清楚，英国人民很不满意他，在这国家危急存亡的时候，他的政府很有可能被推翻。

他刚从下院出来，马上就给达拉第打了一个电话。据记载，时间是晚上 9 点 50 分，当时在旁边的贾德干作了记录留为档案。

张伯伦：这里的情况非常严重……下院闹得很凶……如果法国坚持要把最后通牒的限期定为从明天中午起的 48 小时之内，我的政府就将无法维持。

首相说，他完全明白，法国将首当其冲地受到德国的进攻。但是他坚信，[612] 今晚无论如何必须采取某种步骤。

他提出一个折衷方案……最后通碟于明日上午 8 点发出……限中午 12 点以前答复……

达拉第的回答是，除非英国轰炸机群准备立刻出动，否则法国认为，如果可能的话，最好把对德军的进攻推迟几小时。

过了不到一小时，哈利法克斯在夜晚 10 点 30 分给庞纳打了一个电话。他极力敦促法国方面接受英国的折衷方案：明天（9 月 3 日）上午 8 点在柏林提出最后通牒，最后期限为中午 12 点。法国外交部长不仅不同意，而且还对哈利法克斯提出抗议说，英国方面坚持这样迫不及待地行事会给人造成“一种十分糟糕的印象”。他要求伦敦再等一等，至少在中午以前不要向希特勒提出最后通牒。

哈利法克斯：要英王陛下政府等到那个时候是办不到的……[英国]政府是否能控制这里的局势是很难说的。

下院将在 9 月 3 日（星期日）中午开会，从星期六晚上那次会议的情绪看来，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都明白，如果这个政府想存在下去，他们就必须提出议会所要求的回答。第二天凌晨 2 点，法国驻伦敦大使考平警告庞纳，张伯伦内阁如果不能给议会以确切的答复，就有被推翻的危险。于是，哈利法克斯在电话中最后告诉庞纳，英国打算“单独行动”。

哈利法克斯给汉德逊的电报于凌晨 4 点左右到达柏林，* 叫他在 9 月 3 日（星期日）上午 9 点递交给德国政府，这份通碟提到英国政府曾在 9 月 1 日的照会中宣布，如果德国军队不立刻撤退，英国就要履行它对波兰承担的义务，这份通牒接着指出：

[613]虽然那份照会于 24 小时以前就已提出，但至今未见答复，同时德国又仍然在继续并加紧进攻波兰。鉴于这种情况，我荣幸地通知您，在今天 9 月 3 日英国夏季时间上午 11 点以前，如果德国政府不对上述问题作出令人满意的保证并送达伦敦英王陛下政府，则从该时起，两国即处于战争状态。[②] [④]

[②] 原文见《英国蓝皮书》，第 175 页，另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 7 卷，第 529 页。

[④] 哈利法克斯另外又给汉德逊发去一个电报（发报时间也注明为上午 5 点），通知这位大使说，考仑德雷“要到今日（星期日）中午才会对德国政府提出相同的照会”。他不知道法国最后通牒限几小时答复，他

这个安息日在天还没有亮的时候，汉德逊发现要同威廉街取得联系是相当困难的。德国外交部的人告诉他说，里宾特洛甫“没有功夫”在上午 9 点接见他，不过他可以把照会交给政府翻译官施密特博士。

在这个历史上的重要日子，施密特博士睡过了头，等他乘着一辆出租汽车赶到外交部时，看到那位英国大使正循着外交部门前的台阶拾级而上。施密特从侧门钻了进去，在恰好钟鸣 9 点的时候溜进里宾特洛甫的办公室，一分不差地准时接见了汉德逊。“他走进屋子，表情严肃，”施密特后来追述道，“跟我握了握手，我请他坐下，他谢绝了，只是庄严地站在屋子中间。”[①]汉德逊宣读了英国的最后通牒，把文件交给施密特之后就告辞了。

这位翻译官连忙拿着那份照会，顺着威廉街跑到总理府。在元首办公室外面，他发现内阁大多数的阁员和几个党内高级官员都聚集在那里“焦急地等候着”他的消息。

> 当我进入里面房间的时候[施密特后来追述说]，希特勒止坐在办公桌前，里宾特洛甫站在窗户旁边。他们俩都以期待的目光看着我走进去，我在希特勒的办公桌前不远的地方站住，接着就慢声向他翻译了英国的最后通牒，当我泽完的时候，房间里一片死寂。
>
> 希特勒坐着一动不动，瞪起两只眼睛望着前方……停了一会没有动静，这一会儿功夫就像 100 年一样长；然后，他转过脸未朝着仍然站在窗子旁边的里宾特洛甫说：“现在怎么办，”问这话时希特勒摆出一副凶恶的面孔，意思好像是在抱怨他的外交部长使他对英国方面可能的反应作出了错误的估计。
>
> 里宾特洛南却若无其事地回答道：“我断定，法国人会在一小时之内交来一份相同的通牒。”[②]

施密特完成任务之后就退了出来，在外面的房间里停了一下，把事情的经过告诉其余的人。他们听了也都沉默了半晌没有说话。最后：

> 戈林转过身来向我说：“如果我们在这场战争中打败了，那就只能靠上帝发慈悲了！”
>
> [614]戈培尔垂头丧气地独自站在一个角落里发愣。我看见房间里的每一个人都是忧心忡忡的样子。[①]

与此同时，那个绝无仅有的达勒鲁斯却一直为了避免那不可避免的事情而在作最后的客串努力。上午 8 点，福比斯就把那份、将在一小时以后递交德国政府的最后通碟的内容告诉了他。据他后来在纽伦堡作证时说，他立刻就到空军总部去见戈林，要求戈林一定要做到使德国对最后通牒的答复要”通情达理”。他还建议元帅本人在 11 点以前宣布他准备亲自飞到伦敦去“谈判”，这位瑞典商人在他写的书里说，戈林接受了这个建议，并且和希特勒通了电话，希特勒也表示同意。但德国的正式文件中并没有提到这件事。我们根据施密特博士在前面所说的话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当他于 9 点过几分带着英国的最后通牒来到总理府的时候，戈林正在总理府元首的会客室里，而不是在他的司令部里。

无论如何，这位瑞典和事佬的确给英国外交部打了电话，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并且还不是一次而是两次。第一次在上午 10 点 15 分，他擅自通知英国政府，德国人对于最后通牒的答复“正在路上”，德国人仍然“非常希

估计“可能”在 6 小时到 9 小时之间。

① 施密特的记述，见他所著的上引书， 第 157 页；另见他在纽伦堡的证词， 载《主要战犯的审讯入第 10 卷，第 200 页。

② 施密特著上引书，第 157—58 页；另 见他的证词，上引书，第 200—1页。

① 同上。

望能够满足英国政府的要求，并就不侵犯波兰独立的问题作出令人满意的保证”。（！）他希望伦敦能够“从最赞同的角度”来看待希特勒的复照。[②]

半个小时以后，即上午 10 点 50 分，距最后通牒限定的时间 10 分钟，达勒鲁斯又给伦敦外交部打来了一个长途电话，他这次提议让戈林在希特勒的同意下立刻飞往英国首都。他不知道现在再演这套外交滑稽戏已经过时了，不过事实很快就让他明白过来了。他从哈利法克斯那里得到了一个毫无商量余她的回答。英国政府不能采纳他的建议。英国政府对德国政府提出的问题是非常明确的，“想必他们也会作出明确的答复”。英王陛下政府不能再等着和戈林讨论了。[①]

于是达勒鲁斯挂上了电话，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直到战后，他才在纽伦堡法庭上以及在他写的书里又露了一面，追述他为了拯救和平所作的离奇古怪的努力。*他的用心是好的，他也曾不辞辛苦地为和平奔走，有一个短暂的时期，他一度处身于世界历史的令人目眩神迷的舞台中心。但是那时几乎人人都被过分纷坛杂乱的景象搅得糊里糊涂而无法看清局势，他也不是例外，而且正像他后来在纽伦堡所承认的，他一直不知道自己受到德国人多大的愚弄。

英国最后通碟所限定的时间上午 11 点刚敲过不久，两小时前[616]拒绝接见英国大使的里宾特洛甫，约见了那位大使，把德国的复照交给他。德国的复照说，德国政府“拒绝收下或接受，当然更谈不到履行”英国的最后通牒。接着就是一篇又臭又长的宣传文字，显然是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在发出复照前这两个小时内仓促书就的。为了欺骗易受欺骗的德国人民，这份复照又把那些我们现在已经熟悉的谎言，包括那个关于波兰人“进攻”德国领土的谎话在内，重弹了一遍，把一切事情都归罪于英国，并且拒绝了英国“强迫德国撤回其为保卫国家而部署起来的部队”的企图。复照谎称，德国已经接受了墨索里尼在最后时刻提出的和平建议，但是英国拒绝了这个建议。尽管张伯伦对希特勒一味绥靖姑息，这份复照还是责备英国政府“鼓吹要消灭日耳曼民族”。*

汉德逊后来称这个复照“完全是歪曲事实”的。他读完以后说道，“究竟是谁的过错，让历史来判断好了。”里宾特洛甫也反唇相讥道，“历史已经证明·了实际情况究竟是怎样”。

大约 12 点钟的时候，我正好站在威廉街总理府的前面，扩音器突然宣布大不列颠已经对德国宣战。[①]大约有 250 人——不会更多——顶着太阳站在那里，注意地听着这个消息。广播结束时，没有一个人出声。他们只是站在那里。突如其来的消息使他们发愣了。他们很难相信希特勒已经把他们拖进了一场世界大战中去了。

虽然这是一个安息日，但是不久就有报童在叫卖号外。事实上，我发现他们是在免费散发。我也要了一份。那是《德意志总汇报》的号外，整页上用大号字印着这样一个标题：

[②]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 7 卷， 第 762 号，第 537 页，注①。

[①] 同上。

[①] 上午 11 点 15 分，哈利法克斯在伦敦交给德国代办一份正式照会，声称由于到了上午 11 点还没有收到德国提出的保证，“我荣幸地通知您，我们两国从今天 9 月 3 日上午 11 点起处于战争状态。”

英国最后通牒遭拒[616]
英国已对我宣战
英国照会要求我撤退东线军队
元首今日离此亲临前线

官方公报上的标题活像是里宾特洛甫口授的。

德国备忘录证明过错在英国

对于容易受骗的德国人民来说，德国的备忘录可能是一个“证明”，但它并没有能够在这一天煽起人们对英国人的恶感。当我经过英国大使馆时，汉德逊和他的使馆人员正从使馆搬往拐角处的阿德隆饭店。一个警察在那座大楼前独自踱步。他除了来回踱步而外无事可做。

法国人多挨了一会。庞纳直到最后一刻还在延宕时间，他死抱着一个希望不放，认为墨索里尼还有可能同希特勒谈妥一项交易，从而让法国脱身。他甚至恳求比利时大使想办法让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通过他对墨索里尼的影响去影响希特勒。9 月 2 日（星期六），他同本国的内阁争辩了一整天，说他已经“答应了”齐亚诺，法国将等候到 9 月 3 日中午，让德国对 9 月 1 日英法两国的警告提出答复。他不能说了不算。这话跟他和英国辩论时所说的一样。不错，他曾经在电话里对意大利外交大臣作过这个保证，但他是在 9 月 2 日晚 9 点才作出这个保证的；*到这个时候，正像齐亚诺已经设法告诉他的那样，意大利领袖的建议已经完全失效了。而且，这时候英国已经向他提出了要求，主张由英法两国在当日午夜联合向柏林提出最后通牒。

9 月 2 日将近午夜时分，法国政府才最后作出决定。午夜 12 点整，庞纳打电报给驻在柏林的考仑德雷，说他在明天早晨将把法国要在“中午对威廉街”作出的“新的外交步骤”的内容通知考仑德雷。”[617]9 月 3 日，星期日，上午 10 点 20 分，即在英国最后通碟的时限截止前 40 分钟，内容通知过来了。法国最后通牒的措辞和英国的大致相似，所不同的是法国宣布：如果德国给予否定答复，法国将履行自己对波兰所承担的“为德国政府所知道的”那些义务——甚至到了这个最后关头，庞纳还不肯正式宣战。

法国政府出版的《法国黄皮书》上说，巴黎拍发给考仑德雷的法国最后通牒，规定下午 5 点为德国答复的最后时限。但这不是原来那份电报中所规定的时限，菲普斯大使在那天上午 8 点 45 分从巴黎报告哈利法克斯说：“庞纳对我说，法国的最后时限要到星期一[9 月 4 日]早晨 5 点截止。”这才是庞纳在电报中提出的时限。

这还是达拉第在星期日早晨向法国参谋总部争得的让步。法国参谋总部最初坚持要把时限定为从中午向柏林递交最后通牒之时算起 48 小时。虽然如此，英国政府还是很恼火，那天上午当即相当明确地向巴黎表示了这种不快。这样达拉第总理才向军方作最后的呼吁。他在上午 11 点 30 分把参谋总部的科尔斯东将军请了来，请他缩短时限。这位将军最后勉强同意把时限提前 12 小时，改为下午 5 点。

就是这样，直到考仑德雷快要离开柏林法国大使馆前往威廉街的时候，

庞纳才用电话通知他对最后限期作了必要的修改。[①]里宾特洛甫没有功夫在中午接待这位法国大使。他正在总理府参加一个小小的仪式，陪同元首热烈接待新任的苏联大使亚历山大·施克瓦兹也夫。这个插曲使得柏林在这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安息日里具有一种荒诞的气氛。但考仑德雷坚持非要按照指示在中午 12 点整到威廉街求见不可，因此，只好由威兹萨克接见他。当这位大使问到这位国务秘书是否有权对法国作出“满意的”答复时，威兹萨克回答说，他无权向他作“任何答复”。

接着在这个庄严的时刻又发生了一个小小的外交趣剧：考仑德雷把威兹萨克的回答看作德国的否定答复，这早已在他意料之中，于是便打算把法国的正式最后通牒交给这位国务秘书；这时，后者却拒绝接受。他建议这位大使“耐心稍等片刻，见一见外交部长本人”，考仑德雷碰了这个钉子，只得在那里等着，反正他已经碰过不止一次钉子了。他在那里差不多等了半个钟头，直到 12 点 30 分才被带到总理府去见里宾特洛甫。[②]

那位纳粹外交部长虽然明知道这位大使所负的使命，他还是不肯放过这个机会也可以说是最后的一次机会—向这位法国使节施展其颠倒黑白。歪曲历史的惯伎。里宾特洛甫首先指出，墨索里尼在提出那最后一分钟的和平建议时，曾强调说那是得到法国赞同的。然后他宣布“德国曾经在昨天通知意大利领袖，德[618] 国也准备接受这个建议。但是后来，”里宾特洛甫补充道：“领袖告诉我们说，这个建议由于英国政府的死硬态度已经遭到破坏了。”

接着他又听着那位纳粹外交部长说了一阵什么如果法国追随英国，他将感到遗憾，什么德国无意进攻法国，等等。不过，对里宾特洛甫的这种胡说八道，考仑德雷在过去几个月里已经领教够了，这位法国大使赶紧插言，提出他特为来问的问题：外交部长的这番议论是否意味着德国政府不接受法国 9 月 1 日的照会？

“Ja（是的）。”里宾特洛甫回答。

于是这位大使就把最后通碟递给了这位外交部长，事前还说他必须“最后一次”强调指出：德国政府对于“未经宣战”就突然进攻波兰以及拒绝英法关于撤退德军的要求等问题“负有严重的责任”。

“那么法国就会成为侵略者了。”里宾特洛甫说。

“这问题让历史来裁判吧。”考仑德雷回答说。

在柏林的那个星期天，所有参加最后这幕戏剧的人仿佛都有意要诉诸历史的裁判。

虽然法国正在动员一支在一个时期内会对德国的西线武力占压倒优势的陆军，但是在希特勒那颗狂热的脑子里，当时军队为数微不足道的英国却成了他的心腹之患。他认为，在 1939 年 9 月 3 日行将消逝并将成为历史的时刻，他之所以陷身于这样的窘境，几乎完全应当由英国这个对头负责。那天下午他对德国人民和西线军队发表了两篇冠冕堂皇的文告，把这一点说得非常清楚；他对英国人的歇斯底里的愤怒和刻骨的怨恨在这里面一起迸发出来了：

> 好几世纪以来[他在《告德国人民书》中说]，英国所追求的目的就是使欧洲人民无力防御英国征服世界的政策……[并且]自以为有权可以用站不住脚的借口去进攻和毁灭一个当时看来对它最为危险的欧洲国家……

[①] 庞纳自己也有追述，上引书，第 365—68 页。

[②] 威兹萨克关于这次会见的报告，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 7 卷，第 532 页。

我们自己已经亲自看到英国在战争开始以来对德国所奉行的……包围政策……英国的战争挑拨者……一直用凡尔赛的片面命令压迫德国人民……

西线将士们！[希特勒在《致西线将士书》中对那些在今后若干星期内只可能以法军为对手的部队说］……英国一直奉行着包围德国的政策……英国政府为我们在上次大战中所熟知的那些战争贩子所驱使，现在已经决心摘下他们的假面具，以站不住脚的借口向我们宣战了……

但在这两篇文告中没有一个字提到法国。

[619] 中午 12 点 6 分，张伯伦在伦敦向下院发表演说，他向下院报告，英国现在已同德国处于战争状态。虽然希特勒在 9 月 1 日明令禁止收听外国广播，违者处死，但我们在柏林还是收听了英国广播公司转播的英国首相演讲稿。我们有些人曾经亲眼看到他冒着丧失政治生命的危险，在戈德斯堡和慕尼黑对希特勒一味绥靖姑息，如今再听到他这时的讲演，觉得他的话是沉痛的。

今天是我们大家都感到痛心的日子，但是没有一个人会比我更为痛心。在我担任公职的一生中，我所信仰的一切，我所为之工作的一切，都已毁于一旦。现在我唯一能做的就是：鞠躬尽瘁，使我们必须付出重大代价的事业取得胜利……我相信，我会活着看到希特勒主义归于毁灭和欧洲重新获得解放的一天。

但是张伯伦命中注走不能看到这一天。1940 的 11 月 9 日，他怀着绝望的心情与世长辞了，虽然死时他仍旧是内阁阁员之一。鉴于本书前面对他颇多贬抑之词，我觉得现在在这里引一段丘吉尔对他的评语是最恰当不过了。曾经长期被他排斥在英国国家事务之外的丘吉尔，在 1940 年 5 月 10 日接替他出任首相。1940 年 11 月 12 日，丘吉尔在下院致辞悼念他时说。

……在这世界最严重的危机之中，尼维尔·张伯伦不幸事与愿违，一再失望，受到一个坏人的欺骗。但是，他那落空的希望是什么？他那未遂的心愿是什么？他那遭到愚弄的信念又是什么呢？毋庸置疑，这些都表现了人类心灵最崇高最善良的本性——对和平的热爱，对和平的追求，为和平而奔波，为和平而斗争；为了这一切，他甚至不顾巨大的危险，至于个人的荣辱则肯定也完全置之度外。

希特勒想运用外交手腕，使英、法置身战争之外的企图既已宣告失败，于是就在 9 月 3 日下午把注意力转移到了军事方面。他发布了“第二号绝密作战指令”。虽然英法已经宣战，指令仍然规定：“德国的战争目标目前仍然是迅速地、胜利地结束对波兰的战事……在西线，让敌人先启战衅……对英国可以在海上展开攻击。”但是德国空军甚至连英国海军也不得攻击，除非英国首先对德国目标采取了这样的攻击。即使如此也还要看是否“处于特别[620]有利的地位，能够取得胜利”。希特勒还命令德国全部工业转入“战时经济”轨道。[①]

夜晚 9 点，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分别乘专车前往东线大本营。临行之前他们又采取了两个外交措施。现在英国和法国固然已经同德国开战，但是另外两个曾经支持希特勒，使他的冒险得逞的欧洲大国还必须用心对付。一个是同盟国意大利，另一个是苏俄；前者已在紧要关头临阵脱逃，后者虽然不为纳粹独裁者所信任，却对希特勒出了把力，使得他的战争冒险看来值得一试。

希特勒在临离开首都之前，又给墨索里尼发去一封信。这是在晚上 8 点 51 分用电报发出的，距元首的专车开出的时间只有 9 分钟。虽然这封信不算十分坦率，而且也不乏欺诈之词，但就我们所能获得的材料说来，却是一幅

[①] 原文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 7 卷，第 548—49 页。

最好的图画，描绘出阿道夫·希特勒离开第三帝国那夜幕已降的首都。第一次去扮演德国最高统帅的角色时具有什么样的心情。这封信是在缴获的纳粹文件中找到的。

领袖：

我必须首先感谢您为调停所作的最后努力。我本来是愿意接受调停的，但有一个条件，就是必须有可能确实保证谈判一定会成功。因为德国军队已经苦战了两天，在波兰境内取得了神速的进展。我们不能由于一场外交阴谋而让牺牲在那里的将士的鲜血白流。

虽然如此，我仍然相信，如果英国不是从一开始就决心诉诸战争的话，本来是可以找到一条出路的。领袖，我之所以没有屈服子英国的威胁，是因为我终于认为，即使我屈服了，和平也只能维持 6 个月，或者至多维持一年，既然如此，我想尽管存在着种种困难，目前仍不失为挺身奋战的适当时机。

……波兰军队不久即将崩溃。如果一年或者 2 年以后再打，是否能取得这样迅速的胜利，我觉得是大可怀疑的。英国和法国会继续武装它们的同盟国，使得德国武装部队不可能取得这样显著的决定性的技术优势。领袖，我知道我所从事的斗争是一场生死存亡的斗争……但是我也知道，这样一场斗争迟早是不可避免的，必须通过冷静审慎的考虑来选择抵抗的时机，以确保胜利。对于胜利，领袖，我的信心是坚定不移的。

紧接着便是警告墨索里尼的话：

蒙您最近厚意承诺，愿在某些方面给我以帮助。对这种盛情，我谨向您[621]预致试挚的谢意。但是我还相信，即使我们目前所走的道路不同，命运仍会把我们联结在一起。一旦国家社会主义的德国为西方民主国家所毁灭，法西斯主义的意大利也将遭到困难。我个人始终认为，我们两国政权的命运是联结在一起的，而且我知道您，领袖，也持有完全相同的看法。

追述了德国在波兰取得的初步胜利之后，希特勒最后说：

……在西线，我将继续采取守势。让法国在那方面羌启战衅，到那时候我们就将能够倾全国之力与敌人进行角斗。

领袖，为了您过去给予我的支持，我再一次向您表示谢意，并希望您今后继续给我支持。

阿道夫·希特勒[①]

虽然这一天英法已经对德宣战，履行了它们对波兰的诺言，意大利还是不肯履行它对德国的诺言。不过希特勒努力压注了自己的失望，一个友好的意大利即使不参战，对他仍然可能是有用的。

但是，俄国可以更有用些。

我们从后来纳粹的秘密文件中知道，在德国进攻波兰的第一天，苏联政府就给德国空军提供了信号方面的帮助。那天一清早，空军参谋长汉斯·那舒恩纳克将军打电话给德国驻莫斯科大使馆，说他的驾驶员在轰炸波兰——他称之为“紧急试航”——时需要导航上的帮助，如果明斯克的俄国电台能够不断发出自己的呼号，他将不胜感激。下午，冯·德·舒伦堡大使就通知柏林，苏联政府“准备满足您的愿望”。俄国人答应在广播节目时尽量不断发出电台呼号，并将明斯克电台的广播时间延长两小时，以利深 夜航行的德国飞行员。[②]

可是，当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在 9 月 3 日晚间准备离开柏林的时候，他们还希望俄国人在军事上为他们征服波兰提供更大的帮助。下午 6 点 50 分，里宾特洛甫给莫斯科大使馆发了一份“特急”电，上面标着“绝密”字样，

[①] 全文，同上，第 538—39 页。

[②] 这一点是德国外交部文件泄露的，同 上，第 480 页。

开头是："大使亲启，面交使团团长或其代表。需特别保密。由本人自译。绝对秘密。"

德国人以这个极其秘密的方式邀请苏联参加对彼兰的进攻！

我们有把握在几个星斯之内决定性地击败波军，那时我们将把业经莫斯科谈判划归德国利益范围的领土置于军事占领之下，但是，为了军事上的原[622]因，我们自然还要继续对那时盘踞在俄国利益范围内的波兰土地上的波兰军队采取行动。

请立刻就这一点同莫洛托夫进行商谈，看苏联是否愿意在适当的时机出动军队打击俄国利益范围内的波兰军队，自己来占领这片领土。我们认为，这不仅会减轻我们的负担，而且也符合莫斯科协议的精神和苏联的利益。[①]

不消说，苏联这种不顾信义的行动当然会"减轻"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的"负担"。这不仅可以避免德国人和俄国人在坐地分赃时的摩擦和误会，还可以使苏联替德国分担一部分纳粹侵略波兰的罪责。既然他们分享了好处，为什么不该分担罪责呢？

那个星期日中午英国参战的消息公布后，柏林的德国要人中心情最为阴暗的是德国海军总司令埃里希·雷德尔海军元帅。他认为战争的爆发早了四五年，到1944—1945年，海军的"Z计划"完成后，德国就会拥有一支相当强大的舰队，能够同英国在海上较量。但现在是1939年9月3日，即使希特勒不听他的话硬要打，雷德尔也很清楚，他既没有必要的海面舰只，也没有足够的潜水艇可以对大不列颠进行一场有成效的战争。

这位海军元帅在日记里暗自写道：

今天，同法国和英国的战争爆发了。根据元首原先的断言，我们完全没有必要预计这场战争会在1944年以前发生。直到最后一分钟，元首还认为这场战争是能够避免的，即使这意味着推迟波兰问题的最后解决也在所不惜……

就海军而言，我们的装备显然不足以同英国进行这场巨大的斗争……潜艇部队仍然太软弱无力，不能在战争中起决定性的作用，而海面船只在数量和实力方面都不如英国舰队，即使全部动员，我们只能做到壮烈地为国牺牲……[①]

虽说如此，1939年9月3日晚上9点，正当希特勒动身离开柏林的时刻，德国海军出击了。德国U一30号潜艇在赫布里底群岛以西大约200英里处，事先不经警告就用鱼雷击沉了正从利物浦驶往蒙特利尔的英国邮船"雅典娜"号，船上载有乘客1400人，有112人死亡，其中有28名美国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了。

---

① 电报全文，同上，第540—41页。

① 《海军事务元首会议记录》，1939年， 第13—14页。

第四编　战争：初期的胜利和转折点

[623]

[624]

第十八章　波兰的覆亡

[625]

1939 年 9 月 5 日上午 10 点，哈尔德将军同德国陆军总司令冯，勃劳希契将军和北方集团军司令冯·包克将军谈了一次话。他们对德国进攻波兰后第五天早晨的形势作了一番估计之后，一致认为，“敌人实际上已经被打垮了”。（哈尔德日记语）

冯。克鲁格将军所率领的第四军团从波麦腊尼亚向东推进，冯。库希勒将军所率领的第三军团从东普鲁士向西推进，两军会师后，夺取走廊的战斗在前一天晚上就宣告结束了，在这次战役中，海因兹。古德里安将军用他的坦克初次显露头角。他的坦克在穿过走廊向东驰进的时候，在某一个地点遭到波莫尔斯卡骑兵旅的抗击，作者在几天以后来到现场，目睹了这场屠杀所留下的怵目惊心的惨象。它象征着整个短促的波兰战役。

战马与坦克搏斗！骑兵的长枪与坦克的大炮对抗！尽管波兰人英勇顽强，但在德军的进攻下却归于土崩瓦解。这是他们，也是全世界第一次领教闪电战的滋味：突然的奇袭；成群的战斗机和轰炸机在头顶上吼叫着，进行侦察和袭击，散布着烈火，制造成恐怖；斯图卡式战斗轰炸机俯冲时发出凄厉刺耳的声音；整师整师的坦克横冲直撞，如人无人之境，一天推进三、四十英里；能够迅速开炮的摩托化重炮甚至在坎坷不平的波兰道路上也能以每小时 40 英里的速度滚滚挺进；连步兵也行动神速，150 万乘坐机动车辆的大军，通过错综复杂的无线电、电话和电报网所组成的电讯系统统一指挥，协调行动，这真是人世间前所未见的机械化大屠杀。

不到 48 小时，波兰空军就被摧毁了。500 架第一线的飞机大部分没有来得及起飞就在自己的机场上被德国的轰炸机炸毁了。[626]地面设施全部被毁，大多数地勤人员死的死，伤的伤。波兰第二大城市克拉科夫于 9 月 6 日陷落。当天夜晚，波兰政府从华沙逃到卢布林。第二天，哈尔德就忙着拟制计划，准备把军队调往西线，虽然他并没有看到西线有任何动静。9 月 8 日下午，第四装甲师到达波兰首都外围；同时在这座城市的正南方，从西里西亚和斯洛伐克北上的莱希瑙将军的第十军团占领了基埃尔策，李斯特的第十四军团开到维斯杜拉河同散河汇流处的散多梅希。

不到一星期，波兰的陆军就被击溃了，波兰所来得及动员的 35 个师，绝大部分不是被击溃就是在包抄华沙的钳形攻势下陷入重围。现在留待德国人完成的“第二阶段”工作是：对那些在包围中张惶失措、溃不成军的波兰部队缩小包围圈并消灭他们；同时还要在东面 100 英里处完成另一个更大的钳形攻势，以包围布列斯特一立托夫斯克和布格河以西地区的波兰残部。

这一阶段从 9 月 9 日开始，到 9 月 17 日结束，包克的北方集团军的左翼向布列斯特一立托夫斯克进逼，古德里安的第十四军于 14 日到达那里，两天后攻占该城。9 月 17 日，这个军在布列斯特一立托夫斯克南 50 英里处的符沃达瓦同李斯特第十四军团的斥候部队会师，第二个巨大的钳形包抄攻势就在这里合围。这场“反功”，正如古德里安后来所说的，在 9 月 17 日就“完全见分晓了”，全部波兰军队，除了俄国边境上的一小撮而外，都已陷入包围之中。华沙三角地带和西边的波森附近还有被包围的波军在顽强抵抗，但

是他们失败的命运已经注定。波兰政府，或者说波兰政府的残余，在饱尝德国空军的轰炸与扫射之后，于 15 日逃到罗马尼亚边境上的一个村庄。对于这个政府和这个自尊的民族来说，一切都完了，只有那些仍旧坚持不屈的部队的士兵还在以令人难以置信的刚强精神继续牺牲。

现在轮到俄国人侵入这个备受蹂躏的国家，攫取它的一份赃物了。

俄国人侵入波兰

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像所有其他国家的政府一样，对德军在波兰的军事入侵进展得如此神速，感到大吃一惊。9 月 5 日，莫洛托夫以书面形式正式答复纳粹叫俄国从东方进攻波兰的要求时还说，苏联将在“适当的时机”出兵，但“这一时机现在尚未到来”。他认为“操之过急”会有损苏联的“事业”，不过他郑重提出，即使德国人先到了那里，他们也必须严守德苏条约秘密条款中一致同意的瓜分波兰的“分界线”。[①]由此可见，俄国对德国人是感到不放心的。同样也可以看出，克里姆林宫以为德国还需要经[627]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征服波兰。

但是在 9 月 8 日午夜 12 点敲过不久，德国的一个装甲师到达了华沙外围之后，里宾特洛甫给驻在莫斯科的舒伦堡发了一个“绝密”的“急”电，声称波兰战事“进展之神速甚至也出乎我们的预料”，因此德国希望知道“苏联政府的军事意图”。[②]次日下午 4 点 10 分，莫洛托夫作了回答，他说，俄国将“在最近几天之内”采取军事行动。同一天，这位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在作出上述答复之前就已经“为德军进入华沙”正式向德国人致贺了。[③]

9 月 10 日，莫洛托夫和冯·德·舒伦堡大使碰到了一个大难题。这位外交人民委员首先告诉德国大使，苏联政府“完全没有料到德国会如此迅速地取得军事胜利”，因此苏联现在处于“为难的境地”。然后他就提出了克里姆林宫用什么借口侵入波兰的问题。据舒伦堡打给柏林的“特急绝密”电来看，苏联准备用的借口是：

> 波兰正在瓦解，因此，苏联有责任援救受到德国“威胁”的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莫洛托夫说]为了使苏联在群众面前师出有名，同时避免使苏联看来像个侵略者，这样解释一下是必要的。

同时，莫洛托夫还抱怨说，据德意志通讯社最近的报道，冯·勃劳希契将军已宣布“德国东部边境上的军事行动已经没有必要”。莫洛托夫说，如果真是这样，如果战争真已结束，那么俄国“就不能再发动一场新的战争”。他对整个局势感到非常不痛快。[④]使得事情更加复杂的是，9 月 14 日，莫洛托夫把舒伦堡找到克里姆林宫来，通知他红军将在他们原先预计的时间之前出动，然后问他德国什么时候可以攻陷华沙。为了师出有名，俄国人必须等到波兰首都陷落之后才能出兵。[⑤]

这位人民委员提出了一些令人难以答复的问题。华沙将在什么时候攻

[①] 俄国答复的全文，见《德国外交政策 文件汇编》，第 8 卷，第 4 页。纳粹一 苏联这些照会来往有一部分载《纳粹 一苏联关系》，但《德国外交政策文件 汇编》所收较为全面。

[②] 同上，第 33—34 页。

[③] 莫洛托夫的贺电，同上，第 34 页。他关于军事行动的保证，第 35 页。

[④] 舒伦堡 9 月 10 日的电报，同上，第 44—45 页。

[⑤] 同上，第 60—61 页。

破？如果俄国出兵要把罪名归在德国身上，德国人愿意不愿意？9 月 15 日晚，里宾特洛甫通过德国大使转给莫洛托夫一份“特急绝密”电报，回答了这些问题。他说，德军在“最近几天之内”就可以占领华沙。德国“欢迎苏联现在就采取军事行动”。至于俄国打算找个借口把罪名推在德国身上，那是“绝对不行的……这种做法违反德国的本意……不合当初在莫斯科缔结的协定……而且会使两国以互相敌对的面目出现在全世界面前”“最后，他要求苏联政府确走他们进攻波兰的“日期和时间”。[6]

第二天晚间苏联政府就确定了出兵日期,在缴获的德国文件[628]中发现有舒伦堡的两份电报，叙述作出决定的经过，淋离尽致他说明了克里姆林宫的奸诈。

我在下午 6 点会见了莫洛托夫[舒伦堡在 9 月 16 日的电报中说]，莫洛托夫宣布，苏联即将进行军事干涉——也许就在明后天。斯大林正在同军队领导人开会……

奠洛托夫还说……苏联政府将提出以下的理由作为借口：由于波兰国家已经归子瓦解市不复存在，因此，同波兰缔结的一切协定也归于无效，第三国可能会利用目前出现的混乱局面。苏联政府认为，自己有责任进行干预以保护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族同胞，使这些不幸的人民有可能在和平的环境中安居乐业。

由于唯有德国可能是这里提到的“第三国”，舒伦堡对这种说法表示反对。

莫洛托夫承认，苏联政府提出的理由在德国人听起来确实有点不入耳，但他要求我们体谅苏联政府的苦衷，不要在这点小事上斤斤计较。苏联政府实在找不到其他的理由，因为苏联以前从来没有过问过住在波兰的少数民族同胞的情况，目前的干涉行为对外说来总得要找一个理由。[7]

9 月 17 日下午 5 点 20 分，舒伦堡又给柏林发了一个“特急绝密”电。

斯大林于两点接见了我……他告诉我说，红军将于 6 点钟越过苏联边界……苏联飞机将自今天起轰炸利沃夫（伦堡）以东地区。

当舒伦堡对苏联公报中的三点提出异议之后，那位俄国独裁者“立即欣然”做了修改。[8]

于是在 9 月 17 日早晨，苏联就开始蹂躏这个已经被打倒的国家了，理由就是上面那个站不住脚的借口——由于波兰已经不复存在，因而波苏互不侵犯条约也就不再有效，苏联必须保护它自己的利益以及波兰境内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少数民族同胞的利益。这还不算，苏联政府还通知莫斯科的波兰大使，俄国将在波兰冲突中严守中立！第二天，9 月 18 日，苏联军队和德国人在布列斯特一立托夫斯克会师了。正好是 21 年以前，诞生不久的布尔什维克政府曾在这里背弃了俄国和西方协约国的同盟关系,屈辱地接[629]受了德军极为苛刻的单独媾和条件。

现在他们虽然和纳粹德国狼狈为奸，从地图上抹掉了波兰这个古老的国家，但是俄国人马上就对他们的新伙伴产生了怀疑。斯大林在苏联发动侵略的前夕接见德国大使时就已经表示，他怀疑德国最高统帅部是否会烙守莫斯科协定而退回到双方一致同意的分界线上去。舒伦堡将这件事如实地报告了柏林。这位大使极力向他保证，要他放心，但是显然没有多大效果。“有鉴于斯大林的多疑是尽人皆知的，”舒伦堡在给柏林的电报中说，“最好能授

[6] 同上，第 68—70 页。

[7] 同上，第 76—77 页。

[8] 同上，第 79—80 页。

权给我再发表一个足以消除他最后疑虑的声明。”[9]第二天，9 月 19 日，里宾特洛甫电告那位大使，让他“告诉斯大林，德国一定遵守我在莫斯科签定的协议，我们把这个协定看做是德苏两国新的友好关系的基石”。[10]

虽然如此，这两位同床异梦的伙伴之间的摩擦并未停止。9 月 17 日，这两个伙伴在拟定一份联合公报为德苏共同消灭波兰的行为。洗刷”时，在措辞上又发生了分歧。斯大林反对德国人的底稿，因为，‘它把事情说得过于坦率了”。于是他提出了自己的一份不愧是诡辩杰作的草稿，硬要德国人接受。这份公报声称，德国和俄国的共同目标是“恢复由于波兰国家的崩溃而受到破坏的和平与秩序，协助波兰人民为他们的政治生活造成新的条件”。在寡廉鲜耻方面，希特勒碰着斯大林可以说是棋逢对手了。

这两个独裁者似乎一度打算以拿破仑的华沙大公国为蓝本，保留一个残存的波兰国家，以缓和世界舆论，但是 9 月 19 日莫洛托夫透露，布尔什维克对于这个问题正在重新考虑。他先对舒伦堡提出愤怒的抗议，指责德军将领无视莫斯科协定，企图攫取应归俄国所有的土地，接着就言归正传。

莫洛托夫暗示[舒伦堡在给柏林的电报中说]，苏联政府和斯大林本人已经放弃了原先允许一个残存的波兰存在的意图，现在想以皮萨河一那累夫河一维斯杜拉河一散河为界分割波兰。苏联政府希望立刻就这一问题进行谈判。[①]

由此可见，首先提出完全瓜分波兰，不许波兰人成为一个独立民族存在的，是俄国人，德国人当然求之不得。9 月 23 日，里宾待洛甫电告舒伦堡，叫他通知莫洛托夫，“俄国方面关于以著名的四河为界的主张同德国政府的看法完全一致”。他表示愿意再度[630]飞往莫斯科讨论与此有关的细节问题，并确定“波兰地区的最后结构”[①]。

这一次斯大林亲自主持谈判。他的德国盟友总算领教了他在这次讨价还价的谈判中是多么不讲情谊、寡廉鲜耻、不择手段，这一点，他的英、美盟友以后也会领教到。这位苏联独裁者于 9 月 25 日晚间 8 点在克里姆林宫召见了舒伦堡，这位大使回去以后，当夜就打电报给柏林，就某些严酷的现实问题提出警告，并且指出德国可能偷鸡不着蚀把米。

斯大林声称……他认为留下一个独立的残存波兰国家是错误的。他建议，从分界线以东的领土上，把一直延伸到布格河为止的整个华沙省划归我们所有。作为交换，我们应该放弃对立陶宛的要求。

斯大林……还说，如果我们同意，苏联将立刻依据 8 月 23 日的[秘密] 议定书着手解决波罗的海各国的问题，并且表示希望德国政府在这一方面给予慷慨的支持。斯大林特别指明了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不过没有提到芬兰：[②]

这是一桩狡猾而又狠毒的买卖。斯大林准备用已经被德国攻占的两个波兰省份交换波罗的海各国，他已经帮了希特勒一个大忙，使后者有了进攻波兰的条件，现在他要利用这一点，钻空子尽可能多捞一把。此外，他这样建议也是要求德国人把所有的波兰人全接过手去。他作为一个俄国人，从几百年的历史教训中深深知道：波兰人丧失了独立之后是决不会善罢甘休的。让德国人为他们伤脑筋去吧！俄国人才不管呢，而另一方面，他却可以取得第

---

[9] 舒伦堡的电报，同上，第 92 页。

[10] 同上，第 103 页。

[①] 同上，第 105 页。

[①] 同上，第 123—24 页。

[②] 同上，第 130 页。

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从俄国割走的波罗的海国家，它们的地理位置为苏联提供了绝妙的屏障，可以防御德国这个盟友的突然袭击。

里宾特洛甫于 9 月 28 日下午 6 点乘飞机第二次到达莫斯科,在前往克里姆林宫之前接到柏林打来的两份电报，知道了俄国人正在捣什么鬼。这是德国驻塔林的公使发来的电报，其中说，爱沙尼亚政府刚才通知他，苏联已经以“立刻发动进攻作为严重威胁手段”，要求在爱沙尼亚境内建立军事和航空基地。[①]当天深夜，里宾特洛甫同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作了长时间的商谈之后，打电报报告希特勒，“就在今夜”将缔结一项条约，根据这项条约两师红军和一旅空军将驻扎在“爱沙尼亚领土上；但在目前这段时间内暂不废除爱沙尼亚的政权”。但是，元首原是精于此道的老手，他清楚地知道爱沙尼亚的日子已是屈指可数了。第二天，里宾特洛甫就得到通知，希特勒已经下令撤退居住在爱沙尼亚以及拉脱维亚境内的 86000 名日耳曼族人。[②]

斯大林提出了他的帐单，希特勒不得不如数照付，至少暂时[631]如此。他立刻就放弃了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这两个地方是他在德苏条约中已经同意属于苏联利益范围之内的。这一天还没有过完，他又放弃了德国东北边境上的立陶宛，而根据莫斯科条约秘密条款的规定，这个国家是属于德国利益范围的。

这次会谈从 9 月 27 日晚上 10 点一直进行到深夜 1 点，斯大林向里宾特洛甫提出了两个方案，内容就像他在 25 日对舒伦堡提过的那样：第一个方案是接受原先沿皮萨河、那累夫河、维斯杜拉河和散河这四条河划定的波兰分界线，立陶宛归德国所有；第二个方案是把立陶宛让给俄国，交换条件是让德国取得更多的波兰领土（卢布林省以及华沙以东的土地），这样，全部的波兰人就几乎会全都归于德国。斯大林竭力建议德国选择第二种方案。里宾特洛甫于 9 月 28 日上午 4 点给希特勒发了一份很长的电报，提出这个问题，希特勒表示同意。

分割东欧需要进行相当复杂的绘制地图的工作，9 月 28 日下午进行了 3 个半小时的谈判，紧接着克里姆林宫就举行国宴招待里宾特洛甫，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提早退席去同应召来到莫斯科的拉脱维亚代表团举行会谈。里宾特洛甫趁这个时间赶到歌剧院去看了一幕《天鹅湖》，半夜又回到克里姆林宫为地图以及其他问题作进一步的商谈。第二天清晨 5 点，莫洛托夫和里宾特洛甫就在正式称为德苏边界友好条约的新协走上签了字。这时，斯大林再一次满面春风地在旁观看着，正像一个德国官员事后所报告的那样，“流露出显而易见的满意神情”。“他是有理由高兴的。[②]

公布的条约正文，宣布了两国在“前波兰国家”境内的“各自民族利益”的范围，并且声明，它们将在各自取得的领土上重建“和平与秩序”，并“确保当地居民享有适合本民族特征的和平生活”。

但是和上次德苏之间的交易一样，这一回也有“秘密议定书”，一共有 3 个议定书，其中两个包含着这次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个是把立陶宛划归苏联的“势力范围”，同时把卢布林和东华沙两省划归德国方面，第二个议定书说得简短扼要，内容如下：

[①] 两封电报，同上，第 147—48 页。

[②] 同上，第 162 页。

[②] 条约全文，包括秘密议定书、公开宣言、莫洛托夫和里宾特洛甫交换的两封信，同上，第 164—68 页。

双方在各自领土内不得容许波兰人从事影响对方领土的活动。双方将在自己的领土内扑灭此种活动的一切萌芽，并且将为此目的而采取的适当措施通知对方。[632]

于是波兰就像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一样，从欧洲地图上消失了，不过，这一次帮助和怂恿希特勒并吞一个国家的，却是那个长期以来一直以被压迫民族的维护者自居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这是波兰第四次受到德国和俄国（奥地利参预了其余几次）的瓜分”而在瓜分过程中，情形以这一次为最残酷无情。在 9 月 28 日的秘密议定书[①]”中，希特勒和斯大林一致同意，要在波兰实行恐怖统治，企图残酷地扼杀波兰的自由、文化和民族生活。

希特勒进行了波兰战争，并取得了胜利，但是更大的胜利者却是不费一枪一弹而坐享其成的斯大林。[②]苏联得到了将近半个波兰以及对波罗的海三国的控制权。它更加牢固地阻碍了德国，使德国不能达到它所垂涎的两个主要长远目标——乌克兰的小麦和罗马尼亚的石油，而德国要战胜英国的封锁所最急需的正是这两种东西。甚至希待勒渴望在波兰获得的波里斯拉夫一德罗戈贝奇油区也被斯大林要去了，斯大林仁慈地答应以相当于这一油区年产量的石油售给德国。

为什么希特勒付给俄国人这样高的代价？不错，为了使苏联不参加西方阵营，置身战争之外，他曾经在 8 月间作过这种诺言。但他从来不是一个言而有信的人，况且波兰现在已经被德国以举世震惊的武功征服了，他本来可以像军方所竭力主张的那样对 8 月 23 日的条约来一个不认帐,如果斯大林不答应，元首可以用刚为波兰战役所证明的全世界最强大的军队来威胁斯大林。但是他能够这样办吗：当英国人和法国人正在西方严阵以待的时候，他是不能这样办的。要对付英法，他就不能有后顾之忧。他此后的言论证明，这就是他让斯大林狠狠地敲了这样一笔竹杠的原因。但是，当他把注意力转向西线的时候，他并没有忘记这位苏联独裁者做交易这么心毒手辣。

[①] 条约虽然是 9 月 29 日清晨 5 点签字的，官方宣布的签定日期却是 9 月 28 日。

[②] 德国在波兰的伤亡数字，正式宣布的是，10572 人死亡，30322 人受伤，3400 人失踪。

第十九章　西线的静坐战

[633]

西线那里没有发生什么战事。几乎没有放过一枪。德国的老百姓开始把这种战争叫做“静坐战”)——Sitzkrieg。在西方，人们也很快就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假战争”。在这里，正如那位英国将军 J.F·C·富勒所说的，“世界上最强大的[法国]陆军，对峙的不过26个（德国]师，却躲在钢骨水泥的工事背后静静地坐着，眼看着一个唐·吉诃德式的英勇的盟国被人消灭了”[①]

对这种情况，德国人是不是感到意外呢？一点也不。陆军参谋总长哈尔德在8月14日最初那篇日记中就详尽地估计了一旦德国进攻波兰时西线方面可能出现什么情况。他认为法国“多半不会”采取攻势。他相信法国绝不会“不顾比利时人的意愿”假道比利时出兵。他的结论是，法国方面会继续采取守势。前面已经谈到，当9月7日波兰军队的失败已成定局的时候，哈尔德就已经忙于制定把德军西调的计划了。

那天晚上，他记下了勃劳希契那天下午同希特勒商谈的结果。

西方的动向尚不清楚，从某些迹象来看，没有真想打仗的意图……法国内阁缺乏果敢的气魄，英国方面也开始透露出在进行清醒考虑的迹象。

过了两天，希特勒发出了第三号作战指令，命令作好准备，让陆空军部队从波兰调往西线。但是不一定就打。指令规定“即使在英国……和法国迟疑地启衅之后，我军地面部队[或]……我方飞机每次越过西部国境，[以及]对于英国的每一次空袭，都必[634]须有我的明确命令”。[②]

法国和英国对波兰作过什么保证？在它一旦受到攻击时，它们将怎样做？英国的保证是泛泛的一般性的，但法国的保证是明确的。1939年5月19日的法波军事协定对此曾有明文规定。该条约载明，法国方面将“在总动员令下达后不出3天的时间内逐步对有限目标发动攻势”。如今总动员令已在9月1日宣布。条约还进一步规定，“一旦德国以主力进攻波兰，法国将从法国总动员开始后第15天起，以其主力部队对德国发动攻势”，当波兰副参谋总长雅克林兹上校问到法国能够派出多少部队参加这一大规模的进攻时，甘末林将军曾经告诉他，法国届时大约可以派出35个到38个师。[③]

但是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8月23日，当德国对波兰的进攻眼看就要爆发的时候，那位胆怯的法国统帅却告诉他的政府说，“要到大概不到两年以后……1941—1942年之间”他才可能发动一场真正的攻势，他还说，这是假定到那个时候法国能得到“英国部队和美国装备的帮助”。

的确，在战争一开始的几个星期内，英国能派到法国去的部队是少得可怜的。到了10月11日，波兰战事结束了3个星期以后，英国才派了4个师——158000人——到法国去。丘吉尔称之为“象征性的帮助”。富勒指出，直到12月9日英国方面才第一次有了伤亡——有一个外出巡逻的班长被击毙。富勒说：“自从莫利内拉和扎戈那拉之战以来还未见过这样不流血的战争。”*

那些德国将领们在纽伦堡法庭上追溯往事的时候，一致认为波兰战役期

[①] 富勒少将：《第二次世界大战》，第55页。引自《头一个四分之一》，第343页。

[②] 第3号指令全文，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入第8卷，第41页。

[③] 纳米尔著上引书，第459—60页。他在该书中引述了条约的法文文本。

间西方国家没有在西线发动进攻，是错过了千载难逢的良机。

[哈尔德将军说]只有几乎完全不顾我们的西部边境，我们才有可能在对波兰的进攻中取得胜利。如果法国人当时看出了局势的必然规律，利用德军在波兰交战无暇分身的这个机会，他们本来是有可能在我们无法防御的情况下跨过莱因河，威胁鲁尔区的，而鲁尔区对德国作战具有莫大的决定性意义。[4]

[约德尔将军也说]……如果说我们没有在 1939 年崩溃，那仅仅是由于[635] 在波兰战役期间，英法两国将近 110 个师在西方对德国的 23 个师完全按兵未动的缘故。[5]

对此，最高统帅部长官凯特尔将军补充道：

我们军人一直担心法国会在波兰战役期间发动进攻，结果感到非常惊讶，因为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假使法国进攻，他们所遇到的将会只是德国的一道军事纸屏，而不是真正的防御。[6]

那么，在西线对德军具有压倒优势的法军（最初的两个英国师直到 10 月初才部署好），为什么没有像甘末林将军和法国政府以书面保证的那样发动进攻呢？

说来原因很多：首先是法国最高统帅部、政府和人民当中的失败主义情绪；其次是法国人对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伤亡惨重、元气大伤记忆犹新，他们决心只要能够避免就一定要避免再遭受这样一场杀戮；第三，到 9 月中旬，波兰军队的惨败使他们感到德国人不久就能把优势兵力调往西线，从而把法国最初取得的一点进展一扫而空；还有就是对于德国武器和空中优势的恐惧心理。真的，法国政府从一开始就坚决要求英国空军不去轰炸德国境内的目标，生怕法国工厂会遭受到报复性的打击，殊不知对德国的工业中心鲁尔如果进行全力轰炸，很可能使德国遭到致命打击。许多德国将领后来承认，这是他们在 9 月间最担心的一件事。

从根本上来说，对于法国为什么没有在 9 月间对德国发动进攻这个问题，丘吉尔的话可能是最好的解答。他写道：“这场战争实际上早在几年以前就已经输掉了。”[7]1938 年在慕尼黑的时候，1936 年在德国重新占领莱因兰的时候，以及 1935 年在希特勒悍然不顾凡尔赛条约宣布实行征兵制的时候，就输掉了。由于盟国方面几次可悲地畏缩逡巡，如今就不得不付出代价，可是巴黎和伦敦却仿佛以为静坐不动就可能把那笔债躲过去似的。

但是在海上却有战斗。

德国的海军不像西线的陆军那样受到禁令的限制，在宣战的第一个星期内就击沉了 11 艘英国船舰，总吨位为 64595 吨，几乎等于 1917 年 4 月德国潜艇战最猖獗时英国在一周中所损失的半数，当时英国的处境岌岌可危。但英国的损失往后逐渐减少，第二个星期损失了 53561 吨，第三个星期为 12750 吨，而第四个星期只损失了 4646 吨——9 月份总计被潜艇击沉的船只为 26 艘并[636] 135552 吨，被水雷炸沉的为 3 艘共 16488 吨。”

这种损失的陡然减少，有一个原因是英国人所不知道的。9 月 7 日，雷德尔海军元帅同希特勒作了一次长时间的商谈。由于在波兰旗开得胜以及法

---

[4] 哈尔德在 1948 年 9 月 8—9 日在纽伦堡关于《政府各部案件》审讯中为被告们提出的证词，见《战犯的审讯》，第 12 卷，第 1086 页。

[5] 约德尔 1946 年 6 月 4 日在纽伦堡为自己辩护时所提出的证词，见《主要战犯的审讯》，第 15 卷，第 350 页。

[6] 凯特尔 1946 年 4 月 4 日在纽伦堡为自己辩护时所提出的证词，同上，第 10 卷，第 519 页。

[7] 丘吉尔：《风暴欲临》，第 478 页。

国并未在西线发动进攻而大喜过望的希特勒，叫海军把步子放慢一些。法国表现了“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克制”，英国人也在“举棋不定”。鉴于这种情况，德国人决定大西洋上的潜水艇毫无例外地放过一切客船，完全禁止对法国船进行攻击，并命令在北大西洋的“德意志”号和在南大西洋的“斯比伯爵”号两只袖珍战舰暂时撤到“待命”的基地。雷德尔在日记中写道：

“总的政策是实行克制，等待西方的政局进一步明朗化，这大约需时一星期。”⑧

“雅典娜”号的沉没

希特勒同雷德尔在 9 月 7 日的会上还作出了另一项决定。那位海军元帅在日记里写道：“等到所有潜艇返航后再着手解决‘雅典娜’号事件。”

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海上的战争是在英国宣战 10 小时以后开始的，当时，9 月 3 日晚上 9 点，满载 1400 名乘客的英国邮船“雅典娜”号在赫布里底群岛以西约 200 英里处未获警告就被鱼雷击沉了，当时造成 112 人死亡，其中有 28 名美国人。德国宣传部接到伦敦发出的第一批消息之后就到海军总司令部去查对，海军总司令部的回答说，出事地点附近并没有德国潜艇，于是宣传部当即否认那艘船是德国人击沉的。这一不幸事件弄得希特勒和海军司令部非常尴尬。起初他们还不相信英国方面的报道，因为他们曾经下令所有潜艇舰长遵守海牙公约，不得不予警告就攻击船只。但是由于所有潜艇的无线电台为了保密的缘故全都保持沉默，无[637]法立刻查明事情真相。“虽然如此，不到两天，纳粹的御用报纸就叫嚷说，这艘客船是英国人为了激怒美国使其参战而自行炸沉的。

威廉街的确非常关心美国方面对这次造成 28 名美国公民死亡的惨祸的反应。炸沉船只后的第二天，国务秘书威兹萨克约见了美国代办亚历山大·寇克，向他否认这是德国潜艇干的事。他强调说，在出事地点附近没有一艘德国舰艇。据他后来在纽伦堡供认，当天晚上他找到了雷德尔，提醒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就是因为德国击沉了“卢西坦尼亚”号后美国才参战的，劝他“尽一切努力”避免激怒美国。那位海军元帅向他保证，“不可能有任何一艘德国潜艇牵涉在内”。⑨

雷德尔海军元帅在里宾特洛甫的催促下，于 9 月 16 日把美国大使馆海军武官请到他那里，告诉他说他现在已经收到了所有潜艇的报告，“结果肯定证实“雅典娜”号绝不是德国潜艇击沉的”。他要求这位武官将这一情况转告他的政府，这位武官即刻就照办了。* ⑩ 这位海军元帅说的并不完全是实话。9 月 3 日出海活动的潜艇还没有全部返航回港，没有返航的潜艇里就包括兰普少校指挥的 U 一 30 号在内，这艘潜艇直到 9 月 27 日才进入本国领海停泊。潜艇司令卡尔·邓尼茨海军上将亲自在码头上等着这艘潜艇人港。几年以后他在纽伦堡法庭上叙述了这件事情，这才使击沉“雅典娜”号的真相

---

⑧ 《海军事务元首会议记录》，1939 年，第 16—17 页。

⑨ 威兹萨克所写关天他同寇克谈话的 报告，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 第 8 卷，第 3—4 页。另见他在纽伦堡 所作的关于他同雷德尔谈话的证词， 载《主要战犯的审讯》，第 14 卷，第 278 页。

⑩ 同上，第 35 卷，第 527—29 页（纽伦 堡文件 804—D）。这项文件中收有雷 德尔关于这次谈话的报告，也有美国 海军武官给华盛顿方面的电报。

大白于天下。

当那艘潜艇入港时，我在威廉港的水闸边上见到了舰长兰普少校，他要求和我个别谈话。我立刻注意到他那副郁郁不乐的神情，他马上告诉我说，在北部海峡海面击沉了“雅典娜”号的大概是他。按照我原先的指示，他当时在对不列颠群岛的航线入口上可能出现的武装商船进行严密警戒，他用鱼雷击沉了一条船，事后从无线电广播中才知道这条船就是“雅典娜”号，当时他还当它是一条正在巡逻的武装商船……

我立刻派兰普坐飞机到柏林去向海军作战参谋部面陈一切。同时，我采取临时措施，命令严守秘密。当天深夜，也就是第二天清早，我接到海军上校弗立克转来的一个命令：

1.这一事件应予彻底保密

[638]2.海军总司令部认为并无召开军事法庭的必要，因为司令部已经查明，该舰长的这一行动并非有意。

3.政治上的解释将由海总处理。”

至于元首否认德国潜艇击沉“雅典娜”号的政治宣传活动，我完全没有参预[①]。

邓尼茨必定打一开始就猜到了事情真相，否则他不会到码头上去迎候返航的U-30号。他说没有参预，实际上却参预了消灭一切可能泄露秘密的证据的活动，篡改了该潜艇的航海日志和他自己的日记。正如他在纽伦堡供认的，他本人曾命令把U一30号的航海日志上任何提到“雅典娜”号的话都涂掉，同时也把自己的日记里与此有关的话删去。他还要艇上全体人员立誓绝对保密。[③]

毫无疑问，所有国家的最高统帅部在战争进行期间都有不可告人的事。所以，如果希特勒像雷德尔海军元帅在纽伦堡所供认的那样，命令对“雅典娜”号事件严守秘密，也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不是值得称赞的话，尤其是海军司令部开始时由于确实相信这事不是德国潜水艇干出的，已经正式否认了，如果后来又迫不得已而加以承认，就会处于非常难堪的境地。但是希特勒却不以此为满足。10月22日星期日晚上，宣传部长戈培尔亲自在电台上指控丘吉尔自己炸沉了“雅典娜”号。戈培尔当时那篇广播演说，作者至今还记得很清楚。第二天，纳粹官方报纸《人民观察家报》，在第一版上以《丘吉尔自己炸沉了“雅典娜”号》为标题发表了一篇报道，声称英国海军大臣在那艘船的船舱里安放了一颗定时炸弹，在纽伦堡的审讯中证实，这篇广播和文章是直接出自希特勒的命令；同时也证实了，尽管雷德尔。邓尼茨和威兹萨克对于这种厚颜无耻的弥天大谎感到非常不满，却不敢表示什么意见。[①]

外交部里这位自命反纳粹的领导人和这两位海军将领，只要那位恶魔般

[①] 邓尼茨在纽伦堡的画押供词，见《纳 粹的阴谋与侵略》，第7卷，第114—15页（纽伦堡文件638—D）。

[③] 该潜艇上的军官（包括兰普在内）和一部分水兵，被调到U一110号潜艇上以后，在1941年5月9日随同潜艇一道沉没了，但U一30号潜艇上有一名水兵，在击沉“雅典娜”号后下几天被飞机射伤了。在他保证严守机密的条件下，他们在冰岛雷克雅未克把他送上了岸，后来又被送到了加拿大的一个战俘营里。战后他提供1份画押的供词说明了事情的真相。看来德国人一直担心他会“说出去”，但他守口如瓶直到战争结束。

[①] 雷德尔在纽伦堡的证词，见《主要战 犯的审讯》，第14卷，第78页；威兹 萨克在纽伦堡的证词，同上，第277， 279，293页；汉斯·弗里茨彻（宣传 部的一位高级官员后来在审讯中被 宣告无罪）在纽伦堡的证词，同上，第 17卷，第191，234—35页。《人民观 察家报》的文章载《纳粹的阴谋与侵 略》，第5卷，第1008页（纽伦堡文 件3260—PS）。戈培尔的广播，见 《柏林日记》，第238页。

的纳粹统帅一声令下就会立刻俯首帖耳、唯命是从，其他将领们也完全一样。这种态度注定要在德国的历史上造成最黑暗的一页。

希特勒的和平建议

“今晚的报纸公开地大谈其和平”，我在 9 月 20 日的日记里写道，“今天我和一些德国人交谈，他们全都满怀信心，不出一个月我们就会得到和平。他们个个兴高采烈。”

头一天下午，我在富丽堂皇的但泽市政厅里听了希特勒的演：639＝说。这还是他自从 9 月：日在国会宣告战争开始以来的第一次公开讲演。尽管他因为保卫华沙的波军还在英勇抵抗，使他不能在华沙发表这篇演说而感到恼火，尽管他每次在演说中提到大不列颠时都恨得咬牙切齿，但是他仍然作出了一点点和平姿态。“我无意同英国和法国作战。”他说，“我同情那些在前线上的法国士兵，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战。”最后他祷求“保佑我们取得胜利的万能的上帝让别国人民认清这场战争将是多么的无谓……让他们想一想和平的幸福”。

9 月 26 日，华沙陷落的前一天，德国的报纸和电台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和平攻势。根据我当时的日记，其要点是：“为什么英、法现在要打仗呢？没有理由要打仗。德国对西方并无野心。”

两天以后，俄国一边狼吞虎咽地并吞划归它名下的那一块波兰土地，一边也加入了这场和平攻势。随同德苏边界友好条约及其瓜分东欧的秘密条款的签定,莫洛托夫和里宾特洛甫于 9 月 28 日又在莫斯科合伙拟制并签定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和平宣言。

宣言说，德苏两国政府

> 在最终解决了由于波兰国家瓦解而产生的各种问题，为东欧的持久和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之后，共同表示确信，德国与英、法两国之间终止战争状态将有助于增进世界各国人民的真正利益。两国政府将为此目的共同努力……务求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
>
> 但是，如果两国政府的努力竟然归于无效，这就表明英、法两国应对战争的延续负责……

希特勒是真要和平呢，还是想继续打下去，借苏联的帮助把延续战争的责任推到西方同盟国家身上呢？他嘴上虽然说得很肯定，但是大概连他自己也不十分清楚。

9 月 26 日他同仍然没有放弃和平努力的达勒鲁斯作了一次长谈，两天以前，这位不知疲倦的瑞典人在奥斯陆会见了老朋友奥吉尔维·福比斯。福比斯是前英国驻柏林大使馆的参赞，现任挪威首都英国公使馆参赞。据施密特博士的一份秘密备忘录说[①]，达勒鲁斯报告希特勒，福比斯曾经对他说，英国政府在寻求和平。唯一的问题只是：怎样才能保全英国人的面子？

“假使英国人果真希望和平”，希特勒回答道，“他们能在两星期内得到和平而又不会丧失面子。”

元首说，他们必须承认一个事实：“波兰已经不可能重新站起[640]来了。”他说除了这一点必须承认之外，他准备保证“欧洲其余部分”的现状，包括保证英国、法国以及低地国家”的“安全”。接着就讨论到如何提出和谈的问题。希特勒主张由墨索里尼出面。达勒鲁斯以为荷兰女王可能更为“中

[①] 施密特关于这次谈话的报告，见《德 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 8 卷，第 140—45 页。

立”一些。当时也在场的戈林建议，英、德两国代表先在荷兰秘密会见，如果他们取得了进展，然后再由女工正式邀请两国参加停战谈判。希特勒曾经好几次表示他怀疑“英国是否有意于和平”，但最后还是同意了那位瑞典人的办法，由后者“在第二天就到英国去按指定的方向进行试探”。

“英国人可以得到和平，如果他们想要的话，”希特勒在达勒鲁斯临走的时候对他说，“不过，他们得要赶快。”

这只是元首的一种想法。他还对他的将领们谈出来了另外一种想法。前一天，9 月 25 日，哈尔德在日记里提到，他得到“元首计划在西线发动进攻的消息”。9 月 27 日，也就是希特勒刚向达勒鲁斯保证他准备同英国讲和的第二天，他就在总理府召集武装部队的司令官们开会，告诉他们说他已经决定“尽快地在西线发动进攻，因为法、英联军现在还没有作好准备”。据勃劳希契说，他甚至规定了进攻的日期——11 月 12 日。[①]毫无疑问，那一天希特勒被华沙终于投降的消息冲昏了头脑。他大概以为，至少法国会和波兰一样容易屈服，虽然两天以后，哈尔德在日记中提到要向元首“解释”，“波兰战役的战术不能依样画葫芦地适用于西线。对一支组织严密的军队不能这样打”。

10 月 1 日齐亚诺在柏林同希特勒作过一次长谈，对这位总理的心理了解得最透彻的，也许就要算他了。这位年轻的意大利外交大臣现在虽然已经对德国人厌恶透顶，但是还是不得不维持着表面关系，他发现这位元首充满了自信。齐亚诺说，他讲述自己的计划时，“只要提到他作战的手段和方法，两眼就闪射着凶狠的光芒”。这位意大利贵宾在总结他对希特勒的印象时写道：

……今天，在取得重大胜利之后，使他的人民得到巩固的和平，也许仍然是希特勒所向往的一个目的。但是如果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要他牺牲自己认为理所应得的胜利果实，哪怕是牺牲一点点，他也会毫不犹豫地宁愿再打一仗的。* [①]

[641] 当我坐在 10 月 6 日中午开幕的国会中聆听希特勒发表他那和平的呼吁时，心里感到好像是在听一张已经放了五、六遍的老唱片。我已经三番四次地听到他每逢凯旋归来以后就在这同一个讲坛上，用同一种表面上听来非常诚恳真挚的调子提出和平建议；这些话如果你没有想到当时那次的受害者，听起来的确是合情合理的。在这个天高气爽、阳光灿烂的秋日，他又像往常那样鼓起如簧之舌，摆出伪善的面孔，重弹老调。那是一篇冗长的演说，是他生平最为冗长的公开演说之一。他先用了一个多小时对历史作了典型的歪曲，并且把德国在波兰（“这个不成体统的国家”）的赫赫武功大大吹嘘了一番，然后在快要结束的时候，提出了他的和平建议及其理由：

我的努力主要是使我们同法国的关系摆脱一切恶意的痕迹，使这种关系能为两国所接受……德国对于法国不再有进一步的要求……我甚至已经不愿再提阿尔萨斯一洛林问题……我一直向法国表示愿意永远埋葬彼此之间的旧仇宿怨，并使这两个具有光荣历史的国家互相接近……

对英国呢？

我也作了同样多的努力来争取英德之间的谅解以至友谊。我从来没有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作过任何违反英国利益的事情……我在今天仍然相信，只有德国同英国达成谅解，欧洲和全世界才可能有

[①] 勃劳希契在纽伦堡的证词，见《主要 战犯的审讯》，第 20 卷，第 573 页。最 高统帅部作战日记的一条批注证实 了这段引语。

[①] 《齐亚诺日记》，第 154—55 页。另见《齐亚诺外交文件集》，第 309—16 页。

真正的和平。

关于和平呢？

为什么要在西方打这场战争呢？是为了恢复波兰这个国家吗？凡尔赛和约的波兰是不会再出现了……重建波兰国家的问题不能通过西方的战争来解决，而只能由俄国和德国来解决……波兰在刚刚诞生的时候就被一切非波兰血统的人称为先天不足的流产儿，为了重建这样一个国家而牺牲千百万人的生命和破坏价值亿万的财富，是一种愚蠢的行为。

还有什么别的理由要打仗吗？……

如果这一场战争的真正日的仅仅是为了更换德国的政权的话……那么，这将不过是白白地牺牲千百万人的生命罢了……的确，西线的这一场战争是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的……

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有的，希特勒开了一大张清单：“建立一个波兰国家”（事实上他已经和俄国人商量好不许这样一个国家存在了）；“解决和了结犹太人问题”；德国的殖民地问题；恢复国际贸 [642]易的问题；“无条件地保证和平”；裁减军备；“对于空战、毒气、潜艇等等的限制”；解决欧洲少数民族的问题。

他建议欧洲几个大国举行一次“经过最充分的准备的”会议来“解决这些重大问题”。

这样一个会议行将决定本大陆今后许多年的命运[他继续说道]，在大炮轰鸣下，在军队被动员起来对它施加压力时，是决不可能深思熟虑地审议问题的。

可是，如果这些问题迟早一定要解决，那么，在千百万人被送去作无谓的牺牲和数以亿计的财富化为灰烬之前来解决这些问题，是比较明智的。让西方目前的事态发展下去，其后果是难以设想的。不久,每天的牺牲将不断增长……欧洲的国民财富将为炮弹浪费殆尽,各国的元气将在战场上耗竭……

有一点可以肯定。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同时出现过两个胜利者，而两败俱伤的例子倒是屡见不鲜，但愿那些恃有相同见解的人民及其领袖现在就作出他们的回答。让那些认为战争是更好的解决办法的人拒绝我伸出的手吧。

这里，他指的是丘吉尔。

但是，如果丘吉尔先生及其追随者的意见占了上风，这番话将是我最后的一次声明。这样一来，我们就将打下去……在德国的历史上永远不会有第二个 1918 年 11 月。

我从国会回来以后就在日记上写道,据我看来英国人和法国人会不会‘花 5 分钟的时间”来考虑这个笼统而含糊的建议，是很值得怀疑的。但是德国人却很乐观。那天晚上我去作广播时，在路上买了一份早出版的《人民观察家报》。花体字的标题是：

德国希望和平——德国对英法没有战争意图——除殖民地以外，德国再无英他修正凡尔赛和约的要求——裁减军备——同欧洲所有国家合作——建议举行谈判。

现在我们从德国的秘密档案中知道，当时威廉街陆续通过西班牙和意大利驻巴黎的大使得到那方面传来的报告，因而满心相信法国人没有胃口把这场战争打下去。早在 9 月 8 日，西班牙大使就暗中通知德国人说，庞纳“鉴于法国人普遍厌战，打算一俟[643]波兰战事结束就设法达成一项谅解。有可信的迹象表明，他正在为此目的同墨索里尼保持接触”。[①]

10 月 2 日，阿托利科把意大利驻巴黎大使最近打来的一份电报的抄件交给了威兹萨克，内中说，法国内阁大多数阁员赞成和谈，目前主要的问题是

---

①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 8 卷，第 24 页。

如何“使法国和英国能够保全面子”。不过，达拉第总理显然不在这个大多数之列。*[2]

这是个很可靠的情报。

10月7日，达拉第答复了希特勒。他宣布，法国在没有得到关于“真正的和平与普遍的安全”的确实保证以前，将不放下武器。不过，希特勒更关心的并不是这位法国总理的答复，而是张伯伦的反应。10月10日，在体育馆主持冬赈活动的开幕典礼的简短演说中，他再一次强调声明，他“随时准备接受和平”。他补充道，德国方面“没有理由要同西方国家打仗”。

张伯伦于10月12日作出了回答。这个回答对德国人民如果不是对希特勒——来说，不啻迎头一盆凉水。*那位首相在下院发表了一篇演说，说希特勒的建议是“含糊而不可靠的”，并且指出，“这些建议没有提到如何纠正对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所犯下的错误的问题”。他说，“德国现政府”的诺言不能信赖。如他们果真要求和平，“就应该有行动上的表现，而不仅是在口头上说说”。他要希特勒拿出“令人信眼的证据”来表明自己对和平的诚意。

希特勒的诺言再也不能欺骗这位慕尼黑妥协者了。第二天，10月13日，德国发表了一份正式声明，宣布张伯伦拒绝了希特勒的和平建议，执意选择了战争的道路。这位纳粹独裁者现在算是有了进行战争的借口了。

实际上，我们现在从缴获的德国文件中知道，希特勒不等那位首相作出答复就发布了准备立刻在西线发动进攻的命令。

10月10日，他召见了军事将领们，对他们宣读了一份相当长的备忘录。说明了战争的局面和世界的形势，并把第六号作战指令扔给了他们。[1]

这位元首原来在9月底固执地提出要在西线尽早发动进攻的要求，曾使陆军司令部陷入一片慌乱。勃劳希契和哈尔德在其他几位将领的支持下，曾经共同去向希特勒解释，立刻发动攻势是[644]办不到的，他们说，整修在波兰用过的坦克就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托马斯将军以具体数字说明德国每月缺钢60万吨。军需总监冯·施图尔纳格尔将军报告说，手头的军火只“够我们1/3的部队打14天之用”——要在14天内打败法国人显然是不可能的。但是当那位陆军总司令和那位参谋总长于10月7日就陆军方面的弱点提出正式报告时，元首却不予理睬。约德尔将军是最高统帅部里仅次于凯特尔的第二名唯命是从的应声虫，他警告哈尔德说，由于陆军反对在西线立即发动进攻，“一场严重的危机可能正在酝酿中”，元首“由于军人不服从他的命令非常恼火”。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希特勒于10月10日上午11点召集将领们举行会议，会上根本没有征询他们的意见。注明为前一天签发的第六号指令告诉了他们应当怎样行动：

绝　密

如果最近的未来事态表明，英国以及跟在它后面的法国无意于结束这场战争，我决心不作多大耽搁就采取有力的进攻性的行动……

因此，我命令：

---

[2] 同上，第197—98页。

[1] 希特勒的备忘录，见《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7卷，第800—14页（纽伦堡文件L—52）；第6号指令，见《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6卷，第880—81页（纽伦堡文件C—62）。

1.为穿越卢森堡、比利时和荷兰地区的……攻击战作好准备。必须尽早……实现这一攻击。

2.其目标在于尽量歼灭法国作战部队以及与其并肩作战的同盟国部队；同时，在荷兰、比利时以及法国北部尽可能多占领土地，以便作为对英国进行有利的空战和海战的基地……

我要求三军总司令尽快根据本指令制定计划，向我提出详细报告，并把各种情况随时报告我……

希特勒在把指令交给他的军事将领们之前，曾向他们宣读了签署日期同为10月9日的秘密备忘录,这份备忘录是这位前奥地利下士所写的令人印象最深的文件之一。这份备忘录不仅表明希特勒从德国人的观点出发对于历史的理解，还表明他有杰出的军事战略和战术思想，同时也表明他对于西线战事的发展与结果具有预见，这一点不久就将得到证实。他说，自从1648年的缪恩施特（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结束了德意志第一帝国以来，德国同西方国家之间就一直在进行着斗争，这是“一场无论如何都要打个明白的斗争”。但是，自从在波兰取得了重大胜利之后，只要不“危及”德国在波兰的既得利益，“我们并不反对立刻结束战争”。

但是研究这一方面的可能性，哪怕是对这种可能性加以考虑，都不是本[645]备忘录的目的，我只准备谈另一个问题：继续战斗的必要性……德国的战斗目标，是从军事上一劳永逸地迅速解决西方问题；也就是说，摧毁西方国家的力量和能力，使之永世不能再反对德国人民在欧洲的国家巩固和进一步发展。

这一长远目标对外讲来在宣传上将不得不作种种适应……这并不改变我们的战争目标。这个目标现在是而且永远是摧毁我们的西方仇敌。

将领们对这样仓促地在西线发动进攻曾经表示反对。可是他告诉他们，时间是站在敌人那一边的，他提醒他们，波兰的胜利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德国实际上只有一条战线。这种形势仍未改变——但是又能维持多久呢？

没有任何条约或协定能够有把握地保证苏俄永远保持中立，目前，一切情况都不利于俄国放弃中立。但过了8个月、1年，乃至于几年，这种局面就可能会改变。近年来，各方面的情形都说明条约的不足凭信。防御俄国进攻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及时地显示德国的力量。

至于意大利，“意大利支持德国是否有希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墨索里尼是否活着，以及德国是否能有更大的新胜利去吸引那位领袖。在这里，时间也是个因素。比利时和荷兰的情况也是如此，这两个国家有可能在英、法的压力下放弃中立，这是德国不能坐待其发生的事情。甚至对美国来说，“也应当认为时间是不利于德国的”。

希特勒承认，持久战对德国有很大的危险，他列举好几个危险的因素。友好的和不友好的中立国家（他好像主要考虑的是俄国、意大利和美国）有可能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那样被拉到敌对的一边去。而德国“有限的粮食和原料基地”，也会使德国难于取得“物资进行战争”。他说，最大的危险是鲁尔的地理位置易受攻击。一旦德国这个工业生产的心脏遭到破坏，就会“导致德国战争经济的崩溃，从而丧失抵抗能力”。

必须承认，在这篇备忘录里，那位前奥地利下士一方面显示了他对于战略战术的惊人理解力，可是同时也显示了他为人丝毫不讲道德。有好几页论述了坦克和飞机在波兰战役中所发展的新战术，并且详细地分析了这种战术如何在西线战场上运用以及具体地在什么地方运用。他说，最主要的是避免1914—1918年的那种阵地战。装甲部队必须用来进行决定性的突破。

不得使装甲部队陷身于比利时城镇的迷魂阵般的大街小巷中。根本不必用它们去攻城，而是……用来保持大军通畅无阻地前进，并在找出敌方防[646]守薄弱的阵地后以密集的兵力进行大规模的突破，以打破战线僵持不下的局面。

这对未来西线战局是惊人精确的预测，今天读到它的时候，人们不禁要问，在当时的盟国方面为什么就没有一个人能有这样的见地？

希特勒在战略方面的见地也是卓越的，他说，“唯一可能进攻的地区”是通过卢森堡、比利时和荷兰，首先应该记住两个主要的军事目标：摧毁荷、比、法、英的军队，从而在海峡沿岸和北海之滨取得立足之地，这样德国空军就可以从这里起飞对英国进行“无情的轰炸”。

他回过头来又谈战术问题时说，最重要的是随机应变！

这一战役的特殊性质，可能使我们有必要最高度地运用随机应变的策略，在某些地点需要集中超过一般比例的进攻或防御的兵力[比如坦克或反坦克部队].而在另外一些地方又需作低于一般比例的集中。

至于进攻的时间，希特勒告诉他的那些满心不情愿的将领们说，“不能开始得大早。但是只要有可能，无论如何必须在今秋发动”。

德国的海军将领们与陆军将领们不同，尽管英国舰队占有压倒优势，但是他们在采取攻势方面却无须希特勒的任何催促，事实上，在从 9 月末到 10 月初的那些日子里，雷德尔一直不断地在要求元首解除对海军活动的限制。这一点是慢慢实现的。9 月 17 日，一艘德国潜艇在爱尔兰西南击沉了英国的航空母舰勇敢号。9 月 27 日.雷德尔命令袖珍战舰德意志号和斯比伯爵号离开待命地区，对英国船运开始进攻。到 10 月中旬，它们就已经击沉了七艘英国商船，卤获了一艘美国船弗林特市号。

10 月 14 日，德国潜艇 U—47 号在古恩特·庇里恩少校指挥下，突破了英国重要的海军基地斯卡帕弗罗港看来无法突破的防御，用鱼雷击沉了停泊在港内的皇家橡树号，这艘战舰上有官兵 786 人殉难。这一了不起的成就，提高了海军在希特勒心目中的地位，戈培尔博士利用这件事大吹大擂了一番。

但是陆军将领方面的情况仍然是一个问题。尽管希特勒给他们写了一长篇考虑周密的备忘录，尽管发下了第六号指令要他们作好准备以便立即在西线发动攻势，他们仍然想方设法地规避。这倒不是因为他们对于侵犯比利时和荷兰有什么道德上的顾忌，而只是因为他们对在这个时候进攻是否能取得胜利深为怀疑。但是也有一个例外。

在莱因河上和沿着马奇诺防线与法军对峙的 C 集团军司令威廉·里特·冯·李勃将军，不仅对于西线的胜利表示怀疑，而且，就现有的材料来看，当时唯有他至少部分从道义立场出发反对进攻中立的比利时和荷兰。在希特勒召见陆军将领们的第二天，即 10 月 11 日，李勃自己写了一份长长的备忘录，把它分送给勃劳希契和其他将领。他写道，全世界都会反对德国，因为

它在 25 年之内第二次进犯中立的比利时！德国政府仅仅在几星期以前还信誓旦旦地保证维护并尊重这种中立！

当他从军事上详细申述了不能在西线发动攻击的理由之后，最后他发出了和平的呼吁。他说，“全国都渴望和平”。[①]

但是，这时候希特勒却渴望战争和厮杀，他认为将领们的那种怯懦是不可原谅的，使他感到腻烦。10 月 14 日，勃劳希契同哈尔德聚首长谈了一次。那位陆军总司令觉得目前有“三种可能：进攻、观望、根本性的变化”。哈

[①] 全文载《战犯的审讯》，第 10 卷，第 864—72 页（纽伦堡文件 NOKW—3433）。

尔德在他那天的日记里这么记着，后来在战后他解释说，所谓“根本性的变化”指的是“除掉希特勒”。但是主性怯懦的勃劳希契认为这种激烈的办法“本质上是消极的，并且会使我们处于挨打的地位”。他们最后认为，这三种选择都不能提供“决定性胜利的前景”。唯一可做的是继续在希特勒身上下功夫。

勃劳希契于 10 月 17 日再次谒见了元首，但是他告诉哈尔德说，他的争辩毫不起作用，事情已“毫无希望”。哈尔德在那天的日记里写道，希特勒直截了当地告诉他说：“英国人只有在挨了打以后才会坐下来谈判。我们应该尽快地给他们几下子。进攻日期最迟不得超过 11 月 15 日到 20 日。”

此后又同这位纳粹统帅谈了几次，他终于在 10 月 27 日对将领们宣布了不可更改的决走。在一次授勋仪式上，希特勒将铁十字骑士勋章授给 14 名将领之后，就开始布置西线进攻事宜。当勃劳希契试图说明陆军需要 1 个月也就是要到 11 月 26 日才能准备就绪时，希特勒的回答是“那太晚了”。他命令进攻必须在 11 月 12 日发动。那天散会回来，勃劳希契和哈尔德垂头丧气。那天晚上，他们互相安慰了一番。“勃劳希契显得疲惫而又沮丧，”哈尔德在日记里写道。

推翻希特勒的佐森“密谋”

密谋分子们再一次立即开始行动的时刻到来了，或者说，他们自以为是到来了，发愁的勃劳希契和哈尔德，面临着严酷的抉择：或者是采取他们在 10 月 14 日所想到的第三种“可能”（即除掉希特勒），或者是在西线发动他们认为会给德国带来灾难性后果[48]的进攻。军队和文职机关中所有突然活跃起来的“密谋者”都力主走第一条道路。

战争爆发以来，他们已经遭到过一次挫折。在进攻波兰前夕，早已退休的冯·哈麦施但因将军又暂时被起用，在西线担任一个司令官的职务，战争开始的第一个星期，他曾经竭力邀请希特勒到他的司令部去视察一下，以表示在进攻波兰的时候他并没忽视那条战线。实际上，哈麦施但因将军，这个希特勒的死对头，是想要把他抓起来。费边·冯·施拉勃伦道夫早在 9 月 3 日英国政府宣战的那一天，就在柏林阿德隆饭店匆忙会见奥吉尔维·福比斯的时候，把这个阴谋悄悄地告诉了他。但是那位元首已经嗅出气味不对，谢绝了那位前陆军总司令的邀请，并且过了不久就把他撤掉了。①

但密谋分子们仍然同英国人保持着联系。他们没有能够采取行动阻止希特勒消灭波兰，他们现在集中力量于避免战事向西蔓延。文职密谋分子比以前更清楚地认识到，在德意志帝国中，唯有军队有办法制止希特勒。随着总动员和在波兰取得的闪电般的胜利，军队的力量和地位有了极大的增长。但是正如哈尔德对那些文职密谋分子所解释的，由于编制扩大，军队也有它不方便的一面。军官队伍中增添了大量的预备役军官，而他们当中很多是狂热的纳粹分子。同时部队的士兵又全都被灌了一脑袋的纳粹思想。哈尔德指出，要找到一支可以信赖的并且肯于反抗元首的部队是不容易的。无论是对敌人还是对朋友，哈尔德都是一个善于强调困难的人。

将领们还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文职密谋分子认为也完全应当考虑。就

---

① 这个密谋见施拉勃伦道夫著上引书，第 25 页；另见吉斯维乌斯著上引书，第 431 页。

是如果他们发动一次反对希特勒的政变，英法是不是会利用政变在军队和国家中所造成的混乱，从西线大举入侵，占领德国？并且，虽然他们已经推翻了那个罪魁祸首，英法是否仍然会向德国人民提出苛刻的靖和条件？因此，有必要同英国人保持联系，以便取得明确的谅解，使西方盟国不利用德国反纳粹的政变趁火打劫。

他们通过好几条途径同英国人接触。其中韦一条途径是由约瑟夫·缪勒博士通过梵蒂冈发展出来的。这位博士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慕尼黑的第一流律师，体格魁伟，精力旺盛，而且有股蛮劲儿，所以在年轻时得到过“蛮牛约瑟夫”的绰号。他在谍报局奥斯特上校的默许下，于 10 月初曾经到罗马作了一次旅行，在梵蒂冈同英国驻教廷公使建立了联系。据德国人说，他不仅取得了英国的保证，并且还得到了教皇的诺言，同意在新的反纳粹德国政权和英国之间充当调停人。[①]

另一个接触点在瑞士的伯尔尼。威兹萨克派了不久以前曾任[649]德国驻伦敦代办的西奥多·科尔待当德国驻瑞士公使馆的参赞。他在瑞士的首都不时和一个英国人菲利普·康维尔一伊凡斯博士碰头。后者曾经在德国柯尼斯堡大学担任教授，不仅成了研究纳粹主义的专家，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了纳粹的同情者。

10 月的下半月，康维尔一伊凡斯给科尔特带来了一个讯息，后来被科尔特说成是张伯伦以谅解和公正的态度对待未来的反纳粹德国政权的庄严保证。实际上这个英国人带来的只是张伯伦对下院的演说中的一段话。在这篇演说里，这位首相一方面拒绝希恃勒的和平建议，一方面宣布英国无意“使一个愿意同其他国家和睦相处、互相信赖的德国在欧洲无法获得应有地位”。那一篇对德国人民表示友好的讲演中的这一段话和其他的段落都曾由伦敦方面广播过，那些密谋分子想必也在无线电中听到过，但是他们仍然对那位非正式的英国代表带到伯尔尼来的“保证”大表欢迎，认为是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东西。这些密谋分子得到了这个声明并认为自己已经通过梵蒂冈取得了英国的保证之后，就满怀希望地转向那些德国将领，说他们是满怀希望固然不错，但是也可以说是绝望中的孤注一掷；“我们唯一能得救的希望，”威兹萨克在 10 月 17 日对哈塞尔说：“就在于举行军事政变。但怎样举行政变呢？”

时间已经很紧迫了。德国已经决定在 11 月 12 日侵入比利时和荷兰。必须在这个日子以前举行政变。哈塞尔警告其他的人说，在德国侵犯了比利时以后，就不可能得到“公道的和平”了。

对于后来发生的事，其实应当说是对于后来为什么竟然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参加这个密谋的人各持一说，互相矛盾，莫衷一是。像在慕尼黑时期的那次一样，这次的中心人物仍然是陆军参谋总长哈尔德将军。但是他忽冷忽热，犹豫不定。在纽伦堡提审时，他解释说，“野战部队”由于“全副武装的大敌当前”，不可能举行叛变。他说他曾呼吁不直接与敌人交锋的国内驻防军采取行动，但是他从国内驻防军司令弗雷德里希（弗里茨）·弗洛姆将军那里所能得到的，最多只是一种谅解，那就是“作为一个军人”，[①]只要勃

[①] 惠勒—贝纳特在《权力的报应》第 491 页注中指明了德国方面的来源。另见哈塞尔著上引书和托马斯：《思想和境遇》，上引出处。

[①] 哈尔德在 1946 年 2 月 26 日在纽伦堡受审时的答复，见《纳粹的阴谋与侵略》，附件 B，第 1564—75

劳希契下命令，他马上就执行。

但是勃劳希契甚至比他的参谋总长还要胆小怕事。“ 如果勃劳希契没有足够的魄力作出决定的话，” 贝克将军对哈尔德说，“ 你就应当作出决定，给他来一个既成事实。” 但是哈尔德坚持认为，勃劳希契是陆军总司令，最后责任应当由他负。大家就这样推来推去，谁也不愿负责。哈塞尔在 10 月末的日记中悲叹道：“ 哈尔德的胆略和威信都不足以胜任此事。” 至于勃劳希契，就像贝克所说的，只是一个“ 六年级小学生 ”。这时密谋分子由陆军方面的经济专家托马斯将军和谍报局的奥斯特上校为首,继续在哈尔德身[650]上做工作。哈尔德终于同意，至少他们认为如此，只要希特勒进攻西方的最后命令一下，就发动政变。但哈尔德本人后来却说，这仍然要以勃劳希契作最后决定为条件。不管怎样，11 月 3 日，据哈尔德和奥斯特在最高统帅部里的一个心腹汉斯・格罗斯库特上校说，哈尔德通知贝克将军和戈台勒这两个主要密谋分子，要他们从 11 月 5 日起随时准备行动，陆军总司令部和参谋总部所在的佐森成了酝酿阴谋活动的温床。

11 月 5 日是关键性的一天。部队将在这一天开往与荷、比、卢交界处的出击点，同时勃劳希契也约定在这一天向希特勒摊牌。他同哈尔德曾经在 11 月 2 日和 3 日视察了西线的各高级指挥部，战地指挥官们反对进攻的意见增强了他们的决心。哈尔德在自己的日记里暗自写道，“ 没有一个指挥部认为进攻……有任何可能取得胜利 ”。于是陆军总司令带着把从前线将领们那里得到了的大批论据，再加上他自己和哈尔德、托马斯等人的论据汇集成的一份备忘录，而且，用哈尔德的话来说，另外还带了一份“ 反备忘录 ”，那是对希特勒 10 月 9 日那份备忘录的答复，在 11 月 5 日这一天，驱车前往柏林总理府，决心说服希特勒放弃在西线立即发动进攻的计划。如果劝说无效，勃劳希契就将参加推翻希特勒的密谋——至少密谋分子是这样了解的。他们兴高采烈，非常乐观。据吉斯维乌斯说，戈台勒甚至已经着手为未来的反纳粹临时政府草拟内阁名单了，后来还是头脑较比冷静的贝克制止了他才没有这样做。那时只有沙赫特一个人对这问题极感怀疑。“ 你们瞧着吧，” 他警告道，“ 希特勒准会闻出气味不对，明天不会作出任何决定。”

跟以前一样，他们全都错了。

勃劳希契一无所获，他的备忘录也好，前线指挥宫的报告也好，他自己的论据也好，都没有发生作用，这本来也是意料中的事。当勃劳希契提出当时是西方一年之中天气最恶劣的季节时，希特勒反驳道，对德国人来说是恶劣的气候，对敌人也同样恶劣，何况来年春天天气也未见得就好。最后，这位没有脊梁骨的陆军统帅计无可施，便告诉元首说，西线部队的士气同 1917—1918 年的情况类似，当时军队里充满了失败主义情绪，发生不服从命令的情况，甚至有兵变。

据哈尔德说（他的日记是这次极机密的会谈的主要来源），希特勒一听这话，顿时勃然大怒。他要勃劳希契说出来：“ 哪个部队出现了这种没有纪律的情况？发生了什么事情？在什么地方？” 他要在第二天亲自坐飞机到那里去调查。据哈尔德的日记说，可怜的勃劳希契本来想故意夸大一下事实，以便“ 吓退希特勒的 ”，现在却惹得元首大发雷霆地训了一顿。“ 陆军总司令部采取什么行动？” 元首吼叫道，“ 枪毙了多少人？” 希特勒咆哮道，事

页。

实上“是[651]你们陆军不想打”。

“已经没有办法再谈下去了，”勃劳希契在纽伦堡追忆那次不愉快的会见时在法庭上说，“于是我只好退了出来。”据别人回忆说，他踉踉跄跄地回到 18 英里外佐森的司令部时还惊魂未走,甚至在叙述会见经过时最初都有点语无伦次。

“佐森密谋”就这样完事大吉。它同慕尼黑时期的“哈尔德密谋”一样，遭到了可耻的失败。在这两次密谋中，密谋分子们为自己的行动所提出的条件都实现了。这次希特勒坚持自己的决定，要在 11 月 12 日发动进攻，事实上当碰了一鼻子灰的勃劳希契走了之后，希特勒还用电话向佐森司令部重申了他的命令。当哈尔德要求书面的命令时，书面的命令立刻就送来了，密谋分子们曾经说，要推翻希特勒必需有一个书面证据，也就是要由希特勒下令发动一场他们认为行将使德国遭到惨祸的战争；现在证据有了，但是他们除了惊慌失措之外，毫无所为。他们乱成一团，急急忙忙地焚毁了可能惹祸的文件，掩盖了他们密谋活动的痕迹。只有奥斯特上校好像还保持了镇静。他向比利时和荷兰驻柏林公使馆发出了警告，要这两国提防 11 月 12 日早晨的进攻。[①]然后他就动身到西线去,想试探一下,看看他还能不能再次说动冯·维茨勒本将军来干掉希特勒，结果毫无所获。包括维茨勒本在内，所有的将领都知道他们已失败了。那位前下士又一次不费吹灰之力就战胜了他们。几天以后，指挥 A 集团军的伦斯德召集他所属的军级和师级司令官开会，详细讨论了进攻的计划。虽然他本人对这次进攻的成功仍有疑问，他却劝他的将领们撇开怀疑。他说：“陆军已经分配了这个任务，不论怎样都得执行！”

希特勒冲着勃劳希契发了那一通雷霆，把他吓得要死之后，第二天就着手草拟一个宣言，对荷兰和比利时人民为自己的侵略行为提出辩解。哈尔德日记中提到的借口是“法国军队必将开进比利时”。

但是第二天，11 月 7 日，希特勒却推迟了进攻的日期，使得将领们如释重负地舒了一口气。

绝　密

1939 年 11 月 7 日于柏林

……元首兼武装部队最高统帅听取了气象和铁路运输方面的报告以后，发布命令如下：

“A 日”“推迟 3 天，下一决定将于 1939 年 11 月 9 日下午 6 点作出。

凯特尔

[652] 整个秋天和冬天希特勒发布了 14 道推迟进攻的命令，这是其中的第一道。欧战结束时，从最高统帅部的档案中发现了这些命令的副本。[①]这些命令表明希特勒在任何时候都从没有放弃在西线发动进攻的决定，只不过是一星期一星期地往后推而已。他在 11 月 9 日把进攻推迟到 11 月 19 日；而临到 11 月 13 日又把它推迟到 11 月 22 日，像这样一直推下去，每次都是在五六天以后前通知改期，往往是以天气作为理由。这也许是希特勒在某种程度上对将领们的迁就，也许是他意识到陆军尚未准备就绪。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战略计划和战术计划没有充分拟好，因为他还在不断地进行修改。

希特勒第一次推迟进攻可能还有其他的原因。11 月 7 日作出这个决定的那一天，比利时国王同荷兰女王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表示愿意“在西欧战

[①] 罗茨费尔斯：《希特勒的德国国内反对派》。

[①] 载《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 6 卷，第 893—905 页（纽伦堡文件 C—72）。

争开始激烈进行以前”斡旋和平，这一来使德国人大大地陷入了窘境。希特勒在他所草拟的宣言中本来打算说，德军开入这两个低地国家是因为获悉法国军队即将开进比利时，但是在比荷发表了这个联合声明之后，这个借口就很难取信于人了。

同时，希特勒也可能得到了风声，知道他进攻比利时这个中立小国已经起不到奇袭的作用，而他原来正是倚仗这一点的，10 月底，戈台勒曾经到布鲁塞尔去了一趟，带去了威兹萨克的秘密委托，要德国驻比利时大使贝劳一许汪特私下警告比利时国王“局势极为严重”。那位大使遵命照办，利奥波德国王马上就赶到海牙，同荷兰女王商量，于是便拟定了上述的联合宣言。但比利时人还得到了比这更为明确的情报。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这个情报一部分是从奥斯特那里来的。另外，11 月 8 日，贝劳一许汪特还用电报通知柏林，利奥波德国王曾告诉荷兰女王，说他获得“准确的情报”，得知沿比利时国境线已有德军集结，说明德军将“在两三天”内穿越比利时国土发动进攻。[①]

接着在 11 月 8 日晚间和 11 月 9 日那天下午一连发生了两桩怪事：一桩是险些使希特勒送命的炸弹爆炸事件，另一桩是德国党卫队人员在靠近德国边境处绑架了荷兰境内的两名英国间谍。这两起事件虽然最初分散了那位纳粹统帅的注意，使他无暇考虑在西线发动进攻的计划，但最后却增加了他在德国的威信，同时吓坏了那些实际上同这两起事件全然无关的佐森密谋分子。

纳粹绑架案和啤酒馆炸弹事件

11 月 8 日晚间，希特勒在慕尼黑的贝格勃劳凯勒酒馆为纪念[653]1923 年啤酒馆政变而对党内“老卫队”战友发表每年一度的演说，这篇演说比他往常的演说都短，在他讲完之后 12 分钟，预先安置在讲坛后面的柱子内的一枚炸弹爆炸了，死 7 人，伤 63 人。这时候所有的纳粹要人都已经跟在希特勒的后面匆匆离开了会场。在往年，他们照例都要留下来，一面慢慢地喝着啤酒，一面同党内的老战友们回忆话旧，谈着当年的政变。

第二天早晨，希特勒自己的报纸——《人民观察家报》独家刊登了谋刺元首的新闻。这家报纸说这桩肮脏的勾当是“英国特务机关”、甚至说是张伯伦干的。那天晚间我在日记里写道：“这件未遂的‘谋刺案’无疑将激起舆论支持希特勒，并将煽起对英国的仇恨……我们多数人觉得，这一事件很像是一次新的国会纵火案。”

除开戈培尔的狂热脑袋中所想象的以外，英国特务机关同这件事情又有什么关系呢？于是纳粹立即设法制造这样一种关系。慕尼黑的炸弹爆炸后一、两个小时，党卫队和秘密警察的头子海因里希·希姆莱打电话给杜塞尔道夫的一个正在走红运的年轻下属瓦尔特·施伦堡，根据元首的指示，命令他第二天越过荷兰边境，把两个同施伦堡保持联系的英国特工人员绑架过来。

[①] 贝劳一产汪特在纽伦堡军事法庭审理“政府各部案件”时就戈台勒的信和他本人私下谒见利奥波德国王情况作了证。见英文译文，载第 9807—11 页。《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 8 卷，第 384 页注中也曾提到。他警告柏林方面的电报，载《德国外交政 策文件汇编》，第 8 卷，第 386 页。

希姆莱的这道命令引起了战争中一桩最离奇古怪的事件。施伦堡同阿尔弗雷德·瑙约克斯一样，也是一个受过大学教育的流氓知识分子。一个多月以来，他同荷兰境内的两名英国谍报官 s·潘恩·贝斯特上尉和 R·H·斯蒂芬斯少校建立了联系。在他们面前，他自称是最高统帅部里的反纳粹军官" 夏梅尔少校 "（这位少校倒也确有其人），并且编造了一套活龙活现的故事，说明德国将领们如何决意推翻希特勒。他说，他们希望英国方面保证伦敦政府将公正地对待未来的反纳粹新政权。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由于英国人曾经从其他方面听说过德国军人有这么一个密谋，那些密谋分子也曾经要求过这样的保证，英国政府便有意同这位" 夏梅尔少校 "发展进一步的联系。贝斯特和斯蒂芬斯给了他一部小型无线电收发报机。随后双方在无线电上往来频繁，并且在荷兰不同的城市见了若干次面。11 月 7 日，双方在离德国边境不远的荷兰文洛镇上见面时，那两个英国间谍给" 夏梅尔 "带来了伦敦方面寄给德国反纳粹领袖的一封相当含糊的信，十分笼统地谈了同一个反纳粹政权缔结公正的和约的基础。当时说妥，" 夏梅尔 "将在第二天把一位反纳粹的领袖（一位德国将军）带到文洛来开始举行最后的谈判。这一会晤后来又推迟到 9 日。

直到这时为止，双方的目标是明确的。英国方面打算同德国密谋政变分子建立直接联系，以便鼓励和帮助他们。希姆莱则打算通过这两个英国人来发现德国的密谋分子是那些人，以及他们[654]同英国间谍机关有什么关系。显然，希姆莱和希特勒对于某些将领以及谍报局里的奥斯特和卡纳里斯这样一些人已经有所怀疑。但是到了 11 月 8 日的晚上，希特勒和希姆莱感到需要改变他们的目标。现在他们的新目标是：绑架贝斯特和斯蒂芬斯，并把贝格勃劳凯勒酒馆爆炸案的罪名加在他们身上！

现在，一个我们所熟悉的人物登场了。原先在格莱维茨地方对德国电台表演了那出" 波兰袭击 "的阿尔弗雷德·瑶约克斯，现在又率领了十几个党卫队保安处的打手来帮助施伦堡完成绑架的计划。事情进行得非常顺利。11 月 9 日下午 4 点，施伦堡在文洛镇的一家咖啡馆的凉台上嚼饮着开胃酒，等候贝斯特和斯蒂芬斯来赴约。最后，那两位英国间谍驾着他们的别克牌汽车来了，他们把车子停在咖啡馆的后面，刚下车就遭到候在党卫队汽车上的瑙约克斯那群暴徒一阵枪击。历来伴同这一对英国人去会见施伦堡的一位荷兰谍报官克洛普中尉受了致命的重伤。据瑞约克斯后来说，他们把贝斯特和斯蒂芬斯连同受伤的克洛普" 像一捆草似地 "扔进了那辆党卫队的汽车之后，汽车便开足马力，冲过边界，进入了德国境内。* [1]

于是在 11 月 21 日，希姆莱对公众宣布，在贝格勃劳凯勒酒馆谋杀希特勒的阴谋案，已经真相大白。这件案于是出于英国谍报局的主使，主谋的两名英国人斯蒂芬斯和贝斯特，已经于爆炸发生后的第二天" 在荷德边境线上 "被捕。实际动手的凶手据称是住在慕尼黑的一个德国共产党员——一个名叫格奥尔格·艾尔塞的木匠。

我在那天的日记里写道，希姆莱对这件谋杀案的细节描述在我听来" 气味不正 "。但是希姆莱却不折不扣地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当时我曾记道：" 希

---

[1] 文洛绑架案，众说纷坛，参见潘恩·贝斯特：《文洛事件》；施伦堡：《迷宫》；惠勒—贝纳特《权力的报应》。荷兰官方的记述载在荷兰政府向德国提出的抗议照会中，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 8 卷，第 395—96 页。此外纽伦堡" 政府各部案件 "审讯时也透露了一些材料，见《战犯的审讯》，第 12 卷。

姆莱那一帮匪徒的企图，显然是想要那些易受愚弄的德国人民相信，英国政府打算以谋杀希特勒及其主要助手的方法来赢得战争。”

这次爆炸究竟是谁主使的，迄今仍然是一个没有完全弄清楚的谜。艾尔塞虽不像国会纵火案里的马里努斯·范·德·卢勃那样愚蠢，但却是个不怎么聪明的老实人。他不仅承认犯有制造和放置炸弹的罪行，并且为此扬扬得意。他在这次谋杀事件之前当然没有同斯蒂芬斯和贝斯特见过面，但在萨赫森豪森集中营的那些漫长的岁月里他却同贝斯特交上了朋友。他在集中营里面对这[655]个英国人讲了一个说来话长而且曲折的故事,但这个故事并不完全合情合理。

他说他是那年仲夏被当作共产党的同情者关进达豪集中营的，10 月间某日，他被叫到集中营的长官办公室里，在那里他被介绍给两个陌生人。这两个陌生人说他们需要把元首的几个“心怀贰意的”追随者搞掉，办法是 11 月 8 日晚上等希特勒在贝格勃劳凯勒酒馆发表了例行的演说离开大厅之后，紧跟着在那里爆炸一枚炸弹。炸弹将安置在讲坛后面的一根柱子里。由于艾尔塞是一个手艺高明的家具匠、电工兼补铝匠，他们说这事由他来做是再合适不过了。事成之后，他们将帮助他逃往瑞士，并且给他一大笔钱，让他舒舒服服地在那里过上一辈子。为了表明他们说话算数，他们答应当时就改善他在集中营中的待遇：改善他的饮食，给他穿普通的便服，还给他许多烟卷——因为他是个烟瘾很大的烟鬼——并且给了他一个木匠工作台和一套工具。艾尔塞就在这里用一只可走 8 天的闹钟和一个同时可以用电钮引发爆炸的特殊装置制造了一枚看起来粗糙但效率并不差的走时炸弹。艾尔塞说，在 11 月初的一个夜晚他被带到那个啤酒馆去，把他那个玩意儿放进了那根位置合适的柱子中。

他说，11 月 8 日晚上，大约在那颗炸弹根据规定的时间快要爆炸的时候，他的同谋者把他带到了瑞士边境线上，给了他一笔钱，并且有意思的是，还给了他一张印着那家啤酒馆内部照片的明信片，照片里那根放置炸弹的柱子上还划了一个叉。结果，他并没有得到帮助越过边境，这个傻头傻脑的家伙对这一点仿佛颇感意外。相反，他却被秘密警察逮捕了，那张明信片和其他东西一并落人秘密警察手中。然后秘密警察便教唆他在即将开庭审讯的国家法庭上把贝斯特和斯蒂芬斯牵连进来，而且告诉他，在这次审判中，他将名噪一时，成为众所注目的人物。*

这个审判一直没有举行。现在我们知道，希姆莱由于做贼心虚，不敢举行这次审判。我们现在还知道，艾尔塞在萨赫森豪森集中营里住了一个时期后又被移到达豪集中营，所得到的待遇在那种环境下讲来是完全人道主义的待遇，这显然是根据那位从爆炸案中得到了很大好处的希特勒的特别指令。但是希姆莱一直牢[656]牢地监视着他到底。让这个木匠活到战后去把他的故事四处宣扬是不行的。于是就在战争结束前不久，1945 年 4 月 16 日，秘密警察宣布，格奥尔格·艾尔塞已在前一天盟军空袭时被炸身死。现在我们知道，他是被秘密警察杀害的。[①]

---

① 关于炸弹谋刺案的各种记述，参见贝斯特著上引书；施伦堡著上引书；惠勒一贝纳特著上引书；莱特林格著：《党卫队》；拙著《柏林日记》；吉斯维乌斯著上引书。纽伦堡审讯时也有一些材料，当时我作了笔记，用在这里。但是我在《纳粹的阴谋与侵略》和《主要战犯的审讯》各卷中都没有找到这些材料。

希特勒对将领们的训话

幸免于难的希特勒，或者说使人看来仿佛幸免于难的希特勒压下了将领中的反抗之后，便来进行他的在西线大举进攻的计划。11 月 20 日，他发下了第八号作战指令，命令保持“戒备状态”，以便“随时利用有利的气候条件”，并且规定了灭亡荷兰、比利时的方案，接着，希特勒为了给那些胆怯的将领们打一打气，使他们具有在大战前夕所必须具有的劲头，于是便在 11 月 23 日那一天中午把那些担负指挥的将领和参谋总部的人员召到总理府来。

这是希特勒对他的主要军事将领们所作的秘密精神讲话中一次最能说明问题的讲话。由于盟军在弗伦斯堡发现了一些最高统帅部档案，这篇讲话便被保存下来了，这是某位不知名的与会者的笔记。[②]

这次会议的宗旨，[希特勒一开始便说]是要使你们了解一下我的思想境界，因为这支配着我对未来事态发展的态度；此外我还要把我的决定告诉你们。

他的脑子里充满了关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想法。他在这次与会人数不多的会议上，说话口若悬河，肆无忌惮，异常露骨，使人清楚地看到了他那想象力丰富然而极不正常的脑子里的一切思想活动的轮廓。他还对未来事态的发展作了极其准确的估计。但是，很难想象有谁听了这番讲话还能有任何怀疑，仍旧不相信这个掌握了德国和全世界命运的人已经全然变成了一个危险的自大狂者。

在谈到早年的奋斗时，他说：

我对于历史事态的可能发展有清楚的了解，对于作出无情的决定有坚定的意志……作为最终决定性的因素，我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我是不可代替的。没有一个军人或是文官能够代替我。谋刺我的阴谋以后可能还会有。我对我的才智能力和决断能力是深信不疑的……从未还没有一个人取得过像我这样的成就……在我的领导下，德国人民的地位空前提高了，即使现在全世界都在恨我们……国家的命运全在我一个人身上，我自然当仁不让。

他斥责将领们在他作出“坚决的决定”要退出国联、宣布征[657]兵制、占领莱因兰、在莱因兰设防以及吞并奥地利时不该表现怀疑和动摇。他说，“在那时候相信我的人是很少的”。

“接着下一步是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波兰。”他在叙述他的征服业绩时，态度极为寡廉鲜耻。可惜张伯伦没能听到他这番话。

我从一开始就明白，我是不能以取得苏台德日耳曼人区为满足的。那仅仅是局部的解决办法。于是我便作出了进军波希米亚的决定。随着建立了“保护国”，这样征服波兰的基础就奠定了。但是当时我还没有十分明确，是应该先解决东方再打西方呢，还是先征服西方再来收拾东方。由于事态的压力。最后还是先打波兰，可能有人指责我，说我要打了又打。但我认为，斗争是所有人的命运。任何人，只要他不甘心失败，就不可避免地要进行斗争。

日益增长的[德国]人口，要求有更大的 Lebensraum[生存空间]。我的目标在于使我国人的数目和所需的生存空间之间有一个合理的比例关系。斗争就必须从这里开始。没有一个民族能够回避这个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就只有俯首退让，逐渐衰亡……在这里，一切巧计良策都将无济于事，刀剑是唯一解决问题的办法。拿不出力量来进行斗争的民族是必然要退出历史舞台的……

希特勒说，包括俾斯麦和毛奇在内的过去那些德国领导人的毛病是“不

---

② 逐字逐句的记录，载《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 3 卷，第 572—80 页；另载《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 8 卷，第 439—46 页（纽伦堡文件 789—PS）。

够坚强。只有在一个有利时机对一个国家发动进攻才能解决问题”。由于认识不到这一点，结果 1914 年的战争“多面受敌。因而未能解决这个问题”。希特勒继续说道：

今天，第二幕戏正在编排。67 年来我们第一次避免了两线作战……但是没有人能够知道，这种局面能够维持多久……从根本上说来，我把武装力量组织起来，并不是为了养兵不用。我一直都有决心要发动进击。

想到目前单线作战的好处时，这位元首提起了俄国问题。

就目前来说，俄国还没有什么危险性。它已经由于许多内部问题而被削弱了。况且，我们同俄国还订有条约，但是，条约只有在它们还能为某种目的服务的时候才会得到遵守。俄国只有在它认为这个条约对自己有利的时候才会遵守它……俄国仍然抱有长远的目标，特别是加强它在波罗的海地区的地位。只有我们在西线腾出手来的时候才能够反对俄国。

至于意大利，一切取决于墨索里尼，“他一死情况就可能全盘改变……正像斯大林如果死了一样，意大利领袖一死会给我们带来危险。一个政治家是很容易遭到不测的，最近我对这一点有亲身[658]体会”。美国“由于有中立法”，所以希特勒那时候还不认为它有什么危险，同时它对盟国的援助也还很有限。然而，时间是对敌人有利的。“目前是一个好机会。再过 6 个月就可能不再如此了”。因此：

我的决心是不可变更的。我要尽快地在最有利的时机进攻英、法。破坏比利时和荷兰的中立并没有多大关系，在我们取得胜利以后，不会有人提出这个问题的。关于破坏中立的行为，我们不会提出 1914 年那样笨拙的借口。

希特勒对他的将领们说，西线的进攻意味着“世界大战的结束，而不仅仅是一个作战行动，它所关系到的不是某一个单独的问题，而是整个民族的生死存亡”。接着，他的讲话就开始结束：

我们历代伟人的精神一定会使我们鼓起勇气来。命运所要求于我们的，并不比对德国历代伟人所要求的更多。只要我活着，我所想到的将只是我国人民的胜利。我不会在任何困难面前退缩，我将消灭一切反对我的人……我要消灭我的敌人！

这是一篇很能说明问题的演说，虽然几乎所有的将领都不相信在这个时候发动进攻可能取得胜利，但据我们所知，当时却没有一个将领站出来表示怀疑，也没有任何人起来质问进攻比利时和荷兰是否违反道德，因为这两个国家的中立和边界是得到德国的庄严的保证的。据当时在场的某些将领们说，希特勒对陆军高级将领和参谋总部里所存在的消极情绪的批评，比上面所说的要厉害得多。

当天傍晚 6 点钟，那位纳粹统帅又把勃劳希契和哈尔德叫了去，就“佐森司令部的情绪”狠狠地训了那位陆军总司令一顿，参谋总长则像一个犯了过错的孩子一样站在元首办公室的门外等着。希特勒申斥说，陆军总司令部从上到下全都染上了“失败主义”情绪，而哈尔德的参谋总部则“抱着顽固的态度同元首闹别扭”。勃劳希契沮丧已极，据他自己后来在纽伦堡法庭上说，他当时提出辞职，但是希特勒不准。这位总司令回忆说，希特勒还严厉地提醒他，“我必须像所有其他的军人一样，完成我的职责，履行我的义务”。那天晚上哈尔德在日记中用速记符号写了这样一句：“危机重重的一天！”

从各方面来说，1939 年 11 月 23 日是一个里程碑。这一天标志着在第一

[①] 哈尔德 11 月 23 日的日记和他后来添加的脚注。勃劳希契在纽伦堡的证词，见《主要战犯的审讯》，第 20 卷，第 575 页。

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甩开德皇威廉二世而掌握了德国最高军政大权的陆军，已被希特勒最后决定性地制服了。从这天起，这位前奥地利下士不仅认为自己的政治见解比他的将领们高出一[659]筹,而且认为自己的军事见解也是如此。所以他从此不再听他们的意见，而且不许他们批评——其最后结果为全人类带来了灾难。

“我们之间从此有了裂痕，”勃劳希契在谈到 11 月 23 日的事件时对纽伦堡法庭说，“虽然后来弥补上了，但是芥蒂始终存在。”

希特勒在那个萧瑟的秋天对将领们所发表的这一篇气势汹汹的演说，对哈尔德和勃劳希契不啻当头一棒，使他们不敢再怀有一点点推翻这位纳粹独裁者的念头。他已经警告他们，他将“消灭”一切碍他手脚的人。哈尔德说，希特勒还特别补充一句，他将“以暴力”镇压参谋总部对他的任何反抗。哈尔德至少在当时还不敢挺身反抗这种骇人的威胁。4 天以后，11 月 27 日，托马斯将军在沙赫特和波比茨的怂恿下去见哈尔德，力劝他对勃劳希契下功夫，使他采取行动反对元首。（“必须把希特勒搞掉！”据哈尔德后来回忆，托马斯当时曾这样说，）但是这位参谋总长对他说了一大堆的“困难”。他说他还不能肯定，勃劳希契是否“会积极参加政变”。[①]

过了几天，哈尔德用一些极为可笑的理由向戈台勒说明他为什么不再打算推翻那位纳粹独裁者。哈塞尔在日记里记下了这些理由。除了“大敌当前不能叛变”这一条之外，据哈塞尔所记，哈尔德还补充了以下各点：“我们应当给希特勒一个最后的机会，把德国人民从英国资本主义的奴役下解救出来……目前我们再找不到另外一个伟大人物了……反对派的力量还不够成熟……对于年轻的军官，我们没有把握。”哈塞尔又去找最早的密谋分子之一、海军上将卡纳里斯，要他动手，但是毫无所获。“他对陆军将领的反抗已经不再抱任何希望”，这位卸任的大使在 11 月 30 日的日记里写道，“并且认为再沿着这条路搞下去只是白费力气”。过了不久，哈塞尔在日记中记道，“哈尔德和勃劳希契已经完全变成了希特勒听话的小厮了”。[①]

纳粹在波兰的暴行：第一阶段

德国进攻波兰后没有几天，我的日记就开始充满了关于纳粹在这个被征服的国家中的暴行的记录。后来大家知道，许多其他人的日记也都连篇是这类的记载。哈塞尔在 10 月 19 日的日记上说，他听到了“党卫队骇人听闻的兽行，特别是对犹太人的兽行”。过了几天，他在日记里记述了从波森省一个德国地主那里听来的一个故事。

> 他最后看到的是一个喝醉了酒的区党部头子，命令把牢门打开。他枪杀了 5 个妓女，而且企图强奸另外两个妓女。[②][660]

10 月 18 日，哈尔德在日记里记下了他同军需总监爱德华·瓦格纳将军的一次谈话的摘要，那一天后者曾同希特勒谈到波兰的未来命运的问题——波兰的未来的命运将是黯淡悲惨的。

[①] 哈尔德在纽伦堡提审时的答话，见《纳粹的阴谋与侵略》，附件 B，第 1569—70 页。另见托马斯：《思想与境遇》，上引出处。

[①] 哈塞尔著上引书，第 93—94，172 页。

[②] 同上，第 79，94 页。

我们无意于重建波兰……不能把波兰建成一个德国式的模范国家。绝对不能让波兰的知识分子成为统治阶级。必须保持低生活水平，保持廉价的奴隶劳动……

必须使波兰彻底解体！德国将给予波兰总督必要的手段来实现这一可怕的计划。

德国确实这样做了。

我们现在可以根据缴获的德国档案文件和纽伦堡历次审讯所得到的证据，对纳粹在波兰恐怖统治的开始情况作一简短的叙述。这只不过是德国人对所有被征服民族的黑暗恐怖统治的先声。但是波兰的遭遇比起其他地方来，自始至终是最惨的。纳粹的野蛮兽性在这里达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

在进攻波兰的前夕，希特勒曾在上萨尔斯堡 8 月 22 日的会议上，预先告诉过他的将领们，可能会发生一些“不合德国将领们的胃口”的事情。他警告他们，“不得干涉这一类事情，应当只管本身的军事职责”。他在讲话的时候是知道他讲的是什么的。无论是在柏林还是在波兰，本书作者都马上得到有关纳粹大屠杀的消息。这种消息纷至沓来，不胜暇接。德国的将领们当然也不例外。9 月 10 日，当波兰战役方酣之时，哈尔德在日记里记下了一个事例，后来很快就在柏林成为家喻户晓的事。有几个属于党卫队炮兵团的恶棍，让 50 个犹太人修补了一天的桥梁之后，把他们赶进一座犹大会堂，然后，用哈尔德的话，“把他们屠杀了”。军事法庭判处凶手监禁一年。甚至第三军团司令冯·库希勒将军当时也拒绝批准军事法庭对于凶手量刑过轻的判决，认为判决过于宽大了，虽然他后来也变得狠心起来了。但是陆军总司令勃劳希契在希姆莱出面干涉之下连这一年的徒刑判决也给勾销了，理由是他们属于“大赦”之例。

以正直的基督徒自居的德国将军们对这种情况开始感到不安。9 月 12 日，凯特尔同卡纳里斯海军上将在元首的火车上进行了一次谈话，后者对波兰境内的暴行提出了抗议。那位对希特勒一向俯首听命的最高统帅部长官干脆地回答道，“元首已经就这个问题作出了决定”。如果陆军“不愿意参加这类事情，就得同意让党卫队和秘密警察来唱对台”，这就是说，在每个部队中都会驻上一名党卫队特派员来“执行灭绝政策”。在纽伦堡审讯时，卡纳里斯的日记曾拿出来作证，他在上面写道：

[661]我向凯特尔将军指出，我知道已经作出了计划，要在波兰进行大规模屠杀，特别是贵族和教士将被全部消灭。可是最后世界舆论会要德国武装部队对这些行为负责的。[①]

希姆莱很狡猾，当然不会让陆军的将领们逃避责任。9 月 19 日，希姆莱的主要助手海德里希来到了陆军总司令部，把党卫队“清除[波兰]犹太人、知识分子、教士和贵族”的计划告诉了瓦格纳将军。哈尔德听到瓦格纳报告了这件事之后，在日记里记下了他的反应：

陆军坚决要求“清除”工作推迟到军队撤走和整个国家由民政当局接管之后再进行，也就是要等到 12 月初。

陆军参谋总长的这一则简短的日记，为我们了解德国将领们的道德观念提供了一把钥匙。他们并不打算认真地反对“清除”工作——即消灭波兰的犹太人、知识分子、教士和贵族。他们只打算请求把时间“推迟”到他们离开波兰以后，以便逃脱责任。当然，外国舆论是必须考虑到的。哈尔德在第二天就波兰境内的“清除”问题同勃劳希契作了长时间的商谈之后在日记里写道：

[①] 根据卡纳里斯海军上将的日记，见《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 5 卷，第 769 页（纽伦堡文件 3047—PS）。

我们不能做出任何事情让外国有机会以此为根据发动任何指责德国残暴的宣传。居然要杀天主教教士！目前要这样做是不实际的。

第二天，9 月 21 日，海德里希给陆军总司令部送去了一份关于“清除”工作的初步方案。第一步工作是把犹太人全都赶到城市里去，因为在城市里比较容易把他们一网打尽加以消灭。他说，“最后解决”需要隔一个时期才能实施，而且必须“严守秘密”。但是所有看到这份秘密备忘录的将领都明白，所谓“最后解决”就是斩尽杀绝。①不出两年之内，当这项方案最后付诸实施的时候，“最后解决”就成了德国高级官员之间提到战争期间纳粹这一惨绝人衰的滔天罪行的代号。

在俄国抢占了东部地区，以前属于德国的各省以及一些后来增加的西部土地又被德国正式合并之后，波兰所剩下来的地区就是元首 10 月 12 日的法令所划定的“波兰总督辖区”。这道法令任命汉斯·弗朗克为总督，维也纳的卖国贼赛斯一英夸特为副总督。弗朗克是典型的纳粹流氓知识分子。他是 1927 年从法学院毕业后不久入党的，很快就博得了纳粹运动法律权威的名声。他才思敏[662]捷，精力充沛，不仅精通法律，一般的知识也相当渊博，爱好艺术，尤其是音乐。纳粹执政以后，他就成了法律界举足轻重的人物，最初担任巴伐利亚邦司法部长，后来是全国政府的不管部长、法学院院长兼德国律师协会主席。他肤色黝黑，短小精悍，动作敏捷，家里有 5 个孩子。他的才智和教养抵销了一部分幼稚的狂热，到这时为止，还是希特勒身边最不引人反感的一个人。但是在这张文质彬彬的画皮的后面却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黑暗的纳粹世界有不少令人毛骨悚然的文件，他的 42 本生活和工作日记就是其中之一，曾在纽伦堡法庭上拿出来作证。*这部日记显示出它的作者是一个作事干净利落、残忍冷酷、嗜血成性的人。看来他把他平日那些暴戾的言论一段不漏地都写进去了。

他在就任新职的第二天就宣布，“波兰人应该成为德意志帝国的奴隶”。有一次当弗朗克听说波希米亚的“保护长官”牛赖特张贴告示宣布处决 7 名捷克大学生时，他便对一个德国记者叫着说：“如果我要每枪毙 7 个波兰人就贴一张布告的话，恐怕波兰的森林还不够用来制造写那些布告的纸张呢！”①

至于消灭犹太人的事，希特勒指定由希姆莱和海德里希负责。弗朗克的任务除了从波兰榨取粮食和其他物资以及强迫征集劳工之外，就是消灭那里的知识分子。纳粹分子给这种行动起了一个好听的代号，叫做“特别绥靖行动”（Ausserorenliche Befriedi- gungsaktion，后来以“AB 行动”著称）。为了实现这个行动，弗朗克花了不少时间。直到第二年暮春，当德国在西线的大规模攻势把世界的注意力从波兰引开的时候，他才开始取得成绩。据他的日记所载，到 5 月 30 日，他已能够在对警察部门的喽罗们作精神训话时吹嘘工作有了很大的进展——有“几千”波兰知识分子已经送命或是将要送命。

“先生们，我要求你们，”他说，“尽可能采取最严厉的措施来帮助我们执行这项任务。”他还对他们透露，这是“元首的命令”。他说，元首是这样指示的：

“凡是有可能成为波兰人民领袖的人都必须予以消灭。那些追随他们的人……也必须接着加以

---

① 《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 6 卷，第 97—101 页（纽伦堡文件 3363—PS）。

① 《主要战犯的审讯》，第 1 卷，第 297 页。

清除。没有必要给德国加上这种负担……没有必要把这些分子达到德国的集中营里去。”

他说，这些人将在波兰就地消灭。②[663] 根据弗朗克的日记，在这次会议上，保安警察的头子作了工作报告。他说，大约两千名男人和几百名妇女在“特别绥靖行动一开始时”就被抓了起来。其中大部分已经受到“即决裁判”——这是纳粹对人身消灭的婉转说法。第二批知识分子现在正开始集中，“等待即决裁判”。总数“大约为 3500 人”的最危险的波兰知识分子就将这样收拾掉。①

弗朗克并没有放过犹太人，虽然秘密警察已经不声不响地从他手里把直接灭绝犹太人的任务抢走了。他的日记里充满了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和他在这方面的成就。1940 年 10 月 7 日的日记记载了他那天在波兰的一个纳粹集会上的讲话，其中总结了他在第一年中所作的努力。

亲爱的同志们！……我不可能仅仅在一年之内就把所有的跳蚤和犹太人全都肃清。[在此处他自己注道：“全场活跃”]但是，如果诸位肯帮助我的话，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这个目标是一定会实现的。②

第二年圣诞节的前两个星期，弗朗克在克拉科夫总督府举行的一次高级行政人员会议上致闭幕同时说：

至于扰太人的问题，我可以十分坦率地告诉你们，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把他们消灭干净……先生们，我要请你们收起你们的怜悯心，我们必须消灭犹太人。

他承认，“要把总督辖区内的 350 万犹太人一下子枪毙或毒死”是相当困难的。“但是我们终将能够采取一些措施，把他们消灭掉”。这话和后来的实际情形完全符合。③

波兰的战事刚一结束，就开始把犹太人和波兰人从他们世世代代居住的家园赶走。

10 月 7 日，希待勒在国会发表那篇“和平演说”的第二天，就任命希姆莱去负责一个新的机构：“加强德意志民族委员会”（简称 R.K.F.D.V.）。任务是先把波兰人和犹太人从直接并入德国的那几省中驱逐出去，然后把德国人和“日耳曼族人”迁进来。所谓日耳曼族人就是从受到威胁的波罗的海沿岸各国和波兰边远地区不断涌来的外国国籍的日耳曼人。哈尔德在两星期以前就听说了这个计划，他在日记里写道，“有一名德国人迁入这些地区，就要有两个人被放逐到波兰去”。

10 月 9 日，希姆莱在接任新职后两天就宣布，居住在并入德国各省中的 65 万犹太人中有 55 万人将同其他不适合于“同化”的波兰人一道迁往维斯杜拉河以东的“总督辖区”。于是 1 年之内，[664]就有 120 万波兰人和 30 万犹大人被逐出了家园，迁往波兰东部地区。但是搬进来顶替他们的日耳曼族人却只有 497000 人。这比哈尔德的比率还要高一点：赶走 3 个波兰人和犹太人，让一个德国人占据他们的家园。

作者记得，1939 年的冬天特别寒冷，大雪纷飞，“迁移”的工作是在零度以下的气温中进行的，常常还顶着大风雪，因此而死掉的犹太人和波兰人，实际上比死在纳粹行刑队枪口下和绞架上的人还要多。这可以引希姆莱本人

---

② 同上，第 7 卷，第 468—69 页。

① 同上，第 29 卷，第 447—48 页。

② 《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 4 卷，第 891 页（纽伦堡文件 2233—c—PS）。

③ 同上，第 891—92 页。

的话为证。在法国沦陷后的那个夏天，希姆莱在对党卫队禁卫团讲话时，把他手下的人在西方进行的强迫移民工作同已经在东方完成的工作作了一番比较：

在波兰，工作是在零下 40 度的气温下进行的，我们得把成千、成万、成十万的人拉走。我们不得不硬着心肠——你们应该听一下，但也应该立刻就把它忘掉——枪毙掉几千个有身份的波兰人……先生们，有许多时候同一连敌人战斗倒容易，而要镇压那些文化水平低、碍手碍脚的老百姓，要执行处决，要把人拉走，要把歇斯底里地号哭的妇女从家里撵出去，却要难得多，[①]

早在 1940 年 2 月 21 日，集中营督导处头子、党卫队的大队长理查德 ·格吕克斯在克拉科夫附近视察了一周以后告诉希姆莱说，他在奥斯威辛为新的“ 隔离营 ”找到了一处“ 合适的营址 ”，奥斯威辛是一个比较偏僻的、坐落在沼泽地区的市镇，有居民 12000 人。镇上除了几家工厂以外，还有一座奥地利骑兵留下来的营房。工作于是立刻开始了，6 月 14 日，奥斯威辛集中营正式使用，囚在这里的是德国人打算给予最严酷待遇的波兰政治犯。不久这个集中营的罪恶就远不止此了。在这个当儿，伊 · 格 · 法本公司这家德国最大的化学托拉斯的董事们也发现，兴建新的工厂来从煤中炼油并制造合成橡胶，奥斯威辛是一个“ 合适的 ”厂址，在这里，无论是修建新厂房还是新工厂的生产都能得到廉价的奴隶劳动。

为了管理这座新集中营，并为了向伊 · 格 · 法本公司提供奴隶劳动，1940 年春天，一伙经过精选的党卫队的恶棍来到了奥斯威辛。其中有后来为英国公众所熟知的“ 贝尔森的野兽 ”——约瑟夫.克拉麦。另外还有一个叫鲁道夫 · 弗朗兹 · 霍斯的，这个家伙曾因杀人服过 5 年徒刑，以后就一直当监狱看守，他成年以后的大部分时间就是这样度过的。1946 年，也就是他 46 岁的那年，他在纽伦堡法庭上扬扬得意他说，在奥斯威辛由他监督消灭的就有 250 万人，还不算另外“ 听任饿死 ”的 50 万人。

奥斯威辛注定不久即将成为最有名的灭绝营（Vernich-tungs1ager）。我们必须把灭绝营同集中营区别开来，因为集中营里到底还有少数一些人活了下来。像伊 · 格 · 法本公司这样一个具有[665]国际声誉的企业，其中的董事全都被推崇为德国第一流的企业家，他们都是敬畏上帝的基督徒，居然会有意识地把这个死亡营选作它进行谋利活动的合适场所，这对于我们借此来了解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人，甚至最有体面的德国人，是不无意义的。

极权主义者之间的摩擦

大战开始后的第一个秋天，罗马—柏林轴心就发生了龃龉。

在一些分歧问题上，双方各级官员互相指责。一方指责德国人没有履行前一年 6 月间的协议从意大利的南提罗尔撤退“ 日耳曼族人 ”；德国人没有按月供应意大利 100 万吨煤。另一方则指责意大利人未能突破英国的封锁将原料供应德国；意大利同英国和法国大做其买卖，趁机发财，包括把战争物资出售给他们；齐亚诺的反德情绪愈来愈浓厚。

墨索里尼像往常一样，忽冷忽热，齐亚诺在日记里记下了他摇摆不定的情形。11 月 9 日，这位领袖在草拟祝贺希特勒遇刺脱险的电报时颇费踌躇。

他打算写得热情些，但又不想过于热情，因为据他看来，意大利人对希特勒的幸免于难并不感

[①] 同上，第 553—54 页。

到十分高兴——领袖尤其如此。

11 月 20 日……墨索里尼一想到希特勒在进行战争，尤其是当他想到希特勒取得胜利的时候，就感到简直不可忍受。

圣诞节的后一天，意大利领袖表示了“希望德国战败”的情绪，他指示齐亚诺把比利时和荷兰即将受到攻击的情报秘密地通知这两个国家。*但是到了除夕之夜，他又谈起要站在希特勒一边投入战争了。

两个轴心国发生摩擦的主要原因是德国的亲俄政策。1939 年 11 月 30 日，苏联红军进攻芬兰，使希特勒处于非常屈辱的境地。为了与斯大林签订条约，他已经被赶出波罗的海地区，匆匆忙忙地迁走几百年来定居在那里的日耳曼人家庭，现在他还得正式同意俄国对一个小国的无端进攻。而这个同德国关系密切的小国，主要靠了 1918 年德国正规军的干涉，才向苏联争得了作为一个非共产党国[666]家的独立。*这是叫希特勒哑叭吃黄连，可是他硬着头皮吞了下去。德国驻外使团和德国的报刊电台都奉到严格训令，要支持俄国的侵略行动，不得对芬兰人表示丝毫同情。

大概就是这件事使得墨索里尼感到忍不住了，因为意大利各地所爆发的反德示威使他穷于应付。总而言之，1940 年 1 月 3 日，新年刚过，他就给希特勒写了一封长信，倾吐了压在他心头的话。这是墨索里尼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对希特勒这样坦白、这样直率地提出了尖锐逆耳的忠告。

他说，他“深信”德国即使有意大利的帮助也永远不能“使英法屈膝，甚至不能将它们拆伙。如果认为有这种可能，那就是自欺欺人。美国绝不会听任民主国家完全失败”。因此，既然希特勒的东部边疆现在已经巩固下来了，是否还有必要为了战败英法“而去孤注一掷地冒险，连本国的政权也不顾，并且把德国几代人的精华都牺牲掉”？墨索里尼说，如果德国允许“一个纯粹由波兰人构成的、安分守己的和解除武装的波兰存在”，就能得到和平。他又说：“除非你已经下了无可更改的决心，非把战争进行到底不可，否则我认为波兰国家的建立……将是解决战争的一个因素，并且是奠定和平的一个充分条件。”

“但是这位意大利独裁者最关切的还是德国同俄国的交易。

……俄国不费一枪一弹就在波兰和波罗的海地区坐收战争之利。但是我，作为一个天生的革命家要告诉你，你不能为了某个政治策略上的一时需要而长久地牺牲你的革命原则……我也有责任通知你，你同莫斯科的关系再进一步，就将在意大利引起极为不利的反响……[1]

墨索里尼的这封信不仅警告希特勒，意德关系已经恶化，并且还击中了一个要害：元首同苏俄的蜜月已经开始使双方都感到不安了。希特勒同苏俄的勾搭，使他得以发动战争，灭亡了波兰。此外他还得到了一些别的好处。例如，缴获的瘟国文件暴露了一项封锁得极严的战时秘密：苏联在北冰洋、黑海和太平洋等地提供港口，让德国进口迫切需要的原料，这些原料不通过这些港口[667]就会因英国的封锁而无法进口。

莫洛托夫在 1939 年 11 月 10 日甚至答应,所有这些货物在俄国铁路上的过境运费一概由苏联政府负担。[2]苏联政府允许德国船舰（包括潜水艇在内）在摩尔曼斯克东边的北冰洋港口帕里别尔卡进行修理和添加燃料——莫洛托夫认为摩尔曼斯克“还不够偏僻”，帕里别尔卡则“较为妥当，因为它更偏

---

[1] 全文，同上，第 604—9页。

[2] 同上，第 394 页。

远，没有外国船只进出”。[③]

1939 年整个秋天和初冬，莫斯科和柏林双方一直在谈判增加两国贸易事宜，到 10 月底，苏联日经向德国提供了为数可观的原料，特别是谷物和石油，但是德国方面还要更多的原料。不过德国人渐渐发现，苏联不仅在政治方面而且在经济方面，讨价还价起来也是一个精明厉害的对手。11 月 1 日，戈林元帅、雷德尔海军元帅和凯特尔上将“分别”（威兹萨克语）向德国外交部提出了抗议，说俄国对德国战争物资要求得大多了。一个月后，凯特尔又向威兹萨克抱怨说，俄国对德国产品的需求，特别是对制造军火的机器设备的需求，“数量越来越大，越来越不讲理了”。[①]

但是，如果德国想从俄国那里得到粮食和石油，他们就得用莫斯科所需要的东西来偿付。被封锁的德国极其迫切的需要俄国供给这些必需品，1940 年 3 月 30 日最严重的时候，希特勒甚至下令，向俄国送交战争物资应当先于德国武装部队。”[③]德国甚至一度把尚未竣工的重巡洋舰卢佐夫号也贴进去给莫斯科方面抵付一部分现款。在这以前，12 月 15 日，雷德尔海军元帅曾经建议把正在建造的世界最大的战舰俾斯麦号（4.5 万吨）的蓝图和图纸售给俄国，只要他们肯出“一笔很高的代价”。[④]

1939 年底，斯大林在莫斯科亲自参加了同德国贸易代表团举行的谈判。德国的经济专家们发现他是一个门槛很精的生意人。缴获的威廉街档案中，有好几份很长的备忘录详细地记述了同这位令人望而生畏的苏联独裁者三次难忘的会谈。他事无巨细无不熟悉，使德国代表们为之吃惊。他们发现斯大林是吓不倒、哄不过的，相反，他有时要求极苛，而且，正如纳粹谈判代表之一施努尔博士在给柏林的报告中所说的，他时常会“激动起来”。斯大林提请德国代表注意，苏联“已经帮了德国一个大忙，[并且]由于向德国提供了这种援助而树敌”。因此，苏联希望柏林方面能够给[668]予某些补偿。1939 年除夕，在克里姆林宫的一次会议上，

> 斯大林指出，飞机的总价格是无法接受的，因为那比实际价格高出了好多倍。如果德国不愿意交付这些飞机，不妨把话说清楚。

2 月 8 日午夜，在克里姆林宫的会议上，

> 斯大林要德国代表提出一个合适的价格，不要像以前那样索价太高。他还举出实例说，飞机的总价是 3 亿马克，而且德国把巡洋舰卢佐夫号作价 1·5 亿马克。不要认为苏联老实可欺。[①]

1940 年 2 月 11 日，一项复杂的贸易协定终于在莫斯科签字了。协定规定未来 18 个月内的最低限度换货额为 6.4 亿马克。这是对前一年 8 月间达成协议的 1.5 亿左右的年度贸易额的补充。俄国除了卢佐夫号巡洋舰和慱斯麦号的蓝图以外，还将得到海军重炮和其他装备，约 30 来架最新式的德国作战飞机，包括麦塞施米特 109 型和 110 型战斗机和容—88 型俯冲轰炸机。此外苏联还将获得石油和电力工业方面的机器、火车头、涡轮机、发电机、柴油机、船只、工作母机，还有德国的大炮、坦克、炸药、化学战装备等等的样

[③] 同上，第 213 页。

[①] 同上，第 490 页。

[③] 同上，第 1082 页（纽伦堡文件 2353—PS）。

[④]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 8 卷，第 537 页。

[①] 同上，分别见第 591，753 页。

品。[②]

德国方面在第一年中得到的物资，在最高统帅部也有记录——100 万吨谷物，50 万吨小麦，90 万吨石油，10 万吨棉花，50 万吨磷酸盐，还有相当数量的各种其他重要原料和从苏联过境的 100 万吨满洲大豆。[③]

外交部经济专家施努尔博士代表德国方面在莫斯科进行贸易谈判，他回到柏林之后写了一篇很长的备忘录，报告他为德国争得了一些什么利益。他说，斯大林除了向德国提供德国所亟需的原料以外，他还答应“大力协助”，“在第三国代购金属和原料”。

[施努尔最后说道] 这项协定为我国打开了通向东方的广阔门路……英国封锁的效果肯定将大大削弱。[①]

希特勒当时之所以不得不忍气吞声，采取在德国极不得人心的政策，支持俄国侵略芬兰，并且听任苏联在三个波罗的海国家建立陆空军基地（归根到底这还不是为了对付德国吗？），原因之一就在这里。斯大林帮助他克服了英国的封锁。但更重要的是，斯 [669] 大林使他有了单线作战的可能，使他能够在西线集中全部军事力量给法国和英国以致命的打击，征服比利时和荷兰，至于在这以后怎么办，希特勒已经把他的打算告诉他手下的将领了。

早在 1939 年 10 月 17 日，波兰战役刚刚结束的时候，他就提醒凯特尔，波兰领土

从军事观点看来对我国甚为重要，它可作为我们前沿出击点和军队战略集中点。为此必须妥善保护铁路、公路等交通线路。[②]

1939 年这个重要的年头临近结束之时，希特勒认识到，正如他在 10 月 9 日的备忘录中告诉将领们的那样，德国不能永远指望苏联保持中立。他说过，8 个月或 1 年以后情况可能发生变化。在 11 月 23 日对各将领的长篇谈话中，他强调指出，“我们只有在西线毫无后顾之忧的时候才可能对俄国发动攻击”。这是他那忙碌的头脑所念念不忘的事。

这个决定命运的年头就在一种奇怪的，乃至可以说是怪诞悲惨的气氛中，逐渐变为历史的陈迹了。虽然世界大战已经爆发，陆地上并没有战斗，在天空，巨型轰炸机所投掷的只是一些宣传小册子，而且是写得异常拙劣的宣传小册子。惟有在海上才有真正的交战。潜水艇继续在荒凉寒冷、惊涛骇浪的北大西洋上击沉英国船只，有时中立国船只也有遭殃的。

在南大西洋，德国 3 艘袖珍战舰有一艘斯比伯爵号已经从待命地区钻出来，在 3 个月内击沉了总吨位达 5 万吨的 9 艘英国货轮。接着，在战争开始后的第一个圣诞节的前两个星期左右，也就是 1939 年 12 月 14 日，德国报纸上印着狂热的大标题，无线电广播中飞也似地传出公报，到处传布海上大捷的消息，德国公众欢欣若狂。消息说，前一天“斯比伯爵”号在距蒙得维的亚 400 英里处同 3 艘英国巡洋舰遭遇，把它们打得不能作战了。但是狂喜很快就变成了困惑。3 天以后报纸宣布，这艘袖珍战舰已在上述乌拉圭首都港面的帕拉他河口自行凿沉。这算是什么大捷呢？12 月 21 日，海军总司令部宣告“斯比伯爵”号舰长汉斯·兰格斯道夫海军上校已“随舰殉职”，“他

[②] 1940 年 2 月 11 日贸易条约全文和交货数字，见同上第 762—64 页。

[③] 《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 4 卷，第 1081—82 页（纽伦堡文件 2353—PS）。

[①]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 8 卷，第 814—17 页（施努尔 1940 年 2 月 26 日的备忘录）。

[②] 《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 3 卷，第 620 页（纽伦堡文件 864—PS）。

的战斗精神和英雄气概无愧于元首、德国人民和德国海军对他的期望”。

他们始终没有告诉可怜的德国人民：“斯比伯爵”号为三艘火力不及它的英国巡洋舰所重创，*不得不驶入蒙得维的亚港修理，[670]乌拉圭政府按照国际法只让它停留72小时，这当然是不够的，可是那位“英雄”兰格斯道夫舰长又不敢开着他那艘遍体鳞伤的战舰出来同英舰继续作战，于是只得自行凿沉。他自己并未随舰殉职，而是两天以后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一间孤寂的旅馆房间里悄悄开枪自杀的。德国人民当然也无从得知12月18日约德尔将军在日记中记下的那件事：元首“对‘斯比伯爵’号未经一战就自行凿沉一事极为震怒”，于是把雷德尔海军元帅召来臭骂了一顿。[①]

12月12日希特勒颁发了另一项绝密指令，推迟了对西线的进攻，指令上注明新的决定要到12月27日才能作出，而“A日”最早也只能是1940年1月1日。他说，这样一来圣诞节就可照常给假。对德国人来说，圣诞节是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但是据我的日记所载，那年冬天柏林的圣诞节是冷冷清清的，很少人家互赠礼物；食物限制很严；男人都出去打仗了；大街上由于灯火管制一片漆黑；百叶窗紧闭着，全拉上了窗帘。人人抱怨战争。恶劣的饮食和寒冷的天气。

希特勒和斯大林相互电贺圣诞节。希特勒的贺电是：

祝您个人幸福，祝友好的苏联各族人民繁荣富强。

斯大林的复电是：

德苏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友谊有一切理由万古长青。

在柏林，冯·哈塞尔大使利用假期同他的密谋伙伴波比茨、戈台勒和贝克将军进行了商议策划。他在12月30日的日记里记载着他们最后商得的方案：

让几个师在“从西线调往东线的途中”留在柏林。这时，维茨勒本突然在柏林出现，解散党卫队。以这个行动为基础，贝克将军将前往佐森从勃劳希契年里把最高司令权接过来。由一名医生宣布希特勒因病不能继续任职，然后将他监禁起来。随即向全国人民呼吁：防止党卫队的暴行，恢复法治和基督教道德，继续作战，但准备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接受和平……

但是这完全是幻想，完全是空话。这些“密谋者”的思想甚至糊涂到这种程度：哈塞尔在日记中竟有一大段写的是考虑要不要留用戈林！[671]

戈林这时候却正同希特勒、希姆莱、戈培尔、莱伊以及其他国社党的头子们利用新年发布冠冕堂皇的文告。莱伊说：“元首永远是正确的！服从元首！”那位元首本人则宣称，发动战争的不是他而是“犹太人和资本主义战争贩子”。他接着又说：

我们举国团结一致，在经济上彻底做好了准备，军事上全副武装，跨入德国历史上这个最有决定意义的一年……愿1940年带来结果。不论发生什么情形，这个结果必将是我们的胜利。

12月27日，希特勒把在西线发动进攻的日期又推延了“至少两个星期”。1月10日他下令最后决定进攻日期为1月17日“日出前15分钟——即上午8点16分”。空军须在3天以前（即1月14日）就开始出击，它的任务是炸毁法国境内的敌方机场，但比利时和荷兰的机场不包括在内。这两个中立小国的命运要让它们捉摸不定，一直到最后一刻。

但是，1月13日这位纳粹统帅突然又“鉴于气象状况”再次下令延期。

[①] 兰斯道夫动人的信载在《海军事务元首会议记录》1939年第62页上。关于此一战役及其后果的其他材料，见第59—62页。

此后直到 5 月 7 日，缴获的最高统帅部的档案再没有提到西线的进攻日期。1 月 13 日下令取消原定的进攻，气候可能是一个原因；但是现在我们知道，主要原因是另外两件事。一件事是 1 月 10 日有一架极为特殊的德国军用机不幸被迫在比利时境内降落；另一件事是这时北方出现了新的机会。

1 月 10 日，希特勒下令定于 17 日假道比利时与荷兰发动进攻的当天，一架从缪恩施特飞往科隆的德国军用机在比利时上空云层中迷失方向，被迫在缪斯河畔梅克林附近降落。机上的德国空军重要参谋军官赫尔莫特 · 莱因柏格少校公文皮包里装着附有地图的西线德军进攻计划。当比利时士兵逼近时，这位少校慌忙钻入邻近的树丛，点起火来打算烧毁公文皮包中的文件。比利时士兵注意到这桩离奇的行动以后，扑灭了火焰，抢救了残余的文件。莱因柏格被押到附近的驻军司令部。一位比利时军官把未焚毁的一部分文件刚放在桌上，这位少校便不顾死活地扑过去，抓起文件就朝火炉里扔。那个比利时军官连忙将文件从火炉里抢了出来。

莱因柏格立刻通过德国驻布鲁塞尔大使馆报告柏林空军总部，他已将文件焚毁，“ 剩下的只是一块巴掌大的小残片 ”，但是柏林的高级人员中间已为这事惊慌失措。约德尔立刻就“ 敌人可能知道那些情况和可能不知道那些情况 ”向希特勒作了报告。其实他自己也不清楚。“ 如果全部文件落入敌人手中，”他于 1 月 12 日晋见元首以后在日记里写道，“ 情况就非常糟糕了 ”。当晚，里［672］宾特洛甫给布鲁塞尔德国大使馆拍去一份“ 特急 ”电，要他们立刻报告“ 公文皮包焚毁的情况 ”。约德尔的日记透露，1 月 13 日上午，戈林同匆忙飞返柏林的驻布鲁塞尔空军武官以及空军高级军官开了一个会。约德尔记道：“ 结论是：公文皮包确已焚毁。 ”

但是约德尔的日记里说得很清楚，这不过是黑暗里走路吹口哨，给自己壮壮胆子罢了。根据他的日记，那天下午 1 时，最高统帅部“ 用电话命令哈尔德将军：一切行动停止 ”。

同一天，1 月 13 日，德国驻布鲁塞尔大使紧急通知柏林，“ 由于比利时参谋总部接到了告警的报告 ”，比利时军队有大规模的调动。第二天德国大使又向柏林发去一份“ 特急 ”电：比利时政府下令进入“ D 级阶段 ”，这离总动员的最后阶段只差一步了；同时还新召两级适龄壮丁入伍。他认为原因在于比利时得到了“ 德军在比利时和荷兰边境上调动的报告，并且知道了德国空军军官身上找到的那块没有烧完的文件的内容 ”。

1 月 15 日晚，柏林高级将领们开始发生了怀疑，不知道莱因柏格少校是否真正像他所说的那样把那份惹出麻烦的文件烧掉了。于是为这件事又开了一次会，会后约德尔在日记上说，大家认为文件“ 大概是焚毁了 ”。但是 1 月 17 日，比利时外交大臣保罗一亨利 · 斯巴克约见德国大使，直截了当地通知他（德国大使随即转告了柏林）：

> 由于 1 月 10 日紧急着陆的一架飞机，一份性质严重、非比寻常的文件落入比利时手中。这份文件中有企图进攻的明白证据。这不是一份简单的普通作战计划，而是一份除了时间有待填入以外每个细节都作了规定的进攻命令。

德国方面始终未能完全肯定斯巴克是不是在蒙德国人。至于盟国方面，英法参谋总部已经获得了这份德国进攻计划的抄本，他们倾向于认为这些德国文件是一个“ 圈套 ”。丘吉尔说他当时曾坚决反对这种看法，他悲叹对于这么严重的警告竟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1 月 13 日，也就是希特勒获悉这事的第二天，他就下令推迟了进攻的日期，而且，等到

春天再作决定的时候，整个战略计划都根本改变了。[1]

但是，德国飞机在比利时境内被迫降落和气候恶劣并不是延期进攻的唯一原因。这时德国悍然袭击更靠北方的另外两个中立小国的计划在柏林渐趋成熟，而且当时准备先予执行。随着春天的到来，至少在德国方面，假战争快要结束了。

[1] 关于此次强行降落，我利用了一些德国的原始材料：德国驻布鲁塞尔的大使和空军武官给柏林方面的报告（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 8 卷）以及约德尔的日记。比利时人所抢救出来的德国在西线进攻的计划原文载《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 8 卷，第 423—28 页（纽伦堡文件 TC—58—A）。卡尔·巴尔兹在《当天空燃烧的时候》中对这一事件作了记述。丘吉尔的评述，见《风暴欲临》，第 556—57 页。他关于强行降落的日期却是错误的。

第二十章　征服丹麦和挪威

[673]

德国最新侵略计划的代号叫做“威塞演习”——一个听起来没有什么恶意的名字。它的来由和发展都独具一格，与占了本书大量篇幅的无端进攻计划迥然不同。它不像其他计划那样是由希特勒想出来的，而是由一个野心勃勃的海军将领和一个糊里糊涂的纳粹党棍所创造的。这是德国军事侵略中由海军起决定作用的唯一行动。这也是由最高统帅部制定计划和发动陆、海、空三军协同作战的唯一行动。实际上，甚至同陆军总司令部和陆军参谋总部都没有商量过，这使他们颇为不快。而且戈林也只是直到最后一刻才让他参与其事，这使这位肥胖的空军头子极感愤怒。

德国海军长期以来就在注视着北方。德国没有直接进入大洋的出海口，这个地理事实，在第一次大战时期，就已经对它的海军军官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英国用鱼雷和巡逻舰队，从设得兰群岛到挪威海岸，横跨狭窄的北海，布置了一道严密的封锁网，卡住强大的德国海军，严重地阻碍了潜水艇突破封锁进入北大西洋的企图，并且使德国商船不能出海。德国的外洋舰队从来也到不了外洋。在第一次大战时期，英国海军的封锁，曾把德意志帝国窒息得喘不过气来。在两次大战期间，指挥规模不大的德国海军的一小撮海军军官们，仔细考虑了这一次的经验和这个地理事实，认为将来在对英作战时，德国必须设法在挪威获得基地，这样才能击破英国在北海的封锁线，为德国海面和海底舰艇打开通往广阔的海洋之路，从而使德国能够扭转局势，对不列颠群岛实施有效的封锁。

因此这就难怪在 1939 年战争爆发的时候,德国海军里的第三号人物——也是一个有力的人物——鲁尔夫·卡尔斯海军上将就开始给雷德尔海军元帅（根据后者的日记和在纽伦堡的证词）连［674］连写信，说明“德国占领挪威海岸的重要性”[①]。雷德尔用不着怎样催促怂恿，就在 10 月 3 日波兰战役结束时，向海军作战参谋部提出秘密咨询，要求它调查在“俄国和德国的联合压力下，取得挪威基地”的可能性。他并就莫斯科的态度问题询问了里宾特洛甫，得到的回答是，从那里“可望得到全力的支持”。同时雷德尔告诉他的参谋部，必须尽快地把这种“可能性”告诉希特勒。[②]

10 月 10 日，雷德尔在向元首提出的关于海军作战的长篇报告中，提出了取得挪威基地的重要性，并说必要时可以在俄国的帮助下实现这一点。就秘密记录所载的情况来看，这是海军第一次直接要求希特勒注意这个问题。雷德尔说，领袖“立即看出了挪威问题的重要意义”，他要雷德尔把关于这个问题的报告留下，并且答应将适当考虑这个问题。但是这个纳粹统帅当时正忙干向西方发动进攻，以及设法克服他的将领们的动摇犹疑。*挪威问题，他显然顾不上了。[③]

但是过了两个月，这个问题又重新提上了日程，这有 3 个原因。

一个原因是严冬的降临。德国的生存，要依靠从瑞典进口的铁矿砂。战争的第一年，德国每年消耗的 1500 万吨铁矿砂之中，就有 1100 万吨要靠从

[①] 《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 4 卷，第 104 页（纽伦堡文件 1546—PS）；第 6 卷，第 891—92 页（纽伦堡文件 C—66）。

[②] 同上，第 6 卷，第 928 页（纽伦堡文件 C—122），第 978 页（纽伦堡文件 C—170）。

[③] 同上，第 892 页（纽伦堡文件 C—166）；《海军事务元首会议记录》，1939 年，第 27 页。

瑞典进口。在天气暖和的月份里，铁矿砂还可以从瑞典北部经波的尼亚湾越过波罗的海运到德国。即使在战时，这一条路线也不会发生问题，因为波罗的海已经有效地封锁起来，英国的潜艇和舰只无从进入。但是到了冬天，这一条海道运输线由于结了厚冰，就不能使用了。在严寒的季节，瑞典的铁矿砂只好改由铁道运到附近的挪威港口纳尔维克，然后再用船沿挪威海岸运到德国。德国运铁船的整个航行路线都在挪威领海以内，这就避免了英国海军舰艇和轰炸机的破坏。

因此，正如希特勒最初对海军指出的那样，一个中立的挪威有它的好处。这可以使德国不受英国的干扰而得到它生存所必需的铁矿砂。

在伦敦，英国当时的海军大臣丘吉尔马上看到了这一着。在战争爆发以后的最初几周中，他曾经努力说服内阁批准他在挪威领海内布雷，以便阻止德国运输铁矿砂。但是张伯伦和哈利法克［675］斯不愿侵犯挪威的中立，这个建议就这样暂时被搁起来了。④

1939 年 11 月 30 日俄国对芬兰的进攻，根本改变了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局势，大大增加了它对西方盟国和澫国的战略上的重要性。法国和英国都在苏格兰着手组织远征军，准备援助勇敢的芬兰人，后者出乎意料地对红军的进攻坚持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是远征军只有通过挪威和瑞典才能到达芬兰，而德国也立即看出，如果盟军被允许通过或者径自通过这两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的北部，那么他们就会以维持交通为名，留驻足够的兵力在那里，以便完全截断瑞典铁矿砂对德国的供应。*此外，西方盟国也一定会从北方包围德国。雷德尔海军元帅毫不迟缓地提醒希特勒注意这一威胁。

德国的这位海军首脑，现在已经在挪威本国找到一位叫做维德孔·阿伯拉罕·劳里茨·吉斯林少校的有用的同盟者，来推行他的计划。这个人的名字很快就在各种语文中成为卖国贼的同义词。

维德孔·吉斯林的出现

吉斯林在开始他的生涯之初还是相当体面的。他于 1887 年出生在一个世代务农的家庭里，他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在挪威军事学院毕业。当他还是 20 多岁的时候，就被派到彼得格勒担任陆军武官，由于他在英国和布尔什维克政府断绝关系期间，曾代为照料英国的利益，英国政府授给他大英帝国勋章。这时他既对英亲善，也对布尔什维克亲善。他作为挪威著名探险家和慈善家弗里德托夫·南森的助手，曾在苏俄呆了一个时期从事救济工作。

共产党人在俄国的成功，使这位年轻的挪威军官颇为心折；因此，当他回到奥斯陆的时候，他就向工党毛遂自荐，愿意效劳，当时工党还是共产国际的成员之一。他曾建议由他来组织一支“ 赤卫队 ”，但是工党对于他和他的计划并不信任，拒绝了他。于是，他就掉转方向，走到另一极端去了。他在 1931 年至 1933 年期间担任国防大臣之后，就在 1933 年 5 月，剽窃刚在德国获得了政权［676］的纳粹党的理论和策略，创立了一个叫做“ 国家统一党 ”的法西斯政党。但是纳粹主义在挪威富饶的民主土地上吃不开，吉斯林自己甚至连一个议员的席位也没有弄到手。他在选举中被本国人民唾弃以后，就转而投靠纳粹德国去了。

---

④ 丘吉尔：《风暴欲临》，第 531—37 页。

他和德国纳粹运动的官方哲学家、头脑糊涂的阿尔弗雷德·罗森堡建立了关系。这个哲学家曾担任过许多职位，其中之一就是纳粹党的外交事务办公室主任，这个希特勒启蒙导师之一，波罗的海来的白痴，以为他已在这个挪威军官的身上找到了机会，因为罗森堡醉心的幻想之一就是建立一个排除犹太人和一切“不纯”种族的北欧大帝国，在纳粹德国领导之下，最后统治全世界。从 1933 年以后，他一直和吉斯林保持联系，给吉斯林灌输了自己的荒谬的哲学和宣传。

1939 年 6 月，当欧洲正是战云密布的时候，吉斯林乘出席在卢伯克举行的北欧协会会议的机会，要求罗森堡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其他方面给予支持。根据在纽伦堡公开出来的罗森堡的秘密报告，吉斯林曾就战争一旦爆发时英国有控制挪威的危险这个问题警告过罗森堡，并且提到德国占领挪威的好处。他要求对于他的党和报纸给予实质上的援助。罗森堡是个打报告的能手，他写了 3 份报告，分送给希特勒、戈林和里宾特洛甫，但是，并未得到这 3 个头领的重视——在德国没有一个人把这个“官方哲学家”当作一回事，罗森堡总算为吉斯林的25个强壮的冲锋队员安排好于8月间在德国进行两周训练。

在战争的最初几个月中，雷德尔海军元帅——至少他在纽伦堡是这样供认的——同罗森堡和吉斯林都没有什么接触。他同前者不甚相识，至于后者，他根本没有听到过名字，但在俄国进攻芬兰以后，雷德尔立即就开始从驻奥斯陆的海军武官理查德·施莱勃上校那里得到关于盟军就要在挪威登陆的消息。他在 12 月 8 日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希特勒，并且直率地提出意见说，“必须占领挪威”。[5]

不久，罗森堡写了一份《关于挪威枢密顾问吉斯林来访》一事的备忘录（没有日期）给雷德尔。这个挪威阴谋家已经到了柏林，罗森堡认为应该告诉雷德尔他是怎么样一个人，是来干什么的。他说，在挪威陆军的主要军官之中，有许多人同情吉斯林。为了证明这一点，吉斯林给他看了纳尔维克驻军司令康拉德。孙德洛上校一封最近的信。这封信把挪威首相说成是“一个呆木头”；把他的一个主要大臣说成是“一个老盾鬼”；并且宣告他自己愿意“粉身碎骨，举行全国起义”。但是，孙德洛上校后来临到要保卫国家、抵抗侵略时却没有粉身碎骨。

罗森堡告诉雷德尔说，实际上吉斯林有一个政变计划。这个[677]计划想来一定得到柏林的重视，因为它是从德奥合并事件抄袭过来的。吉斯林的一些冲锋队员将在德国由“有经验的、顽强的、善于这种活动的国社党人”施以紧急训练。这些人受过训练回到挪威之后，将占领奥斯陆的战略据点，

同时，德国海军和德国陆军分遣队，应挪威新政府的特别要求，将在奥斯陆附近的一个预定的港湾出现。

这是德奥合并策略的全部重演，只是由吉斯林担任赛斯—英夸特的角色而已。

[罗森堡又说]吉斯林认为这样一种政变……会得到陆军中现在和他有联系的那一派人的赞同……至于国王，他相信会接受这种既成事实的。

吉斯林对于需要使用多少德国部队来支持这一行动的估计，与德国方面所作的估计是一致的。[6]

---

[5] 《海军事务元首会议记录》，1939 年，第 51 页。

[6] 罗森堡备忘录，载《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 6 卷，第 885—87 页（纽伦堡文件 C—64）。另载《海军

雷德尔海军元帅在 12 月 11 日和吉斯林见了面。这次会见是由一个叫做维拉姆·哈格林的挪威商人通过罗森堡安排的，这个商人由于业务关系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德国，他是吉斯林在德国的主要联络员，哈格林和吉斯林告诉雷德尔许多消息，他都及时记录在海军的机密档案里。

> 吉斯林说……英国计划在斯塔瓦格尔附近登陆，而克里斯丁散则被提出可能作为英国的基地。挪威的现政府、议会以及整个外交政策都控制在霍尔—贝利夏*的亲密友人、著名的扰太人哈姆勃罗[卡尔·哈姆勃罗是挪威议会主席] 手中……关于英国占领后对德国所造成的危险，他作了详尽的叙述……

为了在英国行动之前先发制人，吉斯林建议“把必要的基地交由德国武装部队自由处理。在整个沿海地区的铁路、邮政和交通的重要岗位上的人员，已经为这一目的而被收买过来了”。他和哈格林来到柏林是为了建立“将来和德国的明确关系……希望能召集会议讨论有关联合行动和把部队运到奥斯陆去等等问题”[7]

雷德尔被深深地打动了，后来他在纽伦堡供认了这一点。他对他的两个客人说，他要和元首商量一下，然后把结果通知他们。第二天他就这样办了，开会的时候，凯特尔和约德尔也在场。这个海军总司令（在缴获的文件中有他的关于这次会议的报告）对希特勒说，吉斯林已经给他“一个可靠的印象”。然后他就摘要[678]叙述了这个挪威人所订的计划，强调吉斯林“和挪威陆军军官们的密切关系”，以及他为了“举行一次政变以接管政府并请求德国援助”所作的准备工作。所有出席的人一致认为，不能让英国占领挪威，但是雷德尔却忽然谨慎起来。他指出，德国对挪威的占领，“自然会招致英国采取有力的对策……而德国海军还没有充分的准备，足以作长期的对抗。万一要实行占领的话，这是一个弱点”。另一方面，雷德尔又建议准许最高统帅部

> 与吉斯林一起制定计划，以进行准备工作和按下列两种方法之一实行占领：
>
> 甲、通过友好方法，即由挪威要求德国军队协助；
>
> 乙、通过武力。

希特勒并没有准备好在这个时候走这一着。他回答说，他首先要亲自和吉斯林谈一谈，“以便对他有所了解”。[8]

就在第二天，即 12 月 14 日，他和吉斯林谈了话。雷德尔亲自把这两个挪威卖国贼送到总理府。这次会见的记录虽然没有找到，但是吉斯林，正如他给那位海军首领留下了深刻印象一样，显然也给这位德国独裁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就在当天晚上，希特勒即命令最高统帅部和吉斯林会商，草拟一项计划。哈尔德听说这个计划也将把对丹麦的进攻包括在内。[10]

12 月 16、18 两日，尽管希特勒由于忙于应付有关斯比伯爵号的坏消息，但他还是连续两次接见了吉斯林。可是，海军的受挫看来使他对于主要依靠海军进行的斯堪的纳维亚冒险更加小心起来。据罗森堡说，元首对吉斯林强调，“挪威的态度最好是……完全中立”。但是如果英国人准备入侵挪威，德国人就不能不抢先占领。同时，他也将供给吉斯林一些经费，以对付英国的宣传和加强他自己的亲德活动。1 月间，先拨给了他 20 万金马克，并答应

事务元首会议记录》，1939 年，第 53—55 页。

[7] 《海军事务元首会议记录》，1939 年，第 55—57 页。

[8] 同上，第 57—58 页。

[10] 约德尔的日记，12 月 12—13 日——这个日期显然有误。哈尔德的日记记的是 12 月 14 日。

从 3 月 15 日开始每月给 1 万英镑，连续 3 个月。[①]

圣诞节前不久，罗森堡派了一个名字叫作汉斯一威廉 · 夏特的特务到挪威去和吉斯林一道工作。圣诞假期中，有少数参与内幕的最高统帅部军官，开始考虑最初定名为“北方研究”的计划。[679]海军方面，对此是有意见分歧的。雷德尔确信英国想在不久的将来进入挪威，但海军作战参谋部的作战处却不同意这种看法，在它的 1940 年 1 月 13 日的秘密作战日志里，透露了他们的不同意见。[②]

作战处不相信英国有可能马上占领挪威……[它]认为如果没有英国进攻的成胁，德国占领挪威就将是一个危险的行动。

因此，海军作战参谋部得出结论说，“最有利的解决办法，无疑地就是维持现状”，并且强调说这样就可以继续利用挪威的领海，使铁矿砂的运输“完全安全”。

希特勒对于海军的迟疑和最高统帅部在 1 月中旬向他提出的“北方研究”，的结果报告都感到不满。1 月 27 日，他要凯特尔发出一道绝密的指令，说明“北方研究”的下一步工作将在元首“本人的直接监督之下，’继续进行，并指示凯特尔负责准备一切。于是在最高统帅部成立了一个由海、陆、空三军各派一名代表组成的工作小组。这一军事行动计划以后就用“威塞演习”的代号。[①]

这一步骤，似乎表明希特勒对于占领挪威不再犹疑不决了。如果在他的思想上还有任何怀疑的话，那么，经过 2 月 17 日在挪威领海上发生的事件，他的任何疑团都完全驱散了。

原来斯比伯爵号的一艘辅助供应舰阿尔特马克号，设法通过了英国封锁线偷偷地向德国开回来。2 月 14 日在挪威领海内向南朝德国航行时，被一架英国侦察机发现了。英国政府知道，舰上装有被斯比伯爵号击沉的英国船只被俘船员三百人，他们是被当作战俘运到德国去的。挪威海军军官曾对阿尔特马克号供应舰作了一次马马虎虎的检查，发现舰上并没有俘虏，也不是武装舰只，于是发给通行证，准予开回德国，但是丘吉尔了解到的情况，却不是这样，他亲自命令一个英国驱逐舰队开人挪威领海去登上德国船解救俘虏。

英国驱逐舰哥萨克号在舰长菲力普 · 维安海军上校的指挥下，于 2 月 16 日夜间在阿尔特马克号隐藏地点约新峡湾去执行它的任务。经过一阵混战之后，德国人死亡 4 人，受伤 5 人，英国上船的人员解救了 299 名海员，这些人原来都被关在货仓里和一个空油槽内，为的是避免被挪威人发现。

挪威政府就英国侵犯挪威领海提出了强烈的抗议，但张伯伦［680］在下院作答说，挪威准许德国人使用自己的领海，运输英国俘虏到德国俘虏营去，本身就已经违反了国际法。

对于希特勒来说，这使他最后打定了主意。他由此认为，挪威不会认真反对英国在自己的领海内使用武力。从约德尔的日记中可以看出，阿尔特马克号舰上的斯比伯爵号船员没有作更顽强的战斗——“没有抵抗，英国未受损失”——也使希特勒非常愤怒。据约德尔的日记透露，2 月 19 日希特勒极

[①] 罗森堡备忘录，见《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 3 卷，第 22—25 页（纽伦堡文件 004—PS）。

[②]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 8 卷，第 663—66 页。

[①] 指令全文，见《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 6 卷，第 883 页《纽伦堡文件 C—63）。

力催促完成“威塞演习”的计划。他对约德尔说，“把舰只装备好，把部队准备好”。他们还缺一个领导这整个行动的军官，因此，约德尔就提醒希特勒，已经到了指派一位将军和参谋人员的时候了。

凯特尔提出一个军官，他就是曾在第一次大战末期随冯·德·戈尔茨将军的师团在芬兰作战过的尼古拉斯·冯·福肯霍斯特将军，他现在正在统率西线的一个军。希特勒对于指派一个指挥官来从事北方冒险这样的小事过去一直没有放在心上，这时，马上就把他召回来了，这位将军虽然出身于原来叫做雅茨仁伯斯基而现在又改称为福肯霍斯特（德文的意思是“鹰巢”）的西里西亚的军人世家，但元首并不认识他。

福肯霍斯特在纽伦堡的一次提审中,曾谈起 2 月 21 日清晨他们第一次在总理府见面时的情况，这次会见是很耐人寻味的，福肯霍斯特从来也没有听见过什么“北方研究”计划，而且他也是第一次面对这个纳粹统帅，希特勒显然没有能使他像所有其他将领那样产生敬畏的情绪。

[他在纽伦堡说]我听命坐下。后来我又遵命把 1918 年芬兰作战的情况告诉元首……他说：“坐下，把当时的情况告诉我。”我就说了。

后来，我们站了起来，他把我带到铺满了地图的一张桌子旁边。他说：“德国政府已经知道英国人企图在挪威登陆……”

福肯霍斯特说，他从希特勒那里得到的印象是：阿尔特马克号事件对领袖的“立即执行计划”起了最大的影响。使这位将军感到惊奇的是，他当场立即就被指派为执行这个计划的总司令。希特勒还说，陆军将交给他 5 个师由他指挥，目的是占领挪威几个主要的港口。

希特勒在中午时分叫福肯霍斯特退去，并且要他在下午 5 时带着他的占领挪威的计划回来报告。

［福肯霍斯特在纽伦堡说］我出去买了一本旅行指南，想看看挪威究竟是什么样子。我对它一点也不了解……后来，我回到了我的旅馆的房间里，根据旅行指南进行工作……下午 5 时，我回到元首那里去。[①]

最高统帅部制定的计划从来也没有给这位将军看过，因此他［681］根据一本旧旅行指南制定出来的计划可以想象得到，是相当粗糙的，但看来却已经使希特勒满意了。计划预定在奥斯陆、斯塔瓦格尔、卑尔根、特隆赫姆和纳尔维克 5 个挪威港口各分配 1 个师的兵力。福肯霍斯特后来说：“你所能做的也就是如此而已，因为它们都是大港口。”这位将军在宣誓保守秘密和受到“赶快进行”的催促以后，就辞退出来，开始进行工作了。

正在忙于准备进攻西线的勃劳希契和哈尔德对于这些工作的进行，基本上是不知道的。直到 2 月 26 日福肯霍斯特谒见陆军参谋总长并请求派一些部队、尤其是山地作战部队来执行他的任务，到这时候，他们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哈尔德并不怎么积极合作；实际上他很为恼火，他要求更多的了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还有什么需要。哈尔德在日记里叹息说：“这些事情，元首和勃劳希契从来没有商量过，这种情况必须在这次的战争史上记载下来！”

然而，对这些旧派将领、尤其是对他的参谋总长异常瞧不起的希特勒，是不能推三阻四的。他在 3 月 29 日*热心地批准了福肯霍斯特的计划，包括增加两个山地作战师，并且宣称还需要更多的部队，因为他要“在哥本哈根摆下重兵”。丹麦肯定地成了希特勒的进攻对象；因为空军想得到那里的基

[①] 在纽伦堡提讯福肯霍斯特的记录，见《纳粹的阴谋与侵略》，附件 B，第 1534—47 页。

地，以便进攻英国。

第二天，3 月 1 日，希特勒为“ 威塞演习 ”发出了一道正式指令。

绝 密

斯堪的纳维亚局势的发展，要求作占领丹麦和挪威的一切准备。这一作战行动，可以防止英国对斯堪的纳维亚和波罗的海的侵犯。此外，它还可以保证我们在瑞典的铁矿基地，并为我们的海军和空军提供进攻英国的更为广阔的出发线……

从我们的军事、政治力量和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的军事、政治力量的对比来看，使用于“ 威塞演习 ”的兵力，越少越好。数量上的弱点，应以大胆行动和出奇制胜来弥补。

在原则上，我们应当竭力使这一行动像是一次和平占领。它的目的是以武力维护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的中立。相应的要求将于占领之初递交给这些国家的政府。必要时将举行海、空军示威，以便为这些要求提供必要的压力。如果示威不行，遇到抵抗，就用一切军事手段加以击溃……越过丹麦国界和在挪威登陆，必须同时进行……

［682］最重要的是，对于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和西方的敌人，应该用奇兵袭击……只有在从海上出发的时候，才让部队知道实际的目标。[①]

据约德尔报告，就在 3 月 1 日那天晚上，陆军总司令部由于希特勒要求抽调军队到北方作战而“ 大为生气 ”。第二天戈林又对凯特尔“ 发了一顿脾气 ”，并且跑到希特勒那里去诉苦。这位肥胖的元帅，由于长期以来未得参与机密，并且由于空军已经置于福肯霍斯特的指挥之下而感到愤怒。希特勒在一场严重的互争权力的威胁之下，于 3 月 5 日召集三军领袖到总理府，企图平息这场纠纷，但是也无济于事。

［约德尔在日记里写道］元帅［戈林]之所以生气，是因为事先没有跟他商量。这次讨论几乎是他一人在说话，他并且试图证明所有以前的准备都毫无用处。

希特勒为了安抚他，稍微作了一些让步，计划仍迅速进行。根据哈尔德的日记，他早在 2 月 21 日就有这样的印象：对丹麦和挪威的进攻，要在对西方发动了进攻并取得一定的成就以后才开始。究竟先开始哪一个行动，希特勒自己是犹豫不决的，并且在 2 月 26 日向约德尔提出这个问题。约德尔建议把这两个行动完全错开，希特勒同意说，“ 如果可能的话，就这样办 ”。3 月 3 日，他决定“ 威塞演习 ”应该在“ 黄色方案 ”（进攻西方的代号）之前执行，并且“ 很严厉地 ”对约德尔说：“ 必须在挪威迅速采取强而有力的行动。 ”这时，勇敢的但是在人力上寡不敌众和武器上弱不敌强的芬兰军队，遭到俄国的强大进攻正面临着覆灭的灾祸，据可靠的报告，英法的远征军即将从苏格兰基地开往挪威登陆，准备通过挪威和瑞典到芬兰去援救芬兰人。*这一威胁就是希特勒急于行动的主要原因。［683］

但是，3 月 12 日，俄芬战争突然以芬兰接受俄国苛刻的请和条件而停止了。这在柏林受到了普遍的欢迎，因为它使德国不用再不得人心地支持俄国进攻芬兰，而且也使苏联接管波罗的海的企图暂时中止下来，但是，就希特勒自己在斯堪的纳维亚的冒险来说，俄芬战争的停止使他感到很为难。正如约德尔在日记中所吐露的那样，这使占领挪威和丹麦的“ 动机 ”“ 难子解释 ”。他在 3 月 12 日写道：“ 芬兰和俄国的请和，使英国而且也使我们失去占领挪威的任何政治依据。 ”

希特勒现在确实很难找到借口。3 月 13 日，忠实的约德尔写道：元首“ 还

[①] 指令全文，见《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 6 卷，第 1003—5 页；另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 8 卷，第 831—33 页。

在找寻理由”。第二天，他又写道：“元首对于如何为‘威塞演习’辩解，还没有拿定主意。”更糟糕的是，雷德尔开始泄气了。他“怀疑在挪威搞预防性战争（？）是不是还有重要意义”。[①]

现在希特勒踌躇起来了。这时，又遇到了另外两个问题：(1) 怎样应付美国副国务卿塞姆纳尔·威尔斯。他是奉罗斯福总统之命于 3 月 1 日到达柏林，企图试探在西线开始大屠杀以前是否有终止战争的可能性的；(2) 怎样取得由于受到忽视而被激怒了的意大利盟国的谅解。希特勒还没有考虑怎样答复墨索里尼 1 月 3 日的一封盛气凌人的来信。柏林和罗马的关系显然已经冷淡下来了。德国人有一定的理由相信，塞姆纳尔·威尔斯现在到欧洲来，是想把意大利从已经有裂痕的轴心拉开，并且说服它：如果战争继续下去的话，无论如何也不要和德国一起作战。各种警告从罗马传到柏林，说明现在已经是采取措施使这位怀恨在心的意大利领袖保持联合的时候了。

希特勒会晤塞姆纳尔·威尔斯和墨索里尼

希特勒、戈林和里宾特洛甫对于美国情况的愚昧无知，简直[684]达于极点。*虽然他们这个时候的政策是企图使美国置身于战争之外，但他们却像 1914 年他们的柏林前辈一样，并不认真地把美国看成是一个有强大军事潜力的国家。早在 1939 年 10 月 1 日，德国驻华盛顿的陆军武官弗雷德里希·冯·波提彻尔将军就曾经劝告柏林的最高统帅部用不着担心美国会派远征军到欧洲来。12 月 1 日，他又进一步通知他在柏林的陆军上司说，美国的军事装备完全不足以执行“进攻性的战争政策”，并且还说，“国务院的不起作用的仇恨政策和罗斯福的一时冲动的政策常常是以对美国军事力量估计过高为依据而制定出来的，与这些政策相反”，华盛顿的参谋总部，“对于德国和它从事战争的原因还是有所了解的”。在他的第一次报告里，波提彻尔写道，“林白和著名飞行家里肯巴克”都主张美国置身于战争之外。但是，到了 12 月 1 日，尽管他低估美国的军事力量，他仍然警告最高统帅部说，“如果美国认为西半球受到威胁，它还是会参战的”。[①]

德国驻华盛顿代办汉斯·托姆森曾尽最大努力向他在柏林的无知的外交部长提供美国的一些事实。9 月 18 日，当波兰战争将近结束的时候，他警告德国外交部说，“美国绝大多数人民都同情我们的敌人，美国深信德国是犯有战争罪行的”。在同一份报告里，他还指出，德国想在美国进行破坏活动的任何企图都会引起可怕的结果。他要求不要以“任何方式”进行这一类破坏活动。[②]

这个要求显然没有得到柏林方面的重视，因为在 1940 年 1 月 25 日，托姆森又打电报给柏林说：

> 我得知纽约的一个美籍德人冯·霍斯伯格和一个德国公民华尔特，据说在德国谍报局的指使之下，计划对美国军事工业进行破坏。据信冯·霍斯伯［685］格家里藏有雷管。

托姆森要求柏林停止这种做法。他说：

> 要使美国参战，再也没有比重复采用上次世界大战时驱使美国参加我们敌人行列的那种行动更

[①] 约德尔日记，1940 年 3 月 10—14 日。

[①] 同上，第 179—81 页，第 470—71 页。

[②] 同上，第 89—91 页。

加可靠了，再说，那种行动并不能对美国的战争工业造成丝毫破坏。

此外，他又说，“无论从哪方面来看，这两个人都不适宜做谍报局的特工人员”。”

从 1938 年 11 月罗斯福召回美国驻柏林大使以抗议纳粹对犹太人的公开屠杀以来，两国都没有大使驻在对方了。贸易已减少到最小数额，这主要是由于美国的抵制，而现在又被英国的封锁完全截断了。1939 年 11 月 4 日，参众两院表决解除了禁止军火出口令，这就打开了美国向西欧盟国供应军火的道路。塞姆纳尔·威尔斯就是在这种两国关系迅速恶化的情况下于 1940 年 3 且 1 日到达柏林的。

塞姆纳尔·威尔斯到达柏林的前一天，即 2 月 29 日——这一年是闰年——希特勒采取了非常的步骤，发出一道秘密的“如何和威尔斯先生谈话的指令”[①]。指令要求德国方面持“保留态度”，并且告诫要“尽量让威尔斯先生发言”。这个指令为接待美国特使的全体高级官员规定了 5 点准则。德国的主要论点是，德国并没有对英法两国宣战，而是英法两国向德国宣战；元首曾于 10 月间向它们提出和平的建议，但它们拒绝了；德国接受了挑战；英法进行战争的目的是想“毁灭德意志国家”，因此，德国没有选择的余地，只好继续战争，等等。

[希特勒最后说]应当尽量回避具体政治问题的讨论，例如未来的波兰国家等问题。如果（他）提出这类问题，可以说这种问题要由我作决定。不言[686]而喻，奥地利问题和波希米亚及摩拉维亚保护国的问题，是完全没有讨论余地的……

凡是可以被解释为……德国对于现在讨论和平的可能性表露有任何兴趣的话，都应避免，说得更恰当一点,我要求不要让塞姆纳尔·威尔斯先生有丝毫理由怀疑德国要胜利结束这场战争的决心……

不仅里宾特洛甫和戈林，连希特勒自己分别在 3 月 1 日、3 日和 2 日先后接见威尔斯的时候，也是极其严格地按指令行事的。根据缴获文件中施密特博士所作的长篇谈话记录来判断，这位有些沉默寡言、老于世故的美国外交官必然会以为他到了一所疯人院，如果他还相信自己的耳朵的话。这 3 个纳粹巨头，个个都对威尔斯大肆曲解历史，他们极其荒谬地歪曲事实，甚至连最简单的字都失去了原来意义。“希特勒在 3 月 1 日发出他的“威塞演习”的指令，第二天接见威尔斯时却坚持说，盟国的战争目的是“消灭”，而德国的战争目的是“和平”。他向他的来客大谈其为了与英、法保持和平所做的一切努力。

在战争爆发前不久，英国大使曾坐在塞姆纳尔·威尔斯现在所坐的地方，元首向他提出他一生中最大的建议。

他对那个英国人所提的建议都被拒绝了，英国现在一心一意要毁灭德国。因此，希特勒认为：“这场战争将不得不打到底……除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搏斗之外，没有别的解决办法。”

这就难怪威尔斯向威兹萨克老实说并又向戈林重复：如果德国决心要在西方取得军事胜利，那么，他的欧洲之行“就毫无意义……而他也就没有别的话要说了”。[①]*[687] 虽然威尔斯在与德国人谈话时强调说，他在这次旅

[①] 希特勒指令文，见同上，第 817—19 页。

[①] 施密特博士所记的塞姆纳尔·威尔斯同希特勒、戈林和里宾特洛甫会谈记录载《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 8 卷；另见威兹萨克关于他同威尔斯会谈的两份报告。这个美国使节也会见过沙赫特博士，而在这以前希特勒曾召见了这个失宠的银行家并指示他应采取什么态度。见哈塞尔著上引书，第 121 页。威尔斯自己

行中从欧洲政治家那里所听到的话都是为了传达给罗斯福一个人听的，但是他却认为不妨自作主张告诉希特勒和戈林：他曾和墨索里尼作过“长时间的、建设性的、有益的”谈话；墨索里尼认为“在欧洲实现持久的巩固的和平，还是有可能的”。德国人这时看到，如果意大利独裁者真有这样的想法，那么，现在就是纠正它们的时候了。和平肯定是要的，但那只能在德国取得四线辉煌的胜利之后。

希特勒没有答复墨索里尼 1 月 3 日的信，使这位意大利领袖愈来愈感烦恼。在整整一个月之中，阿托利科大使不断询问里宾特洛甫，什么时候可以得到答复，并且暗示意大利和英、法的关系正在改进，而且贸易也在增加。

这种贸易内容之一是意大利出售战争物资，这使德国人十分恼火。他们在罗马不断提出抗议，指责意大利帮助西方盟国是不适当的。冯·马肯森大使向他的朋友威兹萨克一再叙说自己的“严重焦虑”，而后者也害怕墨索里尼的那封没有得到答复的信如果再“置之不理”，这位意大利领袖就要采取“自由行动”了——德国也许会永远失去墨索里尼和意大利了。[①]

3 月 1 日希特勒得到了一个机会。英国宣布切断德国由海道通过鹿特丹运往意大利的煤炭运输。这对意大利经济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这位意大利领袖对英国大为愤怒，同时对于马上答应设法用火车运煤的德国又热情起来。希特勒趁热打铁，在 3 月 8 日写了一封长信给墨索里尼，两天以后由里宾特洛甫在罗马亲自递交。[②]

信里并没有对迟迟未复前信表示歉意，但是语气是亲切的。在这封信中，希特勒比以前写给他的这个意大利伙伴的信中说的话都要多。他把几乎所有可以想到的问题的看法和政策都作了相当详细的说明。这封信还对纳粹与俄国的联盟问题，抛弃芬兰人问题，以及连一个残存的波兰也没有留下的问题都作了辩解。

如果我把德国部队从总督辖区［波兰］撤走，这并不能使它得到绥靖，而只会带来可怕的混乱。教会将不能执行它赞美上帝的职能！而神甫的脑袋也要被砍掉……

希特勒继续写道，至于塞姆纳尔·威尔斯的访问，并没有什[688]么结果。他仍然决定在西方发动进攻。他认识到“未来的战争不会轻易得胜，而将是德国历史上一场最残酷的斗争……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

接着，希特勒就向墨索里尼示意，劝他参加战争。

领袖，我认为，这次战争的结果无疑也将决定意大利的命运……你终有一天会面对今天与德国作战的这些敌人的……我也看到了我们两国的、两国人民的、我们革命的和我们制度的命运，都已不可分割地联结在一起了……

最后，让我向你保证，不管怎样我总相信，命运迟早会使我们终于并肩作战。这就是说，不管局势中的个别情况现在会怎样发展，你将同样地无法逃避这场武装冲突。我还相信，届时你将比以往更加贴近我们一边，正如同我将更加贴近你们一边一样。

墨索里尼给这封信奉承得飘飘然了。他马上向里宾特洛甫保证，他同意“在火线上”站在希特勒这一边。这位纳粹外交部长不失时机地把他的主人恭维一番。他说，元首“对于最近英国对德国从海道运煤到意大利采取封锁措施，感到异常愤慨”。他问意大利需要多么煤，墨索里尼回答说，每月 50

关于他在柏林会谈的记述载《决定的时刻》。

①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 8 卷，第 652—56 页，第 683—84 页。

② 希特勒 1940 年 3 月 8 日致墨索里尼信，见同上，第 871—80 页。

万吨到 70 万吨。里宾特洛甫爽快地说，德国现在准备每月供应 100 万吨，而且提供运煤用的大部分车皮。

在 3 月 11 日、12 日两天，他们两人举行了两次长时间的会谈，在场的有齐亚诺。据施密特博士的速记记录透露，里宾特洛甫当时极其浮夸。[①]虽然要商谈的还有更加重大的问题，他却把缴获到的波兰驻西方一些首都的使节发回的一些外交电报拿出来给墨索里尼看，来表明“美国的滔天的战争罪行”。

> 这位外交部长解释说，这些文件明确地表明，美国大使布立特［驻巴黎］、肯尼迪［驻伦敦］、德莱西尔·比德尔［驻华沙］所起的罪恶作用……从这些文件可以看出犹太富豪集团的阴谋，这个集团的影响通过摩根和洛克菲勒一直达到罗斯福那里。

这位妄自尊大的纳粹外交部长胡吹了几个小时，这只有显示他一贯的对于世界大事的无知。他强调两个法西斯国家的共同命运，并且强调说，希特勒马上就会进攻西线，“在夏天打败法国军队”，在“秋天以前”把英国人赶出大陆。墨索里尼多半时间在听他说话，偶而插上一两句话，这个纳粹部长显然没有注意到话里的讽刺意味。例如，根据施密特的记录，当里宾特洛甫夸口说“斯大林已经放弃世界革命的想法”时，墨索里尼就反驳说，“你真相[689]信这个说法吗？”当里宾特洛甫说，“每一个德国士兵都相信肯定会在今年取得胜利”时，墨索里尼就插嘴说，“这句话很有意思”。这天晚上，齐亚诺在日记里写道：

> 会见以后，在没有别人在旁的时候，墨索里尼告诉我，他不相信德国的攻势，也不相信德国会完全成功。

意大利领袖答应在第二天会谈时表示自己的意见，里宾特洛甫对于他可能发表怎样的意见多少有些不安。他在给希特勒的电报里说，他还得不到一点“有关这个领袖的想法的暗示”。

他其实是用不着担心的。第二天，墨索里尼的态度完全改变了。施密特写道，他十分突然地“转变为完全赞成战争”。他告诉客人说，问题不在于意大利是否与德国一起作战，而在于什么时候一起作战。时间的配合是“需要十分慎重考虑的。因为他在一切准备工作就绪以前，不应该参战，以免加重他的伙伴的负担”。

> 这一回，他不得不非常明确地说明，意大利的经济情况不能长期作战。他不能像英法两国那样，可以每天花费 10 亿里拉。

这些话看来使里宾特洛甫愣了一会儿。他想逼着这个独裁者确定意大利参战的日期，但后者却不肯把话说死，他说，“在意大利确定对英、法的关系的时候，也就是和这两个国家决裂的时候，意大利参战的日期就会到来”。他补充说，“挑起”这种破裂是极容易的事。里宾特洛甫虽然坚持，但他并没有能够得到一个确定日期。显然这件事情须由希特勒来亲自过问了。因此，纳粹外交部长建议他们两人在 3 月下半月即 19 日以后在勃伦纳会晤。墨索里尼欣然接受了这个建议。这里要附带说明一下，里宾特洛甫对于希特勒打算占领丹麦和挪威的计划，并没有透露过一个字。有些机密，即使你迫切需要一个盟国和你搭伙，也还是不能向他说的。

[①] 施密特的会议记录，见同上，第 882—93 页，第 898—909 页；齐亚诺的意见见《齐亚诺外交文件集》，第 339—59 页。关于他们对会议的个人评论可见施密特著上引书，第 170—71 页，以及《齐亚诺日记》。里宾特洛甫向希特勒报告会见情况的两份电报，载《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 8 卷。

里宾特洛甫虽然没有能够使墨索里尼同意规定一个日期，但他已经诱使意大利领袖同意参战了。齐亚诺在日记里哀叹说：“如果他希望增强轴心，那么，他是成功了。”当塞姆纳尔·威尔斯访问柏林，巴黎、伦敦之后回到罗马，在 3 月 16 日与墨索里尼再度会见的时候，他发现后者已经变成另一个人了。

[威尔斯后来写道]他看来如释重负……我一直在奇怪，在我第一次访问罗马之后的两个星期之中，他是不是还没有下定重大的决心，在里宾特洛甫[690]访问他时，他是不是还没有决定把意大利拖入战争。[①]

威尔斯其实用不着奇怪。

里宾特洛甫坐着专车离开罗马不久，这个心里烦恼的意大利独裁者又反复犹豫起来。齐亚诺在 3 月 12 日的日记里写道：“他生怕答应对盟国作战这一步走得太远了。他现在想劝阻希特勒发动大陆攻势，并且希望在勃伦纳会谈时能够实现这个愿望。”齐亚诺虽然是一个才能有限的人，却知道得更清楚。他在日记里补充说：“不能否认，领袖被希特勒迷住了，被他的性格之中的一种根深蒂固的东西所形成的魅力迷住了。元首将得到比里宾特洛甫能得到的更多的东西。”这话不错——但也有些保留，下面就要谈到。

里宾特洛甫一回到柏林就在 3 月 13 日给齐亚诺打电报,要求勃伦纳会议提前于 3 月 18 日举行。“德国人真教人受不了，”墨索里尼气愤地说，“他们不给人一点喘息或者考虑的时间。”尽管如此，他还是同意了这个日期。

[齐亚诺在那一天的日记里写道] 领袖有点担心。直到现在他还生活在以为一场真正的战争不会爆发的幻想中。现在，冲突已迫在眉睫，而他可能处在局外人的地位，这种可能性使他感到不安，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使他感到屈辱。[①]

1940 年 3 月 18 日清晨，这两个独裁者各自的专车徐徐驶入坐落在高耸入云、白雪皑皑的阿尔卑斯山下的勃伦纳隘口车站，这时空中正飘着雪花。作为对墨索里尼的一个让步，会谈是在这位意大利领袖的私人车厢里举行的，但是，发言的几乎只是希特勒一个人。齐亚诺当天晚上在日记里概述这次会谈的情况：

会谈简直像独白……全部时间只有希特勒在讲话……墨索里尼根感兴趣地、怀着敬意地倾听着。他说得很少，确切表明了他与德国采取一致行动的意图。他给自己保留的，只是适当时刻的选择而已。

墨索里尼在终于能够插上一句的时候说，他认识到，“保持中立一直到战争终了是不可能的”。与英、法两国合作是“不可想象的。我们恨他们，因此，意大利的参战是不可避免的”。为了使他相信这一点，希特勒已花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最后还加了一句：如果意大利不愿受到摈弃并且变成“一个二等国家”的话。[①]但墨索里尼在这个主要的问题上使元首得到了满意的答复以后，马上又留一个退路。

[691] 但是，最大的问题是日期……有一个条件必须得到满足。意大利必须要有“很好的准备”……意大利的经济情况不允许它进行一场长期的战争……

他问元首，如果进攻推迟，是否会对德国有什么危险，而他则不认为这有这样的危险……［这

[①] 威尔斯著上引书，第 138 页。

[①] 《齐亚诺日记》，第 220 页。

[①] 施密特博士关于会议的已译成普通文字的速记记录，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 9 卷，第 1—16 页。

样］他在三、四个月之后，可以完成他的军事准备，才不致于处在眼看着自己的战友作战而自己只限于摇旗呐喊这种为难的地位。他愿意做更多的事情，但不是现在就能做。

希特勒不打算推迟他在西线的进攻，他把这个想法也谈出来了。但他有“一些理论上的计划”，也许可以解决墨索里尼从正面进攻峰峦起伏的法国南部的困难，因为他知道，这一战役“将造成大量的伤亡”。他建议意大利提供一支强有力的部队，协同德国的部队沿着瑞士的边境向罗尼河流域挺进，“以便从背后绕过法一意边界上的阿尔卑斯山前线”。当然，在这之前，德国的主力部队应该已经在北线把英国人和法国人打退。希特勒显然试图使意大利于起来容易一些。

［希特勒继续说］敌人［在法国北部］被击溃时，意大利积极参战的时刻就来到了，不过参战不是在阿尔卑斯山前线最困难的地方，而是在别处……

战争将在法国决定胜负，只要把法国收拾掉，意大利就将称霸地中海，英国就不能不求和了。

这里必须说明，墨索里尼看到，自己可以在德国人进行了最艰苦的战斗以后坐享其成地得到这么多的收获，对于这样一个大好机会，他当然是不肯放过的。

领袖回答说，一旦德国胜利地向前推进，他将立即参战……当盟国遭到德国进攻，已经无法支持，只要再打一拳就可以使他们投降时……他决不拖延。

但是，在另一方面，

领袖说，如果德国的进展迟缓，他就要等一等再说了。

这种露骨的、怯懦的讨价还价，似乎并没有使希特勒过分恼火。如果墨索里尼真的如齐亚诺所说的那样，被“希特勒的性格中的一种根深蒂固的东西”吸引住了的话，那么也许可以说，基于同样的神秘理由，这种吸引力是双方面的。希特勒对于某些最亲近的同僚曾经背信弃义，其中有些人像罗姆和施特拉塞都已遭他杀害；但他对于他的滑稽可笑的意大利伙伴却保持着一种奇怪的、异乎寻常的忠诚，甚至当这个趾高气扬、外强中干的罗马恺[692]撒遭遇到困难和灾难的时候，这种忠诚也并没有减弱，反而更加强了。本书有不少令人感到兴趣的不可解的谜，这就是其中之一。

总之，意大利的参战，不管其价值如何，现在终于庄严地承诺下来了。除了希特勒之外，没有什么德国人，认为这会有多大价值，纳粹将领有这种看法的则更少。现在，希特勒又可以打主意进行新的、迫切的征服了。他对于其中最迫切的一个——在北方——没有对他的盟友透露过半点风声。

密谋分子的又一次失败

反纳粹的密谋分子又一次试图说服将军们废黜他们的领袖——这一次是在他要在北方发动新的侵略之前。他们已经听到了这个风声。这些文职人员密谋分子，仍然希望英国政府保证与反纳粹的政府媾和。由于他们是那样一些人，他们仍然坚持，新的德国政府无论如何应当被允许保有大部分希特勒夺得的领土：奥地利、苏台德区和 1914 年的德波边界，虽然最后这一块领土在过去只是由于消灭波兰国家以后才取得的。

带着这样的建议，哈塞尔，一个有相当个人勇气的人，于 1940 年 2 月 21 日到瑞士的阿罗莎同英国的一位联络人商谈。他在日记里称这个人为“X 先生”，其实名字叫 J.朗斯台尔·布赖恩斯。2 月 22 日、23 日。他们在极端机密的情况下商谈了 4 次。在罗马外交界曾经出过一些风头的布赖恩斯，

是在本书中出现的那些有些外行的毛遂自荐的和平谈判者之一。他和唐宁街有关系，哈塞尔和他一见面就有了深刻的印象。斯蒂芬斯少校和贝斯特上尉打算在荷兰与德国密谋分子建立接触的计划失败以后，英国对于这整个事情，多少有点怀疑。当布赖恩斯催促哈塞尔明确答复他代表谁进行谈判的时候，这位德国使节变得狡猾起来了。

“我无权把支持我的人说出来，”哈塞尔回答说，“我只能对你保证，从哈利法克斯那里得到的声明，会送到适当的人那里。”[①]

哈塞尔接着就把德国“反对派”的意见作了概括的说明：他们认为，“在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以前”，必须推翻希特勒，而这必须是“纯粹由德国人来办的事情”；关于柏林的反纳粹政府将受到如何的对待，必须有“英国权威方面”的声明；改变政治制度的主要障碍是 1918 年的历史，这就是说，德国人担心事情会像当年牺牲了德皇以后那样发展下去。哈塞尔和他的朋友要求得到保证 如果他们除掉了希特勒,德国将得到比除掉威廉二世以后[693]较为宽大的待遇。

于是他就把一份他自己用英文写好的备忘录交给了布赖恩斯。这是一份内容含糊的文件，虽然它对于以“基督教伦理、正义和法律、社会福利、思想和信教自由为基础的未来的社会”充满了高贵的感情。哈塞尔写道，“这场疯狂的战争”继续下去的最大危险是“欧洲的布尔什维化”。——他认为这比纳粹主义的继续存在还要坏。他的和平的主要条件是让薪的德国保持他列举出来的、希特勒征服了的几乎所有地方。德国据有奥地利和苏台德区，这是在任何和平条件中都不能讨论的地区；德国还必须恢复 1914 年德波边界，这实际上当然是指 1914 年的德俄边境，虽然话没有这样说，因为波兰在 1914 年是并不存在的。

布赖恩斯同意必须采取迅速行动，因为德国进攻西线已迫在眉睫。他答应把哈塞尔的备忘录送给哈利法克斯勋爵。哈塞尔回到柏林，把自己最近活动的情况报告给他的同谋者。他们虽然希望能从哈塞尔的“X 先生”那里得到最好的消息，但此刻他们最关心的还是这所谓“X 报告”的文件。这是他们在谍报局的一个成员汉斯·冯·杜那尼根据缪勒博士在梵蒂冈与英国人接触的结果写成的。*这个文件声称，教皇已准备向英国斡旋，同一个新的反纳粹的德国政府进行合理的和平谈判。那些希特勒的反对者的条件中，有一条是他们认为罗马教皇会加以支持的。这就是“在解决东方问题方面要对德国有利”。由此可以看出他们的观点的一般。穷凶极恶的纳粹独裁者已经通过武力侵略在东方得到对“德国有利”的解决：这些正派的德国密谋分子要求英国在教皇的祝福下送给他们同样的东西。

在 1939—1940 年间的冬天，密谋分子的脑子里想的尽是“X 报告”。10 月底，托马斯将军已经把这个报告给勃劳希契看过了。为的是想鼓励这位陆军总司令尽力劝阻希特勒不要在那年秋天在西线发动进攻。但是勃劳希契对这样的鼓励并不领情，事实上，他还威胁托马斯将军，如果他再提这件事，就要把他逮捕起来。他训斥说，这是“显然的叛国罪”。

现在，当纳粹即将发动新的侵略的时候，托马斯把“X 报告”交给哈尔德，希望他能够照这个报告行事。但这是妄想。这位参谋总长告诉密谋分子中最积极的人员之一戈台勒（他也曾请哈尔德带头，因为优柔寡断的勃劳希

[①] 哈塞尔著上引书，第 116—18 页，这基本上是本书叙述情况的根据。

契不肯带头）：此刻他不能背弃他作为一个军人对元首的誓言。而且，他还说：

> 英国和法国已经向我们宣战，我们只有干到底。妥协的和平是毫无意义[694]的。只有在最紧急的关头，我们才能采取戈台勒所希望的行动。

哈塞尔在 1940 年 4 月 6 日的日记中,详细讲到戈台勒向他所分析的哈尔德的精神状态。他在日记中叹息道：“看，结果还不是这样！”这位日记的作者补充说：“哈尔德在谈到他的责任的时候，开始哭起来了，给人的印象是一个神经受伤的软弱的人。”

这个印象的真实性是可疑的。哈尔德 4 月第一周的日记里，尽是关于他协助策划的、在西线举行大攻势的准备工作的详尽记述。在重读这日记时，本书作者至少得到这样的印象：当参谋总长和那些战地司令官商谈并且审核德国历史上最巨大、最大胆的军事行动的最后计划的时候，他的情绪是兴高采烈的。在他的日记里，没有什么谋反思想，或者与良心作斗争的迹象。虽然他对丹麦和挪威的进攻有些不安，那完全是出于军事原因的考虑。他对于纳粹侵略 4 个中立小国，丝毫没有道德上的疑虑，虽然德国对这些国家的边疆都曾作过庄严的保证，而他也知道，德国即将对它们进行攻击，对其中两个国家即比利时和荷兰的进攻计划，还是他自己亲自领导制订的。

这些“正派的德国人”想在时机尚未过晚之前赶希特勒下台的最后企图，就这样结束了。这是他们本来可以获得宽大的和平的最后机会，勃劳希契和哈尔德表示得很清楚，将领们对于谈判出来的和平是不感兴趣的。他们现在与元首一样，只是想实现在德国胜利以后由他们指定条件的和平。直到这种机会渐渐消失时，他们才认真地回到他们原来想把他们的疯狂的独裁者除掉的谋反想法，这种想法，在慕尼黑时代和佐森时代曾经是十分强烈的。读者必须记住这种精神状态和性格，才能了解接着发生的事件和后来编造的神话。

攻占丹麦和挪威

希特勒征服丹麦和挪威的准备工作，被许多作家称为战争中保密最严的事情之一，但在本书作者看来，这两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甚至英国人——之所以猝不及防，不是由于他们没有得到将要发生什么事变的警告，而是由于他们没有及时地相信这种警告。

在灾祸发生前 10 天，谍报局的奥斯特上校向他的一个亲近的朋友、荷兰驻柏林武官 J·G·沙斯上校透露了德国“威塞演习”计划的消息。沙斯立即通知丹麦海军武官寇尔森上校。[1]但是安然自得的丹麦政府并不相信自己的海军武官。当 4 月 4 日丹麦驻柏林[695]的公使打发寇尔森赶快回哥本哈根亲自报告的时候，他的情报还是没有得到重视。甚至在事变发生的前夕，即 3 月 8 日晚上，已接到德国一艘满载部队的运输舰在挪威南部海岸——就在丹麦北面——中了鱼雷的消息，不少丹麦人还亲眼看见一批德国海军舰队在他们的岛屿之间向北驶去，甚至在这个时候，晚餐桌上有人说到国家已处于危险状态时，丹麦国王对这话还一笑置之。

“他真的不相信有这回事。”一个当时在场的禁卫军军官后来说。他还

---

[1] 艾伦·杜勒斯：《德国的地下运动》，第 59 页。

说，事实上，国王餐后还到皇家戏院看戏，心情“ 充满自信而愉快 ”。[②]

早在 3 月间，挪威政府就从驻柏林公使馆和瑞典人那里接到关于德国军队和海军舰艇在北海和波罗的海港口集中的警告。4 月 5 日从柏林收到了一件确实的情报说，德国人即将在挪威南部海岸登陆，但是奥斯陆的麻痹自满的内阁还是对之抱怀疑态度。4 月 7 日，发现有几艘德国大型军舰向挪威海岸前进，同时并接到英国飞机在斯卡格拉克口外扫射德国舰队的报告；4 月 8 日，英国海军部通知挪威驻伦敦公使馆，说发现有一支强大的德国海军驶近纳尔维克；而奥斯陆的报纸也发表新闻说，当天在挪威的利勒散附近海面遭到波兰潜水艇袭击的“ 里约热内卢 ”号运输舰上遇救的德国士兵宣称，他们是去卑尔根协助抵御英国的——即使到了这个时候，挪威政府还不认为有必要采取显而易见需要采取的步骤，例如动员军队，在所有港口的炮台里配备充足的兵力，堵塞飞机场的跑道，或者——尤其重要的是——在通向首都和主要城市的易于敷设水雷的狭窄水道上设置水雷。如果这些事情都办到了，历史也许会别有一番转折。

不祥的消息，正如丘吉尔所说的那样，在 4 月 1 日就开始传到伦敦了。4 月 3 日，英国战时内阁讨论了最新的情报，尤其是从斯德哥尔摩来的情报。这些情报说，德国人在它的北部港口集中了相当多的兵力，目标在于向斯堪的纳维亚推进。但这消息似乎并没有受到认真的考虑。两天以后，4 月 5 日，当德国第一批海军补给舰逛已经出海的时候，张伯伦首相在一次讲演里宣称，希特勒由于没有在英法毫无准备的时候进攻西线，已经“ 错过了机会 ”——这句话使他不久以后就自悔失言。 ”

据丘吉尔说，英国政府这时认为，德国人在波罗的海和北海港口内增兵的目的,只是为了一旦英国为了截断从纳尔维克运送[696]铁矿砂的航道而到挪威领海布雷同时也占领纳尔维克和南部其他一些港口时，使希特勒便于反击。

事实上，英国政府当时的确正在考虑进行这样的占领行动。经过 7 个月的挫折以后，海军大臣丘吉尔终于获得了战时内阁和盟军最高军事会议的批准，于 4 月 8 日在挪威水路上布雷——这是一个代号叫做“ 维尔弗雷德 ”的军事行动。由于看来德国人可能对于他们的纳尔维克铁矿砂运输线受到封锁这一致命打击采取有力的对策，因此决定派一小批英法联军到纳尔维克去，并且一直挺进到附近的瑞典边境。据丘吉尔说，另外还要派一些军队去更远的南方的特隆赫姆、卑尔根和斯塔瓦格尔登陆，“ 以阻止这些基地被敌人占领 ”。这就是人们所知的“ R—4 计划 ”。[①]

这样，在 4 月的第一周，当德国军队已经登上各种舰艇准备开赴挪威的时候，英国军队虽然人数要少得多，也已经在克来德河登上运输舰，在弗尔斯河登上巡洋舰，向着同一目标前进。

4 月 2 日下午，希特勒在同戈林、雷德尔和福肯霍斯特举行了长时间的会议以后，发布了一道正式指令，规定“ 威塞演习 ”在 4 月 9 日上午 5 时 15 分开始。同时，他还发布了另一道指令，规定“ 占领时必须千方百计防止丹

[②] 夏伊勒：《斯堪的纳维亚的挑战》，第 223—25 页。

[①] 丘吉尔：《风暴欲临》，第 579 页。英国的《R—4 计划》见德尔里：《挪威战役》，这是一本英国关于在挪威的战役的官方藏述。

麦和挪威两国国王逃到国外。”[①]同一天，最高统帅部还把这个秘密计划告诉了外交部，对里宾特洛甫发了一道详尽的命令，指示他准备采取外交措施劝诱丹麦和挪威在德国军队到达的时候不战而降，并编造一些理由为希特勒的最新的侵略辩护。[②]

玩弄诡计的工作还不限于外交部，海军也要耍些花招。4 月 3 日，第一批舰艇刚出发，约德尔就在日记里考虑万一挪威人对于本国附近发现这么多的德国军舰发生疑惧，用什么欺骗手法蒙混过去的问题。实际上，这个小问题早已由海军解决了。海军已指示自己的军舰和运输舰伪装成英国舰艇开过去——必要时甚至悬挂英国国旗！德国海军在秘密命令中已为“进攻挪威时进行欺骗和伪装”作了详细的规定。[③]

绝 密

进港时行动守则

所有舰只都须灭灯……伪装英国舰艇的时间应尽可能地延长。挪威舰只用莫尔斯电码发出的盘问，一律用英语回答。回答的时候，可以适当选择诸如下列的词句：[697]

“到卑尔根暂泊，无敌意。”

……回答时应使用下列英国军舰名称：

科尔恩号用英舰开罗号名称。

柯尼斯堡号用英舰加尔各答号名称……（等等）必须作出准备，以便随时为英国军旗照明……

在驶往卑尔根途中……我方舰只在回答过往舰只盆问时的指导原则如下：

回答盆问：（例如科尔恩号）英舰开罗号。

回答停航命令：“（1）请将刚才信号重复一遍：（2）无法了解你舰信号。”

遇到警告性射击时则回答：“请停止射击。英国船，好朋友。”

遇到询问目的地和任务时则回答：“到卑尔根去。追击德国船。”*

这样，在 1940 年 4 月 9 日上午 5 时 20 分整(丹麦时间上午 4 时 20 分)，天亮前 1 小时，德国驻哥本哈很和奥斯陆的使节向丹麦和挪威政府递送了德国的最后通碟，要求他们毫不反抗地立刻接受“德国的保护”。他们早 20 分钟把这两国的外交部长从床上叫起来。里宾特洛甫坚持要严格遵守时间表配合德国部队在那个时刻到达。这个最后通碟可能是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起草的迄今为止最厚颜无耻的文件。他们是起草这一类文件的能手，而且这时候在外交骗术方面也已经极有经验了。[①]

这份备忘录宣称，德国是来援助丹麦和挪威抵抗英、法两国的占领的，它说：

因此，德国部队不是作为敌人登上挪威的国土的。德军最高统帅部除非出于被迫，无意利用德国军队占领的据点作为对英作战行动的基地……相反，德国军事行动的目的，完全在于保护北方，以防止英法军队企图占领挪威基地……

……本着德国和挪威两国之间久己存在的良好关系，德国政府向挪威王国政府宣布，不论现在和将来，德国都无意采取行动侵犯挪威王国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

因此，德国政府期望挪威政府和挪威人民……不要抵抗。任何抵抗将不[698]得不受到而且会受到一切可能的手段的击破……从而只能导致绝对无益的流血牺牲……

[①] 指令全文，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 9 卷，第 66—68 页。

[②] 全文，同上，第 68—73 页。

[③] 全文，见《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 6 卷，第 914—15 页《纽伦堡文件 C—115》。

[①] 《主要战犯的审讯》，第 14 卷，第 99，194 页。

德国的期望在丹麦实现了；但是在挪威落了空。威廉街从驻这两国的公使拍来的第一批急电中就知道了这一点。德国驻哥本哈根公使上午 8 时 34 分打电报给里宾特洛甫说，丹麦人已经“ 接受了我们的一切要求，（虽然）表示了抗议 ”。驻奥斯陆的公使库特 · 勃劳那却不得不作完全不同的报告。上午 5 时 52 分，他在递交德国最后通牒 32 分钟以后，就把挪威政府的迅速答复电告柏林：“ 我们决不自动屈服，战斗已在进行。 ”[①]

傲慢自大的里宾特洛甫被激怒了。*10 点 55 分，他拍了一封“ 特急 ” 电报给勃劳耶：“ 你应再次说服那里的政府，挪威的抵抗是毫无意义的。 ”

这位为难的德国公使并没有能够转达这句话。这时挪威国王、政府和议会议员都已经逃离首都转移到北方的山区去了。不论形势怎样不利，他们都决心抵抗下去。事实上，随着天亮时德国舰艇的到来，有些地方已经在进行抵抗了，虽然不是所有地方都是如此。

丹麦人则处于更为绝望的境地。他们这个快乐的小小岛国是防守不住的。这个国家大小，地势太平坦，而且最大的部分日德兰，对于从陆路开来的希特勒的装甲部队是敞开无阻的。国王和政府不能像在挪威那样可以逃到山地去，也不能指望从英国那里得到什么援助。有人说，丹麦人过于文明，在这种情况下，是不会战斗的 ;总而言之，他们没有战斗。陆军总司令 W ·W ·普莱奥尔将军几乎是唯一主张抗战的人,但他的意见还是被首相多尔瓦尔德 ·施道宁、外交部长爱德瓦 · 门契和国王所否定，后者在 4 月 8 日坏消息开始传来的时候，就拒绝了他的总动员的请求。海军不论从舰艇上或者从它的海岸炮台里，都没有发过一炮一弹，甚至当德国的运兵船只从它的炮口底下驶过，一开炮就可以把它们轰得粉碎的时候，也是如此。作者虽然在哥本哈根进行过调查研究,原因依然不明。陆军则在日德兰稍有接触,禁卫军在首都王[699]宫周国放了几枪，有几个人受伤。到丹麦人吃完一顿饱饱的早餐之后，一切都已结束了。国王听从了政府的劝告，不顾普莱奥尔将军的相反意见，还是投降了，并且下令停止任何抵抗。

用欺骗和突袭的手段占领丹麦的计划，正如缴获的德国陆军文件所表明的，是经过缜密准备的。负责进攻丹麦的特遣部队参谋长库特 · 希麦尔将军，于 4 月 7 日即已穿便服乘火车到达哥本哈根侦察首都，并作了必要的安排，为部队运输舰汉斯施塔特 · 但泽号找到一个合适的停泊码头，为运输少量供应品和 1 台无线电发报机找到 1 辆卡车。负责攻占哥本哈根的那 1 营——要占领这个大城市，1 营的兵力被认为已经足够了——的营长在两天以前就已穿着便服到哥本哈根来侦察地形了。

因此，这位将军和少校营长的计划能够几乎毫无困难地顺利完成，是不足为奇的，部队运输舰在天亮前不久就到达哥本哈根港外，经过港口炮台和丹麦巡逻舰艇的时候，没有遭到任何留难，安然停靠在市中心的兰盖里尼码头，离丹麦陆军总司令部只有一箭之遥，离国王所居住的阿玛连堡宫也很近。这两处地方都很快就被 1 营孤军夺取了，没有遇到值得一提的抵抗。

在疏疏落落的枪声之中，国王和大臣们正在王宫的楼上商议。这些大臣都是主张不抵抗的。只有普莱奥尔将军请求一战。他要求国王至少要逃到最近的豪威尔特兵营里去，以免被俘。但国王同意大臣们的意见。据一个在场

[①] 仑特—芬克发自哥本哈根的电报，《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 9 卷，第 102—3 页；勃劳耶发自奥斯陆的电报，同上，第 102 页。

人说，国王曾问道：“我们的士兵是不是已经抵抗够了。”——普莱奥尔将军反驳说，还没有。* [1]

希麦尔将军由于进展迟缓而感到有点不安了。据他自己的叙述[2]，他曾打电话给设在汉堡的联合作战总司令部——丹麦当局并没有想到要截断通往德国的电话线路——要求派些轰炸机到哥本哈根上空示威，“以便胁迫丹麦屈服”。谈话是用密码进行的。空军认为希麦尔要求的是实际轰炸，就答应马上进行——这一个错误幸亏及时得到纠正。希麦尔将军说，轰炸机“在丹麦首都上空隆隆盘旋，终于达到了目的：政府接受了德国的要求”。

当时想对丹麦部队广播政府已经投降的消息，是相当困难的，因为当地的广播电台在那么早的时候还没有开始工作。德军终于用自己携带的电台以丹麦的波长进行广播，解决了这个问题，希 [700] 麦尔将军事先已经周到地找到的一辆卡车，把电台运到了丹麦总司令部。

那天下午 2 时，希麦尔将军由德国公使西锡尔·冯·伦特芬克陪同，造访了那个已经不再是一国之主、然而自己还没有体会到的丹麦国王。关于这次访问，希麦尔在德军秘密档案里留下了记录。

> 70 岁的国王，虽然表面上还装得很镇静，并且在接见时保持了绝对的尊严，但内心显然已经支持不住了。他全身颤抖。他宣称他和他的政府一定会尽可能地维持国内的和平和秩序，消除德军和他的国家之间的一切摩擦。他希望使自己的国家免遭进一步的不幸和苦难。
>
> 希麦尔将军回答说，作为个人，他对于负着这样一种使命来拜访国王，感到非常遗憾，但他只是在执行一个军人的任务……我们是作为朋友到这里来的等等。当国王问他是否可以保留卫队的时候，希麦尔将军回答说……元首无疑会允许他保留卫队的。他毫不怀疑这一点。
>
> 国王听了，显然感到颇为宽慰。在接见的过程中……国王渐渐放下心来了，最后他对希麦尔将军说了这样的话：“将军，作为一个老军人，我可以向你说几句话吗？说几句军人对军人说的话吗？你们德国人又做出了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人们必须承认，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差不多在 4 年之中，直到战争的形势终于转变时，丹麦国王和他的人民——一个脾气好、讲文明、乐天知命的民族——一直没有给德国人制造什么麻烦。丹麦成了“模范保护国”了，起初，征服者给予国王、政府、法院、甚至议会和新闻界的自由大得令人惊异。甚至丹麦的 7000 犹太人也没有受到什么侵犯，至少有一个时期是如此。但是，虽然较其他大多数被征服的人民为迟，丹麦人后来也终于认识到，当他们的条顿暴君的暴行随着战争形势的恶化一年比一年变本加厉的时候，进一步和这些暴君进行他们所谓的“忠诚合作”是不可能的，如果他们还想保留一点自尊和荣誉的话。他们也开始看到，德国终究未必能得到胜利，小小的丹麦也并不是像许多人起初所担心的那样，无可挽回地注定要作希特勒的恶劣到无法形容的新秩序下的一个附庸国。于是，抵抗运动就开始了。

挪威人的抵抗

挪威从一开始就进行了抵抗，虽然肯定不是每一个地方都在进行抵抗。在瑞典铁矿砂运输铁道线终点纳尔维克港口，驻军司[701]令康拉德·孙德洛

---

[1] 丹麦人所说的关于德军占领哥本哈根时的情况，根据拙著《斯堪的纳维亚的挑战》和包奇·奥泽编辑的《占领时期的丹麦》。陶罗中校的贡献是特别有价值的。他是禁卫军的军官，当时与国王在一起。

[2] 引自德国陆军秘密档案。载《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 6 卷，第 299—308 页（纽伦堡文件 3596—PS）。

上校，我们前已知道，是一个吉斯林的热烈追随者，*他一枪不发就投降了德国。海军指挥官却是另外一种有骨气的人。当 10 艘德国驱逐舰向着长长的峡湾迫近时，港内的两艘古老的装甲舰之一艾得斯伏尔德号发了一炮作为警告，并且用信号通知驱逐舰，叫它们说明身份，德国驱逐舰队的指挥官弗里茨·邦迪海军少将，以派遣一名军官乘汽艇向挪威舰艇招降作为答复。接着德国就玩弄了一下诡计，德国海军军官后来还以战时只问需要无须遵守什么法律为辞，为这种行为辩解。当汽艇上的军官用信号通知德国海军少将，说挪威人表示他们要进行抵抗的时候。邦迪等到汽艇一离开，马上就用鱼雷把艾得斯伏尔德号炸毁了。第二艘挪威装甲舰挪奇号于是就开了火，但也很快就给解决了。

300 名挪威水兵，几乎是这两艘船的全部船员，全部阵亡。到上午 8 时，纳尔维克就落入德国人之手，把它攻下来的是偷偷溜过强大的英国舰队的防线的 10 艘驱逐舰，占领它的是由爱德华·狄特尔准将指挥的纳粹军队中的仅仅两营兵力。这位准将是希特勒在啤酒馆政变时结交的一个巴伐利亚老友，当第二天在纳尔维克的工作开始感到棘手的时候，他的行为表明他不愧是个足智多谋、心狠手辣的指挥官。

德国人夺取漫长的挪威西部海岸中部的特隆赫姆，也几乎是同样地轻而易举。港口的炮台在德国重巡洋舰希伯尔号率领的海军舰艇驶近峡湾时，已来不及向它们开炮。这艘舰上和 4 艘驱逐舰上的军队很顺利地在市内码头登陆，没有受到一点阻难。有些要塞支持了几小时，在附近的瓦尔纳斯机场则支持了两天，但这种抵抗并没有影响到德国对这个良港的占领。这个港口可供最大舰只和潜艇的停泊，同时又是横跨挪威中北部到达瑞典的铁路的起点站。德国人有充分理由希望，万一英国把他们的海道截断，仍可以从这里获得给养。

沿海岸往南，离特隆赫姆约 300 英里，与首都奥斯陆有铁道相通的挪威第二大港口城市卑尔根，曾进行了一些抵抗。守卫港口的炮台，使柯尼斯堡号巡洋舰和一艘辅助舰受到重伤，但其他舰艇上的军队却安全地登了陆，在午前占领了这个城市。英国第一次直接对吓坏了的挪威人的援助，就是在卑尔根开始的。下午，15 架海军俯冲轰炸机炸沉了柯尼斯堡号，这样大的舰只在空袭中被炸沉还是第一艘。在港外，英国有一个很强大的舰队，由 4 艘巡洋舰、7 艘驱逐舰编成，本来是足以制服比较小的德国海军的。

但是当这支舰队快要开入港口的时候，它接到海军部的命令，由[702]于有可能遭到水雷和空中轰炸的危险，取消了进攻。这个决定是丘吉尔批准的，但是后来他后悔不置。这是以后那些关系重大的日子里，将使英国付出昂贵代价的过分谨慎和迟疑不决态度的第一个征象。

在西南海岸斯塔瓦格尔港附近的索拉机场，则是在挪威机关枪阵地——那里并没有真正的防空设备——被炸毁以后才被德国伞兵部队攻占的。这里是挪威最大的机场，在战略上对德国空军非常重要，因为从这里起飞的轰炸机不仅可以攻击挪威海岸沿线的英国舰队，而且也可以袭击英国北部的主要海军基地。德国人攻占了它，就在挪威获得直接的空军优势，使英国的大规模部队登陆的任何企图都无法实现。

南部海岸的克里斯丁散对德国人进行了相当规模的抵抗。那里的海岸炮台两次击退了由轻巡洋舰卡尔斯卢合号率领的德国舰队的进攻。但是这些要塞很快地就被德国空军炸毁了，港口也于午后 3 时左右陷落。但卡尔斯卢合

号在当天晚上离开港口的时候，也被英国潜艇用鱼雷击中，损伤严重，终于沉没。

这样，到了当天中午或稍晚的一些时候，沿挪威西部和南部海岸，从斯卡格拉克到北极圈长达 1500 英里地区的 5 个主要城市和 1 个大机场,都陷入了德国人之手。这些地方都是由力量远较英国海军为弱的德国海军输送的少数军队所攻占的。大胆、欺诈和突袭，使希特勒以很小的代价取得了煊赫一时的胜利。

但是，在奥斯陆这个主要目的地，他的军事力量和外交手段都遇到了意外困难。

在 4 月 8 日寒冷的夜里,从德国公使馆里派出的一个兴高采烈的欢迎团，由海军武官施莱勃上校率领（忙碌的公使勃劳耶博士有时也参加一下），彻夜站在奥斯陆港的码头上，等待德国舰队和运输舰的到来。一个低级的德国海军武官则驾着汽艇在港里游弋，准备当舰队的领港。这个舰队是以袖珍战舰卢佐夫号和这个舰队的旗舰崭新的重巡洋舰勃吕彻尔号率领的。卢佐夫号原名德意志号，因为希特勒不愿意轻易丢失用这个名称的舰只。

但他们白等了一场。这些大军舰一直没有到达。它们在 50 英里长的奥斯陆峡湾入口的地方遭到了挪威布雷舰奥拉夫 · 特里格佛逊号的拦截。后者打沉了 1 艘德国鱼雷艇，打伤了轻巡洋舰埃姆登号。在派了一小股兵力登陆压制了岸上的炮台以后，德国舰队继续向峡湾前进。在奥斯陆以南约 15 英里的地方，海面狭隘，只有 15 英里宽，它们又遇到了困难，那里有古代的奥斯卡斯堡炮台，它的守军十分机警，出乎德国人的意料。天亮之前，炮台上 28 厘米口径的克虏伯大炮对卢佐夫号和勃吕彻尔号开了火，还从岸上发射了鱼雷。1 万吨的勃吕彻尔号，由于舰上弹药的爆炸，着[703]火燃烧起来，船身碎裂，终于沉没，损失 1600 名官兵，其中包括好几名秘密警察和行政官员以及他们所带的全部文件，他们是去逮捕国王和政府人员，接管首都行政工作的。卢佐夫号也受了伤，但没有完全失去战斗力。在勃吕彻尔号上面的舰队司令奥斯卡 · 孔末茨海军少将和率领第一六三步兵师的埃尔温 · 恩格尔布莱希特将军勉强游到岸上，成了挪威人的俘虏。于是这个残缺不全的德国舰队只好暂时退回去医治自己的创伤。它的夺取德国的主要目标挪威首都的任务没有完成。直到第二天它才到达那里。

事实上，奥斯陆是陷于一支空降到当地未加防御的机场上的近似象征性的德军部队之手的。从别的海港传来的不幸消息和 15 英里外奥斯陆峡湾外传来的炮声，使挪威王室、政府和议会议员匆匆坐上专车于上午 9 时半由首都逃向奥斯陆以北 80 英里的哈马尔。 20 辆载着挪威银行的黄金和 3 辆载着外交部秘密文件的卡车，也同时开出。这样，奥斯卡斯堡守军的英勇抵抗就挫败了希特勒企图俘虏挪威国王、政府和黄金的计划。

但是奥斯陆却已完全陷于仓皇失措的状态之中了。那里还留下一些挪威部队，可是对他们并没有作什么防御的安排。尤其是没有把附近的福纳布机场封锁起来，这本来用一些旧汽车停在跑道上和机场周围就能做到的。前一天的深夜，德国驻奥斯陆空军武官斯比勒上尉就已经驻在那里，准备欢迎预定于海军到达以后到达的空运部队。当舰队不能到达的时候，公使馆赶忙向柏林发去一封无线电报，报告了这个意外的不幸局势。柏林方面立即采取了措施。不多久，伞兵和空运步兵部队就在福纳布着陆了。到了中午，已经集中了大约 5 个连的兵力。这些部队都只是轻装，留在首都的挪威军队本来是

能够轻而易举地把他们消灭掉的。但由于到现在还没有弄清楚的原因——当时奥斯陆已乱成一团——挪威军队没有被召集起来，更没有开入阵地，而那个象征性的德国步兵部队就以一支大声吹吹打打、临时拼凑的军乐队为前导，开进了首都。这样，挪威的最后一个城市就陷落了。但这并不是整个挪威的陷落；整个挪威还没有陷落。

4 月 9 日下午，挪威的议会在哈马尔开会，200 名议员中，只有 5 名缺席。但是在 7 时半接到德军已逼近的消息时，议会就休会，向艾耳佛鲁姆转移，该地离东面的瑞典边境只有几英里。勃劳那博士在里宾特洛甫的催促下要求马上谒见国王，挪威首相以[704]德军向南撤退到安全距离为条件才同意接见。德国公使不肯接受这个条件。

实际上纳粹这时正在耍弄新的花招。空军武官斯比勒上尉率领两连德国伞兵从福纳布机场向哈马尔出发，企图俘虏顽抗的国王和政府。在他们看来，这事轻而易举，仿佛一场游戏。挪威军队在德国军队进入奥斯陆的时候既然一枪未发，因此斯比勒料想在哈马尔也不会遇到什么抵抗。这两连伞兵坐在征用来的公共汽车上，真像在作一次愉快的观光旅行。但他们没有估计到会有一个挪威军官干了同其他许多军官完全不同的事。原来护送国王北上的步兵总监卢格上校，坚持要设法掩护逃亡的政府，以临走时匆匆集合起来的两营步兵，在哈马尔附近设下了一个路障。德国人的汽车被迫停下来了，接着在一场小小的伏击中，斯比勒受了致命的重伤。德军在遭受到更多伤亡以后，一路退回奥斯陆去了。

次日，勃劳耶博士单枪匹马从奥斯陆沿着原路去看国王。这个公使是一个旧派的职业外交家，他并不喜欢担任这个角色，但里宾特洛甫硬逼着他去说服国王和政府投降。勃劳那的困难任务由于奥斯陆刚刚发生的某些政治事件而变得更加复杂了。原来前一天晚上，在首都牢牢地落入德国人的手中之后，吉斯林就开始露面活跃起来，他闯入电台，广播了一个公告，任命自己是新政府的首脑，命令所有挪威人立即停止对德军的抵抗。这个叛国的行为反而使德国向挪威诱降的企图归于完全失败，虽然勃劳耶并没有领悟到这一点，而柏林方面是从来不会甚至后来也没有了解这一点的。这看起来似乎很矛盾：挪威人民国耻当头的时候，吉斯林的叛国反而激励了原来吓呆了的挪威人起来从事抵抗，这种抵抗后来发展得十分英勇和不可轻侮。

勃劳耶博士在 4 月 10 日下午 3 时在艾耳佛鲁姆小镇的一间小学校里，会见了哈康六世。哈康七世是 20 世纪唯一由人民投票选举登极的国王，也是 5 个世纪以来第一个属于挪威自己的国王*。本书作者后来与国王进行过一次谈话，又阅读了挪威的记录和缴获的德国外交部文件中的勃劳那博士的秘密报告，因此有可[705]能在此追述一下当时的情况。国王十分勉强地同意在外交大臣哈尔夫丹·科特博士随侍下接见德国公使。但是当勃劳耶坚持先单独谒见哈康的时候，国王在取得科特同意之后终于应允了。

德国公使遵照训令行事，对国王施行了馅媚和威胁并用的手法。他说，德国希望保持王朝，它所要求的只不过是哈康做他的哥哥前一天在哥本哈根做过的事情而已。对德国武装部队进行抵抗是愚蠢的，这只会造成对挪威人的无益的屠杀。他要求国王批准吉斯林政府，回到奥斯陆去，哈康是一个正直的、有民主作风的人，即使在这危难的时刻，仍然严格遵守宪法手续。他企图向这位德国外交官说明，在挪威，政治上的决定不是由国王来作的；这完全是政府的事情，因此他现在得要和政府商议。这时，科特参加了会谈，

结果商定：政府一经作出决定，就将用电话答复在返奥斯陆途中的勃劳耶。

哈康虽然无权作出政治上的决定，但是肯定会起影响。对他来说，对德国人的答复只能有一个。为了防备德国人在勃劳耶走后再来一次奇袭而俘虏他，他退到艾耳佛鲁姆附近纽伯格宋村子的一家简陋旅店里，召集政府的成员，举行了国务会议。

[他告诉他们]……至于我，我不能接受德国人的要求。这是与我来到这个国家近 35 年来一贯认为作为挪成国王的一切责任不能相容的……我并不要求政府的决定受我这个声明的影响，或者以它作为基础。但是……我不能任命吉斯林，一个我知道为我国人民……以及人民在议会的代表所完全不信任的人为首相。

因此，如果政府决定接受德国人的要求——我充分理解主张接受的理由，因为我考虑到迫在眉睫的战争危险，将使许许多多的挪威青年不能不牺牲自己的生命——如果这样，邀位就是我的唯一道潞。[①]

到了这时，政府中虽然也许有几个人还在犹疑不决，但政府的勇气并不比国王小，它马上表示支持国王，到勃劳耶在返回奥斯陆的途中到达艾得斯伏尔德时，科特就用电话把挪威的答复告诉他。这位德国公使立即打电话给奥斯陆的公使馆，再从那里急速转告柏林。

国王不肯任命以吉斯林为首的政府，这个决定是根据政府全体一致的意见作出的。外交大巨科特在回答我特别提出的问题时说：“抵抗将尽可能继续下去。”[②]

那天晚上,从附近乡村的一个电力微弱的小电台——那是与[706]外部世界保持联系的唯一工具——上发出了挪威政府对强大的第三帝国的挑战。它宣告挪威决定不接受德国的要求，并号召为数只有 300 万的人民起来抵抗侵略。国王正式出面发出了这个呼吁。

但纳粹征服者并不十分相信挪威人真会说到做到。他们又作了两次尝试，企图劝阻国王。4 月 11 日早晨，吉斯林的一个密使伊尔根斯上尉，前来劝说国王返回首都。他保证吉斯林一定会效忠国王。但国王以无言的轻蔑拒绝了他的建议。

下午，勃劳耶拍来了一份急电，要求再见国王，商谈“某些建议”。这位被上面追得很紧的德国公使，接到里宾特洛甫的指示，要他告诉国王：他“想给挪威人民最后一次达成合理的协议的机会”。”这一次，科特博士在请示国王以后回答说，如果德国公使有“一定的建议”，他可以用电报向外交大臣提出。

纳粹在这样一个现已陷于绝境的小国面前碰了一鼻子灰以后，马上采取不脱强盗本色的还击。德国人要想俘虏国王和政府人员的企图既失败在先，要想说服他们投降的尝试又碰壁在后，于是现在就想一不做二不休地把他们杀掉了事。4 月 11 日很晚的时候，德国空军奉命出动炸平纽伯格宋村，纳粹飞行员先用炸弹和燃烧弹炸毁该村，又用机枪扫射那些企图从烈焰中逃生的人。德国人显然以为这样一来，他们已经把国王和政府人员都杀光了。后来在挪威北部俘虏的一名德国空军人员在 4 月 11 日记上有这样的记载：“纽伯格宋。奥斯陆政府，已被完全消灭。”

村子的确是消灭了，但国王和政府人员却安然无恙。纳粹的飞机快来的时候，他们已经躲到附近的森林里了。他们站在深可没膝的雪地里，看着德

[①] 引自挪威国家档案；载拙著《斯堪的 纳维亚的挑战》，第 38 页。

[②]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 9 卷，第 124 页。

国空军把这个小村庄里那些简朴的农舍夷为平地。他们现在面临着一个抉择，是向附近的瑞典边境转移，到保持中立的瑞典去避难；还是向北退到本国境内依然积满春雪的山区去。他们终于决定沿着崎岖的古德勃兰德斯山谷北上，经过哈马尔和利勒哈默尔，越过高山峻岭到达西北海岸的昂达耳斯内斯，这地方在特隆赫姆西南 100 英里。沿途他们还可以把那些失[707]散了的、茫然不知所措的军队组织起来，继续抗战。而且有一些希望，英国军队可能会来援助他们。

争夺挪威的几次战役

远在北方纳尔维克的英国海军，对于德国突然占领的反应是十分强烈的。海军领导者丘吉尔承认，他们当初“根本没有想到”德国人会有这一手。现在，至少在德国以陆上为基地的轰炸机的航程难以到达的北方，英国海军转而采取攻势了。4 月 10 日清晨，在德国 10 艘驱逐舰占领了纳尔维克而让狄特尔的部队登陆以后 24 小时，5 艘英国驱逐舰组成的一支舰队开人纳尔维克港，把当时港内的 5 艘德国驱逐舰击沉了两艘，击伤其余的 3 艘，并击沉几乎所有的德国货船（1 艘除外）。在这次行动中，德国的海军司令邦迪海军少将也被击毙。但是英国舰队离港以后，遭遇到在附近峡湾出来的其余 5 艘德国驱逐舰。德国舰队的火力比英国舰队的火力强大一些，打沉了 1 艘英国驱逐舰，迫使另 1 艘搁浅，舰上的英国司令瓦尔伯顿一李上校受了致命重伤，此外，还击伤了另外 1 艘。这样 5 艘英国驱逐舰中有 3 艘设法退到了外洋，在撤退的途中，打沉了 1 艘满载军火驶向纳尔维克港口的德国大货轮。

4 月 13 日中午，英国派第一次大战时身经日德兰半岛之役而安然无恙的战舰瓦斯巴特号率领的一个驱逐舰队，回到了纳尔维克，把残余的德国军舰都歼灭了。指挥官 W·J·惠特沃思海军中将打无线电报给海军部报告战果，他极力主张，既然岸上的德国军队已经仓皇失措，土崩瓦解——狄特尔和他的人马事实上已经逃到山上去了——马上就应该“用主力登陆部队”占领纳尔维克。不幸的是，英国陆军指挥官 P·J·麦克赛少将是一个谨小慎微的人，他第二天带了 3 个步兵营的先遣部队到达之后，决定不在纳尔维克冒险登陆，而在纳尔维克以北 30 英里还留在挪威人手里的哈尔斯塔登陆。这是一个需要付出很高代价的错误。

英国早已准备好要派一支小规模的远征军到挪威去，因此，他们行动这么迟缓是毫无理由的。4 月 8 日下午，英国海军接到德国舰队向挪威海岸调动的消息以后，又以一切船只必须用于海军作战为理由，急急忙忙地把那些已经上船准备占领斯塔瓦格尔、卑尔根、特隆赫姆和纳尔维克的部队打发下船，等到英国地面部队[708]重新登船时，那些港口已经陷入德军手中了。等到他们到达挪威中部时，他们就像那些掩护他们的英国海军舰只一样，命运已操在握有制空权的德国空军之手了。

到了 4 月 20 日，1 个英国旅，在法国阿尔卑斯轻骑兵 3 个营的增援下，在特隆赫姆东北 80 英里的小港纳姆索斯登陆。另外 1 个旅则在特隆赫姆西南 100 英里的昂达耳斯内斯登陆，这就形成了南北两面夹攻特隆赫姆的形势。可是，由于缺乏野战炮、高射炮和空军的支援，他们的基地日以继夜地受到德国空军的轰炸，补给品或增援部队的继续登陆也受到了妨碍，因此，这两支部队都没有给特隆赫姆以严重威胁。在昂达耳斯内斯登陆的 1 个旅，在向

东 60 英里的铁路交叉点顿巴斯同 1 支挪威部队会合以后,放弃了向北进攻特隆赫姆的预定计划，转而向西南推进，到古德勃兰德斯山谷去增援挪威军队了。那儿的挪威军队在卢格上校的有力指挥下，已经使德国主力从奥斯陆向山谷推进的速度减缓下来。

4 月 21 日，在哈马尔以北的利勒哈默尔，英德两国部队进行了第一次交战。但这次战斗并不是势均力敌的。载有英军大炮的船只已被击沉，这 1 旅军队只得用步枪和机关枪同有大炮和轻型坦克装备的强大德军对抗。更糟糕的是，英国步兵没有空军支援，不断地受到从附近挪威机场起飞的德国空军的轰炸。经过 24 小时战斗以后，利勒哈默尔陷落了，英国和挪威军队开始了 140 英里的退却，从山谷铁路沿线撤到昂达耳斯内斯，边走边停地打后卫战，使德国人进展迟缓，但始终没有能把他们阻挡住。4 月 30 日夜间，英国军队从昂达耳斯内斯撤退。5 月 2 日，英法军队从纳姆索斯撤退。这两次撤退，就其本身来说，是一种了不起的成就，因为这两个港口已经由于德国不断的轰炸成了一片火海。4 月 29 日夜间，挪威国王和他的政府人员在莫耳德（莫耳德同昂达耳斯内斯只隔一个罗姆斯达尔斯峡湾，这时也被德国空军炸成瓦砾场）登上了英国巡洋舰格拉斯哥号，到纳尔维克以北、北极圈上的特罗姆索，5 月 1 日在该地建立了临时首都。

这时挪威的南半部，包括一切城市和主要市镇，都已无可挽救地失陷了。但挪威北部似乎还安全。5 月 28 日，一支 25000 人的盟军，包括 2 旅挪威军队、1 旅波兰军队和两营法国外籍军团，把数量上大大处于劣势的德国军队赶出了纳尔维克。看来没有理由可以怀疑，希特勒是既得不到铁矿砂，也实现不了他占领整个挪威并使挪威政府投降的目标了。但是，在这个时候，德国军队已开始以惊人的力量进击西线，盟军需要以全部兵力堵塞这个漏洞。纳尔维克终于放弃了，盟军又急急忙忙地上了船。坚守在瑞[709] 典边境附近的荒野山区的狄特尔将军，于 6 月 8 日重新占领了这个港口，4 天以后接受了英勇顽强的卢格上校和他的由于觉得被英国在患难中遗弃而感到迷惑和愤懑的军队的投降。哈康国王和他的政府于 6 月 7 日从特罗姆索乘巡洋舰得文郡号去伦敦，在那里过了 5 年辛酸的流亡生活。*在柏林，狄特尔被擢升为少将，得到骑士十字勋章，被希特勒赞为纳尔维克的征服者。

在挪威战役中，希特勒尽管取得了惊人的胜利，但还是有他的不好过的日子。在约德尔将军的日记里，充满了有关这个统帅一再表现出神经紧张不安的简短记述。4 月 14 日，在接到纳尔维克德国海军部队全部覆没的消息以后，他记述希特勒“非常激动”。4 月 17 日，希特勒对于纳尔维克的失陷又发作了一阵歇斯底里；他要求把狄特尔将军的部队用空运撤出来，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约德尔那一天在日记里写道，“每一个坏消息都非常令人可怕”。两天以后他又写道：“危机重演，政治行动已经失败了。勃劳那公使被召回国。据元首的意思，必须运用武力……”*4 月 19 日那天，在柏林总理府里召开的会议上，大家情绪很忿懑，三军首脑相互埋怨误了军机，甚至连专会奉迎拍马的凯特尔也愤然退[710]出会议室。“领导方面又有发生混乱的危险”，约德尔写道。4 月 22 日，他又补充说：“元首对于英国人的登陆愈来愈担心。”

4 月 23 日，由于德军从奥斯陆向特隆赫姆和昂达耳斯内斯进展迟缓，“激动情绪越发增长”（这是用约德尔的话），但第二天情况有些好转，从此以后就愈来愈令人乐观了。到 26 日，希特勒精神奕奕，和他的军事顾问举行了

通宵会议，到凌晨 3 点半钟，他对他们说，他想在 5 月 1 日到 7 日开始实行“ 黄色方案 ”。所谓“ 黄色方案 ”是越过荷兰和比利时在西欧进攻计划的代号。希特勒虽然在 4 月 29 日仍然“ 为特隆赫姆担忧 ”，但第二天，他接到有一支战斗部队已从奥斯陆赶到这个城市的消息，他又“ 高兴起来了 ”。现在，他终于能够再度把注意力放到西欧来了。5 月 1 日，他下令在 5 月 5 日以前完成在西欧发动一场强大攻势的准备工作。

在挪威战役中，德国武装部队的司令官们——戈林、勃劳希契、哈尔德、凯特尔、约德尔、雷德尔等等——第一次看到他们的凶神恶煞的领袖在战斗中碰到一点点挫折也会垂头丧气的情况。在经过一系列惊人的胜利以后，当战争局势逆转的时候，他的这个弱点就越发显著，而且有力地促成了第三帝国的最后崩溃。

不过不论人们看法如何，丹麦和挪威的迅速征服，仍然是希特勒的一个重大的胜利，仍然是英国的令人沮丧的失败。它使德国得到冬季运输铁矿砂的道路，进一步保护通往波罗的海的进出口，使得大胆的德国海军能够打开一个缺口进入北大西洋，并为它们的潜艇和海面舰只在对英作战中提供优良的港口设备。它还使希特勒的空军基地与主要敌人之间缩短了几百英国的距离。而最重要的恐怕是它大大地增加了第三帝国的军事威望，相应地减低了西方盟国的军事威望。纳粹德国好像是不可战胜的。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现在又加上丹麦和挪威，都很轻易地屈服于希特勒的武力或武力威胁之下，而在丹麦和挪威事件中，甚至两个西方大国的帮助也没有起一点作用。正如一个著名的美国妇女所说，未来的潮流看来是属于希特勒和纳粹主义了。

希特勒的最近的征服，对于其余的中立国家来说，也是一个令人胆寒的教训。中立显然已不再能够为那些企图在一个极权主义占优势的世界里生存下去的民主小国提供什么保护。芬兰在不久以前刚刚明白了这一点，现在又轮到了挪威和丹麦。它们在还有充分时间的时候，在实际遭到侵略以前，竟然谢绝世界强国的友好援助，这种盲目态度只能责怪它们自己。

> （丘吉尔在 4 月 11 日对下院说）我相信，这个事实将会得到其他国家的反复思量，这些国家也许在明天，也许在 1 星期之后，也许在 1 个月之后，会 [711] 发现自己已成为一个同样处心积虑制订出来要毁灭它们和奴役它们的军事计划的受害者。[①]

显然，他心中指的是荷兰和比利时。但是它们虽然有 1 个月的时限，却并没有开始作什么思量。 ”

人们从希特勒用闪电方式征服斯堪的纳维亚两个国家的事件中，也可以在军事方面得到一些教训。最重要的是空军的重要意义，以及当轰炸机和战斗机的陆上基地就在附近的时候空军对海军的优势的重要意义。还有一个其重要意义不亚于这个教训的老教训是，胜利常常属于胆大心狠、出奇制胜的一方。德国的海军和空军具有这两个特点，而狄特尔在纳尔维克则显示了德国陆军具有盟军所缺少的机智谋略。

在斯堪的纳维亚的冒险中，有一个军事上的后果当时不能立即判定，这也许是因为谁也不能看到遥远的未来。在挪威的战争中，双方人员的损失都是轻微的。德国方面死 1317 人，失踪 2375 人，负伤 1604 人，总共伤亡 5296 人；挪威、法国和英国方面的伤亡约近 5000 人。英国损失航空母舰 1 艘、巡

[①] 丘吉尔：《风暴欲临》，第 601 页。

洋舰 1 艘和驱逐舰 7 艘，波兰和法国则各损失驱逐舰 1 艘。德国海军的损失比较严重得多：

20 艘驱逐舰中损失了 10 艘，8 艘巡洋舰中损失了 3 艘，主力巡洋舰夏恩霍尔斯特号和格奈斯脑号及袖珍战舰卢佐夫号都负了重伤，结果几个月都不能参加作战。希特勒在即将到来的夏季战役中，已经没有值得一提的舰队可以使用了。当不久之后入侵英国的时候到来时，这就成了一个不能克服的困难。[712]但是，到了丹麦、挪威已经列进他一长列征服名单中的 5 月初，希特勒和他的热心的将军们——将军们去年秋天的疑惧情绪如今已一扫而光——正为他们确信将成为最大征讨的军事行动进行最后准备的时候，希特勒丝毫也没有考虑到德国海军严重失去战斗力所可能造成的后果。

第二十一章　西线的胜利

[713]

1940 年 5 月 10 日，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春日，天刚破晓不久，驻柏林的比利时大使和荷兰公使被召到外交部。他们得到里宾特洛甫的通知，德国部队即将开人他们的国家，以保卫他们的中立，抵御英法军队即将进行的进攻——这正是一个月以前对丹麦和挪威所提出的同一个站不住脚的借口。德国发出的一份正式最后通牒，要求两国政府不要进行任何抵抗。若有抵抗，一定会遭到粉碎，而流血的责任，“完全要由比利时王国和荷兰王国的政府负责”。

在布鲁塞尔和海牙，正如以前在哥本哈根和奥斯陆一样，德国使节分别将同样内容的电报送交各驻在国的外交部。十分有讽刺意义的是，在海牙递交最后通碟的是德国公使尤利乌斯·冯·齐希一布尔克斯罗达伯爵，此人就是曾在 1914 年公开地把霍亨佐伦帝国刚刚破坏了的德国对比利时中立的保证叫作“一张废纸”的德皇首相贝特曼一霍尔维格的女婿。

在布鲁塞尔的外交部，当德国轰炸机在头上呼啸，炸弹在附近机场爆炸，把窗户震得咯咯作响的时候，德国大使贝劳一许汪特踏进外交大臣的办公室，正从自己的衣袋里取出一张纸来。保罗一亨利·斯巴克阻止了他。

“我请你原谅，大使先生，让我先说。”

> 德国军队刚刚进攻了我们的国家[斯巴克一点也不打算压住他的愤怒感情说]。德国对中立的忠实的比利时进行罪恶的侵略，这在 25 年之中，已经是第二次了。目前发生的事情，较之 1914 年的侵略，也许甚至更加可恶，既没有向比利时政府提出最后通牒，也没有提出照会或任何抗议。比利时是通[741]过进攻本身才知道德国已经违反了它自己承担义务的……历史将追究德国的责任。比利时已下定决心要保卫自己。

接着，这个为难的德国外交官开始宣读德国正式的最后通碟，但是斯巴克打断了他的话。“把文件交给我，”他说，“我愿意免掉你这个痛苦的任务。”[①]

第三帝国对于这两个低地小国的中立曾作过无数次保证。比利时的独立和中立，曾经在 1839 年得到欧洲 5 大强国“永久”保证，到 1914 年德国撕毁为止，这个条约被遵守了 75 年。魏玛共和国曾答应决不进攻比利时，希特勒在上台以后也继续重申过这个政策，并且也给了荷兰同样的保证。

1937 年 1 月 30 日，这位纳粹总理在废除了洛迦诺条约以后公开宣称：

> 德国政府已经向比利时和荷兰进一步保证，它愿意承认和保证这两国领土的不可侵犯和中立。

比利时在 1918 年以后曾明智地放弃过中立。到了 1936 年，由于第三帝国的重新武装和它在 1936 年春天重新占领莱因兰，比利时感到恐慌，又要用中立来保护自己了。

1937 年 4 月 24 日，英法两国解除了它对洛迦诺条约承担的义务，同年 10 月 13 日，德国也庄严地正式肯定

> 它的决心，它在任何情况下，都下会破坏（比利时的）不可侵犯和领土完整，它在任何时候都将尊重比利时的领土……如果比利时受到进攻，就准备给予援助……

从那一天起，在希特勒对于低地国家的庄严的公开保证与他对将领们的私下谈话之中，就出现了一种我们现在已很熟悉的口是心非现象。

1938 年 8 月 24 日，他在谈到为他草拟的进攻捷克斯洛伐克的“绿色方

[①] 《比利时——官方的情况报告 1939—1940 年》，第 27—29 页。

案”的一个文件时说，如果占领比利时和荷兰，那对德国就“非常有利”，他并向军方征求意见：“在什么条件下才可以完成占领这个地区以及需要多长时间。”1939 年 4 月 28 日，希特勒在答复罗斯福时，再次强调他给予荷兰和比利时的“有约束力的声明”。但是，我们前面谈到，过了不到一个月，5 月 23 日，元首却对他的将领们说：“必须以闪电的速度……用武装力量占领荷兰和比利时的空军基地。无需考虑中立声明。”

他当时虽然还没有发动战争，但计划已经准备好了。8 月 22 日，在他开始进攻波兰从而挑起战争的前一个星期，他和将领们商量了破坏荷兰和比利时中立的“可能性”问题。他说，“英国和法国是不会破坏这两个国家的中立的”。4 天以后，8 月 26 日，他命令他的驻在布鲁塞尔和海牙的使节通知各驻在国政府，一旦爆[715]发战争，“德国绝不会破坏比利时和荷兰的不可侵犯性”。波兰战争结束之后，他在 10 月 6 日又曾公开重申过这个保证。第二天，10 月 7 日，冯·勃劳希契将军在希特勒的推动下，指示他的各个集团军司令，

作好立刻进攻荷兰和比利时领土的一切准备，如果政治形势有此要求的活。[②]

两天以后，10 月 9 日，希特勒在第六号指令中说：

作好……通过卢森堡、比利时和荷兰发动进攻的准备。这次进攻必须尽可能迅速有力地进行……目标在于尽量夺取荷兰、比利时和法国北部的广大地区。[③]

当然，比利时人和荷兰人并不知道希特勒的秘密命令。但是，关于未来将会发生怎样的事件，他们还是接到过一些警告的。有一些警告，本书前章已经谈到过 密谋反纳粹分子奥斯特上校曾于 11 月 5 日向荷兰和比利时驻柏林武官提出警告，德国将于 11 月 12 日开始进攻，这是当时预定的日期。10 月底，另一个密谋分子戈台勒在威兹萨克的指使下到布鲁塞尔去警告比利时人，德国的进攻已迫在眉睫。

1940 年新年后不久的 1 月 10 日，一名携带希特勒西线进攻计划的军官在比利时紧急降落，这个计划于是落到比利时人的手中。*

这时，荷兰和比利时参谋总部也已从自己边境来的情报中得知，德国人正在他们的边境集中大约 50 个师的兵力。他们在德国首都还有一个不寻常的情报来源。这个“来源”就是荷兰驻柏林的武官 G·J·沙斯上校，沙斯是奥斯特上校的好友，经常在偏僻的齐仑道夫郊区奥斯特家里吃饭。战争爆发以后，由于灯火管制，这就更加方便了，灯火管制的掩护使当时在柏林的不少德国人和外国人能够进行各种隐秘活动而用不着担心被人发现。沙斯就是早在 11 月间从奥斯特那里得知德国定于 11 月 12 日发动进攻的情报的人，奥斯特在 1 月间又向这位武官提出新的警告。但德国人的两次进攻都没有如期举行，这就使海牙和布鲁塞尔对沙斯的情报的信赖多少有些减低。当时海牙和布鲁塞尔自然都不知道，希特勒的确两次安排了进攻的日期，只不过后来推迟了而已。但是，沙斯通过奥斯特得来的关于侵犯丹麦和挪威的 10 天前的警告和 [716]他预言的准确日期，似乎又恢复了他在国内的信誉。

5 月 3 日，奥斯特直率地告诉沙斯，德国人将在 5 月 10 日开始通过荷兰和比利时在西线发动进攻，这位陆军武官立即通知了他的政府。第二天，海牙又从它驻梵蒂冈公使那里得到证实这个消息的情报。荷兰人立刻就将这个

---

② 《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 4 卷，第 1037 页（纽伦堡文件 2329—PS）。

③ 同上，第 6 卷，第 880 页（纽伦堡文 件 C—62）。

消息告诉了比利时人。5 月 5 日是星期天，这个星期一开始，我们在柏林的人就都清楚看出，对西线的攻击在几天之内就要发生了，首都的紧张气氛日益增长。5 月 8 日，我打电报给我的纽约办事处，要求把我们的记者留一个在阿姆斯特丹，而不要派他到挪威去，因为反正那里的战事已经结束了。当天晚上，军方新闻检查官允许我在广播中暗示，西线即将开始有军事行动，荷兰和比利时也算在内。

5 月 9 日晚上，奥斯特和沙斯在一起吃最后一次晚饭。这个德国军官肯定他说，第二天拂晓向西线发动进攻的最后命令已经下达。奥斯特在晚饭后到班德勒街的最高统帅部去了一次，以便弄清楚是否会有最后一分钟的变更。结果并没有变更。“猪猡已经到西线去了”，奥斯特告诉沙斯。“猪猡”指的是希特勒，沙斯通知了比利时陆军武官，随即到自己的公使馆，接通了海牙的电话。在这种时候适用的密码早就安排好了。沙斯说了一些听起来似乎极普通的话，把消息传了过去：“明天拂晓。抓紧！”[4]

奇怪得很，西方两大强国英国和法国，这时却在睡大觉。它们的参谋总部不相信布鲁塞尔和海牙传来的警报。伦敦方面当时正忙于应付持续了 3 天的内阁危机，这个危机到 5 月 10 日晚才由丘吉尔接替张伯伦出任首相而得到解决。英法两国的总部一直等到德国轰炸机在头上的咆哮声和施图卡式俯冲轰炸机的刺耳尖叫声冲破了春天黎明前的宁静的时候，才得知德国的进攻。过了一会儿，天大亮了，又从荷兰和比利时政府那里收到拼命求救的呼吁，后者曾把盟国疏远了 8 个月之久，而没有同它们采取一致步调，进行共同的防御措施。

尽管如此，盟国在比利时境内迎击德国主力的计划，在最初两天进行得相当顺利。一支强大的英法联军从法比边境向东北方向推进，以便在布鲁塞尔以东代尔和缨斯两河沿岸的比利时主要防线上部署兵力。结果表明，这种部署恰好正是德国最高统帅部所求之不得的。这支庞大盟军的迂回运动，正好帮了它的大忙。虽然英法联军自己并不知道，但是他们正好迅速投入了陷阱，只要机关一动，就要遭到全军覆没之祸。

[717]

双方的作战计划

自从 1 月间德国原来的进攻西线计划落到比利时人的手中，并且正如德国人所怀疑的，也落入了英法的手中之后，这个计划已经有了重大的变更。这个叫做“黄色方案”的行动计划，是早在 1939 年秋天在希特勒要在 11 月中旬在西线发动进攻的命令的催逼下，由陆军总司令部匆忙制订出来的。它是否就是原先的施利芬计划的修正翻版，这一点在军事史学家和德国将军们之中有很多争论。哈尔德和古德里安就认为是这样的。这个计划要求把德国的主力放在右翼，通过比利时和法国北部，目标在于占领英吉利海峡各港口。这个计划要达到的目的同著名的施利芬计划要达到的目的尚有一段距离，施利芬计划在 1914 年功败垂成，它的目的不仅要占领英吉利海峡各港口，而且还要继续进行一个大规模的迂回运动，使德国的右翼军队通过比利时和法国北部，越过塞纳河，在巴黎以南折向东方，形成一个包围圈，歼灭法国的残余部队。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迅速结束法国的武装抵抗，使德国在 1914 年能

---

[4] 艾伦·杜勒斯著上引书，第 58—61 页。杜勒斯说，沙斯上校在战后曾亲 自向他证实这种说法。

把大部分军事力量掉过头来对付俄国。

但是，希特勒在 1939—1940 年则无需为俄国战线操心。尽管如此，他的目标更加有限。至少在战役的第一阶段，他并不打算击溃法军，只求把它击退，占领英吉利海峡沿岸，从而切断英国和它的盟国的联系，同时取得海空军基地，以便不断骚扰和封锁不列颠群岛。从这个时期他对将领们的长篇大论的讲话中，可以明显看出，他认为英法遭到这样的失败以后将会向他求和，然后他就可以再把注意力转到东方而无后顾之忧。

甚至在“黄色方案”的原来计划落入敌方手中之前，盟军最高统帅部就已料到这一着了。

11 月 17 日，盟国最高军事会议在巴黎开会，通过了“D 计划”，这个计划规定万一德国取道比利时发动进攻，就要法国第一军团和第九军团与英国远征军驰往比利时，到达在代尔和缪斯两河沿岸从安特卫普，经鲁文、纳缪尔和纪韦到梅济埃尔的主要防线。几天之前，法国和英国的参谋总部在同比利时总司令部召开的一系列秘密会议中曾得到后者的保证：要加强这条战线的防御措施，并在这条战线上大力抵抗。但比利时还迷恋着中立的幻想，仍旧希望也许可以不必卷人战争，因此不愿采取更多的措施。英国的参谋长们认为，德国一旦开始进攻，就来不及把盟军调动得那么远，但他们在甘末林将军的催促下，终于同意了“D 计划”。

11 月底，盟军又增加了一项计划，把亨利·季劳德的第七军[718]团开到英吉利海峡沿岸，如果荷兰受到进攻，就在安特卫普以北援助荷兰。这样一来，德军企图横扫比利时——或者还有荷兰——从侧面进击马奇诺防线的打算，从战事初期起就会遇到全部英国远征军、法军主力、比利时 20 个师和荷兰 10 个师的抵抗，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一支在人数上与德军势均力敌的军队。

为了避免这种正面的冲突，同时为了使急忙挺进到这么远的英法军队陷入圈套，西线伦斯德率领的 A 集团军的参谋长埃里希·冯·曼施坦因将军（原来姓刘文斯基）建议彻底改变“黄色方案”，曼施但因是一个富有天才和谋略的军阶较低的参谋军官，到了冬天的时候，他终于克服了勃劳希契、哈尔德和其他将领的最初反对，使自己的有胆识的主张上达给希特勒，曼施坦因的建议是：德国的主要矛头应放在中央，用庞大的装甲部队突破阿登森林，然后在色当的北方跨过缪斯河，突入开旷地区，直趋海峡上的阿布维尔。

希特勒向来喜欢大胆的甚至轻率的设想，因此他对这个计划也甚感兴趣。伦斯德之所以毫不犹疑地推荐这个计划，不仅是因为他相信它，而且还因为如果执行这个计划，他的 A 集团军就可以在进攻时担任主要任务。由于哈尔德个人讨厌曼施坦因，以及在一些比曼施坦因军阶较高的将领们中存在着某种职业上的妒忌，曼施坦因在 1 月底被调去指挥 1 个步兵军。尽管如此，他在 2 月 17 日柏林招待一批新任军长的宴会上,还是找到机会亲自向希特勒陈述了自己的打破正统的观点。他认为，用一支装甲部队突破阿登森林，一定可以出其不意地给盟军以沉重的打击，因为他们的将领像大多数德国人一样，很可能认为这个多山的森林地带不适于使用坦克。德军右翼进行佯攻，就可以使英法联军慌乱地驰赴比利时，然后，在色当突破法军的阵地，再沿松姆河北岸直趋英吉利海峡，这样德军就可以使英法联军的大部和比利时军落入罗网。

正如包括约德尔在内的几个将领所强调指出的，这是一个大胆的、不无

危险的计划。但现在已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军事天才的希特勒，真的认为这就是他自己的主意，因此热情愈来愈高。哈尔德起初把它看作疯人的狂想，未予理会，现在也开始赞成它了，而且通过他的参谋总部军官的帮助，对计划作了很大的改进。1940 年 2 月 24 日，最高统帅部发布一道新的指令，正式采纳这个计划，并命令所有的将领在 3 月 7 日以前重新部署好自己的部队，1939 年 10 月 29 日重订“黄色方案”时，曾取消占领荷兰的计划；但在 11 月 14 日，由于空军的要求，又把这个计划恢复了。空军需要荷兰机场，用以对付英国，它愿意给这次规模不大但又相当复[719] 杂的作战行动提供一大批空运部队。小国的命运往往就是根据这种考虑来决定的。这样，在挪威战役接近胜利结束，5 月初天气转暖时，德国人部署了世界上从来没有见过的强大兵力，在西线待命进攻。单从数量上来看，双方势均力敌——德国 136 个师，法、英、比、荷 135 个师。守方有着广大的防御工事这一有利条件：南方有难以超越的马奇诺防线，中间有绵亘不断的比利时要塞，北方有荷兰的水上防线。即使在坦克的数量方面，盟军也足与德军匹敌。但他们并没有像德军一样把坦克集中起来。同时由于比利时和荷兰拘泥于恪守中立，他们没有举行联合参谋会议，以致守方不能充分协调自己的计划和力量。德国的有利条件则是：有一个统一的指挥部，操有进攻的主动权，对侵略行动没有道德上的顾忌，上上下下信心十足，还有一个大胆的计划。他们还有在波兰作战的经验，他们在那里的战斗中已经尝试过自己的新战术和新武器。他们知道俯冲轰炸机和大量使用坦克的价值。同时他们还知道，正如希特勒一直不断指出的，法国人虽然会保卫自己的国上，但对未来的发展却毫无信心。

德国最高统帅部虽然有信心也有决心，但正如秘密记录所表明的，在即将发动进攻时，也曾经心惊胆战过一阵——至少作为最高统帅的希特勒是这样的。约德尔将军在日记中曾记下了这一点。希特勒对于开始进攻的时刻，曾几度作最后一分钟的推迟。他在 5 月 1 日确定在 5 月 5 日发动进攻。5 月 3 日他把它推迟到 5 月 6 日，这是由于天气的关系，但也许有一部分原因在于外交部认为他所提出的对于侵犯比利时和荷兰中立的理由不很充分。5 月 4 日他确定 5 月 7 日为 X 日；次日又把它推迟到星期三，即 5 月 8 日。约德尔写道，“元首已经决定了‘黄色方案’的借口”。比利时和荷兰将被指责完全没有遵守中立原则。

5 月 7 日[约德尔的日记继续写道]，元首的火车定于 16 时 38 分离开芬肯克鲁格。但天气情况还没有弄清楚，因此（进攻的）命令取消了……元首对于再次延期甚感不安，因为怕有人泄露风声。比利时驻梵蒂冈公使与布鲁塞尔方面进行的商谈，引起了一种推测：有一个在 4 月 29 日离开柏林到罗马

---

[5] 关于德国人在西线发动进攻的计划的制订情况，有大量材料。我取材于 下列文件：哈尔德和约德尔的日记；哈尔德的小册子：《统帅希特勒》，1949 年慕尼黑出版（英译本于 1950 年在伦敦出版）；最高统帅部作战日记的选录，这份日记载《纳粹的阴谋与侵略》和《主要战犯的审讯》；希特勒和最高统帅部的各项指令，载纽伦堡文件和《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 8 卷和第 9 卷；曼施坦因：《失去了的胜利》；戈立茨：《德国参谋总部史》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雅可布逊：《有关西线战役的文件（1939—1940 年）》；古德里安：《装甲部队领导人》；勃鲁门特里特：《冯·伦斯德》；利德尔·哈特：《德国将领谈话录》；收集在纽伦堡文件中的最高统帅部文件丛刊中的大量德国材料，这些材料是在次要审讯中整理出来的。英国方面的计划见丘吉尔回忆录的前两卷；艾利斯：《在法国和佛兰德斯的战争》，这是一本英国官方的叙述；富勒：《第二次世界大战》；德拉波尔，《六星期的战争》；全面情况介绍以特尔福德·泰勒的《征服的进军》一书为最好，该书系根据一切可以得到的德国方面的材料写成的。

去的德国人士，已经犯了叛国罪行……

5 月 8 日，从荷兰传来令人震惊的消息。那边已取消休假、进行疏散、设置路障，并采取了其他动员措施……元首不愿再等下去了，戈林要求至少推迟到 10 日……元首非常焦急不安；后来他终于同意推迟到 5 月 10 日，他说，这是违反他的直觉的。但是，不能再往下拖延了……[720] 5 月 9 日，元首决定，一定要在 5 月 10 日发动进攻。17 时与元首同车离开芬肯鲁格。在得到 10 日天气情况有利的报告以后，在 21 时发出代号“但泽”的命令。

希特勒由凯特尔、约德尔和最高统帅部其他人员陪同，于 5 月 10 日天刚破晓时，到达了缪恩施特莱菲尔附近、他称之为“鹰巢”的大本营。德军在西面 25 英里之外的地方，正在越过比利时边界长驱直人。在从北海到马奇诺防线之间的 175 英里战线上，纳粹的部队已突破了 3 个中立小国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的边境，粗暴地违反了德国人曾经庄严地一再作出的保证。

6 星期战争：1940 年 5 月 10 日—6 月 25 日

就荷兰方面说，这只是一场 5 天的战争。至于比利时、法国以及英国远征军，也在这短促的期间决定了命运。就德国方面说，在战略和战术的执行上，一切都是按计划行事的，甚至执行得比预定的计划还要好。他们的成就超过了希特勒的最高希望。他的将领们都给自己的胜利的闪电速度和程度弄得乱了章法。就盟军的领袖们来说，他们被一点也没有料到的事态发展弄得不知所措，在一片慌乱之中感到事态不可理解。

在战斗的第一天刚刚接任首相的温斯顿·丘吉尔本人也被弄得目瞪口呆。他在 5 月 15 日早晨 7 点半钟被巴黎的保罗·雷诺总理打来的电话叫醒了，雷诺用激动的声音告诉他：“我们打败了！我们打败了！”丘吉尔不相信，伟大的法兰西军队一周之间就打败了？这是不可能的。他后来写道：“我简直弄不明白，运用大量快速装甲部队进行袭击这种战术在上次大战以来会引起这样剧烈的变革。”[6]

坦克，7 个师的坦克，集中在西部防御阵地最薄弱的一点上进行突破，这一仗就是这样打的。用的是坦克、施图卡式俯冲轰炸机和伞兵和空降部队，后者在盟军防线后方或者在看来似乎固若金汤的堡垒的头顶上降落，造成了极大混乱。

但是，我们在柏林的人都很奇怪，盟军领袖们怎么会一点也没有料到德国人会采取这样的战术。希特勒的部队在波兰战役中不是已经显示了这种战术的效能了吗？在波兰，在一周之内包围或歼灭波兰部队的大规模突破，就是在施图卡式俯冲轰炸机使抵抗力削弱以后再集中装甲兵力取得成功的，在波兰，伞兵和空降［721］部队，即使用在规模极小的战斗中也没有发挥多少作用，他们想完整地夺取一些主要桥梁也没有成功。但是，在西线进击的前一个月，他们在挪威获得了巨大的成就，夺取了奥斯陆以及所有的机场，为在斯培瓦格尔、卑尔根、特隆赫姆和纳尔维克登陆的孤立的小批部队提供增援，从而使他们能够坚持下去。盟军司令官们难道没有研究这些战役，从中吸取教训吗？

征服荷兰

[6] 丘吉尔，《他们最美好的时刻》，第 42—43 页。

德国人只能腾出一个装甲师的兵力用于征服荷兰的战役。这次战役主要是由伞兵和空运部队降落到广大的洪水防线后面而取得成功的。这些防线，柏林方面许多人士曾经认为可以抵抗几个星期。吓得惊惶失措的荷兰人所经历的是战争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空运部队的进攻。他们对于这样一种严峻的考验事前毫无准备，对于这次袭击也完全没有料到，从这些情况看来，他们的表现比人们当时设想的要好一些。

德国人的第一个目标是以一支强大的部队从天而降，在海牙附近的机场着陆，立即占领首都，俘虏女王和政府人员，跟 1 个月前进攻挪威的计划一样。但是，在海牙，正如在奥斯陆一样，这个计划失败了，虽然原因有所不同。荷兰的步兵从初期的惊惶和混乱中清醒过来，到 5 月 10 日晚上，在炮兵的配合下，终于能够把德国两团之众的军队驱逐出海牙周围的 3 个机场。这样就暂时挽救了首都和政府，但却使后备部队牵制住，不能调到其他迫切需要的地方去。

德国计划的关键在于用空运部队夺取鹿特丹正南尼维 · 马斯河上和东南方马斯（缪斯）河在多德莱希特和莫尔狄克两处出海口上的几座桥梁。从大约 100 英里之外的德国边境向前推进的格奥尔格 · 冯 · 库希勒将军的第十八军团，就是希望通过这些桥梁攻入设防的“ 荷兰要塞 ”。“ 荷兰要塞 ”包括海牙、阿姆斯特丹、乌德勒支、鹿侍丹和菜伊登在内，设有重重水道防线，如不通过这些重要桥梁，是不可能轻易迅速地夺取这个“ 要塞 ”的。

5 月 10 日清晨，空运部队包括从旧式水上飞机降落在鹿特丹河上的 1 个连在内，在那些冷不及防的荷兰守军还来不及炸毁以前，就夺下了这些桥梁。临时拼凑起来的荷兰部队曾奋不顾身地企图击退德军，他们眼看就要成功了。但是德国人竭力撑持到 5 月 12 日早晨，这时，库希勒的一个装甲师，在突破了格莱伯—彼尔防线以后赶到这里。格荣伯—彼尔防线是荷兰东部一条用许多条 [722] 水道所加固的阵地，荷兰人原来希望在这条战线上固守几天。

再一个希望是：法国季劳德将军的第七军团可能会把德国人阻止在莫尔狄克的桥头。第七军团正从英吉利海峡兼程前进，5 月 11 日下午抵达提尔堡。但是这支法军，也像被围困的荷兰人一样，没有空军支援，缺少装甲车、反坦克炮和高射炮，一下子就被击退到布雷达去了。这就给德国第九装甲师让开一条通道，使他们得以通过莫尔狄克和多德莱希特的桥梁，在 5 月 12 日下午进抵鹿特丹对面的尼维 · 马斯河南岸。鹿特丹那里的桥梁，还一直掌握在德国空降部队的手里。

但是，坦克通不过鹿特丹的那些桥梁。原来荷兰人这时已经封锁了桥梁的北端。5 月 14 日清晨，荷兰人的情况非常危急，但还没有绝望。“ 荷兰要塞 ”还没有被突破。海牙周围的德国强大空降部队，不是被俘就是溃散到附近的村庄里去了。鹿特丹还未失守。德军最高统帅部急于想从荷兰撤出装甲师和支援部队，以便利用刚在南方法国那里出现的新的机会，他们对于这种情况并不感到如意。因此，希特勒在 14 日早晨发出第十一号指令：“ 荷兰军队的抵抗力已经证明比预料为强，由于军事上和政治上的考虑，必须迅速粉碎这种抵抗。 ”办法何在？他命令从比利时前线的第六军团调来一些空军部队，“ 以便加速夺取‘ 荷兰要塞 ’ ”。[7]

[7]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 9 卷，第 343—44 页。

他和戈林发布特别命令，猛炸鹿特丹。荷兰人尝到了纳粹的恐怖滋味后一定会被迫投降的。去年秋天围攻华沙时使用的就是这个法宝。

5 月 14 日早晨，德国第三十九军的 1 个参谋军官，打着 1 面白旗跨过鹿特丹桥，要求该市投降。他警告说，如不投降，就要遭到轰炸。当投降谈判还在进行的时候——1 名荷兰军官到了离桥不远的德军司令部讨论详细条款并且正把德军条件带回来的时候，轰炸机就出现了，炸平了这个大城市的中心。大约 800 人死于非命，几乎全是平民，几千人受伤，78000 人无家可归* 。这种背信弃义的举动，这种蓄意的残暴行为，荷兰人是不会忘怀的，虽然在纽伦堡审判中，负责空军的戈林和凯塞林都以鹿特丹并非不设防的城市而是在荷兰人坚守之下的城市为理由，替这种行为进行辩护。他们两人都否认，当他们派遣轰炸机队的时候，他们已经知道投降谈判正在进行，虽然在德军的档案中，有充分的证据，［723］证明他们是知情的。* ⑨总之，德军最高统帅部当时并未加以辩解。我本人就曾在 5 月 14 日晚上柏林电台上听到过最高统帅部的特别公报：

在德国俯冲轰炸机的攻击和德国坦克即将进攻的巨大压力下，鹿特丹市已经投降，从而使该市免于被毁。

鹿特丹投降了，接着就是荷兰武装部队的投降。威廉敏娜女王和政府成员乘坐两艘英国驱逐舰逃往伦敦。5 月 14 日黄昏时分，荷兰武装部队总司令 H·G·温克尔曼将军命令他的部队放下武器，次日上午 11 时，他签署了正式降书。只 5 天的工夫，就一切都结束了。但是结束的只是战斗，此后 5 年，野蛮的德国恐怖统治的黑夜将一直笼罩着这个惨遭浩劫的文明小国。

比利时的陷落和英法联军的落入陷讲

荷兰既已投降，比利时和法国以及英国远征军的命运也就决定了。5 月 14 日，离发动进攻虽然还只有 5 天，这一天却是决定命运的一天。前一天的晚上，德军夺取了迪囊到色当之间的河岸峻峭、林木繁茂的缪斯河对岸的 4 个桥头堡，并且进占了色当。这是 1870 年拿破仑三世向毛奇投降的场所，也是结束法兰西第二帝国的地方。这样，盟军防线的中央部分和英法两军的精锐迅速转移到比利时去的重要枢纽地点，就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次日，5 月 14 日，大规模的袭击开始了，5 月 10 日，一支在数量、集中程度、机动性和打击力量等方面都是空前未有的坦克部队，由德国边境通过阿登森林出发，其队伍之长，即使分了三路纵队还延展到莱因河后面 100 英里。现在它突破了法国第九军团和第二军团的防线，迅速地向在比利时的盟军背后的英吉利海峡推进。这是一股令人胆寒的巨大力量。一批又一批的施图卡式俯冲轰炸机首先削弱了法军的防御阵地；大批的战斗工兵布置橡皮船下水，架搭浮桥，准备渡河；接着就是配备有自动推进炮的装甲师，每个装甲师都有 1 个摩托化步兵旅；装甲师的后面紧跟着摩托化步兵师，占领坦克开辟出来的阵地。这个钢与火的密集［724］队伍，不是惊慌失措的守军手中的任何武器所能阻挡得住的。在缪斯河上迪囊的两侧，法军被赫尔曼·霍特将军的第十五装甲军击败了。这个军的两个坦克师之中，有一个坦克师是由一个名叫埃尔温·隆美尔的年轻大胆的准将指挥的。在河的南面的蒙丹梅，

⑨ 《主要战犯的审讯》，第 36 卷，第 656 页。

格奥尔格—汉斯·莱因哈特将军的两个坦克师组成的第四十一装甲军，也采取同样战术。

但是，法军受到的打击以在色当四郊最为沉重，这对他们来说，真是一个悲惨的记忆。5 月 14 日晨，海因兹·古德里安将军的第十九装甲军的两个坦克师，* 一拥而过当晚才在缪斯河上匆促地搭起来的浮桥，向西挺进。法国军队和英国的轰炸机虽然拼命企图炸毁这座桥梁，但是，皇家空军 71 架轰炸机在一次攻击中就给打落了 40 架，大部分都是给高射炮火击落的，法国坦克则被击毁了 70 辆，结果并没有炸毁这座桥梁。到了傍晚时分，德军在色当的桥头堡已经扩展到 30 英里宽、15 英里深，防守在盟军关系重大的中央防线上的法军已被击溃了。没有被围和被俘的队伍在仓皇后撤。北部的英法联军和比利时的 22 个师，都已陷于被截断后路的极端危险的境地。

最初两天盟军打得还相当顺利，至少他们是这样想的。在怀着新的热情投入首相新职务的丘吉尔看来，“ 直到 12 日晚上［他后来写道］，还没有什么理由认为战争进行得不好 ”。[10]盟军最高统帅甘末林对于当时的情况十分乐观。前一天晚上，法军的大部精锐部队第一、第七和第九军团与英国远征军哥特勋爵指挥下的九个师，根据预定计划，已与比利时部队会合。他们沿代尔河设置了一条坚固的防线：从安特卫普经过鲁文到伐佛尔，然后跨过昂布鲁缺口到纳缪尔，再沿着缪斯河向南到达色当。在比利时的坚强的纳缪尔要塞和安特卫普之间，在短短 60 英里的战线上，盟军的数量实际上已超过来犯的德军，约为 36 个师对莱希瑙的第六军团的 20 个师。

比利时军队虽然在他们的东北边境沿线上打得不坏，但并没有支持得像预期的那么长久，更没有像 1914 年那么长久。他们也像在他们北面的荷兰人一样，简直无法对付德国武装部队的崭新战术。德国人在这里，也如在荷兰一样，大胆地使用了经过特殊训练的小股部队在黎明时由滑翔机上悄悄地着陆，去夺取重要的桥梁。在马斯特里赫特后面的艾伯特运河上有 3 座桥梁，他们制服了其中两座桥的守军，后者连扳动电钮炸掉桥梁都没有来得及。

他们在夺取埃本·埃马尔炮台一役中，甚至取得了更大的成［725］就。这个炮台控制着缪斯河和艾伯特运河的交叉点。盟军和德军双方都认为这一个现代化的、具有战略地位的要塞是欧洲最难攻克的工事，它比法国在马奇诺防线或德国在西壁防线建筑的任何工事都更为坚固。它是由一系列深入地下的钢筋混凝土的交通壕所构成，它的炮楼有厚甲板保护，共有 1200 个人防守。原来预计它可以无限期地抵抗住威力最大的炸弹和炮弹的连续不断轰击，但是却在 30 小时之内就落入由 1 名上士指挥的 80 名德国士兵之手了。他们乘坐 9 架滑翔机，降落在工事的顶部，结果只有 6 人死亡，19 人受伤。我记得，柏林的德国最高统帅部曾给这场战斗蒙上一层十分神秘的色彩，他们在 5 月 11 日晚发表特别公报宣称，埃本·埃马尔炮台已经被“ 一种新式进攻方法 ” 攻克了。这个声明引起了不少谣传，戈培尔博士也乐于乘机到处散布，说什么德国发明了一种非常厉害的新的“ 秘密武器 ”，可能是一种能够使防守的人暂时麻痹的神经毒气。

其实，实际情况却要平凡得多。德国人以他们一贯的缜密作风，在 1939—1940 年间的冬天，在希耳德斯海姆建筑了艾伯特运河的桥梁和要塞的复制品，训练了大约 400 名滑翔部队，教他们怎样攻取的战术。有 3 个小组负责

[10] 丘吉尔：《他们最美好的时刻》，第 40 页。

攻打 3 座桥梁，第四小组去攻打埃本·埃马尔炮台。这第四小组的 80 个人后来在炮台的顶上着陆，把一个特制的“空心”弹安放在装甲的炮楼里，这不仅使炮楼失去作战能力，并且使下面屋内满布火焰和瓦斯。在炮门和了望口还使用了手提的火焰喷射器。1 小时之内，德国人就进入炮台的上层，使这个巨大炮台的所有轻炮和重炮都失去了作用，使它的了望台烟雾密布。要塞后面的比利时步兵无法打退这一小股进攻者，自己反而被施图卡式轰炸机和增援的伞兵打退了。5 月 11 日早晨，跨过北方两座完好的桥梁疾驰而来的装甲兵先头部队到达炮台，包围了它。经过施图卡的继续轰炸和地道白刃战之后，到中午时分，一面白旗扯起了，1200 名惊惶失措的比利时守军鱼贯走出炮台投降。①

这次奇袭的成功，桥梁的被夺取以及冯·莱希瑙将军的第六军团在霍普纳将军的两个坦克师、1 个机械化步兵师编成的第十六装甲军支援下所进行的攻势之猛烈，使盟军最高统帅部深信，这次战役跟 1914 年一样，德军攻势的主要锋芒是在右翼；他们也认为为了制止这个进攻，他们已经采取了适当的措施。结果，直到 5 月 15 日晚上，比利时、英国和法国的部队还坚守在从安特卫普到纳缪尔的代尔河防线上。

这恰恰是德军最高统帅部所求之不得的事。因为这样一来，就可以实现曼施坦因计划，而在中路进行沉重的打击。陆军参谋总［726］长哈尔德将军，在 5 月 13 日晚上，就已经清楚看到这种形势以及他的机会了。

［他在日记里写道］我们可以指望 24 个师左右的英法军队和 15 个师的比利时军队，在纳缪尔以北完成集中。为了应付这种局面，我们的第六军团在前线有 15 个师，还有 6 个师的后备军……我们有足够的力量击退敌人的任何进攻。用不着配备更多的部队。在纳缪尔以南，敌人的力量较弱，大约只有我们兵力的一半，对缪斯河的进攻的结果，将决定我们是不是能够利用这种优势，在什么时候利用以及在什么地方利用。在这条战线的后面，敌人并没有一支值得一提的兵力。

在这条次日就被攻破的战线的后面，真的没有一支值得一提的兵力吗？

5 月 16 日，丘吉尔首相飞往巴黎去探明这一点。下午，当他驱车到法国政府办公处访问雷诺总理和甘末林将军的时候，德国的先头部队已经抵达色当以西 60 英里的地方，在毫无防御的平地上驰骋前进。在他们和巴黎之间，也可以说在他们与英吉利海峡之间，并没有多少障碍。但是丘吉尔却不知道这种情况。“战略后备部队在哪里？”他问甘末林，还插进一句法语：“什么地方有大量的人力？”盟军总司令甘末林向他摇了摇头，耸了耸肩回答说：“没有！”*

“我奇怪得说不出话来”，丘吉尔后来追述道。从来没有听说过，一支大军在受到攻击的时候会不留些后备部队的。“我承认，”丘吉尔说，“这是我一生中所碰到的最令我吃惊的事之一。”①

德国最高统帅部也同样感到吃惊，至少对于希特勒和最高统帅部的将军们来说是如此，也许哈尔德是例外。这次西线战役是元首亲自指挥的，他曾

---

① 详细情况见瓦尔特·梅尔齐尔：《艾伯特运河和埃本—埃马尔炮台》；鲁道夫·维哲希 1954 年 5 月在《战讯》上所写的《埃本—埃马尔炮台的占领》一文（维哲希中尉指挥这一战斗，但由于他的滑翔机出了事故，直到他手下的人员在温齐尔中士指挥下快要完成任务时才赶到）；凡·奥佛尔斯特拉坦将军：《从艾伯特一世到利奥波尔德三世》；《比利时——官方的憯况报告》，特尔福德·泰勒著《征服的进军》对此有很出色的概述，见该书第 210—14 页。

① 丘吉尔：《他们最美好的时刻》，第 46—47 页。

有过两次迟疑不决，拿不定主意。第一次是 5 月 17 日，他忽然神经极度紧张起来。那天早上，带着他的装甲军到英吉利海峡去已经走了 1/3 路程的古德里安，奉令停止前进。因为空军发来情报说，法国人即将大举反攻，企图截断从色当楔入向西前进的力量薄弱的德国装甲部队。希特勒急忙同他的陆军总司令勃劳希契和哈尔德会商。他肯定地认为南面会出现法军的严重威胁，突破缪斯河的主力、A 集团军司令伦斯德，在那天晚些时候会见他时支持他的这种看法。伦斯德说，他估计“强大的法军会从凡尔登和马恩河畔夏龙地区发动一次出人意料的有力反攻”。希特勒忽然担心起来，生怕出现第二次马恩河事件。“我［727］正在注意这件事，”第二天他写信给墨索里尼说，“1914 年马恩的奇迹决不能重演！”[②]

［5 月 17 日晚上，哈尔德在日记里写道］一个非常不愉快的日子。元首神经紧张透了。他担心自己能否取得成功，不愿冒什么险，坚决抑制我们。他为自己辩解说，这都是由于他担心左翼……他带来的只是惶恐和怀疑。

尽管第二天法军崩溃的消息不断传来，这个纳粹统帅的神经紧张情况并没有什么好转。哈尔德在 5 月 18 日的日记中记录了这种神经紧张的情况：

元首对于南翼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焦虑，他大发雷霆，叫喊着说，我们会使整个行动毁掉，我们有遭到失败的危险。他不愿继续西进，更不必说西南方面，只是坚持向西北推进。这就是以元首为一方同勃劳希契和我为另一方之间所发生的最不愉快的争论的问题。

最高统帅部的约德尔将军差不多总是认为元首是对的，他也记录了最高领导间的分歧。

［他在 18 日写道］极度紧张的一日。陆军总司令［勃劳希契］没有执行尽快在南方建立一个新的侧翼阵地的意图……把勃劳希契和哈尔德立刻召来，严命他们立即采取必要的措施。

但哈尔德是对的：法国并没有可以从南方进行反攻的部队。这时装甲师正等得手痒难耐，一接到只许进行“大规模侦察”的命令，便不管三七二十一，向英吉利海峡推进。一支由 7 个装甲师组成的强大楔形队伍，无情地在松姆河北岸向西挺进，经过第一次大战的著名战场，于 5 月 19 日早晨进抵离英吉利海峡只有 50 英里的地方。使希特勒总部惊讶的是，第二装甲师已于 5 月 20 日晚上到达松姆河口的阿布维尔了。比利时军队、英国远征军和法国的 3 个军团已经陷入了重围。

［约德尔那天晚上在日记上写道］元首高兴得忘乎所以。他对德军和它的领导备加赞扬。他已在准备和约，主要内容为：归还最近 400 年来从德国人［728］民手中夺去的领土和其他有价值的东西……

一份特别的备忘录已存入档案中，内容有元首接到陆军总司令关于攻下阿布维尔的电话报告时激动得语不成声的话。

盟军从这个后果不堪设想的包围圈逃出来的唯一希望在于，在比利时的军队立即转向西南，摆脱正在向自己进攻的德国第六军团，突破那伸入法国北部到达海边的德国楔形装甲部队，杀出一条血路，从而与从松姆河向北推进的法国生力军会合。这实际上正是甘末林将军在 5 月 19 日晨下达的命令。但是那天晚上，马克西姆·魏刚将军接替了他的职务，立即取消了这道命令。魏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在军事上获得很高的声誉。他希望在同比利时的盟军指挥官进行会商之后再决定采取行动。结果，等到魏刚决定采取与他的前任完全相同的计划时，3 天的时间已经错过了。这样延误军机花费了巨

[②] 希特勒，1940 年 5 月 18 日致墨索里尼信件，载《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 9 卷，第 374—75 页。

大的代价。此时法国、英国和比利时还有 40 师有作战经验的部队在北部，如果他们遵照甘末林的命令，于 5 月 19 日向南突进，冲过兵力薄弱的德国装甲部队的防线，突围可能已经成功了。但是到他们转移的时候，盟国各指挥部之间的交通陷于一片混乱，各军在遭到压力之下，行动也乱成一团。总之，魏刚将军的计划只存在于他自己的心中；实际上法国部队并没有从松姆河北上。

同时，德军最高统帅部已把所有能用得上的步兵都投入战斗，以巩固并扩大装甲部队突破的缺口。5 月 24 日，从阿布维尔向英吉利海峡推进的古德里安坦克部队，分别攻占布伦，包围加莱这两个主要港口，并进抵格腊夫林，这个地方在离开敦刻尔克约 20 英里的海岸上。比利时战线已经向西南转移了，因为盟军试图在那里脱身出来。24 日，英国、法国和比利时在北部的军队被迫退到一个很小的三角形地带，这个三角形的底部在从格腊夫林到特纳曾的英吉利海峡沿岸，顶端在距海岸约 70 英里的发隆西纳。现在突围的希望已经没有了，唯一的希望——这看来是微乎其微的——就是由敦刻尔克从海上撤退。

5 月 24 日，德国装甲部队已经望见敦刻尔克，并且沿阿运河在格腊夫林和圣奥麦尔之间摆好阵势，准备投入最后厮杀。正在这个时候，接到一个奇怪的命令，要他们停止前进，这对于在战场上的士兵来说是费解的。这是第二次大战中德军最高统帅部犯的第一个大错误。在谁应负责和究竟为什么原因的问题上，不仅在德国将领们之间，而且在军事历史家们之间，都曾引起剧烈的争论。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后边将根据目前拥有的大量资料谈 [729] 到。这道停止进攻的命令，不论是根据什么理由发出的，都给盟军，尤其是英军，一个意外的喘息机会，导致了敦刻尔克的奇迹。

但比利时军队并没有因此获救。

利奥波德国王的投降

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三世于 5 月 28 日清晨投降。这位刚愎自用的年轻统治者，曾经使自己的国家退出同英法的联盟，采取愚蠢的中立，甚至当他获悉德国准备越过自己边界大举进攻的时候，还拒绝恢复联盟的关系；直到希特勒进攻以后，他才在最后一分钟向英法呼吁军事援助，并接受了援助。现在他又在绝望的时刻，抛弃了英法，打开了大门，让德国军队在已经受很大压力的英法部队侧翼长驱直入。再说，他这样做的时候，正如丘吉尔 6 月 4 日在下院所说，“事先未经协商，临时才片面通知，也没有和他的大臣们商量，只凭他个人自作主张”。

实际上，他是不顾政府的一致劝告这么做的，虽然他曾经按照宪法宣誓要听从政府的意见。5 月 25 日上午 5 时，在国王的大本营里，举行了一次国王和包括首相、外交大臣在内的 3 个阁员的摊牌会议，他们最后一次劝告国王自己不要投降，做德国人的俘虏，因为他如果这么做，“就会落到像布拉格的哈查那样的地位”。他们还提醒他，他不但是总司令，还是国家的元首，万不得已时，他可以像荷兰女王和挪威国王那样，在流亡中执行他的国王职务，直到盟国取得最后胜利。

“我已决定留下来，”利奥波德回答，“盟国的事业已经没有指望了。”

5 月 27 日下午 5 时，他派遣比利时参谋总部的副参谋长德罗骚将军到德军那里，要求休战。10 时，这位将军带回德军的条件：“ 元首要求无条件放下武器。 ” 下午 11 时，国王决定无条件投降，并建议于上午 4 时停止战斗，结果就在那时候停止了战斗。

法国总理雷诺发表了一篇言词激烈的广播，愤怒谴责利奥波德的投降。比利时首相皮埃洛特也在巴黎作了广播，不过语气比较得体一些，他对比利时人民说，国王的行动是违反政府的一致意见的，他这样做是自绝于人民，他已不可能继续执政，比利时流亡政府将继续奋斗。5 月 28 日，丘吉尔在下院发言的时候，对利奥波德的行动未加判断，但在 6 月 4 日也同大家一起批评他的不当。［730］ 直到战争结束以后很久，争论还是很激烈的。在比利时国内外，替利奥波德辩护的人为数都很多，他们相信他在与比利时军民患难与共这一点上，做了一件正确而光荣的事情。他们一再声称，他并不是作为国家的元首而是作为比利时军队的总司令投降的。

到 5 月 27 日，被打得焦头烂额的比利时军队已经陷于绝境，这一点是无可争辩的。他们为了使英法军队可以脱身向南突围，曾英勇地同意延长自己的战线。比利时军队虽顽强奋战，但是所延长的战线还是迅速崩溃了。利奥波德也没有得悉关于哥特勋爵在5月26日已经从伦敦接到向敦刻尔克撤退并尽量挽救英国远征军的命令的消息。这是一方面的论点，但另一方面也有他们的论据。他们说，比利时军队是由盟军统一指挥的，而利奥波德进行单独媾和，事先并没有与盟军协商过。有人替他辩护时指出：在 5 月 27 日中午 12 时半，他曾打电报告诉哥特，他马上就“ 得被迫投降，以避免崩溃 ”。但是这位英军司令官正忙得不可开交，而且时常在移动，因此没有接到这个电报。他后来证实他是在 5 月 27 日晚上 11 时以后不久才第一次听到投降的消息，发现自己“ 在伊普莱斯和大海之间突然面临一个 20 英里宽的缺口，敌人的装甲部队可以通过这里到达海滨 ”。[①]至于国王的上级军事指挥官魏刚将军，则是在下午 6 时以后从法国驻比利时大本营的联络官发来的电报中得到这个消息的。他后来说，这个消息对于他“ 像晴天霹雳，事先一点也不知道 ”[②]。

最后，利奥波德虽然身为武装部队的总司令，但在这个立宪民主的王国，是有义务接受政府的意见的。他不论作为总司令或作为国家元首，都无权擅自投降。最后还是比利时人民通过了对自己的君主的判决，他们这样做是正确的。那就是一直没有请他从他在战争结尾时在那里避难的瑞士回来复位。战争结束后过了 5 年到 1950 年 7 月 20 日举行公民投票，57%的票赞成他回来的时候，在群众中还引起了十分激烈的反响，几乎爆发了内战。他于是立即让位给他的儿子。

不论对利奥波德的行为有怎样的评价，对于他的军队的英勇战斗却是不应该有什么不同意见的——虽然也曾经有过不同意见。 ”5 月间，我曾有几天跟随莱希瑙的第六军团经过比利时，我亲自看到比利时人在敌我力量极为悬殊的条件下顽强作战的情况，在德国空军残酷无情、肆无忌惮的轰炸下，

[①] 引自国王自己关于这次会议的叙述以及皮埃洛特首相的叙述。载官方的《比利时报告》，附录第 69—75 页，保罗 · 雷诺也曾援引过，他是当时的法国总理，见他的《斗争最前线》一书，第 420—26 页。

[①] 哥特勋爵的函电，伦敦《官报》的附件，1914 年伦敦出版。

[②] 魏刚：《应召服役》，第 125—26 页。

或者当德国装甲部队企图截断他们的时候，他们从来没有屈服过。对于这次战役［731］中其他一些盟国部队，就不能这么说了。比利时军队坚持了 18 天，如果他们没有同英国远征军和法国的北部军队一起陷入重围，他们本来是可以支持得更久的，何况陷入重围并不是他们的过失。

敦刻尔克的奇迹

自从 5 月 20 日古德里安的坦克部队突破盟军防线进抵海边的阿布维尔以后，英国海军部就根据丘吉尔亲自下的命令调集船只，为英国远征军和其他盟国军队可能撤出海峡上的各处港口做准备。非战斗人员和其他“用不着的人”立即开始渡过这个狭窄的海面前往英国。到 5 月 24 日，我们上面已经谈到，北面的比利时前线已接近崩溃，在南方，从阿布维尔沿海岸向北猛扑的德国装甲部队，在攻克布伦包围加莱以后，已经到达距离敦刻尔克只有 20 英里的阿运河。比利时军队、英国远征军 9 个师和法国第一军团的 10 个师都被夹在中间了。虽然在包围圈南端，运河、沟渠和泛滥地区纵横交错，地形不利于坦克的行动，但古德里安和莱因哈特的装甲军已经在海岸上的格腊夫林和圣奥麦尔之间主要障碍之—阿运河彼岸建立了 5 座桥头堡，准备给盟军以彻底打击，使他们受到从东北方推进过来的德国第六军团和第十八军团的夹攻，从而完全消灭他们。

5 月 24 日晚上，最高统帅部突然发来紧急命令，这道命令是在伦斯德和戈林怂恿之下，不顾勃劳希契和哈尔德的激烈反对，由希特勒坚持发出的。命令要坦克部队停在运河一线，不要再向前推进，这就给了哥特勋爵一个意外的、重要的喘息机会，他和英国海军及空军都充分利用了这个机会。伦斯德后来体会到这一点，他说，这个喘息机会导致了“战事中几个重大转折点之一”。

德国在眼看就要取得这次战役中最大胜利的时候，怎么会发出这道难于解释的命令呢？下这个命令的原因是什么？谁应该负这个责任？这些问题在有关的德国将领中和历史学家中，曾引起过一场大辩论。以伦斯德和哈尔德为首的将领，把责任完全推在希特勒身上。丘吉尔在大战回忆录第 2 卷中，为这场争论火上加油，他认为这个命令出自伦斯德，而不是希特勒，他引述了伦斯德司令部的战争日志作为论证。在一大堆互相矛盾、众说纷坛的证词之中，要弄清楚事实真相是很难的。在准备写这一章的过程中，作者曾写信给哈尔德将军本人请他阐明，不久就接到一封有礼貌的详细的回信。根据这封信和其他许多现在能够得到的证据，［732］也许可以得出一定的结论平息争论，即使这不是最后的结论，但至少也是有相当说服力的。

说到这道著名的命令的责任问题，不管伦斯德后来怎样辩解，他必须与希特勒分担责任。元首在 5 月 24 日早晨，曾到伦斯德将军设在查理维尔的 A 集团军总司令部去过，伦斯德建议在离敦刻尔克不远的运河一线上的装甲师应当停止前进，等候更多的步兵部队的接应。* 希特勒同意了这个建议，并且认为装甲部队应当保存下来，留待进攻松姆河以南的法国军队时使用。他还说，如果盟军陷入的袋形地带缩得大小，就会妨碍空军的活动。停止前进的命令可能是伦斯德获得元首的批准以后立即发出的。因为据丘吉尔说，英

国远征军曾截获到德国那天早晨 11 点 42 分下达那个命令的无线电报。[①]希特勒和伦斯德当时正在开会。

总之，那天晚上希特勒从最高统帅部发出了正式的命令，这在约德尔和哈尔德两人的日记上都有记载。参谋总长极感不快。

［他在日记里写道］我们的由装甲部队和摩托化部队组成的左翼，由于元首的直接命令，都将因此完全停止下来！消灭包围中的敌军，要留给空军去干！

这个表示轻蔑的惊叹号表明，戈林参与了希特勒的决定，现在我们知道他的确是参与了的。他曾建议由他的空军单独来消灭被包围的敌军！哈尔德在 1957 年 7 月 19 日给作者的信中举出了［733］他所以作出这个野心勃勃、不自量力的建议的理由。

在以后的几天中［即 5 月 24 日以后］，终于弄明白希特勒的决定，主要是受戈林的影响。陆军的迅速行动，对于这个独裁者说来，几乎变成了不祥的事情，因为他缺乏军事训练，毫不了解这一行动究竟有多少危险性和它的成功的可能性。他常常有一种忧虑的情绪，觉得会出现不利的情况……

戈林很了解他的元首，因此就利用了这种忧虑情绪。他建议单独用他的空军来收拾这一个大包围战的残局，这样就可以毋须冒必须使用宝贵的装甲部队的风险。他提出这个建议……有一个理由，这个理由说明了野心勃勃、不择手段的戈林的特性。在陆军一帆风顺的作战以后，他要为他自己的空军在这次大战役中取得最后决战的机会，从而在整个世界面前获得成功的荣誉。

哈尔德将军接着在来信中谈到了勃劳希契1946年1月在纽伦堡监狱中同空军将领米尔契和凯塞林谈话以后，对他所作的一个说明。据说这些空军军官宣称：

戈林当时［1940 年 5 月］对希特勒强调说，如果当时快要到手的战斗中的伟大胜利的功劳完全被陆军将领得去的话，那么元首在德国国内的威望就会遭到无法弥补的损失。只有一个方法可以防止这一情况，那就是由空军而不是由陆军来完成决战。

事实至此已很清楚：希特勒在戈林和伦斯德的怂恿下，但遭到勃劳希契和哈尔德竭力反对的计划，是让空军和包克的Ｂ集团军去扫荡陷入重围的敌军。B 集团军谈不上有什么装甲部队，他们这时正在慢慢地把比利时军队和英国军队驱到海峡西南地区。而拥有 7 个坦克师在敦刻尔克西面和南面的运河线上停止前进的伦斯德的 A 集团军却要在原地不动围住敌人。结果是，不论空军或包克的集团军都没有达到他们的目标。5 月 26 日早晨，哈尔德在日记中愤怒地说：“ 从最高统帅部发来的这些命令真是莫名其妙……坦克都像瘫痪似地停在那里不动。 ”

最后，5 月 26 日夜间，希特勒取消了停止前进的命令，并同意这样的意见：由于包克的部队在比利时进展迟缓和海岸附近运输舰活动频繁，装甲部队可以继续向敦刻尔克前进。但到了这个时候已经太迟了；被围的敌人已经得到加强自己的防务的时间，一边抵御，一边开始偷偷地逃到海里去了。

现在我们知道希特勒所以发出这个命运攸关的命令，也是有［734］其政治原因的。5 月 25 日，据哈尔德说，这一天一开始，“ 勃劳希契和元首之间在包围战中下一步行动的问题上就发生了一次令人痛心的争吵 ”，他在这一天日记中写道：

现在政治当局已经形成了一种固定的观念，认为决战要在法国北部而不应在佛兰德斯一带进行。

这一则日记曾使我感到大惑不解。因此我写信给这位前参谋总长，问他

[①] 丘吉尔：《他们最美好的时刻》，第 76 页。

是否能够回忆一下希特勒要求在法国北部而不在比利时结束这一战役的政治原因是什么。哈尔德记得很清楚。“根据我现在还是栩栩如生的记忆，”他回答道，“在当时我们的谈话中，希特勒用两个主要考虑来支持他的停止前进的命令。第一个考虑是军事上的理由：地形不适干坦克的活动，由此而造成很大的损失，将会削弱即将对法国其他地方进行的进攻，等等。”然后，哈尔德写道，元首举出了

第二个理由，他知道，我们作为军人是不能反驳这个理由的，因为这是政治上的，而不是军事上的理由。

这第二个理由是，为了政治的理由，他不希望这个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居民重大损失的最后决战，发生在佛兰德斯人居住的地方。他说，他想把这个日耳曼后代佛兰德斯人居住的地方变成一个独立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区域，从而使他们和德国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他在佛兰德斯地区的支持者，为此已经作了长期的活动。他已经答应他们，使他们的国土不致遭到战争的破坏。如果他现在不实践诺言，那就会严重损害他们对他的信任。这对于德国将是一件政治上的损失，这是他作为政治上负责的领袖所必须尽力避免的。

荒唐吗？如果说这看来好像是希特勒又一次突然发生神经错乱（哈尔德写道，他和勃劳希契“没有被这种理由说服”），那么，他对另一些将领透露的另一个政治上的考虑，却是比较合理而且重要的。伦斯德的作战处长古恩特·勃鲁门特里特将军在战后对英国军事作家利德尔·哈特追述希特勒 5 月 24 日和伦斯德的会晤时说：

希特勒当时的心情很好……并且告诉我们，他认为战争在 6 个星期之后就可以结束。他希望战事结束后，能和法国缔结一个合理的和约，这样和英国达成协议的道路就打开了……

后来，使我们觉得惊异的是，他竟用钦佩的口吻谈到大英帝国，谈到它的存在的必要，谈到英国给世界带来的文明……他说，他所要求于英国的，不过是它应当承认德国在大陆的地位。德国如果能够重新获得它的殖民地，那［735］当然最好，但也并不是非如此不可……他最后说，他的目的是能和英国在一个英国认为可以接受而并不有损自己的尊严的基础上媾和。[①]

希特勒在以后的几个星期中常常向他的将领们、向齐亚诺和墨索里尼表示这种想法，并且最后公开地作了表示。齐亚诺在 1 个月以后发现，这个纳粹独裁者当时正处在成功的顶点，竟反反复复地提到保持大英帝国作为“世界均势的一个因素”[②]的重要意义，他不禁感到惊异。7 月 13 日，哈尔德在日记中谈到元首对于英国没有接受和平感到非常迷惑不解。那一天，他对他的将领说，用武力迫使英国投降，“对德国没有什么好处……只对日本、美国和别的国家有好处”。

因此，可能是（虽然还有人怀疑）希特勒把他的装甲部队遏止在敦刻尔克的前面，目的在于想使英国避免一场奇耻大辱，从而促进和平解决。而这个和平解决，照他的说法，必须是这样的：英国让德国放心地重新掉头东向，这一次是进攻俄国。他还说，伦敦必须承认第三帝国独霸大陆的地位。在以后两个月之中，希特勒深信，这种和平已在他的股掌之中了。他现在和过去几年一样不了解英国民族的特性，不了解它的领袖和它的人民要不惜牺牲性作战到底加以保卫的是哪种世界。

过去和现在对于海洋都缺乏了解的希特勒和他的将领们，做梦也想不到熟习海洋的英国人竟能够从一个设备已荡然无存的小小港口和暴露在他们鼻

[①] 利德尔·哈特：《德国将领谈话录》，第 114—15 页（平装本）。

[②] 《齐亚诺日记》，第 265—66 页。

尖下面的沙滩上撤退了 30 多万人。

5 月 26 日晚上 7 时差 3 分，在希特勒取消停止前进的命令以后不久，英国海军部发出通知，开始执行“ 发电机计划 ”，这是敦刻尔克撤退计划的代号。那天晚上，德国装甲部队恢复了从西面和南面对这个海港的进攻，但现在装甲部队发现进攻很困难。哥特勋爵已经有时间部署了 3 个步兵师，在重炮的配合下，抵抗他们的进攻。坦克的进展迟缓。就在这个时候，撤退工作开始了。由 850 艘各种类型、各种动力的大小船只编成的舰队，从巡洋舰、驱逐舰到小帆船和荷兰小船（其中有许多都是由英国滨海城市的人民志愿驾驶的）集中在敦刻尔克。第一天，5 月 27 日，他们撤走了 7669 人，第二天 17804 人，第三天 47310 人；5 月 30 日 53823 人，头 4 天总共撤退了 126606 人。这大大超过了海军部原来希望撤出的人数。当撤退开始的时候，海军部以为只能有两天的时间，只指望能撤退 45000 人。

一直到“ 发电机计划 ” 执行到第四天即 5 月 30 日的时候，德军最高统帅部才发现发生了什么事情。4 天来，德军最高统帅部的公报一直在重申，被围敌军的命运已经注定了。我的日记中记录的 5 月 29 日的一份公报断然说道：“ 在阿托瓦的法军的命运已经［736］决定了……被迫退入敦刻尔克周围地区的英军在我们的集中进攻之下也在走向毁灭。 ”

但英国军队并没有走向毁灭，他们是在走向海上去。当然，他们没有带走重武器和装备，但是可以肯定，这些人将会活下来，有朝一日再投入战斗。

一直到 5 月 30 日早晨，哈尔德还在日记中满有信心地写道，“ 我们所包围的敌人正在继续崩溃 ”。他承认，有的英国人“ 打得很猛 ”。其他的人则“ 逃至海滨，想用不管是什么漂浮在海上的东西渡过英吉利海峡。《Le Debac1e》（《崩溃》），他最后这么说，指的显然是左拉描写普法战争中法国崩溃的著名小说。

下午，在与勃劳希契会议以后，参谋总长终于发觉这许多运载英军逃跑的小得可怜的船只的意义。

勃劳希契很为恼火……要是我们的装甲部队没有被阻止的话，早已在海岸边把袋形阵地的口封上了。恶劣的天气使空军无法出动，现在我们只有站在一旁，眼看成千上万的敌人在我们鼻尖底下逃到英国去。

事实上，这就是他们所看到的情况。不管德国人在袋形阵地各边立即增加多么大的压力，英国的防线还是屹然不动，撤退的部队更多了。第二天，5 月 31 日，是撤退人数最多的一天，有 68000 人上了船到英国去，其中 1/3 是从海摊撤退的，2/3 是从敦刻尔克港撤退的。现在总共已经撤退了 194620 人，较原来估计能撤出的人数多出 3 倍多。

著名的德国空军到哪里去了呢？据哈尔德记述，它有一部分时间是由于恶劣的天气不能出动。其余的时间则是遭到英国皇家空军意外的抗击，后者从海峡对面的基地起飞，第一次成功地向德国空军挑战。* 英国新式的喷火式飞机虽然在数量上居于劣势，但证明胜过麦塞施米特式，他们击落了笨重的德国轰炸机。有少数几次，戈林的飞机乘英机未来的间隙时间飞到敦刻尔克上空，使这个港口受到很大的损失，一时无法使用，部队不得不完全依靠从海滩上船。德国空军对船只也进行了几次强袭，在 861 艘中有［237］243 艘沉没，其中大部分是德国空军炸沉的。但戈林向希特勒许下的歼灭英国远征军的诺言，却没有实现。6 月 1 日，德国空军进行最大的一次攻击（也受到最沉重的一次损失——双方都损失飞机 30 架），炸沉了英国驱逐舰 3 艘和

一些小型运输舰，但这一天撤退人数仅次于最高的那一天，共撤退了 64429 人。到第二天黎明时分，只有 4000 名英国部队还留在包围圈中，由当时守住防线的 10 万名法国部队保护着他们。

这时德军中程炮已到达射程以内，白天不得不停止撤退工作。当时德国空军在天黑之后并不进行活动，6 月 2 日、3 日夜间，余下的英国远征军和 60000 名法军成功地撤出来了。一直到 6 月 4 日早晨，敦刻尔克仍在 40000 名法军的固守之中。到那一天为止，一共有 338226 名英法士兵逃出了德军的虎口。他们已经溃不成军。绝大部分部队当时的狼狈情况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但他们都经历了战斗的考验；他们知道，他们如果得到适当的装备和充分的空军掩护，是能够抵抗德国人的。他们大多数人，当装备方面能与德军并驾齐驱的时候，终于证明能够做到这一点——而且就是在离他们被救出来的沙滩上不远的英吉利海峡海岸上。

敦刻尔克救了英国部队。但是丘吉尔 6 月 4 日在下院提醒他们说，“战争不是靠撤退来打赢的”。英国的处境的确是严重的，比较近 1000 年前诺曼人登陆以来任何时候都要危险。它没有陆军保卫岛屿，空军力量在法国已受到很大的削弱。剩下的只有海军。挪威战役已经表明，大型战舰是很容易遭到以陆地为基地的空军的攻击的。现在德国轰炸机从基地飞过狭窄的英吉利海峡，只需 5 分钟到 10 分钟的时间。当然，法国还坚守在松姆河和安纳河以南的地方，但是，它的最精锐的部队和最精良的装备已经在比利时和法国北部损失殆尽，它的数量不多、陈旧过时的空军也已大部分被毁了。它的两个最著名的将军——现在开始领导那个摇摇欲坠的政府的贝当元帅和魏刚将军，已经不再想和这样一个优势的敌人打下去了。

当 1940 年 6 月 4 日，温斯顿·丘吉尔在下院起立发言的时候，这些渗淡的事实，使他的心头十分沉重。当时，从敦刻尔克开回来的最后一批运输舰正在把人员卸下来。正如同他后来所写的那样，这时他已下定决心不仅向本国人民，而且也向全世界——尤其是美国——表明，“我们决定继续战斗是有重要理由的”。正是在这个时刻，他发表了他那著名的令人久久不能忘怀的演说，这篇演说必然可以和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演说相媲美：

> 欧洲大片大片的土地和许多古老著名的国家虽然已经陷入或可能陷入［738］秘密警察和纳粹政体所有凶恶的统治工具的魔掌之中，但是我们决不气馁认输。我们将战斗到底，我们将在法国战斗，将在海洋上战斗，我们将以不断增长的信心和不断增长的力量在空中战斗。不论代价多么大，我们都将保卫我们的岛屿，我们将在海滩上战斗，我们将在登陆地点战斗，我们将在农田和街道上战斗，我们将在山中战斗。我们决不投降，即使这个岛屿，或者它的一大部分土地已被征服，或者挨冻受饿——我一点也不相信会发生这种情况——我们那个由英国舰队所武装和保卫的海外帝国，也将战斗下去，直到新世界在上帝认为适当的时机挺身而出，用它的全部力量把旧世界援救和解放出来为止。

法兰西的崩溃

英国继续战斗的决心，似乎并没有使希特勒感到不安。他确信在他把法国干掉以后，他们就会改变主意的，而他现在就要干掉法国了。6 月 5 日，在敦刻尔克陷落后的第二天早晨，他们在松姆河上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随即以压倒的力量从阿布维尔到莱因河上游这整个 400 英里宽的横贯法国的战线上采取攻势。法国的命运已注定了。他们只能用 65 个师（其中大部分还是第二流的），去抵抗包括 10 个装甲师在内的德军 143 个师的兵力，因为最优

秀的部队和大部分装甲部队都在比利时消耗掉了。力量薄弱的法国空军也所剩无几。英国能够派出来的只有驻在萨尔的 1 个步兵师，另外还有 1 个装甲师的部分人员。英国皇家空军除非把不列颠群岛置于不顾，否则它能为这场战斗提供的飞机极为有限。再说，现在在贝当和魏刚的控制下，法军最高统帅部已经浸透了失败主义情绪。虽然如此，有些法国部队还是极为勇敢和顽强地战斗着，在一些地方甚至暂时阻止住了德军装甲部队，并且坚决地不向德国空军的不断轰炸屈服。

但这是众寡悬殊的战斗。特尔福德·泰勒描写得很恰当，德军在"胜利的混乱"中，像潮水一般地涌过法国。混乱的发生是因为他们的人数那么多，行动那么迅速，路线又常常互相冲突[①]。

6 月 10 日，法国政府匆忙地离开巴黎。6 月 14 日，这个未设防的伟大城市，法兰西的光荣，被冯·库希勒将军的第十八军团占领了。巴黎铁塔上立即高悬起卐字旗。6 月 16 日，雷诺辞职，他的政府已经逃到波尔多，贝当接任总理，贝当在任职的第二天，就通过西班牙大使向德国要求停战。* 希特勒于同一天答复说，他首［739］先要和他的盟友墨索里尼商量。墨索里尼这个趾高气扬的斗士，在弄清楚法国军队已经受到绝望的打击以后，就像鹰犬一样在 6 月 10 日投入战争，企图分得战利品。

墨索里尼在法国背上扎进一小刀

希特勒尽管正在为西线战事的开展忙得不可开交，但仍接二连三地抽暇写信给墨索里尼，把德国连连取得胜利的消息告诉他。

5 月 7 日第一封信通知意大利领袖，他正在进攻比利时和荷兰，以"保证它们的中立"，并说他将使他的朋友知道他的进展，以便他的朋友得以及时做出决定。后来，在 5 月 13 日、18 日和 25 日，又接连写了几封信，这些信写得一封比一封详细、热情。[①]虽然正如哈尔德日记所证实的，将领们对意大利的动向——参战或者不参战——毫不关心，但是，元首为了某种原因，很重视意大利的参战。一等到荷兰。比利时已经投降，北路的英法军队一败涂地，英军残部在敦刻尔克开始登船的时候，墨索里尼决定参加战争。他在 5 月 30 日写信给希特勒说，参战的日期将是 6 月 5 日。希特勒立即回答说，他"深受感动"。

［希特勒在 5 月 31 日的信里写道］在这次战争的胜利结局方面，如果说还有什么可以加强我的不可动摇的信心的话，那就是你的声明了……仅仅你参战这一事实本身，就是足以使我们敌人的战线受到沉重打击的一个因素。

但是元首要求自己的盟友把日期推迟 3 天，他说，他要先把残余的法国空军击溃。而墨索里尼却好意推迟了 5 天，到 6 月 10 日。墨索里尼说，战斗将在第二天开始。

这些战斗简直算不了什么。到 6 月 18 日，当希特勒召唤他的［740］小伙伴到慕尼黑来讨论与法国停战问题的时候,意大利的大约 32 个师已进行了一周的"战斗"。但他们在阿尔卑斯山前线和南方的海岸一带，丝毫没有迫使力量单薄的 6 师法国军队后退一步，虽然守方此时正遭受到沿尼罗河流域

[①] 特尔福德·泰勒：《征服的进军》，第 297 页。

[①] 希特勒和墨索里尼 1940 年 5—6月 间来往信件全文见《德国外交政策文、 件汇编》，第 9 卷。

扫荡的德军队背后攻击的威胁。* 齐亚诺在 6 月 21 日的日记中写道：

墨索里尼已经十分丢脸，国为我们的部队还没有前进一步。甚至直到今天他们也没有能够向前推进，还停在进行抵抗的法国第一道防御工事的阵地前。[①]

墨索里尼曾大吹大擂自己的军事力量，但从参战一开始就暴露出是虚张声势。因此，当这位泄了气的意大利独裁者和齐亚诺在 6 月 17 日晚上乘火车去同希特勒会商对法停战的时候，他的心情是沉郁的。

［齐亚诺在日记里写道］墨索里尼颇为不满。突如其来的和谈，使他感到不安。在旅途中，我们作了详细的谈话，以便弄清与法停战要提出哪些条件。领袖……想占领整个法国领土，要求法国舰队投降。但他知道，他的意见只能有参考的价值。战争是希特勒赢得的，意大利并没有参加任何积极的军事行动。有最后决定权的只有希特勒一个人。这当然会使墨索里尼感到忧郁不安。

当他门在慕尼黑元首府里与希特勒进行会谈的时候，元首的“ 最后决定 ”相当温和，使意大利人感到特别惊讶。这个官邸正是不到两年以前张伯伦和达拉第就捷克问题对这两个独裁者妥协的地方。德国方面关于这次会谈的秘密备忘录[②]清楚表明：希待勒认定，最重要的问题是不让法国舰队落到英国的手里。他还担心法国政府逃到北非或伦敦去继续战斗。由于这个理由，停战条件——最后的和平条件，也许又当别论——一定得温和一点，要能保持“ 一个在法国本上行使职权的政府 ”，并且使“ 法国舰队中立化 ”。他断然拒绝了墨索里尼关于由意大利占领包括上伦（法国在地中海的一个重要海军基地，绝大多数舰只都集中在那里）和马赛在内的罗尼河流域并使科西嘉、突尼斯和吉布提解除武装的要求。上述最后一个城市，是通往意大利侵占的埃塞俄比亚的门户，据德［741］国方面的文件透露，这是齐亚诺“ 低声 ”提出来的。

齐亚诺发现，甚至好斗成性的里宾侍洛甫，也“ 异常温和而沉静，并且主张和平 ”。这位女婿写道，墨索里尼“ 感到非常难为情 ”。

他觉得自己扮演的是二等角色……领袖实在担心和平时刻的日益迫近，并且担心他再度失去他平生未能实现的美梦：战场上的光荣。[①]

墨索里尼甚至没有能使希特勒同意他参加与法国进行的停战谈判。元首并不想在一个历史上富有盛名的地点（他不把地名告知他的朋友），与这个迟到的伙伴分享他的胜利。但他答应墨索里尼，在法国和意大利也签订一个停战条约以前，他和法国之间的停战条约将不生效。

墨索里尼灰心丧气地离开了慕尼黑，但齐亚诺对于希特勒的一个方面，却得到非常好的印象。他在日记中清楚指出，这个方面是他从来没有看到或想到的。

［他们回到罗马以后，他在日记里写道］从他［希特勒］所说的一切看来，他显然要想早日结束战争。希特勒现在是一个赢得了一大笔钱的赌徒，他想从桌边站起来，不再冒险了。今天他的话说得谨慎而聪明，在获得这样大的胜利以后能够这样，这实在是令人惊异的。我这个人是不能说对他有特别好感的，但今天我确实佩服他。[①]

贡比臬的第二次停战

[①] 《齐亚诺日记》，第 267 页。

[②]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 9 卷， 第 608—11 页。

[①] 《齐亚诺日记》，第 266 页。

[①] 同上。

那年 6 月，我随德国军队进入巴黎。在这个富丽堂皇的首都，6 月总是最可爱的一个月份，但如今却是一片惊慌。6 月 19 日，我获悉希特勒将在什么地方提出停战条件。停战是贝当在两天以前提出要求的。这个地方就是 1918 年 11 月 11 日德意志帝国向法国及其盟国投降的地方；贡比臬森林中的一块小小的空地。希特勒将在这儿报仇雪耻，因为这个地方本身会增加他报仇雪耻的甜美滋味。他想出这个主意是在 5 月 20 日，即在西线发动总攻势仅仅 10 天以后，也就是德国坦克打到阿布维尔的那一天。约德尔在那天的日记上写道：“ 元首正在草拟和约……初步谈判将在贡比臬森林中进行。 ”6 月 19 日傍晚，我驱车到贡比臬，看见德国工兵正在拆毁还保存着福煦元帅的旧卧车的博物馆的墙壁，1918 年的停战［742］条约就是在那个车厢里签订的。我离开的时候，德国工兵已经用风镐把墙壁推倒，把车子推到空地中间的轨道上。他们说，这就是 1918 年 11 月上午 5 时德国的使节遵照福煦的命令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时，车子停放的确实地点。

6 月 21 日下午，我站在贡比臬森林的边上，观看了希特勒的最新的和最大的胜利的场面。这种场面，我由于工作关系，在最近几年扰攘的岁月里已经见过多次了。这是我所能记得的法国的最美丽的一个夏日。6 月的阳光暖洋洋地照着壮丽的树木——榆树、橡树、丝柏和松树——把一片令人神爽的阴影投在通往小小的圆形空地的林荫道上。下午 3 时 15 分工，希特勒乘着他的曼赛德斯牌汽车来了。同行的有戈林、勃劳希契、凯特尔、雷德尔、里宾特洛甫和赫斯，他们都身穿各种各样的制服。独一无二的帝国元帅戈林，手里还拿着他的陆军元帅节杖。他们在离空地大约 200 码的阿尔萨斯—洛林的雕像前走下汽车。雕像用德国军旗覆盖着，为的是不让元首看到那把大剑（不过我因以前来参观过，所以还记得）。那是一把 1918 年获得胜利的盟国的大剑，插在一只有气无力的鹰身上，这鹰代表霍亨佐伦王朝的德意志帝国。希特勒向纪念碑投了一瞥，继续大踏步地走去。

［我在日记中写道］我观察了他的脸，他的脸严肃、庄重而充满了复仇的神情。从他的脸上，正如从他的轻快的步伐里一样，可以看出一副胜利的征服者、世界的挑战者的神气。还有……一种傲然的内心快乐，这是因为他目睹命运起了地覆天翻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又是他亲刍创造出来的。

他走到这块小小的林间空地以后，空地中央升起了他的最高统帅旗。他的注意力给离地约 3 英尺高的一大块花岗石吸引住了。

［我引用我的日记］希特勒后面跟着一些人，慢步走上前去，读着石头上刻着的大字碑文［法文］：

“ 1918 年 11 月 11 日，德意志帝国在此屈膝投降——被它企图奴役的自由人民所击败。 ”

希特勒读着，戈林也读着。大家站在 6 月的阳光中和一片沉静中读完了它。我观察着希特勒脸部的表情。我离他只有 50 码，从我的望远镜里看他，好像他正站在我面前一样。我曾经在也生命的伟大时刻里多次看见过那张脸孔。但是今天啊！他的脸上燃烧的是蔑视、愤怒、伊恨、报复和胜利。

他离开了纪念碑，极力使他的姿态能表示出他的蔑视。他回头看了一下，［743］表情轻蔑而愤怒——人们几乎可以感觉到这种愤怒，因为他不能用他的普鲁士高统靴一脚踏去这些可恶的、挑衅的字句。*他慢慢地向空地四周扫了一眼，这时，当他的目光和我们的目光相遇的时候，谁都可以体会到他的仇恨的深度。这种仇恨是和胜利混在一起的——一种报复的、胜利的仇恨。突然，他好像感到自己的脸部表情还没有完全表达出他的感情似的，他把整个身子摆出一副与他的心情相协调的姿态。他迅速地用两手搭在臀部，两肩耸起，两脚分得很开。这是一种不可一世的挑战姿态。这种姿态是对现在这个地方的极端蔑视，以及对这个地方在目击德意志帝国受辱以来的 22 年中所代表的一切的极端蔑

视。

然后，希特勒及其随行人员走进停战谈判的车厢，元首坐在 1918 年福煦坐过的那把椅子上。5 分钟以后，法国代表团来了。这个代表团以色当的第二军团司令查理 · 亨茨格将军为首，成员有 1 个海军将领、1 个空军将领和 1 个文职官员利昂 · 诺尔。利昂 · 诺尔曾任驻波兰大使，他现在正亲身经历着德军造成的第二次崩溃。他们看起来都精神颓丧，但还保持着一种悲惨的尊严。他们事先并不知道会把他们带到法国人引为骄傲的这个圣地来受这样一种屈辱。他们的这种震惊，无疑正是希特勒所期望的。哈尔德在听了勃劳希契对他讲述了当场看到的情况以后，那天晚上在日记里写道：

法国人事先没有得到通知，要他们在 1918 年谈判的地方接受条件。这种安排显然使他们大为惊讶，在开始的时候并且有点不高兴。

甚至像哈尔德或勃劳希契这样有教养的德国人，也把法国人的尊严神情误认为不高兴，这是不足为怪的。我们立即看到，法国人确实感到茫然不知所措。但是，与当时报道的情况相反，他们曾经企图使元首所提条件中比较苛刻的部分放宽一些，并且取消那些他们认为屈辱的条件。他们的企图失败了。这是我们现在才从缴获的纳粹秘密文件中的德国官方会议记录[①]中得知的。

在凯特尔将军对法国人宣读了停战条款的序文以后，希特勒和他的随行人员马上离开了车厢。谈判工作交由最高统帅部长官继续进行，但对于他亲手所拟订的条件没有留出丝毫的回旋余地。

凯特尔把这些条款读完以后，亨茨格马上对德国人说，条件太 “ 冷酷无情 ” 了，比 1918 年法国在这里向德国提出的条件坏得多。而且，“ 如果阿尔卑斯山那一边的、一个没有打败法国的国家（亨茨格很看不起意大利，甚至不愿提它的名字），也提出类似的要求，法国决不投降。它将战斗到底……因此，他不能在德国停 [744] 战协定上签字 ”。

当时临时主持会议的最高统帅部第二号人物约德尔将军，没有料到一个被打得走投无路的敌人，竟会说出这样倔强的话。他回答说，他虽然不免要表示他 “ 理解 ” 亨茨格所说的关于意大利人的话，但他无权改变元首提出的条款。他说。他所能够做的，只是 “ 提供一些说明和对不清楚的地方作些解释 ” 而已。法国人要么原封不动地接受停战条款，要么就全部不接受。

德国人感到着恼的是：法国代表团除非得到在波尔多的政府的明确同意，无权签订停战协定。靠了技术上的奇迹，也许是运气好，他们从这辆旧卧车上居然通过战斗还在继续的战线，与波尔多直接建立了电话联系，法国

[①] 虽然在德国档案局发现的会议记录 副本是未经签字的，施密特博士证实 那是他自己起草的。他当时担任翻译 工作，因此他比任何人做这件事情都 要适当。这些文件载《德国外交政策 文件汇编人第 9 卷，其中有：6 月 21 日谈判，第 643—52 页；6 月 21 日晚 上亨茨格将军与魏刚将军（在波尔 多）电话会谈记录，是由奉命偷听这 次谈话的施密特记录并整理出来的， 第 652—54 页；6 月 22 日上午十时亨 茨格将军与魏刚将军的副官波尔格 特上校的电话谈话记录，第 664—71 页；法德停战协定全文，第 671—76 页；关于贡比臬谈判期间法国所提出 的和德国所答复的问题的备忘录，第 676—79 页。希特勒曾经指示，这项 文件虽然不是协定的一部分，但 “ 对 德国方面有约束力 ”。德国人在这节卧车里安置了偷 听器，把车上所讲的每一句话都记录 下来。当它们在德国的通讯车中记录 下来的时候，我曾亲耳听到过当时会 议的部分懵况。就我所知，它们从来 没有公布过，录音和记录也许从来没 有被发现。我自己的笔记除了富有戏 剧性的闭幕会议外，都是非常零 碎的。

代表团被允许用电话将停战条款的全文发回去，并和他们的政府进行磋商。担任翻译的施密特博士，被指派在树林后面几码远的地方，在军用通讯车里偷听谈话内容。第二天，我自己设法听到了德国人记录的亨茨格和魏刚将军谈话的部分录音。

魏刚对于法国的失败主义情绪、最后投降和与英国决裂都负有重大责任，但是他至少在抗拒德国的许多要求这一点上，曾作过不屈不挠的努力。这是应该记载下来的。在德国人提出的条件中，最恶毒的一条就是强迫法国把法国本土和海外属地上的反纳粹的德国流亡人士全部交给希特勒帝国。魏刚认为，从法国尊重避难权的传统来看，这样做是可耻的。但是当第二天讨论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傲慢自大的凯特尔一点也不肯取消这个要求。他大声说道，“德国的流亡者是最大的战争贩子”，他们已经“背叛了自己的人民”，必须“不惜任何牺牲”把他们移交出来。法国对于这样一条也没有提出抗议：凡是与别国联合对德国作战的法国人，被捕以后将按法国义勇军处理——就是说，立即枪决。这其实是指戴高乐说的，他已经开始在英国组织一支自由法国军队了。魏刚和凯特尔都知道，这一条条款是对于战争基本法规的粗暴违反。条款中还有这样一条：所有战俘都将被拘留到签订和约为止，对于这样一段文字，法国方面也没有提出异议。魏刚肯定地认为，英国在 3 个星期之内将被战败，到那个时候，法国战俘即可释放了。这样一来，他就使 150 万法国人在战俘营中呆了 5 年。

停战条约中最难处理的是法国海军问题。在法国将要崩溃的时候，丘吉尔曾经表示，法国如果把海军开到英国来，过去不单独媾和的诺言就可取消。希特勒决心不让这件事情实现。他在 6 月［745］18 日对墨索里尼说，他充分认识到，这将大大加强英国的力量。由于此事关系重大，他不得不对这个被打败了的敌人作一些让步，或者至少给一点保证。停战协定规定，法国舰队必须复员、解除武装并把舰只停泊在本国港口废置不用。对这个行动的报酬是：

> 德国政府对法国政府庄严地宣布，它无意使用在德国监督下的港口所停泊的法国舰队来为自己作战。而且，德国政府还庄严而明确地宣布，在签订和约的时候，他们无意对法国舰队提出任何要求。

正如希特勒的几乎全部诺言一样，这个诺言也是要违背的。

最后，希特勒给法国政府一块未占领区，它在法国的南部和东南部，表面上可以自由治理，这是一种狡猾的手段。这不仅可以从地理上和行政上分裂法国，还可以使法国流亡政府难以成立，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并且可以打消在波尔多的政治家们想把政府迁往北非的任何计划——这个计划几乎得到成功，结果却失败了，破坏它的不是德国人，而是法国失败主义者：贝当、魏刚、赖伐尔及其支持者。还有，希待勒明白，目前在波尔多控制法国政府的这批人是法兰西民主的敌人，可以期望这些人与他合作，帮助他在欧洲建立纳粹新秩序。

但是，在贡比臬举行停战会谈的第二天，法国代表还在继续拖延和争论。拖延的原因之一是，亨茨格坚持说，魏刚并没有给他签字的权力，而只是给他一项命令——在法国，谁也不肯负这个责任。最后，下午 6 时半，凯特尔发出了最后通牒。法国必须在 1 小时之内接受或者拒绝德国的停战条件。在这 1 小时之内，法国政府屈服了。

1940 年 6 月 22 日下午 6 时 50 分，亨茨格和凯特尔在停战协定上签了字。

*

我曾从卧车上秘密的麦克风里听到这最后一幕的情况。这位法国将军在签字以前，以颤抖的声调说，他想发表一项个人声明。在他说话的时候，我曾用法文记下他的话。

我宣布，法国政府已经命令我在这些停战条款上签字……法国由于武力所迫，不得不停止与盟国并肩作战。它认为，加在自己身上的条件是苛刻的。法国有权希望在未来的谈判中，德国能表现出容许两个相邻的大国在和平中共同生活和工作的精神。

［746］签订和约的那些谈判，永远也不会举行。但是不久，随着对法国统治的日渐残酷，随着对卑躬屈膝的贝当政府的压力日益增加，纳粹第三帝国表现的是怎样的精神已很清楚了。法国现在已经注定要成为德国的属国，贝当、魏刚、赖伐尔显然已看到这一点——并且也己接受了这一点。

当代表们从停战谈判的车厢里出来乘车离开的时候，开始下起靠靠的细雨。在森林里的一条路上，人们可以看见有成群结队的难民。他们拖着疲惫的步伐，在回家的路途上走着。还有骑着自行车的，有坐在大车上的，有几个运气好的坐在旧卡车上。我走到空场上。一群德军工兵正起劲地叫着，开始移动那辆老卧车。

“到哪里去？”我问。

“到柏林去。”他们说。*

两天以后，法国—意大利停战协定在罗马签字。墨索里尼只能占领他的部队攻克了的地方，这就是说，占领法国几百码的领土，另外在法意边境和突尼斯设置 50 英里长的非军事区。这个停战协定在 6 月 24 日下午 7 时 35 分签了字，6 小时以后，法国全境的炮声停止了。

在上一次战争中，曾经有 4 年之久坚持不败的法兰西，在这次战争爆发 6 周以后就退出了战争。德国军队驻守着欧洲的大部分地区，从北极圈内的北角到波尔多，从英吉利海峡到波兰东部的布格河。阿道夫·希特勒已经到达了顶峰，这个第一次把德国人统一在一个真正的民族国家中的前奥地利流浪汉，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下士，现在已经成了德国征服者中最伟大的人物了。阻挠他在欧洲建立德国霸权的，现在只有一个拒不屈服的英国人——那就是温斯顿·丘吉尔——和在他领导下的意志坚决的人民。他们拒不承认面临失败，他们差不多是赤手空拳地孤军作战，他们的岛国正遭到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军事力量的围攻。

希特勒玩弄和平

当德国在西线发动进攻 10 天以后,德国的坦克到达了阿布维尔的那个晚上，约德尔将军在日记里对元首怎样“欣喜若狂”作了一番描述，之后他又写道，元首“……正在草拟和约……英国在把殖民地归还德国以后，随时都可以单独媾和”。这是 5 月 20 日的事。在随后的几周之中，看来希特勒已肯定地认为，由于法国［747］ 的屈服，英国一定会急于求和。从德国的观点看来，由于英国在挪威和法国受到严重打击，他所提出的条件似乎很宽大了。他在 5 月 24 日对冯·伦斯德将军详细他说明这些条件。他表示，他对英帝国是钦佩的，并且强调指出英帝国有它存在的“必要”。他说他只希望伦敦让他在大陆有行动的自由。

他非常肯定地认为英国一定会同意这一点，甚而至于在法国战败以后，仍然没有订出继续对英国作战的计划。而骄矜自负的参谋总部向来被认为具

有普鲁士人的缜密作风，对各种可能情况都是事先有周密的筹划，但这次也没有为他提供出什么计划。在这期间，参谋总长哈尔德在他的成本成本的日记里，也没有谈到这个问题。他对于俄国在巴尔干和波罗的海的威胁，比对英国的威胁更感到不安。

可不是吗，为什么英国要在这毫无希望的劣势中单独打下去呢？特别是当它看到自己同法国、波兰以及其他一切战败国家的处境不同，可以在不受损伤、完整无缺和保持自由的情况下获得和平、摆脱战祸的时候为什么偏要打下去呢？除了唐宁街以外，到处都在提出这样的问题，据丘吉尔后来透露，唐宁街从来也没有讨论过这个问题，因为答案是可想而知的。[①]但德国独裁者并不懂得这一点，而当丘吉尔开始公开宣布英国不放弃作战的时候，希特勒显然不相信真的会如此。甚至在 6 月 4 日英国军队已从敦刻尔克撤退，首相作了关于在山上、在滩头继续作战的有名演说以后，他还是不相信；在贝当已经要求签订停战条约以后，丘吉尔在 6 月 18 日在下院重申英国“继续作战的不可动摇的决心”，并在他的另一篇动人的、令人难忘的演说中说了如下的话以后，他还是不相信：

因此，让我们振起精神，负起我们的责任来，让我们这样要求自己，如果大英帝国及英联邦能延续千年之久，人们将要这样说：“现在是他们最美好的时刻。”

自己是一个夸夸其谈的演说家的希特勒，想必认为，这只不过是一个天才演说家的打气话而已。他现在一定还从中立国家的首都的试探和从那里传出来的结束战争的要求中得到了鼓励。6 月 28 日，希特勒收到教皇发给他的一封密电——墨索里尼和丘吉尔也收到类似的电报。电报说，他愿意为“公平而体面的和平”进行调解，并宣布在着手这一步骤以前，他希望私下了解一下这个建议将会受到怎样的对待。[①]瑞典国王也积极地向伦敦和柏林双方建议举行和谈。

在美国，德国大使馆在代办汉斯·托姆森的领导下，正在把他们得到的每一块钱都花在支持孤立主义者身上，使美国能够继续不参加战争，从而使英国丧失继续作战的信心。在缴获的德国外交部文件中，有很多是托姆森报告大使馆在如何致力于操纵美［748］国舆论使其对希特勒有利的函电。那年夏天，美国政党举行代表大会，托姆森集中一切力量影响各党的外交政策纲领，特别是共和党的外交政策纲领。

例如，在 6 月 12 日，他向柏林发出了“特急、绝密”的密码电报，说有一个和德国大使馆“密切”合作的“著名的共和党国会议员”愿意邀请 50 个孤立主义议员参加共和党代表大会，“使他们能够对代表做工作，让他们赞成孤立主义者的外交政策”，他要的代价是 3000 美元。托姆森的报告说，同一个人还要求给他 30000 美元，以支付美国报纸的广告费，这些广告将刊登整版篇幅，其标题为“别让美国参加战争”！”*[②]

第二天托姆森打电报到柏林报告一项新的计划。他说，他通过一个美国文艺界的经理人，找到 5 个著名的美国作家，写几本“我希望能起到巨大效果”的书。他需要 20000 美元以进行这项计划。几天以后，里宾特洛甫就同

[①] 丘吉尔：《他们最美好的时刻》，第 177 页。

[①] 《德国外文政策文件汇编》，第 10 卷，第 49—50 页。

[②] 同上，第 9 卷，第 550—51 页。

意拨出这笔款子。”[①]

希特勒关于希望与英国进行和谈的最初的公开言论之一，是对赫斯特系报纸记者卡尔·冯·维冈的谈话。它发表于 6 月 14 日纽约的《美国人报》上。两周以后，托姆森通知德国外交部，他已把这篇访问记加印了 10 万份。他说：

我能够进一步通过一个秘密代理人劝使孤立主义众议员托克尔森[蒙塔那州的共和党员]把元首访问记载入 6 月 22 日的《国会记录》中。这就再一次保证访问记能得到最广泛的传播。[③]

华盛顿的纳粹大使馆抓住了每一根稻草。这年夏天的某一个时候，大使馆的新闻参赞转来了据他说是电台评论员富尔顿·刘易斯的一项建议。新闻参赞把他说成是“德国和元首的崇拜者，是 [749]一个很受尊敬的美国新闻记者”。

元首应该致电给罗斯福……内容大致如下：“您，罗斯福先生，曾经一再向我呼吁，并且经常表示希望避免流血的战争，我并没有对英国宣战；恰恰相反，我经常强调我并不想毁灭大英帝国。我曾一再要求丘吉尔理智一些，要求他达成一个体面的和约，但这个要求却给丘吉尔顽固地拒绝了。我意识到，如果我发出向不列颠诸岛进行全面战争的命令，英国是会遭到严重损失的。因此，我要求您与丘吉尔联系，说服他放弃他那无谓的固执。”刘易斯补充说，当然，罗斯福会作出一个无礼的、恶意的答复；不过那没有什么关系。这样一种呼吁，必然会在北美人民中，特别会在甫美造成深刻的印象……[①]

阿道夫·希特勒并没有采纳刘易斯先生的建议，但柏林的外交部却打电报来询问这位电台评论员在美国有怎样的重要地位。托姆森回答说，刘易斯“最近取得了特殊的成就……[但是]另一方面，和一些有名的时事评论员比起来，刘在政治上却并没有什么重要地位”。[①] *

丘吉尔自己，正如他后来在回忆录中所说，对于通过瑞典、[750]美国和梵蒂冈发出来的和平试探颇感为难，同时，他由于深信希特勒在试图尽力利用他们，于是采取了严厉的对策。他在得到德国代办托姆森企图在华盛顿与英国大使会谈的消息以后，发了一封电报说，“应告知洛提安勋爵绝不能给德国代办以任何答复”。[①]

瑞典国王曾劝说英国接受和平解决，因此这位坚决的首相写了一封措辞强硬的复信。

……甚至在对于这种要求或建议作任何考虑以前，德国必须用事实而不是用空话作出确实的保证。它必须保证恢复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挪威、丹麦、荷兰、比利时，特别是法国的自由和独立生活……[②]

这就是丘吉尔的主要立场。在伦敦显然没有一个人会梦想违[751] 反这个立场而签订和约，只保住英国而让那些已被希特勒征服的国家永远遭受奴役。但是柏林并不明白这一点。据我回忆，那年夏天，柏林的每一个人，尤其是威廉街和班德勒街的那些人，都深信战争几乎已经过去了。

6 月的整整下半个月和 7 月初，希特勒都在等待伦敦发来的英国政府表示认输并准备签订和约的消息。7 月 1 日他对意大利的新任大使狄诺·阿尔

[①] 同上，第 9 卷，第 558—59 页，第 585 页。

[③] 同上，第 39—40 页。

[①] 同上，第 298 页。

[①] 同上，第 424，435 页。

[①] 丘吉尔：《他们最美好的时刻》，第 259—60 页。

[②] 同上，第 261—62 页。

非里说”，他“不能想象英国还有什么人当真相信能获得胜利”[①]最高统帅部仍然没有作出任何继续对英作战的准备。

但是第二天，7 月 2 日，最高统帅部终于发出了第一道关于继续对英作战的指令。这是一道犹豫不决的命令。

元首兼最高统帅已经决定：

如果能取得空中优势并具备其他一些必要条件的话，登陆英国是可能的。开始登陆的日期还没有决定。一切准备工作须立即开始。

希特勒对于这项军事行动劲头不大，他并认为没有必要采取这一行动，这反映在指令的最后一节中。

一切准备工作都必须在这样的基础上进行，入侵仍然仅仅是一个计划，还没有作出什么决定。[②]

7 月 7 日齐亚诺在柏林会见元首。他得到的印象是，这位纳粹统帅很难下定决心。他在日记中记下了这一点。[752]

他颇倾向于继续作战，用愤怒和钢铁的风暴袭击英国，但最后决定还没有作出，也正因为如此，他推迟了他的演说，据他自己说，他要权衡演说的每一个字的分量。[①]

7 月 11 日，希特勒开始在上萨尔斯堡召集他的军事首领，听取他们对于这个问题的意见。如果进攻英国，海军就要担任负责入侵部队渡海的任务。雷德尔海军元帅这一天和元首作了一次长谈。他们之中谁也没有兴趣详谈这个问题——事实上，他们花了大部分时间讨论了关于在挪威的特隆赫姆和纳尔维克扩充海军基地的问题。

从雷德尔关于会议的秘密备忘录判断[②]，最高统帅的心情是低沉的。他问这位海军元帅是否认为他计划中的国会演说“会发生效果”。雷德尔回答说，会发生效果，特别是如果在演说之前能对英国作一次“密集”轰炸。海军元帅提醒他的上司注意，英国皇家空军正对威廉港、汉堡和基尔等德国主要的海军基地进行“破坏性的轰炸”，他认为德国空军应当立即动手对付英国。但在入侵的问题上，这个海军总司令显然很冷淡。他急切建议只能把入侵“当作迫使英国乞求和平的最后一着”试一试。

他（雷德尔）深信，只要用潜水艇作战，空军对护航队进行袭击，并在英国主要城市进行猛烈轰炸，以截断英国的进口贸易，就能够迫使英国求和……

因此，海军总司令［雷德尔）本人与在挪威战争中的态度不同，他不能赞成对英国实行入侵……

于是这位海军元帅就有关这种入侵的一切困难情况，作了一次长时间的详细说明。这必然使希待勒感到非常气馁。气馁是不在话下的，但是也许也相信他的说法。因为雷德尔报告说，“元首也认为入侵是最后一着”。

两天以后，7 月 13 日，将军们到了伯希特斯加登山上的伯格霍夫，与最高统帅进行商谈，他们发现英国人仍然使他感到难以理解。哈尔德在那天晚上的日记中写道，“元首仍然一心在想英国为什么还不走和平道路的问题”。但是，现在他第一次开始明白其中的一个原因。哈尔德这样写道：

他和我们一样看到，问题的答案在于英国仍然把希望寄托在俄国方面。因此他也认为对英国将不得不用武力迫其求和，虽然这样做是他所不愿意的。道理在于：如果我们用武力击溃英国，大英帝国就会分崩离析。但这对[753] 德国并没有什么好处。我们德国人流血牺牲得到一些胜利，但获得实

---

①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 10 卷，第 82 页。

② 由凯特尔签署的最高统帅部指令，见《海军事务元首会议记录》，1940 年，第 61—62 页。

① 《齐亚诺日记》，第 274 页。

② 《海军事务元首会议记录》，1940 年，第 62—66 页

惠的只是日本、美国及其他国家。

同一天，7 月 13 日，希特勒写信给墨索里尼，婉言谢绝意大利领袖派部队和飞机帮助入侵英国的建议。从这封信里可以明白地看出，元首终于开始打定主意了，英国人性格特别，对他们用讲道理的办法是不行的。

［他写道］我已经向英国提出许多有关协商、甚至合作的建议，但是却受到难堪的对待。因此，我现在深信再作任何理智的呼吁，都会遭到同样的拒绝。因为，现在统治那个国家的并不是理智……[1]

3 天以后，7 月 16 日，希特勒终于作出了决走。他发出了“关于准备在英国登陆作战的第十六号指令”[2]。

绝　密

元首大本营，1940 年 7 月 16 日

由于英国不顾自己军事上的绝望处境，仍然毫无愿意妥协的表示，我己决定准备在英国登陆作战，如果必要，即付诸实施。这一作战行动的目的，是消除英国本土作为对德作战的基地，并且在必要时，全部予以占领。

这个进攻的代号将是“海狮”。准备工作定在 8 月中旬完成。

“如果必要，即付诸实施。”虽然他在直觉上越来越强烈地感觉有采取行动的必要，但正如指令所表明的那样，他并没有十分肯定。7 月 19 日晚上，当阿道夫·希特勒在国会中站起来向英国提出最后一次和谈建议的时候，“如果”这两个字，仍然占着重要的地位，这是他在国会所作的最后一次重要演说，也是本书作者这几年来在国会所听到的许多演说中的最后一次。这也是他的最精彩演说之一。就在这天晚上，我写下了关于这次演说的印象。

今晚我们在国会里看见的希特勒，是一个征服者，他自己也感觉到是一个征服者；但他同时又是一个十分了不起的演员，是一个能自由操纵德国人心理的人，他把征服者的充分自信和常常使群众点头心服（当他们知道这是一个领袖人物时则更心服）的谦逊巧妙地揉合在一起，今晚他的声音低了一些，很少像平常那样大叫大嚷；他一次也没有像我从前见到的那样在这个讲坛上歇斯底里地大声叫喊。

不用说，他的长篇讲演充满了历史的伪造和对丘吉尔个人的[754]恣意攻击。但与当时光辉灿烂的场面相形之下，语调是温和的。目的是不仅想狡猾地赢得本国人民的支持，还想赢得中立国家人民的支持，同时还要给英国群众一些值得考虑的东西。

[他说]现在我从英国只听到一个呼声：战争必须进行下去！但这不是人民的声音，而是政客的声音。我不知道这些政客对于这场战争继续下去会有什么结果，是否有了一个正确的概念。他们的确宣布过，他们将继续打下去，并且说即使英国灭亡了，他们也要到加拿大继续进行战争。我不能相信他们的意思是说英国人民也将迁到加拿大去。大概是只有那些热衷于把这个战争继续打下去的绅士才迁到那里去。恐怕人民将不得不留在英国，而且……一定会用与他们在加拿大的所谓领导人不同的眼光来看待这个战争。

请相信我吧，先生们，我对于这种毁灭整个国家的无耻政客，是深感嫌恶的。这些人早已把房屋糟蹋得东倒西歪了，而命运却安排我来给予最后一击，每想到这里，我就感到十分难受……丘吉尔先生……无疑将会去加拿大，那些特别热衷子战争的人们的金钱和子女早就迭到加拿大去了。但是千百万人民将开始遭受大灾大难。丘吉尔先生这一次也许会相信我的预言：一个伟大的帝国——一个我从来也不想毁灭甚至不想伤害的伟大帝国，将遭到毁灭……

---

[1] 希特勒 1940 年 7 月 13 日致墨索里尼的信，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 10 卷，第 209—11 页。

[2] 第十六号指令全文，见《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 3 卷，第 399—403 页（纽伦堡文件 442—PS）。另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 10 卷，第 226—29 页。

对这个顽强的首相进行了这样攻击，并试图对他和英国人民的关系进行挑拨离间后，希特勒接着开始谈到这个长篇演说的中心问题。

现在，我觉得在良心上有责任再一次向英国和其他国家呼吁，应该拿出理智和常识来。我认为我是有资格作这种呼吁的，因为我不是乞求恩惠的被征服者，而是以理智的名义说话的胜利者。

我看不出有继续打下去的任何理由。*

他没有更明确他说下去。他对于和平条件没有提出什么具体（755）建议，也没有提到被征服国家中在纳粹统治下的千百万人民的命运问题，但是那天晚上，在国会里几乎没有人认为有必要在这个时候详细他说明。在会议结束的时候，我曾与许多文武官员混在一起，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有丝毫的怀疑，都认为英国一定会接受元首的建议。他们真的相信，元首的建议是十分宽大的，甚至是豪爽的。但是，他们是不会长期受骗下去的。

我直接驱车到广播大厦，把这篇演说用无线电报告到美国去。刚到广播电台，就听到伦敦英国广播公司的德语广播。还不到一小时，英国就答复希特勒了。回答是一个坚决的“不！””

从最高统帅部来的下级军官和从各部来的官员们，正围坐在屋子里，全神贯注地倾听着。他们的脸变了色，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你说这是怎么一回事？”有一个人大声问我。他好像被弄得莫名其妙了。“你能理解那些英国傻瓜吗？”他继续大声说。“现在还拒绝和平？他们发疯了！”

同一天晚上，齐亚诺”在柏林听到比我所接触到的要高级得多的人士对于发了疯的英国人的反应，他在日记里写道：“深夜，当英国人对于演讲的第一个冷冰冰的反应传来的时候，在德国人中间蔓延着一种掩盖不住的失望情绪。”据齐亚诺说，墨索里尼的反应则恰恰相反。

他……说这是“一个十分狡猾的讲演”。他担心英国人会从这里找到开始谈判的借口。这对于墨索里尼是可悲的，因为他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希望战争。[①]

正如丘吉尔后来所说，墨索里尼“其实不必担忧，不管他要想打什么仗，没有人会拒绝他的”。[②][756] 那天晚上我在日记里写道：“作为团结德国人民对英国作战的一种策略，希特勒的演说是一篇杰作。因为德国人民现在会说：‘希特勒向英国建议和平，并且不附带什么条件。他说他看不出有把这场战争进行下去的任何理由。如果战争进行下去，那是英国的过失。'”

在发出了准备入侵英国的第十六号指令的第 3 天，他发表了这个演说，主要原因难道不就在于这个吗？他在事前就向两个意大利人阿尔非里和齐亚诺私下承认了这一点。7 月 1 日他告诉大使：

……使德国和外国的公众舆论认为事件的未来发展的责任，完全在于敌人方面，这总是一种很好的策略。这样就可以增强自己的斗志，打击敌人的士气。德国正在计划中的军事行动是要作出重大牺牲的……因此，我们必须使公众舆论相信，为了避免这种惨祸，已经作了一切努力……

他在 10 月 6 日的演说中（当时他向西方建议在波兰战争结束的时候谈和。——作者），同样地为这样的思想所支配：把一切后果都推给对方负责。这样，在战争真正开始以前，他似乎就已经取得了胜利。现在他为了心理上的理由，又想鼓励士气，以迎接行将采取的行动。[①]

一周以后，7 月 8 日，希特勒对齐亚诺透露：

他要再作一次表示，以便在战争必须继续下去的时候——他认为继续下去是唯一真正成问题的

[①] 《齐亚诺日记》第 277—78 页（7 月 19 日，22 日）。

[②] 丘吉尔：《他们最美好的时刻》，第 261 页。

[①]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 10 卷，第 79—80 页。

可能性——他可以在英国人民中取得心理上的效果……也许，通过对于英国人民的巧妙的呼吁，有可能使英国政府在英国更加孤立。[2]

这并没有证明是可能的。7 月 19 日的演说，打动的是德国人民，而不是英国人民。7 月 22 日，哈利法克斯勋爵在广播中正式拒绝了希特勒的和平建议。这虽然是意料之中的事，但是使威廉街多少受到一些震动。我在那天下午，看到那里许多人都是满面怒容。政府发言人告诉我们："哈利法克斯勋爵已拒绝接受元首的和平建议。先生们，将要打仗了！"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事实上，希特勒和最高统帅部以及陆、海、空军的参谋总部都没有认真考虑过同英国的仗怎么打和怎么取得胜利的问题。现在，在 1940 年仲夏，他们对自己辉煌的成就感到不知所措；他们没有什么计划，更谈不上想利用他们这个军事化国家的空前军事胜利。这是第三帝国的最大矛盾之一。希 [757] 特勒已达到他的军事力量的顶峰。欧洲大部分的土地都在他的践踏之下。他的胜利的军队从比利牛斯山直到北极圈，从大西洋直到维斯杜拉河以东，现在在养精蓄锐，准备下一步的行动。但是也正在这个时候，他却不知道怎样继续行动，怎样使战争胜利结束。他的将领们，其中有 12 个还授与了陆军元帅的节杖，也同样不知道。

当然，这里是有原因的，不过当时我们并不清楚罢了。德国人尽管自吹有军事天才，但是缺乏雄才大略的战略思想。他们的天地只限于——而且常常如此——在欧洲大陆进攻邻国的陆上战争，希特勒自己怕海，"而他手下的重要军事将领，对海则几乎一窍不通。他们的心上只有陆地，没有海洋。虽然，德国军队只要能抓得到英国陆军，他们就能在一周之内击溃英国软弱无力的陆军，但是把他们隔开的多雏尔海峡狭窄的水面——狭到可以看清对岸——当壮丽的夏天开始消逝时，却像一个他们不知如何才能越过的障碍一样，使他们惴惴不安。

自然，在德国人面前，还有另一个选择途径。他们可以和他们的盟国意大利横渡地中海，西取地中海的门户直布罗陀，东从意大利在北非的基地直趋埃及，跨过苏伊士运河而至伊朗，截断英帝国的一个主要生命线，以此来搞垮英国。但这就需要远离本国基地，在海外广大地区进行军事行动，而在 1940 年，这对德国似乎是无法想象的。

因此，在这目眩头晕的胜利的顶峰，希特勒和他的将领们犹豫不决了。他们没有策划下一着，也没有想出走下一步的办法。事实证明，这个致命的疏忽，是这场战争而且的确是第三帝国的短促的生命和呵道夫·希特勒昙花一现的事业中的巨大转折点之一。他们在取得了许多伟大的胜利之后，现在失败开始了。但是，当然，这是难以预见的，因为当时在围困之中的英国正在孤军坚持作战，为了准备应付德军在夏末的进攻，把手头的一切可以使用的力量都用上了。

[2] 同上，第 148 页。

第二十二章　海狮计划：入侵英国的失败

[758]

德国最高统帅部作战局局长约德尔将军在 1940 年 6 月 30 日写道，“德国对英国的最后胜利，现在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敌人再也不可能进行大规模的进攻作战了”。

希特勒宠信的这个战略家感到信心十足，颇为自满，法国在一周前已经投降，丢下英国单独作战，显然已孤立无援。6 月 15 日，希特勒通知将领们，他要把陆军复员一部分——从 160 个师减到 120 个师。哈尔德在那一天的日记里写道，“这一措施所根据的假定是，陆军的任务已经完成。空军和海军将单独担负起对英作战的任务”。

事实上，陆军对于对英作战并不感兴趣。元首自己对此也并不怎样关心。6 月 17 日，约德尔的副手瓦尔特·瓦尔利蒙上校通知海军说：“关于登陆英国的问题，元首……至今还没有表示过有这种意图……因此，最高统帅部直到现在还没有完成任何准备工作。”[①]4 天以后，6 月 21 日，就在希特勒步入贡比桌停战谈判车厢使法国人受辱的时候，海军接到通知说：“陆军参谋总部对于英国问题并不感兴趣。它认为不可能实施这种行动，它不知道怎么能从南部地区采取行动……参谋总部反对这个行动。”[②]

在德国陆海空三军中，没有一个有才能的战略家知道如何进攻英国，虽然，首先是让海军对这个问题有所考虑，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早在 1939 年 11 月 15 日，当希特勒枉费心机地试图鼓励他的将军们在西线进攻的时候，雷德尔就曾指示海军作战参谋部研究一下“入侵英国的可能性，如果战争继续发展下去，某些条件具备了，这种可能性会日渐增加”。[③]德国的军事参谋部被要求对这种军事行动进行研究，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雷德尔所以采取这一步骤,看来好像主要是因为他想免得他的变幻莫测的领[759]抽会突然乱出主意。这件事情是否和希特勒商量过，或者他是否知情，没有记录可以查考。希特勒当时所想到的充其量不过是在荷、比、法取得机场和海军基地，以便加强对不列颠群岛的封锁而已。

到 1939 年 12 月，陆军和空军总司令部对入侵英国的问题，也曾作过一些研究。陆海空三军曾互相交换一些非常含混的意见，但并没有什么结果。

1940 年 1 月，海军和空军拒绝了陆军提出的一个计划，认为它不现实。海军认为，这个计划没有把英国的海军力量估计在内；空军则认为它把英国皇家空军估计过低了。空军参谋总部在给陆总的公函中说，“总之，必须放弃以在英国登陆作为目标的联合作战计划”。[④]后来，正如我们将要谈到的，戈林和他的副手们却要采取一种完全相反的观点。

在德国的文件记录里，第一次提到希特勒认为有可能进攻英国的是在 5 月 21 日，就是装甲部队在阿布维尔打到海岸的这天。雷德尔和元首“私下”

[①] 海军参谋部作战日记，1940 年 6 月 18 日。罗纳德·惠特莱著《海狮计 划》第 16 页中加以引用。作者是英国 方面负责编纂官方战争史的人之一。他不受限制地参看了缴获的德国海 陆空三军的档案和外交档案。直到写 该书时，联合保管这些文件的英国或 美国当局都还未给予任何非官方美 国作者以这样一种特权。因此，惠特 莱作为了解关于“海狮计划”的德国 机密材料的一个向导，是非常有帮 助的。

[②] 海军总司令部记录。见惠特莱著上引 书，第 26 页。

[③] 海军参谋部作战日记，1939 年 11 月 15 日。惠特莱著上引书，第 4—7 页。

[④] 惠特莱著上引书，第 7—13 页。

讨论了“将来在英国登陆的可能性”。这个情报来源是海军元帅雷德尔。[5]雷德尔的海军没有分享到陆、空军在西线获得惊人胜利的光荣，因此，他当然也要找寻使自己的海军获得光彩的门路了，但希特勒却在考虑北边的围攻战和当时正在南边形成的松姆战线。除了这两个紧急任务，他没有再让别的任务来使他的将领们伤脑筋。

但是海军军官无事可做，仍在继续研究进攻英国的问题。到 5 月 27 日，海军作战参谋部作战处处长库特·弗立克海军少将提出了一个新的计划，叫做“英国研究”。初步的准备工作，如集中船舶和建造登陆艇，都已经开始了。德国海军当时连一艘登陆艇都没有。在这一方面，经济学怪物戈特弗雷德·弗德尔博士提出一个叫做“战争鳄鱼”的计划。（此人在慕尼黑早期时代曾帮助希特勒草拟过党纲，现在在经济部担任国务秘书，他的种种奇怪主意在那里毫无用武之地。）这是一种用水泥制成的自动推进驳船，可以装载全副武装的 200 人的连队，或者装几辆坦克，或者几门大炮，登上任何海滩，掩护登陆的部队和车辆，海军司令部非常重视这个计划，甚至哈尔德也很重视。他曾在日记里提到过。6 月 22 日希特勒和雷德尔也曾详细讨论过这个计划。但结果并没有下文。

快到 6 月底的时候，那些海军将领们，对于进攻不列颠群岛的问题似乎并没有得出什么结论。6 月 21 日，希特勒在贡比臬露[760]面以后，曾和一些老友到巴黎作过一次短暂的游览，同时也参观了战场——是第一次大战的，而不是这次大战的战场。他曾在这里当过传令兵。同他一起去的是他当时那厉害的班长马克斯·阿曼（现在已成了拥有百万财富的纳粹出版商）。他对战争的未来发展，特别是怎样继续对英作战，似乎并不怎么关心，也许只是因为他认为这件小事已经解决，因为现在是英国恢复“理智”而求和的时候了。

希特勒直到6月29日才回到他在坦能堡新建立的大本营去,它坐落在“黑色森林”中的弗洛伊登斯塔特西面。第二天，他又回到现实中来，阅读了约德尔所写的关于下一步怎么办的报告，反复思考着问题。这个报告的题目是《继续对英作战》。[6]虽然约德尔对希特勒的天才的盲信，在最高统帅部中仅次于以特尔；但在他一人独自思考问题的时候，他往往是一个精明的战略家，但是他现在却和最高统帅部中的一般看法一样，认为战争已经赢定了，差不多要结束了。如果英国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那必须要再用一点武力来提醒它。为了“围困”英国，他在报告中建议采取 3 个步骤：加强德国空军和海军对英国船舶、仓库、工厂和皇家空军的打击；“在居民集中的地方，进行恐怖轰炸”；“部队登陆，以占领英国为目的”。

约德尔认为，“对英国空军的作战应当占最优先的地位”。但是他认为，就整个来说，进攻英国空军也如其他方面的进攻一样，进行起来不会有什么困难。

食品供应标准的不断降低，加上宣传影响和宣布作为报复手段的定期恐怖轰炸，将麻痹并最后瓦解人民的抗战意志，从而强迫他们的政府投降。

---

[5] 《海军事务元首会议记录》，第 51 页 （1940 年 5 月 21 日）；海军参谋部作 战日记，同一日期，惠特莱著上引书， 第 15 页。

[6] 全文，见《主要战犯的审讯》，第 28 卷，第 301—3页（纽伦堡文件 1776—PS）。下太好的英文译文载《纳粹的阴 谋与侵略》，附件 A，第 404—6页。

至于登陆，只能

在德国获得制空权以后才可考虑。因此，登陆决不能以军事征服英国为目的，这一个任务可以交给空军和海军。登陆的目的，毋宁说是对经济上已经陷于瘫痪再也没有能力进行空战的英国进行致命的打击（Todesstoss），如果认为这是必需的话。*

但是，约德尔也认为，所有这些或许都是不必要的。

[761]因为英国打下去再也不是为了取得胜利，而只不过是为了保持自己的属地和世界威望。因此，根据各种情况判断，它在看到现在还可以用相对较小的代价就能够保持它们的时候，它一定会同意和平解决。

这也是希特勒的想法，他于是立即准备在国会作和平演说。与此同时，正如前面所说，他也命令（7 月 2 日）制定一些登陆的初步计划，到 7 月 16 日，当伦敦没有作出什么“理智”的答复时，他就发出关于“海狮计划”的十六号指令。经过了 6 个多星期的迟疑以后，他终于决定“如有必要”就进攻英国。希特勒和他的将领们终于开始明白（但时间已晚），这一场大战不是没有危险的，要取得胜利，全靠空军和海军能否胜过远占优势的英国海军和不可轻视的敌人空军而为陆军开道。

“海狮”是一个认真的计划吗？当初是认真地要求贯彻执行吗？

直到今天还有许多人作这样的怀疑。而他们的这种意见，也由于德国将领在战后的齐声否认而显得有力起来。当时指挥这次入侵的伦斯德，在 1945 年对盟国的提审人员说：

入侵英国的计划完全是胡来，因为没有足够的船只……我们把整个事情看作是开玩笑，因为我们的海军没有力量掩护渡海或运输增援部队，入侵显然是不可能的，如果海军失败了，空军也没有能力担当起这些任务……我总是十分怀疑这整个事情……我觉得元首从来没有真的要打算入侵英国。他根本没有过足够的勇气……他肯定希望英国会求和……[7]

伦斯德的作战处长勃鲁门特里特在战后也曾向利德尔·哈特表示过同样的看法。他说，“我们彼此谈论到它[“海狮”]的时候，把它当作是一种虚张声势”。[8]

这年 8 月中旬，我自己曾在英吉利海峡度过了几天，从安特卫普到布伦，来来去去寻找入侵部队。8 月 15 日，在加莱和格里斯一尼兹角，我们看见几群德国轰炸机和战斗机通过海峡上空，向英国飞去，后来才知道它们是进行第一次大规模空袭。虽然空军显然是在全力出动，但后方缺乏船只，尤其在港口、运河和内河都缺乏驳船。这就给我一个印象：德国的确是在虚张声势。就我所知，他们根本没有运送军队渡过海峡的工具。

但是一个采访记者在一场战争中，是看不到多少东西的。现在我们知道德国人到 9 月 1 日才开始把准备入侵的舰队集中起来。至于将领们，任何一个读过他们的口供或在纽伦堡审判中听[762]过他们受盘诘的人,都知道对他们战后的证词是要打折扣来听的。人的记忆力到底是很靠不住的，德国将领们也不例外。同时，他们还有许多其他的打算。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把希特勒的军事领导才能说得一钱不值。的确，他们在回忆录中，在口供中和证词中不厌其烦地加以说明的主要论调不外是：如果让他们来作决定，希特勒就不可能把第三帝国弄到一败涂地。

对于他们说来是不幸的，但对于后代和真理却很幸运的是：大批德国的

---

[7] 英国陆军部情报评论，1945 年 11 月。许尔曼引用过，见所著上引书，第 49—50 页。

[8] 利德尔·哈特，《德国将领谈话录》，第 129 页。

军事秘密档案使我们清楚看到,希特勒在 1940 年初秋的侵英计划是非常认真地制定出来的，而且，尽管多次犹豫不决，但只要有一点成功的机会，这位独裁者就要认真地付诸实施。这个计划的最后命运，不是决定于缺乏决心或努力，而是决定于战争的运气，这种运气现在第一次对他不利了。

7 月 17 日，即发布准备入侵的第十六号指令的后一天，也是元首在国会发表“ 和平 ”演说前两天，陆军总司令部就部署了执行“ 海狮计划 ”的部队，并且命令 13 个精锐师开到海峡沿岸的出击地点，以便作为头一批登陆部队，同一天，陆军总司令部完成了在英国南部海岸广阔的前线登陆的详细计划。

正如法国战役一样，执行主要进攻任务的是 A 集团军司令冯 · 伦斯德陆军元帅。恩斯特 · 布许将军的第十六军团的 6 个步兵师从加莱海峡乘船进攻腊姆斯盖特和贝克斯希耳之间的海滩。阿道夫 · 施特劳斯将军的第九军团的 4 个师从勒 · 阿佛尔地区横渡海峡，在布赖顿和威地岛之间登陆。再往西一点的地方，有莱希瑞陆军元帅的第六军团的 3 个师（属冯 · 包克陆军元帅的 B 集团军）从瑟堡半岛出发，将在韦默思和来姆—里季斯之间的来姆湾上岸。总共 9 万人组成了第一批登陆部队；陆军总司令部计划到第三天总共登陆 26 万人。空运部队将在来姆湾和其他地区着陆，以作增援。一支不少于 6 个装甲师的装甲部队，由 3 个摩托化师支援，将作为第二批。计划在几天之内，将总共登陆 39 个师和 2 个空运师。

他们的任务如下：在取得桥头堡以后，东南方的 A 集团军的[763]各师部队将推进至第一目标，即在格腊夫森和南安普敦之间的一线。莱希瑞的第六军团将北进至布里斯托尔，切断德文和康沃耳。第二个目标是东海岸泰晤士河口之北的马尔顿与塞坟河之间的一线，以封锁威尔士。大约在德国人达到他们第一个目标的时候，预计将会“ 与强大的英军发生大战 ”。但大战必然会马上取胜，伦敦将被包围，这时德军就继续向北推进。[⑨]勃劳希契在 7 月 17 日对雷德尔说，整个战役将子一个月内结束，并且是比较容易的事。*[⑩]

但雷德尔和海军总司令部对此是有怀疑的。在这样一条广阔的战线上进行这样大规模的战斗——从腊姆斯盖特至来姆湾延伸了 200 多英里——是完全超出德国海军的运输和掩护能力的。两天以后，雷德尔向最高统帅部报告了这一点。7 月 21 日，当希特勒召集他、勃劳希契和汉斯 · 耶舒恩纳克将军（空军参谋总长）在柏林开会的时候，他再次提出这一点。元首对于“ 英国当时的情况 ”还是不清楚的。他承认海军的困难，但强调尽快结束战争的重要意义。他说，入侵英国须用 40 个师，并且“ 主要战役 ”一定要在 9 月 15 日以前结束。从总的来看，这位统帅是乐观的，尽管丘吉尔在这个时候拒绝响应他的和平呼吁。

（哈尔德记录希特勒的话说）英国的处境是没有希望的。我们已经赢得了这场战争。把成功的前景扭转过来是不可能盼。[①]

可是，在强大得多的英国海军和还很活跃的敌人空军面前，要把一支大军送过白浪滔天的海峡，海军面对着这样吓人的任务并没有多大把握。7 月 29 日，海军作战参谋部起草了一份备忘录，主[764]张“ 不要在今年进行作

[⑨] 摘自惠特莱引用的陆军总司令部文 件，见所著上引书，第 40，152—55， 158 页。在后来的六个星期中，这个 计划曾不断改变。

[⑩] 雷德尔一勃劳希契会谈，见海军参谋部作战日记，7 月 17 日，惠特莱著上引书，第 40 页注。

[①] 哈尔德日记，7 月 22 日；《海军事务元首会议记录》，第 71—73 页（7 月 21 日）。

战”，并且建议：“至 1941 年 5 月或者更晚一些时候再作考虑。”[2]

但是，希特勒却坚持要在 1940 年 7 月 31 日考虑这个问题。那一天他再度召集了他的军事首脑，这一次开会地点在他的上萨尔斯堡别墅。出席会议的除了雷德尔以外，还有代表最高统帅部的凯特尔和约德尔，以及代表陆军总司令部的勃劳希契和哈尔德，现在当上了海军元帅的雷德尔，说话最多。他并不是很抱希望的。

他说，9 月 15 日将是开始执行“海狮计划”的最早日期，并且说，只有届时没有“由于天气或者敌人的原因而出现不测的情况”，才开始执行，当希特勒问到天气问题的时候，雷德尔就这个问题发表了长篇大论的讲话，说得越来越雄辩有力，而且说得相当可怕，他解释说，海峡和北海的天气，除了 10 月上半月以外，“一般都是恶劣的”。10 月中开始有薄雾，到月底就有浓雾了。但这只是天气问题的一部分。他说，“只有海上风平浪静，才能够执行作战计划”。如果波涛汹涌，驳船就会沉没，甚至大船也将无能为力，因为它们不能卸下补给品。这位海军元帅在考虑到前途时，愈来愈悲观。

> [他继续说]即使第一批部队在天气有利的条件下渡海成功，还是不能保证第二批第三批部队，也能够有同样有利的天气……事实上，我们必须认识到，在一些港口可供利用之前，有好几天是不能运送比较大量的物资的。

这种情况就会使得陆军陷入困境：他们会被搁在海滩上，没有给养，也没有援军。雷德尔现在谈到了海军和陆军之间的主要分歧。陆军需要一条从多维尔海峡到来姆湾的广阔的战线。但预料英国海空军必将进行强大反击，在这种情况下进行这样规模的作战，海军根本提供不出所需的船只。因此，雷德尔强烈地主张缩短战线——只能从多维尔海峡到伊斯特伯恩。这位海军元帅有力的结论是留在最后说的。

“从一切情况考虑，”他说，“最有利的作战时间将是 1941 年 5 月。”

但希特勒不愿等待那么久。他承认，对于天气，他们“自然”没有什么办法可想。但他们也不能不考虑坐失时机的后果。德国海军到来年春天也仍然不会是英国海军的对手。而英国陆军在目前这个时候却是微不足道的。如果给英国陆军 8 个月到 10 个月的时间，它就将有 30 至 35 个师的兵力，摆在预定入侵的有限地区，就成了可观的力量了。因此，他作出如下的决定（根据雷德尔和哈尔德两人所作的秘密记录）：[1]

> 应该考虑在非洲进行牵制战。但是只有对英国进攻才能获得决定性的结[765]果。因此必须设法为 1940 年 9 月 15 日开始的作战行动进行准备工作……至于这次作战行动是在 9 月进行，还是推迟到 1941 年 5 月进行，将在空军对英国南部进行一个星期的密集轰炸之后作出决定。如果空袭的效果很好，敌人的空军、港口和海军等等遭受重创，那么“海狮计划”将在 1940 年进行。否则将推迟到 1941 年 5 月。

现在一切取决于德国空军了。

因此，希特勒在第二天，即 8 月 1 日，从最高统帅部发出了两个指令，一个由他本人签字，另一个由凯特尔签字。

元首大本营
1940 年 8 月 1 日

---

[2] 海军参谋部作战日记，7 月 30 日，和备忘录，7 月 29 日。惠特莱著上引书，第 45—46 页。

[1] 《海军事务元首会议记录》，1940 年 8 月 1 日。这是雷德尔关于会议的秘密报告。哈尔德在 7 月 31 日的一篇长篇日记中提供了他自己的报告。

绝　密

关于对英进行海空作战的第 17 号指令

为了为最后征服英国创造必要的条件，我打算对英国本上继续进行比过去更加猛烈的海空战争。

为此目的，我发布如下命令：

1.德国空军应尽快以其所有的力量打败英国空军……

2.在获得暂时的或局部的空中优势之后，应对港口，特别是对与粮食供应有关的设施进行空袭……对英国南部沿海港口的袭击应在尽可能小的规模上进行，以利于我们所计划的作战行动……

4.空军主力应整装待命，准备参加“海狮计划”。

5.关于以恐怖空袭作为报复手段，由我作最后决定。

6.可以于 8 月 6 日或在这个日子以后开始加强进行空战……海军己受权在同时开始加强进行计划中的海战。

阿道夫·希特勒[①]

同日由凯特尔代表希特勒签署的指令的部分内容如下：

绝　密

海狮计划

海军总司令于 7 月 31 日报告，为“海狮”进行的必要准备工作不能在 9 月 15 日以前完成，因此元首命令：

陆军和空军应继续进行“海狮计划”的准备工作，并在 9 月 15 日以前[766]完成。

计划在 8 月 5 日前后开始对英国进行空中攻势，在发动这次攻势之后 8 天到 14 天内，元首将决定是否在今年发动入侵；他的决定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空中攻势的结果……

尽管海军警告说它只能保证防卫一条狭长的海岸地带（最西到伊斯特伯恩），但仍应按原定计划为在广阔基础上进行的攻击继续进行准备工作……[①]

上面最后一段话，只能加剧陆军和海军之间在进攻战线应长应短的问题上的争吵。两星期以前，海军作战参谋部曾估计，为了满足陆军在第一次进攻中运送带着装备和给养的10万人在从腊姆斯盖特到来姆湾的一条200英里长的战线上登陆的要求，需要征集 1722 艘驳船、1161 艘汽艇、471 艘拖轮和155 艘运输船。雷德尔于 7 月 25 日对希特勒说，即使聚集这样大量的船只是可能的，也将破坏德国的经济，因为调走那么多的驳船和拖船，将摧毁国家经济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所依赖的整个内河运输。[②]雷德尔表明，要保护为这样长的战线运送给养的一支船队，使其不受英国海军和空军肯定会进行的攻击，无论如何是德国海军能力所不及的。海军作战参谋部一度还警告陆军，如果陆军坚持很长的战线，海军可能丧失全部船只。

但是陆军仍然坚持它的主张。由于过高估计英国的力量，陆军认为在一条短短的战线上登陆，将使进攻部队遭到“占优势的”英国陆军的攻击。8 月 7 日，当哈尔德碰到海军作战参谋长施尼温海军上将时，这两个军种之间摊牌了，发生了一场尖锐的激烈的冲突。

陆军参谋总长通常是很平心静气的，这时他发火说：“我完全不同意海军的建议，从陆军观点看来，我认为这简直是自杀。我还不如把登上陆的军

[①]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 10 卷，第 390—91 页。另见（纽伦堡文件 443—PS），这个文件在《纳粹的阴谋与侵略》或《主要战犯的审讯》中都没有刊载。

[①] 《海军事务元首会议记录》，第 81—82 页（1940 年 8 月 1 日）。

[②] 同上，第 73—75 页。

队直接放进绞肉机里去！”

根据海军作战参谋部的会议记录”，施尼温回答说，“鉴于英国海军的优势”，如果像陆军所希望的那样，试图为那样长的战线运送军队，也将“同样是自杀”。

这是一个极为严重的左右两难局面。如果试图用大量军队来[767]部署一条很长的战线，那么德国的全部远征军可能被英国海军击沉于海底。如果用较少的军队开辟一条短短的战线，那么入侵部队又可能被英国陆军赶到海里。8 月 10 日，陆军总司令勃劳希契通知最高统帅部说，他“不能同意”在福克斯顿和伊斯特伯恩之间进行登陆。但是他仍然表示愿意，虽然‘很勉强”，放弃在来姆湾登陆，以便缩短战线，迁就海军的意见。

固执己见的海军将领们并不以此为满足，他们的谨慎和坚决的态度开始对最高统帅部发生了影响，8 月 13 日，约德尔草拟了一份“估价”形势的文件，规定了“海狮计划”取得成功所需要的 5 个条件。陆军和海军将领们对这些条件看来一定会感到荒唐可笑的，如果他们的左右为难境地不是那样严重的话。他说，第在哈尔德那天晚上的日记里，他并没有像上面那样记载自己的活。但是他说，“谈话只不过肯定了一个无可弥补的分歧”。他说，海军“害怕英国远洋舰队，并且坚持认为德国空军不可能对付这种危险”。显然，这时德国海军——如果不是陆军的话——对戈林的空军的打击力量不抱什么幻想。一，应从南海岸把英国海军消灭；第二，应当从英国上空把皇家空军消灭。其他条件规定要以大量军队迅速登陆，而其规模和速度显然不是海军力量所能做到的。如果这些条件不能实现，他认为登陆“就是一个只有在万不得已的局势下才应采取的万不得已的行动，但是我们目前没有理由采取这种行动”。[1]

如果说海军的担心正扩大到约德尔，那么最高统帅部这位作战局局长的犹豫不决也在影响希特勒。在整个战争期间，元首对约德尔要比对没有骨气、头脑迟钝的最高统帅部长官凯特尔更加倚仗得多。因此这就难怪，当雷德尔 8 月 13 日在柏林会见最高统帅并要求就战线长短作出决定时，希特勒便倾向于同意海军所主张的较小规模的行动，他答应在第二天会见陆军总司令以后作出明确的决定。[2]希特勒于 14 日听取了勃劳希契的意见之后，终于作出了决定。

16 日，由凯特尔签署的最高统帅部的一项指令说，元首已决定放弃原定由莱希瑙的第六军团执行的在来姆湾登陆的计划。关于 9 月 15 日在比较短的战线上登陆的准备工作仍要继续进行，但是现在元首自己的怀疑第一次在秘密指令里出现了。这项指令又说，“在局势明朗以前将不发出最后命令”。然而新命令多少是一种妥协。因为那一天发出的另一项指令就扩大了这个较长的战线。

> 横渡海峡主要在较短的战线上进行。但同时要用 4000—5000 军队乘汽艇在布歉顿登陆，并且空运同样数目的伞兵在迪耳—腊姆斯盖特着陆。此外，在登陆前一日，空军将对伦敦进行猛烈轰炸，这将使居民逃离这个城市，从而堵塞道路。[3]

尽管哈尔德 8 月 23 日雨速记在日记里草草写道，“在这个基础上，今年

---

[1] 引自约德尔和最高统帅部文件。惠特莱著上引书，第 68 页。

[2] 《海军事务元首会议记录》，第 82—83 页（8 月 13 日）。

[3] 两项指令，同上，第 81—82 页（8 月 16 日）。

进行攻击没有成功希望”，但是 8 月 27 日由凯特尔签[768]字的一项指令，仍然为在福克斯顿和塞耳西—比耳角（在朴茨茅斯东面不远）之间的南部海岸的 4 个主要地区进行登陆制定了最后的计划，而且和以前一样，第一个目标是，一俟摊头阵地联成一片、组织起来，军队能够向北进攻之后，便立即推进到从朴茨茅斯到伦敦以东泰晤士河上的格腊夫森一线。同时还下令准备好进行若干迷惑性的调动，其中主要的是“秋季旅行”（Herbstreise）。这要求对英国东海岸进行大规模的佯攻，前面已说过，丘吉尔和他的军事顾问们仍在预料主要的入侵将在东海岸。为此目的，在登陆前两天，将从挪威南部一些港口和赫耳果兰湾驶出包括德国最大邮船欧罗巴号和不来梅号在内的 4 艘大邮船和 10 艘运输舰，由 4 艘巡洋舰护航，开往阿贝丁和纽卡斯尔之间的英国海岸。运输舰只都是空船，天黑以后便全部返航，第二天再进行同样的调动。[①]

8 月 30 日，勃劳希契发出一份关于登陆的详尽指示，但是收到这项指示的将领们必然怀疑，他们的这位陆军首脑现在对登陆这件事究竟有多大的热忱。他把这项指示叫做《关于海狮计划准备工作的指示》——他前已下令这个计划必须在 9 月 15 日以前执行，如今才发出准确的命令未免太晚了。他还说，“执行这一计划的命令取决于政治局势”——这个条件必然使不懂政治的将领们感到大惑不解。[②]

9 月 1 日，船只开始从德国北海一些港口向英吉利海峡上一些出航港口移动。两天后，9 月 3 日，最高统帅部又发出一项指令。

> 进攻的舰队启航的最早日期已定为 9 月 20 日，登陆的最早日期已定为 9 月 21 日。
>
> 发动攻击的命令将在登陆前 10 天下达，因此大概在 9 月 11 日。
>
> 最后的命令至迟将在登陆前 3 天的中午下达。
>
> 一切准备工作在预定开始行动前 24 小时仍然有取消的可能。
>
> 凯特尔[①]

这个指令听起来好像挺认真，但是听觉是靠不住的。9 月 6 日，雷德尔和希特勒又举行了一次长时间的会议。这位海军元帅当晚在海军作战参谋部的日记上写道，“元首关于在英国登陆的决定仍然没有确定，因为他坚信，甚至不‘登陆，也能把英国打败”，实际上，雷德尔关于这次会谈的长篇记录表明,元首在长时间的谈话中几乎谈到了所有的问题,就是没有谈‘海狮”。他谈到挪威、直布罗陀、苏伊士、“美国问题”、法国一些殖民地的处理[769]以及关于建立“北德意志联邦”的异想天开的想法。关于这次值得注意的会议，如果丘吉尔和他的军事首脑们听到了一点点风声，那末也许就不会在第二天（9 月 7 日）晚上在英国发出“克伦威尔”这个代号。这个代号表示“入侵在即”，它引起了莫大混乱；它使英国国民警卫队不断敲着教堂的钟，使皇家工兵炸毁了好几座桥梁，并使一些人由于误触匆忙埋设的地雷而遭到不必要的伤亡。

但是在 9 月 7 日星期六傍晚，德国人用 648 架战斗机掩护着 625 架轰炸

[①] 同上，第 85—86 页。惠特莱著上引书，第 161—62 页，提供了引自德国军事记录的关于 8 月旅程的细节。

[②] 引自陆军总司令部档案中的勃劳希契的指示全文。惠特莱著上引书，第 174—82 页。

[①] 《海军事务元首会议记录》，1940 年，第 88 页。

[②] 同上，第 91—97 页。

机，开始对伦敦进行首次大规模轰炸。这是到那时为止对一个城市进行的最猛烈的空袭——对比之下，华沙和鹿特丹遭到的轰炸就像小巫见大巫一样——那天黄昏，这个大城市的整个码头地区成了一片火海，在它南面对防御入侵十分重要的每条铁路都堵塞了。在那种情况下，伦敦有许多人认为这种猛烈的轰炸是德国即将登陆的前奏，主要就是由于这一点，才发出了“入侵在即”的警报。但下文即将表明，9 月 7 日对伦敦进行的野蛮轰炸，尽管促使警报过早发出并造成很大损害，但是它也标志着当时正在迅速接近最高潮的不列颠战役——这个地球上从未经历过的第一次空中大决战——已达到一个决定性转折点。

希特勒必须作出他是否发动入侵这个重大决定的时刻也接近了。按照 9 月 3 日指令的规定，这一决定应于 9 月 11 日作出，给武装部队 10 天的时间来进行准备工作。但是到了 10 日，希特勒又决定把他的决定推迟到 14 日作出。推迟的原因看来至少有两个。一个原因是，最高统帅部认为轰炸伦敦对英国人的财产和斗志造成了很大的破坏，入侵可能不再需要了。

另一个原因是德国海军在聚集它的船只方面开始感到困难。[770]此外，据海军当局在 9 月 10 日报告，天气“非常不正常和不稳定”，而戈林保证要摧毁的皇家空军以及英国海军都在加紧扰乱准备入侵的舰队的集中工作。同一天，海军作战参谋部对英国空军和海军攻击调动干的德国运输舰只的“危险”发出警报，它还说，英国人的攻击“无疑已经获得成功”，两天后，在 9 月 12 日，海军西部舰队司令部向柏林拍发了一个不祥的电报：

由于敌人空军造成的阻碍，长距离大饱和轻型海军舰艇第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由于有遭到英国轰炸和炮击的危险，在奥斯但德、敦刻尔克、加莱和布伦的港口都不能供船只在夜间停泊之用。英国海军舰只现在能够几乎不受阻挠地在海峡活动，由于这些困难，预料集结入侵舰队的工作将再度延迟。

第二天情况变得更坏。英国海军轻型舰艇轰击了海峡内供发动入侵用的主要港口奥斯坦德、加莱、布伦和瑟堡，英国皇家空军还在奥斯但德港炸沉了 8 艘驳船。这一天，希特勒在柏林和他的军事首脑们举行午餐会议。他认为空战进行得很好，并说他无意冒险发动入侵。[①]事实上，约德尔从元首讲话中获得的印象是：他已“显然决定完全放弃‘海狮’”，这个印象在那天来说是正确的，因为希特勒在第二天证实了这一点，可是就在那一天，他又改变了主意。

9 月 14 日，元首和他的总司令们在柏林会谈时，雷德尔和哈尔德二人都记下了关于会议情况的秘密记录。[②]会议开始以前，那位海军元帅设法递给希特勒一个备忘录，陈述海军的意见认为

目前空中形势并没有为执行（“海狮”]计划提供条件，因为风险仍然太大。

在会议开始的时候，这个纳粹统帅表现出一种消极情绪，他的思想充满矛盾，无所适从。他既不愿下令发动人侵，又不愿取消入侵，因为据雷德尔在海军作战日志上所记的，“他显然计划在 9 月 13 日下令”。

他最后这次改变主意是什么原因呢？哈尔德比较详细地记录了这些原因。

[元首认为]成功登陆之后就接着再加以占领，将可在短时间年结束战[771]争。英国将遭受饥

[①] 同日的哈尔德日记；阿斯曼：《决定德国命运的年代》，第 189—90 页；最高 统帅部作战日记，惠特莱著上引书中加以援引，第 82 页。

[②] 雷德尔的报告，《海军事务元首会议记录》，1940 年，第 98—101 页。哈尔德日记，9 月 14 日。

荒。登陆并不一定要在特定时间内进行……但是进行长时间的战争是不可取的。我们已经完成了我们所需要的一切。

希特勒说，英国对俄国和美国的希望没有实现。俄国不准备为英国流血。美国的重整军备工作要到 1945 年才能充分发生效果。至于目前，“ 最快的解决办法是在英国登陆。海军已经完成了必要的条件。空军的行动是最值得赞扬的。四五天的好天气将取得决定性的结果……我们使英国屈服的可能性很大 ”。

那么问题在哪里呢？为什么还要迟疑而不发动入侵呢？

希特勒承认，困难在于：

敌人不断得到恢复……敌人的战斗机还没有完全被消灭。我们自己关于成功的报告并不能使人得到一种完全可靠的情况，虽然敌人已遭受重创。

接着，希特勒说，总的说来，“ 尽管我们取得这一切成就，但是进行‘ 海狮计划，的必要条件还没有实现 ”。（着重体是哈尔德用的）

希特勒把他的考虑总结为：

1.登陆成功就意味着胜利，但是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取得空中的完全优势。

2.恶劣的天气至今使我们未能获得空中的完全优势。

3.所有其他的因素都是良好的。

因此决定：还不放弃这个计划。

在作出这种消极的结论以后，希特勒于是就对空军抱起奢望幻想来，以为它仍然可能取得可望而不可及的胜利，他说：“ 空袭到目前为止产生了巨大的效果，虽然这种效果主要或许是在心理方面。即使空中的胜利只保持 10 天或 12 天以内，英国也可能会处于大规模歇斯底里状态。 ”

为了使这个希望得以实现，空军的那舒恩纳克请求准许轰炸伦敦的住宅区，他说，由于这些区域没有受到轰炸，伦敦没有“ 大规模恐怖情绪 ” 的迹象。雷德尔海军元帅积极地支持进行一些恐怖轰炸。但是希特勒认为集中轰炸军事目标更为重要。他说，“ 为了造成大规模的恐怖情绪而进行的轰炸必须留在最后进行 ”。

雷德尔之所以热衷于恐怖轰炸，看来主要是由于他对登陆不热心。他现在再次发言，强调登陆具有“ 巨大危险 ”。他指出，在 9 月 24 日到 27 日计划登陆的日期以前，空中的形势很难有所改[772]善 ;因此必须放弃登陆,“ 直到 10 月 8 日或 24 日为止 ”。

但是这实际上是根本取消入侵，希特勒是知道这一点的，因此他决定把他关于登陆的决定仅推迟到 9 月 17 日——即 3 天以后——作出,以便仍有可能在 9 月 2 宁日进行登陆。如果到那时仍然不行，他将考虑 10 月的日子。于是最高统帅部发布了一项指令。

1940 年 9 月 14 日，柏林

绝　密

……元首已决定：

“ 海狮计划 ” 再次延期开始。9 月 17 日以后将发出新命令。一切准备工作应继续进行。

对伦敦的空袭应继续进行，空袭的目标将扩大到军事和其他重要设备（例如火车站）。

对纯粹住宅区的恐怖空袭，保留作为施加压力的最后手段。[1]

希特勒虽然这样把入侵的决定推迟了 3 天，但是并没有放弃入侵。这样

---

[1] 《海军事务元首会议记录》，1940 年， 第 100—1页。

给德国空军多几天时间来消灭皇家空军和瓦解伦敦的士气，接着便可进行登陆，这将带来最后的胜利。因此，一切仍旧取决于戈林所吹嘘的空军。事实上，空军将在第二天作出它最大的努力。

然而海军对空军的看法愈来愈坏了。在柏林召开决定性会议的那天晚上，德国海军作战参谋部报告，英国皇家空军猛烈地轰炸了各个准备发动入侵的港口，从安特卫普到布伦。

……在安特卫普……运输船只遭到很大的损失，在港年的 5 艘运输轮遭受重创；1 艘驳船沉没，2 架起重机被破坏，一列军人火车被炸毁，几处仓库着火。

第二天晚上，情况更糟。海军报告，“ 敌人强大的空军袭击从勒阿佛尔到安特卫普的整个沿海地区 ”。海军发出了紧急求救信号，要求派更多的高射炮来保护准备发动人侵的港口。海军作战参谋部 9 月 17 日报告：

英国皇家空军仍然丝毫未被击败，相反地，他们加强了攻击海峡各港口和扰乱军事集结的活动。”[①]

那天晚上是满月，进行夜袭的英国轰炸机充分地利用了这月[773]明之夜。德国海军作战参谋部报告船只遭到“ 很大损失 ”，因为这些船只当时拥塞在准备入侵的港口里。在敦刻尔克，有 84 艘驳船被击沉或受到损害；又据海军报告，从瑟堡到登一赫耳德，传来令人沮丧的消息：1 个 500 吨的军人库被炸毁， 1 所军粮仓库被焚毁，各种轮船和鱼雷艇被炸沉，人员也遭到不少的伤亡。海军作战参谋部报告，由于这种猛烈的轰炸，再加上海峡那边的大炮的轰击，有必要疏散已经集中在海峡的军舰和运输船只以及停止进一步把船只调到准备入侵的港口。

[海军作战参谋部说]否则，在敌人采取有力行动时，我们将遭到重大的伤亡，从而使按原定规模执行登陆，在任何情况下都很成问题，[②]

事实上事情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了。

在德国海军作战日志里，9 月 17 日简明地记着这样一段：

敌人的空军仍然一点也没有被打败。它的活动反而增加了。从天气的总的情况看来，我们不能指望会有一个平静的时期……因此元首决定无限期地推迟“ 海狮 ”。（着重体是海军用的）[①]

阿道夫 · 希特勒在经过那么多年的辉煌成功以后，终于遇到了失败。在这以后的近一个月时间中，他一直佯称仍有可能在秋天进行入侵，但这不过是为自己壮胆而已。9 月 19 日，元首正式下令停止继续集结入侵的舰只，并疏散已在港内的船只，“ 以使船只遭受敌人空袭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 ”。

但是，甚至要维持一个分散的舰队，要维持为了现在已无限期延迟的入侵而集结起来准备横渡海峡的所有军队、大炮、坦克和给养，都已不可能了。哈尔德在 9 月 28 日的日记中惊呼：“ 把[774]‘ 海狮 ’继续拖下去，这种情况是令人难以忍受的。 ”10 月 4 日，齐亚诺和墨索里尼在勃伦纳隘口同元首会晤时，这位意大利外交大臣在日记里写道，“ 这次没有再谈到在不列颠群岛登陆的问题 ”。希特勒遭受这种挫折，使他的伙伴墨索里尼产生了好久以来没有过的那种愉快心情。齐亚诺还记道：“ 我很少见到领袖像今天在勃伦纳隘口这样高兴…… ”[②]

[①] 海军参谋部作战日记，9 月 17 日。惠特莱著上引书，第 88 页。

[②] 同上书，9 月 18 日，惠特莱援引。

[①] 《海军事务元首会议记录》，1940 年，第 101 页。

[②] 《齐亚诺日记》，第 298 页。

海军和陆军已经在促使元首决定完全放弃“海狮”。陆军参谋总部向他指出，把军队留在海峡“遭受英国空军不断的袭击会造成连续的伤亡”。

终于在 10 月 12 日，纳粹统帅正式承认失败，取消入侵，到来年春天再说。他发了一个正式指令。

元首大本营

1940 年 10 月 12 日

绝 密

元首已经决定，从现在起直到明年春天，“海狮”准备工作应继续下去，这只是为了保持对英国的政治和军事压力。

如果 1941 年春天或初夏重新考虑入侵，重新进行作战准备的命令以后将会发布……

陆军奉命调出它用于“海狮”的部队，“以便担任其他任务或者部署到其他战线上”。海军则奉命“采取一切措施调出人员和舰只”。但这两个军种不得暴露它们的调动情况。希特勒规定，“必须让英国人继续认为我们正在准备在很长的战线上发动进攻”。[①]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使阿道夫·希特勒终于后退了呢？

有两件事：在空中进行的不列颠战役的不利发展以及他的念头再次转向东方，转向俄国。

不列颠战役

戈林对英国大规模空中攻势——“鹰计划”——是在 8 月 15 日发动的，其目的在于把英国空军逐出空中，从而完成发动入侵的一个必要条件，现在已经成为帝国元帅的肥胖的戈林，对胜利毫不怀疑。在 7 月中旬，他深信倾全力进攻，能够在 4 天内摧毁英国战斗机在英国南部的防御，从而为入侵开辟道路。戈林对陆军总司令部说，要完全摧毁英国皇家空军则需要稍微长一点的时间：两至四星期。[②]事实上，这个勋章满胸的德国空军领袖认为单[775]靠空军就能使英国屈膝，可能不需要用陆军进攻。

他拥有 3 支庞大的航空队可以实现这个巨大的目的：第二航空队在凯塞林元帅指挥之下，从低地国家和法国北部进行活动，第三航空队在斯比埃尔元帅指挥之下，基地在法国北部，第五航空队在施登夫将军指挥之下，驻在挪威和丹麦。前两个航空队总共有战斗机 929 架，轰炸机 875 架，俯冲轰炸机 316 架；第五航空队小得多，拥有轰炸机 123 架和双引擎 ME 一 110 型战斗机 34 架。为了抵御这支强大的空军，英国皇家空军在 8 月初保卫帝国本上的力量为 700—800 架战斗机。

在整个 7 月里，德国空军对在海峡里的英国舰只和英国南部的港口进行的攻击日益频繁。这是一种试探性的行动。尽管在入侵开始以前肃清狭隘的海峡里英国舰只是必要的，但是这些初步空中袭击的目的在于引诱英国战斗机出来作战。这个目的没有达到，英国皇家空军司令部机智地只出动了很小一部分战斗机来应战，结果舰只和一些港口遭到了很大的损失。4 艘驱逐舰和 18 艘商船被击沉,但是这个初步交锋使德国空军付出的代价是 296 架飞机

[①] 《海军事务元首会议记录》，1940 年，第 103 页。

[②] 《空战史学习笔记，第 11 卷，进攻英国的空战，1940—1941 年》，冯·赫斯勒中校著，惠特莱摇引，第 59 页。两周到四周的估计是哈尔德提出的，他记于 7 月 11 日的日记中。

被击毁，135 架被击伤。皇家空军丧失了 148 架战斗机。

戈林在 8 月 12 日下令在第二天开始“ 鹰计划 ”。作为战斗的序幕，12 日对敌人的雷达站进行了猛烈的袭击，5 个雷达站被击中并受到损坏，一个雷达站被炸毁。但是德国人这时还不了解雷达对英国的防御多么重要，因此没有继续袭击这些雷达站。在 13 日和 14 日两天，德国人出动了大约 1500 架飞机，主要是袭击皇家空军的战斗机机场，虽然德国人说已经“ 完全摧毁了 ”其中的 5 个，但是它们所受的损失实际上是微不足道的，德国空军损失了 47 架飞机，皇家空军损失了 13 架。 ”

8 月 15 日展开了第一次大规模空战。德国人从把他们所有的 3 个航空队中的大部分飞机都投了进去，轰炸机出动了 801 架次，战斗机 1149 架次。从斯堪的纳维亚出动的第五航空队遇到了灾难。德国人满心以为东北沿海是一无防御的，因此派出约 800 架飞机对英国南部海岸进行大规模空袭。而只派 100 架轰炸机由 34 架双引擎 ME 一 110 型战斗机掩护去袭击东北沿海，但是这支队伍在飞近太恩河畔时，意外地碰上 7 个中队的飓风式和喷火式机群，因此严重地受到打击。

30 架德国飞机（大部分是轰炸机）被击落，而对方则一无损失。这是第五航空队在不列颠战役中的末日。它从此没有重新参加这场战役。

那天德国人在英国南部比较成功，他们发动了 4 次大规模的袭击，有一次几乎飞到伦敦。他们击中了克劳伊登的 4 个飞机工[776]厂并且损坏了皇家空军 5 个战斗机机场。德国人总共损失了 75 架飞机，皇家空军损失 34 架。按照这个比数，德国人虽然在数量上占优势，也很难希望把皇家空军逐出空中。

戈林这时犯了他的两个战术错误中的第一个错误。英国战斗机司令部派飞机同处于极大优势的攻击力量作战，靠的是机智地运用雷达。德国飞机刚从西欧的一些基地起飞，它们的影子便在英国雷达的萤光屏上显示出来，它们的航程被精确地划出来后，英国战斗机司令部完全知道在什么地点和在什么时候迎战最为有利，这是战争中的新发明，它使德国人感到迷惑，因为在发展和运用这种电子装置方面，德国人远远落后于英国人。

[德国著名战斗机驾驶员阿道夫·加兰后来作证说] 我们意识到皇家空军战斗机中队一定受地面某种新装置的控制，因为我们听到指挥喷火式和飓风式飞机同德国机队作战的命令是非常熟练和准确的……这种雷达和对战斗机的控制使我们感到意外，而且是非常惨痛的意外。[1]

但是在 8 月 12 日使英国雷达站遭到巨大损失的攻击并没有继续进行下去，8 月 15 日戈林受到第一次挫折后，便完全放弃这种攻击。他说：“ 继续攻击雷达站是否还有任何意义是有疑问的，因为受到攻击的雷达站迄今为止没有一个失去作用。 ”

成功地保卫了英国南部上空的第二个关键是扇形站。这是地下神经中心，这个中心根据从雷达、从地面观察站和从空中的驾驶员获得的最新情报，用无线电话指导飓风式和喷火式飞机作战。正如加兰指出的那样，德国人能够听到扇形站和天上的驾驶员之间经常进行的无线电谈话，并且终于开始认识到这些地面控制中心的重要性。8 月 24 日，他们便改变战术，去摧毁这种扇形站，其中 7 个扇形站设在伦敦四周各机场，它们对于保护英国南部和首

---

[1] 阿道夫·加兰：《最初一个和最后一个》，第 26 页。另见加兰的提审记录，威尔莫特在《争夺欧洲的斗争》，第 44 页中援引过。

都本身是十分重要的。这个战术的改变对英国空中防御的关键是一个打击。

直到那天为止，战斗看来对德国空军不利。8 月 17 日，德国空军损失了 71 架飞机，皇家空军则损失了 27 架。曾在波兰和在西线为陆军的胜利铺平道路的缓慢的施图卡式俯冲轰炸机,受到[777]英国战斗机的打击时毫无招架之功。8 月 17 日，戈林把它们撤出了战斗，这样便使德国轰炸机的力量削减了 1/3。8 月 19 日到 23 日，由于天气恶劣，空战停止了 5 天。戈林于 19 日在柏林附近的乡村别墅卡林霍尔回顾了局势后命令，等天气一好，德国空军立即集中力量专门攻击英国皇家空军。

他说：“ 我们在对英国的空战中已经进入了决定性的时期。最重要的任务是击败敌人的空军。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是摧毁敌人的战斗机。 ”[①]

为了完成这个目标，德国人从 8 月 24 日到 9 月 6 日每天平均派出 1000 多架飞机。这位帝国元帅这一回是正确的。不列颠战役已经进入了决定性阶段。皇家空军驾驶员 1 个月来每天要出动好几次，已经很疲劳了。他们虽然进行了英勇的战斗，但是德国方面在数量上的优势开始发挥效力。英国南部的 5 个前进战斗机场遭到了巨大破坏，更糟的是，7 个关键性的扇形站有 6 个受到十分猛烈的轰炸，整个通讯系统似乎已处于被摧毁的边缘。这使英国面临灾难的威胁。

最糟糕的是，皇家空军战斗机防御力量开始变弱了。在 8 月 23 日到 9 月 6 日这个关键性的两周中，英国被摧毁或受重伤的战斗机有 446 架，虽然他们当时并不知道德国空军损失较少：损失 385 架，其中 214 架为战斗机，138 架为轰炸机。而且，皇家空军有 103 名驾驶员被打死，128 名受重伤——为当时全部驾驶员的 1/4。

正如丘吉尔后来所写的那样，“ 局势已对战术空军不利……人们感到十分焦虑 ”。这种情况如果再继续几个星期，英国在天空就没有有组织的防御力量。入侵几乎肯定是会成功的。

但是接着戈林又突然犯了他第二个战术错误，这一错误的后果可与希特勒在 5 月 24 日停止用坦克进攻敦刻尔克相比。它拯救了被打得晕头转向的皇家空军，并且标志着历史上第一次大空战的一个重大转折点。

在英国战斗机防御力量在空中和地面遭受了它无法长期支持的损失的情况下，德国空军 9 月 7 日转而大规模夜袭伦敦。皇家空军的战斗机因此而缓了一口气。

这种战术上的改变对野心勃勃的希特勒和戈林肯定会有非常致命的后果。德国阵营里到底发主了什么事情才使战术作这样的改变呢？答案是十分具有讽刺意味的。

首先，有 12 名德国轰炸机驾驶员在 8 月 23 日晚上飞行时航向有一点错误。他们原来奉令对伦敦效外的飞机工厂和油库投弹，却没有击中目标，而把炸弹投到首都中心，炸毁了一些住房，炸 ［778 ］ 死了若干平民。英国人认为这是有意的，为了报复，第二天晚上他们轰炸了柏林。

衰炸本身没有什么了不起。那天晚上柏林上空笼罩着密云，派出的 81 架皇家空军轰炸机只有大约半数找到了目标。物质损失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对德国士气的影响极大。因为柏林受到飞机麦炸还是第一次。

柏林人惊得目瞪口呆［第二天，8 月 26 日，我在日记上写道］。他们没有想到竟会发生这种事。

[①] 空军参谋总部关于戈林在这次会议上发出的指令的记录。惠特莱著上引书，第 73 页。

当这次战争开始时，戈林曾向他们保证不可能发生这种事……他们相信了他。因此，他们今天感到的失望程度就更大了。你看看他们面部的表情就能衡量出这一点来。

保卫柏林的有里外两层高射炮。当飞临的轰炸机在云层（它使数以百计的探照灯搜寻不到轰炸机）上嗡嗡飞行 3 小时的时候，高射炮火之猛烈是我前所未见的，但是连一架飞机也没有打下来。英国人还扔下一些传单说，“希特勒发动的这场战争将继续下去，希特勒要打多久就打多久”，这是很好的宣传，但是炸弹的爆炸声是更好的宣传。

8 月 28 日的夜间，英国皇家空军派了更多的飞机袭击柏林，我在日记上写道，“第一次在德国的首都打死了德国人”。官方统计数字说炸死了 10 人，炸伤了 29 人。纳粹的要人大为震怒。在第一次袭击时，戈培尔曾命令报纸只用几行字报道空袭消息，现在则指示就英国飞行员“野蛮地”袭击柏林手无寸铁的妇孺大肆宣传。首都的大部分报纸都用同样的标题：《懦怯的英国袭击》。过了两个晚上，在第三次空袭之后，标题则为：《柏林上空的英国空中强盗》！

[9 月 1 日.我在日记里写道]一星期来英国连续不断地进行夜间轰炸的主要作用，是在人民中引起普遍幻灭的情绪和在他们心里播下怀疑的种子……实际上轰炸并不很厉害。

9 月 1 日是战争开始的一周年。除了人们由于睡眠不足和由于出乎意外的轰炸和可怕的高射炮响声的惊扰而神经受到损伤以外，我还记载了人们的情绪。

德国军队在今年取得了甚至在这个侵略成性的军国主义国家的辉煌军事史上也无与伦比的胜利。然而战争并没有过去，也没有打赢。人民的思想今天就集中在这个方面。他们渴望和平。他们希望在冬季来到以前获得和平。

9 月 4 日，冬赈运动在体育馆开幕这天，希特勒认为有必要向[779]人民发表讲话，他要出席这一点一直保密到最后一分钟，这显然是担心敌人的飞机可能利用云层进行轰炸以破坏这次集会，虽然集会是在下午天黑以前一小时举行的。

我很少看见这个纳粹独裁者有这一次那样喜欢冷嘲热讽，或者那样喜欢说德国人民所认为的幽默话，虽然希特勒基本上是一个毫不幽默的人。他称丘吉尔是“那个著名的战地记者”。他说，像“达夫·古柏这样的人在普通的德文里是找不到字来形容的。只有巴伐利亚人有一个字可以恰当地描写这一类人，这就是 krampftlenne”，这个字可以译为“一只神经质的老母鸡”。

［他说］丘吉尔先生或者艾登先生的胡言乱语——为了尊老，这里且不谈张伯伦先生——对德国人民来说不起任何作用。这种胡言乱语充其量不过使他们发笑而已。

于是希特勒继续使他的听众一大部分是女护士和社会工作者——发笑，随后是歇斯底里地鼓掌。他需要答复德国人民心中想得最多的两个问题：什么时候进攻英国，对于柏林和德国其他城市遭到的夜袭将采取什么行动？关于第一个问题：

在英国，人们充满了好奇心，他们一直在问：“他为什么不来？”别着急，别着急。他就来了！他就来了！

他的听众觉得这句俏皮话很好笑，但是他们也相信这是毫不含糊的保证。至于轰炸问题，他首先捏造了典型的谎言，最后进行了可怕的威胁：

现在……丘吉尔先生正在显示他想出的新主意——夜间空袭。丘吉尔先生进行这些空袭，并不是因为这些空袭很有效，而是因为他的空军不能够在白天飞临德国上空……但是德国飞机则每天都飞临英国领土上空……英国人看见一点亮光就扔下炸弹……扔在住宅区、农场和乡村里。

接着进行了威胁。

我 3 个月没有回击，因为我认为这种疯狂行动会停止的。丘吉尔先生却把这一点当作是示弱。现在我们要以夜袭来回答夜袭。

当英国空军扔下 2 千、3 千或者 4 千公斤炸弹时，我们将在一夜间扔下 15 万、23 万、30 万或者 40 万公斤炸弹。

根据我的日记记载，希特勒说到这里时不得不停下来，因为[780]德国妇女听众歇斯底里地鼓掌。

希特勒继续说，“当他们说他们将加强对我们城市的袭击的时候，我们将把他们的一些城市夷为平地”。这时，我记载说，那些年轻妇女忘乎所以，狂热鼓掌。在她们恢复平静后，他又说：“我们将制止这些夜间空中强盗的行径，愿上帝帮助我们！”

我还记载说，在听到这话时，“年轻的德国妇女跳了起来，挺起胸部，高喊她们赞成”！

希特勒最后说：“总有一天，我们两个国家有一个会求饶，但这决不会是国家社会主义的德国！”我最后记载说，这时“疯狂般的妇女们才从狂喊乱叫转为齐声高喊‘决不是！决不是！’”

齐亚诺数小时后在罗马听到录音广播，他承认感到迷惑不解。他的结论是，“希特勒一定是神经过敏了”。[①]

德国空军在白天对皇家空军进行攻击甚为顺利，如今改为大规模夜袭伦敦，希特勒之所以作出这个有致命后果的决定，他的神经过敏是一个因素。这既是一个军事决定，也是一个政治决定，作出这一决定的一部分原因，是为了对柏林以及德国其他城市遭受的轰炸（这同德国空军对英国一些城市的轰炸比较起来犹如小巫见大巫）进行报复，并且用夷平英国首都的办法来摧毁英国人进行抵抗的意志。如果此举成功的话，可能就不需要进攻英国，而希特勒和戈培尔是毫不怀疑此举是会成功的。

因此，在 9 月 7 日傍晚，对伦敦的大规模空袭开始了。正如前面所说*，德国人投入了 625 架轰炸机和 648 架战斗机。在那天星期六下午 5 点左右，第一批 320 架轰炸机在德国所有的战斗机的保护下，飞到泰晤士河上空，开始向瓦尔维治兵工厂、各个煤气厂、发电厂。仓库以及几英里长的码头扔下了炸弹。这一片广大地区立即成为火海。锡佛尔镇的居民被火包围了，不得不从水路把他们撤出来。天黑以后，在 8 点 10 分，第二批 250 架轰炸机再次进行袭击，接着一批又一批的飞机不断前来轰炸，一直进行到星期天早晨 4 点 30 分。第二天晚上 7 点 30 分又来了 200 架轰炸机，继续炸了一整夜。据英国官方的历史学家说，在最初这两天夜里约有 842 人死亡和 2347 人受伤，这个大城市遭到了巨大的破坏。[①]在整个下一星期中，天天晚上都遭到空袭。[②]

接着，德国空军在胜利（或者说它自认为的胜利）的鼓舞下，决定在白天对这个疮痍满目、大火焚烧中的首都进行大规模空袭。这便导致了 9 月 15 日（星期天）的这次战争中的一场决斗性的战斗。[781]这天大约中午时分，

[①] 《齐亚诺日记》，第 290 页。

[①] 见 T·H·奥布里恩：《民防》。这是英国官方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中的一卷，由巴特勒教授编辑，皇家出版局出版。

[②] 这时，夜间的防御还没有完善，德国人的损失微不足道。

200 架左右的德国轰炸机在 3 倍的战斗机掩护下在海峡上空出现，飞向伦敦。英国战斗机司令部在雷达荧光屏上注视着进攻者的聚集，并且作好了准备。德国人在逼近英国首都以前就遭到拦截，虽然有几架飞机穿过去了，但是很多飞机被驱散了，另外一些还没有把炸弹扔下就被击落，两小时后，一支甚至更为强大的德国机队来了，也被打得落花流水。尽管英国人宣称击落了 185 架德国空军的飞机，战后从柏林档案中获悉的实际数字要小得多——56 架，但是其中有 34 架是轰炸机。英国皇家空军仅丧失了 26 架飞机。

这一天的战斗表明，德国空军至少在当时还不能成功地在白天对英国进行大规模的空袭，因为它停止袭击英国战斗机而改为空袭伦敦已使英国战斗机有一个星期的时间来恢复元气。情况既然如此，要进行有效登陆的前景自然就暗淡了，因此，9 月 15 日这一天是不列颠战役的一个转折点，正如丘吉尔后来所估价的，是不列颠战役的“关键”。戈林在第二天下令改变战术，规定白天使用轰炸机不再是为了进行轰炸，而只是用它们来作英国战斗机的诱饵。他吹嘘说，敌人的战斗机“应当在四五天内消灭”。[①]但是希特勒以及陆军和海军的司令们比他知道得更清楚。在决定性的空战之后两天，即 9 月 17 日，正如我们前面已经指出的，元首把“海狮计划”无限期推迟了。

伦敦从 9 月 7 日到 11 月 3 日连续 57 个夜晚遭到恐怖袭击，每天平均有 200 架轰炸机前来轰炸，以致在丘吉尔看来（他后来如此透露），这个城市不久肯定将成为一片废墟；同时英国其他大部分城市，尤其是考文垂，在整个秋天和冬天也要遭到巨大的残酷的破坏。尽管如此，英国的士气并没有瓦解，军火的生产也没有下降，而希特勒曾十分自信地认为一定会如此的。情况恰恰相反。作为德国轰炸机首要目标之一的英国飞机工厂的产量，在 1940 年实际上仍然比德国人多，其比数为 9924 架对 8070 架飞机。希特勒在英国上空损失大量的轰炸机，它们一直没有能恢复原来的数目。事实上，德国的机密档案表明，德国空军在夏末和秋天在英国上空遭受打击之后，一直没有能够完全恢复。

德国海军首脑们一直承认，海军自从初春在挪威海面遭受严重损失以来，不能够为入侵英国提供海上的力量。没有这种力量，没有空中的优势，德国陆军要想横渡这狭小的海峡是无能为力的。

战争发生以来希特勒第一次被制止住了，他的进一步征服计划遭到了挫折，我们上面已经谈到，而就在这时，他却肯定认为已经获得了最后的胜利。

他从来没有想到，到那时为止也从来没有别人想到，一次决定性的战役能够在空中决定胜负。或许他也没有认识到，当阴暗[782]的冬天笼罩着欧洲的时候，少数英国战斗机驾驶员由于阻挠了他的入侵，保全了英国，使它成为一个日后从西方重新征服大陆的巨大基地。他的念头不得不转到别处，而事实上，我们在下面将要看到，他的念头已经转到别处了。

英国保全了。在将近 1000 年的时间内，英国成功地用海上的力量保卫了自己。英国领袖们尽管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做了种种蠢事，本书不乏这种记载,但他们之中终于有少数几个人及时地认识到空军已经成为 20 世纪中叶的决走性力量，小小的战斗机和它的驾驶员成了主要的防御盾牌。丘吉尔于 8 月 20 日在另一次难忘的总结性演说里对下院说，“在人类战争领域里，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那么多的人的生存全靠那么少的人”。他说这话的时候，

[①] 戈林同空军首脑举行的会议的记录，9 月 16 日。惠特莱援引，第 87 页。

空战仍在激烈进行，结局如何还不得而知。

如果入侵成功

如果纳粹德国占领了英国，那不会是一件好受的事情。缴获的德国文件使人毫不怀疑这一点。陆军总司令勃劳希契在 9 月 9 日签署了一项指令，规定“除非当地局势要求作例外规定，[英国的]所有从 17 岁到 45 岁的健全的男性居民都将被拘禁，送到大陆”。几天以后，陆军总司令部的军需总监向集合起来准备入侵的第九军团和第十六军团发出了同样的命令。在任何其他一个被征服的国家里，甚至在波兰，德国人都没有在一开头就采取这样激烈的措施。勃劳希契指令的标题是《关于英国军政府的组织和职能的命令》，并且作了很详细的规定。它的目的似乎在于保证对这个岛国进行有计划的洗劫并对它的居民进行恐怖统治。为了完成第一个目标，在 7 月 27 日建立了一个特设的“驻英经济军管处”。除了家常用物以外，一切都将立即没收。一些人要作为人质。凡是张贴一张德国人所不喜欢的标语者将立即被枪决，凡是在 24 小时以内不交出武器或无线电收发报机者，将受到同样的惩处。

但是真正的恐怖行动将由希姆莱和党卫队来执行。由海德里希领导的令人害怕的德国中央保安局负责。*奉派要在伦敦就地指挥其活动的人是一个党卫队上校。大学教授弗朗兹·西克斯博士。他也是一个知识分子出身的匪徒，在纳粹时期，不知怎么他竟被吸引参加希姆莱的秘密警察。西克斯教授辞去了柏林大学经济系主任的职务，参加了海德里希的保安处，他在那里专门处理[783]“科学事务”，这个“事务”的神秘的一面，戴眼镜的海因里希·希姆莱和他手下的刽子手是颇为着迷的。英国人民由于西克斯博士没有在英国出现而错过了领略他的本领的机会，但可以从他后来在俄国的所作所为看出一些来，在俄国，他在党卫队特别行动队里很活跃，后者是以在那里进行大规模屠杀而出名的。这位教授的专长之一就是从被俘的苏联人中查出政治委员加以杀害。[①]

据缴获的德国中央保安局的档案透露，戈林曾于 8 月 1 日叫海德里希开始工作。党卫队保安警察和保安处应

> 在军事入侵的同时开始它们的活动，以便查封在英国的许多重要反德组织和团体并对它们进行有效的斗争。

希特勒在 9 月 17 日无限期推迟入侵，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西克斯教授就在这一天被海德里希正式委任他在英国的新职位。海德里希对他说：

> 你的任务在于用必要的手段，同一切能够在英国查到的反德组织、机构和反对团体进行斗争，以防止所有可以得到的物资被运走，并集中和保护这些物资，以供将来使用。我指定伦敦为你的总部所在地……我授权你在英国其他地方设立小型的特别行动队，如果局势要求这样和有此必要的话。

实际上，海德里希在 8 月间就已经为英国建立了 6 个特别行动队，由设在伦敦、布里斯托尔、伯明翰，利物浦、曼彻斯特和爱丁堡（如果发现福思桥被炸掉的话，则设在格拉斯哥）的总部指挥它们的活动。它们将执行纳粹的恐怖政策；在开始时，它们要逮捕所有在《英国特别搜查名单》上的人，这个名单是希姆莱的另一个年轻聪明的大学毕业生瓦尔特·施伦堡在 5 月间匆匆忙忙、漫不经心地编制出来的，施伦堡当时是德国中央保安局第四 E 处

[①] 西克斯博士 1948 年在纽伦堡作为战犯被判 20 年徒刑，但于 1952 年获释。

（反间谍）的处长。这是施伦堡后来说的，虽然当时他主要是在葡萄牙的里斯本忙于进行绑架温莎公爵的离奇使命。

这个英国特别搜查名单是和其他更为有趣的“入侵”，文件一起在希姆莱的文件中发现的，当然，本来是没想到会让人们发现的，名单上罗列了大约 2300 名英国的知名人士，德国的秘密警察[784]认为立即监禁他们是重要的，他们不全是英国人，丘吉尔自然列在名单上，还有内阁成员和所有党派的著名的政治家。名单上有报纸的著名主编、发行人和记者，其中包括《泰晤士报》前驻柏林的两位记者诺曼·埃布特和道格拉斯·里德，他们发的消息曾使纳粹不快。英国的一些作家受到特别的注意。突出的是没有萧伯纳的名字，但是有 H·G·威尔斯，其他的作家有佛吉尼亚·沃尔夫，E·M·福斯特、阿尔杜斯·赫胥黎、J·B·普里斯特莱、斯蒂芬·斯宾德、C·P·斯诺、诺尔·考德、丽贝加·维斯特、菲利普·吉伯斯爵士和诺曼·安吉尔。也没有放过学者，他们当中有吉尔伯特·摩雷、伯特兰·罗素、哈罗德·拉斯基、皮特丽斯·韦伯和 J·B·S·哈尔丹。

德国秘密警察还打算在英国搜捕外国和德国的流亡者。在它的名单上有巴德莱夫斯基、弗洛伊德*和却姆·威兹曼，还有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的总统贝奈斯和外交部长扬·马萨里克。在许多德国难民中，有两个过去是希特勒的私友、后来又反对他的人，他们是赫尔曼·劳希宁和恩斯特·汉夫施丹格尔。名单上的许多英国人的名字拼得乱七八糟，以致几乎分辨不出他们是谁，有时还附有奇怪的说明，例如，波纳姆·卡特夫人被写成卡特一波纳姆夫人，说明中不仅写有“婚前姓名维奥莱特·阿斯奎思”，而且称她为“主张包围德国的女政客”。每个名字后面标着 R.S.H.A.（德国中央保安局）字样，意思是由它来处理此人。丘吉尔则由第六处（外国情报处）处理，不过大部分人却将交给第四处（秘密警察）处理。这个纳粹黑名单实际上是一本称作《情报稿》的被认为是绝密手册的附录，施伦堡说这个《情报稿》也是他写的，其目的似乎在于帮助征眼者洗劫英国并且消灭那里的一切反德组织。它甚至比搜查名单还要有趣。在开列的许多危险的组织中，除了德国中央保安局“特别注意”的共济会会所和犹大人的各种组织以外，还有“公共学校”（在英国就是私立学校），被称为“英帝国政策的得力工具”的英国教会以及童子军，它称童子军是“为英国谍报局提供消息的极好来源”。童子军的受人尊敬的领袖和创始人巴登一包维尔勋爵则要立即予以逮捕。

如果德国人果真入侵的话，也不会得到英国人的客气对待。丘吉尔后来承认，他那时常常在想，不知会发生什么情况。不过下面这种情况，他确信是会发生的：[785]

> 双方都将进行残酷和大规模的屠杀。不会有仁慈或宽大。他们会采取恐怖手段，我们也准备采取一切极端措施。[①]

他没有具体说明采取什么样的极端措施，但是彼得·弗莱明在他写的关于“海狮”的书中谈到其中之一。他说，英国人曾决定，如果所有其他常规的防御方法都失败了，则准备用飞机低空飞行，施放糜烂性的芥子毒气来攻

[①] 若干美国人也被列入逮捕的名单，包括伯纳德·巴鲁赫、约翰·根室、保罗·罗伯逊、路易·弗歇尔、丹尼尔·德·鲁斯（他是美联社记者）名单上把他写成“丹尼尔·德·鲁斯——美国记者”，列在字母口栏内）和 M·W·弗道尔。弗道尔是芝加哥《每日新闻》记者，以写反对纳粹的文章而出名。

[①] 丘吉尔：《他们最美好的时刻》，第 279 页。

击德国人的滩头阵地，作为最后一着。这是一个痛苦的决定，最高当局作这个决定时不是不感到内疚的；而且正如弗莱明所说，这个决定“在当时和以后都一直保守秘密”[②]。

丘吉尔所考虑的这种屠杀以及德国秘密警察计划进行的这种恐怖活动，在当时当地都没有发生——至于原因，我们已经在这一章里叙述了。然而不到一年，在欧洲的另一部分，德国人就要在空前的规模上放手进行这种恐怖活动。

甚至在放弃入侵英国以前，阿道夫·希特勒就已经作出一项决定。他将在来年春天转而进攻俄国。

附记：纳粹绑架温莎公爵夫妇的阴谋

纳粹阴谋绑架温莎公爵夫妇，并且劝诱这位前英王同希特勒合作，以便与英国请和，这段故事虽很有趣，但没有什么重要性，不过通过它可以看到第三帝国的统治者在他们获得巨大胜利的那年夏天的荒唐可笑的一面。缴获的德国外交部文件[①]详细说明了这个想入非非的计划的制订过程,被派执行这一计划的年轻的党卫队保安处领导人瓦尔特·施伦堡，在回忆录[②]中也谈到这件事。

里宾特洛甫曾告诉施伦堡，这是希特勒的主意。这位纳粹外交部长十分热情地接受了这个计划，他的极端无知往往驱使他抱有这种热情。同时，德国外交部和它驻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外交代表们在 1940 年关键性的夏天也不得不为这个计划浪费了大量时间。

1940 年 6 月法国沦陷之后，作为英国驻法国陆军最高司令部的军事代表团成员的这位公爵，偕同夫人前往西班牙，以免被德国人所俘。德国驻马德里大使、职业外交家埃伯哈德·冯·施托勒 6 月 23 日打电报到柏林说：

> 关于如何对待即将子今天到达马德里的温莎公爵夫妇，西班牙外交部长征求我们的意见，公爵夫妇显然是取道里斯本前往英国的。外交部长认为，我 [786]们或许可能对于把公爵扣留在这里并可能和他建立接触一事感到兴趣。请回电指示。

第二天里宾特洛甫回电作了指示。他建议把温莎夫妇“在西班牙扣留两个星期”，但是警告说，一定不要流露出“建议系来自德国”。第二天，6 月 25 日，施托勒回答说：“[西班牙]外交部长答应我尽一切可能把温莎扣留在这里一些时候。”外交部长胡安·贝贝台尔·伊·阿蒂扎上校会见了公爵，并把会见的情况告诉了德国大使，大使于 7 月 2 日用“绝密”电报向柏林汇报说，除非承认公爵夫人为王室的成员和给予公爵本人一个重要的地位，温莎将不返回英国。他将在佛朗哥政府答应给他的一所古堡中住下来。

> [大使又说]温莎曾向外交部长以及其他熟人表示，他反对丘言尔，反对战争。

7 月初，温莎夫妇前往里斯本。德国驻里斯本公使在 7 月 11 日向里宾特洛甫报告说，公爵已被任命为巴哈马总督，但是“打算尽可能长地推迟动身时间……希望局势会有对他有利的转变”。

[②] 彼得·弗莱明：《海狮计划》，第 293 页。这是一部出色的书，但是弗莱明不能看到保密文件，虽然他说他获准在惠特莱的著作出版之前不久花了一两个小时把它翻阅了一遍。

[①]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 10 卷。

[②] 施伦堡：《迷宫》，第 2 章。

[公使又说]他深信，如果他仍然是国王的话，战争本来是会避免的，他称自己是坚决支持同德国媾和的人。公爵肯定地认为，继续猛烈地轰炸将使英国愿意媾和。

这个情报促使狂妄自大的德国外长在富许尔从他的专车发出一封标有“特急、绝密”字样的电报给德国驻马德里大使馆，这是在同一天即 7 月 11 日深夜发出的。他希望把公爵送回西班牙，最好由他的西班牙朋友送回，以阻止他前往巴哈马，里宾特洛甫说，“在公爵和他的夫人回到西班牙之后，必须劝说或者强迫他们留在西班牙领土上”。如果必要的话，西班牙可以把他当作英国军官“拘禁”起来，并且把他“作为逃亡军人”对待。

［里宾特洛甫进一步说］在适当时机必须告诉公爵，德国是希望同英国人民媾和的，但遭到丘吉尔集团的阻挠。如果公爵本人为局势的进一步发展作好准备，那将是一件好事。德国决心用各种办法迫使英国媾和，如果这样的情况发生的话，德国准备满足公爵所表示的任何希望，特别是使公爵和夫人来担任英国国王和王后。如果公爵另有打算，但又愿意为建立德国和英国之[787]间的良好关系而合作，我们也同样准备保证他和他的夫人有一笔生活费，使他能够……过和国王身份相称的生活。*

这个愚昧无知的纳粹部长当德国驻伦敦大使的经验并没有使他对英国人有什么了解。他又说，他已得到情报，“英国特务机关”将在公爵一到巴哈马之后就“干掉”他。

第二天，7 月 12 日，德国驻马德里大使会晤了西班牙内政部长、佛朗哥的姻兄弟雷蒙·塞兰诺·苏纳，这位部长答应把佛朗哥也拉进这一阴谋并执行下述的计划：西班牙政府将派公爵的老友、马德里长枪党的领袖、前西班牙一位独裁者的儿子米古埃尔。普里摩·德·里维拉前往里斯本。里维拉将邀请公爵到西班牙来打猎并同政府商谈关于英国一西班牙的关系问题。届时苏纳

将把英国特务阴谋杀害他的消息告诉公爵。

[德国大使向柏林报告说]这位部长随后还将邀请公爵和夫人接受西班牙的接待，可能还有经济上的帮助。也可能用其他的办法不让公爵离开。在这整个计划中，我们将一直完全隐蔽在幕后。

据德国文件说，里维拉于 7 月 16 日第一次访问温莎夫妇之后，从里斯本回到了马德里。他给西班牙外交部长带来一个消息，外交部长把它转给德国大使，大使立即发往柏林。这个消息说，丘吉尔在一封“非常冷淡和毫无商量余地的信件里”任命公爵为巴哈马的总督，并命令他立即前去就职。如果他不去，“丘吉尔曾以交军事法庭审判威胁温莎”。这个消息还说，西班牙政府同意“再一次紧急警告公爵不要去就职”。

7 月 22 日，里维拉第二天访问里斯本后归来。第二天德国大使及时用“特急、绝密”电把他发现的情况汇报给里宾特洛甫。

他曾同温莎公爵作了两次长淡；最后一次谈话时，公爵夫人也在座。公爵毫无拘束地表示了自己的意见……在政治上，他同英王和目前的政府愈来愈远了。公爵和夫人并不畏惧十分愚蠢的国王，而是害怕精明的王后，她巧妙地施计反对公爵，特别是反对公爵夫人。

公爵正在考虑发表一项公开声明……反对目前的英国政策并与他的兄[788]弟决裂……公爵和夫人说，他们很希望回西班牙。

电报又说，为了便于此事的进行，大使已和苏纳作好安排，派遣另一名西班牙使者前往葡萄牙“劝说公爵离开里斯本，假装乘汽车作长途旅行，然后在安排好的地点越境，那里的西班牙秘密警察一定会设法使他们安全越过边境”。

两天后，大使又用“特急、绝密”的电报把来自里维拉的进一步消息报告给里宾特洛甫。

他劝告公爵不要去巴哈马，而返回西班牙，因为可能需要公爵出来在英国政策中起重大的作用，并且有可能登上英国王位，这时公爵和夫人都显然感到惊讶。两人……回答说，根据英国的宪法，在逊位以后是不可能再即位的。于是密使表示，他预料战争的发展可能甚至改变英国的宪法。公爵夫人这时就沉思起来。

德国大使在这份电报中提醒里宾特洛甫说，里维拉不知道“德国在这个事件里有任何利害关系”。这位年轻的西班牙人显然相信他是在为他自己的政府效劳。

到了7月的最后一个星期，纳粹绑架温莎夫妇的计划已经拟妥。希特勒亲自委派瓦尔特·施伦堡执行这个计划。他从柏林飞到马德里同那里的德国大使商谈，然后前往葡萄牙开始工作。7月26日，大使已经能够发出长篇的“最急、绝密”的电报给里宾特洛甫，叙述阴谋的梗概。

……可以假定公爵夫妇已决心返回西班牙。为了加强他们的这个决心，今天已派出第二个密使，带给公爵一封写得很巧妙的信件；信内附有周密准备的关于越境的计划。

根据这项计划，公爵和夫人将启程前往西班牙边境附近的山区，表面上说是去避暑，实际上是在打猎的过程中在特定时间内在明确指定的地点越境。由于公爵没有护照，需要把该地负责的葡萄牙边境官员收买过来。

在计划规定的时间中，第一个密使［普里摩·信·里维拉］将与布置在适当地点的西班牙军队在边境守候，以保证安全。

施伦堡一行为了同一目的，将离开里斯本继续活动。　［789］

为此目的，在前往避暑地点的旅程中以及避暑时，应当有一个可靠的葡萄牙警察长暗中进行保护……

在预定越过边界的时刻，施伦堡一行应当接管边界上的葡萄牙一边的安全工作，并且要作为直接的护卫人员继续进入西班牙。这些护卫人员要时常更换，但不要引起注意。

为了整个计划的安全，［西班牙］部长选择了另一名特工人员，一名妇女，她在必要时可以同另一名特工人员进行联系，也可以在必要时向施伦堡提供情报。

同时也作了准备，使公爵夫妇能够乘飞机到达西班牙，以防万一由于英国谍报局采取的行动而发生紧急情况。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就像执行第一个计划那样，首先必须对公爵的明显的英国人心理巧妙地施加心理影响，使他愿意离开，而不要造成仓惶逃走的印象。办法是利用他对英国谍报局的不安心情和利用他在西班牙领土可以自由进行政治活动的前景。

除了在里斯本的护卫工作以外，考虑在必要时采取适当的恫吓行动，使他愿意离开。这种恫吓行动可归咎于英国谍报局。

这就是纳粹绑架温莎公爵夫妇的计划。它具有典型的德国人的愚蠢作风。德国人一向不能了解“公爵的英国人心理”，也使这项计划受到阻碍。

施伦堡及时地执行了这个“恫吓行动”。一天晚上，他安排人员对温莎夫妇的别墅的窗户投掷石头，然后在仆人中间散布谣言，说是“英国特务机关”干的。他让人送一束花给公爵夫人，所附的一张名片上写道：“谨防英国特务机关的阴谋，一个关心你的利益的葡萄牙朋友。”他在向柏林发出的正式报告中说，“预定在7月30日晚上进行的打枪（打碎卧室窗户的一种无害的行动）没有进行，因为它对公爵夫人产生的心理影响只会加强她离开的愿望”。

时间已经不多了。施伦堡在7月30日报告说，公爵的一位老朋友、英国政府的重要官员华尔特·蒙克顿爵士，已到达里斯本。他的使命显然是使公爵夫妇尽快前往巴哈马群岛。同一天，德国驻马德里大使向里宾特洛甫拍发了一份“特急、绝密”的电报说，在里斯本的一名德国情报人员刚刚告诉他，

公爵夫妇计划在 8 月 1 日（即两天以后）离开。由于这种情况，他问里宾特洛甫，“我们是否应当在某种程度上从我们所处的幕后地位走出来”。这位大使又说，根据德国的情报，公爵已经向他的主人葡萄牙银行家理查图 -图 伊斯比利多·圣多·席尔瓦表示“希望同元首接触”。［790］为什么不安排温莎和希特勒之间的会晤呢？

第二天，7 月 31 日，大使再次向里宾特洛甫发出一封“特急、绝密”的电报，内称：据在里斯本会见温莎夫妇后刚刚回来的西班牙密使说，公爵夫妇虽然“对于英国阴谋伤害他们的消息和他们个人的安全很为关注”，但是显然仍计划在 8 月 1 日乘船启行，不过温莎企图“隐瞒实际的启行日期”。大使又说，西班牙内政部长即将对“防止公爵夫妇的离开作最后努力”。

温莎夫妇可能很快启行的消息，使里宾特洛甫感到吃惊，他在同一天即 7 月 31 日傍晚从他在富许尔的专车上向德国驻里斯本公使发出了一封“特急。绝密”的电报。他要求通过公爵的主人、葡萄牙银行家把下列情况通知公爵：

德国基本上希望同英国人民媾和。丘吉尔集团堵塞了这条和平道路。在元首上次发出的要求采取理智态度的呼吁遭到拒绝之后，德国现在决心以一切力量迫使英国媾和。如果公爵使自己对事态的进一步发展作好准备，那将是一件好事情。在这种情况下，德国将愿意同公爵进行最密切的合作，并为公爵和夫人听表示的任何愿望扫清道路……如果公爵和夫人抱有其他意图，但是愿意在建立德国和英国的良好关系方面进行合作，德国同样准备同公爵进行合作，并按照公爵夫妇的愿望为他们的前途作出安排。与公爵同住的葡萄牙密使应该作最认真的努力，来阻止他明天启程，因为据我们掌握的可靠消息，丘吉尔打算在巴哈马把公爵控制起来，以便使公爵永久住在那里，而且还因为我们在适当的时候同公爵在已哈马群岛建立接触是十分困难的……

这位德国外长的紧急电报在午夜前不久送到了驻里斯本的公使馆。德国公使在夜间会见了伊斯比利多·圣多·席尔瓦先生，竭力要求他把这个消息告诉他的贵宾。这位银行家在 8 月 1 日早晨照办了。据公使馆的电报说，公爵深受感动。

公爵赞扬了元首的和平愿望，这种愿望同他自己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他坚信，如果他是国王，决不会进行战争。他欣然同意向他提出的在适当时候进行合作建立和平的要求。但是在目前，他必须遵守他的政府的官方命令。[791]不服从命令会过早地暴露他的意图，引起一件丑闻，并使他在英国威信扫地。他还深信，目前由他出面还为时过早，因为英国还没有要同德国进行商谈的意向。但是，一俟这种情绪改变，他就准备立即回去……英国早晚会要他回来（他认为这一点是完全可能的），德国也将表示愿意同他谈判。在这两种情况下，他都准备作出个人的任何牺牲，愿意效劳，而毫不带有个人野心。

他将同他以前的主人继续通讯，并同他订好一个暗号，他在接到这个暗号后将立即回来。

公爵夫妇在 8 月 1 日晚上乘美国邮船阿瑟王之剑号启程了，这使德国人大吃一惊。施伦堡在第二天给“外长[里宾特洛甫]亲收”的长电中提出的关于他的任务失败的最后报告中说，他直到最后一刻为止，做了可能做的一切事情来阻止公爵夫妇启程。佛朗哥的一个兄弟（他是西班牙驻里斯本大使）已被说服，同意向温莎夫妇发出最后一分钟的呼吁，要求他们不要走。施伦堡说，装载公爵夫妇的行李的汽车被“破坏了”，因此行李很晚才送到船上。德国人散布谣言说，有人在船上放了定时炸弹。葡萄牙官员推迟了开船的时间，在船上进行了彻底搜查。

但是，公爵夫妇还是在那天晚上启程了。纳粹的阴谋失败了。施伦堡在向里宾特洛甫提出的最后报告中，认为这种失败应归咎于蒙克顿的影响，归

咎于“西班牙计划”的失败和“公爵的心理”。

在缴获的德国外长的档案中，关于这个阴谋，还有最后一项文件。8 月 15 日，德国驻里斯本公使打电报给柏林说：“密使刚刚败到了公爵从百慕大发来的一份电报，要求他一俟宜于采取行动就发出通知。是否应该作任何答复？”

在德国外交部的文件中没有找到答复。到 8 月中，希特勒决定用武力征服英国。为英国寻找一个新国王是不必要的。这个岛屿，将如其他一切被征服的领土一样，由柏林来直接治理。至少希特勒是这样想的。

德国的秘密文件所叙述的而且得到施伦堡补充的这个离奇的故事，就谈到这里。施伦堡是一个不可信的人，不过若说他在这个故事中所扮演的角色——他承认他所扮演的角色是可笑的——完全出诸他的捏造，也是使人难以相信的。

在这些德国文件公布之后，公爵在 1957 年 8 月 1 日通过他在伦敦的律师发表了一项声明。他在声明中指责里宾特洛甫同德国驻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大使的通讯“完全是捏造，一部分则大大歪［792］曲了真相”。温莎解释说，当他在 1940 年在里斯本候船前往巴哈马时，“某些人”（他发现这些人是纳粹的同情者）曾作过一定的努力劝他回到西班牙，不要去担任他的总督职务。

他说：“有人甚至向我暗示，如果公爵夫人和我前往巴哈马，我们甚至可能遇到人身的危险，在任何时候，我都从未有过要照这种暗示去做的想法，我待之以它应得的轻蔑。”

英国外交部发表一项正式声明，说公爵在战争期间对英国的忠诚从来没有动摇过。[①]

[①] 《纽约时报》，1957 年 8 月 1 日。